邱克●著

邱克

历史考古文博论文集



线装书局

邱克历史考古文博论文集

邱　克　编著

线装书局

电子图书在版编目数据

邱克历史考古文博论文集 / 邱克 著 .——北京：线装书局，2023，9

ISBN 978-7-89544-623-6

邱克历史考古文博论文集

作　　者：邱　克
责任编辑：陈　卓
封面设计：候　泰
美　　编：范　范
校　　对：高　燕
策　　划：东方巨名（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　　版：线装书局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日月天地大厦
字　　数：250 千字
载　　体：光盘
版　　次：2023 年 9 月第一版第 1 次出版
I S B N：978-7-89544-623-6
定　　价：8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郑和下西洋　001

谈《明史》所载郑和宝船尺寸的可靠性　003

郑和与西安　013

试论《郑和航海图》的地名研究　016

新绘《郑和航海图》的地名补释和航线分析　023

国外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033

读曾鍏波《郑和下西洋考略》　043

从越南史料看郑和下西洋与占城的关系　046

第二部分　英人赫德与近代中国　055

英人赫德与中国外交的近代化　057

英人赫德与中葡澳门交涉史料　128

英人赫德与澳门问题　142

论晚清总理衙门之前的“抚局” 149

《清史稿·赫德传》补注 154

关于《英商否认海关洋员违章处分的管辖权和（会讯船货入官章程）的制定》的补充 162

有关晚清福州税务司美里登的档案史料 166

试述晚清档案中有关中国海关的资料 173

试评汪敬虞先生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 179

第三部分 中西交通史 185

交往理论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187

我国地名与古代造船 193

《马可·波罗游记》的汉译版本 196

闭关锁国时代广州与长崎的比较 203

古代花刺子模 211

古代奄蔡 214

斯基泰人 215

海上丝绸之路与各国船舶 217

评《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 229

人类最古老的帆船 232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的西方知识 234

李昭祥《龙江船厂志》的史学价值和海外影响 249

第四部分 考古学与博物馆学 265

谈殷都地望选择 267

古代车辆与东西方文化 269

浅谈海洋考古学 277

论殷代战车源自西方说 285

关于匈奴西迁欧洲的质疑 293

论手机博物馆及其教育功能的发挥 302

海洋文化数字旅游平台初探 312

增强现实技术在博物馆的运用 319

虚拟触觉让藏品“触手可及” 329

虚拟嗅觉技术——唤醒历史的记忆 334

虚拟现实技术在水下考古的应用前景 337

展品点交工作的数字化尝试 340

未来博物馆如何拥抱新科技 344

大中华地区海事博物馆网站的比较 349

图像触觉感知如何帮助博物馆的视障观众 354

基思·穆克尔瑞及其《海洋考古学》的学术价值 364

定向音箱给博物馆观众带来新奇的视听感受 378

第五部分 点滴回忆 381

四十年后重返魂牵梦绕的焦坪 383

西安外国语学校的回忆 385

深切怀念张维华教授 390
怀念山大留学生朋友韩克图 395
暨南园的回忆 401
白求恩故居访问记 417
厚谊常存魂梦里 420

第一部分

郑和下西洋

谈《明史》所载郑和宝船尺寸的可靠性

关于《明史》所载郑和下西洋宝船尺寸的可靠性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专家根据现代造船原理，认为《明史・郑和传》中“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的记载是不可信的。他们提出，这一记载出自并仅见于明人“说集”的《瀛涯胜览序》，因此不能说这个尺寸有充分的根据。对此笔者想谈一点粗浅的看法，恳祈同志们教正。

关于郑和宝船的尺寸记载

有关郑和下西洋宝船尺寸的记载，今见于明钞说集本《瀛涯胜览》①和《客座赘语》②《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以下简称《西洋记》）③《国榷》④。《郑和家谱》⑤以及《明史・郑和传》等书均成书较晚，从时间先后和所载内容来看，其后诸书内容基本相同，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录自马欢的著作。因此，首先应当对“说集本”《瀛涯胜览》中的记载穷源究委，判断其究竟是出自马欢之笔，抑或是传写或刻印过程中的舛误。

众所周知，《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三部最初史料。其作者的身份、地位都比较低。费信、巩珍是士兵出身，马欢也只是一个通事（即翻译）。他们与前代修史写书的官员有着很大的不同。加之他们究系亲历而非耳闻，附舶浮海，历涉诸邦，往返数年，“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他们所记录的航行经过以及沿途的风土人情，为研究明代航海史提供了珍贵史料，其可靠性更远非其他修史写书者可比。所以，如果能够证实宝船尺度为马欢所载，这个数字应不会有大的误差。因为马欢对自己乘过8次，并在其上生活工作过很长时间的宝船长、宽尺度的估算，充其量只可能差之毫厘，而绝不至于谬之千里。

---

① 按：明钞说集，共六十种，四函二十册。《全国丛书综录》未著录。《瀛涯胜览》收在第二函。白棉纸，白口，兰格，半页十一行，共39页。

②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宝船厂条，金陵丛刻本。

③ （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15回，上海申报馆排印本。

④ （明）谈迁：《国榷》永乐三年条，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⑤ 李士厚：《郑和家谱考释》，自刊本，1937年增订版，第3页。

这里的问题是，《瀛涯胜览》的各种版本约二十种，但大多数版本上并没有宝船尺寸的记载。所以，急需通过对各种不同版本的溯源来探讨关于宝船尺寸记载的可靠性。

《瀛涯胜览》大致可分为删节本和足本两个版本系统。先谈删节本系统。正德年间，曾做过礼部尚书的张升见到一部《瀛涯胜览》，“翻阅数过，喜其瞻详，足以广异闻。第其辞鄙朴不文，亦牵强难辨，读之数页，觉厌而思睡，暇日乃为易之，词亦肤浅，贵易晓也”①。张升自尚雅洁，将他认为芜俚之处统统删去，有的段落所剩无几。如忽鲁谟斯条，原本此条有1,355字，经张删润，只剩下77字。有关宝船尺寸及其下西洋官兵人数，很可能被张升作为文章的附赘悬疣而删去了。因此，这个系统的版本有十余种，俱无宝船尺寸的记载。

《瀛涯胜览》足本系统共有五种版本，各本优劣不同，也都有抵牾错落之处。其中胜朝遗事本是1842年吴弥光辑刻的②。这个版本没有经过认真的校勘，其所根据的写本也错误百出，改窜之处甚多。国朝典故本据冯承钧言，可能抄自祁氏说钞本，但错误较多，比胜朝遗事本犹简。所以，这两种足本阙佚宝船尺寸的记载似也不难理解。

纪录汇编本（以下简称纪本）系明末沈节甫于1617年所辑刻③。他收录了两种不同系统的《瀛涯胜览》，并录有张升的“小引”。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即以此足本为底本。根据伯希和的研究，沈的足本可能就是收录了景泰辛未年间初刻的一种版本，卷首无宝船尺寸的记载。而冯承钧以后看到的明钞说集本，所据也是与纪本相同的初印本，卷末亦有“景泰辛未”一行。此钞本足以校订纪本之文很多，可以证明经过校勘，较之纪本更为精审④。说集本卷首（不是序）诸番国名之后却有“宝舡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的记载。所以，很可能沈节甫在辑刻纪本时将初印本上有关宝船尺寸的记载删掉了。由于说集本是诸多版本中较早和较完备的一种，因此不能简单根据其他较晚的版本没有这条记载而怀疑其可靠性。

足本系统中还有一部题为三宝征彝集（以下简称征彝集）的明代钞本⑤，长期以来人们只闻其名，不见其书。此钞本最早著录于《天一阁书目》⑥。伯希和在《郑和下西洋考》中曾提到过它⑦。冯承钧则进一步指出这是《瀛涯胜览》的别本，并根据《抱经楼藏书志》录有的前后序认为“且足补纪录汇编脱漏之文”。他还说：“这部孤本三宝征彝集现在或尚存，若能取以校勘纪录汇编本，必更有所发明。”

① （明）张升：《瀛涯胜览集》《小序》，纪录汇编本。

② （清）吴弥光辑：《胜朝遗事本》二编，光绪九年山阴宋泽元忏华庵刊本。

③ （明）沈节甫辑：《纪录汇编本》，上海涵芬楼1938年据万历本影印，足本收入第62卷（47页），删削本收入第63卷（22页）。

④ （明）马欢：《校明钞本瀛涯胜览》，冯承钧校注，清秘阁朱丝栏稿本。

⑤ （明）马欢：《三宝征夷集》，白棉纸，白口，兰格，半页十行，四周单边。

⑥ （明）范钦：《天一阁书目》史部，嘉庆戊辰阮氏刻本。

⑦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1–22页，17页，《序》2页。

征彝集行文讹脱亦不少，甚至有他本未误而此本独误之处。然而比较其他诸本，似更接近原本。今取征彝集与纪本和《西洋番国志》（简称巩本）等版本对校，一些过去不得其解的脱文误字，都能解释清楚。如胜朝遗事本苏儿把牙条“其港口流出淡水，自此大船难进”。“淡水”后脱去“浅沙”二字，令人费解。以征彝集和巩本对勘，应为“水淡沙浅，大舡难进”，其义始彰明较著。又如纪本旧港条“火鸡用棍打碎莫能死”，其义不通。征彝集和巩本作“用棍打击，猝不能死”，就很清楚了。这些校改虽只是片言只字，但对理解整个文义很有助益，同时也证明征彝集比较接近原本。

《瀛涯胜览》初稿完成于永乐十四年①，全书完稿于马欢参加第七次下西洋归来（宣德八年）之后，并增添了天方国条等新的内容②。而巩珍在宣德九年完成《西洋番国志》之前看到并抄袭了马欢的全稿③。因此，《瀛涯胜览》最后定稿似不晚于宣德九年。经过校勘可知，征彝集与其他版本相比，非常接近于巩本，有理由认为巩珍写作时参考的很可能就是与征彝集相类似的原本。其可靠程度较之明钞说集本又胜过一筹。这部明钞本卷首诸番国名之后，亦录有宝船尺寸及下西洋官兵人数，与说集本略有不同，现录之如下：

宝船陆拾叁只

大者长肆拾肆丈肆尺

阔壹拾捌丈

中者长叁拾柒丈 阔壹拾伍丈

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力士、通

士、民稍、买办、书手通共计贰万柒千陆百

柒拾员名（以下从略）。

在下西洋官兵人数的记载中，征彝集有“力士”一职，系说集本及其他版本无有。据《明史》《职官志》和《兵志》记载，力士专领金鼓旗帜，随驾出入，及守卫四门，先隶旗手卫，后改隶锦衣及腾镶四卫。此亦可补诸版本之不足。笔者认为，如果说明钞说集本有关宝船尺寸的记载尚有“孤证”之嫌的话，那么明钞三宝征彝集则对于这条记载增添了相当的可信成分。

有的专家根据外海沙船比例的计算，颇疑《瀛涯胜览》有关船宽的记载有讹舛之处，认为《明

① （明）马欢：《瀛涯胜览》序有“永乐拾肆年，岁次丙申，黄钟月吉旦，会稽山樵马欢序”，三宝征彝集。

② （明）马欢：《瀛涯胜览》天方国条后有“景泰辛未中秋望日会稽山樵马欢述”，说集本。

③ （明）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有“汉言番语，悉凭通事转译而得，记录无遗”，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82年重印本。

史·郑和传》所载宝船“广一十八丈”可能系“广于八丈”或“广六丈”之误。从两种较早的明代钞本来看，郑和最大宝船的长宽尺寸完全相同。如果说有所不同者，则一为汉字大写，一为汉字小写。因此，似乎可以排除转抄刻印过程中把船的长宽尺寸颠倒或笔误的可能。

宝船记载与《瀛涯胜览》

《明史·郑和传》有关宝船的记载是否出自《瀛涯胜览》呢?

郑和下西洋时间长达28年，下番军士两万多人。这种大规模的远航，其创始、组织、准备，以及沿途情形，历次文献一定很多，但据说大部分都在成化年间被取而烧之。所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三部随员亲历见闻的记录。然而，后代出现的历史著作、笔记、小说以及家谱中有关宝船的记载，其来源却并不一定都是来自《瀛涯胜览》等三部书。因此，还需对这些记载互相印证、相互考核，进一步讨论《明史》有关宝船尺寸的记载究竟依据何本，到底是否可靠。

首先，郑和远洋船队不会仅由一两种尺度相同的船只组成，而应有旗舰、战舰、货船、粮船以及其他辅助船只。但《瀛涯胜览》卷首仅列出两种尺度的船只，特别是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显然指船队中最大的旗舰，而不是六十几艘都是如此规模。关于其他类型船只的记载，是从万历年间罗懋登的《西洋记》和同时代的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①]等材料中得到的。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整个郑和船队的船只至少可分为七种类型，用途各异，其料、修、广和桅数，均依次递减，而每次奉使远航，也绝非同一型制，长度自四十四丈四尺到十三丈不等，以此“辨尊卑之等，利迟速之宜”。《西洋记》虽属小说，但史家普遍认为对考证郑和宝船的尺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有的学者将上述的最大宝船和其他六种类型船的长宽比一并列出，发现其数值均在2.5左右，与近年考古发现的海船的长宽比非常接近[②]。这说明罗懋登和李昭祥利用的材料虽不是随员的行纪，却是比较可信的，也证明了《瀛涯胜览》所载最大宝船的长宽尺度的可靠性应无问题。

再次，有关宝船数目的记载互有出入，来源可能也不一样。如第一次下西洋的船数，马欢等人都无记载，《明实录》仅记载永乐二年由福建承造五艘下西洋的海船[③]。《崇明县志》《太仓州志》记载，自浏河出海时，有海船二百零八艘。明末清初谈迁撰《国榷》记载永乐三年，造“宝船六十三艘”。而《明史·郑和传》却说：永乐三年，“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

① （明）李昭祥：《龙江船厂志》，《舟楫志》，玄览堂丛书本，续集。

② 席龙飞、何国卫：《试论郑和宝船》，载《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③ 《明成祖实录》卷26，永乐二年元月癸亥条。

再次，最大宝船的尺寸也略有不同，“说集本”“征彝集”《郑和家谱》《西洋记》以及万历年间顾起元所著的《客座赘语》均作“四十四丈四尺”，但谈迁所著的《国榷》和《明史》则作“四十四丈”。

这些都说明郑和下西洋之后的文人学士在撰述各种反映郑和宝船的著作时，除依据《瀛涯胜览》等最初材料外，还可能参阅了某些见于当时而今已散佚的其他直接的材料。譬如《西洋朝贡典录》的作者曾参考了已佚的《铖位编》《武备志》卷240《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的底本应是今已不见的郑和下西洋时绘制的海图等等。所有这些著作中关于郑和宝船尺寸的记载却无大的差异，这对考证《瀛涯胜览》和《明史·郑和传》中宝船尺寸的记载的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

清代官修的正史《明史》中有关郑和最大宝船的记载，无论是宝船数目，或者是长度，都与最早的《瀛涯胜览》有所不同。一般认为《明史》只举其大船而略去小船只，在长度上更略去四尺。但从史源学角度看，也可能是由于依据了不同来源的资料的结果。特别是南京图书馆藏佚名《明史稿抄本·郑和传》中有关宝船的记载，除了“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以外，还有“中客数百人”一句，更是以上所列明代史籍所无有。《明史》这条记载所据何本虽还不得而知，但这至少可以说明，一直到清初纂修《明史》时，还见到并参考过其他我们今天已无法看到的材料，并且这些材料中有关郑和宝船的尺寸也与马欢所记基本一致，无大差错。因此，有人认为宝船记载的“来源是一本书，而其他诸书所载是转抄”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①]；而断然判定《明史·郑和传》中的宝船尺度是“引自明人‘说集’的《瀛涯胜览·序》”，因而不足为据之说[②]，似更缺乏根据。

综上所述，有关郑和最大宝船尺寸的记载不管是一源说，还是多源说，出自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作者和不同性质的书籍中的记载，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把宝船的长宽尺度颠倒或搞错的现象，其具体的尺寸记载也都与当事人马欢的记载基本一致且无大差别。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马欢对于宝船尺度记载的可靠性。正如他在自序中所强调的，《瀛涯胜览》“措意遣词，不能文饰，但直笔书其事而已，览者毋以肤浅消焉”。明代著名文人归有光题《星槎胜览》时也说：“吾独以为当时所记，虽不文亦不失真，存之以待班固、范晔之徒为之可也。”[③]诚然，古代文献中不乏过甚夸张之词和鲁鱼亥豕之误，我们应当客观地从具体的史实中去分析和鉴别古人记载的真伪，而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来求证历史的事实，只有在大量确凿可靠的史实基础上去科学论证，才能得出比较全面正确的结论。

① 杨槱：《郑和的宝船究竟有多大》，载《文汇报》1983年10月19日第3版。

② 杨槱、杨宗英、黄根余：《略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度》，载《海交史研究》1981年刊。

③ （明）费信：《星槎胜览》，附录《归有光题》。

宝船尺寸与时代背景

仅仅从文献考察郑和宝船尺寸记载的可靠性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因为造船业的发展水平与生产力水平、经济关系和政治状况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还应通过研究造船技术相对独立性和社会制约性的关系，来深入探讨宝船记载到底是否可靠。

郑和下西洋是明初的一件大事。关系到郑和使团全体官兵生命安全和整个出使西洋成败的郑和船队，自然应由久经考验、航海性能优良的海船组成。长达四十四丈四尺的最大宝船，虽属比较罕见，却也并非不可能。我国古代的木帆船素以设计优良，配备齐全，船身巨大，能经风浪而闻名于世。唐代末年，江南一带就出现了可载万石的商船①。宋代元丰年间出使高丽的两大神舟，其容量也是万斛②。张舜民《画墁集》中还记载了宋代一种“形制圆短”“非其大风不行”的万石船③。明初，继承唐、宋、元以来建造巨型海船的技术成就，并在此基础上达到更高的水平，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需要，往往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直接动因和必要条件。明初致力于恢复经济和巩固中央集权政治，又因北方的边患，洪武年间与海外诸国往来较少。成祖即位后，迫切感到有必要发展与海外诸邻国的外交关系，借以提高大明帝国的威望并招徕万国向明朝称臣纳贡。因此，建造宽敞、雄伟、坚固的大型海舶，组织规模宏大的远洋船队，派遣大批使者出海诏谕四方，其政治原因正是“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的需要④。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出于同样需要而建造超乎同时期造船水平的特大海舶是不乏其例的。宋代元丰年间因往聘高丽而造的“神舟”，其“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其“规模甚雄”。宋徽宗宣和年间，又造了两艘更大的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所以晖赫皇华，震慑夷狄，超冠今古”，一语道破了建造巨舶的真正政治目的。另外，从军事方面考虑，水军舰队通常也都有较大的船作为旗舰，以辨尊卑之等，利迟速之宜。如唐天祐年间，成汭“以巡属五州事力，造舰一艘，三年而成，号曰和州载。舰上列厅事洎司局，有如衙府之制，又有齐山、截海之名，其于华壮，即可知也”⑤。这种过大的船舶，在气候骤变的情况下，可能无法依靠人力有效地驾驭，但出于军事目的却不可缺少⑥。郑和下西洋的最大宝船正是兼具政治和军事的双重性质。

① （唐）李肇：《国史补》卷下，学津讨原本。
②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神舟条，万有文库本。
③ （宋）张舜民：《画墁集》卷8，知不足斋本。
④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郑和传》。
⑤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5，林艾园校点本。
⑥ （唐）李筌：《太白阴经》卷4提到晋“造大船，长二百步，上置飞檐阁道，可奔车驰马。忽遇暴风，人力不能制，不便于事。然为水军，不可不设，以张形势”。丛书集成本初编。

关于宝船的上层建筑，诸书记载较少，可以从《西洋记》第十六回中窥见一斑。船队中最大的宝船与其他船只迥然有异，其上建有“头门、仪门、丹墀、滴水、官厅、穿堂、后堂、库司、侧屋，另有书房、公廨等类，都是雕梁画栋、象鼻挑檐”，俨然与帅府一般。巩珍在《西洋番国志·自序》中也曾形象地描绘这艘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其能举动。趋事人众，纷杂往来，岂暇停憩”。这些描述与《瀛涯胜览》卷首宝船尺寸记载和其实际的用途完全吻合。有人认为郑和航船不需特大的船，二千料船即可容将士二百人，加上小船足够远航之用。实际上，他们忽视了郑和最大宝船的真正用途。二千料的海船，在宋代尚属中小型船，明初怎么谈得上“巨无与敌”和“盖古所未有”？又如何使得“海外诸番益服天子威德，贡使载道”①？

建造郑和船队的最大宝船，在当时不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急需的，而且还有明初雄厚的经济基础作其后盾和发达的造船业为其保证。明初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出现了活跃和繁荣的景象。海运方面，运输量之大，航程之长，航线开辟之早，都是中国航运史上的突出特点。这也对造船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明初设计和建造的海船，不仅种类多，数量多，规模大，在质量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洪武年间南京龙江关就设造船场，调职五省滨海四百多户熟练的造船工匠，“絜家于提举司隶”。沿海各省都设有许多船场，造船场内部的分工也很细致。一些大的造船场，还附设有帆篷作坊、缆索作坊和铁铸作坊。可以说，洪武年间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造船业体系，因而永乐年间才能建造和改造海船近二千艘之多（详见表2）。

明初官办船场和其他官营手工业一样，是在封建中央政权的直接控制下，以强制劳役的方式进行生产的。各船场所需造船原料，也由官府调配供应。除在南京等地设园植树外，还在全国各地征敛。官办船场集中了技术高超的能工巧匠，生产上有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制度。如规定“船完（工）之日，编为字号，次第验烙，仍将经造官匠姓名刻于船尾，如无故早坏一年，于官匠名：下追补一分，二年递加”②。加之造船不须计较成本，可以充分保证其规模与质量。当时一般的船只“造舶费可千余金，每往还，岁一修葺，亦不下五六百金”③。而郑和船队的最大宝船比一般船大若干倍，且系特别设计的远洋巨舶，造价和修葺之费更是无法计算，明人认为“须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方才够用”④。明初全国总共13个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称省），可见是倾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值得注意的是，明初私营造船业也在沿海各地发展起来。私营船厂虽然比较分散，但所造船只的质量和规模却很可观。永乐、宣德之际，有的官员军民人等，也能自筹资金原料，自备工匠，自

① （明）夏燮：《明通鉴》卷16，永乐九年条。
② 《明会典》卷200，河渠五，船只条，万有文库本。
③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9，舟师考，谢方校点本。
④ （明）罗懋登：上揭书，第15回。

选造船地址，建造海舶，冒充明朝政府的使节，“擅自下蕃”[①]。这说明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明初建造大型海船的工艺水平普遍提高，涌现出大批能够打造巨舶的能工巧匠。他们不仅应募为官办船场工作，也参与私人海船的制造。

如果认真考察明代的造船技术，也可证明文献中有关宝船记载的可靠性。按照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的斛斗称尺制度，当时的一尺相当于今31厘米。因此，最大宝船的长与宽约为138米和56米[②]。我国古代对船舶长宽尺度的计算与今迥然不同。所谓船体的长度应是指船面自头至梢（尾）的距离。我国航海木帆船的一大特点是船的首尾两端向外伸展，这对于减小纵摇有利。所以，尾舷和船首柱的倾斜度一般较大，船体的虚梢长度也就随之增加了。古船的船宽一般指最大横面处的面梁宽，并算至木结构舷侧纵通材（大概）的外缘。另外，在纵通材之外通常还要加大机外的帮机。大型木帆船的这个纵通材都非常大，两舷加起来比型宽要大许多。这样，就可以在水线上增加船的长宽尺度和操作面积，而不会因为增加船体的浸水面积使阻力加大。

《明会典》和陈侃《使事记略》载，“底长六丈，头长一丈一尺，梢长一丈一尺；底阔一丈一尺，底梢宽六尺，底头宽七尺五寸”。也就是说，梢占船体通长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③]。依照这个比例计算，郑和船队的最大宝船的长度44丈4尺，除去头尾虚梢，自航门（或抛锚梁）下至舵楼（或压舵梁）的实际长度应是32丈左右，折合今制约为100米[④]。

除此之外，古人对于船舶的载重概念，也不是今天所指的船体及其甲板建筑物的总容积所载物质的质量，而是以船舶的搭载能力与区别于空船的实际容量来计算的。由于我国古代船舶类型繁多，加之古人对船舶的记述缺乏统一的标准尺度，不仅船体长度并非依料数成比例递减，而且在每一料之容量方面也相差甚大。因此，郑和最大宝船的准确载质量到底有多少，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尚未提出令人满意的解答。据英国学者米尔斯推算，郑和最大宝船的载质量约为2,500吨，排水量为3,100吨[⑤]。

当时增加船舶纵向强度的主要方法，是依靠龙骨和置于船舶两舷的大概。龙骨俗称“龙筋”，主要承受总纵弯曲和水压力以及搁浅、擦浅时的压力和摩擦力。宋代海船的舶底水线还有一道方龙骨，突出底板下面20～30厘米。这样除能提高船底纵向强度外，驶偏风时还可生产对船体横向漂移的阻力。这一工艺当为明初造船业所承袭。木船船壳特有的另一强力构件是两舷侧身板以上的纵向加厚壳板——大机，配合横骨架，以保证船体纵向强度，承受外部碰撞力，并有助于船体的稳定性

① 《宣宗实录》，卷130。

② 如果按照浙江沿海造船工匠世代相传的鲁班尺（一尺合25.8厘米）计算，郑和最大宝船的长宽分别是114.55米和46.44米。

③ 清代大型木帆船的虚头、虚艄和两头接榫占船体总长的30%，龙骨实长只占70%。

④ 庄为玑、庄景辉：《郑和宝船尺度的探索》，《海交史研究》第5期，1983年刊。

⑤ 详见本书所收《国外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和浮力。

最大宝船的体宽达50多米，保证这样大幅度的横向强度也是十分重要的。古代船舶建造是按照严格的尺度进行的，“大小广狭皆有成式”。最大宝船的长宽比可以说是符合科学原理和我国古代造船传统的。大型木船不宜造得过于狭长，以避免海中风浪冲击而致断裂。因此，大型木船一般长宽比都比较小。宋元时期，我国的远洋巨舶就采取“船方正若一木斛”的形式，“非风不能动”[①]。特别像最大宝船的长度实属空前，势必要扩大船宽以保证纵向的强度。

除此之外，通过对泉州宋船的考察和结合明代文献来看，郑和宝船还应采取多舵和密舱制来达到这一目的。泉州宋船以12道隔梁分隔，梁用三四块木板榫接而成，并和助骨紧密结合在一起。明代出现于琉球的海舶，也是随着船体长度的增加而增设了10个舵位。这种做法实际上奠定了近代船舶结构的基础。它不仅是增强抗沉性的有力措施，而且在保证横向结构的强度和增强纵摇的承压力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坚实的龙骨，耐风浪的大机以及牢固的水密横隔舱壁，使得郑和宝船具备足够的强度，得以自由驰骋在“烈风陡起，怒涛如山”的印度洋上。况且，郑和最大宝船的实际装载量也决不会“比现在的万吨货轮还要大得多”。因此，我认为，明初倾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造一两艘大型宝船，在当时是完全有可能的。从现有的各种材料来看，有关郑和下西洋最大宝船的尺寸记载应是比较可靠的。

《明成祖永乐实录》所载永乐年间运船情况统计表

时 间	建造地点	艘数	建或改	明实录卷页	附注
元年五月辛巳	福建都司	137	建造	20：2b	海船
元年八月癸巳	京卫及浙江、湖广、江西、苏州等府卫	200	建造	22：4b	海运船
元年十月辛巳	湖广、浙江、江西	188	改造	24：6b	海运船
二年正月壬戌	京卫	50	建造	27：4b	海船
二年正月癸亥	福建	5	建造	27：5b	海船
三年六月丙戌	浙江等都司	1,180	建造	27：3b	海舟
三年十月戊寅	浙江、江西、潮广及直隶、安庆等府	80	改造	27：3b	海运船
三年十一月丁酉	浙江、江西、湖广	13	改造	48：2a	海运船
四年十月乙未	浙江、江西、湖广及直隶、徽州、安庆、太平、镇江、苏州等府卫	88	建造	60：1b	海运船
五年九月乙卯	?	249	改造	71：1b	海运船
五年十一月丁巳	浙江、湖广、江西	16	改造	73：1b	海运船
六年正月丁卯	工部	48	建造	75：2b	宝船

① 《资治通鉴》卷199，《萍洲可谈》《岭外代答》《画墁集》都谈到巨型船舶多为方正或圆短形，长宽比较小。米尔斯认为，古代木船的长宽比为2:1是完全可能的。17世纪以前海船的龙骨长度和船体最大宽度之间通常都是这个比例。最近，菲律宾沿海发现一艘13世纪的中国船只，载有许多珍贵的明代瓷器。初步潜水调查证实，此船长100呎，宽40呎，其长宽比与郑和宝船相近。

续表

时 间	建造地点	艘数	建或改	明实录卷页	附注
六年二月丁未	浙江金乡等卫	33	改造	76：3a	海运船
六年十一月庚戌	江西、浙江、潮广及直隶、苏松府	58	建造	85：1b	海运船
七年十月壬戌	江西、浙江、湖广及苏州等府卫	35	建造	97：4a	海船
七年十一月戊寅	龙虎等卫	9	建造	98：1b	海运船
七年十二月丁未	扬州等卫	5	建造	99：1a	海船
九年十月辛丑	浙江临山、观海、定海、宁波、昌国等卫	48	建造	120：2a–b	海船
十年十月庚辰	浙江、湖广、江西、镇江等府卫	130	建造	133：3b	海运船
十年十一月壬寅	扬州等卫	61	建造	134：3b	海风船
十一年九月辛丑	江西、湖广、浙江及镇江等府卫	61	改造	143：2b	海风船
十三年三月庚申	？	？	建造	162：3b	海船
十七年九月乙卯	？	41	建造	216：1b	宝船

（《成祖实录》，台湾据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微缩胶卷放火影印，1960年版）

郑和与西安

郑和，又名三宝太监，是明代我国伟大的航海家。他先后七次出使西洋，促进了中国和亚非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郑和在出国时与西安还有过一段不解之缘。



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统军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勿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等国。《瀛涯胜览》的作者、虔诚的穆斯林马欢曾随同郑和三下西洋，第一次就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这在马欢撰写的《瀛涯胜览》序中有明确记载："永乐十一年癸巳，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领宝船往西洋诸国开读赏赐，余以通读番书，亦被使末。"这里所谓的"通读番书"，是指熟练掌握阿拉伯文。由于这次航行的目的地有很多是讲阿拉伯语的国家和地区，船队需要精通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的人才，"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于是郑和专程来陕西求贤。

为何郑和要来陕西挑选阿拉伯语的翻译人才呢？

首先，陕西关中地区穆斯林的人口众多，是中国伊斯兰教和回族的发祥地之一。

其次，郑和与陕西也有特殊的缘分。据郑和十二世孙妇墓碑所载，元代大德元年（1297年）担任陕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的回回人赛典赤乌麻儿就是郑和的先祖，郑和为赛典赤乌麻儿的六世孙。彭嘉霖《马哈只郑和族系里居考》对此曾作过考证[①]。郑和出生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哈只”，即朝觐过伊斯兰圣地麦加的人，“犹言师尊也”[②]。后来因战乱不幸被掳入内地，阉割为宦官，逐渐崇奉佛教。永乐三年郑和首次出使西洋前夕，恳请礼部尚书李至刚为其父马哈只撰墓志铭，铭文中点出了郑和祖父、父亲的“哈只”身份，以此亮明自己长期埋在心底的伊斯兰教信仰[③]。郑和这次来陕西，也算是一次寻根之旅。

根据《元史列传第十二》记载，“别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至元元年，置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出为平章政事。莅官三年，增户九千五百六十五、军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五、钞六千二百二十五锭、屯田粮九万七千二十一石，撙节和买钞三百三十一锭。中书以闻，诏赏银五千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作为一位穆斯林，他在陕西“大崇厥教，增广饰治，视前有加”。因此，陕西关中地区伊斯兰教育发达，伊斯兰文化的研究、学习、交流空前活跃，吸引了大批人才汇聚于此，在关中形成了浓厚的伊斯兰文化氛围。

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在第四次下西洋前，郑和在西安经过重重筛选，终于选中西安清真寺的掌教阿訇哈三作为使团的翻译官。

郑和船队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出发，使团中包括官员868人，兵26,800人，指挥93人，都指挥2人，书手140人，百户430人，户部郎中1人，阴阳官1人，教谕1人，舍人2人，医官医士180人，正使太监7人，监丞5人，少监10人，内官内使53人，其中包括翻译官马欢、哈三，指挥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

哈三聪慧稳重，见多识广，深得郑和以及其他随员的尊敬。回国途中，海浪骤起，情况十分危急。哈三从容镇静，发挥了“通国语”“佐信使”及于危难之际安定人心的重要作用。他朝天恳恳默祷，祈求真主赐予平安，让大家消除恐惧情绪，全体船员同心合力，战胜了风浪，风恬波寂，安妥得济，船队转危为安，凯旋而归。

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郑和船队回国。九月，郑和等人献俘于北京，明廷赏赐所有立功将士。郑和“遂发宏誓”，重修了西安的清真大寺。还有一个说法是该清真寺是哈三所修，但得到了郑和的资助[④]。

---

①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第17页，海洋出版社，2005年。

② 袁嘉谷《滇绎》卷三《郑和条》。

③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第10页，海洋出版社，2005年。

④ 参阅杨怀中：《回族史论稿》，第24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郑和曾做过内官监太监，专门负责营造建筑，主持修建过不少的宫殿和寺庙。据《重修清净寺记》记载，经郑和重修的西安清真大寺，乃作前门四楹，门之直西为崇楼，洞门四达，重檐巨栱，岿然奇观，巍峨壮丽，雄伟庄严。楼之后为大殿，广五间，楹纵七丈五尺，中为教宗座，金壁光华，耀夺人目，缭以围墙，阒无尘染，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充分体现了郑和精湛的建筑艺术才能。

关于郑和重修西安清真大寺的时间，据《西安府志》记载，在明朝永乐十一年，由太监郑和重修[①]。但这个记载恐有误。因为永乐十三年郑和、哈三等才回国，永乐十五年秋郑和又开始了第五次远航。所以，郑和重修西安清真大寺的时间，应该只能在永乐十三年至永乐十五年间。

西安清真寺大殿月台下的南北碑亭玲珑典雅，独具一格。南碑亭内是著名的郑和碑，即明代嘉靖二年（1523年）刘序撰写的《重修清净寺碑记》，详细记载了郑和与西安的故事，特别是重修清净寺的经过。

北碑亭内碑的正面是汉文《增修清真寺记》，内有“长安新兴坊清真寺天方徐裔肇于唐初盛于大元皇庆年间”的记载，落款为“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年）。碑阴通篇用阿文书写的碑记。该碑的正面和碑阴所记均为“修缮清真寺”，但行文内容互不印证，而且提到这座清真寺的修缮完工，岁在受选先知迁徙的伊斯兰历740年（1339年），时间顺序上与嘉靖二十四年乙巳（1545年）相差206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有待进一步考证。底部用小儿经拼写出刻碑者人名与修建此清真寺人员的人名都是阿拉伯文经名，寺内找不到相关的汉文碑两相印证，他们的汉名也就无从考证。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回回民族史》中收录的冯今源先生所著《中国伊斯兰教碑文选注》一文中曾介绍：“‘定州至正八年重修礼拜寺记’是迄今为止所知的最早的伊斯兰教汉文碑。”[②]元至正八年即1348年，那么，相较于“定州碑”，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的这通刻于伊历740年的“重修清真寺碑”，时间上早了整整九年。这通阿拉伯文石碑有可能是现存中国穆斯林用阿拉伯文撰写的最早碑刻。

另外，寺内还有清代咸丰七年的《敕赐清真寺碑记》，亦言郑和重修此寺一事。

（本文原载《西安晚报》1982年1月12日，有更新）

①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第32页，海洋出版社，2005年。

② 白璋：《中国穆斯林用阿拉伯文撰写的较早的碑记——译介西安大学习巷重修清真寺阿文碑记》，《中国穆斯林》2007年第2期。

试论《郑和航海图》的地名研究

世界各国出版的大型百科全书对明初郑和下西洋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美国百科全书》（国际版）认为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航海技术①。《苏联大百科全书》说明代中国地理学因此而得到极大的丰富②。《大英百科全书》则更进一步指出，郑和下西洋所探险的地区“直到几乎100年后才为西方所发现”③。这些评价无疑是公允的。《郑和航海图》（以下简称《郑图》）是15世纪初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航海家经验和智慧的集中体现。这部图籍不仅详细注明了针位航向、航程和天体星象，更重要的是还记载了中外地名540余个。其中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中国沿海（240余个）、东南亚地区（152个）、印度洋地区（135个）和非洲东部海岸（14个）。其地理属性的种类包括地理名称（如山名、水域名、港湾名、航门水道名、岛屿名、礁石名、岬角名以及国名、省名、州卫县所巡检司等名称）和地物名称（如宫殿名、寺庙名、桥梁名、工厂名、城门名等）。在16世纪以前我国表示亚非的地理图籍中，《郑图》的内容最为丰富。因此，百余年来，《郑图》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国内研究概况

《郑图》原载明末茅元仪所辑《武备志》卷二百四十。这部书因讲到辽事和建州，清初一直被列为禁书，到道光年间才重新印行。鸦片战争后，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的过程中最早注意到《武备志》中的《郑图》，并对其中的一些地名进行了研究，明确称其为“明太监郑和下西洋之图”。

《郑图》地名的全面研究则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1929年，向达在《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一文中首先充分肯定了《郑图》地名的史料价值。他说，有了这幅图，郑和下西洋的史实“因而更为明确”。他还指出虽然中国古代航海家所记针路已很详细，“但得此图，方才可

---

① 《美国百科全书》（国际版），1980年，第6卷，郑和条。

② 《苏联大百科全书》，1973年，第12卷，第44页。

③ 《大英百科全书》，第4卷，第193页。

知如伏液聚米为山，一览便知，这于考究中国古代航海的情形，的确是一桩重要的资料[①]”。

1943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范文涛《郑和海图考》，对于马来半岛的地名详加考证。后来张礼千《东西洋考中之针路》（新加坡南洋编译所，1947）对西起印度、东至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越南诸国的地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郑图》和《东西洋考》中相当一部分地名“其来源甚为复杂，惟以著者之籍隶闽南，则其中涵有不少闽音地名”。毫无疑问，他举出B辄如M音，D辄读L，P在U或0之前可读如K等例证，从方言角度作了大量考证。许云樵《郑和航海图中有关马来半岛之记载》将马来半岛诸地与岛屿的地名详细对比。周钰森《郑和航路考》重点则在中国沿海诸地及岛屿的地名。郑鹤声在1947年出版的《郑和遗书汇编》附录中将明清史籍（14种）所记郑和下西洋所经近60个地名的不同译名列表加以比较，对研究《郑图》地名有参考价值。其他有关《郑图》地名的论文还有夏壁《郑和七使西洋往返年月及其所经诸国》（《禹贡》1934年2期），顾天锡《三保太监下西洋之国名途程今释》（《中日文化》1942年2卷），朱偰《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历地名考》（《东方杂志》1946年42卷）等。

解放以后，朱偰《郑和》一传最早对《郑图》地名进行了全面研究。他从现代舆图学的角度对《郑图》地名加以分析，认为大致可分四种情况：①基本正确：从南京到琼州府的地名，不但方位正确，而且沿海岛屿，星罗棋布，都各标有名称，此外何处有浅沙、暗礁，也各加以记载。②大体上不差的，是交趾、占城、真腊、昆仑山、暹罗国等地名，虽然大致不差，但正确程度已不如前。③部分正确、部分错误的，是爪哇、古兰丹、旧港；长腰屿、满剌加、吉利门；龙牙加儿港、槟榔屿；苏门答剌、大小花面，翠兰屿、榜葛剌等地名。这些地区岛屿罗列，港湾纷歧，客观上给绘图带来相当的困难。④基本上不正确，是第十八、十九、二十各图，这里把小葛兰、柯枝国、古里国，都绘成岛国，阿丹、佐法儿，被绘成和印度半岛正相对。总的来看，朱偰对《郑图》地名准确性的估价有所偏低，其中有些考证也不无商榷之处。

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向达整理的《郑和航海图》。这部书全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达到了新的水平。特别是后附的地名索引，对《郑图》中的350余个地名作出了考证，说明其今为何地。据英国学者米尔斯（J.V.G.Mills）分析，在向达所考订的地名中，有276个地名考释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当然，向达的考证也有一些疏漏之处，如招宝山的考定等。未能考出的地名尚有150余个，占三分之一。此外，索引缺志了不少地名，如抽分厂、宣课司、菜园、天地坛、祭祀坛、水驿、吉利门、石斑州、茭杯山、九星、东莞所等。“地名索引”的编制笔画与页码也有一些错误。还有个别印刷错误，如袜尔干别误为抹尔千剔等。张铁生在《中非交通史初探》一书中，对《郑图》有关东非地名作了考证。他认为，哈甫泥与卜剌哇之间的黑儿为El Hur，抹尔千

① 《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

（此处似悦“别”字——引者）为Merca；卜剌哇西南的起若儿为Ciula，葛答干为Takaugu。他还提出门肥赤和慢八撒同为一地，但一个指其大陆部分，一个指其海岛部分[①]。这些考释与一般学者的观点多不相契。

近年来，《郑图》研究又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郑鹤声、郑一钧所编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在针路举例中对《郑图》主要地名作了简释，大致与向达所论相同。他们在《资料汇编》（中册）（1983年出版）中又将郑和出使时期亚非国家的位置沿革、港湾都会、名胜古迹等资料分门别类加以搜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考证《郑图》地名的文章主要有沈福伟的《郑和宝船队的东非航程》和蒋赞初的《郑和航海图》上有关南京地名的考证等。沈福伟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郑和》将东非的慢八撒刊讹为慢八撒，因此被很多人误认为今之蒙巴萨，图上的麻林地过去和麻林一样被误认为今之马林迪，因此向达等人以为《郑图》将马林迪和蒙巴萨的位置南北倒置了。沈福伟将东非的几个地名作了更正，如慢八撒应为今罗布鲁伊，门肥赤应为今之蒙巴萨，葛答干为今之基林迪尼，麻林地为今基尔瓦–基西瓦尼。这些新见解还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深入地探讨。

台湾学术界研究《郑图》地名最负盛名的是徐玉虎先生。徐玉虎一直致力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1956年他撰著的《郑和评传》出版后，更以全部精力投入《郑图》的诠释工作。1976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这部书于1978年曾获得台湾中山、中正两学术著作奖。1980年，台湾德馨室出版社又出版了徐玉虎的论文集《明郑和之研究》，收入论文20篇，约50万字。其中最长篇论文《明郑和航海图中诸地名诠释》（240～480页）洋洋20余万字，广泛搜集中外史籍，对《郑图》548个地名逐一详加考证。徐玉虎认为，《郑图》所志地名的来源甚为复杂，“非但具有时代性，且混有我国闽粤地区、南洋地区，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与非洲东岸诸地之方言，再经传译，雕版讹错，骤之难得其解，欲还其原确非易事”[②]。他将这些地名的构成形式分为音译、义译、形译、音义兼备、形义两合、音形并用及强为牵合等。每考证一处，必附上有关史料，不厌其烦。沿革变化、学人歧义亦多详阐述，对于读者细致探讨甚为便利。当然这样也颇有杂芜、堆砌之嫌。特别是徐氏对西方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似未能充分利用，仍只限于参照早期西方汉学家如菲利浦、葛路耐和柔克义等人的考证，而对现代西方研究《郑图》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如英人米尔斯的著述）竟只字未提，这不能不引以为憾。至于大陆学术界近30年的研究成果，除向达整理《郑图》之外，徐氏也未能多予参考。这势必影响了他对《郑图》地名研究的深度。在徐氏的考释中，仍有百余地名只限于根据图中相对的位置予以说明。

① 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第92页，三联书店，1965年。

② 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第240～241页。

国外研究状况

百余年来国外学者对《郑图》地名的研究也很有成绩。1885—1886年，菲利浦在《皇家亚洲学会北华分会杂志》上发表《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家所描述的印度和锡兰港口》一文，最早向西方刊布和介绍了《郑图》，并初步考证了其中166个地名。1909年，布莱格登在《古代马来史考证》（《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杂志》第53卷）中对马来半岛东岸的16个主要地名进行考释。同年，杰里尼（G．E．Gerini）也作了类似的探讨。20世纪30年代初，荷兰汉学家戴文达所著《马欢重考》一书对《郑图》的源流作了研究。他认为这部图籍很可能是茅元仪的祖父茅坤在巡抚衙门里发现并传给其子孙的。因此，他提出与其称之为《武备志图》，不如叫《茅坤图》更确切些。后来，他进一步指出，《郑图》中标出的沿海地点，按罗盘所指的方位和以此计算的航程距离，虽还不完善，但“无疑是真正重要的”。

前苏联学者亦曾研究过《郑图》的地名。如斯维特《沿着东方旅行家和航海家的足迹》一书曾论及《郑图》及其有关地名。伯克夏宁在《十五世纪初郑和远航非洲诸国》和《十四—十六世纪中国地名学中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等论文中考证过不少《郑图》上的地名。他认为刺撒是阿丹西北的一个非洲国家，位于今马萨瓦（梅尔克—法蒂姆市区）东南100千米处。他还提出郑和到达非洲沿岸的最远地方是麻林，位于竹步以南约400千米处的加兰河（Tadah）北部，也就是现在的蒙巴萨北边。

在日本很早就有《武备志》刻本流传，即宽文须原屋茂兵衙等刊本。著名汉学家藤田丰八较早论述了《武备志》中《郑图》的可靠性，他认为“此图所载航海之路程，及海图之列次，大致无误，并与明中叶以后杂出之剿说不同”。这种肯定的说法对我国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其他如北村松之助、国井清音《《瀛涯胜览》与《星槎胜览》地名考》，石泽发身《十五世纪支那旅行记中之南洋地名考》、山本达郎《郑和西征考》都牵涉到《郑图》地名的考证问题。

总的来看，国外全面研究《郑图》地名比较重要的成果当推英人米尔斯《马欢：《瀛涯胜览》译注》（剑桥，1970年）一书的长篇附录部分（181～347页）。和戴文达一样，米尔斯也将《郑图》称为《茅坤图》。首先，他对这部图籍的现存版本、渊源、与郑和的关系、绘制者、绘制年代以及在此之前的其他地图作了介绍，然后又详细论述了《郑图》的比例、航向、针位、天体星象等。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考定《郑图》的地名。米尔斯将《郑图》分为五部分，即中国沿海部分（共18幅图）、印度支那部分（7幅）、马来亚部分（11幅）、印度部分（7幅）和阿拉伯部分（6幅）。他说，除去题目和针位外，图中共有577个汉字名称，包括499个各种性质的地名。米尔斯对其中的420余个地名（占各种地名的84%，不含庙宇宫殿名、行政名称、地方出产物和牵星说明）逐图进行细密的考证。早期国外学者研究《郑图》地名多依据梅辉立、贝勒、葛路耐或菲利浦所翻

译的史料，无法掌握第一手资料，因而对各种地名的研究一般不易深入。米尔斯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能够熟练地应用古汉语，而且注意研究中国沿海地区的方言和古马来语。他广泛参考各种类型的地图，如古阿拉伯图和英国海军部有关地区的详细海图。所以，他不仅对《郑图》中主要地名都能提出充足的论据，纠正了前人的疏失，对于许多极小的地名（如礁石、村镇）也能列出继续深入探讨的线索，使《郑图》地名研究达到了新的水平。当然，米尔斯的研究还有些疏忽之处，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书中缺少较详细的地图加以对照，许多地名的方位仍不明确，另外有些地名标注也未说明其根据，不便于继续查考。

《古今对照图》

为配合全国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的学术活动，在纪念郑和筹备委员会和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等部门的组织和领导下，山东大学历史系中西交通史研究室、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于1984年5月共同商定承担了研究和绘制《古今对照郑和航海图》（以下简称《古今对照图》）的课题。参加研究和绘制工作的同志们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特长，分别从中西交通史、历史地理学、航海学和现代海图绘制学的角度，对《郑图》重新进行具有科学意义的探讨。这一项协作攻关在《郑图》研究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向达就曾提出《郑图》原先的刻绘“很有重复讹脱的地方，山势也很粗率”，“路线过于错杂，特别是第二十页，不仅路线复杂，指示路程方向及罗针与牵星并用，看来真是头昏”。他非常期望先将《郑图》中所有错误（如庚坤针之类）用其他史籍所记针路加以相互校勘，然后用近代详细的西南亚洲以及南洋地图，依据校正过的海图航路，作一“近代式的郑和航海图”。那么，“四百余年前这位伟大航海家的航程，自可灿若列眉了”。后来，向达整理《郑图》已有意朝这个方向努力。但由于各方面原因，他终未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没有较好的海图航路做参考，向达在其书后附今图上所标注的宝船路线和航海图路线，有些就缺乏现代航海学的依据。

台湾学者徐玉虎也一直认为《武备志》所志《郑图》“因系刻本，显示图形粗劣，骤视之，易生模糊杂乱之感”，并且这种书本式的海图翻阅亦不方便。因此，他在《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中将《郑图》仿制成手卷式图卷，并将《郑图》的主要地名绘制在今日地图上，便于参考。徐氏的这一努力在台湾得到很高的评价，但因系墨笔手绘，制图水平较低，因此同样显得杂乱草疏，并且有些地方与原图有所出入。徐氏绘制的今图（亦墨笔手绘）实际上与向达的今图相去不远，只是图幅较大一点（大约4倍），并加上英文地名而已。

与此相比较，新近编绘的《古今对照图》无论在地图绘制、航线标注，还是在古今地名考释方

面，其准确性和可靠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不少方面都弥补了前人的不足。

（1）《古今对照图》长约2.5米，宽0.76米。图面包括“郑和航海图”和“郑和下西洋航线图”两部分。新编“郑和下西洋航线图”配置在中间，古图分8段配置在两边。绘制古图时，图形基本上依原样绘制，拼接处作了必要的技术处理。图中文字则重新标注，但其位置，排列仍按原样。新编的“郑和航海图”以现代海图的形式，显示郑和下西洋所经区域的地理概况及航线，且古今地名和外文译名对照。这一繁重的绘制工作是由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承担的。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于1985年年初完成了制图任务。其规模之宏伟、体例之周备、内容之详赡，图面配置之新颖，是我国古今对照图中前所未有的。

（2）《古今对照图》中“郑和下西洋航线图”的航线是按照大连海运学院航海史研究室标绘资料标示的。他们在本院航海研究室等单位协助下，对《郑图》中的针路与明清各种航海史籍作了认真的校勘，结合牵星（天文导航）的研究，纠正了其中的一些伪舛，提出了有严格科学依据地反映郑和下西洋的准确航线。

（3）山东大学历史系中西交通史研究室所编注的《郑图》古今地名考证参考资料，注意了广泛利用和吸收国内外有关《郑图》地名研究的各种学术成果，尽可能搜集了各种文种的研究论述和图籍，对每一幅图中的地名逐一考释说明（包括古名、今名、英文名、经纬度及地望范围）。凡能够确定今地者，均注出今地。凡根据地望、对音推测而得的地名，亦悉列入，以供标注航线和绘制海图的同志参考。对于一些因文献缺略、众说纷纭、具体地望不易确定的地名，编者经过缜密比较，多选择成说。对于某些不能确定的疑似之论，如怀疑《郑图》刊误的一些地名，则采取慎重态度，多弃而不采。当然，《郑图》地名涉及大量中外历史地理问题，编者所提的看法，学术界还会有不同意见，有待于学术讨论的展开。

纵观《郑图》的研究历史，可以说《古今对照图》大体反映了当代的学术水平，并在某些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实现了海内外学人久已期待而又一直未能实现的夙愿。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岗位的历史工作者、航海研究者和海图制图工作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相互协作，为我国科学技术史、中外关系史、海外交通史、航海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等学科开辟了多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新途径。这一重要成果，必将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未来研究展望

《郑图》的研究经过国内外学者100余年的努力，到今天《古今对照图》的出版标志着又一个新阶段的到来。但我们目前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对现有的成果不断修订，使其更趋完善。为使今后的研究工作更有成绩，我想提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古今对照图》中新编“郑和下西洋航线图”比例尺较小（1:1000万），还不能充分反映原先《郑图》的各种内容，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名未能全部绘入。郑和下西洋的航迹这次未能详细标示。根据《郑图》针路所标绘的航线也因图幅关系仍显得有些简略。从专业研究工作来说，要深入探讨中国航海技术史，就需要更为细致的分幅地图。如能加以继续合作研究，编绘出一部图文并茂的《郑和航海图册》，并配备详细的参考文献，相信必将受到学术界的欢迎。

其次，对于《郑图》地名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一些地名如那里寅上、双屿门尚需深加探究，已考出的地名有些也还有疑问。尤其是东南亚、东非、印度、伊朗、阿拉伯等地区的古代地理和古代语言知识，是我国学者极为缺乏的，应该注意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我以为对于《郑图》所示航迹的实地考察工作，也应做出长远规划，组织有关人员，由近及远，逐步实施。另外，对牵星高度与确定地望的关系还应进一步加强研究。如同样是牵华盖星，位于赤道以南的麻林地、葛答干却同位于北纬20°的已龙溜（Haddumati atol，2° 07 ' N）和沙刺溜（Mulakuatol， 2° 57 ' N）差不多高度，以此来确定一些地名的方位就值得怀疑了。

再次，各单位参加编绘《古今对照图》的同志曾研究过大量文献资料，纠正了前人的一些失误，并作出许多新的考订。但现在图上所显示的只是最后的结论，而没有具体说明其依据和论证过程。100余年来，国内外许多有价值的论文或因散见历年各地报刊，或系外国文字，不便国内学人检索。因此，我提议参加编绘工作的同志将尚未发表的考订成果尽快撰为专文，连同国内已发表的论文，并选择一部分国外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汇编为一本《郑和航海图研究论集》。这样，不仅使读者在利用《古今对照图》时知所依据，也使大量学术成果得以及时整理，引进而不致淹没。

（原载《上海大学文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新绘《郑和航海图》的地名补释和航线分析

郑和是我国古代的伟大航海家，他一生在海洋上工作了28年（1405—1433年），前后七次出使西洋，一为促进亚非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发展经济贸易、沟通各国人民文化、科学技术交流等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将世界古代航海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关于郑和航海技术成就，征诸古籍，除有随郑和出使少数人员的笔记传世外，唯一留传的只有明天启年间（1621—1627）茅元仪辑入《武备志》卷二百四十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关直抵外国诸番图”。[①]后人省称《郑和航海图》。此图并经向达先生整理，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刊印行世。

《郑和航海图》就现存所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指导船舶航行的航海图册；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一部珍贵的航海科技文献。它体现了15世纪30年代中国航海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成就，把中国古代航海中的罗经导航、天文导航（针位、指数）、标准航速（更数）等多种航海技术综合使用，将世界航海史上的“定量航行”时代推进到历史高峰，为世界航海开创第三阶段的数学航行时代，提供了发展基础。

今值纪念中国古代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年之际，为研究郑和一生伟大航海活动，我们用现代科学技术来分析、整理了这一重要科技文献，并依据现代海图绘制原理重新将《郑和航海图》编绘出来。这项工作拟分作两步进行，第一步先绘出郑和下西洋航线示意图。在此基础上，第二步完成分区的《郑和航海图》图册。为做好此项工作，首先要对《郑和航海图》的地名进行考证和对图中航线进行分析。现将一些工作，择要简述于后。

对《郑和航海图》的地名考释

《郑和航海图》上所绘山川地势、国家城邦、港口、河流、岛屿、沙滩和州县卫所之详尽，地区范围之广泛，为同时期其他史志所不及，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关于海洋地理的世界地图。《美国百科全书》认为：郑和下西洋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航海技术[②]。《苏联大百科全书》说：

① 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1961年。

②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edition,Vol.6, 1980.

明代中国地理学因此而得到极大的丰富[①]。《大英百科全书》更进一步指出：郑和下西洋所探险的地区，“直到一百年后才为西方所发现”。[②]这些评价是公允的。由于《航海图》是16世纪以前我国记载海外的地理图籍，堪称内容丰富的地名百科全书，所以在世界海图和海洋地图史籍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近百余年来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关注，也是国际汉学界人士传统的研究课题之一。终因年代久远，国内外社会屡经更替，在政治演革和疆域变迁上多有兴废，甚至有些城市、港口湮没无存，致使今天对不少地名的定位犹有异议。向达先生在“整理郑和航海图序言”中指出：“全部地名约五百个，未能考出的尚有一百五十个左右，占十分之三，即已考出的三百五十个也难免有错误遗漏之处。”这一虚怀若谷的治学精神，深受后人学习和称颂。

首先我们是在向达先生研究成就的基础上，试用历史学、航海学、地图学相结合的方法，将郑和航海图的航线绘制在现代海图上，对原图上的地名进行了订正和补释，这是一次尝试。《航海图》中南京至太仓，长江口至海南岛地名凡凡两百三十余，海外地名三百余，图中标注的州县卫所、岛屿礁浅名称虽然亦有误记和刊讹之处，给读者带来一些疑惑，但从《读史方域纪要》《筹海图编》、有关地方志、今图、海图大都还是可以考订的。现就与向达先生整理、注释有异议部分地名，谨举例说明。

（一）国内部分（东南沿海）

招宝山：向达先生注（简称向注）为今镇海之招宝山。据《读史方舆纪要林》[③]。（简称《纪要》）卷二十四宝山：“嘉定县东南八十里，明永乐十年命海运将士筑此，以建烽堠，周六百丈，高三十丈，为海运标识；昼则举烟，夜则明火，海洋空阔，一望千里。先是，居民尝见其地山影，至是山成，因名曰宝山。御制诗文，刻石其上。（原碑石现存上海浦东高桥中学院内）海运废，山仍为戍守之所。”又“宝山守御千户所在嘉定县东南八十里，本名清浦镇，一名高桥镇，其地东北据海，西滨吴淞江”。按《航海图》标注针路：“（自吴淞江）平招宝用乙辰（112.5° ）三更，船出洪打水丈六七正路见。”可见，船自吴淞口行驶，船身与宝山正横，按罗经112.5° 航行三更后即驶离长江口之深水道，而不可能经浙江甬江口之镇海。《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中亦有宝山绘于江左。可见招宝山当系宝山之误。今已沉没海中。

灵山卫：向注为今临山卫，据《纪要》卷九十二所记：“临山卫在（余姚）县西北五十里，洪武二十年，汤和奏置于庙山上，徙上虞县故篙城戍守，并海筑城。”按《航海图》上灵山卫

① *The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Vol.12,p.44,1973。

②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ol.4, P193。

③ （清）顾租禹辑著《读史方典纪要》，中华书局版，1955年。

绘于观海卫与定海卫之间，应是龙山所。洪武间汤和筑城设所，旧有千总驻防于此，即今之龙山镇。

定海卫：向注为今浙江定海。据《纪要》卷九十二："定海卫，在定海县治东北，洪武二十五年建，领所五。"至清代于舟山别置定海县，将原定海改称为镇海，属宁波府。原图定海在甬江口附近，当以今之镇海为是。

昌国所：向注不见今图。据《纪要》九十二："定海卫舟山中中千户所，治昌国故县城中，城周七里。洪武十二年重筑，明年城成，设守卫昌国千户所。十七年改置昌国卫，二十年，县废移卫于象山县境，改建今所，永乐十六年增葺所城。"又"舟山中左千户所，亦治昌国县故城中，建置同上"。故昌国所，即指今舟山群岛之定海。

列港：向注不见今图。据《纪要》卷九十二列港条："定海县西北五十里，东出海，近金塘山。"对照今图，应指今之沥港。

狭山：向注不见今图。据《筹海图编》沿海沙山图，对照今图皆作披山，疑狭山为披山之误。

又如大小六经，据《筹海图编》，对照今图作大鹿山、小鹿山，黄山即今图之黄大岙，又作大门岛；东洛山应指今北麂山；南已山即今之南麂山。

平湖屿：向注不见今图，据元《岛夷志略校释》彭湖条注：[①]原号平湖，自清初以来皆作澎湖，平彭音同，当指今之澎湖列岛。

（二）越南沿海地区

（1）越南北部

在许多记载中国至越南针路的古籍中，都以海南岛附近之独猪山（今名大洲岛）为最后一个望山，从此开航出洋，经外罗山（今李山岛，Culao Re）驶达占城新州（今归仁，Qui Nhon）为郑和出使西洋第一个寄泊港。在此地区以北有大灵胡山一地，向注为"与钦州隔北仑河相望，今地无考"。此说有误，按《海国广记・暹罗往交趾》[②]针路所记：

自外罗山	单亥	（330°）	五更	取占毕罗山	今图之占婆岛（Culao Cham）
自占毕罗山	单亥	（330°）	五更	取大琅瑚山	今图之土伦角（C.Tourane）

①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庼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

② 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出版社，上册，1980年。

从上述针路和航程推算可知，外罗山以北五更之占毕罗山即今图之占婆岛，再行五更则至太琅瑚山，即《航海图》中大灵胡山之异译，在今岘港附近之土伦角。

（2）占城至昆仑山

自占城至昆仑山航线，原图未注出航行针路，今依《海国广记》《东西洋考 西洋针路》部分针路补入，据此针位和航行更数，亦可判明这一地区山势、岛屿名称。如：

自昆仑山	单庚（255°　）庚酉（265°　）	三更	至小昆仑	今兄弟岛（Les deux Freres Is）
自小昆仑	庚酉（262，5°　）单酉（270°　）	八更	至真屿	今奥比岛（Poulo'Obis）
自真屿	辛酉（277.5”　）	五更	至假屿	今福赛奥比岛（Fausse Pouło Obis）
自假屿	乾戌（307.5”　）	五更	至大横	今土珠岛（Poulo Panjang）
自大横山	乾戌（307.5°　）	五更	至小横山	今威岛（Poulo Way）
自小横山	辛戌（292，5°　）乾戌（307.5°　）	三十更	至笔架山	今沙姆洛越山（Samrioyot）

在向注中，对小昆仑只提出地理位置，未指出今名；对假屿、大横、小横等认为今地无考，在参照上述针位和更数记载，以罗经方位结合航程推算时，大都是可考的。但这一地区所绘岛屿密集，方位难辨，有些岛名如：竹屿、象坎、奶门等是今何地尚待进一步考订。

（三）马六甲海峡地区

在《郑和航海图》中，这一地区所绘岛屿众多，地势复杂，古名今址，亦较难辨识，历来诸家之说亦较纷纭。今摘其要者，扼述如下。

龙牙门：向注误为今林加群岛。应为今新加坡岛南端之海峡，即石叻门（Selat Panikam）。对照航海图回航针路，西来北去航线，则不需经过位于新加坡东南之林加群岛。

假五屿：向注“在满剌加北，五屿西北二更，今Pulau Besar”。据《郑和航海图》假五屿为半岛上之岸山，真五屿当为海中五小岛。假五屿即为岸上五小山，指满剌加西北Raehado岬，米尔斯（Mills）称此岬之山脊与满剌加沿岸之水岛相似，故名。

急水湾：向注今地无考。据原图针路“苏门答剌开船，用丑艮（37.5°　）及乙辰（112.5°　）针五更，船平急水湾、巴禄头有浅”，应于“急水湾”后，增“又五更”三字，则与《东西洋考》《西洋朝贡典录》各书所记距离相合。巴禄头在今金刚角（Diamond Point），土名作Tanjong

Perlak，其西之洛克肖马韦，土名作Telok Semaway与Lokseumave，Lok即Telok之省写，为湾之意，盖元明时期我国航海家因金刚角至洛克肖马韦沿岸多暗沙与珊瑚礁，故名。

苏门答剌：向注“在苏门答剌岛西北端之Pase河畔”。另一说为在今三马朗加（Samar Langa），据《航海图》所记更数，应在急水湾以西五更处，则以在三马朗加最合，而不在其东之八昔河（Pase）下游。苏门答剌在15世纪时为亚齐所灭，自16世纪初虽其国亡而其名却成为全岛名称，今图作苏门答腊岛（Sumatra）。

龙涎屿：向注“在苏门答剌岛西北隅今亚齐海上，即Brass Is”。据《航海图》针路：“苏门答剌开船用乾戌（307.5°）针十二更平龙涎屿。”据这一针路，对照今图应为帽山（今韦岛）以西之龙多岛（Rondo I），而Bras I位于韦岛西南，航行船舶不经该地。

（四）印度西海岸部分

郑和船队在七次下西洋期间，都以印度西岸古里（今科泽科德）为主要寄泊港。郑和船队由此或沿岸逐港航行或自此驶往阿拉伯、忽鲁谟斯各地。《航海图》对这一地区的记载足谓“详而不诬”。现就向注中部分未考证者，补释如下：

阿者刁：对照今英版地图，应为Anjidiv，对音相近，测星指数与所在纬度相合。

缠打兀儿：见《岛夷志略校释》东（束）淡邈条，经校注者考证，认为见于中世纪东方撰述史地Sandabur与Sindabur之对音，即果阿（Goa）之土名，玉耳（Yule）以为此土名似原作Sundapur或者 Chandapur，并以后者尤为接近。今名称为果阿。

起儿未儿：参照英版地图，疑为孟买南之Chaul。

马哈音：孟买原名Mumbai，其北岸有古城名马希姆（Mahim），今图中仍为孟买之外港，原来即为古代之港口。

杂葛得：疑为今图之朱纳格（Junagdh）。

（五）牵星图中部分地名

郑和船队自古里驶往忽鲁谟斯（霍尔木兹）时，系用观星高度定位的导航技术。在牵星图中，将印度西岸附近之丁得把昔作为横渡大洋的始点，以阿拉伯沿岸之沙姑马山为终点，但这两个地名，向注无考，经对照今海图，提出以下浅见。

据《顺风相送·古里至忽鲁谋斯》条[①]：“（自古里）单亥（330°）五更取白礁（今海图之Sacrifice rock），沿山使用壬亥（337.5°）四十五更取丁得把昔。看北辰星七指，看灯笼

① 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版，1982年。

骨七（八）指半，好风过洋。乾戌（307.5°）、单戌（330°）一百更姑马山，若饿风用单戌（330°）八十五更。”对照今图及北辰高度指教，丁得把昔约在北纬14°左右。海图中上述航线西侧，只有今拉克代夫群岛以北之另一群礁延伸至14°附近，即佩得罗群礁（Bassas de Pedro），越其北端，可横渡阿拉伯。因此，丁得把昔当指这一礁群。牵星图中的沙姑马山，疑为在今阿拉伯东北端马斯喀特以南之沙姆山（Jeb Sham），高达3,352米，无疑该山或其余脉会成为远航船舶望山，且对音相近，牵星图中此地看北辰十一指，所在纬度相符，故认为当指今之沙姆山或其余脉，约在阿拉伯半岛腊斯哈德角以北附近。

（六）东非海岸地区

郑和船队在第四次出使（1413年）及其以后，曾历次访问过阿拉伯、东非各国。《明实录》中也记叙了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来华通好，证明宝船曾到过这些国家。因《航海图》中所绘的麻林地置于慢八撒、门肥赤之南，因此许多学者多以麻林地即为今肯尼亚之马林迪，此说与原图地理位置颠倒，从而怀疑航海图所绘错误。而沈福伟同志自成一说，认为麻林便是13世纪末叶，继承基尔瓦设拉子朝的马赫迪里朝（Mahdali，Mahadila），“麻林地”原意是“马赫迪里”国，是其音译，马林迪是基尔瓦苏丹下属一个省，其首都为基尔瓦基西瓦尼[①]，即《航海图》中之麻林地。又据《航海图》记载，麻林地牵星高度是华盖五指，门肥赤（蒙巴萨）是华盖七指，两者相差二指，据此麻林地必在蒙巴萨以南，以平均值来说，一指的航程距离约在纬度1°03′。

以上，但东非沿岸航行，一指常当于2°或3°。图中木骨都束和黑儿标明相差一指，而实际纬度相差6°，蒙巴萨在南纬4°4′，基尔瓦基西瓦尼在南纬8°55′，两者的距离相差4°4′，仍在二指以内。据此，当以沈说为是。

对《郑和航海图》的航线分析

从《郑和航海图》中表示的航线来看，航海图既不是七次下西洋中某一次的航行记录，也不是《明史·郑和传》所列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部航线。图中仅对主要航线标注了针位、更数，很可能是为了使主要航线的航行技术规范化而绘制的。由于针路标注文字的方向不同，可以分别出船舶出航和返航的针位和更数，借以判断航行中的导航物标和转向地点。

在分析《航海图》中的航线时，首先应判明图中所列的主要港口。在图中，这些港口是航线汇集之处，它是船队与各国通商贸易或补充柴水、给养的重要基地。其中有：

① 沈福伟《郑和船队的东非航程》，《郑和下西洋论文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

国内部分：南京、太仓（浏河口）、福建（长乐）。

中南半岛、南海地区：新州（归仁）、占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剌加（马六甲）、苏门答腊。

爪哇：苏鲁马益（泗水）。

印度、锡兰山地区：别罗里、官屿（马累）、柯枝（科钦）、古里、莽葛奴儿（芒格洛尔）、阿者刁、缠打兀儿（果阿）。

阿拉伯、东非海岸地区：忽鲁漠斯、佐法儿、阿丹（亚丁）、木骨都束（摩加迪沙）。

在图中于满剌加、苏门答腊并注有"官厂"，这是郑和船队在海外的货物集散转运站。船队曾常由这些港口分遣船队驶往其他国家和地区。故应以上述主要港口作为起讫地点，从中判明图中所绘的各条航线。

现将《郑和航海图》所绘的各条航线，汇总如下。

鉴于《郑和航海图》是实践性较强的科技资料，若按其针位和更数计算船位，而将其航迹绘制在现代海图上应该是可能的，由而所绘制的航海图，将更符合郑和船队下西洋时的实际航线，这对探明古代航海技术成就更有积极意义。同时，再依据有关古代航海针路的记载，如《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海国广记》《东南考察》《西洋朝贡典录》等书校正和补充《郑和航海图》中的疏漏与不足，进而将《航海图》的针路内容加以充实，使这一古代科技文献的研究工作日臻完善。

但在试绘过程中，若按《航海图》和各种针路记载，将各条航线绘制在现代海图上时，往往出现不能到达目的港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航海图》中所记针位、更数都是长期的海上经验总结，它已将多变的海上自然条件，如风压、潮流诸多因素均包含在所记针位之中，假如排除这些因素，势必偏离预期的航线，正如在今天航海实际工作中，当设计航线的罗经方位确定时，须视风流压差的大小和方向，应在实际中增减罗经度数才能保持船舶的真航向。

《郑和航海图》中记载的航线

		起　迄　地　点	针位标注			起　迄　地　点	针位标注
		出航路线			5	加平年溜-古里	有
1		南京-一太仓（浏河口）	无		6	加平年溜-柯枝	有
2		太仓一一长乐（福州）	有		7	官屿-木骨都束（摩加迪沙）	有
3		长乐-占城（越南归仁）	无	10		*印度西岸至阿拉伯各地航线：*	
4		*以占城为起点的航线：*			1	莽葛奴儿（芒格洛尔）-加剌哈①	有
	1	占城-占腊（柬埔寨）	无		2	阿者刁（Anjidiv）-加剌哈	有
	2	古城-暹罗（泰国）	无		3	阿名刁（Anjidiv）-加剌哈	有
	3	占城--爪哇	无		4	缠打兀儿（果阿）-加剌哈	有
	4	占城-满剌加（马六甲）	无		5	马哈音（孟买）-部里马新富②	有
5		暹罗-满剌加	无		6	刁元（第乌）-忽音谟斯（霍尔木兹）	有
6		满剌加-苏门答剌	无	11		*非洲东岸、阿拉伯沿岸航线：*	
7		*以苏门答剌为起点的航线：*			1	底林地-葛儿得风（瓜达伊角）	有
	1	苏门答剌-翠兰屿（尼科巴群岛）-锡兰山	有		2	阿丹（亚丁） -那里寅上（Ar Riyan？）-麻实吉（马斯喀特）	有
	2	苏门答剌一锡兰山（斯里兰卡）	有		3	麻实吉-忽鲁谟斯	有
	3	苏门答剌-撒地港（吉大港）-乌里舍城（克塔克）-锡兰	无	12		灵山（大岭角）-爪哇	无
8		*以锡兰为起点的航线：*		13		爪哇-满剌加	无
	1	千佛堂（栋德拉）-官屿（马累）	有	14		苏门签腊岛西岸航线	无
	2	别罗里（贝鲁瓦拉）-官屿	有			**回航航线**	
	3	别罗里-任不知溜（法迪福户环礁）	有	1		*印度西岸航线：*	
	4	别罗里-起来溜（喀雷岛）	有		1	莽葛奴儿-古里	有
	5	别罗里-一加平年溜（加尔皮尼岛）	有		2	安都里溜（安德罗斯岛）-古里	有
9		溜山国（马尔代夫）至印度南部、非州航线：			3	安都里溜-加加溜（卡达姆礁）	有
	1	官屿-甘巴里头（科摩林角）	有	2		苏门答剌--满剌加	有
	2	官屿一小葛兰（魁隆）	有	3		满剌加-外罗山（李山岛）	有
	3	麻里溪溜（米尼科伊岛）-柯枝（科钦）	有	4		外罗山-太仓	有
	4	麻里溪溜-古里（科泽科德）	有	5		太仓-南京	无

注：

①加剌哈：据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1]第一九一章哈剌图湾及哈剌图城，经译者考证，哈剌图为Calatu即Kalhat，在阿曼湾沿岸，在佐法儿东北，相距约九百千米，近在马斯喀特西南，该古城已毁于地震。最新美版世界地图中仍有此地名，在腊斯哈德角西湘滨海处。

②都里马新富：按郑和航海图原针路“九指二角（在马哈音附近）用丹辛针（285°）一百六十六更收都里马新富。”按其航程已越过鲁谟斯，可抵达阿巴丹港附近，起内港有今名霍拉姆沙赫尔（Khorramshahr）当为其对音。

例一，自大岭角（C.Varella）（lat 12° 53′ N，Long 109° 29′ E）至东董山（Great Natuna）（lat 3° 55′ N， Long 108° 14′ E）航线。据有关书籍的针路记载，为丙午（172.5°）或丙（180°）针，船行三十更。从两地所在经度来看，东董山地理位置偏西，如不计算自然条件影响，按上述针路将航线绘在图面上，必然不能抵达目的地。只有将针路画成南偏西，与原记针路几有10° 之差，才能达到东董山。据中国南海自然条件资料来看：“9月至次年5月受东北季风影响，平均风力约4–5级，以12月最强，北部海域较南部海域为强，当有冷空气入侵时风力可达6–8级。”又“南海9月至次年4月受东北季风影响为西南流，流速约0.5–1节。”[2]由此可知，若船舶自大岭角张帆开航，使用南偏东的针位，船在东北季风和西南流的作用下，才能乘风航达东、西董山附近。

例二，自东西竹山（Aur Is）（lat 2° 27′ N，Long 104° 3′ E）至昆仑山（Great Condore）（lat 8° 45′ N，Long 106° 35′ E）航线。

据《郑和航海图》回航针路：“东竹山外过，用子丑（癸）（7.5°）及单癸（15°）（四十五更）船取昆仑山。”又按《海国广记》：“用子癸针（7.5°）四十五更船平昆仑山外过。”《顺风相送》：“用子癸针（7.5°）四十五更船昆仑山。”从而校订出《航海图》中针位有误，并疏漏了更数。

按以上针位绘出的航线，同样，必将偏离目标10° 左右，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而必须考虑西南季风影响和东北流诸因素的作用。据《前闻记》记载下西洋的返航日程为：“五月十日（阴历五月二十八日）到昆仑洋，二十三日（阴历六月十日）到赤坎。”这一时期正当西南季风和东北流季节，南海海域情况是“5–10月受西南季风影响，风力约2–3级”。又“4–9月则受西南季风影响为东北流，流速约0.5节左右”。[3] 只有按原针路航行，随着季风、海流的作用才能抵达预期目的地。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郑和航海图》的针位与其实际航迹约有10° 之差，《航海图》中的针位，是

①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商务印书馆版，1948年。

② 《世界主要航线简介》，人民交通出版社，1979年。

③ 《世界主要航线简介》，人民交通出版社，1979年。

将罗经差、风流压差等因素的修正量已包括在内，从而保证了航行的准确和安全。盖古代利用季风航行至宋代已大致完备。“船舶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①]这一实践经验在郑和航海时期及其以后一直沿用，只是装备动力的现代船舶出现后，才不受季风的局限，可在任何条件下随时出航。

结语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是中国历史上贯通从中国到红海地区及东非一带航路的先驱者，他所遗留下来的航海图是一份珍贵的科技文献资料。但毕竟是15世纪初叶的成就，还受着当时科学技术的制约，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当代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第五卷的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en）曾作了仔细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罗经）误差一般不超过5°。这对于1425年的舵工来说，可以认为是极好的了。”[②]无疑伟大航海家郑和及其随行者，在长年航海活动中，对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友好交往，对各国人民经济、文化交流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其流传后世的航海图，也是中国和世界航海科技史上一项重大成就。

由于《郑和航海图》所记海域广泛，航线较多，本文只就部分航线和地名提出浅见，在撰写中曾得到杨熺、潘群两同志斧正，特此致意。并请海内专家不吝指导是幸。

（该文与李万权老师合写，原载《大连海运学院学报》1985年8月第11卷第3期）

① （宋）朱彧《萍州可谈》，卷二。

②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3,1959.

国外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世界航海史上也占有极为显著的地位。郑和历时28年的航海活动，表现出15世纪初叶，中国航海和造船技术的光辉成就，还发展了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增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长期以来，国外学术界对这一事件极为重视。自20世纪末，国外学者就开始对郑和下西洋的背景、过程、航海造船技术以及史料、传说等进行广泛的探讨。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或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取得了一些成果，对中国学者曾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有些观点未必妥当。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对几十年来国外主要的研究成果予以介绍，以供国内研究者们参考，进一步推动郑和研究走向深入，是很有必要的。

西方研究状况

国外最早研究向西方介绍郑和下西洋的是英国外交官梅辉立（W.F.Mayers，1831—1878）。梅氏1859年来华。1871—1878年曾任汉务参赞（汉文正使），撰写过许多有关中国的文章。1874—1875年，梅辉立在《中国评论》（英文）第3~4卷上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摘要翻译了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部分史料，并对其中的地名和民俗作了考证。竖年，格伦威尔德（W.P.Groeneveldt）也在《从中国史料看马来群岛和满剌加》（巴达维亚，1876年）摘译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明史・郑和传》的部分章节。后来，菲律普（G.Phillips）在《皇家亚洲学会北亚分会杂志》第20~21卷（1885—1886）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家所描述的印度和锡兰港口》，也引用马欢和费信的著作。1895—1896年，又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摘译了《瀛涯胜览》，并最早向西方刊布了《郑和航海图》。荷兰汉学家施古德（G・Schlegel，1840—1903）曾于1898、1899、1901年在《通报》上以《地理考证》为总题目，对郑和途经的锡兰等十余个古国进行了考证，也用英文选译了马欢、费信的著作。美国柔克义（W.W.Rockhill，1854—1914）写过《十五世纪中国与东部群岛和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交往与贸易》（《通报》15~16卷，1914—1915），此文前半部介绍了宋元以来的历史资料，后半部按国别翻译和考证了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史料。1915年，法国沙畹（E.Chavennes，1865—1918）在《皇家洲学会杂志》介绍了不久前发现的“锡兰郑和布施碑记”。

这是西方研究郑和下西洋的第一阶段，主要是翻译和介绍有关郑和的基本史料，并开始初步探讨。虽然其中存在不少错误和遗漏，但为以后西方汉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西方研究郑和下西洋的第二阶段以荷兰戴文达（J.J.L.Duyvendak，1889—1954）和法国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为代表。戴文达于1912年来华，先后任驻华使馆通译生和副通译官。1933年，他出版了《马欢重考》，对以前西方汉学家的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并进而作了新的详细考证。伯希和称此书为“颇有功益”之作，伯氏著名的论文《十五世纪初中国人伟大的海上航行》（《通报》1933年第30卷，冯承钧中译本为《郑和下西洋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就是专为评述戴文达这部书而作的。1939年，戴文达根据新发现的福建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和江苏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迹记》，对郑和七下西洋的年月和航程又作了全面的考证。这篇长文题为《十五世纪初中国人海上远征的确切年代》（《通报》第34卷），与伯希和之文同被誉为西方研究郑和的权威之作。同年，他在《中国》杂志上发表了《长颈鹿》一文，提出长颈鹿的名称和外形与中国人传说中的神兽麒麟十分相似，它巧妙切合风尚，成为圣德、圣世的象征。正是这种长颈鹿促使中国人航行到了非洲。也是在这一年，戴氏还用法文撰写了《郑和航行抵达东非海岸：1416—1433年》（《非洲与埃及制图学杂志》第四卷）。1947年，戴文达应邀在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作了题为《中国对于非洲的发现》的著名讲演，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伦敦，1949年）。1953年，他发表了《〈西洋记〉散论》（《通报》第42卷）。他认为，罗懋登以郑和航海为题材而创作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虽有许多荒诞不经的故事，但为研究郑和使团的组织、相互馈赠的礼品，以及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权威的西方汉学家伯希和在郑和研究方面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著述。冯承钧曾说过，在西方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学者中，“寻究史源，勘对版本的，只有伯希和一人”。由于当时所见资料有限，特别是尚不知道长乐和刘家港的两块碑记，伯希和的著作中也有不少疏忽和错误，其中有些已在以后撰写的《郑和及其航行补证》（《通报》1934年31卷）和《再论郑和的航行》（《通报》1935年32卷）得到修正和补充。

此后，西方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英国学者米尔斯（J.V.Mills）和李约瑟（J.Needham）。米尔斯研究的重点是航海造船技术以及航海史料的翻译、注释，其深度和广度超过了以往的西方汉学家。米尔斯的主要著述有：《武备志海图中的马来亚》（《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杂志》1937年15卷）、《论早期中国航海》（《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51年3卷）、《中国沿海地图》（lmago Mundi）1954年第2期）、《中国最大木帆船及其排水量》（《航海宝鉴》1960年46卷）、《马欢：瀛涯胜览译注》（剑桥1970年）、《十六世纪前后阿拉伯人与中国人在马来水域的航海活动》（《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杂志》1974年226卷）。其中以《马欢：瀛涯胜览译注》一书贡献最大，它标志着西方对郑和下西洋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

本书的导言很长，分两部分。首先介绍了郑和的身世，七次下西洋的年月、航程、航线、船只等问题，然后叙述了马欢的生平、《瀛涯胜览》的版本、内容、价值和同时代其他的史料。此书主要部分是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的翻译和注解。在东南亚地理和民俗方面，米尔斯有许多独到和精辟的见解。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郑和下西洋花费了相当的笔墨，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探险时代”。郑和的明显意图是“向所有国家，甚至包括远在他们已知世界之外的国家显示中国是一个政治文化上强大的国家”（第1卷）。后来李约瑟又说，郑和“探险的航程愈远，到的地方愈多，他们对于自然奇珍的搜求变得愈重要，而对于要求海外诸王承认其臣属地位之事却反而越发不重要了”（第4卷）。关于郑和下西洋终结的原因，李约瑟认为可能与宦官和儒家官僚之间的竞争有关，其后果是对印度洋的统治权落入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之手（第1卷）。“这一结果不仅对中国历史，甚至对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4卷）。李约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点也是在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方面。

关于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的关系问题，可以参见澳大利亚学者王赓武的研究。他在《中国和东南亚，1402—1424》（《中国和东南社会史研究论集》，剑桥1970年）一文中指出，郑和下西洋期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出自永乐个人对东南亚的兴趣。他在另一篇《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坎布里奇1968年）中特别指出郑和的远征与扩展朝贡制度有非常直接的关系，这里包含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所认为的所有外国人都一律平等和应该一视同仁的思想。王赓武的《南海贸易》（《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杂志》1958年31期）和《中国与满剌加关系的建立：1403—1405年》（载J.S.巴斯丁等编《马来亚与印尼研究》牛津1964年）也专门论及了郑和与东南亚的关系。其他有关论著有：谢巴德（M.C.Sheppard）的《郑和将军的惊人航行》（《海峡时代刊》，1955年）、《永乐皇帝与郑和将军》《郑和时代的满剌加》（《历史上的马来亚》，1957年3~4期），费子智（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1902—199）的《中国人向南的扩张》（伦敦，1972年），许云樵（Hsu Yun-tsiao）的《元明时代航路的改进及其在东南亚史上的影响》（《中国文化》1979年19期）。许云樵创立的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进行过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如许云樵写过《三保太监下西洋考》（《南洋学报》5卷1辑）、陈育崧《巩珍西洋番国志的真伪问题》（同上，11卷2辑），饶宗颐《西洋番国志书后》（同上，16卷1~2辑）。

关于郑和与非洲的关系，除上述戴文达的有关研究论著之外，还有施瓦茨（E.H.Schwarz）的《中国与非洲的联系》（《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孟加拉1938年4期），卡麦尔（Y.Kamel）的《郑和的航海》（《非洲与埃及制图学杂志》1939年4期）；弗里坡（C.E.Fripp）的《中世纪中国与非洲的贸易》（《国内事务部年报》1941年18期），张桂生（1921—）的《中国有关非洲最早地图的重新考察》（密执安1957年）、《明代海上事业和在大发现时代以前中国关于非洲的知识》（1971

年）、《伟大的中国探险家》（密执安，1555年），席文（Nathan Sivin，1931—2022）的《哥伦布之前80年中国27,000人的舰队到达非洲》（《科学美国人》1972年1期）。意大利学者费莱西（D.Filesi）的《中世纪中国与非洲的关系》（米兰1962年，英译本1972年），其中一大半都是讲述郑和与非洲关系的，如第五章“明初中国人的西进”，第六章“中国对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的记述”，第八章“郑和下西洋的年代”，第九章“郑和的两块碑记”，第九章“中国对西洋和非洲远征的结束”。

关于郑和下西洋与中亚，美国中亚史学家罗塞比（M.Rossabi，1941—）曾专门写过《郑和与帖木儿有何关系》（《极远东》20卷3期，1973年）。另外，其他几部较有影响的西方著述有：法国考尔迭（H.Cordier，1849—1925）时《中外关系通史》（巴黎1920—1921年），美国费正清（J.K.Fairbank，1907—）和赖绍华（E.O.Reischauer，1910—）合著的《东亚：伟大的传统》）（波士顿1960年），傅路德（L.C.Goodrich，1894—1986）的《中国人民简史》（伦敦，1957年）和罗荣邦（Jung-pang Lo，1912—1981）的《明初海军的衰微》（《极远东》1958年5期）等。

郑和航海图与郑和宝船

在15世纪初中国航海和造船技术的研究方面，最吸引学者们注意的是《郑和航海图》和郑和最大宝船。对于前者，M.G.菲利普在1885年和杰里尼（G.E.Gerini）在1909年都做过详细考证。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布莱格登（C.O.Blagden）发表的《马来史研究》（《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杂志》53卷），他逐一考证了图中马来半岛东岸从孙姑那到半岛西岸的古力由不洞等16处地名。1937年，米尔斯在《武备志海图中的马来亚》中研究了其余35个地名，并高度评价了《郑和航海图》的准确性。他认为，在马来水域的40个可以追溯其语源的地名中，有17个是中国人命名的，如“将军帽”（Pulau Tinggi），17个是从马来地名按厦门等方言翻译的，如“昆宋屿”（Pulau Pisang），还有6个是马来地名的意译，如“九洲”（Sembilan，即九的意思）。他认为这种航海图很可能是传统的绝对中国式的。17世纪初以前，在马来水域活动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葡萄牙人一直不知道（起码未使用过）《郑和航海图》中所标注的针路。马尔德（W.Z.Mulder）在《武备志海图》（《通报》1944年37卷）中从领航员的角度研究了海图，并对米尔斯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戴文达曾认为郑图可能受到阿拉伯人的影响，但在1947年《中国对于非洲的发现》讲演中指出：“这些航海图，实际上是中国人在这几次远征中所得到的知识成果。”他在另文《中国航海家的航行指南》（《通报》1939年34卷）中还对牛津大学所藏《顺风相送》等抄本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航行日志无疑也保留了郑和伟大航海的成果。这些图与《武备志》海图有很大关系，很可能就是《针位编》的一种（虽然现存的只是更早收稿的抄本），它们包含了无数次航行所积累的知识。

这方面还可参考傅路特《葡萄牙人东来以前中国航海图与阿拉伯航海图之间联系的质疑》（《爱色斯》，1954年44卷）和德本汉（F. Debenham）《发现与探险》（伦敦，1960年第122页）。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2章也认为这些图应视为中国的航海图，它们与西方航海图形式上很不相同，但在性质上却很相似，在时间上（15世纪初）也差不多相同。虽然由于极端的图解式，《郑和航海图》显得失真，但图中针位的误差不超过5度，这对1420年的舵工来说可以认为是极好的了。

米尔斯等人还根据《郑和航海图》所标注的针位，对郑和船队的航行速度作了推论，即图中的一更约等于2.4 h，在障壁海城，从苏门答剌到白礁（Pedra Branca）平均航速2.39 n milo/h， 最快航速为4.5 n mile/h.最慢航速平均1.8 n mile/h，而在开阔性水域，郑和船队的航速更快，从白礁确到东竹山（Pulau Aur） 平均航速6.25 n mile/h.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尺问题，在西方学术界的争论也很大。

早在1876年，一位名叫W・P・格伦威尔德的汉学家就开始注意到郑和舰队中有关巨型木船的问题，首先提出了郑和宝船尺寸决不可信的看法。到1925年，而I・A・唐纳里在《论古代中国船舶与贸易》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据称郑和出使宝船中，有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这“显属过分夸张之词”。另一位学者C・E・吉布森从船的稳定性考虑，认为当时建造长度超过三十丈的木船根本不可能。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G.P内什在评述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航海造船部分）的文章中，更是力持此说。其理由有二：第一，郑和最大宝船长宽为132×54米，设九桅，三层甲板，需要水手450~500人，这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1843年，英国建造的钢制轮船“大不列颠”号，震惊了当时西方的造船业，船长只有87米，船宽15米。西方史料中虽然也有一些传说，例如埃及托勒密王（公元前222—公元前205年）曾命令建造有40排桨手的庞大木船，长宽为204×17米，驾乘人员包括400多名船员、2,850名兵士。内什认为这一记载荒诞无稽，根本不可相信；郑和宝船的记载也是如此。第二，郑和舰队的停靠港多是像东非蒙巴萨这样的小型港口，这样超大型的木船必然极为笨拙不便，停靠和驶离都非常困难。当年达・伽马率领的船队到蒙巴萨时，一直等到遇见了当地的领水员，才找到一处较安全的锚地。郑和大规模的宝船队的航行更是难以想象。

前苏联研究明代中外交通史的专家伯克夏宁也认为：14至15世纪一般大型海船的有效载重吨位为50～360吨，《明史》有关宝船的尺度多半是夸张了。

美国华裔学者罗荣邦对郑和宝船的看法在西方史学界有一定代表性。他对郑和出使的总人数与所乘船数作了比较，认为15世纪初中国船只的平均定员为450～700人。由此计算，郑和船队每艘船的平均载重为500吨，所以，另外建造如此巨大的宝船实属没有必要。他提出“料”是中国古代计算船舶载货量的单位，据南京静海寺残碑记载，郑和航行中最大载质量的船只仅有两千料，约合

500吨（排水吨位为800吨），而这仍然比当时葡萄牙人的船只大得多。奇怪的是，罗荣邦相信宋代的海船有的规模更大，他援引宋代吴自牧《梦粱录》江海船舰条的记载“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云云，并说这种五千料船的载质量为1,200吨。这样的话，郑和最大宝船仅相当于宋代的中小船舶。那么，如何解释郑和下西洋的目击者对于宝船“巨无与敌”“盖古所未有”的描述呢？对此，罗荣邦则缄默未谈。

英国航海史专家J·R·米尔斯对郑和宝船的研究造诣较深。他在1960年《航海宝鉴》上发表的《最大的中国木帆船及其排水量》一文中引用大量材料，论证郑和宝船尺寸是基本可靠的。他提出，从整个航海史来看，建造四十余丈长、排水量为几千吨的木船是有可能的。因为早在明代以前，中国就曾制造过比郑和宝船更为庞大的木船。据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约1343年）的记载，元代最大的中国船只设四层甲板，12桅，乘一千人。《三才图会》中也记载过一种长120步（六十丈）的木船，不过这不是海船。米尔斯还提出，元代的海船比我们今天的木船（通常不会超过18丈）要大得多。因此，不能以今天船型的大小去揣度甚至怀疑古代的造船能力。他认为，长宽比为2:1是完全可能的，17世纪以前海船的龙骨长度和船身最大宽度之间通常都是这个比例。（本文作者获悉菲律宾最近发现一艘15世纪初的中国沉船，载有大量明初瓷器和其他物品。据测量，这艘沉船长100英尺，宽40英尺，其长宽比与郑和宝船相近。）

同时，米尔斯指出“中国史家有时喜于夸张，也可能船用尺较明工部尺（约合12.1英寸）要小一些”。根据他的推算，郑和宝船的最大实际尺度应为30余丈长，15丈宽，排水量为3,100吨。

在1970年《瀛涯胜览校注》一书中，米尔斯又重申了自己的意见，并补充说，有关宝船的最大吃水深度虽无明确记载，但可能不会低于元代（吃水二丈），并且很可能要深得多。米尔斯还有一个观点是颇有卓见的，值得国内学者注意：“据《明史》言，郑和第一次航行，造大舶六十二。但如果说这里所指的是郑和率领的全部船只数量，或者所有船只都是同一规模，那都是令人不可想象的。”

迄今为止，国外对于郑和宝船最为全面的论述当推英国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航海与造船部分）。他认为，郑和宝船的真实尺度问题是船舶考古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李约瑟提出，在考察郑和宝船的尺度时应考虑古今表示船舶大小的方法是不同的。最初，12世纪法国波尔多等地对装运酒和油之类货物的船舶，能装多少桶酒或油来表示船的大小，这就是所谓的桶数；还有的用能装载货物的质量来表示船的大小，这就是所谓的载重吨数。用排水量表示船舶载重，只是10世纪中叶才开始通行。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和现代的吨位概念发生混淆。问题在于在古代记述中计算吨位的方法总是不予以特别说明。因此，计算中世纪数字的最合适单位可能是总吨位或总质量。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最大宝船，也应将此概念搞清楚。

李约瑟又提出，还应考虑：中西木帆船的建造传统是不同的。欧洲在整个中世纪内使用的船只

都不很大。载质量达200吨的木船，在14世纪的欧洲就算异常庞大了。15世纪时，亨利王子的著名帆船约为50吨。达·伽马船队中没有一艘超过300吨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使用的“圣玛丽亚”号为2,800吨，但这是一个例外。而在8世纪中叶，中国人的船只就几乎达到600吨；到13世纪中期达到700吨。这一规模与15世纪威尼斯最大木帆船是大致相同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平均吨位只有528吨，而当时英国舰队平均只有177吨。这样的规模或更大一些规模的船只，自13世纪（马可波罗时代）至18世纪之间是比较普遍的。到19世纪中叶以前，西方木帆船除个别情况外，其最大载质量不超过3,100吨。李约瑟表示赞同J·R·米尔斯等人的意见，认为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最大宝船曾经达到了这一极限。他还提到一位叫作尼可洛·康蒂的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1395—1469年）曾于1438年亲眼见到过约2,000吨的五桅中国大型木船。因此，李约瑟总的印象是，“整个中世纪内中国船舶的吨位比之欧洲要大得多”。

李约瑟说，《明史》记载最大宝船长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这一尺度“大概还是可信的”。每艘宝船带有船员450~500人（不清楚是否包括兵士和乘客，也不知道每次是否一样多），艉楼有三层重叠的甲板，主甲板下也有数层板。至于谈到船宽，有人曾提出大宝船的船幅尺度可能包括主帆的宽度。现代木帆船的主帆宽度多大于船宽。如不平衡式主帆一般为船宽的2倍或2.5倍，原因是在帆的长度受限制的条件下，应尽可能扩大帆面积。但李约瑟认为这一看法对郑和宝船是完全不适用的。他说，中国造船传统是，上甲板和艉楼可以跨出底肋骨约30%。这样看来，最大宝船的龙骨实长只有三十一丈，如有三个接头，分为四节的话，每节长度各约八丈，这是令人可以确信的。虽然宝船的船型极宽（长宽比为2.45），但这可以从其他来源的材料中得以证实。整个郑和船队的各种船只，从九桅船到长度只有最大宝船十分之一的单桅船，其长宽比都是大致相同的。

李约瑟在文中最后风趣地说，如果达·伽马当年有幸能够遇到郑和舰队的话，将会大吃一惊。中西造船的最明显区别即在于中国大宗宝船队中有极为巨大的宝船，而达·伽马的舰队却没有一条超过300吨的船，有的甚至更小。在造船方面，中国曾远远走在欧洲的前面。

苏俄研究郑和状况

俄国和前苏联学者对郑和下西洋也有不少研究。还在19世纪末，俄国研究中国植物和中西交通史的学者贝勒（E. Bretsheider，1833—1901）在任驻华使馆医师期间，就写过《十五世纪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的交往》（《中国评论》4卷，1875年），在早期研究郑和的西文著述中有一定影响。著名汉学家比丘林也曾翻译过与郑和出使南亚、西亚诸国有关的史料。20世纪50年代以来，前苏联学者开始以新的观点对郑和下西洋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

19.斯维特（Я.М.Свет; 1911—1987）曾发表过不少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著述，主要有：《郑和

的伟大远航》（《知识就是力量》1954年3期）、《十五世纪上半叶中国航海家的远航》（《科学技术史问题》1957年3期）、《沿着东方旅行家和航海家的足迹》（莫斯科，1955年）和《航程万里》（莫斯科，1960年）等。斯维特比较了马欢、费信的游记与周去非、汪大渊的著作，认为宋元学者所提及的许多较小而且联系极少的陌生遥远之国，到了15世纪上半叶已成为中国人世界观念中不可分离的和能予详细了解的部分。而这正是郑和下西洋最为重要和最有意义的总结。

伯克夏宁（Aleksey Anatolyevich Bokshchanin）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包括：《十五世纪初郑和远航非洲诸国》（《世界文化史通报》1959年6期）、《十四至十六世纪中国地名学中的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家》（《亚洲人民研究所学术简报》85辑1964年）、《中国史学家对于十五世纪初郑和远征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科学》，莫斯科，1981年）、《十四至十六世纪中国与南海诸国》（莫斯科，1968年）、《十五世纪初叶的中华帝国》（莫斯科，1976年）等。他的研究在前苏联学者中是最为全面深入的。他提出郑和是第一个开辟通往非洲道路的中国人，认为戴文达的郑和是为寻找长颈鹿之说毫无根据。明成祖曾表示：“麟之有无，何所损益？”对中国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大事是同远方诸国沟通友好关系。他还提出，《明史》虽记载了郑和第七次航行时曾访问木骨都束和卜剌哇，但在其他有关史料却得不到佐证。据他推测，郑和到达忽鲁谟斯后，便没有继续指挥他的船队。当时船队的一部分在古里稍事停留即返航中国，而另一部分人到达天方，经陆路历时一年回国。真正去非洲的是洪保太监。这一推论今天看来不无道理。伯克夏宁在《十四至十六世纪中国与南海诸国》第二章中，认为郑和下西洋有政治、经济的双重目的。政治目的是采取新的外交政策，通过向南海、西洋的多次远征，进一步巩固中国对南海诸国在名义上的宗主权。他极不赞同踪迹建文或耀威异域说。“二帝之心，岂真欲夸多斗靡于远方哉？”问题的关键在于“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往异域（马欢诗）”。这里的“纶音”即是表达了中国皇帝对海外诸国的最高宗主权。郑和下西洋的经济目的是扩大海外贸易。这在15世纪初符合国家的经济利益，也特别符合经济文化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各阶层人民（首先是大城镇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愿望与要求。伯克夏宁认为郑和远征的直接后果是扩大了当时与中国有使节关系的“朝贡国家”的范围，南海诸国派往中国使团的数量骤增，对中国在各方面的宗主关系大大巩固。但中国的这种宗主权从一开始就是“不彻底的”。郑和率领船队多次远航，却从未在外国留下一艘船、一支部队，在满剌加和苏门答剌建立的基地（官厂）也没有中国驻军。甚至对实际控制旧港地区的海外华人，中国政府也和其他周边番王同样看待，只限于要求形式上的宗主权。他通过中西早期殖民在目的、性质上不同的比较，分析了中国为何不能进一步发展这种殖民政策和海外贸易的原因。

伯列芙斯卡娅（Н.Е.Боревская）的《早期中国历史演义的史料来源》（《亚非人民》1973年3期）认为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为研究中国长篇叙事体小说的形成过程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西洋记》采用了许多对各种体裁的作品都很典型的形象化描写。它以传国玺、女人国、五

鬼闹判、五鼠闹东京等为例，详征博引，分析了作者从新的角度进行再构思的过程。

前苏联学者还注意中国研究郑和下西洋动态的评论。伯克夏宁在《中国史学家对于十五世纪初郑和远征的评价》中，对20世纪3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主要史学家的观点作了介绍和评述。他说，大部分中国学者都倾向于从分析明初中国的经济、政治条件入手来寻求郑和远征的原因并评价其性质。但是，“他们的分析水平并没有全部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者所提出的要求。尤其是对于郑和远征的结果与中国政治、经济进一步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问题也未能得到应有的研究”。类似的述评文章还有图托夫的《朱偰〈郑和〉一书简介》（《现代中国社会科学文摘》1957年22期）。

日本郑和研究状况

笔者对于日本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概况所知甚少，这里主要根据庄景辉同志提供的资料作一简介。

在地名研究方面，有北村松之助、国井清音《瀛涯胜览》与《星槎胜览地名考》（《史学杂志》十四卷，1903年）、石泽发身《十五世纪支那旅行记中之南洋地名考》、藤田丰八（1869—1929年）《大小葛兰考——星槎胜览的价值》（《史学杂志》二十五卷，1914年）。藤田丰八指出，费信的这部书多引《岛夷志略》，仅稍改字句，误解、臆改之处甚多。如“麻逸”与“麻逸冻”“大葛兰”与“小葛兰”，“古里”与“古里佛”都是如此。他还较早提出了《武备志》未载《郑和航海图》的问题，认为“此图所载航海之路程，及海图之列次，大致无误，并与明中叶以后杂出之则说不同”。这一肯定的说法对我国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山本达郎（1911—）《郑和西征考》（《东洋学报》21卷，1934年）也曾引起我国早期研究者的重视。

航海和造船技术方面，有高岩氏（1884—1968）《郑和的南海经略》（《历史与地理》1卷，1917年）、《明代的船舶与航海术》（《地理教育》22卷，1935年）、桥本敬造《郑和的航海》（《东方学报》1968年39册）。

关于郑和下西洋史料学方面的研究，有坪井九马三《论明代钞本〈星槎胜览〉》（《史学杂志》29卷，1918年）、可儿弘明《费信所见闻的十五世纪初之南海渔事》（《史学》33卷，1960年）、小川井博译注的《马欢：瀛涯胜览》（吉川弘文馆，1969年）。石田干之助（1891—1974）《有关南海的中国史料》（生活社，1945年）的第六章题为“明初有关南海知识的扩大”，其论述了郑和在南海的远征，郑和远征的文献记载以及西方、中国和日本的研究状况。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29章曾提及阿拉伯史料里有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述（490页）。1970年，家岛彦一果真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也门拉土鲁王朝（1229—1454）有关郑和第5–7次下西洋期间派船

队访问也门的新材料。家岛对这些材料作了较好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伊斯兰史料中的郑和远征记事》（《史学》38卷，1966年）、《从伊斯兰史料看郑和的远征》（《亚非语言文化研究》1968年1号）和《十五世纪印度洋通商史之一页——郑和远征分队访问也门》（同上，1974年8号）。日本学者对中国在史料整理方面的动态也极为关心。郑鹤声、郑一钧合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出版不久，小川井博即撰文加以介绍和评述（《东南亚历史和文化》1982年11月）。

日本研究郑和的其他著述还有：桑田六郎（1894—）《〈皇明实录〉所载明初之南洋》（《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史学科研究年报》1937年四辑）、浅海正三《五百年前南海的开拓与郑和》（《历史》18卷，1943年）、李献章《从明廷之海外宣谕看妈祖的传播——特别是有关郑和西征时的灵验》（《中国学志》1964年第一本）、和田久德（1917—）《十五世纪初的苏门答剌华侨社会》（《茶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纪要》1967年第5号）等。

日本研究郑和的最新成果是清水书院1981年出版的东北大学教授寺田隆信（1931—）著述的《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这部书共分四章，包括序、跋和郑和年谱。第一章论述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第二至三章介绍郑和身世、出洋舰队的组织，并利用中国和伊斯兰史料，详细论述了郑和出使的年代、航线及所到国家和与各国展开贸易活动、进行友好往来的状况。第四章说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动因和终止，还谈到明代航海术、造船技术的成就、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以及在中国和海外的遗迹等。这部书已由庄景辉译成中文，即将同大家见面，这对推动国内的学术研究，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5期）

读曾鍏波《郑和下西洋考略》

明代“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世界探险史上也是最引人入胜的一页。百余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这一课题产生兴趣，出现了许多种专门著作和论文。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人们又进一步重视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并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1985年7月中旬，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大会”，邀请了国内外研究郑和的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数百人，济济一堂，交流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就在这次大会上，经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的介绍，我第一次见到《郑和下西洋考略》的作者曾鍏波先生。其实在此之前，当我参加由业师张维华教授主编的《郑和下西洋》（交通出版社，1985年）的编写时，前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主任委员王大勇先生就曾专门从上海寄赠鍏波先生研究郑和的论文，对我和其他编写者帮助很大。尤其是关于郑和在东南亚的遗迹、遗物的论述，资料丰富，考订精深，使人大开眼界。当时我还以为他是一位专业史学家，其实他在香港主要经营东南亚贸易，业余耽爱文史书法，颇有造诣，并以欣赏西欧古典音乐为娱。除了商务和担任大量社会公益工作之外，常以“思然”等笔名发表文章。曾先生待人诚挚有礼，并且提掖后学，给我和其他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南京会议之后，他又对国内外各种资料耐心搜罗，虚心研读，在原有文章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改订，形成了今天这部比较有系统的专门著作。除了请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沈已尧教授作序外，在出版之前，作者特将书稿寄示于我，执意要我说点什么。我作为一个学识浅陋的晚辈，自然提不出什么贴切得体的意见。但有幸作为这部著作最早的读者和同样关心郑和研究的年轻学者，我还是希望将自己读完这部书稿的一点感想写出来，以就正于作者和其他同行。

首先，我觉得这部书编排新颖，不落俗套，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匠心独运。全书共分5卷：资料篇、身世篇、航程篇、技术篇和成就篇。在这5个框架之中对郑和研究中的主要问题逐一作了详尽的分析和考辨，如基本史料、碑铭探讨，研究述略（以上为第一卷）、家世出身、生年新说、何以赐姓、卒年考证（以上为第二卷）、出使动机、西洋南洋、七次出使（以上为第三卷）、兴造大船、宝船研究、航海技术（以上为第四卷）、辉煌成就、遗迹流风和航海节日（以上为第五卷）。既是个案研究的汇集，彼此专题之间又有一种有机的联系，条理非常清晰。这部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以比较严肃审慎的态度来考察史实。对时下较流行的郑和为赛典赤・赡思丁第六世孙的说法，作者提出了不少疑点：除了有关族谱、家谱所载郑和先世世系混乱、彼此矛盾之外，最直接证据又仅

有郑和十二世孙妇墓碑中的记载，这时距赛典赤已有18世之远，时间相隔得太久，难免令人怀疑其中有攀援之嫌。因此，作者采取了一种比较慎重的说法，即郑和为赡思丁六世孙之说只能说“非不可能”。至于有人由此推衍说什么郑和为穆罕默德之三十七世孙，实在是无稽之谈。另外关于“西洋”的概念，不少人不仅将之与今日之南洋混为一谈，而且据《明史・婆罗传》：“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认为当时东西洋之分界在今印尼加里曼丹北部的文莱。作者根据随郑和出使的马欢、黄信、巩珍等人的笔记指出，这种划分并不符合郑和时代的情况，当时东西洋的分界线是在今印尼苏门答腊西北角元亚齐附近的南浡里。搞清楚这一点并非没有什么意义。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黎来方教授提出郑和曾7次下西洋，其理由是永乐二十二年郑和曾短期出使过旧港。实际上，在当时人心目中，旧港因为位于苏门答腊岛东南岸巨港一带，所以并不属“西洋”的范围内。这种未谙东西洋划分而提出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其次，作者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的估价是十分充分和准确的。作者认为，郑和出使西洋传插了国威，开拓了国际间文化和经济的交流，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对于华侨开发南洋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然，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和500余年之前的明朝是截然不同的。谁也不可能用今天的开放去比附郑和所执行的“好勤远略”的政策。因为时代不同，开放的概念有着严格的区别。但历史毕竟是不能随意割裂的。从整个历史来看，中国人一直在探索着中国以外的外部世界，虽然这个历程不是风平浪静、畅通无阻，而是充满了艰辛、曲折和苦痛的，甚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努力。郑和下西洋即是中国认识世界发展链环中的重要一环，使中国人海外航行的范围和规模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部分地突破了传统地理认识的束缚，在一定意义上对儒家传统文化藩篱是一次小小的冲击。有人过分强调郑和远征耗资巨大，得不偿失，并以此来贬低或否定郑和下西洋的意义。这种批评也是禁不起推敲的。《明史・夏原吉传》谈到明初财政状况时说：“是时兵革初定，论靖难功臣、封赏分封诸藩，增设武卫百司，已又发卒八十万问罪安南，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宫阙，供亿转输以巨万计，皆取给户曹，原吉悉心计应之，国用不绌。”《明史・黄福传》亦曰：“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曾鍏波先生也引用不少实例说明郑和下西洋通过进一步开拓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贸易关系，扩大了这些国家商品在我国的销售市场，对于这些国家的农业、手工业生产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的某些产品在外销和内供的促进下也获得了进步和发展。他的论述是很令人信服的。总之，我认为，郑和及其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都是他们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后来的人们固然可以对他们的是非功过做出种种评判，但他们在中国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艰苦历程中所留下的足迹却是不应该遗忘的。

最后，在郑和下西洋与以前中国人航海活动的联系方面，作者虽未花费很多笔墨，却在几处关键的地方强调了这一点，即唐代以降，中国对外探索积极活动的主要目标已由西进转向南进，经海

上商路南下，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经常的贸易和外交联系。只有强调了这一点，郑和出使西洋才不会被认为是某个皇帝个人意志的产物。没有以前许多无名航海家的开拓，郑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如此巨大的成就。例如，在中国人的非洲探险活动中，郑和航海是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郑和船队很可能已向西南航行穿过莫桑比克海峡。然而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证明元代之前很久中国人就已知道桑给巴尔了。中国最早的绘有非洲的地图——朱思本所绘的《舆地图》（1311—1320年）不仅正确标出了刚果盆地的位置，而且几内亚海岸线的方向也画得十分准确。这在某种意义上要比欧洲地理学者早一个半世纪。据美国学者研究，朱思本的地图还证明14世纪初期中国地理学者的视界在西南方的扩展已远远超出印度洋范围，甚至已达到南极海。郑和的作用就在他基于前人的地理知识、率领庞大的中国使团第一次访问了非洲许多国家，并对这些国家的确切方位、情况与习俗作了考察。这些记载都颇详尽生动，同当今东非海岸的情景极其相似。但郑和船队在到达非洲东南部后，为什么没有继续往南航行，中国花了3个世纪才登上海上强国的地位，为什么在郑和之后却如此迅速、轻易地衰落下去，只能勉强地坚守在近海水域内抵抗倭寇和海盗，这也是很值得深思的。可能是限于篇幅，作者对此问题未能做深入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憾。

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之所以历久而不衰，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极为重要的意义，更主要的是由于诸如史料支离破碎等因素，使得这方面进展难以继续深入，还存在着许多疑难和空白，吸引着更多的研究者。我相信，曾鍏波先生所著《郑和下西洋考略》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思索，引导我们进一步探求。

（原载《郑和研究》1988年第6期）

从越南史料看郑和下西洋与占城的关系

占城（Chiêm Thành），是中南半岛的占族人于今越南中部地区建立的古国。郑和七次下西洋，每一次都要访问占城，这可以从明朝的文字史料和文物史料得到确凿的证明，如《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天妃之神灵应碑》等。郑和率领的庞大舰队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七次来到占城的主要港口，并且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理应与当地政府与民众有很多的互动和交往，也应该引起占城周边国家的注意，特别是位于今越南北部的强敌安南国的关注。但在越南浩如烟海的汉籍史料中至今还没有发现过任何关于郑和访问占城的记载，越南的历史学家也从来不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其原因扑朔离迷，令人不解。为此笔者试图通过对越南现存中文汉籍史料的梳理，争取从另外一个角度，对郑和下西洋与占城的历史背景做一些粗浅的分析，尤其对越南史料中为何没有这段历史的记载提出新的思考。

郑和下西洋前后越南的中文史料

占城是曾经创造过灿烂文明的历史古国。《明史》记载说：

> 占城居南海中，自琼州航海顺风一昼夜可至，自福州西南行十昼夜可至，即周越裳地。秦为林邑，汉为象林县。后汉末，区连据其地，始称林邑王。自晋至隋仍之。唐时，或称占不劳，或称占婆，其王所居曰占城。至德后，改国号曰环。迨周、宋，遂以占城为号，朝贡不替。元世祖恶其阻命，大举兵击破之，亦不能定。[①]

越南流传至今编撰时间最早的史书之一《大越史略》大约成书于陈朝年间（1225—1400），里面11次提及“林邑”，74次提及“占城”，详细记述了位于古代越南南北地区两个国家占城与安南的密切交往。[②]

从地理位置上讲，占城自古是中国与南洋诸国及大食等国贸易活动的最重要中转站。从宋元时

①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列传第二百十二，外国五，占城。

② 《越史略》四库全书版，卷上。

代起，占城的海上贸易就很活跃，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指出，占城是“海外诸蕃国”中西南诸国的“都会”之一。[①]越南人黎崱于14世纪撰写的越南史志《安南志略》也记载了占城国“立国于海滨。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新水，为南方第一码头”。该书对宋元期间占城与安南之间的战事纠纷也有详细的描述，如“占城国象马数万来寇”，说明占城军事实力非常强悍。[②]

在越南史学最重要的编年体正史《大越史记全书》中最早对于占城港口的描述见卷一黎纪：

> 癸未四年宋太平兴国八年。春，遣使通好于宋。初，帝征占城，管甲刘继宗遁居其国。至是，遣养儿养子也，缺名。收捕，获继宗斩之。海道新港成，未详某处。帝征占时，历铜鼓山，至婆和江，山路险难.人马困惫，海道波涛，又难往来，乃使人开港。至是成，舟楫所至，皆得其便。[③]

越南史料中还有一本《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是在《大越史记全书》的基础上，参考中国史籍和越南其他史书而作的一部纲目体史书。该书对占城和新港的描述基本也出自《大越史记全书》：

> 〈癸未〉四年〈宋太平兴国八年〉春，遣使如宋。新港成。帝征占。辰历铜鼓山，至婆和江，山路险难，人马困惫。乃命浚新港，至是成。公私皆得其便。注：铜鼓山，在清化安定县丹泥社。婆和江，在清化玉山县，今同和社江是。[④]

这几部史籍中提到的占城港口新港应该就是后来郑和及其船队出洋的海外首站停泊港——占城新洲，也就是如今越南境内平定省的归仁附近。

郑和下西洋期间的安南和占城

一部古代越南史，基本上可以说北部安南与南部占城的争斗史。郑和下西洋前后，明朝对这两个国家的争端一直采取未审曲直、息事宁人的态度，避免直接卷入番国之间的纷争。只是多次遣人往谕，希望双方各自罢兵息民，毋相侵扰。

---

①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外国门上，占城国。

② 《安南志略》卷一边境服役，卷十一黎氏世家。

③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一，黎纪，大行皇帝。

④ 《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一。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前三年，安南军队一直在不断攻伐占城，永乐元年又造小钉船以击占城。占城遣使多次向明朝求救，明朝也屡次遣使谕解，但没有效果。有一次明军还驾海船九艘来救，可是双方冲突仍然不断。

1404年，安南陈朝故王孙陈天平（越史作陈添平）逃难前来明朝，说明安南外戚胡氏父子弑陈顺宗而篡其国的真相，明朝遣使斥责。

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奉命第一次下西洋，其庞大船队从南京出发，第一次访问占城，于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回京复命。

大约同时，胡朝黎苍遣使向明朝请罪，提出接陈天平回国，以君事之。但当明朝护送陈天平回到安南，却遭黎苍伏击。使臣以闻，朱棣震怒，特命明军分别从广西、云南出击安南。越南史料记载：

> 明遣征夷右副将军挂征夷副将军印、新成侯张辅，参将荣阳伯陈旭，领兵四十万犯坡垒关。一伏一行，更番相济。征夷左副将军、西平侯沐晟，参将右军都督同知、丰城侯李彬，亦领兵四十万犯富令关。凿山伐木，开道进兵。二道兵总八十万”。黎苍大败，“明人入东都， 掳掠女子、玉帛。会计粮储，分官（辨）〔办〕事。招集流民，为久居计。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驿送金陵。[1]

永乐五年（1407年），朱棣以平安南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直接委任官吏统治，置交趾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及卫所府州县各衙门，正式将安南变成明朝的一个省。“明人计所获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户三百一十二万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马四百二十，牛三万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2]占城也趁机北伐，夺回被安南侵占的土地，“及占城举兵，欲收故地，迁民惊散”。这一年安南发生大饥荒，人民不得耕种，死者相枕。同年秋，郑和带回爪哇等国的朝贡使节和数十船商贸换回的异域珍品，完成首次航行，尽显明成祖朱棣“君主华夷、抚驭万国”的愿景。

大约永乐六年（1408年）初，郑和奉命开始了第二次下西洋并再次到访占城。《明史·占城传》记载：“六年，郑和使其国，王遣其孙舍杨该贡象及方物谢恩。”[3]此次航行路线同前一次差不多，也是历时两年。永乐七年（1409年）夏季回京复命。同年陈朝后人陈简定起兵抗明，即位于长安州谟渡，建元兴庆，“大破明师于逋姑”。明军增兵二十万前去征讨。

---

①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九，后陈纪，简定帝，卷九，属明纪。

②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九，后陈纪，简定帝，卷九，属明纪。

③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三百二十四 列传第二百十二，外国五，占城。

永乐七年（1409年）夏，明朝张辅帅兵进入交趾，大败越军，俘虏陈简定。同年，明成祖朱棣下诏，命郑和第三次统领船队出国，途经占城，在新洲停泊。此次航行仍以东印度洋为中心，并在满剌加建立排栅城垣，盖了仓库，作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这一年安南饥荒，比1407年还要严重。

1410年安南另一个起义者陈季扩遣使上表请降，明朝封季扩为交趾右布政使，但陈季扩不肯接受，再次起兵反明。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

1412年明朝派张辅出征交趾，越军大败；同年11月，明成祖下达第四次航海命令。这一次，郑和船队继续往西，将东非沿海列入了航程之内，进一步扩大同海外各国的交往与贸易。

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郑和船队扬帆出海，第四次到达占城。同年明军又与越军交战，越军死伤甚重，军人仅存十之三四，陈季扩败走化州。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郑和回京复命。

1414年明军在老挝俘获陈季扩，并斩首于金陵。

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季，郑和船队第五次出海远航，这次出海的主要任务是护送19个国家的使臣回国，郑和船队最远到了东非沿海最南的地区。永乐十七年（1419年）郑和回京复命。

1418年，明朝在安南“开设珠场，采香料，搜捕白狐、白鹿、白象，索求九尾龟、倒挂鸟、白颊猿、蛹蛇等物进纳”。加上很多明朝派往安南的地方官吏贪婪残暴，引起当地民众不断反抗。最有名的是交趾俄乐县巡检黎利，于同年在蓝山举起义旗，起兵反明，称平定王。[①]

1419年，黎利与明军继续抗争，世时处处纷扰。

1420年，安南各地民众望风响应，相与进逼。如路文律起兵于石室；另有黎饿起义，得众数万人，置官铸钱，烧昌江城，掠平滩栅；加上黎利继续组织群众抗击，抚集各处人民。自此明军势力日衰。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郑和奉命第六次下西洋，护送16国使臣回国。郑和亲率船队到达东非海岸，永乐二十年（1422年）八月回京，带回香料等珍品。

1425年，宣德元年，以地方未平故，乞免明年朝觐。明朝宣诏：“凡交趾官吏军民等，所犯叛逆等罪，已结觉、未结觉，已结正、未结正，诏书出日，罪无大小，咸赦除之。其交趾军民等，除纳税粮外，该征及采（辨）〔办〕金、银、铜、钱、盐、铁、香货、鱼课等项，即且停罢，听于境内交易，官府勿禁，用称朕恤民之意。”[②]黎利围攻东都（升龙），“京路豪杰，及各府县人民、边镇酋长，皆辐辏军门，愿效死力”。明将明王通、山寿等，“随战随败，心沮气丧，计穷援绝，势日穷蹙”。[③]

1426年，黎利继续与明军交战，明军不利，冬十一月，明总兵王通、内官山寿遣夏千户登书讲

①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十，黎皇朝纪，太祖高皇帝。

②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十，黎皇朝纪，太祖高皇帝；《明宣宗实录》卷十七。

③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十，黎皇朝纪，太祖高皇帝。

和，请开归路，许之。

1427年，黎利大胜明军。双方协和，撤交趾布政司等文武官吏，明朝郡县安南彻底失败。

1428年，黎利建立后黎朝，正式脱离明朝统治。国号仍为“大越”，后黎朝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百年称为后黎朝（1428—1527），此后贯称中兴后黎（1533—1789）。

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宣宗继续维持祖父明成祖朱棣所建立的西洋朝贡体系，再次诏令郑和出海。第七次下西洋历时3年多，郑和船队途经占城，在新洲停泊。宣德六年（1431年），明使章敞、徐琦来安南，正式同意黎利“权署安南国事”，承认了黎利在安南统治的合法性。安南遣使如明谢恩，并解岁贡金五万两，乞依洪武三年贡例，自后常贡不绝。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郑和在古里病逝，船队在王景弘的带领下，于同年七月回京。

越南史料中没有提及郑和的原因

通过对以上史料的整理罗列，我们得出以下几个不成熟的推论。

首先，明朝征服安南和郑和访问占城应该都是明成祖朱棣整个西洋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但安南不属于西洋藩国，郑和下西洋与明朝征服安南可能是平行发展的两个事件，郑和似乎也没有直接参与征服安南有关的政治和军事活动。

明朝宦官参与外交活动的例子很多，《明实录》和《明史》中多有记载，《大越史记全书》中也几次提到明朝内官或者中官作为外交官前往安南的史实。宦官作为跟皇帝关系最密切的官僚，郑和与其他出使安南的宦官进行沟通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很正常的。但对外应该是保密的，他们的任务也各有不同，所以安南方面可能对郑和并不知情，所以没有任何记载。

其次，郑和下西洋期间，明朝与安南的矛盾非常突出，战争不断，明朝对安南的征服以及安南各地起义不断，成为安南面对的主要矛盾。越南史学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并没有重视明朝与占城合作的问题。

早在宋朝，中越史料已经有着宋朝与占城联合攻击交趾的记载。如宋越熙宁战争中，“王师讨交阯，以其素仇，诏使乘机协力除荡”。“实还，言其国选兵七千扼贼要路，其王以木叶书回牒，诏使上之”。但占城和真腊的牵制并未对战局产生明显影响。元祐七年（1092年），“又表言如天朝讨交阯，愿率兵掩袭”。[①]《大越史记全传》也记载1076年“宋令广南宣抚郭逵为招讨使，赵高副之，总九将军合占城、真腊来侵”。[②]说宋朝联合占城和真腊一起攻打交趾，但后来占城与真腊之间又发生矛盾，占城转而与真腊开战，反而与宋朝疏远了。

① 《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列传第二百四十八，外国五。

②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三，李纪，仁宗皇帝。

明朝史料中确实记载了明成祖朱棣希望占城助兵明朝征讨安南的愿望。如永乐四年（1406年），明朝远征安南，曾命令广东都指挥司选精锐军士六百人以能干千户二员百户六员，由海道往占城会合军马，希望占城出兵助战，防遏安南。[①]

永乐四年八月壬子（二十六日），明成祖遣内官马彬等在给占城国王占巴的赖的敕谕中明确命令：

> 尔宜严兵境上，防遏要冲，其安南人先居占城者不问，自今有逃至者，皆勿容隐。但得黎贼父子及其党恶，即械送京师，厚加赏赉，尔宜勉之！[②]

占城在明朝与安南战争中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占城国王率军北伐，夺回了部分被安南所侵占的土地。永乐五年八月，占城国王占巴的赖奏："臣仰荷天威，以今年五月克取安南所侵地，获到贼党胡烈、潘麻那等，专遣头目济媚等献俘阙下，且上表进方物谢恩。"上嘉纳之。[③]同年九月，太监王贵通赍敕往劳占城国王占巴的赖，赐王白金三百两，彩绢二十表里，"嘉其尝出兵助征安南也"。[④]

但除此之外，还没有看到明朝或者安南史料中有其他任何直接证据，说明占城和明朝南北夹击，联合作战，对安南构成决定性的威胁或者打击。

相反，对占城跟安南之间的暧昧关系以及占城在明朝出征安南期间的真正表现，明朝内部的高层官员早就有所察觉。永乐十三年（1415年）十一月辛酉，兵部尚书陈洽上言，说明朝最初征讨安南之时，占城国王虽听朝命出兵来助，然实"阴怀二心，图唇齿相依，徘徊观望，愆期不进"，不仅侵夺升华府所隶四州十一县之地，还跑到化州大肆掳掠，同时又暗地用金帛、战象资助安南反抗明朝的起义军，甚至收容了他们三万余人。兵部尚书陈洽甚至请求明太宗发兵征讨占城。由于明太宗朱棣已经深陷郡县安南的漩涡之中，感到焦头烂额，十分狼狈，不愿意再跟占城开战，只能遣使敕谕占城国王，用严厉的口吻告知占巴的赖："尔久罹安南荼毒，屡请发兵除害，朕既命师平之郡县，其地尔赖以安，当思感德守分，用保爵土，若阴蓄二心，悖违天道，不抚下人，不归侵地，安南覆辙在前，尔其鉴之。"[⑤]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明朝与占城的关系并非亲密无间。

占城由于自身内部矛盾重重，与安南的实力对比已经逆转，逐渐显出颓势，所以在安南和明朝之间总是采用见风使舵和两面讨好的方式。越南史料说占城一方面继续给安南进贡，尽量放低姿

---

① 《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七。

② 《明太宗实录》卷五十八。

③ 《明太宗实录》卷七十，（明）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四《占城传》。

④ 《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一。

⑤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七十。

态，不直接得罪安南（一直到宣德年间还有占城派使臣朝贡安南马匹和青白玻璃酒器的记载[①]）；另一方面占城不断在明朝面前投诉安南侵犯骚扰。占城趁机反攻安南，只是希望夺回被安南霸占的土地，没有也不可能在明朝与安南的角逐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越南史学家其实已经注意到明朝在拉拢其他邻国打击安南起义军，如永乐十九年到二十年间，两次提到哀牢（老挝）和明军呼应夹击的事件。安南起义军头领黎利原来一直与哀牢结好，此前在芦册山与明人抗争时，哀牢常遣众救援。永乐十九年冬十一月，哀牢率众三万、象一百，猝至黎营，声言并力击明。黎利信之，没有设防，不料反为所袭。第二年年底，哀牢又与明人相约，腹背交攻，黎军多伤死。[②]蹊跷的是，在明朝史料中完全没有见到有类似的说法。

越史中没有任何记载安南主要敌国占城相约与明军腹背交攻的情报，对明朝与占城的密切来往也没有多少关切，说明安南可能没有重视占城在安南与明朝争斗的作用，更没有把郑和访问占城这一事件跟安南与明朝的战争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越南的史料中没有留下关于郑和及其庞大舰队访问占城的只字记载，也就不奇怪了。

再次，对照同一时期的明朝和安南史籍，发现同一事件在双方的记述中相差甚大。在越南史料中，对安南有利的史实往往占了很大篇幅，对明朝取胜的描述则是非常简略。对明军在安南的暴行描写得淋漓尽致惨不忍睹，如越史记载明将张辅“所至多行杀戮，或积尸为山，或抽肠系树，或煎肉取膏，或炮烙为戏，至有剖胎为二诚以应令者。京路以次受降。其遗民尽掠为奴婢，及转卖去而四散者矣”。[③]但对安南和占城骚扰明朝边境地区的史实语焉不详。越南史学家自古以来选择性写史似乎非常明显，对他们不利的史实往往不愿正视。越史对占城的很多事情都记载甚详，如某年某月“占城瑜伽僧来，惟食牛乳”，[④]但对郑和庞大的船队在占城停泊数月的事件却只字不提。甚至到了今天，还没有见到一个越南历史学家正面评价郑和下西洋，对郑和访问占城的史实也没有任何正面的描述。[⑤]这也可能导致了郑和下西洋在越南完全遭到漠视。

最后，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还是寄希望于在原来属于古占城的地方今后可以发现有关的文字记载或者新的文物考古发现。占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先进的古代文明，不仅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还保留了很多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占城深受印度古文明的影响，很早就有在贝树叶上书写文字的传统。宋初建隆二年（961年）占城来贡“表章书于贝多叶，以香木函盛之”。[⑥]这里说的贝多叶，也称为“木叶书”，在印度有2,500年的历史。相传玄奘从印度取回的经卷就是写在贝叶上的，即贝

---

①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十，黎皇朝纪，太祖高皇帝。

②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十，黎皇朝纪，太祖高皇帝。

③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九，后陈纪，重光帝。

④ 《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八，陈纪，少帝。

⑤ 张明亮：《郑和在越南：应该却未被纪念的缘由》，《南洋学报》,2011年,第65卷。

⑥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列传第二百四十八，外国五。

叶经。目前海内外一些博物馆尚存有部分各时期各种文字的贝树叶文献残片，但不清楚是否有占城的贝多叶文献残留至今。

皇佑二年（1050年）占城贡使“表二通，一以本国书，一以中国书”，说明占城虽然不像安南那么强烈浸润在中国文明之中，但应该也通晓中国文字。《宋史》中说占城“别置文吏五十余员，有郎中、员外、秀才之称，分掌资储宝货等事”，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说占城早在宋代“亦知文教之崇久矣，故国人多有能词翰者”。[①]

依据明朝史料记载，在占城与明朝150多年的官方交往中，占城遣使达多达91次，其中使节有姓名可考者97人，是当时东南亚国家中向明王朝朝贡最多的国家之一。[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四年（1371年）占城国使节来觐见明太祖朱元璋的时候，是在一个长一尺阔五寸的金叶上刻写国书的，通过使节口头翻译给明朝皇帝。[③]后来占城多次给明朝皇帝类似的金叶国书。明朝伊始就遣使颁科举诏于其国，让那些明经能文，博学有才之士参加科举考试。万历年间成书的《殊域周咨录》说：“占城不惟粗通文墨，而且敦重节义。不惟其臣有诗才，而其主亦善篇章。彬彬乎声名文物，匹于朝鲜，超于日本远矣。”他认为“占城既通文字，且有秀才，则纸笔乃其所有。虽言语不通于中国，而其诗文与华夏颇亦近似”。所以，巩珍在《西洋番国志》中记载的占城灰书之说，是不确切的，“恐亦上世之事，而非今时之陋也”。[④]自古以来，占城用自己文字和汉文记载的文书已经频繁送达宋朝和明朝的中央政府，只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而已。

加之占族人谙熟航海贸易，对外交流特别广泛，从中国到阿拉伯半岛，都留下了占人航海经商的足迹，应该还会保存着某种历史记载或者传说。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发掘域外汉籍的资源，可以找到原占城地区有关郑和的记载。

郑和始下西洋，开启了世界史上沟连亚洲和非洲海上通道的首次尝试，而每次首泊站都是占城，绝非偶然。在越南现存文字史料里还没有看到有关这一事件的直接记载，这里可能暗藏很多不为人道的玄机。本文通过对越南现有史料的梳理提出一点看法，希冀更多志同道合的史学家继续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尤其期盼在原占城地区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证明郑和访问占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原载《2020年厦门第二届“大航海时代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①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七，南蛮，占城。

② 刘利华：《明朝出使占城使节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③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七。

④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七，南蛮，占城。

第二部分

英人赫德与近代中国

英人赫德与中国外交的近代化

赫德（Robert Hart）1835年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1854年大学毕业后，被英国外交部选拔来华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50余年的旅华生涯。自1863年起，他担任清朝总理衡门所属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直到逝世才予卸任，共48年。赫德利用海关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对晚清外交政策的筹议和定策，乃至外交社交的因应与周旋，几均身预其事，甚至包揽把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操纵近代中国内政外交、左右清王朝安危祸福方面，他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个来华的外国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说，在他的身上浓缩了中国近代外交畸形发展的深刻内容，因而很有必要详加探讨。

赫德在华时间甚久，活动领域极为广阔，与清政府和西方各国都有着颇为微妙的关系，从而留下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形象，从不同的立场、角度观察，往往可以勾勒出种种不同的脸谱，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历来对他的评价都抑扬不同、毁誉各殊。

西方不少历史学家从来都是以歌功颂德的曲调来评价赫德的。他们盛赞赫德在中国建树了“无与伦比的”“远东传奇式的辉煌业绩”[①]，认为他“以尽忠中国为一生之使命”[②]，“对许多事情采取纯中国人的观点，因而长期得到中国政府的信任”[③]。一些海外中国学者也认为赫德并非“一般所谓帝国主义侵略者”[④]，而是“以中国政府为服务对象，不因国籍而自生外心”[⑤]，“表现了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建设性的一面”[⑥]，甚至认为他的目的“均在为中国效力”[⑦]。这些学者在研究赫德与近代中国外交的关系时候，往往受到一种西方中心论意识的影响，把近代历史发展的最高限

① China , The Maritime Customs,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简称Origin）, Vol.4,p.203, also see J. Bredon, Sir Robert Hart, The Romance of a Great Career； S.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s Customs； P.king, In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A personal Record of Forty-seven years； W.A.P.A.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E.B.Drew： Sir Rober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in the Chinese Student Monthly, Vol.Ⅶ, Nov,1911.

② ［日］高柳松一郎：《中国关税制度论》，第127页。

③ Origin，Vol.7，p.383.

④ Luke S.K.Kwong（邝兆江）：A China Career In Detail：Robert Hart’letter to J.D.Campbell （Review Article）,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Vol.Ⅺ,1980.

⑤ 姚崧龄：《楚材晋用之赫德》，《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第2页。

⑥ 吴相湘：《英人赫德主持中国海关四十五年》，《历史与人物》，第224页。

⑦ 程文华：《赫德与近代中国外交之关系》，《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31期，1975年。

度仅仅确立在仿效西方的单一模式上，而未能考虑到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对各民族走向近代、走向世界的巨大影响，因而由此得出的某些结论不尽符合近代历史的客观事实。此外，不少论著对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的关系不仅仅限于就某些交涉过程作出轮廓性的描述，还缺乏细致的分析和中肯的评价。除了主观和历史的原因之外，这一现象与近代外交档案的大量散失有很大的关系。赫德所参与的外交活动大多是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就连当时一些朝廷贵族、封疆大吏，对于其中波诡云谲的交涉细节，所知也微乎其微。在获得第一手资料前，人们很难对分析赫德参与近代外交必不可少的各种变量有深入的了解和贴切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是重新研究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关系的大好时机。在此期间，赫德的通信集、日记及其他资料已大多出版[①]。国内所藏清代外交档案和海关档案亦开始较容易地供学者利用。同时，有关这一问题的专著和论文也逐渐增多，而且一般说来皆属佳作[②]。从史学观点来看，不少人已从一般社会历史的角度强调史家要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逐步转向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深入认识赫德与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联系。这无疑标志着赫德研究的深化。

笔者不拟在本文中承担起对赫德一生功过及其历史作用的全面评价，事实上这样做也是不太可能的。外交是赫德在华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评价这个历史人物的争论热点。本书的目的是以赫德为主要线索，联系中国封建外交结构的内部变化，深入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作用与影响，阐明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形成及发展进程中的某些特点。并且期望重新探讨与这一主题有关的一些问题。

赫德在华的半个世纪，是西方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也处于中国由封闭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中国近代外交，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种新的、经常性的、“华夷混一”的对外关系模式。它以中外不平等条约为法律基础，以西方国际法为主要规范，以遣使馆、建立永久外交关系为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论及的近代外交，是对过去封建朝贡外交的否定，从而代表了一种过渡和转变的趋势。但其本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外交，当然也有区别于近代主权国家的独立外交。

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的关系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他一反过去一些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恶劣形象，以清政府客卿的身份，利用海关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特殊关系，取得了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作为中国急需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面貌和需要进行改革和开放的始终不渝的鼓吹者，赫德以海关为根基，从开拓对外关系打开缺口，影响和诱导了清政府对传统封建外交进行改革，促

① J.K.Fairbank et al ed.The I.G.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2 vols；K.F.Bruner et al ed. 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1854–1863.

②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问题初探》，展望出版社，1987年；叶凤美：《赫德在中国》，《近代中国对外关系》（《近代史研究》增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卢汉超：《赫德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

成了西方近代外交的某些思想和制度在中国的移植，也增进了清政府官员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应该说，这在当时确实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赫德对中国近代外交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所谓直接影响，就是他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特权在海关推行近代化事业，更新了近代中西关系，促进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主动精神。所谓间接影响，就是在列强入侵的逼迫下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清政府自己进行的外交变革。在这一方面，赫德是一个局内的旁观者。他对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影响和推动，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中国的内在条件，特别是进步与保守势力斗争的结果。近代中国外交制度，无论从建立动机或客观动机，都是既有适应外国资本主义需要的一面，同时也有抵制外国侵略的一面。两个方面都客观存在，是任何半殖民地国家外交都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赫德所起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无论如何不应估计过高。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封建势力本身对外交近代化以及吸收、传播外来先进文化所带来的阻碍作用。

赫德帮助中国，不一定完全出于善良的愿望。即使他本人确实没有任何恶劣的动机，也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所介绍和引进的西方近代外交模式几乎都已经令人沮丧地扭曲和变形。犹如一盒被污水泡湿的火柴，虽然孕育着火，却始终点不起火，也冒不了烟。其原因很简单，当时根本没有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集团或杰出人物能在短时期内使中国由弱变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提出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或主张。这是被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及其他主客观条件限制了的。从赫德本身来说，他的确并不希望中外交往的扩展导致清王朝这块久经剥蚀的帝国大石滚进下面的深渊，而是企图使之恢复平衡，稳定在悬崖的边缘上。在此基础上引导或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使其有利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最大利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不管怎么说，在他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外交制度所包含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这就应当说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从总税务司到外交顾问

赫德于1854年7月来到中国，不久即被派到宁波（后来调至广州）英国领事馆工作。他刻苦学习汉语，深入了解中国朝野政情，广泛结交清朝地方大吏，深得英国官方人士的赏识①。不久（1858年以后），由上海外国税务监督演变而来的外籍税务司制度逐渐形成，原江海关英国税务监督李泰国被任命为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②。这不仅标志着中国近代半殖民地海关制度的开始，

① K.F.Bruner et al.ed.,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 pp.10,16,17,65,68,76,92,110,138,179； Bredon, Sir Robert Hart,p,44； Origin, Vol.7, p.377.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2，第2705–2706页。

也是中国政治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的预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许多变化都与海关有着密切的关系。1859年，目光敏锐的赫德毅然辞去英国领事馆的职务，进入中国海关。两年之后即登上了署理总税务司的高位[①]。或许人们永远也搞不清楚使赫德确立这一转变的最初的契机，然而事实证明了进入海关确实为进一步实现他的长期政治目标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一、赫德对中国海关的改造

赫德担任署理总税务司后所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如何对原有的清朝封建海关进行全面的改造。海关虽然已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性质，但作为清朝封建专制制度躯体上的一个器官，它仍然具有其躯体本身所有的一切弱点——混乱、贪污和低效率。

首先，清政府设立在各口的海关，一般都在各省督抚控制之下，由海关监督和海关道负责管理。各海关税则章程、人事安排、财务监察以及关税纠纷的处理等等，均各自为政，无法形成统一有效的海关行政系统，与其他查私机构也缺乏配合，关政十分混乱。

其次，海关税收历来被视为利薮，侵蚀偷漏，百弊丛生。清朝征税制度规定由中央政府确立上缴一定数额的税额，其余部分则可由海关自行处理，多数都被大小税吏侵吞自肥。赫德曾于1861年写信向总理衙门揭发粤海关监督侵蚀海关税银的行径[②]。实际上这种“中饱私囊而漏公项之弊”在沿海各口和内地各关都有存在，清政府对此始终拿不出一套切实有效的防治办法。

再次，旧海关结构松散，经理不善，“用人杂滥”[③]，也使其工作效率极低，各海关偷税漏税及其他走私活动甚为猖獗。据赫德估计，仅广东走私食盐、鸦片和其他物品，每年至少偷漏海关税银85万两以上[④]，而粤海关每年总税银亦不过120万两[⑤]。

显而易见，这种落后的行政制度、关税制度及海关的作业方式，不仅阻碍了国内经济的交流，也不利于正常的中外贸易的发展。随着近代中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改革旧海关已是势在必行。于是，赫德决心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面貌和需求，对中国海关进行逐步改造，努力把每况愈下的局面扭转过来。

在行政方面，他参考西方近代海关的行政组织形式，把各口海关行政完全从地方当局手中剥夺出来，集中到总理衙门和对它负责的总税务司的手中。举凡各关行政组织、人事管理、财务制度、征税章程，都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改变了以前各自为政的情况，统一了全国海关的征税工作，提高了海关的效率。

---

① J.Bredon, op. cit. pp.51–52；［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姚增廙译本），第147页。

② 外务部档，第4819号，第8函。

③ 《李鸿章全集》，卷1，第871页。

④ 总理衙门清档，第78册。

⑤ 海防档（购买船炮一），第10–15页。

在人事管理方面，他采取仅让各海关监督“主名”的办法，将所有“办理征税、查拏私漏”的工作都交给外籍税务司担任[①]“从未有华人充当者”[②]。这样就取得了西方各国资产阶级的承认，即所谓的“多国合作的基础及国际上的认许”[③]。海关监督“呼应不灵”[④]，“实同虚设”[⑤]。而仅对总税务司负责的各海关税务司则“每多自行独断，决不相闻”[⑥]，有利赫德进行高度集权管理。

在征税和财务方面，新海关规定外商卸货。验估货税后，由海关发给验单，外商持单到清政府指定的银号纳税，由银号发给与验单税额相符的收据。海关根据收据统计关税，用中英文编制账目和季度报表，分别呈送海关监督、总税务司署、总理衙门和户部查验。海关职员支取固定薪金，按级增薪，成绩卓著者每年酌给酬劳金等。征税费用也由清政府另外拨给，不能侵蚀关税，使旧海关以税款中饱的弊端有所革除，海关行政管理机构更加严密和完善。

近代中国海关其他一些新制，如对外贸易资料的统计与刊行、海关出版单位的设立、稽核制度等，都是在赫德手上完成的。这套由赫德规划定型的近代海关制度影响较大，后来只有枝节局部的改变，甚至进入民国以后依然如此[⑦]。

海关第一位总税务司李泰国任内，只是在上海、广州、汕头等地开办了新关。赫德署理总税务司后，第一年即开办了镇江、宁波、天津、福州、汉口、九江等海关，第二年开办了厦门海关，第三年开办了烟台海关和台湾淡水、基隆、打狗（高雄）等海关，在中国沿海地区及长江流域，初步形成了一个体系。到1904年，共设新关34处，另外管理常关19处，厘金7处，海关职员由千人增至万人，近代海关的势力扩展到全中国几乎所有的通商口岸[⑧]。因此，赫德虽然不是中国近代海关的最早创始者，但他却是最重要的实际创建者。

在赫德的经营规划下，近代海关严格管理制度，广泛挖掘税源，配合了西方各国扩大对华贸易，增设商埠，加强商品的倾销和原材料农产品掠夺的行动。海关税收也以较大幅度增长，效果甚为显著。如厦门海关1862年采用赫德所拟章程，不久税银就比过去增加近两倍。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出赫德主持海关后税收的增长情况[⑨]：

---

① 外务部档，第4820 号，第18函。

② 外务部档，第0749号。

③ Robert H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 p.155.

④ 外务部档，第3941号。

⑤ 黄序鹓：《海关通志》，册11页。

⑥ 外务部档，第4359号。

⑦ 赵淑敏：《中国海关史》，第20页。

⑧ 外务部档，第3979号。

⑨ 外务部档，第4819号，第13函。

年 代	海关税收数目	资料来源
1862 年以前	4,900,000 两	《清史稿、食货志》
1862	6,630,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 26 号
1871	11,400,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 26 号
1874	11,490,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 26 号
1875	11,960,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 26 号
1876	13,150,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 26 号
1880	13,000,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 26 号
1888	15,000,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 26 号

鸦片战争前后，海关税收在清朝全国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一直为数甚微。赫德改造海关之后，关税逐渐成为最为稳定和可靠的一项财政来源。从1891年赋税分析来看，海关税收一跃成为第二位主要收入。地丁虽然仍为首位收入。但重要性已经远不如以前。原居第二位的盐课退居第五。常关税更自第三退至第十。1899年，洋税甚至取代了地丁的首席地位①。

海关收入对清政府来说，多少有些意外。他们没能料到关税增长如此之快。

当时清廷的一大心病是如何偿付第二次鸦片战争给英、法的赔款。由于赫德经营海关“历年所收税项有加无已”②，除四成解交户部外，其余均用于扣还赔款等项③。至1865年，1,600万两赔款全部用关税偿清，赫德管理海关的成绩得到清政府的称道和奖赏④。

此外，从19世纪50年代起，清政府还开始举借外债，乞求西方各国的“财政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1853—1872年间，清政府至少借了17笔外债，计银450多万两，几乎全部用于镇压各族人民起义的军费⑤。到光绪年间，外债甚至成为清朝各级政府赖以存活的另一主要财源。这些外债的绝大部分都是以海关税收作为偿还的担保。赫德曾多明确指出⑥：总税务司署对于有权取得损失赔偿的外商，对于索取赔款的各国政府，以及对于必须支付赔款的中国政府，都不是一个毫无价值的机关。该署对于征收关税的监督已经保证了满足这一类要求，要比其他方式迅速得多，而且毫无损害。

据统计，从赫德建立近代海关统计制度（1864年），到清朝被推翻的前一年（1910年），中国海关出口税的水准始终高于进口税⑦。这种优待进口商品而歧视出口商品的惊人现象，使海关失去了保护和发展本国经济的自卫能力，实际上便利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贸易扩张，促使中国商品经济

① 何烈：《清咸同时期的财政》，第281–283页。
② 外务部档，第1570号。
③ 《清续文献通考》，卷68，国用6，第7928页。
④ 税务处档，第2号：《总署奏底汇订》，第1册。
⑤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4–7，19页。
⑥ Origin, Vol.6, p.155.
⑦ 鲁传鼎、赵淑敏：《1840–1910年间中国海关税则的演变》，《国立政治大学学报》，1977年总第35期。

因被卷入世界市场而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从政治学角度来看，西方经济的侵蚀，使中国专制权力不能再任意停止对外贸易，不能由官商或所谓公行包办垄断，也不能对外货流通任意加以勒索或留难。虽然这是出于西方列强的强迫，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已不啻为长期被囚禁的中国工商业网开一面。事实上，不仅中国传统的封建官僚统治从这些方面受到了破坏和限制，而其现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也是由以后逐渐深入、逐渐展开的对外商业活动而促其分解的[①]。

二、海关作用的扩大

虽然总税务司的职权仅仅是“掌各海关征收税课之事”，或“综理各国关税行政与关员任免事务”[②]，但赫德一直不满足把自己局限在收税这一具体琐碎的事务当中。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他凭借海关这个组织完善、人员精干、管理周密、经费充裕的机构，举办和兼理了许多与海关业务不相干的洋务事宜，力图将海关建设成改革清政府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核心组织[③]。

第一，筹办港务、海务。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第10款将港务、海务划入海关职权范围之内[④]。为此，赫德在海关内设立了专门的海务部门，开始引进西方先进海务技术设备，办理各口理船厅应备之件。1868年，又请得将船钞的70%用来办理江面、海面灯楼塔表浮标的设置和维修，设立了一些提供台风气象信息的天象测候所。在测量、疏浚水道、绘制水道图、制定航行章程、刊发航行公告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赫德还亲自到沿海各处，勘定某处应设灯塔等事。到1911年，海关海务部门已增至近900人（其中114人为外籍职员），建有132座灯塔、45艘灯船、138处浮标、119处指向标以及一支较为齐备的搜索和修理船队[⑤]。

第二，兼办邮政。早在1861年，赫德就向恭亲王建议设立全国邮政机构[⑥]。在他的争取下，1866年总理衙门将传递邮政事权交给海关负责，在总税务司署设立邮务办事处，于天津、上海等处海关内附设具体邮政机构。从开始只办理各国驻华使馆及海关往来邮件，扩大到收寄各条约口岸的公文和私人邮件，并制定了邮务章程，发行了正式邮票[⑦]。到赫德逝世时，邮政机构已拥有职员12,000余人（其中外国人约100人），所属大小机构7,000余个，分布在全国各省设有海关的通商口岸。邮政路线长达19万多千米，每年收发两亿封信函和150万件包裹[⑧]。

第三，举办赛会。赛会（赛奇会）即国际博览会。1872—1905年，由于赫德的建议和提倡，海

①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154页。
② 《光绪朝会典》，卷100；《清续文献通考》，卷118，职官4。
③ Origin, Vol.6, p.544.
④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卷1，第118页。
⑤ 外务部档，第1570号。
⑥ Origin, Vol.5, pp.292–295。
⑦ Ibid, Vol.7, p.380.
⑧ 《中国近代邮电史》，第24页。

关一直负责组织筹备，共代表中国参加大型赛会7次，小型赛会20余次。1878年，赫德亲自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前往巴黎参加赛会①。这不仅提高了海关的名誉，也直接促进了海关对进出口贸易的统计出版工作②。

第四，插手创建海军。19世纪60年代初，赫德曾四处奔波，往返于上海、广州、汕头、厦门之间，积极为清政府筹建水师搜集钱款。他不仅希望借此加强海关缉私船队的力量，而且建议按照海关监督与外籍税务司的关系模式，“一切打战、驶船之事”通通交给外国军官办理，中国水师官吏则必挑选“和平之人”，“不过是他主名”③。这一尝试虽未成功，但赫德在以后创建北洋水师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874年，他开列了创建海军需购外国船炮清单，同李鸿章进行详细讨论，议定先在英国试购船炮，由赫德出面订立合同，派员查验④。1879年，通过在英的海关驻伦敦办事处，订购“蚊子船”（浅水炮艇）、快篷船等战舰，用海关关税支付，并提出由他亲自控制。此后他又帮助清政府购到四艘战舰，成为“北洋水师之根本”⑤。初步改变了清朝军队手持弓箭、帜蓬舟楫的落后状态。李鸿章曾经说过：“蚊子船防守海岸最为得力，赫德所购尤各国罕有之新式，中国各局目前实不能仿造。”⑥

赫德所做这一切的目的很明确，他认为海关建设实为对外关系之基石，“为了使海关站得住脚，应该不放松任何机会扩展其根基，以保证海关的稳定”⑦。他对清政府的所有改革都有极大的兴趣，总是希望“承担一切事情”⑧，并建议总理衙门将所有洋务事宜“都揽到自己手中，通过我作为总税务司（general I.G.）来处理之”⑨。因而他包。他明确表示：“总税务司署虽然不是一个政治性的机构”，但“假如任何人能够所统辖下的海关的职权范围，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文化，无所不有他自己做出任何事情来，不管是扩大商业利益的范围，或是创办工业，甚至是促成政治情况的改良（虽然这后者含有对于最好不要去碰的事情进行一种多事干预的可能性），没有人比我更加迅速地予以承认，充分地给予赏识，并且热烈地给予支持⑩”。

赫德来华后，正遇到中国发生震撼中外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赫德从维护英国在华利益出发，毫不犹豫地站在清朝统治阶级一边，热情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加强与清朝统

---

① 外务部档，第3979号；Vol.7 ,p.382.

② 外务部档，第1570号；Vol.7, p.379.

③ 外务部档，第4819号,第18函。

④ 外务部档，第4500号；I.G.in Peking, letter 115, 2 Oct.1874, p.182.

⑤ 外务部档，第1570号，第4500号。

⑥ 《总署奏底汇订》，第37册。

⑦ I.G.in Peking,letter 1023,14 June,1896, p.1068.

⑧ Ibid,letter 185,2 Nov.1877,p.253.

⑨ Ibid,letter 988,15 Sep.1895,p.1033.

⑩ Origin,Vol.1,p.153.

治阶级勾结方面走出最为关键的一步[①]。

赫德不仅经常向清政府献计献策，还以海关关税源源接济清军饷需。他亲自筹措巨款，帮助清军购买洋枪洋炮，在扭转战局形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得到了清王朝的高度赞赏[②]。1863年11月，清政府任命赫德正式担任海关总税务司，驻扎上海[③]。

赫德得到如此信任，自然“尤所感悚交萦”，表示要“勉策驽验，竭力办公”[④]。1863年年底，常胜军首领、英人戈登与李鸿章因杀戮苏州太平军降将郜永宽之事发生争执，几乎倒戈相向，戈登率兵退却昆山，“讫不临阵”。在这危及共同镇压太平军“大业”的关键时刻，赫德亲自出马，从中调和，“会晤剖说”，往返于昆山、苏州之间。他一方面劝说戈登“该贼目等（指郜永宽等人）罪大恶极，杀害无数生灵，势感求降，即降之后，仍将明正典刑，原为国法应尔”[⑤]；另一方面则不惜用金钱贿赂李鸿章，使二人“解释前嫌”[⑥]。在赫德的“启发”和调停下，戈登很快重新出兵，“于数月之内，克复如许地方”[⑦]，“不但始终奋勇出力，且能深明中外和好大体”，为挽救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⑧]。赫德亦因“阴与维持，深明大体，实属著有劳绩”，获得了御批赏加“按察使衔”的殊荣[⑨]。其他参加镇压有“功”的洋将兵弁的宝星功牌也“悉由赫德转交”[⑩]。赫德在清王朝的地位和影响力正日益提高。

三、海关与外交的关系

在中国海关，赫德是唯一有权使各级关员得以录用、革职、升级、降级的最高长官，“几有一国元首之权威”[⑪]。在他看来，总税务司署简直就是他的私人府邸，甚至把整个海关都看成是他的私有财产。

自从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以来，他那种当之无愧的心理使他具有异乎寻常的自信。赫德意念中的总税务司之职乃是非我莫属，而且此职无所不包、无所不能[⑫]。他力图以这种特殊身份影响清政府的政治决策过程，尤其是外交政策的决策，并直接参与中外交涉，以便使自己成为近代中外交涉的

---

① Ibid, Vol.7,p.76.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第2915页。
③ K. F. Bruner, op.cit, p.258.
④ 外务部档，第4819号，第17、18函。
⑤ 外务部档，第4830号。
⑥ North-China Herald,26 Aug,1885.
⑦ 外务部档，第1570号。
⑧ 谕旨汇奏，第436号，同治三年五月十一日。
⑨ 《筹办夷务始末》，卷30，第13页。
⑩ 总理衙门清档，第86册；《通商约章类纂》，卷32，“选募洋将”，见外务部档，第4350号。
⑪ Origin, Vol.1, p.46；黄序鹤：上揭书，卷下，第193页。
⑫ I.G.in Peking, Letter 1132,26 Feb.1899,p.1189； P.King,In the Customs Service（1924）,pp.237–243。

中心人物。

赫德控制下的海关，依赖其组织和规模所享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掌握了清政府的经济命脉，对中国外交起到了重要的牵制作用。海关既像一个“无形的帝国”，又似一个“隐形的政府”，能够左右驰骋，不断通过插手操纵中国内政外交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

在外交决策方面，赫德出入总理衙门最勤，得风声之先，遂屡屡参预其事。或直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影响外交事务的决策过程；或者采用间接方法来改变清廷的立场；或密切窥探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动向，以便随机应变，提出对策。有人说，海关已经成为晚清“外交政策的主要凭借”[①]，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海关影响外交事务执行过程的方式有：（1）直接参与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并接受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咨询。清政府在决策许多外交事务时，往往要得到海关方面的意见和信息决策者必须掌握充分、及时而可靠的情报，才能准确做出判断。而在中国驻外机构建立、完善之前，提供这些情报恰恰是赫德及其海关的任务。如果他们从自身需要或自身判断出发，只给清廷决策者提供经他们筛选过的有限情报，那就意味着他们在实际上已先决地左右了清政府外交事务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在处理“马嘉理事件”、中法越南交涉、中葡澳门谈判中莫不如此。除此之外，海关还通过各种途径向总理衙门中的具体部门施加压力。（2）影响清廷官员的任命。赫德不仅可以影响乃至边疆大吏的任命，还挖空心思，直接向清朝驻外机构派出海关行政人员。在一些重大外交谈判和清廷要员的出访时，每每亦有海关职员陪同，他们或躬身参加磋商条件之谈判，或暗中操纵而了然于经过之情形。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清政府的对外交涉。

如果说总理衙门是代表清廷外交政策的决策者，那么作为总理衙门的直接延伸——海关及其领导人赫德则是首要的政策影响者。这位政策影响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他在名流荟萃的外交界周旋自如、纵横捭阖，并自恃享有极高的权势和威望，足以影响近代中外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外人士视为泰山北斗，各国公使亦且相率拜其下风。”[②]

当然，介入晚清外交活动的其他社会力量也是不能忽视的，如人民大众和舆论对近代外交格局的影响，人民大众对晚清外交过程的压力是最为强大的，但也是最分散、最没有组织的。在封建专制的社会环境中，人民大众难以直接对外交事务的决策过程施加压力。只有在人民群众普遍被发动起来的时候，才有可能有力地作用于外交事务。如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使法国自北黎冲突后所提出的，并且坚持了很久的扩大侵华要求没有能够全部实现。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事实上并没有根本扭转中法战争的结局，更没有摆脱中国受人欺凌的处境。此外，人民大众的作用还受到其本身知识水平、政治觉悟、民族感情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有时甚至会

①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第423–434页。

② 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册3，第282页。

受到统治集团中一些势力的欺骗和操纵，从而产生相反的作用。

晚清的社会舆论与传播媒介亦较重要，尤其是清廷中的“清流”或“清议”，不仅可以控制社会舆论和制造社会舆论，还能监督外交事务的某些过程。在中法战争、中葡澳门谈判以及中日战争中，“清议”均起过比较显要的作用。赫德对此曾感到十分头痛。然而，“清议”派多数不谙外交内幕，而且鲜有切实可行的有效办法，并不承担直接责任，因而他们的观点多带有盲目性、传染性和摇摆性，往往趋赴众议，投其所好，沽名钓誉。所以，他们都无法与操纵清政府财政命脉的海关及其领导人赫德相比。真正能够呼风唤雨的乃是具有深刻政治背景的赫德。他的意图和目标往往出没在清政府外交决策和执行的各个具体过程中。

才能也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力，在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近代外交棋局中，赫德始终掌握主动，几十年来一直是清廷官场上的不倒翁，除了有西方列强作其后盾外，也应该承认他具有非常突出的才干、圆滑的手腕和敏锐的政治眼光。他的决策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总能在短时期内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这种实践性因素在赫德旅华的漫长生涯里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为什么清政府一开始就将一项又一项重要使命委于斯人，并且对其完成使命常常极有信心的原因之一。

早在进入海关之前，赫德就已显露出“在建立与一切中国官员交往的新制度方面”的“一个现成桥梁”①的作用。在当时，这种在清政府和西方列强之间左右逢源的沟通能力是“高于一切”的。他主张要与中国官僚建立一种“更为亲切”的关系，“这对于中国官吏更好地了解外国人，消除对外国人的许多怀疑和反感，是极有裨益的”②。他不赞成用对待“远离首都的道台们的盛气凌人的态度”来对待北京的上层贵族和要员③。他强调要“用理智为先导”，“耐心守候机会”，做出建议而不自命不凡竭力使之信服而不去强迫命令，并且要能够在不因暴露缺点而引起刺激的条件下提出补救办法④。他还主张以“待己之心待人”，并视此为“金科玉律”⑤，这也赢得了不少中国官吏的好感。

赫德能说流利的汉语，“熟于孟子书，旁及墨子”⑥，性格含蓄内向，老练沉着，一切谦谨自守遇事备具申呈，其表面上的儒雅风度使他比较容易接近中国的封建士大夫。他不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较深刻的了解，对清政府的当务之急和应作的改革，也有一定的独立见解。在这方面，当时在华的外国人没有谁能望其项背。马士曾经说过⑦：

---

① Origin, Vol.7, p.377.

② Ibid, Vol.6, p.192.

③ J.J.Gerson, op.cit, pp.239–240.

④ Origin, Vol.1, p.37.

⑤ Robert Hart, op.cit, p.141.

⑥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年元月十日；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⑦ ［美］马士：上揭书，卷3，第425–426页。

自早期耶稣会教士起，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他那样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他洞悉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并且因深通中国语文，所以能把事情教成那样一种形式，致使西方读者看来似乎瑕疵百出、幼稚可笑，可是却颇投那些精细有余而胸襟开阔不足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好。

因而恭亲王等深深觉得赫德“精明、机智和富有经验”[①]，在许多问题上都愿意同他商议，企求在他的帮助下减少对外交往所带来的损失。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赫德早期与总理衙门的通信中，许多信函都论及外交和军事，关税问题反而只占很小的比例[②]。

赫德及其海关对中国外交产生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受复杂国际背景的制约，因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清政府接受这种影响时也带有某种被动性。西方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主要采用外交手段逐步“扶持”、挟制清政府，采取所谓温和的“合作政策”。他们不仅全力支持赫德为改造半殖民地海关所做的努力，同时希望利用海关支配中国政治，克服清政府官员的“无知和刚愎”[③]。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因“言语狂悖”“办事刁诈，以致虚靡巨款”[④]而失宠，这使各国公使一度产生犹豫。但后来赫德地位的逐步上升又使他们产生新的希望，认为海关只要办理妥当，就可以一方面帮助清王朝，“使其他国家以海关人员的身份作其后脚[⑤]；另一方面，海关作为“西方国家对华外交的方便的助手”，可以在一种“正常”的气氛中掩饰各种非正常的活动，起到西方公使难以起到的作用[⑥]。费正清曾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享用不平等条约权利的主要机构，近代海关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各国驻华使馆。”[⑦]不少西方外交官和传教士都乐意辞去现职，进入海关；或努力使自己的孩子成为海关职员，将之看成飞黄腾达、谋取高官厚禄的用武之地，甚至认为其意义同在英国印度部供职差不多[⑧]。

作为英国人而担任清朝的总税务司，赫德可以自由地与任何人交往而不会被认为僭越非分；只要略设计谋，他也不会过分地惹人注目。他具有英国国籍，可以不受中国法律制裁。遇有危险，则逃往英国使馆避难。至于赫德与英国使馆公使经常在教堂或使馆内或府邸中会面交换意见，更是公开的事实[⑨]。这些不能不使清朝统治者一直有一种戒备心理，“不敢专倚赫德”[⑩]，在一些交涉中也处处对其保密[⑪]。尽管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对赫德保举加衔，但更希望“嗣后军事平静，总税务

---

① ［美］马士：上揭书，卷2，第50页。

② 外务部档，第4819号 。

③ Origin, Vol.6, p.127.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第6–8页。

⑤ Origin, Vol.1, pp.82–83.

⑥ A.Michie, The Englishme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Vol.2,p.156.

⑦ J.R.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p.462.

⑧ R.R..Campbell, J.D Campbell, A Memoir by his son, p .30.

⑨ A,Michie, op.cit. Vol.1, p.166.

⑩ 张侠等主编：《清末海军史料》（上册），第161页。

⑪ 外务部档，第0644号。

司仅办税务，例有薪俸”，“庶激励之中，仍寓限制之意”[①]。

然而，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发展表明，虽然主观上清政府决不愿意本末倒置，让这个支取他们薪俸的人来对他们发号施令，但实际上他们明白，对他的话应该也必须悉心相从。因为从国际背景来看，他的意见具有一种权威的代表性，足以使清朝统治者产生服从感和敬畏感。从效果上看，他的建议也似乎无一不比清廷官员“高明”，并使清政府受“益”匪浅[②]。

最后要强调的是，清朝统治者对近代洋务外交的愚昧无知以及满汉官僚之间的权力之争成为赫德插手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因。1861年1月，清政府成立专门统办通商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满族皇族和贵族官僚执掌。这一机构规模虽小，但不仅是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决策机关，后来发展到拥有内阁的权力，经管许多一般纯属国内的事务，如通商、海关税务、各口训练新军、同文馆以及铁路、矿务、电线、制造枪械、传教等等，实际上囊括了所有“洋务”。这样，总理衙门不仅负担过重，实际上也力所不能及。当时，“洋情谲幻、朝议纷纭”，所谓“廉正者即以夷务为羞”[③]，视总理衙门为“媚外集团，耻予其选”[④]，清廷外交决策人物也普遍素质较差，才薄识短“胸无定见，无以自解”[⑤]。面对许多十分紧迫的外交难题清政府亟需一个通晓外情、“时备咨询”，并且能够信赖的顾问和“指导者”。赫德虽属“异类”，但与清政府熟悉的其他洋人相比，“性情尚属驯服，语言亦多近理，且贪恋总（税）务司薪俸甚巨是以尚肯从中助力[⑥]”，况“向为商民所悦服，此后中外交涉事件，当更易于办理也”[⑦]。他们希望赫德及其他海关洋员时时“兼奉他差”[⑧]，帮助解决一些中外交涉事务，特别是海外之外管辖权的棘手和复杂问题，希望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同时也似乎期许减轻本身对外交事务的直接牵涉。“在一切国际问题上，从谈判一件条约到解决一项土地争端”[⑨]，“洵赖各洋员相助”[⑩]。

晚清统治集团内部充满着非常复杂而且永远不能稍释的矛盾。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人官僚实权的逐步扩大，使满族贵族统治者感到十分不安。尤其是坐镇天津25年、掌管清政府大门的洋务巨头李鸿章，已成为清政府中与西方各国关系最密切的官吏，历年代表清政府全权办理交涉，签订过许多重要条约，具有很大的外交实权。李鸿章与清廷满族贵族之间既相互利用、相互依赖，也钩心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0，第13页。
② A,Michie, op.Cit.Vol .Ⅱ,P .162.
③ 外务部档，第4522号。
④ 《总署奏底汇订》序。
⑤ 外务部档，第4522号。
⑥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第2917页。
⑦ 同上书（同治朝），卷21, 第48页。
⑧ 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一年财政关税第36号。
⑨ ［美］马士：上揭书，卷3，第4166页。
⑩ 外务部档，第3979号。

斗角、相互猜疑和你争我夺。在一时还不得不依靠汉人官僚应付对外交涉的情况下，清廷非常期望借海关总税务司的权势夺回和稳掌一部分权力。赫德在后期一些中外交涉中公开排斥李鸿章，都多少得到清廷满族贵族的暗示、默许和支持①。海关作为总理衙门的直属机构，蛛网般地密布在沿海各主要城市及内地新开商埠，不仅有利于外商在全中国范围内推销洋货、搜购土产，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清王朝中埋在各地的权力，维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在对外交涉方面，清王朝借助赫德及各级洋员亦可掌握一部分主不致被汉人官僚全盘垄断。

清廷既要利用赫德等人为自己效力，就不能不给他们一定的权力。从理论上讲，这种权力是从拥有绝对权力的君权中分泌出来的，是君权的附属权力。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君权的屏卫。只要控制得当，就不会构成对清王朝的直接威胁。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想法大多是事与愿违的。但清朝统治者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不断以感激之情向赫德馈赠礼品②，并先后10余次对各级海关洋员参与清政府内政外交活动给予奖励③。

早在1863年，总理衙门就曾表示希望赫德留在北京，充当外交顾问④。1865年8月，在赫德办妥台湾开设新关事宜赴京报告后，清政府即以“总税务司驻扎上海，遇事不便，复饬移驻京中”⑤，将海关总税务司署由上海迁设于北京。赫德开始更加直接地利用海关参与中国外交。这一点“正是改变中外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⑥。

赫德与国际法在近代中国

近代国际法产生于欧洲。作为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国际法随着中国与西方交往的扩大而逐步传入中国。早在鸦片战争之前，林则徐就在广州主持翻译过瑞士滑达尔的《各国律例》片段。但国际法的系统引入却是在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之后，由赫德等人率先开始的。国际法所包含的近代国际关系的原则、规则和惯例，使长期禁锢在闭关自守樊篱之中，对世界形势茫然不知的清朝政府官员及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了解和熟悉了近代国际社会，客观上起到了近代外交思想的启蒙作用。然而从本质上说，赫德等人的主观目的，却在于引导清政府实施半殖民地的外交政策，用所谓“公理”和“公法”掩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尽管赫德曾提出过一些限制西方列强侵略的建议，也曾依据国际法原则处理了一些中外交涉事件，但其客观效果是有限的，而且从根本

① I.G.in Peking, Letter 517, 27 March, 1885； R.Hart, op. Cit, p.24.
② 洋务档，同文馆类，第0025、0096、0141号。
③ 税务处档，第2号。
④ K. F. Bruner et.al, ed.op. Cit, p. 303.
⑤ 外务部档，1570号。
⑥ 钱实甫：《清代外交机关》，第94页。

上不能改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特权。

一、西方国际法的引入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中西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经历的历史道路不同，民族心理、宗教信仰和交往方式的不同，使中外交涉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尖锐。西方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力图用西方国际法进一步打破清朝统治者的闭关自守传统，影响并改变清政府就其在对外关系中的宗旨和原则所做的政策规定，使中国进一步向西方洞开门户。因此，引进西方的近代国际法，使清政府的对外关系进入近代世界外交体制，就成了赫德极为关切的问题。

清政府在历次中外交涉中，看到西方外交官屡屡“援据中国典制律例相难”也十分希望“借彼国事例以破其说”。但由于不谙外文，“苦不能识”[①]。1863年，当总理衙门得知有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惠顿的《万国律例》（一译《万国公法》）一书时，便请求赫德将此翻译成中文，或者至少先翻译对总理衙门有用的部分[②]。

赫德接受了总理衙门的请求。他知道，惠顿的这部书是国际法名著，原名《国际法原理》，1836年首版二卷本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外交界和国际法学界享有盛名。这部著作所汇集的英、美国际法资料不仅包括了列强在掠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过程中出现及形成的一些问题和案例，而且用资产阶级掠夺者的观点论述和解释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准则。因而很受英、美官方的重视，也可以说是教育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统治阶级遵守殖民主义时代世界秩序的一部政治教科书。将这部著作介绍给中国，是最合适的[③]。

1863年7至8月，时值溽暑盛夏。赫德闭门不出潜心翻译这部国际法名著[④]，他在翻译了惠顿《国际法原理》第三章有关驻外使馆权利和义务的部分内容后，还亲自摹写了导言，以此进一步“启发总理衙门”[⑤]。他在日记中记载，清政府对他的译文，特别是导言，十分重视，也非常满意[⑥]。文祥肯定地说：“在我们向外派遣使团时，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指导。”

在赫德全力翻译的同时甚至更早一些时候，他的好友、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也在翻译此书。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等人对此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赫德获悉这一情况后，亦写信鼓励丁韪良，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页。

② K.F,Bruner et al, ed. 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 p.295.

③ I.C.Y. Hsu, 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 p.127.

④ K.F,Bruner et al,ed.op.cit.pp.295–303.I.C.Y. Hsu认为赫德所译原本为1855年版第三章第一节，见其书126页，但他又提出赫德于1862年选译此书，显然不确，见其书153页。

⑤ Ibid.p.298.

⑥ Ibid.p.299.

要他相信总理衙门定会乐于接受这部译书[①]。不久，清政府与丁韪良达成了翻译校订和资助刊印的协议。1864年，在中国学者的协助下，翻译工作终于完成，取名《万国公法》，成为第一部以专书出版的比较完整的西方国际法著作的中译本。它由中国政府出资刊印，备其翻阅研习，以便“参酌援引”[②]；并由赫德通过海关将此书分发给各通商口岸，以供中外交涉咨询参考，在近代中国政界、外交界和知识界广为流传，影响较大[③]。1865年，这部书还在东京复刻出版，成为日本维新初期决定开国方针的重要参考书籍[④]。

随着《万国公法》的翻译出版，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逐渐扩大。清政府一方面“广购各国律例诸书”，饬京师同文馆师生依次翻译；另一方面又咨行出使各国大臣“搜采其风之法律诸书，饬随带之中外翻译官陆续译出”，并寄回以便“参互考订”[⑤]。据统计，1862—1895年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方法律学著作中，国际法著作占44%[⑥]。

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中，深感中国原有的法律已不能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根据。尽管在口头上仍然叫嚷“中国自有体制，未便参阅外国之书”[⑦]，但“我既不能屏绝外交，自亦不能不讲公法”[⑧]。实际上已产生有限度地接受西方国际法的要求，并认为：“其于启衅之间，彼此控制箝束，尤各有法”[⑨]，可以“执此以平洋人之心”[⑩]，并能够“洞知其强弱治乱，向背喜恶，有所盟约论议，则以知其张弛操纵，而恫喝之术穷；知其异同得失，而举措之机当”[⑪]，甚至认为“是书则亦大有裨益于中华”[⑫]。从客观上讲，这意味着长期囿于“天朝”成见的清朝统治阶级已开始多少了解一些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相互关系，增加了一些西方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知识，开阔了自己的视野。

虽然国际法并未触及当时中外关系的本质，也不可能揭示复杂国际现象的内在联系，但引进国际法知识，就有可能使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中或多或少地运用国际法规范所应遵守的一些基本原则，来同西方侵略者进行某种周旋。对肆无忌惮地违反国际法的一些殖民主义分子多少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在处理对外交涉中也确实收到了某些效果。《万国公法》等书作为中国近代外交官的必读

① Ibid.p.234.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页。

③ K.F,Bruner et al,ed.op.cit.pp.383.

④ 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辞典》，第23页。

⑤ 佚名：《总署奏底汇钞》，第32册。

⑥ （清）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徐维则：《东西学书录》。

⑦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页。

⑧ 军机录副，第1563号（胶片号46），陈其璋奏折。

⑨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页。

⑩ （清）志刚：《初使泰西记》。

⑪ 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一册，第571页。

⑫ （清）张斯桂：《万国公法》序。

之书，也使他们放弃了以往脱离实际的一些幻想，在对外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这在反对封建闭关锁国的保守主义以及改变以保守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外交的过程中，还是有着一定的启蒙作用和积极的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和其他上层建筑一样，具有强大的保守性和排外性，有着一整套严格的重规叠矩捍卫它的实施。这和其以往对外活动的有限和狭窄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外局势巨大变化的冲击，封建的对外关系模式很难有所变动。赫德等人对国际法知识的引进，不仅加速了这个变化的过程，而且使之转变成为另外一种畸形的模式。

西方国际法虽然形式上披上一层公正合理的外衣，也不乏“自主之国，无论其国势大小，皆平行也”[①]之类动听的言辞，但它实质上“毕竟是一套为差不多同样力量的国家所接受的惯例”[②]。其基本精神体现着“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的原则，其目的在于从法律上维护资产阶级剥削、掠夺其他国家的权利，从理论上阐述西方列强进行政治、经济侵略的合法性，处处重视突出西方大国的地位和威风，束缚落后国家的权利和能力。将西方国际法引入中国，既可以标榜西方的文明，也能使清政府驯服接受强加于中国的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而且还可以避免武力征服中国所引起的麻烦。正像英国公使卜鲁斯所说的[③]：这项工作向中国表明，西方国家自有指导他们的“道理”，武力并非是他们唯一的原则。

从外交学的角度来看，通过国际法的调整，一方面使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各种活动结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松动和变化都会引起其他环节的连锁反应，也就是说将晚清对外关系的各个领域都融合进一个相互连结的不平等条约的网络之中；另一方面，西方各国可以进一步在法律上和实权上无所不包地控制和操纵中国日益扩大的对外关系，并运用国际法的力量规定其对外交往的基本方向。

首先，在赫德看来，鸦片战争是由于中国“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又无条约可凭而引起的，所以“必须定章，方可有凭”[④]。这种说法显然颠倒了是非曲直。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承认和尊重国家主权。而西方列强在与中国的交往关系中，却时刻都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甚至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征服和掠夺。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中国主权的否定和对国际法原则的践踏，使中国失去了在平等基础上与各国进行正常交往的前提条件。鸦片战争以来中外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在国际法上都是不平等的。清政府从维护它的封建统治的本能出发，在履行这些不平等条约时自然显得颇为勉强。而它本身由于腐败而造成的机构臃肿，办事拖沓，指挥乏力以及地方政府在处理涉外事

① ［美］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卷一。

② E .H.Parker, China, Past and Present, pp.340–391.

③ W .A .P .Martin, op.cit. p.234.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15页 。

件中与中央政府的不协调等等，客观上也使西方国家不能像他们原先企望的那样随心所欲。对此赫德是极为不满的。他虽然十分清楚这些不平等条约并非中国本意，系由外国而订，但还是坚持片面的缔约观念，认为威胁一个国家所订的条约仍然有效，并且利用国际法对这些条约赋予了相当的合法性。如《万国公法》明确强调“有被逼立约者，犹必遵守”，“不能因利害迥异而废也”，等等。他还威胁、警告清政府说：“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他声言，假如清政府“因不能照约”办事，则“必有起而代行者”，造成“动兵之举，国乱之灾”，使清政府深切感觉到不信守不平等条约的危险后果。

其次，赫德虽然深深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和落后以及如何除旧布新，但他最为关心的是怎样在不触动清朝根本弊端，从而尽可能减少中国对西方开放阻力的情况下，促使中国最大限度的对西方开放，并建立与西方更为密切的依赖关系。他说：“此等事并非外人所能勒令勉强而行者。”①他违心地称赞清王朝的“律例本极允当”，“制度本极精详”，廷议“外国所有之方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主张在保存旧秩序的基础上实行改革，使“旧制度中美好的事物与必须接受的新事物相互融合”②。赫德的这些用意或许是为中国这个素以文化发达而自负的礼仪之邦也要从“蛮夷之地”接受先进文明寻找根据，以求得清朝统治者的心理平衡。但这从另一方面暴露了赫德引进西方国际法的真实意图，即主要是要引导清政按照西方列强制订的这种在事实上极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原则去处理与西方的“友好关系”。他提出，若能确立“友好关系”，“进步”就会随之而来。相反，“强求进步的尝试可能不但会失败，更坏的是连友好关系也牺牲了”③。这种思想符合西方列强在华的长远利益，也与清政府的观点不谋而合。清朝统治者支持国际法的传入，是因为幻想国际法对保护自身及发展对外关系有用，需要这样做。但他们决不允许西方法律成为至高无上的东西，以至于影响其统治地位。因此，赫德在这方面的努力只是使清帝国从闭关自守、离群索居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以半殖民地国家的现实地位加入近代国际社会，而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结构。

第三，赫德竭力争取将引导清政府“忠实地贯彻执行已经缋绒的条约”④作为中国近代外交的根本方针和对外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石。他在1878年5月为总理衙门起草的《咨出使各国大臣》中系统阐述了对当时中外交涉主要问题的态度。这篇咨文提出：“中国于邦交之事，所欲者恪遵条约章程办事耳。”赫德进一步将其解释为两层含义，即“一则按条约之意尽量而为之，一则举友邦之人一律而优待之”⑤。这不仅道出了各国列强的心声，同时也为患有半殖民地软骨病的清朝统治者所

① Origin,V.6, p.429.

② Robert H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p.100.

③ Robert Hart, op. cit. p.140.

④ J .J .Gerson, H.N.Lay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pp.239–240.

⑤ Origin, Vol.I,p.636.

接受近代洋务外交将这一思想作为长期恪守的最高原则，希望谨守成约，苟安既成的事实，借此将对外交往的风险，固定在一个已知的方位上，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近代一系列中外交涉的惨痛结局。

二、如何对待治外管辖权

近代中外交涉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治外管辖权”问题，即外国领事可以依据本国法律对从居住在中国的本国侨民和法人行使完全的民事和刑事管辖。这种片面特惠的特权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维护在华侵略利益的重要法律保障。西方列强在中国所攫取的各种其他特权，归根到底要由“治外管辖权”提供法律上的保证。因此，赫德等人利用国际法反复强调这种特权“并非生于彼此之不欲公平所致，乃系因律例之不同，审法之不同，罪名之不同”①。他的态度很明确②：

从外人的角度和商法的角度看，在中国领土上维持治外管辖权和外国人自己的法庭……在过去和现在都属权宜和必要之举。

他在致清政府的申呈中也毫无隐讳地指出③：“若卒令其洋人径行归地方官管理，毫无限制，此固万不克允行者。”

另一方面，赫德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愈来愈成为中外正常交往的障碍。因为“中国自议有新条约之后，日渐一日始知我中华为天下各国之一国，始知条约内有系于我中华之事者甚重，乃思设法为之求与我国家无害也④，而且中国人民“识见日开日广，愈知此不归地方管理之条为必宜免去之事”⑤，否则始终使中国人民感到不满和羞耻。如果听任外人实施与中国传统及西方国际法原则过分违背之事，中外交往的心理隔阂将会进一步加深，对外国的仇恨和反抗更为激烈，这样会使形势变得格外复杂，不仅不利于中国对西方的开放，反而会影响西方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所以，赫德忧心忡忡地指出⑥：

（治外管辖权）除非极小心地运用，并且局限于事关外国人安全的最狭窄范围内，否则就会变成一个乱源，而结果对于一切利益都是有害的。

为此，赫德一直试图在不改变不平等条约的前提下，利用国际法制定一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以约束各国在华人员的行为，逐步消除中国对外的“恐疑之心”。他主张，治外管辖权并不意味着外国人可以“任意违背中国章程，亦无惩办之条”⑦。“外国人在中国，中国人在外国者，各须遵

① Origin, Vol.I，P.429.

② R .Hart, op .Cit.P.143.

③ Origin, Vol.I,p.440.

④ Origin, Vol.6,p.412.

⑤ Origin, Vol.6,p.442.

⑥ ［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150页，译文略有改动。

⑦ Origin, Vol.I,p.633.

守其所到之国之章程[①]。”他在代表总理衙门起草的《咨出使各国大臣》进一步指出外人在华应与中国人共同遵守中国的法律。

赫德还提出一套具体解决办法。他不是顾此失彼，而是巧妙地要弄他那模棱两可的政治手腕设想出一个西方列强和中国政府都能感到满意的“通同审判、周密无愉之善法”[②]，并努力说服双方可以按照各自的方式继续行事，条件是双方各作一点小的让步：“外国所应得益处中国必宜给之，中国所怨而不欲给者外国亦可不要”[③]，以此来弥补治外管辖权的弊病。

其主要思想是：（1）延聘委托外国律师代理诉讼。委托律师代理诉讼是西方各国普遍的制度。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在涉外案件中，外国当事人必须委托法院地国家的律师，而不能委托外国律师代理诉讼。当时清朝司法系统较为混乱，主要由地方政府官员兼理司法事务的承审机关，根本没有律师制度，这显然不能适应近代中外正常的交往。因此，赫德主张加以改革，凡涉外诉讼都应在各通商口岸另外设立的专门法院（理案衙署）办理。法院由中外两方代表主持。一方为本省督抚委任的候补道员，另一方则为总理衙门延聘的素谙西方法律的外国专职律师。原告、被告都可由律师代备诉词，并准律师当场代问一切。如有重大案件，应准原告、被告各请局外一人在座，“以为旁观公论之准”[④]。

这一建议逐渐为清政府所接受。晚清驻外公使最先开始延聘律师在外办理诉讼。国内南北洋大臣后来如“有棘手洋务，亦有藉手律师”。总理衙门与比利时驻华公使订立三年合同，聘请外国律师专备总署交涉之用[⑤]。这样也就促进了清政府进一步接受西方的国际法知识，在某种称得上似乎提高了涉外诉讼的办案效率。但由外国人以律师资格出庭辩护，实施外国的法律制度，毕竟已经超出当时中外条约的规定[⑥]。虽然清政府仅仅是“资其赞佐，而不假以事权”，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司法独立权。

（2）涉外物权问题。根据中美《望厦条约》第21、25款规定，凡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外国人，无论是和中国人、本国人或其他国人发生财产诉讼等纠纷，一律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也不受捉拿、审讯[⑦]。而赫德则依据在西方广泛适用的“物之所在地法”提出关于不动产案件专属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管辖的原则：“查各国办理田地、房屋、行栈、买卖等事，均系按本国律例办理”，“不便照他国办法行之”。他建议：

---

① Origin, Vol.6, pp.444–445.

② Origin, Vol.6, p.432.

③ Origin, Vol.6, pp.439–440.

④ Origin, Vol.6, p.433–435.

⑤ 军机录副，第1563号（胶片号45）。

⑥ 梁敬錞：《在华领事裁判权论》，第116页。

⑦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4–45页。

可否于凡有外国人买得田地、房屋或有分股生意等事，必须外国人同本地人一体遵守此等事之章程。

这一点虽然扩大了中国法律管辖权的范围，但赫德建议的前提是分割中国司法独立权，延聘外国律师实施西方法律制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更有利于西方。如赫德基于同一原则参与订立的会讯章程，使中国海关得以参加审讯外商走私、偷漏关税等案件，改变了过去统由外国领事无理包办的不正常现象，扩大了海关的权力范围，对违法行为多少有一点限制作用。可实际上，虽然最后查核定夺大权规定应由中国海关监督所掌握。通常却都是由各关外籍税务司绕过海关监督与外国领事官私下处理了结，并且很少能够认真执行。这样就以“似让权而永保其权”为诱饵，使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欲保其权”反而失去了主权[①]。

（3）确定管辖权。这是处理涉外民事案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首先肯定一国法院对某一涉外民事案件具有管辖权，该国法院才有权受理这一案件，才会产生诉讼中的其他问题。赫德主张，外国人来华到领事馆报到后，如果“欲作为原来本国之人，则另应留名于领事官处”；如“欲作为所到国之人，则另应于所到之国地方官处挂号”。后者如有涉外民事案件，应由中国政府“按照中国办中外交涉案件新议定之条例办理”[②]。

这种通过协议管辖而推衍出的设想实际上是一种依靠某种冲突规范的间接调整方法。它允许当事人自愿加入中国国籍，自愿选择中国法律，自愿服从中国法院的管辖，以此克服各国法律不统一的弊端，使中国法院的管辖权由于这种联系因素而获得进一步的肯定。这样既可以消除中国方面的顾虑，也有利于西方商人在中国内地扩大经贸活动，即所谓“凡所到之国，其国人所不应为者，亦不准外来人为之；其国人所可为者，功准外来人为之”[③]。赫德进而指出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④]：

遇有洋商欲争性华商之生意，凡华商应遵之章即应遵之；遇有华商欲争作洋商之生意，则凡洋商应遵之幸亦应遵之，以免低昂。

在主权国家之间，或在经济力量相等、相似的贸易双方之间，只要订立严密的法律条例，实行上述主张可以做到避害趋利。但当时中外经济力量和发展水平相差极为悬殊，这样做只是扩大了外人的内地居住权利，显然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因为这种想法只是指出西方商人如欲到中国内地，其民事法律关系应当由侵权行为地国家的实体法（在近代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存在这样一个实体法）来解决。它本身则不能直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样就无法最后解决涉外民事法律的纠纷。因此，这种主张主要还是对西方商人有利的，其中所包含的限制条件，实际上也难以做到。

① 外务部档，第4819号，第16函，第20函，第22函。

② Origin, Vol.6, pp.444–445.

③ Origin, Vol.6, pp.450.

④ Ibid，后来赫德一直坚持这一思想，认为外商可以到内地做生意，“惟应添归地方官管辖一层。譬如华商到德国内地营生，自应归该国管理。各国均是如此，故洋商亦应照办”。见外务部档，第1375号。

（4）对领事和传教士的限制。为了防止治外管辖权的不适当利用，赫德根据国际惯例，反对外国派充商人担任领事，也反对外国在华领事享有外交代表的特权。他说[①]：

> 领事官扰有审钧之责，事关紧要，似应委派真正官员充当此职，方足以昭慎重。

因为按照赫德参与订立的会讯章程，领事官可以参与同中国官员的“会讯”，如果“今日在座之领事官，即前日因偷漏受罚之商人，或案情与其本行有关涉，既属不成体统，亦有诸多未便”[②]。

在传教问题上，赫德一方面主张取消关于传教的一切禁令，另一方面也提出防止教民、教士不受中国法律束缚，以致流弊滋生的趋势。他指出[③]：

> 凡属中国界内只有中国官可以管理中国百姓。而中国百姓无论入教与不入教均应一一遵守中国的科条法律，始为安分无过。扣有犯案，由中国官不分民教，一律办理，外国传教士不应护庇搀越。

他还提出外国传教士也应厘定其身份[④]：“教士不外是教士，必须安于教士分内的工作，避免介入任何涉及诉讼和可能干预中国官方行动的事件。”只有这样，“布道工作才可以避免劳而无功的情形”。但事实证明，赫德的建议并未得以实行，也未受到西方各国的理睬。

（5）赫德还根据所谓平等和相互的原则，提出中外订约应坚持“彼此互相允准”的思想，中国给予来华外国人的权利和优惠，外国亦应同样给予旅居海外的中国人。这样不仅可以表示“公允之情势”，而且可以缓和因在华外人治外管辖权所引起的矛盾，从而更顺利地贯彻执行中外不平等条约[⑤]。他建议[⑥]：

> 凡有中国大臣及中国领事官所驻扎之国，如遇中国人案件与此国无涉者，可否归中国官办理；如遇有中国人案件与此国人有涉者，可否即按照在中国办理中外交涉讼件之章程办理。

这一说法对实力孱弱、又长期遭受列强压迫的中国官吏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无疑是不现实的。

---

① Origin, Vol.I, pp.634–636.

② Origin, Vol.I, pp.634–636.

③ Origin, Vol.I, pp.634–636.

④ Origin, Vol.I, pp.634–636.

⑤ R .Hart, 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p.107.

⑥ Origin, Vol.6，P.444–446.

治外管辖权从来就不是相互的，西方列强没有也不可能允许中国人在西方各国及其殖民地享受同一权利。这种幻想最后必然陷于破灭，是毫不足怪的。

赫德的上述建议被称作是一个东方国家的“西洋公仆”所提出的：“在完全承认西方的要求和东方的需要”的前提下有关处理东西方关系的准则[①]。这种奇怪的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赫德自相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赫德已经觉察到治外管辖权是“一切麻烦的根源”[②]，确有修订和限制的必要。他以为只要西方列强在这方面做一点小小的让步，中外关系“便会即时改善过来，积怨就会消除，而代之以友好善意，商业会到处不受限制，资本投资和资源开发也可避免不必要的障碍”[③]。但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几乎他的每一主张都表明，赫德仿佛已被套上了无形的链铐，每走一步都受到紧紧的束缚，他无力跳出已成了的不平等条约的体系。对西方各国来说，这一体系已构成盘根错节、密切相关的整体。任何部分的变动或修订往往会影响整体的稳态结构，都有可能破坏各国在华势力的平衡。而治外管辖权恰恰是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基础，它“连系着所有条款”，并“被中肯地视为对华条约中最重要，最有价值，而从外国立场上看又是最精要的一点”[④]。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性质决定了赫德利用国际法限制治外管辖权的必然结局。

清政府对赫德的建议也是疑虑重重。虽然他提出了一些对中国有利的建议，如议及外国人归中国地方官管理之条，“专就此条论之，所议自可采取”。但清政府同时看到赫德的用意“有因此及彼者，此利而彼弊，此益而彼损，并行则我有所难，专办彼非所愿。且恐此得其虚名，而事不能究；彼得其实济，而悔不可追。（故）又不得不审慎图维相机筹议”[⑤]。清朝统治者的这种疑虑绝非没有道理。赫德提出修订治外管辖权的目的很明确，即“用整个国家的声誉来做保证，同时又通过怀柔远人这句格言，援用中国思想教诲所发挥最大的力量，为外人谋取利益”。他指出，这样做只会扩大而不会限制外国商人和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只会尽多享受而不会减少西方各国在华的权利，只会简化外国领事官和公使的工作而不会使之变得更复杂[⑥]。因此，当赫德试图减轻中国所受危害，限制不平等条约的滥用时，他却对外国资产阶级扩大在华活动起了促进作用。

三、分析几起涉外法律纠纷

不能否认，在一些具体的中外交涉中，为了维持海关的正常业务，作为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毕竟要坚持中外条约中有关关税问题的规定并以一种较为制度化的方法打击走私、偷漏等违法行为。

①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册，第336页。

② R .Hart, op.cit. p.143.

③ R .Hart, op.cit. p.143.

④ R .Hart, op.cit. p.143.

⑤ 佚名：《总署奏底汇订》，第32册。

⑥ R .Hart, op.cit. p.145.

否则，他所控制的海关就无法增加收入和提高威信，他所希冀的其他目的也无从谈起。因此，赫德曾经运用国际法的某些原则，帮助清政府对各国商人的违章行为进行过一些交涉，甚至与外国领事、公使也据理力争，并聘用外国律师参与法律诉讼，迫使西方国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中国做出让步，限制了外国奸商肆无忌惮的违法行为，缓和了当时的中外矛盾，客观上对发展正常的中外贸易和保障中国的税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861年，在处理英国怡和洋行商船“喀斯号”以及“衣伦马时多号”商船走私案时，英国领事官明目张胆地为违法英商开脱罪名。他们认为，这些商船的走私活动未经中国地方官员的禁阻，因而海关方面不能治其罪。赫德则指出[①]：

> 即如因有奸商在天津漏税，关差弁并无查出，旋被粤海关所查拏，别（此）商漏税之货不应入官，此等理论实出乎情理之外也。

他引用英国法律，证明“该船系由中国关差在违章时擎获，应由中国自行将其入官”[②]。

与此同时，赫德还建议总理衙门以外交方式向英国驻华使馆抗议英国领事的“屡执偏理”，并请饬谕沿海各省地方官员严格禁阻外国商船在未开通商之处贸易，以配合海关的查私行动[③]。他在致英国公使卜鲁斯的信中也表示[④]：

> 虽则大多领事都反付采取任何未经条约明文规定的预防走私的尝试，虽则势必因此引起种种困难，然而也只有再所不计了。

1862年，英国商船“白里号”违法在未开通商口岸贩运私盐，被海关扣留。这时，不仅英国领事出面阻挠处理，就连英国驻香港总检察长（“明例大员”）也反对海关根据条约将船货入官。理由是该船在非通商口岸交易时未被当场查获，因而不得按条约的规定办理。英国领事甚至不惜动用兵舰强迫释放“白里号”，商船。赫德对此发表意见说[⑤]：

> （英国方面的说法）实恐非系秉公而出，乃是偏心之论，似若此处有人抢劫，而别处不能拿办一样，其意实出情理之外。

---

① 外务部档，第0632号。

② 外务部档，第0632号。

③ 总理衙门清档，第76册。

④ ［英］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第150页。

⑤ 外务部档，第0632号。

他向英国驻华公使要求将此案向英国外交部汇报，并请李泰国在英国向有关法律专家请教，以求“公正”地解决。最后，在赫德的支持下，当“白里号”商船复往台湾鸡笼山违法贩运时，由福州海关强行将之没收罚办①。

这些做法对于约束限制外商偷税、走私起到了一定作用。沈葆祯在一份奏折中指出②：

> 闻各国洋商以中国用洋人为税务司，不能任意偷漏，有坚求公使裁撤之议。

这反映出早期一些不法外商对海关税务司制度的忌恨。某些代决外商利益的报刊也一直用非常尖刻的语言攻击赫德的政策。锱铢必较的西方商人往往用眼前的浅短利益取代长远的重要目标，认不清究竟是谁代表了自己的根本利益。他们甚至因为利害关系的权衡，宁愿牺牲自己的代表人物，来换取他们所期望得到的实际利益。对此，赫德明智地避开一切徒劳的辩解，他相信，“他的工作将适时地表明一切”③，他对各国在华利益的长远考虑迟早会被人们所理解。

赫德经手处理的镇江趸船案也是很典型的。事情本来很简单。1874年，英国太古洋行一趸船在镇江起卸货物时，致使江岸坍塌。镇江海关要求该船暂时移泊，以便查看坍塌情况，设法处理。这本来是中国的主权，理应尊重。但该船主拒不听从。海关照会英国领事馆十余次，亦均不答复，积至一年之久。1876年6月，镇江海关停发该船的起卸货物准单。由此引起英国驻华公使与总理衙门的反复交涉，双方争执不下。

英国外交部也参与了这场交涉。它虽然承认中国方面“非不尽情尽理”，却同时指责中国“何以不先知照本国，遂行不顾两国友谊之办法”，“断截该行之买卖”。并无理要求中国“视此为不必应办事件趸船仍在原处停泊”，以“不使该行耽搁买卖，稍受亏折”④。

赫德开始并未重视此案，更不愿把自己卷进这一争执中，以免加深海关与英国驻华使馆的矛盾。但由于总理衙门的态度十分坚决，赫德考虑再三，只好向英国公使表明要全力支持镇江海关的行动⑤。他向总理衙门提议，既然此案在中国相持不下，“不如详细交知出使英国大臣延请律师，在英国总理衙门与之剖辩，较有把握”⑥。这一建议立即被采纳。

赫德根据国际法的原则提出，此案关键在于强调中国历来具有对任何船舶指泊或移泊的主权，

---

① 总理衙门清档，第80册；S .F .Wright, Hart and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p.354.

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第1519号（胶片第44号）。

③ R .R .Campbell，J.D.Campbell，A Memoir By His son，P .15。

④ 外务部档，第0722号 。

⑤ J .K .Fairbank Et al　ed. The I.G. in Peking, letters of R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1868–1907, letter 167.

⑥ 佚名；《总署奏底汇订》，第6册。

毋庸经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同意[①]。他帮助总理衙门起草给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训令，再次重申了这一思想；他还将处理这一交涉的长篇备忘录寄交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的金登干，要他配合郭嵩焘的行动[②]。同时，他指令金登干聘请一位著名的英国律师，从法律角度为中国做辩护，并详细解答他亲自拟定的有关此案的一些法律问题。这位律师明确表示，指泊、移泊是中国的主权，不容置疑[③]。同时赫德还将镇江趸船案所有文件、图纸寄给英国著名的工程学家，请他们帮助定断江岸坍塌的责任。研究结果表明："江岸损坏是由该趸船，而应令挪移为是。"由此，赫德更为肯定了中国方面"不但无所逾权，且于中国能行之权尚有所未逮也"[④]。

在策略上，赫德主张郭嵩焘不要与英国外交部在某些细节问题上纠缠，重要的是要让英国承认中国的基本主权[⑤]。似如英国方面仍然敷衍拖延的话，他建议海关采取行动，强行移泊此趸船[⑥]。

在英国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到1879年2月，英国终于通知中国，表示英国承认中国通过其海关代表对本国航道行使主权，以及在通商口岸对任何船舶（包括趸船）指泊和移泊的权利。至此，这场长达四五年之久的中外交涉案终于以中国胜诉而结束。

交涉镇江趸船案表明，在对外关系中正确、巧妙地利用西方国际法的合理因素，对维护一个弱国的主权并非毫无裨益。这次诉讼之所以成功，除了总理衙门所持态度始终坚定不移以及驻英公使郭嵩焘殚精竭虑、据理争辩之外，赫德所作的客观努力也是比较重要的。

作为英国人的赫德竟然帮助中国与英国商人及英国官方抗争，这看起来似乎完全矛盾，却统一于他的具体行动之中，这正反映出这一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赫德的努力具有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掠夺欲望控制在国际法范围之内的作用。面对无耻的外国奸商以及无理偏袒外商的西方外交官，赫德有时能够参与听断，"钤制洋商"[⑦]，并"借以压服各国帮讼之领事"[⑧]。这不能不使清政府对他产生某种信任感和依赖感。总理衙门在致赫德的一封信札中盛赞他"办事实心，深堪嘉尚且持论两得其平，尤属公允"[⑨]。这些评价虽然出自清朝统治者之口，但多少有些客观事实做依据，我们不能一概抹杀。

从整个近代中外关系史来看，类似镇江是趸案这样的胜诉却带有明显的偶发性，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其一，这一事件的性质较为清楚，显然是英方无理偏执，即使按照中外不平等条约也偏离

① The I.G.in Peking, letter 173, 11 ApR.1877, p.240.

② Ibid, letters 161, 167, 173, pp.230,237,240.

③ 外务部档，第0722号。

④ 外务部档，第0722号。

⑤ The I.G.in Peking, letters 185, 188, p.254,256.

⑥ I bid, letters 184, 185, pp.251,254.

⑦ 军机处录副奏折，第1519号（胶片第44）。

⑧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0，第一页。

⑨ 总理衙门清档，第76册。

甚多，这对自我标榜为依法治国的英国来说，一开始就处在理屈词穷的地步。其二，英国资产阶级正着力按照自己的面貌和需要改造清政府的统治。这一交涉无异于清政府响应了这一号召，愿意通过西方国际法处理中外关系，英国自然要表示积极的反应。加上这一事件并不怎么重要，既未要求赔偿坍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未提出英方承担诉讼费用。趸船的暂时移泊，对英国的经济利益并无直接的损害，而中国胜诉对于突出英国的开明、宽大，从而便于它在中国同其他列强争夺，都是很有助益的。其三，英国政府正在密切注视赫德统辖下的中国海关，期望它在扩展中英关系方面起到促进而不是阻碍作用，而容许在一定条件下对海关做些微让步，以换取今后更进一步扩大对华经济、政治渗透，就是为此而采用的一种手段。其四，就赫德及其领导的海关来说，在其他中外交涉中并不总是具有这种与不法奸商及外国使领争执到底的勇气。据赫德自己透露，“凡在中国洋行，不论资本如何富厚，无一不为偷漏之事”[①]，“各国公使无不包庇商人”[②]。所以，虽然拿获议罚几个外商，或在个别诉讼中成功，可是“漏网尚多”[③]，不可能彻底改变外商肆意违法的现象。相反，各海关税务司对外商走私偷漏多采取“尊重犯规者之申辩，轻于处罚了事，务期回避会讯章程之规定”的政策，尽量予以包庇，迁就和宽容，而对华商的处分则“严如最终之判决，绝无申辩余地”[④]。因此，对赫德的认识，无论如何都不能以事实性认识的历史范围去代替其价值性认识的历史范围，即不能以他的个别言行去取代其一生主要活动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所具有的意义。这样不仅无法展示赫德的真实历史面貌，也必然会影响我们对其历史地位的恰当评价。

通观中国近代外交史，虽然清政府一些官员也曾援引西方国际法抵制西方列强对我国权益的侵害，但类似镇江趸船案这样成功地在英国胜诉，从而维护中国主权的事例并不多见，因为在近代中外关系中，威胁和被威胁的划分是十分明确的。中国不可能跳出这个基本结构。西方列强只要中国承担国际法的义务，却不允许中国享受国际法的权利。所以，赫德等人引进的国际法，不仅在法律上是极其脆弱的，在事实上也造成了倒置过来的新的不平等关系。奕䜣等人深有感慨地说[⑤]：

> 泰西各国竞尚兵力，其于中国情势亦然。力所不能胜，而欲以（公法）条例口舌争胜焉，难矣！

王佐才进一步指出[⑥]：

---

① 外务部档，第4361号。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40，第20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卷40，第20页。

④ ［日］高柳松一郎：《中国关税制度论》，第12–121页。

⑤ 佚名：《总署奏底汇订》，第32册。

⑥ （清）王佐才：《格致书院课艺》，乙丑卷上，第6页；（清）宋育仁：《采风记》，卷5，第6页。

> 小国援公法，未必能却强暴，大国藉公法，转足以扶制小国。则所谓万国公法者，不过为大侵小、强凌弱藉手之资而已。

郑观应在19世纪80年代完全重写的《公法》一文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最为精辟。他说[①]：

> 一国有利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烟台之约强减中国，而外部从而助之，何所仿也？外国人初到中国不收身价，中国至美国者何如？中国所征齐国商货之入口税甚轻，各国所征于中西商货者，又何如也？

只要中国在政治上没有真正独立，没有完整的主权，那么派生于主权的司法独立权、与其他国家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权就无从谈起，更不可能成为涉外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就难以凭借国际法的力量充分保护本国人民乃至国家在外交关系中的合法权益。正像赫德所指出的："如果中国仍受到不同一般的等差待遇，情况就会恶化下去，不会好转[②]。"这亦反映出中国近代外交的性质所在。

晚清驻外使馆的建立与发展

近代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设立常驻外交使馆，这是促使国家间交往、加强永久外交关系的保证。近代外交也通常以互换使节、常设使馆为其标志。每一个得到承认的独立国家，都有权派遣外交人员常驻其他国家，以代表本国的利益；同时，也应该接受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根据自格劳修斯以来一直得到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和设立常驻外交使馆必须以双方同意和对使馆职责产生共同谅解为基础。但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这一制度却是以赫德等人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采用各种手段诱迫、促使清政府接受的。

一、遣使设馆的背景

中国自古就曾屡派使节出访异域，但多为负有特殊外交使命的临时性使节。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不可能产生以建立和发展长期外交关系为主旨的近代驻外使节制度。在虚骄自大的清朝封建统治者的片面意识上，交易往来仍然不外是"册封落属"而已。中国派出的代表都是以"天使"的身份前往的，对待其他国家来使则通通视作"贡使"。这种状况奠定了中国古代封建外交的基本格局。虽然它对抵制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起了一点作用，但同时也严重限制了中国对外交往所

---

① （清）郑观应：《易言》，第2页。

② R .Hart, op.cit. p.124.

能施展的区域，既不能适应近代日益发展的多元化的国际政治的偏要，更无法满足西方资产阶级扩展在华侵略势力的要求。因此，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各国就曾先后25次派使来华，以求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此后，列强更将改变清政府的传统对外态度，逼迫中国屈服于西方的外交秩序，视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1844年，法国特使拉萼尼在与清朝钦差大臣耆英签订中法《黄埔条约》时就提出[①]：

> 西洋诸国若遇两相结好，必须各派使臣，往来聘问。倘中国亦可仿办，伊国当遣使进京朝见，即留驻京城。中国亦遣使至伊国驻扎。庶两国消息常通，方可互相帮助。

这一建议当时遭到耆英的“正言覆绝”。

1858年，美国公使列卫廉和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又向清政府办理外交的官员建议中国遣使西方。据当时英方译员李泰国记载，桂良和花沙纳曾私下告诉额尔金说，俟缔结和约之后，“皇上当简派钦差赴英，以示两国友好之意”。但正像有人曾经指出的，这一表示与其说是一个政策声明，倒不如说是在战争中被战败一方的一个礼貌的表示，目的是为眼前棘手的谈判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②]。虽然此年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已有双方可以互派常驻使节的明文规定，但清朝统治者陈腐而落伍的意识并未得到丝毫修正，仍然坚持中国历来并无派使出洋常驻的“定制”，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无求于外国，不需要对外发展商业贸易，当然更谈不上保护海外华侨的利益[③]。不难看出，在长期与世隔绝状态中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对遣使设馆的认识与世界各国存在着多么巨大的鸿沟。

1861年，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在北京设立使馆后，促使中国“遣使出洋”又成为西方各国迭次向清政府提出的要求之一。他们希望通过强迫中国行使这一“对等”权利，同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使清政府了解和接受西方的外交制度，以便将西方的影响渗透到清政府的统治集团中去，强化中国对西方的信任和依赖关系。

英国公使卜鲁斯第一次见到恭亲王时，就提出中国只有遣使出洋，才能保证中国愿意以更为友好的精神处理对外关系[④]。美国公使蒲安臣也曾屡向总理衙门鼓吹要直接与外国政府办理交涉[⑤]，英国参赞威妥玛在给清政府的《新议略论》中论述得比较具体，他认为遣使西方对中国来说可以

---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2，第45页。

② I，C.Y, Hsu，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p.153.

③ W.A .P.Martin ，A Cycle of Cathay，P.160.

④ I，C.Y, Hsu，op .cit.PP 153–154.

⑤ I，C.Y, Hsu，op .cit.PP 153–154.

“全得其益”[①]：

惟遇设若某国大生所定，中国之意不同，中国既无大臣驻扎伊国，只由该大臣自行向本国辩驳，何人在彼能代设辩？

赫德也一直在想方设法推动清朝统治者走上他们本来所不愿意走的轨道，在敦促清政府遣使出洋问题上更是不遗余力。美国一位公使这样说[②]：

赫德先生对于派遣使节到西方去这一件事曾经共同致力，这是为一般人所承认的。事实上，这个问题没有怀疑的余地。

自1861年年初到北京以来，赫德不断向清政府力陈“中国应沿着西方人所理解的‘进步’方向前进”。他认为，他在总理衙门所谈论的，“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在各条约国首都设立常驻使馆的需要更为强烈和更为合乎习惯”[③]。

为使清政府了解西方外交的详细内容，赫德于1862年选择了美国著名国际法惠顿《国际法原》第三章中《论通使》一节（其中包括24个小节），全面论述了有关外交使馆的权利和义务，以此作为中国日后对使出洋的“指导”[④]。他进而向总理衙门指出，“关于处理对外交涉，除非遣使欧洲，否则永远不会做得令人满意”；假如中国有使臣驻扎国外，西方驻华公使才有可能“按照事情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怡朝），卷40，第29页；另外，旅英华人唐学埙致恭亲王的信函也颇值得注意。此人咸丰末年离华赴英，据称是为了“学其言语、文字、国法、民风，以图报效”。他在1862年8月27日致恭亲王的票函中指出：“滋今英、法二国之君甚愿圣朝赐以钦差大臣至英、法二国，看访其民风、国法及一切要务。生思此乃极妙之机。因若有钦差或龚（恭）王爷驾至欧罗巴，将能授许多仁义保民之方、编排国法之则，看一切奇妙古怪之事物，经历各方之地土人情，实未必非无有大助于本国也。”他还表示愿意担任中国出使大臣的翻译（外务部档，第0960号）。此后不久，他又写信说：“兹于英国之诚心，上自皇后，以至于庶人，无不共相喜悦，愿有一位天朝钦差驻扎伊国之皇都，鉴临二国往来之要务，而伊等必皆诚心恭敬钦差，且甚安稳定居，决无丝毫疏虞。”（同上，第2函）唐氏在第三封信中还提到日本已派遣使团考察欧洲，在巴黎与法国皇帝‘“似有甚相投知之谊，希望清政商也能仿效日本，尽快派出使节”。（同上，第3函）唐学埙的劝谏与西方驻华公使所言几乎完全相同，其信函又都是通过英国外交官威妥玛寿交，这一点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出西方各国不放过任何机会对我政府施加影响。

②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2，第489页。

③ Origin, Vol .6, pp.294–295.

④ W, A.,p, Martin, op, cit,p,234；赫德的译文已佚，我们从后来丁韪良的译本《万国公法》卷3“论诸国平时往来之权”的《论通使》一节中了解到其大致内容，具体包括：①钦差驻扎外国；②可遣可受；③何国可以通使；④国乱通使；⑤先议后接；⑥国使等纵，信凭式款；⑧全权之凭；⑨训条之规；⑩牌票护身；⑪ 上任之规；⑫延见之规；⑬交好礼款；⑭国使权利，⑮例外之事；⑯ 家人置权外；⑰ 房屋器具；⑱纳税之规；⑲寄公信者；⑳路过别国，礼拜不禁，领事权利，国使卸任，召回国使。

的是非曲直来处理问题”[①]。

1865年，赫德在向总理衙门提出的《局外旁观论》（《帮官论》）中，深刻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劝告清政府尽早接受“外国日后必请之事”，如觐见、遣使等等。他认为遣使设馆是对中国大有益处的“自护”行动，“在京所住之（外国）大臣若请办有理之事，中国自应照办；若请办无理之事，中国若无大臣驻其本国，难以不照办”[②]，以此诱导清政府改善片面交往的方式。

1867年9月至10月间，赫德几乎每次到总理衙门都要与王公大臣们讨论向国外派遣使节的问题。他把中国遣使西方看成是摆脱驻华外国使馆控制的唯一切实的办法，以及“作为使中国保持其独立和自由的最不使人反对的方式”。他进而指出，遣使设馆的“本身就是一个进步”。亲自与外国人接触不仅会使清朝统治者“得到有益的经验和教育”，而且有可能使他们最终成为“进步和友好外交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一事实将“成为中国与西方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一个纽带，它将约束中国坚定地前进，而不致有后退之虞”[③]。由于赫德对清政府影响力的日益加深，他的这些建议逐渐受到清朝统治阶级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晚清遣使设馆制度形成的有效酵母。

赫德等人想方设法催促清政府遣使西方，无疑有着他们自己的想法，但要求中国遣使这件事本身却是无可厚非的，很难说这是什么侵略行为。在近代日益开放的国际社会里，遣使常驻有关国家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于密切中外联系，维护中国权益也有着一定的实际意义。因而，应该说赫德多少体会到了历史的力量对改变中国传统外交结构所提出的必然要求。

在赫德等人以及外部其他压力的促进下，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也逐渐出现松动的迹象。早在1861年，文祥就曾暗示过遣使出洋的可能性[④]。然而囿于传统习惯，清政府顾虑重重，不愿过早予以考虑。1867年，总理衙门终于提出遣使出洋“亦关紧要，未可视为缓图”，并在同、光之间几次命令各省将军督抚、南北洋大臣等讨论议复，虽然笃守旧制、盲目排外的反对者和主张拖延者不乏其人，但越来越多的封将大吏和饱学之士不仅认为“彼此往来，亦属常事”，而且已经预见到遣使设馆迟早“应行举办”[⑤]。他们纷纷著文上奏，建议朝廷正视国际环境，学习泰西之术，接受对外交往的新形式，派遣使领，设官护侨。自我孤立的消极的传统意识正在悄悄得以改变。

李鸿章等人的建议对清廷颇有决定性的影响。他首先指出，鉴于来华外人的蛮横无理，中国只有停止踽踽独行的传统政策，接受国际交往及遣使设馆的惯例，才有可能直接向其政府“明相谙

---

① K .F.Bruner et al ed. Entrering China’s Service，Robert Hart’ s Journals，1854–1863，P.300。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0，第12页。

③ Origin，Vol，6.P.296；R.Hart，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PP，21–24。

④ D. F. Rennie, Peking and the Pekingese，Vol, 1。p.128 。

⑤ 军机录副，第1519号（胶片44号）。

责，曲为晓譬”，根据是非曲直并“援引该国政教法律”[①]进行交涉，争取起到排难解纷的作用。

其次，李鸿章认为，西方兵制、船政、军火、器械“精利奇巧，远过于中土”已被普遍承认。因此，遣派使臣前往各国，可以探其利弊，明了外国实际情况[②]：

> 若能探窥其曲折要领，从而学之，归而求之，我增加一长，彼失一恃，足为自强根基。

主张以遣使为媒介向西方学习。这实际上已经摈弃了以往那种遣使不外“册封藩属”的陈腐观念。

再次，福建巡抚李福泰提出，“彼以使来，我以使往”，“国体”无碍，而且将会有利于“通商大局”。他说，中国与西方远隔重洋，历来声气不通，故从无遣使之事。但是目前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③]：

> 近年各国以贸易来者，聚集海口；我闽、粤商民赴新加坡等处交易者，更复不少。时异势殊，不能不量为变通。

后来一位海关道进一步建议“审通商以收利权”，并以日本为例，说明只要“执西法以绳西人之利”，就可以做到“游历较多而情形愈熟”[④]。这些建议虽然多笼统含混，但已经一改中国不勤远略的传统外交思想，急切呼吁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主张不要再坐困一隅，呆呆承受外力冲击，而应通过积极的对外交往改变中国在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困难处境，借使国家转危为安，捍卫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清政府对海外华侨、华工的态度此时也已有所转变。自1863年，在赫德的协助下，清政府开始订立旨在查禁非法贩运华工出国的招工章程，并同有关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交涉[⑤]。1871年中日初议和约时，李鸿章与曾国藩奏请派遣使臣出洋，以“管束我国商民”[⑥]。1872年，李鸿章更为明确地提出，遣使设领“外托邻邦报聘之礼，内答华民望泽之诚”，“未可再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I2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I2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I2页。
④ 外务部档，第5126号。
⑤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17页。
⑥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27页。

缓”[①]。同年，总理衙门派遣陈兰彬等前往古以调查华工受虐情况，由赫德亲拟调查问题表，饬随团前去的海关职员协助。“逐条查明，据实登答”[②]，帮助清政府了解海外华工的真实状况，并采取措施，历经交涉，以取消对华工的苛例[③]。到1875年，总理衙门终于提出必须照约于华侨较为集中的国家和地区设立领事馆，以保护华工、华侨，抚绥中国商民的利益。在设立须事之前，要先派大臣出使各国，“方能呼应”[④]。

至此，由于以赫德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外力促进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的内部酝酿，晚清邀使设馆的倡议基本已趋于成熟。

二、近代最初的遣使活动

在中国驻外使馆正式设立之前，赫德曾促使清政府派遣过两次临时性使团。这两次出使虽然性质、目的各不相同，但都成为晚清正式建立驻外使馆的先导。

1866年，赫德请假回国探亲。离华前，他向恭亲王建议[⑤]：

> 趁本人回国之便，请派同文馆学生十一二人随同前往英国，一览风土人情。

他希望借此消除清政府对出使异域的恐惧和疑虑，并可作为“日后派委出使大臣之先导”[⑥]。总理衙门似曾有过类似的考虑，所以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饬令已经担任过赫德的中文文案的斌椿以总理衙门副总办官的名义，率领三名同文馆学生随赫德前往西方各国考察。于是，赫德将一次本来是纯粹的私人旅行，化成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

斌椿一行访问了法国、英国、丹麦、瑞典、比利时、普鲁士和俄罗斯等国，往返程途九万余里。所到之处都受到西方各国官方和民间的热情接待。赫德为这次考察做了精心安排，由英籍海关职员包腊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担任翻译，负责旅行参观的具体事项[⑦]。在赫德回乡省亲期间，由包腊随时写信汇报情况。赫德也多次专程从家乡回到伦敦、巴黎，安排他们的社交活动[⑧]。赫德本来期望这个使团“至少要访问华盛顿后再返华”[⑨]，但因斌椿等人归国心切，所以于1866年8月提前自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9，第33页。
②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册，第581页。
③ 佚名：《总署奏底汇订》，第11册。
④ 外务部档，第5126号：《清季外交史料》，卷4，第17–18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第1页；J.Bredon,Sir Robert Hart,p.1。
⑥ 外务部档，第1570号。
⑦ （清）斌椿：《乘槎笔记》，第94页。
⑧ K .F.Bruner al ed.op.Cit.P.320。
⑨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2，第205页。

马赛启程回国[①]。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遣使出洋的试验。斌椿等人虽然既未奉有任何外交使命，也未携带国书或其他文件，不可能代表中国对西方各国有所表达，可是却代表了中国人对近代欧洲和西方外交界的"初步勘察"[②]。这些封建士大夫的陈旧眼光纵然无法完全理解西方的各种奇异现象，但毕竟有了亲身的感受，并通过"笔诸日记，略举端倪"，多少扩大了清朝统治阶级及知识分子认识西方的视野。斌椿在访问中已经隐约预感到中外交往势在必行，一定会不断得到发展。他对英国女王说[③]：

> 我等既开其先，他日源源而来者，不难频临贵地矣。

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将这次遣使出访看成清政府"常驻使节的萌芽"以及"有利于与西方各国建立更为亲密友好关系的伟大进步"。他说[④]：

> 这是中国政府对外交往以来第一次决定派遣一位中国官吏出访欧洲。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步骤，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其中绝没有来自外国使臣的压力。它确实在赫德先生的建议下，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应归之于赫德所施加的非常有益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这一点已经奏效……

然而，赫德等人对斌椿考察的结果并不满意。他们认为，这次出使既未能使西方各国更好地了解中国，斌椿等人对西方文明漫不经心的欣赏和赞扬亦远未达到赫德所期待程度显然，赫德希冀着中国与西方世界有更进一步的接触。

赫德在斌椿回国之后，继续促请清政府采取进一步的遣使行动。总理衙门估计到西方各国公使在来年修约时必将肆意要挟，所以也希望通过正式向西方派遣外交使节来缓解这一迫切威胁，请求各国政府放松对中国的勒索和压迫。但由于在出使人选问题上一直拿不定主意，清政府"明知其为必应举行，而不敢竟请提出"[⑤]。文祥甚至想请赫德再次陪同中国使团出访，但此时赫德因税务不能脱身，未便成行[⑥]。

就在清政府踌躇为难、焦急忧虑的时候，长期担任驻华公使、现准备辞职返美的蒲安臣于1867

① （清）斌椿：《乘槎笔记》，第136页。
② H .F .Me Nair，The Chinese Abroad，Their Position and Protection，A Study of Introduction，Law and Rule，p.18。
③ （清）张德彝：《航海述奇》，第554页。
④ C .Y .Chao，A Brie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Diplomatic Relations，pp.173–175 。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第27页。
⑥ Origin.vol.6，P.295 。

年11月下旬向总理衙门辞行。蒲安臣与其他国家驻华公使有所不同，以“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一直受到清政府的另眼看待。他在辞行中毛遂自荐地表示：“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①]这番话正投清朝统治者之意。奕䜣等人顺势立即决定邀请他担任中国出使大臣，率领中国使团出访西方各国。赫德得知此事后，凭着他特有的敏捷和智谋，认为这是开创中国外交新阶段的大好时机。他马上向蒲安臣表示全力赞同和支持[②]。

赫德在这次遣使活动中也起了较大的作用。在他的建议下[③]，清政府另外委派英国使馆翻译官柏卓安充“左协理”，法籍海关职员德善充“右协理”，随同蒲安臣出使。共同起到“引导襄赞”的作用；并加派几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陪同，亦担任“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其他诸如筹集出使经费，制定消费标准等具体问题，都由赫德一手办理。《北华捷报》无不夸张地指出[④]：

>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此事发生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是经过长期和缜密的考虑的。我们的记者说：“此事是同赫德商议之后才提出的。”我们相信，这个计划确实出自赫德的头脑。

赫德自己也将这次出使看作是“许多年来力劝总理衙门的一个步骤”。他认为，总理衙门之所以派遣蒲安臣使团的目的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期望“通过向各条约国解释中国在试图改变现存环境或引进新事物过程中所必然面临的诸多困难，以培养和保持彼此间的友好关系，求取外国的宽容，并尽可能防止企图从中国攫取进一步特权的任何敌对的压力”。第二，从中国本身来说，则是“准备采取一种通用的方式，使中国既可以听取驻华外国公使的意见，又能以中国驻外人员为媒介，在各国首都与其政府互通情况”[⑤]，即为将来派遣常驻使节创造条件。

赫德进一步向西方各国提出，既然中国在西方人所理解的“真正和健康的发展方面”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开端，那么“列强最聪明和最富有成果的政策就是不要用压力迫使中国前进，而应让中国按照自己的步伐，使其在适当时间和以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自我拯救”[⑥]。显而易见，这次以乞求西方列强放慢侵略中国步伐为宗旨的外交使命，笼罩着多么浓重的半殖民地外交的气氛！

---

① Origin.vol.6，P.295 。

② W .A.P .Martin，Op.cit.P.375。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2，第1页；Origin.vol.1，P.295。

④ The North China Herald, December 14，1867。

⑤ Origin.vol.1，P.296。

⑥ S.Wright，op，cit，Pp.369–370。

聘请外籍人员担任外交使团的首领，在各国早期外交史上并非没有先例[①]。但是，蒲安臣在出使过程中擅自与美国政府签订条约的越权行为，却完全违背了中国的意愿和利益[②]；他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夸大渲染也引起西方不少人的非议。在蒲安臣离华不久，赫德就曾对此表示过疑虑[③]。蒲氏离美赴英之后，他的不满情绪更是溢于言表。他专门发表一篇长文，提醒西方各国切不可对这次出使抱过高的希望。他在文中指责蒲安臣在美国不负责任地大肆宣扬中国欢迎西方文明，结果却使“一个富饶而愚昧、非理性的社会在自我吹嘘方面走得更远了”。他还提出西方新闻界忽视了清朝统治者对西方世界的无知，也没有预料到在中国推行西方文明必然遇到的困难。他说，如果轻信蒲安臣的宣传，对中国抱有幻想，“中国将会使这种期望落空”[④]。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遣使主要的意义已经失去了”。

斌椿、蒲安臣两次出使的经费，因事属创始，无法核定数目，所以都由总税务司赫德从海关税收中先行垫发[⑤]。由于蒲安臣一行在国外过分挥霍浪费，引起许多人不满，所以后来赫德拒不承认这笔26.5万两银的巨额出使。经费是从海关支出的，甚至宣称连海关职员德善在出使期间的薪金也未动用海关津贴，企图推卸自己和海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⑥]。他对蒲安臣出使的反感也就不言而喻了。

赫德的这种看法完全是从欧洲各国在华利益出发的。在许多西方资产阶级看来，蒲安臣出使西方的结果多少改变了清王朝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完全妥协退让的立场，从反面鼓励了清政府采取较以前强硬的态度，助长了中国的保守主义[⑦]，“使中国人变得更加自负，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更加迟缓”[⑧]。为赫德作传的英籍海关职员魏尔特甚至更明确地指出[⑨]：

> 这一失败本身作为一个危险的信号，使得中国和外国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这些政策最终给中国带来持久的利益。

这对赫德极力贬低蒲安臣出使倒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

① ［英］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137–138页；［美］丁韪良译：《万国公法》，卷1；李其泰：《外交学》，第17页。

② F.William，Anson Burlingame and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p.152 。

③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2，第212，222页。

④ Origin.vol.6，Pp.296–297。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2，第1页；卷56，第21页，卷83，第41–42页；卷79，第15页 。

⑥ ［美］马士：上揭书，第217页；Origin.vol.1，Pp.239–241。

⑦ ［美］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388页。

⑧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晚清史》，下册，第91页。

⑨ S .Wright，op.cit.P.372。

当然，蒲安臣出使的结果在中国并未引起普遍的注意，更没有也不可能使当时清廷权贵及一般封建士大夫的对外态度以及接受西方文明的程度，产生重大的改变或根本的影响。这说明中国要进入近代国际社会，与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尚需经历长期和艰苦的适应过程。

但无论如何，这次历时近三年，访问西方十余个国家，行程十万余里的出使毕竟是清政府第一次正式遣往西方的、具有明确外交意图的重要行动。虽然它也具有试探的性质，但已与斌椿使团的考察大不相同。它使清政府更加直接地了解了西方世界的发展和中国在当时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多少缓和了西方各国对华的强硬政策，在遣派外交使节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867年年底，总理衙门曾经表示①：

（此次出使）设无中国大员同行，则将来无熟悉外情、堪任使职之人。他日中朝自遣使臣，有成例可循，且易做准备。

这说明清政府并非浓无长远打算，徒以权宜应付的态度处理这一问题。而是已有同西方各国建立长期外交关系的准备，并努力为此创造条件。英国公使阿礼国在致英国政府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蒲安臣出使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作用和意义，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自发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他说②：

没有一个人知道中国已面临一种变革的前夕，这种变革将使局面有实质性的转变。

1870年，在赫德的协助下，清政府第三次派出外交使团，并首次由中国人担任外交特使，赴西方“乞情致歉”③。虽然这在近代外交史上并不光彩，但它有意无意地带来了一种观念上的变化，使清政府在进一步放弃闭关锁国思想的同时，提出了一种新的动态方法，即要缓和与西方的矛盾，摆脱对己不利的困境，就必须扩大外交活动的领域，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准，改变传统外交保守和狭窄的结构。否则，不仅会影响中外关系的继续发展，也会危及清政府本身的运转机能。因此，在赫德“启示”和推动下清政府所进行的几次遣使活动，从更深的意义上反映了扩大中外交往已成为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光绪以后，在中国对外遣使设馆问题上终于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① H .F .Mc Nair，op.cit。P，21，note 12。

② 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Vol.1,P .193；C.Y.Chao，op.cit.P，91。

③ 这次出使赫德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如安排具体行程、推荐海关职员担任译员。在经费上照例予以协助等等.See S.Wright，op。cit，P.396；I.G.in Peking，letters 18 and 1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8，第9页；卷87，第5页。

三、赫德与中国驻外使馆

1875年，英国试图开辟滇缅商路的探险队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杀。这一偶然事件引起中英两国长达一年半的交涉，并成为晚清商议已久的遣使设馆计划得以实现的直接导因。

英国公使威妥玛将马嘉理事件视为扩大侵略、进行外交讹诈的大好时机。他用尽一切威逼、要挟手段，不断将英国的各种要求扩大化和具体化。其中重要的一点即是要求“中国朝廷必须派一钦差大臣赴英国”表示歉意。他不断催促清政府“赶紧先办”此事①。在这一压力下，清政府于同年8月决定委派兵部侍郎郭嵩焘为赴英使臣②。但威妥玛害怕郭嵩焘的出使会导致与英国政府直接交涉解决此案，影响他在这一事件中的“功绩”，所以转而又要求中国出使大臣暂缓出发③。

赫德在这一问题上与威妥玛的意见不同。他认为应该利用这一事件首先促使清政府尽快接受西方的遣使设馆制度，然后再讨论诸如优待公使和商务税厘等其他问题④。早在赫德受命赴上海居间调停之前，他就向李鸿章建议，如果他此行转圜失败，中国应该立即派素有声望的大员为道歉专使赴英，与英国外交部直接谈判。他自告奋勇表示愿意陪同前往⑤。赫德指出，中国只有派出自己的使臣，才能“使英国政府听取中国的解说，决定它将来的行动。而中国的解说定能如英国对他的责难那样得到充分的发挥”。否则，必将“带给中国种种麻烦”，“其性质的严重，非总理衙门所能想象”⑥。

1876年9月，中英关于马嘉理事件的交涉以中国忍辱曲让、双方签订《烟台条约》而告结束。条约第一段《昭雪滇案》第六款规定⑦：

> 俟此案结时，奉有中国朝廷惋惜滇案玺书，即应由钦派出使大臣择期起程，前往英国。

次年，郭嵩焘等人奉派出使英国，向英国国王呈递了道款国书，并在伦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嗣后，清政府又陆续派遣使臣到德、美、日、法、俄等16国常用驻扎；并先后在新加坡、横滨、汉城、小吕宋、旧金山、纽约、南非洲、澳洲等地设立了领事。中国常驻国外使领制度，从此正式开始。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参与国际活动的规模和范围的重大扩展，而且还标志着过去那种中

① 外务部档，第0484号。
② 外务部档，第0484号。
③ I.G.in Peking，letter 146。
④ I.G.in Peking，letter 150。
⑤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5，第35–36,42–43页。
⑥ 王绳祖：《中英关系史论丛），第140页；I, G in Peking,letter 146,March 1876，P，216。
⑦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347页。

外相互隔绝、同居各爨、自成一体的封建闭关自守状态已被进一步打破。通过各种渠道的接触，清朝统治者比以往更加直观和现实地了解了一些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以及近代国际社会的各种矛盾。这些了解帮助清政府或多或少地放弃了一些严重脱离实际的外交思想，在对外关系中越来越多地采取符合国际习惯的做法。同时，也开始考虑使中央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逐渐与驻外使馆予以沟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一些对外交涉的效率。此外，遣使设馆使中国各级出使人员置身于西方各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使他们亲身感受到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力量。他们中的不少人回国后都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强烈支持者。

但是，同时应该指出，晚清驻外使馆的建立使中国日益深入地卷入近代国际社会，然而这并未使晚清外交建立长期和积极的目标。清朝统治阶级从主观上或许希望借此减少对外依赖的程度，可是当时中外各方面力量的对比都决定了中国既无能力也无可能在国际上形成独树一帜的力量。相反，在清政府消极被动的外交政策指导下，晚清驻外使馆的主要任务，几乎大多限定在保护驻在国及所属殖民地的华侨华工。搜集驻在国有关交涉事件及风土人情的报告等事务上，并未能通过出使大臣主动办理外交，来逐渐摆脱外人干预、挟持的困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而晚清对外政策的基本取向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仍然是对国际事务的低水平卷入，清廷政策制定者在外交上的回旋余地相对也未得以较大的扩充。主要是正式外交谈判很少由驻外使馆担任，绝大部分仍在总理衙门、李鸿章处至假手赫德进行的同时，赫德也不断寻找机会，利用晚清驻外使馆，进一步操纵、控制中国的外交。

早在晚清驻外使馆建立之前的1874年，赫德就在伦敦设立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驻伦敦办事处，由其亲信金登干以“无任所税务司”（驻外税务司）的名义具体负责[①]。办事处的事务包括：（1）招聘海关职员和京师同文馆教习；（2）采购灯塔、航标工程所需器材及北洋海军的军舰、军械；（3）接洽、偿付借款；（4）支付有关人员来华旅费；（5）照料赫德的私人资产及家属，实际上这是赫德设在欧洲的一所秘密情报机构和“准外交机关”。其工作人员要誓守不泄露秘密，违者严予处罚[②]。金登干经常按照赫德的密令，往来于欧洲各国，进行秘密的外交活动多方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晚清驻外使馆的建立与早期发展，也与他们有很大的关系。

1. 建馆

1876年12月初，郭嵩焘一行自上海启程，前往英国建立中国驻使馆。本来，建馆的工作并未请赫德帮助。为此，赫德不高兴地说[③]：

---

① R.R.Campbell，J.D.Campbell，A Memoir by his son.P.18。

② R .R .Campbell，op. cit.p.19。

③ 142，26 Jan.1876，P.212。

他们想到达后自己安排馆址，因为他们不着急，而且有的是钱。我们别庸人自扰了，等他们来找我们时再说吧。

这番话并不反映赫德的真实思想。他虽然在表面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实际上一直极力关心此事，后来终于设法将在伦敦设馆的工作揽到自己手中。他详细函示金登干“全力帮助（郭嵩焘）尽快找到一套好房子”，并强调一定要在中国使团到达之前安排就绪。就连使馆的家具、洋仆、房间安排等具体细节，赫德都一一予以叮嘱。金登干的工作亦很迅速。在郭郭嵩焘使团航至印度时，就接到了金的电报，报告已在伦敦新城东南租定房屋一所，“需用器具一切皆备”。中国驻法使馆也由金登干“代觅居止”。

赫、金的帮助显然是有效果的。郭嵩焘到达伦敦的第一天晚上，就去看望了金登干，并且一直谈到深夜①。

2. 经费

清季正式遣使建立驻外使馆的经费，是在充裕可靠的海关税收中提用的，“俾得运转自如，不致贻误使事”②。郭嵩焘率团前往欧洲的船票、旅途费用，伦敦设馆费用等，由赫德指示江海关税务司吉罗福体协助提供。使团随员赡养家属的银两，也由吉罗福按月从随员薪金中领取，分别寄送③。此后逐渐形成制度，所有各海关“所收六成洋税，作为十成分算，即于此十成中每关每结酌给一成，另款存储，听候指拨”，将此作为专门的出使经费④，先行解交江海关收存，再由江海关直接按年汇往驻各国使馆⑤。外交人员赴任的车船票由海关代购⑥。出使各国人员的留支安家银两，也由赫德按月先行垫付，以后再从出使经费项下照数拨还⑦。海关税收负担中国驻外使馆经费的制度，直到民国都没有改变。

3. 推荐使馆译员

为了更好地参与控制中国驻外使馆的各项事务，赫德挖空心思地寻找机会在使馆安插他的亲信。他强调说，如果要从海关抽调使馆译员，“必须要由总税务司决定人选”。在郭嵩焘尚未启程之前，他就极力推荐英籍海关职员屠迈伦担任驻英使馆的翻译。但由于李鸿章不愿听任赫德四处插手，遂从中阻拦，使清政府任命了李所信任的英国人马格里任译员。英国驻华使馆的一些人闻讯后

① R .R .Campbell，op. Cit.p.27。
② 《通商汇章成案汇编》，卷3，第3页。
③ 外务部档，第0867号；Origin.vol.6，Pp.462–463。
④ Origin.vol.6，Pp.465。
⑤ 《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18，第2–3页；《通商汇章成案汇编》，卷2，第2–3页。
⑥ 总理衙门清档，第50册。
⑦ 总理衙门清档，第51，274，275册；外务部档，第0870、0867号；经济所藏题本，第320册，出使经费（英、法），第6页。

暗自庆幸，他们对赫德日益增长的权势也心怀忌妒，因而将这一决定看成是“对赫德政治野心的一种抑制”[①]。

赫德对此满腔怨恨。因为这不仅使他在清政府方面碰了壁，更使他在英国人面前丢了脸。他决心“先发制人”，一方面防止郭嵩焘被英国外交部的某些人或威妥玛（此人正在英国）控制，另一方面“更要防止海关以外与使馆有关的外国雇员势力的增长”。他背着清政府授权金登干立即行动，让屠迈伦等人直接去见郭嵩焘，并设法将屠留在郭的身边，尽心照顾他各方面的生活，以免这位中国使臣被他人控制。为此他专门批给了活动经费。屠迈伦等人进入中国驻英使馆后，其薪金也一直由海关办事处支付。赫德在给金登干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说[②]：

> 由于郭嵩焘可能害怕我们干涉他的事情，不要让屠迈伦对他太明显了……更不要过分炫耀地帮助他做各种事情。

只有这样，才可以使郭嵩焘逐渐感到海关职员对其有用，而李鸿章派来的人对其无用。赫德反复叮咛“要悄悄干，不要暴露出这是你的目标”[③]。他的这一手腕确实对郭嵩焘产生了影响。郭在日记中称赞金登干等海关职员“论事粗练有识，西洋人才实盛”，而李鸿章派来的马格里却是“可与言学而断不可与办事”[④]。后来赫德为了“让郭嵩焘更多地了解我们（海关）的人”，又给中国使馆物色了两位海关职员哲幕森和贺壁理前去协助工作[⑤]。他说[⑥]：

> 我很高兴地了解到郭（嵩焘）正逐渐转向我们的人。但我正犹豫是否让屠迈伦再待一年，或命令他四月期满退出。我认为最好让他退出，由哲慕森明年代替他的位置。记住，假如我命令他出来，他必须要出来，不能让郭阻挡他……

中国驻德使馆建立后，赫德电令金登干推荐曾幼居德国读书的英国人博郎担任公使刘锡鸿的译员[⑦]，以此让刘知道“我们（赫德等）是他的好朋友”[⑧]。他担心刘锡鸿会受到德籍海关税务司康

---

① R .R .Campbell，op. Cit.p.27。

② I.G.in Peking，letter 185，2 Nov.1877，P.254；D.C.Boulger，The Life of Sir H.Macartney,P259。

③ I.G.in Peking，letter 166，25 Jan.1877，p.235。

④ （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75页。

⑤ I.G.in Peking，letter 181，30 Aug.1877，p.248。

⑥ Ibid,letter 184,25 Oct.1877，p.251。

⑦ 《驻德使馆档案抄》，第13页；《总署奏底汇订》，第2册；（清）刘锡鸿：《英轺私记》，第140页。

⑧ I.G.in Peking，letter 180，5 Aug.1877，p.247。

发达的左右，认为康氏“肯定会给刘带来麻烦”，“要特别防备”[①]。他安插博郎到中国驻德使馆的目的即在于此[②]。赫德对于博郎的工作十分关注，他在一封信中说[③]：

> 我认为博郎为刘做得太多了，看起来太像他私人的信函开始可以这样做，但这不是我想让他占据的位置，关于这一点，我会寄上一份备忘录的！

在赫德的精心遥控下，博郎逐渐获得了中国出使大臣的信任[④]。

四、直接插手中国使馆事务

赫德对驻英公使郭嵩焘十分赞赏和尊重，但他“并没有忘记这位使臣毕竟是中国人”[⑤]。一方面，他赞扬郭嵩焘“博学、能干、善于处理问题、思想正派”[⑥]，并告诉金登干“你可以为我所有朋友做的事情，也可以为他做”。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命令金登干“无论如何不要听他（郭嵩焘）的指挥”[⑦]。作为中国政府属下的雇员，竟然可以不听从中国政府全权代表的指挥，这显然违背了赫德自己翻译引进的有关驻外使馆权利和义务的国际法准则。

不仅如此，赫德还利用晚清使馆对海关经费的依赖以及他安插在使馆的亲信，不断直接插手中国驻外使馆的具体事务。海关驻外办事处除定期探听使馆消息外，还经常越俎代庖，多方包揽了许多按其性质应由中国使馆办理的事务，如为北洋海军采购军舰、军械，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接送中国外交人员，筹备参加1897年英国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活动及1902年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等等，甚至几次越过中国使馆，代表清政府与外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金登干的儿子曾得意扬扬地说，早期中国公使如无金登干等人的帮助，很难办成任何重要的事情[⑧]。

在购买船炮问题上，上19世纪70年代初，赫德便利用中国欲建北洋水师之机，命令金登干在英国为中国海军购买船炮[⑨]。中国使馆建立后，这一工作已成为出使大臣的重要职责之一[⑩]，照理赫

---

① Ibid,letter 181,30 Aug.1877，p.248。
② Ibid,letter 184,25 Oct.1877，p.251。
③ Ibid,letter 184,2 Nov 1877，p.254。
④ Ibid,letter 184,2 Nov 1877，p.254。
⑤ 王曾才：《清季外交史料论集》，第108页。
⑥ I.G.in Peking，letter 150，12 May.1876，p.220。
⑦ I.G.in Peking，letter 155，9 Nov.1876，p.225。
⑧ R .R .Campbell，op. Cit.p.28–29。
⑨ 外务部档，第4500号。
⑩ 严和平：《清季驻外使馆的建立》，第234–238页 。

德可以不再插手。但他仍然经常地参与其事。赫德多次密示金登干[①]：

（购买船炮之事）只限你自己干，我不想让郭嵩焘、日意格或李凤苞等人去干预此事。

李凤苞是第二任驻德公使，他在购买船炮问题与赫德意见不同。赫德对此耿耿于怀，骂他是李鸿章的“奴隶”[②]，并叮嘱金登干“不要让他（李凤苞）所做的一切损坏你的名誉，也不许他干涉我们的事情”[③]。

在驻外使馆文件传递方面，早在19世纪60年代海关就开始兼办递送各驻华使馆的文件及其他公私信件。后来总理衙门寄送中国驻外使馆的各种邮件（包括图书、敕书、条约、咨文、关防等）也交由赫德经手，从津海关和江海关通过外国海轮代寄[④]。赫德回国时亦曾亲自携带国书转交中国驻外使馆[⑤]。中外电信联络开通不久，清政府与驻各国使馆的电信往来均要经过赫德和金登干转递代理，如郭嵩焘、刘锡鸿等始建驻英、驻德使馆时都是如此[⑥]。对赫德来说，中国驻外使馆的各种大小事务，他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也反映出清朝统治阶级对赫德的信任和依赖已经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他们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中将自己的命运越来越紧地系在西方列强及其代理人的身上，从而使遣使设馆这一平等的国际交往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半殖民地外交的阴影，从而无法在中国从衰弱走向富强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在许多方面却牺牲了自身的利益和目标。

京师同文馆与近代外交人才的培养

京师同文馆是清政府设立的旨在培养外交人才的新式外国语学校，在中国近代外交史、洋务运动史及教育史上均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赫德长期作为同文馆的支持者和“监察官”，对该校的发展起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赫德与京师同文馆的关系，不仅可以进一步揭示这所新式学校的成败得失，对于深入理解西方资产阶级在文化、教育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和渗透，也是有所帮助的。

---

① I.G.in Peking，letter 219，24 Aug.1878，p.279 。

② Ibid,letter 332,11 Jnue .1881，p.375。

③ Ibid,letter 253,12 Aug.1879，p.299。

④ 总理衙门清档，第121、123、253册；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126页；《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39页；《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52页。

⑤（清）张德彝：《随使英俄记》，第539页。

⑥（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267、292、334、494、498页；《驻德使馆档案抄》，第140页。

一、同文馆的初期建设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外交涉谈判往来不断，但居间传译者一般都是其他国家的人员，“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与文字之人”①，从而使清政府的对外交涉长期处于被动地位。恭亲王为此曾感叹地说②：

> 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

早在1859年，郭嵩焘就曾提出“请广求谙通夷语人才折”。在这篇奏折中，他不仅分析了学习外国语言的重要性，并且还提出了具体的教学方法③。冯桂芬也曾提出建议，认为应在上海、广州各设一翻译公所，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并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西学的工具④。

西方列强也不断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采取措施，培养适应与西方国家交往的外交人员。1856年6月，中美签订《天津条约》时，美国公使列卫廉在给桂良等人的照会中，首先便是建议学习外国语文⑤。同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更十分明确地规定⑥：

> 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辞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在这种内外压力之下，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决定设馆挑选学生教授外文，以培养“通晓外国情形之人”，“为他日备访通翻译地步”。1862年6月，正式成立京师同文馆，亦称“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⑦。

当赫德于1861年年初访北京，从恭亲王和文祥处获悉将要筹建培养外交人才的京师同文馆，马上就为他“潜在的希望”所吸引。在他常驻北京后，更是满腔热情地为加强和发展这所新建的学校出谋划策。在他看来，同文馆无疑将成为推动中国接受西方外交制度，从而进一步向西方开发的主要跳板⑧。

---

①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3，第11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7，总第2679页。
③ 《四国新档·英国档》下，第885页。
④ 《戊戌变法》，第1册，第27–28页。
⑤ 《中美关系史料》，第1册，第305页。
⑥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卷1，第102页。
⑦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5，第33页；卷26，第6页。
⑧ S.Wright，Hart and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p.325。

首先，赫德认为，正是由于中国人对西方无所了解，因而反对向西方开发的势力才极为强大，整个社会“都密布着排外的思想”①。他估计，“在一万个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了解外国人，在十万个中国人中没有一个懂得西方的文明和发现，在一百万个中国人中没有一个认识西方在文明社会的地位或者在器械方面有任何的优越之处”②。清政府各级官员绝大多数对西方也一无所知，少数官员只是一知半解，真正懂得西方知识的犹如凤毛麟角，而且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准备勇敢地投身于这种进步的事业，承担起即使是一种微弱的首创的后果”③。

鉴于这种状况，赫德提出：“要在中国这一疆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土上进行风俗习惯和机构上重大改革的进步，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他迫切希望通过京师同文馆采用新的教育方式，逐渐消除清朝官员对西方的盲目无知，培养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兴趣，使西方文化“改变未来中国人思想与感情的内涵和倾向，促使中国真正进入国际生活的领域”④。

其次，赫德从西方资产阶级在华利益的需要出发，也期待着同文馆能够造就适应西方文明并按照西方列强意志办事的外交人才。他在1868年曾说过这样一段话⑤：

> 中国可能在半个多世纪内要求外国人在我们现在所担任的职位上服务；但是期望这种状况永远继续存在下去，则是很可笑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或远或近，或早或晚，我们的后继者都将依次被中国人所替代。如果预料到这种前景，我设想我们对中国政府和缔约国负有尽我们所能地培养一批适于继承我们的中国人的义务，然而这部分是否可以期望从现在的学习语言的人们中找到，或者是否很有可能从同文馆中产生（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时间将会予以证明。

这段论述对于考察赫德与同文馆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它毫无掩饰地暴露了赫德全力支持同文馆的真实意图。教育目的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依据，也是教育活动的归宿；它对教育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的确立以及教育方法的选择都有决定的意义。显然，赫德将京师同文馆看作是加强对华扩张和影响的工具，试图以传播西方知识为媒介，影响和渗透整个帝国官僚阶层，指导他们有效地改变清政府的决策体系，接受现有国际条件下的基本关系，从而使中国稳定地按照西方人所认为的“进步”方向发展⑥。可以说，这也使同文馆创设伊始就深深打上半殖民化的烙印。

---

①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2，第260页。
② A.D.P.P.p96。
③ Origin.vol.6，Pp.296–297。
④ Robert Hart,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p.54。
⑤ Origin.vol.1，Pp.96。
⑥ K.Biggerstaff，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 p.108.

赫德早期对于同文馆的支持和帮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京师同文馆开办初期，因清政府部库支绌，无款动支，其办学经费只能提取南北各海关外国所纳船钞的三成。船钞以前是“向不解部”的，仅用于各关修建塔表望楼及其他办公费用①。海关对京师同文馆的财政支持，显然与当时担任署理总税务司的赫德的态度有关。这些应解的三成船钞银两。由各关按期拨出，交各口税务司汇呈总税务司，然后递送总理衙门。“所有中外教习俸银，以及生徒桌饭、苏拉工食、修理房屋、治备器具等项，无不立需此款支发，望之甚殷。”②

其次，在赫德的影响和建议下，京师同文馆自1866年开始增设天文算学馆（亦称“新同文馆”），招收满、汉举人，恩、拔、副、岁、优贡生等所谓“正途人员”入馆学习，并延聘西人教习③。由此引起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剧烈的心理冲突和意识冲突。最后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击败了反对添设新馆的顽固派④。天文算学馆的设立，标志着对“空疏无用”的传统封建教育的大胆批判，使同文馆在办学方向和体制上发生了重要转折，成为在教育制度方面建设、采用近代西学的先驱。这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要求学习西方、自强图存的进步潮流。

再次，赫德于1866年请假回国时，答应总理衙门帮助同文馆代聘称职的西方教习。他还向清政府建议酌派同文馆学生随往英国，“一览该国风土人情”⑤。这是清政府官僚和同文馆学生访问西方各国的初始。赫德回国后，聘请英、法等国的化学、天文、算学、法文、英文和军事诸教习⑥。他为这些洋教习买好房子，使他们搬入新居，并在公务之余与他们一起讨论各门课程的教学安排及五年教学计划⑦。他甚至还参加同文馆的各种考试，并“会同阅看”试卷⑧。

虽然赫德对同文馆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由于朝野封建守旧势力的攻击和阻挠，加上清政府某些官员的腐败无能，京师同文馆开办不久即陷入深深的困境。原先以“训课汉文，兼司稽察”而设置的汉教习无人前来报考，经过几次修改旧章，也只有一人“赴部验到”，以致“员缺悬待”⑨。不仅学生寥寥可数，外国教习也甚缺乏，只好都“归并训课”，并增加了洋教习的薪金⑩。赫德的

---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8，第31页。

② 外务部档，第5036号。

③ Origin.vol.7，Pp.220–22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4页；卷47，第15–16页；卷48，第1页；卷49，第13–24页。

④ Origin.vol.7，Pp.220–22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4页；卷47，第15–16页；卷48，第1页；卷49，第13–24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第3–4页；卷39，第1–2页。

⑥ W .A .P .Martin，A Cycle of Cathay，P .303；Origin，Vol .7，P .224；K.Biggerstaff，op.alt.P .120.

⑦ R .R .Campbell，J.D.Campbell：A Memoir by his Son，PP 12–13。

⑧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7，第31页。

⑨ 外务部档，第5036号。

⑩ 洋务档，同文馆类，第0088号。

亲信金登干在日记中写道："整个来说，学校（同文馆）的开端并不好。"[①]赫德聘来的英文教习额布连曾对赫德申述过这一情况，他还在《北华捷报》上撰文，认为京师同文馆已经"名存实亡"[②]。赫德对同文馆的工作亦十分不满，他担心这样下去"恐怕同文馆将会失效"[③]。

不过，赫德的办学信念并未因此而淡漠。因为此时促使清政府接受西方影响的大门既然已经打开，他期望确保京师同文馆在他的整个目标中占有一个适当的位置。虽然海关中更为重要的外交涉事项使他不可能抽出许多时间亲自管理同文馆，但他仍然满怀信心地鼓励他的挚友、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出来主持同文馆馆务，共同对同文馆进行一番根本的整顿[④]。经赫德推荐，总理衙门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并举行了正式的就职礼[⑤]。从此，开始了赫、丁二人共同控制、改造京师同文馆长达20余年的历史。

二、赫德对同文馆的改造与扶持

赫德、丁韪良接管京师同文馆后，首先对其领导体制进行改革改变了同文馆管理的根本制度。

作为清朝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附属学校，由总理衙门集体会商、联衔具奏、共同管理，事无大小，悉行奏陈，对许多具体教学也过多干涉，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同文馆的正常教学。这一做法引起外国教习的极大不满，他们将之视为同文馆教学不彰的重要原因。对此，赫德按照海关模式对其组织结构进行了变革。总理衙门对同文馆的领导虽然仍然透过同文馆管理大臣具体负责，但绝大部分管理大臣已都成为兼职，有的甚至身兼数职。以前为管理大臣专门支出薪金的制度也被取消[⑥]。他们对于各项馆务的决策已经没有什么特殊的职权，仅仅主持一些例行事务[⑦]。而且，在同文馆建立的40年中，只有14年派有管理大臣[⑧]。此外，总理衙门还派有正提调官、帮提调等，主要由帮提调在馆专门管理"所有馆务"[⑨]。但从大量档案资料来看，他们主要负责对同文馆教习和学生的管理和稽查，在他们的报告中毫无提及诸如占同文馆教习半数以上的洋教习的管理以及课程设置、教学安排等重大问题。这些工作都由赫德以监察官的身份、丁韪良以总教习的身份共同全面负责。

现在尚未查检出赫德出任同文馆监察官的最早官方文献。1879年第一次《同文馆题名录》已列

① R .R .Campbell，op, cit，P.12。
② North-China Herald，Jan.25，1870。
③ I .G.in Peking，letter 4。
④ W .A.P.Martin, op .cit.P.241；K.Biggerstaff,op.cit.P.124
⑤ W .A.P.Martin, op .cit.Pp.293–294
⑥ 洋务档，同文馆类，第0069号。
⑦ （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光绪23年7月26日。
⑧ 苏精：《同文馆及其师生》，第19页。
⑨ 《同文馆章程及续增条规》，第7–8页。

有“监察官、布政使衔、总税务司赫德”。其实早在1871年3月赫德在一封信中已经提到[①]：

> 我对同文馆的作用（同海关总税务司）一样无疑其有相同的权力。我是指像总理衙门公文和上谕所说的那样，可以行使明确的、无可争辩的权力。

赫德极有可能是在1871年根据某一上谕出任监察官的。很明显，这正是赫德着意要达到的目的。从此，除汉教习、学生以及教辅人员仍受清政府管理之外，所有外国教习及其教学、教导行政业务、财务管理等活动都由赫德、丁韪良操纵，许多都不必经过请旨办理的程序，所以以后各种官方档案中很少发现有关同文馆的详细记载。虽然“监察官”的职权无明文可考，但赫德对京师同文馆的影响决不限于财政一项，而是包括了各种教学业务和行政业务，其作用也始终不逊于总教习。丁韪良曾经说过，“确切地讲，他（赫德）是这一学堂的父亲，人只是个保姆而已”[②]。

一、对于洋教习来说，赫德握有决定的权力。他说：“洋教习应当听我的命令（即总税务司的）。”[③]旧教习离开时，时护后任不许推荐。由外国新到人员，亦不许直接来谋教习之职，必须由总税务司推荐。所以每逢一位教习离职，总署就通知总税务司，请其介绍新人。倘其时恰无新人，则同文馆就得等几天。京师同文馆非兼任洋教习共27名，其中四人原是传教士，五人后一来进入海关工作，其余人都是海关现职职员，由赫德指派教习。因而这种隶属关系是十分明显的。有人曾说过：“总理衙门对这些教习，可以说没有发言权。”每届截考之年，洋教习的功课勤惰；如何奖惩，都由赫德与丁韪良商量“酌拟章程”，然后再由总理衙门查核办理[④]。最可注意的是，自1868年起，所有外国教习的薪金不再由船钞同文馆项下支出，而“均系由总税务司赫德经手”，“在各关留出之四成罚款项下，按季支给”[⑤]。洋教习的待遇互有轩轾，统归赫德掌握，就连总教习丁韪良的薪金也要他来决定是否增加[⑥]。他利用这一手段，将同文馆主要教学人员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二、专门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学校设施的完善和扩大，都要由不断拨付资金来保证。京师同文馆的经费一直由赫德主持下的海关供给。各海关在奏报每年收支船钞款项时，都列有同文认专

---

① I.G. in Peking, letter 23, 15 March, 1871, p64.但根据司马富教授的研究，赫德曾于1868年1月22日接到过总理衙门的札文，命他负责同文馆并承担责任。但他并未透露这篇札文的详细内容，也未说明1868年的任命与1871年任命的区别。见司马富《赫德与中国早期近代化》（1862—1874），邱克译，原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② W .A .P .Martin，op.cit，P.295.

③ I .G .in Peking，letter 97，12June，1874；p.162.

④ （清）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纂》，卷230，学校18，学堂类。

⑤ 洋务档，同文馆类，第0088号。

⑥ I.G. in Peking, letters 97,309,487,pp97,351,557。

项。总理衙门的部分费用，也从这部分船钞中支出[①]。但同文馆的开支所占比例较大，而且逐年增加。开始每年只有数一千两，到1898年后每年约为5万两[②]，其中不包括养教习的巨额薪金以及奏派同文馆学生到各驻外使馆学习"语言、文字、算法"的所有费用[③]。由于海关税收的迅速、稳定增长，赫德可以向京师同文馆提供充足的物质和财政帮助。用丁韪良的话说，在他任总教习的25年间，赫德对同文馆一直"尽心尽职，从未改变"[④]。

三、教学过程的完善，不能缺少新的教学技术手段。增设教学设施也是赫德支持同文馆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文馆所需的许多教学仪器同设备都是赫德通过海关驻外办事处从国外购置的。1873年，在赫德的支持下，同文馆花费2,300余两银设立了印书处[⑤]，负责印刷同文馆教材和总理衙门文件，改变了以往依赖美国公理会在京印刷所的状况。其印刷设备除在广州、上海购买外，主要由赫德从英国进口[⑥]。印书处的设立大大加强了同文馆的教学物质基础。1884年同文馆设立观象台（星楼）也与赫德的建议有关。早在1869年赫德就提出过在建立海关气象所之前先建立一个与同文馆有关的观象台的设想[⑦]。1873年，他命令金登干在英国购买邮寄必需的精密仪器和昂贵的设备，并让他征求英国有关科学家的意见[⑧]。他在谈到延聘天文气象专家时说[⑨]：

> 如果我们为此（气象天测所）雇人，我们就不能要业余的；我宁愿要一个气象天测所的职员，或者借调开设（海关）测候所的人，或者是愿意开设（海关）测候所并；愿意以后成为天文学教习和帮助同文馆建立观象台的人。

他要金登干"留意此事，看这样的人是否找得到：一个愿意干一番事业的年轻人——不管他来自哪个国家"。赫德提议建立观象台的目的，当然主要是为配合海关在中国沿海建立气象天测所着想的，而且进展并不顺利。但观象台、天文格物馆、天文化学馆等新设施的建立，无疑还是促进了同文馆的课堂教学。

在赫德和丁韪良共同主持下，京师同文馆顺利地渡过难关，很快就以新的面貌出现。同文馆初设时，总理衙门不得不在俄罗斯馆的旧例中寻找根据，因而毫无生机和新文化可言，仍是一个由封

---

① 洋务档，同文馆类，第0015号。
② 邓实辑：《光绪癸卯政艺丛书》，第186–188页。
③ 《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第18–20页。
④ W .A.P.Martin，op.cit，P.293。
⑤ 军机处录副奏折：财政：关税，第26号。
⑥ I .G .in Peking，letter 85，28 March 1874，p .151。
⑦ Origin.vol.1，Pp.177。
⑧ I .G .in Peking，letter 49，14 March 1873，P P.100–101。
⑨ Ibid，letter 82,24 Feb .1874，P .148。

建官僚把持的腐败机构。这种传统的封建教育模式显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近代对外关系的需要。在赫德的建议和督促下，京师同文馆从议设天文算学馆，到延请丁韪良担任总教习，逐渐“按照泰西大学章法”进行改革，吸收招聘更多的外国教习，建立起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教育体系，确立了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模式。同文馆的变革有力地冲击了陈腐的中国封建教育制度，打开了一扇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窗口，使同文馆成为中国第一所具有近代学校特点的教育机构。1871年3月，赫德兴奋地说[①]：

同文馆的学生已经增加到100人了，正在招聘新式教习， 同文馆终究会成功的。

从教学内容上看，同文馆的课程逐渐有所增多，如外国语文、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以及国际公法和富国策（政治经济学）等多种课程，初步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基本格调。自1872年起，同文馆拟订了“8年课程计划”，开始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章程[②]。其中不少课程已经划分得相当细，有些课程在中国还是首次开设，为中国以后建立近代新学制奠定了基础。1873年，同文馆设立医学和生理讲座，由英人德贞担任教习，赫德说[③]：

（德贞）将为中国建立真正的医学系科奠定基础。学生们正在学习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数学、格致和化学。今年还会来两名新教习，同文馆的发展已经历了艰巨的斗争，迟早它会取得巨大成功的！

赫德还继续帮助丁韪良在国外延聘教习，并制订高薪招聘的计划，安排教习课程[④]。为了提高外国教习的教学水平，他曾遣送一些洋教习回欧洲攻读博士学位，或指定进修同文馆的课程[⑤]。

在教学过程中，赫德鼓励和支持同文馆师生翻译各种西方书籍。据1893年《同文馆题名录》记载，凡有学生参与翻译的西籍占总数60%以上。除西方近代科技书籍之外，外交和国际法方面的译著也不少[⑥]。这些书籍由同文馆印书处印刷装订，不仅供同文馆学生使用，有的还免费分发各级政府官吏，影响较为广泛[⑦]。同文馆一度成为吸收和提倡西方知识的“总机关”[⑧]。赫德十分清楚，

---

① I .G .in Peking，letter 23。

② 《光绪会典》，卷104，第5–11页；C，F .G .Cumming Wandering in China,p.474。

③ I .G .in Peking，letter 27,21 Dec.1871 P.71。

④ Ibid，letter 97 and 309，Pp.162, 351。

⑤ Ibid，letter 788，14 Sep .1890，P.811。

⑥ 《洋务运动》，册2，第87–89页。

⑦ W .A .P .Martin, op.cit.P.320。

⑧ 刘熊祥：《清季四十年外交与海防》，第11页 。

同文馆出版的书籍及其他活动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会进一步改变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观念并加强对中国官宦仕途的影响。他亲自选择、组译并出版了介绍西方史地文化和自然科学的《西学启蒙丛书》，在清廷王公大臣中广为散发，甚至还呈送光绪皇帝，以充分发挥它们的"启蒙"作用。为了提高这套丛书的知名度，赫德特意嘱请李鸿章、曾纪泽等人作序。李鸿章在序中称赞"赫君之盛心"与翻译者的妙笔"并足不朽矣"，对赫德的"用意殷肫"给予很高的评价①。赫德对这套丛书的出版也深感满意。当他听到今后科举考试也要加入算学科目、其试卷都要送到总理衙门交由同文馆核阅批分的消息时，更是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他说②：

新的曙光确实正在破晓，二十年的工作并没有白干！

应该承认，赫德整顿、改造过的京师同文馆确实为清政府培养了一批翻译和外交人才。同文馆学生在学习期间就开始参加一些外交实践。由于总理衙门对外交涉的需要，经常调同文馆学生担任口译，或译缮来往电报、或翻译新闻报刊中的国际时事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往洋员翻译任意把持的局面。光绪以后，清政府开始向外国派驻使馆，同文馆逐渐被视为"培养使才重地"。中国最早几个驻外使馆的翻译官绝大部分都是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后来一些同文馆学生又逐渐升任领事、参赞以至公使，或在国内中央、地方政府负责外交事务③。1892年，赫德最欣赏的一位学生汪凤藻正式担任驻日公使。这是同文馆创建30年来，第一次获得钦差出使大臣高位的学生。汪凤藻在同文馆的英语成绩最佳，但他把这次擢升"归之于他所取得的翰林地位，而不是英文"，这使赫德十分失望④，光绪末年出任驻英公使的张德彝也是赫德比较器重的一个学生。赫德虽然觉得他并非能干，但毕竟"文雅友善"。他很高兴张德彝得到赏识，因为"这将是对同文馆的赏识"⑤。截至宣统三年，共有13名同文馆学生担任过驻外公使，占该时期全部驻外使臣人数的24%。1915年有人甚至指出"近今吾华使东内各国全权公使十居其五"为同文馆学生⑥。

赫德在京师同文馆的发展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否认的事实。丁韪良曾经这样写道⑦：

① 《万国公报》，第5册，第3页（1889年6月）。
② I.G. in Peking, letter 664，2 Sep.1888,p.717。
③ 外务部档，第5034号。
④ I .G .in Peking，letter 847，17 July，1892，p.894。
⑤ Ibid，letter 1219，20 Oct.1901，p.1286。
⑥ 《京师同文馆学友会第一次报告书》，民国4年10月毕桂芳序。
⑦ Origin， Vol.7，P.219。

> 当赫德就任海关总税务司时，同文馆已经诞生了。但这个婴儿如此羸弱，如不进行某种人工呼吸，它将无法生存。赫德准确判断了它的潜能，他不仅给予赞助，还为其发展制定出远大的规划。幸而有他的庇护，同文馆才能从一星萤火发展成为一座灯塔。

赫德病逝后，清廷在褒扬他的谕旨中也将“设同文馆”列为赫德供职中国“深资赞助”的重大功绩之一[①]。

从外交史上来看，在近代多元化的国际关系中，对外交往的发展速度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近代外交知识的积累和有效运用，取决于专门人才的数量、构成、知识水平和创造才能。专门人才的培养，不仅是近代外交的必要条件，也是促进外交进步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赫德多次提出兴办外交人员的科学教育，密切注意日本在这一领域的动向并及时通报清政府，尤其是在改革京师同文馆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对加速中国近代外交的变革和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多少改变了中国在外交上完全受外国人愚弄的尴尬局面。接受西方知识的新一代外交人才逐渐取代了一班昏聩懵懂的满汉官僚在外交界的地位。一些人在接受了洋教习传播的西学之后，并没有充当他们的代理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做斗争，并使得清政府逐渐不再完全依赖外国“客卿”的挟持和“扶助”[②]。这是赫德、丁韪良等人始料不及的，也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违背的。

三、京师同文馆的评价

尽管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新式学校，首次对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对加强中外往来、了解西方起到了有益的作用。赫德、丁韪良作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也确实具有希望清王朝能按照其要求“理解”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善意，客观上如同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促进了这种反应的加快。但总的来说，西方列强借同文馆对中国进行渗透以促其向进一步半殖民地化演变的目的是很明确的。他们密切注视着京师同文馆的发展，认为“整个文明世界都同它（同文馆）的成败利害攸关”。他们希望在中国用西方知识培养出一大批“不仅通晓近代科学，而且具有科名的人，以充实地方官衙，出任督抚，也许最终成为部院大臣”[③]的崇外势力。西方驻华公使和政治家们纷纷以推荐教习、馈赠图书、谷种、或参观访问、发表演说等方式表示对同文馆“热情”的支持，以施加自己的影响[④]。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同文馆的所有人员都受到

① 税务处档，第2号。

② ［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3，第433–434页 。

③ M.C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a’s Conservatism：The Tung-chip Restoration，1862–1874，P.247。

④ 洋务档，同文馆类，第 0122号；经济所藏题本“总署及同文馆经费”第二册，第109页；W .A.P.Martin，op.cit. P.297 。

外国使馆的严密保护，并同各国驻军一起在使馆区“轮流日夜守更”[①]。因此，京师同文馆建馆伊始，就具有一种独特的国际性质和复杂的政治背景。赫德长期支持、赞助同文馆，也怀着培养“适于继承我们的中国人”[②]的动机。因而，他只能对同文馆进行部分改革和整顿，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及封建教育的实质性内容，更不可能由此改革清王朝的整个官吏制度[③]。京师同文馆虽然已有不少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形式，却并不具备资产阶级新教育的灵魂，而封建官衙学校的性质一直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京师同文馆曾一度成为吸收、引进西方文化的“总机关”，但毕竟以造就翻译人才为主，“虽亦有天、算、医、农诸科，率皆浅近初级，未足以语专门”[④]，这样的培养结构使同文馆始终不能形成培植技术人才的专门教育，而一直停留在基础性教育水平上。

即就培养外交人才而言，京师同文馆设置了公法、富国策等课程，但并未规定必修若干课程，所以学生选修西学的总共才有半数左右，对于有限的西学知识也是生吞活剥而不能真正消化的。就连与学生将来工作最有关系的“公法”课，选修者亦寥寥可数。1879年和1888年参加考试的只有八九人，1893年仅有十二人，不到参加英文大考人数的1/4。1898年的大考甚至干脆取消了“公法”一科[⑤]。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京师同文馆开办40余年，“未尝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间”[⑥]。既没有造就出在政界和外交界做出杰出贡献的领袖，也没有涌现出有资格影响社会思想并真正通晓西学的人物。京师同文馆这棵西学的幼苗，插在排斥它的封建主义土壤里，被顽固守旧的气氛笼罩着，自然无法长成郁郁葱葱的大树，结出繁茂硕大的果实，只能维系着一种既不成熟、又难以继续成长的畸形幼芽状态。

京师同文馆的一些学生虽然成为公使或其他较高的外交官员，但由于晚清没有建立职业外交官的人事制度，出使大臣对随员可以自由选派，所以自1879—1898年间，中国驻外使馆增加了近一倍，而京师同文馆毕业的随员仅增加了两三人[⑦]。整个说来，他们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有限的。他们并不能参与清政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的制定，更不可能改变清廷依附帝国主义的既定卖国政策。相反，他们只能执行清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实行半殖民地外交。

赫德之所以全力帮助同文馆，甚至连他最讨厌的同文馆师生的年终会餐都要参加，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将同文馆与他直接管辖的海关紧密联系在一起。自1888年起，海关各种出版物都将

---

① Robert Hart，op.cit.Pp.13–14。
② Origin， Vol.1，P.96。
③ W .A .P .Martin，op.cit.P .327。
④ 外务部档，第5017号 。
⑤ K.Biggerstaff，op.cit.P.129。
⑥ 梁启超：《钦冰室合集》文集，册1，第61–64页。
⑦ 参见严和平：《清季驻外使馆的建立》，第177–186页。

京师同文馆列入海关的教育股[①]。赫德早期确曾考虑过在同文馆学生中培养未来接管海关的中国人员[②]。部分清朝官员也曾迫切希望[③]：

> （派遣）同文馆熟习外国语言文字者发往海关，学习税务，俟事理通达，即予以税务司之任。庶各关税务司一缺，亦不致专为洋人所占矣。

但为确保帝国主义对海关的统治，赫德认为中国人尽管具有适于充任海关官员的能力和经验，却并不兼备“各种必要的品质”，“在本质上不利于他们获得信任的地位”[④]。因而同文馆并未给海关培养什么人才，但同文馆的一些建置（如观象台）和师资却同海关有关系。一些新招聘的海关洋员，一般先派到京师同文馆任教习，目的是学习中文，俟中文熟谙后即被派往海关当差，“这几乎是定例”[⑤]。当同文馆教习偶有缺处，补充又较为困难时，赫德就从海关派员暂时代理。这样不少洋教习难免存在着浓厚的应付思想，对学生也缺乏责任感。有人指责同文馆洋教习“非传教来华之神甫，即海关退出之废员，以至素质低落，学无专长”[⑥]。这种评价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赫德在招聘洋教习时就说明了这是一种类似于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目的是在语言方面给予一般学童以所能接受的基础教育[⑦]。同文馆前后到职的50余名洋教习中，大学毕业的只有19人，占38%。所以，丁韪良将京师同文馆视为“一所学院”，甚至“一所大学”[⑧]，这是毫无根据的。

对赫德来说，他最为关心的并不是同文馆教学程度的提高，而是怎样保住他对这所学校的控制权。这不仅关系到他在中国官场上的地位，也直接影响着他一生主要目标的实现。1894—1895年，丁韪良退休离开北京后，英、法两国对同文馆领导权的争夺十分激烈。法国公使施阿兰四处活动，企图让法文教习华必乐担任同文馆总教习，使法国得以控制中国的教育权。赫德也亲自出马，到处散布华必乐“根本不适合作总教习”[⑨]，极力向总理衙门推荐他的亲信、海关职员，爱尔兰人欧礼斐担任总教习，这样他依然可以把持京师同文馆的大权[⑩]。

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译学馆”，正式脱离了与海关的联系。赫德马上

---

① 黄序鹤：《海关通志》第10页言：“教育股者，即同文馆是也。”

② Origin，Vol.1，P.96。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19–20页。

④ Origin，Vol.1，P，97。

⑤ 《齐如山自传》，《中国一周》，第239期，第22页；I .G .in Peking，letter 82，P.148。

⑥ （清）朱朋寿：《光绪朝东华录》，光绪28年2月丁卯；（清）于宝轩：《皇朝蓄艾文编》，卷14.第24–25页。

⑦ I .G .in Peking，letter 309.14 Dec.1880，P.351。

⑧ W .A .P.Marti.n，op.cit.P .318。

⑨ I .G .in Peking，letter 1151，19 Nov.1899，P .1207。

⑩ Ibid，letter 988，15 Sept.I895，P.1033。

预感到，他和洋教习在京师同文馆旧日的地位“将会丧失”①。果然，在张百熙担任管学大臣之后不久，由于不满外国教习对中国教育的干预和控制，遂以学校经费困难为由，解聘了所有的西方国家的教习。赫德得知此事后，气急败坏地说：“这不啻是将时针往回拨了！”②显然，这里所说的“往回拨”，并不是指中国拒绝西方先进文化的输入，而是特指赫德等人对中国教育主权的控制遇到中国官员的抵制和反抗。这虽然不符合赫德在京师同文馆几十年活动的主观动机和目的，却是长期以来中华民族日益觉醒的必然结果。

结语：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赫德的历史作用

赫德来华之时，西方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已经奠定了中西关系的主要法律基础。不管清朝统治阶级主观上怎样认为，中国事实上已经加入至少在理论上所有成员都一律平等的网际关系体系之中。过去那种建立在封建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及朝礼仪极其片面设想的朝贡外交的模式已无法继续存在。为此，清政府成立专门对外交涉机构——总理衙门，中外官吏往来采用平等礼仪，不能公开使用带侮辱性的“夷”字，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建立使馆。这标志着中国传统外交“穷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的根基受到了致命冲击。一种同西方各国新的经常性的外交关系正在开始得到发展。

大约50年后，当赫德准备离开中国时，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的交往关系和相互作用关系呈现出更加纷纭杂乱的图像，构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最主要内容。赫德所参与的西方资产阶级逼迫、诱使中国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活动，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关系和不平等关系，压抑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褫夺了中国独立自主的权利，在经济剥削和掠夺中伴随着对中国人民的屈辱性的政治压迫和统治；另一方面，则通过将西方近代外交的某些思想和制度移植到中国，使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和驻外使节的眼睛去观察外面的事物”③，接触和了解了西方国际关系的法律和实践，扩大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从而也产生了帝国主义不愿见到的后果④。一批批京师同文馆的毕业生和受过英、美资本主义教育或影响的新型人才逐渐成为清政府各种涉外部门的主要骨干，中国驻外使领亦开始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质，这样就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一股具有一定民族意识、力图

---

① Ibid，letter 1231，12 Jan.1902，P.1300。

② Ibid，letter 123，8 March，1902，P.1305。

③ R.Hart，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p.3。

④ I .G .in Peking，letter 994，3 Nov.1895，P.1039。

谋求在近代国际关系中寻找出路的新兴力量[①]。他们所进行的某些旨在摆脱外人操纵控制的改革，虽然未能挽救清王朝灭亡的命运，但却代表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国人治中国的时代发展趋势”。如果说，中国过去在强权面前的屈从是西方能够认可的唯一“理性”选择的话，那么，此时中国迫切需要的则是尽快摆脱长期遭受的封建束缚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污辱、奴役，从而成为真正平等和独立的民族。“用睡眠来作譬喻，它已睡了很久，现在终于醒过来了，它的每一个成员正在激起中国人的感情：‘中国是中国人的，外国人滚出去。’[②]”

赫德承认，所有这一切都是西方资产阶级侵华行为的“合乎逻辑的结果”[③]。他一生的活动虽然一直受着维护中国半殖民地这一主导性动机的支配，但“他自己所具备的特性使他自己最能致力于当时在一般和特殊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社会需要”，而他的行动正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觉过程的自命自由的麦现”[④]。从长期隔绝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宏观角度来观察，不加强中外往来，不了解世界情势，就不可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也就不可能形成推翻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更谈不上争取独立自由和谋求社会进步。况且，中国与西方联系的日益紧密，本身就标志着整个中国传统秩序的逐步瓦解，而赫德及其他西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作所为，使近代中国日益深入地卷入世界市场经济的潮流之中，增加了中国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加速了中国传统封建秩序的瓦解过程。

“依赖”是一个很带争议的名词。西方经济学界有关依赖理论本身有许多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关于什么是决定依赖的基本因素的说法是各不相同的。在近代，频繁的内忧外患使中国既无能力也无可能在国际上形成独树一帜的力量，因而总是需要外在的平衡力量，这是显而易见的。清朝统治者支持赫德对中国政治、经济进行改革，其目的或许是希望最大限度减少中国的依赖程度，但历史事实是中国一步步向西方靠拢，受西方钳制，难以建立本身的独立形象。无论如何，这种依赖关系表明清政府在赫德等人的帮助下开始谋求在国际关系中寻求出路。相比过去那种以自欺欺人的闭关政策抗拒在世界上孤立的冷酷现实、不接受国际交往惯例的做法，清政府对西方的依赖关系似乎不应当简单予以否定。因为这种现象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科学分析，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打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第1571号（胶片45号）；外务部档，第0749，3964，3959号；S .Wright，op.cit，p.819；Pong David et al ed. Ideal and Reality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PP. 221 . 250。

② R.Hart,op,cit，p.52。

③ Ibid，pp.4，7，59。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73页。

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笔者认为，资本扩张造成的世界经济体系必然要求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依赖西方，放弃民族权利，做资本的附庸。同时，资本压迫本身也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运动，从而促进中国社会自身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东进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外压成为促进内部变革因素增长的契机，而伴随西方入侵者传播而至的西方文明不仅仅是西方入侵者所挟以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手段，同时，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借鉴，和中国人民摄取外来文化、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外部因素。正像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所指出的：“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②]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文明的传播方式是否是强制性的，传播者是何人，对中国社会的促进都是巨大的。

二、赫德的阶级性与民族性

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在华势力的代表人物，赫德的阶级性与民族性在本质上和总体方向上是明确无误的，他虽然一再指示他的属下“无论如何都不和他们本国的政府发生关系”[③]，但实际上正像他的亲信贺璧理所指出的，所有在华外国人“都是他们本国政府手中的傀儡”，而且“绝大多数外国人并不隐瞒他们的民族倾向”[④]。赫德也不止一次地宣称：“当然我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⑤]他无疑希望看到英国在华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看到英国在远东势力超过任何国家。他在华50余年的际遇清楚地反映出这一思想轨迹的前后连贯性。归根到底，赫德代表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阶级、民族的向背是他一生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皈依。

当然，赫德的思想并不是英国外交政策的简单重复，他本人也不是完全受英国政府操纵的傀儡。阶级、民族的因素作为赫德外交思想的中轴，其行为规范发展的曲线围绕这一中轴上下波动，有时二者重合，有时也有异向甚至逆向的趋势。

首先，近代中国是各国列强大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进行激烈角逐的场所，赫德必须小心翼翼地注意欧美各国政治气压计上的每一变化，不能过分突出强调英国利益。他有意识地选用其他国家的人员参加海关事务，允许其他列强与英国一起分享控制中国海关的利益。否则，不仅会加剧各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页。

③ Origin， Vol.7，P.83。

④ R .R .Campbell，op.cit，p.86。

⑤ I.G.in Peking，letter 422， 17 June 1883，P.471。

企图染指中国海关所引起的矛盾，得不到其他列强的支持，而且也保不住他自己的地位。他曾经这样说道[①]：

> 在这一具有国际性的地方，我不能总是向英国使馆求助。基于一种世界主义立场为中国工作，是我必须首先要掌握的——我不愿要任何使馆的帮助，我所期望的只是使馆让我独自地干，或者至少不要作对和给海关制造麻烦！

他在1896年提出的关于各国在华贸易应当平等课税和共享均等商业机会的主张，也与英国外交部的意见不同[②]。当然，他的主张并不违背英国的根本利益。因为赫德确信，在"公正"的商业竞争中，英国商人足以保持他们的领先地位[③]。

其次，赫德比较注意通过某些与英国资产阶级的局部和暂时利益相歧甚至相反的策略来谋求长远的利益，这也造成了他与英国政府、英国驻华使领和其他英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基本方向一致前提下的诸多分歧。赫德曾经不无冤屈地说，"我想使中国变得强大，并期望使中国将英国当成最好的朋友"，但英国方面常常"与我作对（领事们总是如此，公使馆有时也是这样）……"[④]他极为不满英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观望态度，认为英国对华政策"永远是那么不痛不痒，有气无力，其价值可想而知"[⑤]。1895年5月，他写道[⑥]：

> 英国正在被冷落。这只能怪它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错过机会。它的牌打得太差了。如果它能在朝鲜就将日本人挡住，使其不进入中国本土，所有问题都会以它的办法解决。据我所知，（英国）除此还有一个步骤，将更加疏远中国。如果真的实现，那么我只好马上辞职了。

同样，英国方面不少人对赫德也啧有烦言。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法磊斯甚至斥责赫德是"中国文明的真正敌人，尤其是英国的敌人"[⑦]，表现出对他的极不理解。

再次，赫德对待中国的态度，与同时期英国许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亦有很大的不同。在当时不少帝国主义分子眼中，中国人完全是劣等民族，根本不配受到文明的待遇，也根本没有可以利用的

---

① I.G.in Peking, letter 1153，10 Dec.1899，P.1210。
②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231页。
③ F .Wright，op .cit，Pp.718–723。
④ I.G.in Peking, letter 342，16 Oct.1881 .P.389。
⑤ Ibid，letter 946，30 Sept .1894， p.989。
⑥ Ibid，971，5 May，1895，P.1017。
⑦ 法磊斯致莫理循函，1900年12月18日；《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192页。

价值。只有使用武力，才能使得中国认识和接受西方的文明。赫德则不然，他认为中国人是“有才智、有教养的”“勤劳、守法、文明和易于满足的民族”[①]“中国人和其他国人一样，有许多令人羡慕的特质，不仅见于零星的例子，而是由整个种族及其发展出来的文明所反映出来的”[②]。他总是强调要“仔细观察自己的立足之地及其周围环境”，不要“催迫中国人”[③]。他在1868年12月致阿礼国的一封信中指出[④]：

> 当然，武力可以从中国取得一切。但正如自然法则所表现的那样，只要有作用力，必然会有反作用力。很明显，一时的武力会给以后的人们带来复仇的遗产。将来的欧洲人或许希望他们的祖先不要在中国用刺刀耕种的土地上再播下仇恨的种子。

因为，处于特殊身份的赫德，如果对中英双方利益得失考虑稍有不周，就不可能取得双方信任，更不可能担任清朝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他自己也总是标榜他寻求尽量兼顾符合中英双方利益的结果，对双方都“不敢偏袒”，“只是两边周停”[⑤]。否则，他所参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就不可能“全面顾及中国的环境、困难、办事方法和需要”[⑥]。因而当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时，赫德不得不承认：“六十年来的条约关系导致了这场运动”[⑦]，“其根源有爱国主义思想，其要求也大致合理，这一点毋庸置疑，怎样强调也不过分。”

赫德的这种两面手法在《辛丑条约》的签订前后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当时，许多帝国主义分子都叫嚷着瓜分中国或另立一个傀儡政府，而有着40余年在华经验的赫德则显得冷静得多。他认为，要想瓜分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必须依靠强大的武力来维持。列强割取的面积越大，管制时需要的士兵就越多，不安和动乱就越容易发生。被瓜分的中国会把对抗外国统治者作为共同目标，随时会出现动乱，显示出民族感情的存在和力量。他提出付出这样的代价是不值得的，而且“如果作为一个涉及权利、公平甚至仁慈的问题来看，任何不带成见的人都一定会反对的”[⑧]。

至于那种强迫中国改朝换代的想法，赫德认为是“一个比瓜分更无望的方案”[⑨]。因为“任何

---

① I.G.in Peking, letter 419，2 June.1883 .P.469

② 黄序鹤：《海关通志》第10页言：“教育股者，即同文馆是也。”

③ Origin， Vol.1，P.96。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第19–20页。

⑤ Origin， Vol.1，P.97。

⑥ R .Hart, op.cit，p.7 。

⑦ Ibid，P.151。

⑧ Ibid，P.97。

⑨ Ibid，P.99。

依靠列强撑腰建立起来的朝代将永远成为懦弱和耻辱的标志”①，其寿命决不会长久，这样，即使建立起一个傀儡政府，中国也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其结果对任何一方都是不利的。

赫德主张，最佳方案乃是“承认清廷和支持光绪皇帝”。他说：“这一朝廷决不衰弱，它的威令遍及全国。承认它是列强可以接受的最容易的办法。支持它会比其他行动更迅速和更有效地全面恢复和平。”②

在谈到赔款时，赫德亦强调西方应考虑到中国的经济现状及承受能力。中日甲午战争已使中国人民背上了苦不堪言的重债，此次不应再次强加过于沉重的负担。他说③：

> 无论如何，中国总要被加上一个沉重的负担。希望列强会把它减至最轻，同时本着同情和迁就的精神优待这位不幸的负债人。

多么悲天悯人的腔调！然而，他的内心并不完全是真正同情中国人民，而是害怕因此过分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使各国在华贸易受到严重的钳制。他明确地指出：“将来商业的繁荣比此刻难以负担的现金罚款，可能是偿还这笔债项的最佳方法④。”

不难看出，赫德的这番主张是从西方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他希望利用清王朝作为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保持中国作为一个公开的市场。这样不仅避免了用兵侵占之累，又可以坐以收其实利；既符合作为一个遥远商业帝国的英国的利益，也同各国在华贸易共享均等机会的期望相益，也同各国在华贸易共享均等机会的期望相一致。于是，赫德通过发表一系列关于“如何处理中国问题的文章，并向西方重要政治家和外交家赠送其论著，使他的基本思想完全贯彻于《辛丑条约》及其谈判过程之中，甚至还影响到英、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确立和实施⑤。但正如魏尔特所指出的，这一政策的目标与其说为了中国，还不如说是“为了取得各国能够维持一致行动的必要压制力量，以防止任何一国占其他各国的便宜”⑥。

但就另一方面说，在中国四周虎狼环伺、濒临被列强瓜分灭绝的时刻，赫德始终坚持中国多少仍有利用的价值，所以还须顾及中国人民的感情，也多少要考虑中国的利益。他多次指出，民族感情是一个必须重视、不可忽略的常因；应该以所谓“友好关系、共同利益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尊重”取代“强制、嫉妒和种族仇恨”；有关商务的谈判，不应带有丝毫的强迫性质，而应缓慢、审

---

① Ibid，P.50。

② R .Hart, op.cit，pp.50，51。

③ Ibid，P.104。

④ Ibid，P.104。

⑤ J.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 p.162。

⑥ S .Wright，op，cit，P.718 。

慎地进行；不仅应对现实及环境有充分的认识，多少也应考虑到对方的观点及需要，应设身处地，将自己放在对方立场上，用对方的眼睛观察，多为对方着想，从而做出全面和善意的抉择；这样做除了符合公义和常识的需要外，还能取得中国谈判人员的好感和中国政府的支持；这样议定的条约才会收到诚信的效果[①]。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浪潮不可阻挡的形势下，赫德的这些建议固然是为势所迫，这也反映出他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顺应了社会时势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因而，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颇有眼光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三、赫德的个性特征

赫德年仅19岁就离开孕育近代文明的英国，来遥远的东方，在“没有娱乐，没有社交，没有享受”“到处充满废墟、荒芜、光秃、痛苦和贫困”[②]的古老中国孜孜不倦地工作，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投入为成功而进行的奋斗之中，并且在中国度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

有人说，压制人性，再加上智慧和毅力，就可以使人成为一名众人仰慕的成功者、一台润滑的机器。从某种程度上说，赫德正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直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自我控制、有逻辑性、不依赖人、遇事圆滑果断等等。只要他不受生理和感情需要的干扰，不受人际关系的纠缠，就能舒适地、无牵无挂地埋头于工作，经常一天工作15个小时，尽可能地规避无目的活动的侵扰和妨碍。甚至他的社会生活都成了成功的工具。成功的欲望和毅力代替了一切；为了成功，生活中任何亲密关系都可以舍弃。赫德曾于1874年提出他所推崇的一些个人品质，包括良好的体魄”；“长时间工作的能力”；“博览群书”；“才思敏捷”；“做一个‘好听众’”，“有理解力，为人诚实。良好的记忆力；认真周到；处理问题条理分明，小心审慎，主次有别”，“性情温文尔雅”；“令人信赖”；“耐心”；“有奉献精神，富有勇气及自信”等等。他都强调事业是“我的首要考虑”，“我不让任何事情使我之脱离，我会为之放弃一切”[③]。

实际上，对赫德来说，随着成功和权力的获得，追求本身变得越来越容易，因为所有其他活动对他来说都已失去意义，工作成了他的庇护所和精神支柱，使他忘却自己缺乏人性的生活方式。此时成功已不像他先前想象的那样令人陶醉，愈成功，他愈得加倍努力，否则就感觉不到其中的欢欣与快慰了。同时，他为成功所付出的代价就变成了一座孤岛，内心感情潜在水下，只是偶尔露出水面，而露出水面的形式则是抑郁以及人性被吞噬的苦恼。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他的“忧郁”之苦，“生活无甚欢愉之事”[④]。

---

① R .Hart，op.cit Pp.49，54，75，80–81

② R.R.Campbell，op.cit，P.13。

③ 赫德日记，1874年7月9日，1868年12月20日，1869年4月18日，由司马富教授提供。

④ 赫德日记，司马富教授提供。

二十余年与妻子儿女的别离也使他深深叹息“孤独是我存在的背景”[①]。他多次希望离开中国，以结束这种孤独和痛苦，但他还是坚持到了最后的时刻才返回祖国，甚至在他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再来中国。

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期间，烧杀掠夺，蹂躏妇女，留京外人也纷纷以廉价竞购清宫或巨室流出的珍宝古玩，或恣意出入“大内”、三海、天坛等皇家“禁地”，如履无人之境。赫德对此极为反感，他不但一无所取，亦未尝一游禁地。他还著文批评这些“令人可悲”的行径，他说[②]：

> 难道纪律和同情心不能及时阻止他们（指八国联军——译者注），让他们仅向较高层人物进行报复吗？他们在这里征用东西，在那里抢掠，到处攫取战利品，残暴袭击未能及时和其他人一起逃脱的可怜的妇女；在暂时被弃置的房间内，私人财物不翼而飞，留下来的少数中国人吃尽了苦头……这显示出野蛮的复旧如何像野草地般在文明的花丛中出现。

这些自然引起许多人的敬佩。有人说他“生平不贪便宜，同时以中国官吏自居，笃守官箴，不愿僭越，以招指摘”，是其“一生行谊，不特具备西方企业家之道德与技能，实尝濡染我国儒家之修养与风范”[③]。有人甚至赞扬他“树立了一种廉洁的公务和忠心为（中国）中央政府服务的楷模”[④]。

实际上，这些称颂者仅仅看到赫德的表面。赫德从一个小酒商的儿子，凭借着英国海外殖民的势力及其个人的才干，在等级森严的清朝帝国炙手可热、煊赫声名，不仅具有高官厚禄之位，而且享尽殊荣奇赏之尊。他长期把持中国海关，呼朋引类，借势秉权，恣其所欲为，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一个“暗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的非正式帝王的境地[⑤]。

在个人经济问题上，赫德也并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的。1896年，他在英德借款过程出了不少力，并将之看成他聊以自慰、引以为荣的“业绩”。他自我表白地说[⑥]：

> 此等巨款，均由总税务司一手经理。因系在中国食俸之人，是以借款挽例费用等项丝毫未受。能借如此巨款，而未指地抵偿，可谓开设新关之明效。

---

① I.G.in Peking, letter 388，26 Nov.1882，P.433。

② R.Hart，op.cit.Pp.87–88。

③ 姚崧龄：上揭书，第1–2页。

④ J.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Pp.462–463。

⑤ 吴相湘：上揭书，第224页。

⑥ 外务部档，第1570号。

但当时已有人揭发他不仅借此保全了他的地位，还“因增添次项税务，借口磅价日贵，议加薪水骤增一百二十万之多”[①]！这一批评虽然暂时无法证实，但恐怕也不是无根之说。

据估计，自从赫德1858年进入中国海关以来，他本人及其家属所得到的收入超过七十五万英镑[②]。赫德的一位下属，中国海关牛庄税务司楼德这样评论道[③]：

> 赫德以他本人的名义至少从海关提取四十万英镑的工资及退休津贴，并且不惜使海关蒙受损失，把所有这些钱都汇往英国，这指的是在某个时期中因为兑换率低，他得到了相当于他工资两倍多的白银。他的亲属另外又提取了多少钱是个未知数，但不会比十万英镑少很多。这样看来，赫德向中国政府提供“无私”贡献的说法实在不恰当。

赫德曾说他自己少年得志，年轻时碰上机会和幸运，就此置身高位，权势显赫。而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平常的人物”。他之所以自信有异乎寻常的能力，足以驾驭一切难以对付的势力和解决一切难以应付的难题，就是因为他巧妙地把中国海关看成介于中外之间的一个独立方面，一方面利用海关确立了在清政府的地位和影响，同时利用中国讨好英国，提高他自己在英国的声名和身价。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代替中国在英国和其他列强面前游说，有时甚至作为“中国的主要依靠”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他的个人利益已经同中国海关、清政府、英国及其他列强联系在一起。他不愿看到任何与己不利的变动。因而他的许多建议似乎都在努力寻求一种对中、英利益及个人利益俱无伤害的办法。当然，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正像为他作传的魏尔特所指出的：“中国的利益同外国在华利益可能会偶然重合，有时或者会平行，但是它们很少或者决不会趋于一致，它们一般是不同的。”[④]

赫德对此的策略是首先于其本人有利，其次对英国，再次才能考虑如何减少对中国的损害。他深深知道应该如何巧妙协调各方统治者的情绪、政策、策略以及国际社会的舆论，而又不损害他在中外交涉中的主动地位和既得利益，有人指责赫德“个人的喜好压倒了作为一个英国人应尽的义务”[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无道理的。因为赫德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政治掮客。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无论哪一方成功，他都能从中获得个人的利益，都不会在“两片磨盘之间”“擦伤自己手指”[⑥]。正因如此。不仅清政府因他襄助有功而感恩戴德，“叠晋崇封”，授予他许多品级

---

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第1479号。

② 莫理循致布拉姆函，1911年9月26日，《清采民初政情内幕》，第757页。

③ 楼德致莫理循函，1911年9月28日；同上，第760页。

④ I.G.in Peking，letter 613，7 Aug，1887。

⑤ 莫理循致濮兰德函，1902年2月1日，《清采民初政情内幕》，第215页。

⑥ I.G.in Peking，letter 613，7 Aug，1887。

的官衔和赏赐[①]；西方各国也因其全力协助，多次授予他各种勋章、爵位和称号[②]。

四、赫德的改革主张

如果认为赫德根本没有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或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甚至动机，那不仅在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也与历史事实相违背。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直称颂赫德是“十九世纪后期领导中国进行改革的主要推动者”[③]。赫德也始终不忘他是“进步人类文明的代表”[④]。他曾经恳切地说他“四十余年毛践土，极思助中国自强”[⑤]。在向清朝统治者的进言中，他多次对清帝国的弊病进行过较深入的分析和批评。他认为，“中国官吏到处都一样腐败，如不根本改革，国家肯定经常处在困境之中”[⑥]。他很早就开始探索“哪些西方文明的产物能最有利于中国，用什么方式使这些不同的事物最有效地传入（中国）”[⑦]。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图新的建议，不少都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早在1865年，赫德就提出，“凡有外国可效之法，应学应办，即如铸银钱以便民用，做轮车以利人行，造船以便涉险，电机以速通信”[⑧]，并将此看作是“跻中国于强盛和开拓进步之路的手段[⑨]”，最后导致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各种改良和改组[⑩]。

赫德还长期担任广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他虽然从未出席过该学会的年会，但一直负责其经费，并创办广学会的刊物，使之成为19世纪中国最大的翻译西方著作的机构。广学会的译著“初印时人鲜顾问，往往随处分赠，既而渐有乐购者，近三年内，几于四处风行”[⑪]。据统计，广学会译书的销售量在1893—1898年间陡增十倍以上，说明在赫德的支持下，广学会的活动使人们对西学的态度有了迅速的改变。

今天看来，赫德的许多改革主张本身无可厚非，而且确有传播西方先进文化及引进资本主义体制的善意，但结合近代中国所处的特殊环境来看，这些主张却无不带有适合西方资产阶级扩大对华影响的政治背景，并且都以中西之间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关系为基础，因而其积极意义是有限的，同

---

① 税务处档，第72号。

② Origin， Vol.7，P.387

③ I.G.in Peking， p.18。

④ H. F, Mac.Nair，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P.385。

⑤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⑥ I.G.in Peking, letter 700，8 March，1896。

⑦ 赫德日记，1863年12月23日，司马富教授提供。

⑧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40，第14–18页 。

⑨ I.G.in Peking，letter 1027，12 July，1896。

⑩ S .Wright，op.cit，P.493。

⑪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336页；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近代史集刊》，总第4集。

时也遭到中国各方面势力的强烈抵制。赫德曾委屈地说他“前后书数十上，无一准行者”①，这种悲剧性的后果是不难想见的。赫德逝世后，有人感慨地说：“忠言而未蒙采纳，终成泡影，赍志而没，抱憾千古。”②赫德的悲剧是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必然要求和使这种要求无法实现的客观条件之间冲突的悲剧。对此，下一节还会继续予以评述。

有时，赫德对清朝统治者在改革过程中根深蒂固的慵懒疲沓十分恼火，甚至希望中国在对外战争中一败涂地，给清帝国这个疲惫不堪的病躯来一个醒脑惊神、脱胎换骨，否则，“它大概不会充分领会改革的必要”③。

但总的来说，赫德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是迂回曲折的。他一贯认为中国人不会突然做出任何事情，也不会采取任何惊人的方式。他说：“在扬弃旧事物和引进新事物之际，应先仔细考察地方与人民的情况，同样的泥土不能栽种各种农作物，在一处可行或有益之事在他处不一定也一样。”他认为补救之策应该在中国内部寻找，“在缺乏这种内在力量的地方，就只有顺其自然，不应强使新生命在妊娠期完成之前便诞生出”，否则于事无补，徒增烦忧，是不会成功的④。因此，虽然他几次声称“如政治再不能改革，我也无意久留此地”，但他最终还是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对海关和清政府的机构及其功能所进行的改革之中，力图在行政学的范围内解决中国对外交涉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以提高清政府的办事效率。以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距离之大，这种梯度式的反应总是聊胜于无的，并非一无是处，但毕竟是治标不治本的。

赫德十分清楚，中国人对变革常常显得迟钝和勉强，其变革也往往是在旧制度中适应的。就像弱不禁风的人不能动大手术一样。旧制度的代表——清王朝本身已经脆弱不堪，根本无法经受根本的改革。1895年赫德悲哀地说过：“虽然我为中国政府效忠多年，但我不能闭起眼睛，不顾中国大小官吏禁不起历史考验的事实。”⑤为了维持和利用这个腐朽的王朝，赫德不敢也不能够接触尖锐的矛盾，只能采用某些西方模式逐步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局部补充修缮，不能够全面向中国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赫德的心理是自相矛盾的。他既希望中国采用西方国际关系准则，由此中国社会进一步向资本主义化发展，同时，又不高兴看到触动清王朝根本弊端而带来的相反后果，并强烈地遏制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发展趋势。这样，就只能是以提倡顺应时代潮流的变革开始，以应该改革而不去采取真正的变革措施，因而违反时代潮流而结束。

---

①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② 莫理循致布拉姆函，1911年9月26日，《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758页 。

③ I.G.in Peking，letter 418，932，941，Pp.465，974，983。

④ R .Hart，op.cit，P.102。

⑤ I.G.in Peking，letter 655，24 March，1895。

五、赫德与中国外交近代化问题

在近代，只有学习西方与独立自主齐头并进的外交才能踏住历史洪流的节奏。赫德虽然在进一步打破妨碍中国近代外交的封闭状态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引进了一些新的社会因素，但他并没有能够为发展真正的近代外交创造条件，灾难深重的中国并没有实现近代化。这里，我们既要看到他个人的作用和影响，又不能将此归咎于赫德一人，而是应该看到社会、历史的特定因素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首先，晚清社会经济尚未超越传统的发展结构，仍以非工业社会的机制为依撑，并没有形成近代化社会所要求的规模。西方各国对华交往是以商品生产不可制约的扩张为动力的。他们将中国看成是廉价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获取垄断利润的投资场所。因而他们的经济活动是以掠夺为主的，无法促成中国内部近代经济关系的产生。虽然晚清不乏近代类型的经济活动，但没有形成社会化的大生产，加上中国原来经济发展水平就落后于西方近代国家，这种状况就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近代观念的选择，即仅仅具有近代的形式，并不具备真正近代化的内容。从实际发展的情形来看，这些观念必定要逐渐游离其形式上的近代性，而日趋适应其内容上的生态性，中国传统外交思想中某些根深蒂固的沉淀物仍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近代中国外交的一个主要历史前提是中国失去了独立自主发展对外交往的神圣权利，不得不曲从地接受外来政治势力的渗透和控制。各国在华势力的消长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外交格局的发展。从当时的国际条件来看，支配世界的帝国主义体系中，没有容下、也不可能容得下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独立强大的近代化中国。赫德对中国外交的参与，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强烈的政治色彩。他承认："外交把中国骗苦了。"[①]他对中国的"扶助"是以中国人民的政治朦胧为基础，以清政府接受其"劝告"听从其"指导"为前提的，并且常常以救世主的姿态凌驾于中国国家之上。且中华民族在政治上觉醒起来。这种畸形的半殖民地外交模式便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失败而失去根基，最后全部土崩瓦解。再次，腐朽的封建君主制度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外交近代化的不可避免的厄运。因为它的结构、逻辑与历史的力量所造就的近代化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外交近代化需要具备一定的内在机制，如健全的决策体制、法律体制和司法体制，必须有完整的分工和专业化，形成集中的外交行政的合理结构。只有这样，才能适应近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日新月异的速度，才能满足中外交往所提出的多方面的需要，这些显然是晚清封建王朝所无法承担的。所以，当新时代的空气冲进旧时代的胡同里时，气流的清浊立即形成了一种奇形怪状的胶作状态，这就是半殖民地外交模式。其特点是主要等待西方各国的催促威逼，听凭外来势力的操纵摆布，其本身很少具有主动、积极和创造性的反应，相反总是被动的、消极平庸的和修修补补的。这种结果必然导致其自

① I.G.in Peking，letter 634，30 Sep，1894。

身的效能低下和不稳态。赫德于1896年形象地说过[①]：

中国的政府是一个谜，它好像一片平板上翻滚的水银，忽然聚向一个中心，忽然又散作无数小珠。分合大小，变化万端，使人无法捉摸。它也像玩戏法的人手中的豆子和套杯，你明明看到豆子在杯内。但一转眼又不见了。中国说是有一个政府，人们也感到它的存在，但它却是不成其形的，好像是一团气体，你休想能抓得住它。

他在1895年还写道[②]：

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政治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这真是怪事，对大部分人们来讲，也是一件痛心的事情。

事实上，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腐败、顽固是百余年来近代化一直陷于坎坷困顿中的基因。我们固然不能忽视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近代外交的束缚，但是敢于正视现实的人应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发生的阻挠破坏作用，都是通过中国封建官僚政府的弱点而进行的。

六、赫德的历史观

赫德对近代中外关系发展趋势的洞察力非时人所及。他多次指出："无论如何，外国人决不能期望永远保有中国在武力威胁下所给予他们的治外管辖权的身份和各国通商条款"，"外国人的强制总有一天要停止"[③]；外国人控制的海关也"迟早会销声匿迹"，会静悄悄地、然而是不断起着作用的自然力量和民族力量会来改变我们这种非正常的地位"！[④]

1901年，赫德预言说，50年后的中国将是一个独立的强国，"将从外国人手中夺回他们从中国抢走的每一样东西"，外国人在中国的一切殖民利益都会随之宣告终止[⑤]。他反复强调中国必将崛起有日，不可能永远屈居于列强凌辱之下，而"必能立于世界大国之列"，"中国之前途，未可限量"[⑥]。

① I.G.in Peking，letter 692，1 Dec.1896。
② I.G.in Peking，letter 651，3 Feb.1895。
③ R.Hart，op, cit.P.59。
④ Origin，Vol.1，P.313。
⑤ R.Hart，op, cit.P.54–59 。
⑥ 《外交报》，戊申年10号（第218期），第8–10页。

这些见解无疑都是正确的，而且已经成为当今的现实。但是，这一发展并未按照赫德所设计的方式或达到他所希望的程度。历史和现实都是残酷无情的。一切维护西方在华利益及清朝腐朽统治的努力抵挡不了历史和现实的反抗力量。这一点他早有预感。1895年，赫德悲哀地说道：“就此朝代而言，恐怕它已是无望了，十年之内革命将会达到目的。”[①]当轰轰烈烈的义和团造成了无法控制的事态时，赫德也能认真对待这一事实，并就其可能对他长远计划所造成的威胁提出了种种忧虑。他说：这是“一个变动的世界的序幕，也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题。2000年的中国将会大异于1900年的中国”[②]！

尽管赫德已经认识到这一趋势，却一直不肯放弃追求他的目标。在他眼里，中国与满清王朝差不多是同一概念。因为300年来这个异族政府与中国的汉族已“结成一体，中国人憎恨皇帝的程度并未超过英国人憎恨女皇”[③]。所以，他力争“让现存的朝代维持原状，到中国人民感到它的政令不行时，才由他们自己解决”[④]。并且提醒那些主张挽救清王朝的人士要感到“目前担负的责任，不应忽视过去经历所给予的教训和各种征兆所带来的提示。日本的事例表明，当全体人民接受新思想和新动机的鼓励而进入一种新生活时，将会做出什么事情”[⑤]。他并非有意维护垂死的封建统治，但为了维护英国在华利益，他仇视孙中山等反清人士[⑥]，曾主张以外交方式压制海外反清斗争[⑦]，并向清王朝呈递了不少诸如《筹饷节略》之类企图使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的建议[⑧]。这样做是符合赫德的身份和本质的，他毕竟不是白求恩或柯棣华。

当然，赫德没有回天之术。他不可能达到他的目的。20世纪的帷幕拉开以后，即使大搞强权政治并完全依赖武力，也不能有效地改变中国人民要求摆脱外来压迫、推翻封建统治、追求独立自主富强的发展进程。这一强大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

附录一

威妥玛就赫德《局外旁观论》给拉塞尔勋爵的两封信

（1）外交部文件17/431，第245号，秘密与机密；1865年10月27日，北京。

---

① I.G.in Peking，letter 994.3 Nov.1895，P.1039。

② R.Hart，op, cit.P.49。

③ R.Hart，op, cit.Pp.96–97。

④ Ibid.P.99。

⑤ Ibid.Pp.102–103。

⑥ I.G.in Peking，letter 1048.3 Jan.1897，P.1098。

⑦ 税务处档，第81号。

⑧ 外务部档，第3962号。

勋爵阁下：

我与赫德先生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秘密地给了我一份他于本月17日给总理衙门大臣的中文呈文。这篇类似监察官向皇上呈上的节略，各个段落都很简短，它用最大胆的言辞抨击了政府及其内政外交的各种弊端。

对于那些无须克服的缺陷，此文在论述司法、文职机构、财政及其各方面行政制度所需改革的时候详略不同。然而，该文非常明确地强调，为了维持和平与独立，除了期望普遍满足条约权利（应比目前更为爽快）之外，必须通过引进外国机器来开发国家的资源；他强调需要及时处理所有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诸如已经答应的惩罚对谋杀阿比·尼尔负有责任的官员之事，还有允许我们进入潮州域的问题。同时，他强烈呼吁在有约各国首都遣使设馆，中国皇帝也应接纳各国使臣。

该文用最为不留情面的言辞对尚待补救的弊端进行了斥责。他的这些议论已被很好地接受，没有比这更为有力地证明赫德先生所受的敬重。赫德先生知道，虽然恭亲王尚未看到这篇上书，但总理衙门的所有大臣已经以一种十分不安的心情对此做了研究，并且这已成为他们与赫德先生及其协助他准备此文的中国学者之间谈论的主要话题。

根据赫德先生的建议，应派一名年轻的英国翻译立即前往曾在江西被拘留的英国人，满斯礼被关押的城市。我已经报告过总督瑞麟亦应亲自去潮州。我认为，这一点即使原先并未受到那篇呈文的影响，也与其中的一条建议相一致。也是由于赫德先生的坚决主张，此人应由海关另一位年轻美国翻译陪同。最后，文祥告诉赫德说，他希望赫能常驻北京，无论如何要自今冬始，因为他希望在使中国人成为外国船舶的所有者方面以及在筹备明年向外国派遣一个或数个使团方面得到赫的资助。

上述后一种措施谈论得太多，以致无法很快成为现实。但我相信，勋爵阁下会认为现在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报告这一进展时，我并未十分欣喜，因为这几乎不能归功于我自己。我一直认为，假如中国要保持独立，其未来就在它雇佣的外国人手中，而不是在与其有外交关系的人们的手中。后者的态度通常不可避免地是敌对的或者至少是对立的。他们的建议在目前我们交往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通常摆出极为需要的架势，以至于人们存在畏惧，唯恐接受这些建议会被解释为对外国侵略者和贪婪的极不适当的让步。除此之外，条约的遵守情况是这样的糟糕，作为一个与此利益攸关的外国列强的代表就很难做到既能改变这种情况，又能有足够时间去建立一种对于充当友好顾问十分重要的关系。

中国政府有赫德先生是极为幸运的，他将他的谦和、耐心及沉静的性情与极高的才华和训练有素、富有思想力的头脑结合起来。同时，在海关的组织方面或者在他所能给予他服务的政府的影响力方面，他都成功地完全消弭了各国政府的妒忌。我在使总理衙门大臣

们知道以下事实时是十分谨慎的；我很赞赏他；我与他的关系很亲密；但我并不怎么赞同他的意见；虽然他是一个英国臣民，然而毕竟不是英国使馆的代表。这样的猜测当然也有可能，假如在总理衙门或者外国使馆流传就会对他的有益作用产生如同直接对抗一样的悲惨结果。

考虑到他的呈文的性质，我冒昧请求阁下将我的这封信列为机密文件。

致以

最崇高的敬意

附言：总理衙门中三位最有影响的大臣，宝鋆、文祥、董恂已经阅读了赫德先生的呈文。宝鋆和文祥是军机处的满族大臣。军机处成员还有恭亲王及其与我们无甚关系的两个汉人大臣，值得性意的是董恂（汉人）已经看到此文中的所有观点都是正确的；其所有建议都必须执行。宝鋆指出，所有建议都是不错的，但难以采纳，然而我们通常认为支持进步政策的文祥说此文的言辞太过直率。可是正是他对这一上书中提出的实际上已经采纳的部分建议起到了作用。他告诉赫德先生，通知瑞麟将由一名翻译陪同前往潮州之事也表明这一步骤亦被实施，因为政府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消除种种涉外误解更为重要。文祥还很自然地告诉赫德先生，中国人所有的外国船只目前还只能在开放口岸进行贸易；这些船只将置于外国税务司的管理之下，他希望通过这些手段最终摆脱目前存在的常关。

我冒昧补充一点，赫德先生的呈文与我自己于上星期五交给董恂的呈文（已寄呈阁下）虽然形式不同，却有着共同之处。我提及这些并非出于虚荣，因为我的呈文并未产生明显效果。这是由于他们自己的代理人的作用，以上补充可以作为我推论的证据，也说明我们必须期待受到这种影响的中国人去进行改革。赫德先生也很幸运有这种机会，假如这种说法不过分的话。法国传教士被谋害的消息就像所有立即引起纠纷的事件一样，已使得总理衙门较平时更为渴望得到友好的忠告。

威妥玛

（2）外交部文件17/431第257号，秘密与机密；1865年11月2日，北京。

勋爵阁下：

我在上月27日第245号信函中已察告阁下，赫德先生曾向总理衙门大臣提交一份公开指摘其弊端以及建议对帝国政府进行改革的呈文。文祥已经通知赫德先生，恭亲王阅读过之后派人捎话说，其中有些部分殿下可能不甚明了，有些部分过分倡言无忌；他应在保存其呈文实际内容的前提下重新斟酌其表达方式，然后将呈交皇上。还将发布一道谕旨，命

将此呈文分送各省官员。同时通告各省官员，这一行动表明，帝国政府认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继续保持与各国列强的友好关系更为重要。这一情况当然可以解释文祥初读呈文后对其过于直截了当的评论。谕旨肯定不会公开，但我坚信无论如何文祥曾介入此事。

赫德先生今晨离开北京，拟于开冻前返回。

致以

最崇高的敬意

威妥玛敬启

英人赫德与中葡澳门交涉史料

众所周知，晚清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曾于1887年参与操纵了中葡关于澳门谈判。实际上，从1862年到1905年的40余年间，几乎所有的中葡澳门交涉，都有赫德直接或间接的插手，这一点许多人还不十分清楚。为了更好地研究澳门的历史，特别是了解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在澳门主权的具体过程，我们在此提供一些片段的资料。

这些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清外交者案所藏赫德致清政府的申呈与信函，主要反映了赫德早期对于澳门问题的关注以及后来（晚年）在与葡萄牙签约过程中对清政府的影响。第二类是赫德给他的亲信金登干（J. D. Campbell）的信函。这部分资料可以说是《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一个补充。读者可以将二者相互比较，进行参考。第三类是《金登干传》中所收录的几封信函。金登干在协助赫德干预中国外交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人曾经说过，假若没有金登干，“赫德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一次外交成功”。在金登干的家信中，可以看出他在中葡里斯本草约谈判中的心态，也可窥见赫、金与英国外交部的微妙关系。在其他人致金登干的信函中，不仅反映出中国人民（包括一些封建大吏）对于他们出卖中国主权的强烈反对，也说明了其他海关职员（如英籍税务司葛德立、德籍税务司德璀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当然，在中葡关于澳门的交涉中，英国政府始终是非常活跃的，这与英国同中、葡两国的各自关系以及香港、澳门的特殊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我们也选编了几则与香港有关的资料以及英国直接干涉中葡关系的问答节略。

我们认为，探讨赫德与中葡澳门交涉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切忌简单化和概念化。例如，赫德早期解决澳门问题的建议和行动，客观上对中国是有利的，可惜清政府未予采纳。他与澳门总督所拟议的“拟议条约摘要”也并不是“背着清政府答应”的，只能说是一种严重的越权行为。实际上后来赫、金在谈判中费尽气力，就是希望挽回清政府拒不同意的那些无原则的让步，事实上也多少有一些效果。赫德晚年念念不忘赎回澳门，亦似乎想以此洗清他在澳门交涉中的责任。在其他问题上，他还是做过一些好事的。但我们对此不能过高评价。清政府昧于国际法常识，始终未能认真考虑历次中葡澳门交涉对中国主权的损害，甚至一直搞不清楚“永久占据权”的准确含义。赫德在率先将国际法传入中国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他对澳门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应该有非常清楚的认识。然而正是他在中葡立约中明确宣称要“不致与（澳门）界内之主权有碍，亦不致

与界外之主权有损”。主权具有包括领土处置权在内的领土权的性质，显然与葡萄牙对澳门的永久占据权和不准擅自转让他国的保证截然不同。如果承认葡萄牙在澳门界内有它的所谓“主权”，实质上就是确认了葡萄牙对澳门的统治权和所有权。这种混淆法律概念的做法很难说不是蓄意而为的。痛心的是，清政府对这种愚弄竟然毫无察觉，反而也跟着重复。也许这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外交的“正常现象”吧！

以下资料，凡摘引翻译史料原文者都不加引号。基本是以时间顺序及主题分类编排。必要的地方加有注释。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陈霞飞先生等都曾给予支持和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一、关于1862年《中葡和好贸易条约》

（1862年5月28日）赫德致总理衙门函：

兹闻小西洋国公使现议由澳门上京，商定通商条约[①]。查住澳门之西洋人，若由中国准其立有明文之约，即有三款紧要条应议定书明在内：

凡由西洋派委住（驻）扎通商各口之领事官者，不得干预贸易，亦不准别国之商民或代办，须由西洋派本国可靠之员住（驻）扎各口，澳门日前设有海关。现议由中国仍旧派官注（驻）彼，照则例征收各项税钞，不得由西洋拦阻。如何严防偷漏之处，任凭中国设法筹办。

澳门仍系中华土地，只准西洋人在彼居住，自政仍应由西洋每年将地土税银呈交海关委员查收（向来租银之数目不过系每年五百两，应议定租银每年一万二千两，此数亦不昂也）。

查美、法、英、德四国条约各有日后大清国若有重待别国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处，毋庸再议，即与该国一律办理施行字样。惟此次议定西洋通商条约，（以）不立此沾典之章程为善。

以上各款甚要，若该公使不肯答应，即不准设立条约为是也。兹因南方仍有应办之事，数月未便旋北，是以特意写信奉达，以免国事受损失。（总理衙门清档）

（1862年6月8日）赫德致总理衙门函：

① 指葡萄牙派遣特使基马郎英士（I. F.Guimaraes）赴京谈判缔约。信函日期应为收到日期，下函同。

小西洋国公使上京一事，曾于三月二十六日由厦门备函奉达。兹本司回粤，闻该公使早已起程，此刻约可抵津矣。

现查澳门绕越私入内地洋药，每月有五六百箱之多。而随此大宗洋药，其余进出口各项货物均系漏税之件，以致百弊丛生。若能在彼立关，即与粤关税务大有裨益。再澳门原系中国之地，只准西洋人在彼居住。而所居之西洋人及中国人亦属不少，且并非无银两之地。闻西洋官员所受各项规费，除每年留下地方用度之外，尚有送本国银两数万之多。睹此情形，不如每年令其呈纳地租银一万二千两，籍可赔补立关之费。若该公使不肯答应，即不准其立约。

或由英、法两国有人来请，准令该公使立约，即由总理衙门令其勿管，此系中国之事，别国毋庸过问。否则此次立约而不立关，实与粤关税务有损。倘若立约而不明言澳门系中国之地，将来各国均以澳门为西洋地土，必致与中国大局有害也。因此事关紧要，本司不得不再备函布阅，尚祈阁下留心为望。（总理衙门清档）

（二）关于“玛斯”计划的最初尝试

（1869年1月30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总理衙门尚未告诉我希望玛斯先生做点什么[1]。所以下一次去信（2月13日）我才能发出指令。总理衙门希望“二者兼得”，即非常想去掌握这一地方，但又期望在不改变现有管理的条件下得到它……（费正清等编：《总税务司在北京》，坎布里奇，1975年版，第4函，下同）

（1869年2月13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一星期前，我收到一封恐怕是元月中旬从伦敦发出的电报，内言“埃米莉2·3·4”[2]。可怜的老人！我很遗憾在他的外放刚刚结束时听到他的噩耗，我也很遗憾在他刚刚为我们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总税务司在北京》，第5函）

（1869年2月26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

① 玛斯（Sinibaldo de Mas）为西班牙驻华公使，此年离任回国。赫德怂恿他替清政府游说葡萄牙当局，将澳门赎买回来。这次活动也称为“玛斯计划”。

② 埃米莉是玛斯的别名，他在离华不久病故。

总理衙门尚未定好其多头的想法，现在应该对你的来电[①]采取什么步骤……很有可能让你去尝试设法处理玛斯之事，因为我不认为他们期望将此事置于埃米莉在欧洲的另一个兄弟手中[②]。无论如何，五月底以前你定会接到有关指令的……（《总税务司在北京》，第6函）

（1869年3月18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我问总理衙门此事是交给蒲安臣先生，还是交给你？或者是否要你回到中国携带国书及文件？等等。总理衙门经过长时间考虑，决定采取后者。所以，你将要回来亲携国书及文件。那样，此事至今尚未成为定局，我们是必须感到庆幸的[③]。

如果你能找到埃米莉的朋友或是与他有联系的人，你可以告诉他们，如果葡萄牙派一位特使到这里，授权接受我们的条件，此事会在一天之内得到解决的。（《总税务司在北京》，第7函）

（三）关于1887年《会议草约》

（1886年8月8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由于一个总督离任，另一个将来[④]，我有点进退两难，但我希望在下周的今天之前想方设法解决澳门问题。（《总税务司在北京》，第580函）

（1886年10月22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明天我将去总理衙门汇报此次港澳之行[⑤]，到时会知道我的工作是否有成效。（《总税务司在北京》，第583函）

---

① 指金登干报告玛斯病故的电报。

② 指正在欧洲代表清政府出使的蒲安臣（A . Burlingame）。

③ 后来清政府又觉金登干为“帮办税务之人”“未便派办此事”，决定暂时停待，另行筹议，饬赫德致函金登干令将前须国书及文件撤回。“玛斯计划”初试即告失败。

④ 此信发自澳门。这时葡萄牙驻华公使兼澳门总督罗沙（Thomaz de Souza Roza）离任，由高士度（Firmi no Jose da Costa）接任其职。

⑤ 此信发自北京。

（1887年2月23日）金登干致其母亲函：

我已打出最后的牌，并且已经承担起如同在巴黎一样的巨大的责任。毕乐曾公正地承认，那时我如不这样做的话，那一草约根本就不可能签订；而且他对这里的公使们也这样说[1]……如果此事成功，当然一切皆佳！假若失败，他们会在这里说，他们将此事委托给我，我应对失败负责。另一面，倘若成功，功劳也会归于其他什么人，而不会是我这个“无名的谈判者”。在巴黎，我如果按照给我训令的严格字面意义，而不是依照其精神行事，整个事情都会失败的。现在亦是如此！有人认为我是一个处理整个巴黎交涉的——不能宣告自己的意见——无人可以商量——无任何助手帮助起草接受通电文等等，现在在这儿也是这样，非常孤独，依靠自己的判断力行事，差不多比人们能够想象的还要严重……巴黎谈判之后，我曾希望再也不做任何这类工作，现在我还是这样说。虽然性质不同，但这次谈判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巴黎谈判更加困难。其结果一两天之内一定会知晓的。如果有利的话，将寄去一份短札，想请您转交庞斯弗德爵士[2]（R.F. 坎贝尔：《金登干传》，坎布里奇，1970年版，第75页）

（1887年3月6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刚刚收到你的930号电报[3]。我希望我们现在跳出我们的澳门工作。总理衙门认为它为澳门所给予的一切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但我希望当（葡国公使）到此时，我们将能够设法使事情让我们更加满意一点。（《总税务司在北京》，第592函）

（1887年3月6日）金登干致其母亲函：

庞斯弗德爵士曾给我一封致彼德先生[4]的介绍信。但是，正如您所知道，在里斯本体验几天之后，我遂决定最佳策略仍是我在巴黎所采取的，即保持缄默，以真诚获得信任。就像在巴黎一样，在这里主要困难之一仍是使他们相信中国人的和我自己的真诚。我认为我应回信给庞斯弗德爵士感谢他的好意，并且因为澳门问题的解决对香港是如此重要。但

① 此信发自里斯本。毕乐（A.Billot），原为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与金登干共同拟定1880年中法《停战条件》。函中所言巴黎“那一草约”即指此。此时毕乐任法国驻葡萄牙公使。

② 庞斯弗德（J. Pouncefort）此时任英国副外交大臣。

③ 金登干在电报中指出葡萄牙已同意总理衙门所提出的谈判基础。

④ 彼德（George Peter）为英国驻葡公使。

我不会失慎地让他知道我们将要达成协议，现在，尚需要做的只是一个形式的或程序的问题——至少我希望如此。这样我希望您将此封口信转交给他，并言无须任何答复，我之所以通过您转交他，是要确保此信安全到他手中……

附言：经仔细考虑，在您转信给庞斯弗德爵士之前，请等待我的电报。我如果去电“太阳在照耀”，就请将信交给他，并告诉他您已收到我的电报，说明一切进行均好，如我所希望一样。但如果我去电 “雨落了”，请不要把信告给池，等我另外的信或电报。[①]（《金登干传》，第76 页）

（1887年4月24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我想他（曾纪泽）和我在我离京之前将会有一场较量。我在法国和澳门问题上已击败了他……我们的洋药工作正在令人满意地进行，其结果将会使印度鸦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大的销售额，并且对消费者来说，价格还要稍微便宜一些！ “爱塞特厅”[②]曾经认为这一协议将会断送鸦片贸易，但我一直坚持认为，税厘 120两不会减少销售额……我的观点正在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总税务司在北京》，第597函）

四、关于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1887年5月29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罗沙写信说，他将住在旅馆[③]。我认为对他来说不会存在什么困难，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他自己的慎重及其译员的能力。（《总税务司在北京》，第602 函）

（1887年6月）葛德立致金登干函：[④]

我在总督（李鸿章）处坐了将近两个小时。他不高兴对澳门问题的这一解决，认为中国所给予的太多了。我向他提出一些应该考虑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使得他以一种不同的观点来看待之。我恐怕，罗沙先生商定条约时是不会容易的。当然，我把这些都告诉了

① 金登干最后还是及时将消息透露给庞斯弗德，参见上引书。

② 英国东方禁止鸦片贸易协会总部的名称。

③ 罗沙代表葡萄牙政府来华签署正式条约。赫德邀请他住在赫德处。这样“可以教他走每一步”。但遭到罗沙的谢绝。

④ 葛德立（William Cartwright）英籍海关职员，曾被考虑为赫德的继任人之一。

总税务司（赫德），他将以此作为手段，促使葡人在澳门给予我们最积极的合作。（《金登干传》，第76 页）

（1887年7月24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罗沙尚未开始工作，如果他不标新立异的话，就不会有什么难处。然而，当他宣称他不能签署一个对澳门有所损失的条约，并且试图得到某些让步，以使澳门贸易得以存活（其实这种贸易一直是存在的，如果不是通过走私的话，至少是不缴纳关税的）的时候，可能总理衙门面对草约已经引起的反对意见，就会说："那么好了，就别签了！"我不会忧虑这件事情以何种方式了结，或者对香港和洋药税收有什么影响……（《总税务司在北京》，第611函）

（1887年11月）葛德立致金登干函：

我认为现在罗沙将会得到他的条约。主要困难是关于草约中的"属地"一词。两广总督（张之洞）极为愤怒，他作为中国清流派的拥护者是如此强硬，以致不易将其逐退。德璀琳正做李鸿章的工作，李最近已上奏言中国不能拒绝接受在里斯本所做的一切。两广总督将会撕毁草约并予以抵抗的。（《金登干传》，第76页）

（1887年11月底）赫德致金登干函：[①]

明天葡人将签约并离去。最后的困难是在星期日（即27日）解决的。星期六那天罗沙已经绝望，我也认为一切都完了。但是我再次推动了一下，无意中取得了成功。我极为高兴得以摆脱，并且希望再也不大规模地接触谈判了……（《总税务司在北京》，第627函）

（1887年12月4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我们在12月1日签约……两小时后罗沙离去。结局来得并不太快：我的耐心已经竭尽，总督已命令调动其军人去澳门，似乎想拿此以示警告。我真高兴得以摆脱……（《总

① 此函收到日期为1888年元月16日，大约写成于11月30日，因为条约是在12月 1日签订的。

税务司在北京》，第628函）

（1887年12月）葛德立致金登干函：

就像您将会从电报中得知的那样，葡人在最后一刻得到了他们的条约。各种困难都被巧妙地绕开了。目前张之洞已被欺骗。（《金登干传》，第77页）

五、签约后港澳情况及“玛斯计划”

（1888年9月23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法来格[1]并非“心胸狭隘”的人，但我不会怀疑罗沙会发现他难以受他人影响。澳门的财政不久可能会使老玛斯的想法成为可能。但我不想在适当时机到来之前探索其方式……（《总税务司在北京》第667函）

（1889年3月30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新任澳门总督想要划界[2]，并且反对我们海关的汽船开进“澳门水域”。在这两个问题上他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澳门不要庇护逃税者，至于边界，对于澳门人来说，他们现在享有的大量却含糊的自由比强迫中国人下决心宣布“至此，不得前进一步”要强多了！（《总税务司在北京》，第694函）

（1889年8月18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我尚未答复罗沙的短札。在我为他及其使团搞到“双龙”以前我是不会回信的。（你认为葡萄牙会卖吗？）（《总税务司在北京》，第713函）

（1889年12月1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至于澳门，它将一定再属中国，但我不能说什么时候，而且现在不能关心。当然，澳

① 法来格（Edrnond Farago），匈牙利人，拱北海关第一任税务司。
② 这位澳门新总督为施方济（F.T. de Silva）。

门与香港是不方便的邻居，而且它们从国际法角度坚持自己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太过于忽视中国的需要、环境以及它们之间麻烦的相近。虽然只要中国贫弱，这种暂时协定就会被忍受，但它迟早要有很大的改变的！（《总税务司在北京》，第728函）

（1890年6月15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我们又在广州与新总督（李瀚章）闹翻了，李极力想破坏税厘并征专条，还想控制九龙、拱北两关。这两件事使我在总理衙门费了近十天的力气。现在我们总算已战胜对手，占了上风。（《总税务司在北京》，第752函）

（1890年6月29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两广总督给我造成了许多麻烦，现在他的愚蠢举动是强迫澳门划界——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并可能“搞得我们都不合”，况且这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总税务司在北京》，第754函）

（1890年7月20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自从1885年“公使插曲”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想来是很令人愉快的。我们为海关“诈取”了[①]平壤……香港、澳门、蒙自、龙州……现在是重庆，并且我们已经将鸦片厘金搞到我们手中，还设法签订了香港协定，与葡萄牙人的澳门条约、锡金条约以及重庆协定。成果不错啊！（《总税务司在北京》，第758函）

（1890年8月16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香港对我们在那里办公已经厌烦，所以我们要设法去荔枝角（在九龙一边）。澳门将跟着要求，因此我们要到马溜洲去；我拒绝去使馆已经五年，假如我接受的话，我的任期现已结束，我将会自由！然而我现在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深地“陷入泥潭”或者说“进退维谷”！工作，然后是烦恼，然后是厌倦！（《总税务司在北京》，第763函）

---

① “公使插曲”系指英国任命赫德为驻华公使，而赫德辞谢不就之事。“诈取”（robble）是英国俚语。

（1890年8月24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香港、澳门突然出现一些问题，我正在做某种改变：我们将继续驻扎，但至于办公地点等等，我们不得不在中国领土上行使职责。这使我顺便想起我曾问过你的，你是否收到葡萄牙外交部关于你授勋的任何正式信件？我从未收到任何官方的正式东西（证书或特许状除外）。因此，罗沙的信一直未回！你收到什么没有，有无称谢？如果有的话，来自何人，致以何人？我非常希望葡萄牙没有授予这些勋章，这些已被反对者们，还有中国人误解了！（《总税务司在北京》，第764函）

（1891年2月26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你认为下一季度是开始讨论老玛斯计划的时候吗？（《总税务司在北京》，第789函）

（1891年9月11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澳门与条约问题暂时已靠后放，出卖澳门现在还差得很远[①]，修约也几乎不可能在我的时代里进行。（《总税务司在北京》，第810函）

（1895年10月27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有关香港的问题正使我感到作难，海关巡逻船在那里简单执行任务就有使我接近英国水域的危险，这个殖民地是一个越来越厉害的走私中心，我必须以一种非常小心翼翼的方式处理香港问题；因为假如我们不得不放弃它，我们也要离开澳门。离开这两个地方就会诱使地方官员再次冲来夺走九龙、拱北海关——这将剪掉我们海关的“翅膀”，可能还会危及中国的鸦片厘金；当然形势是险恶的……（《总税务司在北京》，第993函）

（1905年12月3日）赫德致金登干函：

① 1891年年初，葡萄牙处于极端财政困难时期，误传葡政府已允出卖若干殖民地。6月16日，赫德电示金登干，赴里斯本探寻中国赎买澳门的可能性。但金登干认为赫德所告赎金数目太小，不具有吸引力。他见到葡萄国外交大臣后报告说，澳门被葡人视为“其王冠上最明亮的宝石”“是葡萄牙最后考虑放弃的殖民地”。

我很高兴罗沙仍然身居高位。至于澳门问题，老玛斯的想法终有一天会实现的，但现在却很难[①]。（《总税务司在北京》，第1391函）

六、关于1903年中葡《分关章程条款》及其他

（1902年11月11日）赫德致庆亲王申呈：

钦加太子少保衔花翔头品戴顶二等第一宝星总税务司赫德为申呈事。奉到本年九月二十六日钧内呈，所有新订中葡增加条约，业经备文，札知在案。约载澳门设立分关一事，现经过葡国白大臣派出阿参赞为会议之员[②]，相应派总税务司与阿参赞先行会商，并将所商项目随时报明本部核复，再与定议等因。奉此。当经函致现署大臣阿定期会议[③]，旋即届期面商一切。兹将会拟之办法十一条译法备文录呈核复。

伏思中国在澳界内设关，与在中国地方设关大不相同。拟议此事者须设法妥议，不致与界内之主权有碍，亦不致与界外之主权有损。更须设法议定以后会办实力奉行之法，以便征税缉私，两得其宜。所有会商之条款，即本此意议拟，合将现议情况呈请鉴查可也。须至申呈者。

附录条款清折一件。[④]（外务部档）

（1902年12月2日）赫德致庆亲王申呈：

钦加太子少保衔花翎头品顶戴二等第一宝星总税务司赫德为申复事。奉到十月二十七日钧札内开，中葡约载澳门设立分关一事，本部于九月二十六日札行总税务司合同葡国阿参赞商议在案。兹据申称，中国在澳界内设关，与在中国地方设关大不相同。拟议此事者，须设法妥订，不致与界内之主权有碍，亦不致与界外之主权有损。更须设法议一日后会办实力奉行之法，以便征税缉私，两得其宜。所有会商之条款，即本此意拟议等因。并将会议办法十一条录呈核复前来。本部查所议各条，尚属妥恰，可以作为试办章程，相应

---

① 此时金登干正在巴黎养病，他曾给罗沙通过电话。罗沙说，澳门“已经不中用了，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值什么，不管在商业或其他方面”。金登干表示，为何葡萄牙不将之放弃？罗沙说也许没有一个葡萄牙政府敢这样做。此后，赫德与金登干再未谈起“玛斯计划”。

② 白大臣即葡国驻公使白朗谷（Jose Azevedo Castello Branco），阿参赞为阿梅达（Gabriel D' Almeida Sanctos）。

③ 阿梅达于1902年10月15日—1903年2月11日署理驻华公使一职。

④ 清外务部以赫德“所议各条尚属妥洽，可以作为试办章程，未作任何改动”。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二）第152–153页，此处删去不录。

执行总税务司遵照等因。奉此。

当将“各条妥洽，可作试办章程”等语而交阿署大臣知照。据云，现在两面奉派所议之十一条，断难加以“试办”二字。缘所议各条，应视为条约附件，照第十一条所载与条约一并施行。此十一条即系澳门设关之大纲领，一经定明，必俟修约之期，方能增改。至开关事宜，该处应另行酌定之详细条目，自可作为试办之章，随时随事酌改所议各条。既属妥洽，即应划押结案等语。

伏思事关撤厂设关、此兴彼废之要事，诚如该署大臣所云，难加试办二字。若开办后见有不妥之处，至修约之期方可另订现议之件。若贵部以为可行，即应缮具两分（份），订期彼此画押，分别呈送销差可也。现奉前因，理合备文呈请鉴核，再行示复为荷[①]。须至申呈者。

（外务部档）

（1904年5月14日）致外务部函：

敬启者。税则载硝磺汉、英文不符一事，现据奉旨随同议约之贺、戴两税司复电称[②]，硝磺二字系属注明于汉文税则之内，其洋文虽无此二字，然洋文中之军火一语即已包括在内。若阅日本大臣二月初一日致外部之文件内载如枪炮军械子药炸爆各药及上开各物材料（铅、硝、硫磺等亦包括在内）等字样，足资考证一切矣。并云随同议约大臣之英文翻译亦无异议云云前来。

总税务司查此等条款关系重要，而禁货各类注明较包括之办法尤为稳适。现准三月二十八日来函领悉葡国尚未画押，似应乘此机会将硝磺字样即行载明于葡国洋文条款之内，以资约之用。合行函复鉴查可也。专此。顺颂日祉。

（外务部档）

（1904年7月4日）赫德致外务部函：

敬复者。奉到本月二十日钧函，以准商约大臣电称葡国议约一事，饬将寄沪说帖照录一分（份）送部等因。兹以遵缮一分（份），合行备函附呈查收可也。专此布达，顺颂

① 在赫德与阿梅达的压力下，清外务部只好让步，同意“照此办理”。

② 贺指贺壁理（Alfred Edward Hippisley），美籍海关税务司。戴指戴乐尔（Edward Taylor），英籍海关税务司。他俩多次参与清政府对外国签约的谈判。

升旗。

附：葡国议约说帖

一、光绪十二年（西历1886）与葡国议约时，其情事利于葡国者有二端：曰葡人实有澳门，曰香港允抽鸦片税及厘金与否视澳之允驳。是以有娄札之约云云①。

二、北京和好条款既定，葡国开议新约，彼时情事利于葡国者复有二端：按娄札之约，葡人可要索划定不归榷税疆界，并可索照旧定税则办理是也。嗣乃有加司台娄布阑帅未批准之约稿也②。

三、据未批准之约稿，葡国议约员允照新定税则，允中国在澳设关榷税，中国则允将澳外诸卡悉行裁撤，将澳人需以养生诸物悉予免征。稿中又允将葡人澳门三水铁路之议善为商酌等因。嗣葡国议约员复来京，申辩旧约当废，宜仿照各国近日在沪办法，更议新约，乃迁葡约于沪并议。

四、中国在澳地设关，似较在澳外分设税卡多所为优。葡人有此一端之让，中国宜有允让以报之。如澳门轮船给予行驶内河凭照、澳人养生诸物豁免税钞暨榷税疆界，可由葡人酌拟一款，载明不归抽收界限，免再勘划，中国即照允之绪端皆可也。此外更有宜商办者，则葡人允照新则与否，中国允驳葡人铁路之议，二端是也。

五、葡国原有去在澳设关之允让，中国亦日不宜允给船行驶内河凭照。

六、葡国原有要索划定疆界之权利，今彼既肯别筹分清界限之法，中国宜亟因而照允。

七、葡国原有索照旧则之权利，今彼既肯允照新例，中国宜让给别种权益，如允修澳水铁路，豁免澳人养生诸物，或允让其一，或两让之皆可。不然葡人行当倡言仍照旧则，各国闻之，亦将援利益均沾之语，起而效之，则税务大为掣肘矣。甘受税务扯肘诸难为较智耶，抑隐去致（掣）肘诸难之原（源）为较妥耶？

八、葡人允中国在澳设关，并未议及照青岛税关一律办理（全用葡人经理）。尝再四审之，此关之设，较在澳外遍设多卡，固自稍优，然亦有不甚妥协之处，何也？澳门官府于此关苟不极力维持，此关必不能得力，一也。澳外设卡，操纵任意；设关澳内，必有不得自如之处，二也。是以此次更约，设关一节，殊不必视为前不可忽之端，但中国既不在彼设关，而葡人仍有要索利益之处。则议者须详斟细酌，请都中审定后，乃可照允。恐有误许，各国即援照要索也。

九、葡国议约诸员向来皆极和平循理，惟中国有利益均沾一语，故中国此项议约，于各国已无而葡人独享之权利，则宜止而去之，如葡人可照旧定税则办理一层是也。于各国

① 娄札即罗沙。

② 此指白郎谷与吕海环、盛宣怀签订之《中葡新商约》（续修增改各国通商进口税则）。

皆无之权利，又不宜于葡人独享其端，如中国不在澳设关，而仍给澳船行驶内河凭照一层是也。此须和衷相商，通融办理乃可耳。

（外务部档）

（1908年6月3日）中英会晤问答：

朱迩典问[①]：澳门事我们可以为调停其间，贵部意思如何？

梁大人答[②]：以现在并无庸调停之处，如果将来有用调停时，再与朱大人说。

朱迩典云：葡国接贵国照会后，他们尚未答复，向我们政府诉说。我英国与中、葡两国均有交情，所以我来问用我出来调停否？现在粤督按照光绪十三年旧样办法派兵去，葡国并不认此办法。假如葡亦派兵登岸，未免有伤交情。

梁大人答：我们给他照会，他并未复，亦并未来说什么话，就去找你们英国出来说话，其有意要挟耶？澳门是我们借与他的，这几年在澳所做事，多伤中国人民感情，现粤督所办系按旧样办理，并无不合。近来亦未接该处电报有什么情形。请你电告你政府，现在尚无须调停。

朱迩典云：葡国之所以未照复，在等着我们回信，用我们调停与否。贵大臣既如此说，我即电我们政府。

（外务部档）

（1908年6月20日）中英会晤问答：

朱迩典云：昨接本国政府训条，有中国水师到澳门内港。澳政厅令其照章注册，该船不允。现在葡政府将此事告知我国政府转达中国。以前我国与葡国已有成约，葡国询其保护。现在葡国既有此事，我愿两国政府和平了结。昨间葡国公使到贵署说及伊国政府已派有划画澳界委员一人来华，与中国会同勘画。我想此事甚好。界线清楚后，免得将来轇轕。

梁大人答：你以上所说，我当面问中堂、王爷、宫保再说。

（外务部档）

（原载《岭南文史》1987年第2期）

① 朱迩典（John Newell Jordan），为英国驻华公使。此日同他一起去外务部公署的还有汉务参赞兼翻译甘伯乐（Charles William Campbell）等。

② 梁大人应为梁敦彦。下同。

英人赫德与澳门问题

澳门问题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外关系史上一直有着重要位置。葡萄牙自明代末年开始法占据澳门以来，从未得到过中国政府的承认。但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怂恿和插手，中国澳门的领土主权不断受到损害。尤其是1887年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对澳门的历史地位产生过最重要的影响。而诱使清政府签订这一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主要人物，即是英国人罗伯特·赫德。回顾赫德在澳门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刻地认识澳门的历史，而且对于正确理解当今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会有一定的启迪。

“玛斯计划”及其背景

赫德1854年来华，在中国活动长达54年，其中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有45年。赫德并不满足于海关税务，他利用清政府对国际知识的无知及其与总理衙门的特殊关系，从干预逐步发展到操纵控制中国的对外交涉，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在澳门问题上，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赫德还在担任清朝的代理总税务司时，就十分注意澳门问题。1862年，葡萄牙派遣特使基马郎英士到北京谈判缔约，企图迫使清政府承认葡萄牙对澳门的占据。当时正在南方的赫德风闻此事，马上给总理衙门写信，建议与葡国缔约时应注意几点：第一，在澳门建立海关，“由中国仍旧派官住彼，照则例征收各项税钞”，葡国不得阻挠，“如何严防偷漏之处，任凭中国设法筹办”；第二，“澳门仍系中华地土，只准西洋人（葡人）在彼居住”。每年须交租银应由过去规定的五百两增到一万二千两。他还提出不能在中葡条约中加进片面最惠国待遇（即一体均沾）[①]。

赫德如此关心澳门问题并非偶然。首先，这时他正致力于将海关的势力迅速扩展到各通商口岸。澳门作为偷漏税课、招纳叛亡和拐骗丁口的走私中心，对海关的发展极为不利，尤其是赫德最初发迹的粤海关的关税非常严重。据赫德估计，当时粤海关每年税银不过120多万两[②]，而各种走私漏税货物每年最少损失税银85万两以上[③]。其中自澳门“绕越私入内地”的鸦片所占比例甚高，以

① 赫德致总理衙门函，同治元年五月一日，外交部档，4816，第一函。
② 赫德致总理衙门函，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外交部档，4819，第一函。
③ 赫德致总理衙门申呈，咸丰十一年五月六日，总理衙门清档，第76册。

致百弊丛生。由此赫德积极建议在澳门设关，尽早完善粤海关缉私征税的机构。其次，赫德刚刚开始写涉足中国政坛，为了得到清政府的信任，他也不得不站在中国立场上来考虑澳门问题。

赫德的这些建议客观上对中国是有利的，可惜没有受到总理衙门的重视和采纳。昏庸的政府代表在与葡萄牙的谈判中作了无原则的让步，在条约中规定中国在澳门设官，其职权同于英法在澳门的领事，变相出卖了中国对澳门的主权。此约虽然后来没有交换批准，但其危险性就像代表英国利益的《北华捷报》所指出的："在此新条约中……犹如香港为英国所割取一样，澳门也将从此永远割让于葡萄牙。"[①]

1867年冬天，赫德从保护海关税收的利益出发，屡次建议清政府赎回澳门，"以清除掉这个珠江口上的走私中心"[②]。而清政府也害怕西方列强抢先购得澳门，所以很赞同他的建议。恰好翌年春天西班牙驻华公使玛斯即将卸任回国。赫德趁此机会与之密谈，要他代表中国与葡交涉。总理衙门也准备在各通商口岸借用洋商存款银100万两，作为葡萄牙撤兵澳门及交出炮台的补偿。另外还备银30万两，交给赫德与玛斯，作为活动经费[③]。

赫德称这次行动为"玛斯计划"。不料，葡国形势"忽有变故"，加之玛斯中途病故，使赎买澳门的计划无法进行。赫德十分着急，他建议总理衙门授权他的亲信金登干继续行动，并保证如果葡方派出特使接受中国的条件，"此事会在一天之内予以商定"[④]。但由于总理衙门缺乏信心，遂以金登干为"帮办税务之人"，"未便派办此事"为理由，放弃了这次尝试[⑤]。

总的来说，19世纪80年代之前，赫德对澳门问题的态度一直是比较明确的。他曾反复强调"中国不承认葡萄牙在中国领土或水域的任何主权，"并反对与澳门总督达成足以解释为，或牵涉承认葡萄牙主权的任何协议"[⑥]。

中葡关于澳门问题条约的签订

"玛斯计划"虽然受挫，但赫德一直未能善罢甘休。20年后，赫德插手澳门问题的时机终于"以另外一种方式"，导致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条约的签订。

这一事件的背景仍与鸦片贸易有关。赫德对于鸦片贸易在中国产生的恶劣影响是十分清楚的。他曾指出"鸦片无毒中国"的说法"殊属不确"，但出于维护英国贸易利益的需要，他却认为"必

---

① 《北华捷报》，第652期，1865年1月7日。

② ［英］魏尔特：《赫德与中国海关》，贝尔法斯特，1950年第596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8，第30–32页，卷59，第14页。

④ ［美］费正清等编：《赫德书信集》（1868—1907），坎布里奇，1975年，第5、6、7函。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4，第16页，卷70，第20页。

⑥ 赫德致包腊函，1871年12月30日，总税务司署统计科出版《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卷6，第524页。

待印度铲净根株”，才可能在中国真正禁烟，目前只能依靠增加税率、严禁走私来限制鸦片的进口”[①]。

赫德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迎合了财力竭蹶的清政府欲多方罗掘税源的需要。1885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决定对进口鸦片进行税厘并征。次年又在香港谈判港粤间贸易征收税金和防止走私的办法。但香港当局提出一定要以澳门同样接受为前提，形成了“若不准葡人立约，澳门必不愿照办，澳门不照办，香港亦必不允”这样一种局面。清政府不得不为此再与葡萄牙进行交涉，葡萄牙借此从中国获取期待已久的“补偿”机会。

赫德认为，中国与葡萄牙谈判“也就意味着默认葡在澳门的地位”[②]。于是，他在1886年7月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即与葡订约，“照各国一律”，“将澳门地方永租于该国”，以“允准澳门悉照香港所定章程无异”。他向清政府解释说：“如此说法，既符中国体制，且可得澳门关税，从此两国和好，必可永远照办[③]。总理衙门急于实行鸦片税厘并征办法，以增加财政收入，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这是否损害中国对澳门的主权，第二天便轻率电示同意赫德“所拟港澳各节办”，并令他赴澳门“相机筹商”[④]。

赫德很快就与澳门总督罗沙商定达成了《拟议条约》。其中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有：（一）现允葡国永远驻扎管理澳门及其属地，包括“澳门对面拱北岛上实际久已是澳门属地的那一部分”，（二）中国答应停闭澳门周围关卡，并决不在别处重新设立；（三）两国所拟条约“应按有约各国已订之章一体均沾办理”[⑤]。

我们如果将以上各条与赫德1862年致总理衙门函作一比较的话，不难看出赫德一反当年站在中国一边的姿态，完全代表了葡萄牙的利益和要求。更为严重的是，赫德超出了总理衙门所授予他的权限和训示，擅自代表中国作了无原则的让步，给以后的中葡谈判增加了极大的困难。

1886年7月29日，赫德向总理衙门报告，鉴于澳门总督卸任回国请求政府指令，拟派正在英国的金登干“随往听信”，即由金登干在里斯本与葡国政府进行秘密谈判。这次谈判历时近4个月。葡方的目标十分明确，即根据葡萄牙非法对中国领土长期占领的时效，来获得澳门的主权并试图利用清政府急于求得澳门协助查禁鸦片走私，进一步攫取新的利益。因此，葡方反复强调要完全按照赫德与罗沙商定的《拟议条约》。而清政府为了消弭国内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坚决反对《拟议条约》中进一步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特别是拱北、撤卡两款。双方争论非常激烈。经过赫德的从中斡旋，双方仓促订立了《中葡里斯本草约》。《草约》不仅“定准”同葡签订与西方列强一样

① ［美］金楷理等口述，蔡锡龄等笔述：《西国近事汇编》辛巳卷3，第45–46页。

② 《赫德书信集》第577函，1886年7月12日。

③ 李鸿章寄总理衙门电转述，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李鸿章全集》（一），第687–688页。

④ 总理衙门致邵友濂电，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李鸿章全集》（一），第688页。

⑤ 《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中华书局，1983年。

“一体均沾”的条约，而且“坚准”“葡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①]，使葡萄牙得到了几百年来从未得到的利益。从实质上看，这一《草约》同《拟议条约》并无本质的区别。

《草约》公布后，中国朝野舆论为之哗然。不仅广东地方官吏张之洞、吴大微等力主反对，就连当初赞襄此事的李鸿章也觉得在澳门问题上“中国所付出的太多”。总理衙门不得不就澳门以及属澳之地的条款问题与前来签约谈判的葡萄牙代表再作争论。赫德虽已不再参与谈判，但为了使他精心策划的港澳鸦片税厘并征计划不致落空，一方面暗示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对李鸿章施加压力，使清政府不能拒绝接受《草约》，他本人也在谈判濒于决裂时再次插手，终于用这一损害中国主权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于1887年12月1日在北京签字。

这一条约对澳门的地位问题首次作了规定，以条约的形式肯定了葡对澳门的“永久占据权”（包括行政管理权）。清政府由于对国际法的无知，对“永久占据权”的法律含义并不清楚，仅仅知道“与通商口岸之租界，迥不相同”[②]，甚至一直简单地将此看成“澳门是我们借与他（葡萄牙）的”[③]，根本没有领悟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

在中葡议约的同时，赫德一直在寻找重现“玛斯计划”的可能，以为“收买澳门的意思也或者可以打动葡萄牙政府”。条约签订后，他指出：“虽然只要中国贫弱，这种暂时协定就要容忍，但它迟早会做很大的改变的！”[④]此后几乎每年他都要提及赎回澳门的“玛斯计划”。但由于葡萄牙将澳门看成“其王冠上最明亮的宝石”，宣称澳门将是葡最后考虑放弃的殖民地，根本拒绝赫德的建议。赫德一直希望“玛斯计划”能够实现，或许这是为了洗清他在中葡谈判中的责任。但无论如何，这种以中国领土主权作为赌注进行外交冒险的行径是任何人都不能宽恕的。

《续增专条》与划界问题

中葡两国签订关于澳门问题的条约之后，又由赫德代表总理衙门同葡国签订了《会订洋药如何征收税之善后条款》。澳门当局开始与中国海关合作查禁鸦片走私和进行鸦片税厘并征计划，首先在拱北设立海关，并在澳门界内验货和征收税厘，具体管理澳门和通商口岸与非通商口岸民间贸易关税的征收。与此同时，赫德以在中葡谈判中葡方提出的撤卡为挟制，揽收了粤省六厂常税厘金以及粤海关所管全省各关、各口华船贸易，从而控制了各通商口岸往来港澳的民船贸易，进一步侵蚀

---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82年，第5页。

② 总理衙门光绪十三年九月二十七的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484，胶片第26。

③ 中英会晤问答，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四日，外交部档，0963。

④ 《赫德书信集》，下同。

了中国内地常关的税厘之权。由于通商各口同时开办鸦片税厘并征，特别是香港、澳门加以配合，从而使中国海关总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其中“海军岁入增至一千五百余万”①。澳门所收税款甚至超过了香港②。赫德用增收税款的一部分，在英国增购了海关巡逻艇三艘，分别命名为“开办”号、“厘金”号和“专条”号（指《续增专条》），以纪念他为进一步篡夺中国海关权力所付出的心血。赫德高兴地对金登干说：“自1885年‘公使插曲’（指英国任命赫德为驻华公使，而赫不就的事——引者注）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想来是很令人愉快的；我们为海关‘搞到’（nobble）了平壤、济物浦（仁川）、釜山、香港、澳门……，并且已将鸦片厘金弄到我们手中，还商订了香港协议、同葡萄牙的澳门条约、印藏条约和重庆条约。成果不错啊！”踌躇之情溢于言表。

实际上，对鸦片进口实行税厘并征，仅使中国对西方的鸦片输入取得一个固定的税额，而西方诸国在一次缴纳税厘之后即可在中国享受自由运销的权利。正如赫德自己所承认的，税厘并征“将使印度鸦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会有更大的销售量，而且对消费者来说价格还要稍微便宜一些”。这就不打自招地表明他为增加海关税收所作的努力，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保护和扩大英国商人的利益。这种“毒税”的收入越多，中国人民所受鸦片之害也就越深。

在划界问题上，赫德的表演也很拙劣。《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将葡人的永居管理权仅限于“澳门”通常是指澳门半岛上围墙以内的地区；并规定“俟两国派员妥定界址，再行特立专约”③。但葡萄牙不仅将葡人自鸦片战争以来非法侵占的整个澳门半岛和附近的一些岛屿都视作澳门领地，而且不让中国海关的巡逻艇驶入澳门水域，并企图通过划界进一步扩大占领区域。赫德作为海关总税务司，非但不去帮助中国政府与葡方的非法违约据理力争，反而站在讨好葡萄牙殖民者的立场上，竭力主张推迟讨论划界。还在签约之前，他就主张“将来过一些年，自会形成更有利的东西，葡萄牙按约占据管理澳门已经没有疑问，到那时如有需要，再着手在纸面上讨论划界”。此后，他仍然认为：“至于划界，对于澳门人来说，他们现在所享有的大量却含糊的自由比强迫中国人下决心宣布‘至此，不准前进一步’要强多了。”他批评中国方面提出划界是“愚蠢的举动”，并强调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1897年，在谈到划界问题时，他又指出：“通过划界什么也未得到，因为中国不去打扰澳门及其港口，葡人应该保持缄默和感到满足”，要葡不要去“超越这种庇护”。1902年，葡国公使白郎谷利用修约之际再次试图提出划界问题，也是由于赫德的暗示，才没有迫促划界问题的解决，而是趁机为葡争取其他方面的更大利益。

在赫德诱使下，清政府为求得港、澳当局的合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港、澳对大陆上的鸦片和其他走私并未得到有效的抑制。香港同澳门反而成为“越来越厉害的走私中心”。海关的缉私征

① 总理衙门致粤督电，光绪十三年三月六日，《李鸿章全集》（一），第802页。

② 《金登干传》，第77页。

③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123页。

税工作极为困难。赫德也感到自己已深深陷入泥潭，进退两难。1890年，他说："香港对我们（海关）在那儿办公已经厌烦，所以我们要设法移到九龙一边的荔枝兔，澳门将随之提出要求，我们也要移到马溜洲去。"赫德十分清楚，这样下去势必"会使得地方官吏发动另一次进攻来夺去九龙和拱北的海关——这将剪掉我们海关的'翅膀'，可能还会危及中国的鸦片厘金"。因此，他不惜牺牲更多的中国利益，以求得葡萄牙在澳门设关问题上的让步。1903年，赫德同葡国代表就设立澳门分关问题达成《中葡分关章程》十一条。赫德虽然声称要"不致与界内之主权尹碍，亦不致于界外之主权有损"，"以便征税缉私，两得其宜"①，实际上则以葡国允中国在澳门设关榷税为要索，迫使中国允将澳外储税卡悉行裁撤，并规定"澳门土产出口暨由外国口岸运进之货与本地人民日用食物，此数类毋庸纳税"②，使葡又得到了自1887年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的权益，中国的关税主权进一步受到损害。赫德还同葡方代表一起以"事关撤厂设关，此兴彼废之要事"为由，坚决反对清外务部对此章加以"试办"字样，要求立即实行③。但由于葡萄牙国会的拒绝批准，这一章程最后还是变成具文。赫德对澳门问题的最后插手至此以失败告终。

纵观赫德插手澳门问题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英国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英国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十分觊觎澳门，甚至几次派兵船闯入澳门。此后澳门地位虽然衰落，但由于地理位置邻近，澳门的任何变动都直接影响着英国在香港的利益。中葡关于澳门地位问题的谈判就是在香港当局的压力下提出开始的。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赴葡谈判之前，先要去拜见英国副外交大臣庞斯弗德。英国驻葡公使也一直多方打听中葡谈判的进展，甚至无理地提出由英国向葡萄牙购买澳门。虽然从现有资料来看，英国并没有能够直接插手中葡谈判，但由于解决澳门问题对香港十分重要，赫德还是命令金登干将《草约》内容秘密通过英国公使转达英国外交部，金登干在《草约》签署前通过其母亲向庞斯弗德作了详细汇报④。金登干的正式代表身份以及清廷允准签约的谕旨也是由英国使馆予以证实的。因此，认为中国与葡萄牙关于澳门地位的条约是在英国的怂恿和影响下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一点并不过分。此后，每当中葡在澳门问题上发生摩擦时，葡萄牙也都乞求英国出面干涉，英国甚至公开宣称"从前我国与葡国已有成约，葡国询其保护"⑤，以此来维护英、葡在华的共同利益。

赫德在澳门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尤其是迫使清政府满足葡萄牙攫取中国领土野心的行径，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当赫德晚年忆及此事时，他竭力掩饰其代表英国利益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损害，仅仅提到："彼时此事若澳门官宪不允，香港亦难成议，当仍派税务司金登干亲赴大西洋国，

① 赫德致外交部申呈，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兰国，外务部档，1848号。
② 黄月波等编《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16–417页。
③ 赫德致外交部申呈，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兰国，外务部档，1848号。
④ 《金登干传》，第76页。
⑤ 中英会晤问答，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外务部档，0963号。

在彼议定草约，此草约甫定，香、澳两处即允照总税务司所拟办法办理”[①]，将此作为他为中国所立的功绩。他在向清政府汇报金登干的“劳绩”时，也褒扬他在澳门问题上“竭力磋商，始克次第就绪，实为数十年来不可多得之员”[②]。实际上，这种表白和称赞都是针对英国和葡萄牙而言的，澳门所得到的只有更黑暗的殖民统治。因此，中国人民一直没有放弃与盘踞自己领土的外国殖民者的坚决斗争。只有当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再由外人插手干预内政、外交，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而彻底解决历史上遗留的各种问题。

（原载《广州研究》1987年第12期）

① 赫德致奕劻申呈，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外务部档，1670号。
② 外务部咨复，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外务部档，3966号。

论晚清总理衙门之前的“抚局”

——近代外交机构名称研究

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之前，有没有一个“抚夷局”或“抚局”之类的外交机构呢？邓之诚对此记之甚详，认为总理衙门的前身实为“抚夷局”，设局在咸丰十年[①]：

> 咸丰十年，设抚夷局于嘉兴寺。奏准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八员，轮班入值，一切俱传照军机处办理；又奏准司员轮班办事，以五日为一班；满汉各四员到署，每日派一员住宿。又奏准于司员十六名内，择满汉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奏折照会文移等事；其机密要件，内阁各员缮写；关税事件，由户部司员经理；各站驿递事件，由兵部司员经理。见《总理衙门会典》底稿；按此条不载《光绪会典事例》。局设未久，即改总理衙门。

实际上，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载有“十年，设抚局于地安门外元嘉兴寺”一语[②]。有人即以为“抚局”系“抚夷局”之简称[③]。另外，成书于宣统三年的蒋芷侪《都门识小录》和侯植忠《总署奏底汇抄》序（民国28年）都有如是记载[④]。在一些英文论著中，“抚局”被译为Conciliation Bureau或 Soothing office（抚慰局），显然作者亦将“抚局”看成是一个官衙[⑤]。

邓之诚所据《总理衙门会典》系何人何时编纂，因未见原书，不敢妄加评论。但从笔者所查阅的各种档案资料来看，却从未见到有任何关于“抚夷局”的记载。如果说“抚夷局”的简称是“抚局”的话，以上记述与档案史料相印证，也是大有问题的。

1. 从时间上看，“抚局”一词早在咸丰九年就已出现，而这几部资料都认为抚局设于咸丰十

---

①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3，第507页，三联书店，1955年。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1220，第1页，商务印书馆，1908年。

③ 王仲瀚：《清史杂考》，第321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④ 《清季野史》，第79页，岳麓书社，1985年；侯植忠：《总署奏底汇抄》序官，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⑤ 余传璋（译音）：《外交部的组织》，《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英文），1916年第1卷第一期：谢宝超（译音）：《中国的政府：1644—1911年》，第238页，巴尔的摩，1925年。

年。咸丰九年五月初，英、法新任驻华公使不顾清政府阻挡，强行到天津要求进京换约。清廷因要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决定与英、法妥协。五月二十九日，直隶总督恒福接到廷寄上谕："从来驾驶外夷，未有不肆于议抚者，专意用兵如何了局"，命令恒祺等"专门抚局"。此后，恒福还奏上"办理抚局情形折"[①]。但这次办理"抚局"因"大沽事件"而告吹。

2. 就在咸丰十年，清政府在上海、天津、通州、北京等地办理过几次不同的"抚局"，而不是如上述资料所言，只有京师次"抚局"。

（1）上海"抚局"。咸丰十年春天，正当英、法侵略军在上海集结时，太平军向太湖流域发起猛烈攻势，连续攻克杭州、苏州等重要城市。江南地主官僚集团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极力提出妥协。咸丰也急召薛焕"兼程来京，不可耽延，总以在上海抚局有成"。闰三月二十三日咸丰在两江总督何桂清的奏折上朱批道[②]：

> 该夷以兵胁和，以地要和，若自我稍缓其辞，必启彼挟制之心；若一意决战，亦必激彼无一退步，再战不休，致岁岁决战，终须归于抚局。

咸丰这番话不无矛盾之意。虽然其本意倾向于"抚局"，但对完全接受侵略者的要求，甚而借兵助"剿"，还是有些顾虑的。他后来曾明确表示："速就抚局，原属正办；若藉资夷办，"后患无穷。"[③]因此，这次"抚局"也没有成功。

（2）天津"抚局"。就在清政府试图在上海与侵略军"议抚"时，六月初，英、法联军已完成封锁渤海湾和建立前进基地的军事部署。清廷虽然已知"现在该夷抚局未定"，但并未打算与英、法作战，一再表示"总须以抚局为要"[④]。同时，它错误地把希望寄托在大沽炮台和守军统帅僧格林沁身上，认为"僧格林沁素顾大局，深得兵心，于决战之时固无罅隙之漏，而于抚局亦必能代为擘画"，希望他暗中帮助筹划"抚局"。甚至在敌军进攻大沽时，仍令"不得因业经接仗，遂置抚局于不问"[⑤]。这样，英、法联军很快攻下大沽炮台。清政府只好任命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恒祺为帮办大臣，在天津与英、法议办"抚局"。但由于侵略者肆意要挟，"若稍拂意，立即决裂，抚局转难有成"，谈判最终还是破裂[⑥]。

（3）通州"抚局"。七月九日，英法联军6,000余名向通州推进，对清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

① 《吴煦档案选编》，第4册，第215–216页，第2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4册，第305，338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1，第1932，2053页。
④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51，第1932，2053页。
⑤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4册，第429、431、464页。
⑥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15页。

咸丰一方面色厉内荏地宣布："联为近畿百姓免受荼毒，不得已勉就抚局。乃该夷屡肆要挟，努不决战不能已"；另一方面则将桂良的钦差撤掉，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由津赴通，筹办抚局"[①]，然而又因争执不下，再次中止。于是，侵略军在张家湾附近向清军开火，清军也以"抚局已成决裂"，拘捕英法谈判代表，最终发生八月七日英法军队在京东八里桥大败清军，震动北京，咸丰仓皇逃往热河。

（4）北京"抚局"。一些著作认为，北京"抚局"始于八里桥之役的第二天，即八月八日。但根据档案资料，任命恭亲王督办"抚局"的上谕发自八里桥之役的当天，即八月七日[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咸丰十年办理抚局案》[③]，对北京"抚局"有较详细的记述。此时，不仅咸丰皇帝心惊胆战，极力要求"抚局自应早定"，清廷大部分官员亦主张立即投降，如僧格林沁表示"仍望抚局有成，方为万全"。豫亲王义道更表示：

> 夫抚局诚万不得已之计，皇上之苦衷实为臣民所共谅。倘恭亲王奕（䜣）一经摇足，则抚局又裂，恐该夷势必带兵直趋木兰。万一震惊行在，则臣等束手无策。大事更不可为矣。
>
> 臣等惟有籲恳天恩，饬下恭亲王奕（䜣）仍驻城外，专心坐镇，商同桂（良）、文（祥）妥办抚局，以要其成，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次日，咸丰又下谕旨："现在事机紧迫，间不容发，朕亦不为遥制，即著恭亲王等，相机办理，总期抚局速成。"当时，北京城内一部分官吏已主动投降，并把安定门交给侵略军把守，英法联军又劫掠并烧毁了圆明园。在英法两国的武力恫吓和俄使的诱逼下，奕䜣终于代表清政府与英法侵略者交换《天津条约》和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清廷两年来所内定的"抚局"方案，于此时曲折地最终告成。总之，《咸丰十年办理抚局案》中"抚局"两字多达20余处，如"闻抚局渐有端绪""力挽抚局""抚局似觉可望有成""抚不可恃"等等，可见"抚局"与"和局""抚议"的意思是相同的，其性质不外指清政府对外妥协谈和，而非指常设的外交机关。

3. 《骨董琐记全编》等书记载北京"抚局"的具体地址是嘉兴寺内，从档案资料来看，也是不确切的。恭亲王等办理"抚局"至少搬动过5次，最初是在善缘庵。奕䜣在奏折中说[④]：

---

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37、42页。

② 《四国新档·办理抚局案》，第234页，台北，1966年。

③ 外务部金宗，第491号。

④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163页。

至臣奕䜣奉命办理抚局，于圆明园如意门外善缘庵内设立公所，两旬以来并未挪动。

英法侵略军劫掠圆明园后，办理“抚局”诸人“赶紧暂赴万寿寺，仍望再议和局，拟给照会”①。后来又因北上之路被阻，逃到距京40余里的长辛店②。由于咸丰一再要求奕䜣“于京城西北附近地方，择地驻扎”，以便竭力筹办抚局，“奏报亦较为便捷”。所以，奕䜣诸人于九月一日移驻西便门外的天宁寺，他们进城后住在德胜门内的瑞应寺中③。至于嘉兴寺，目前仅看到八月二十三日有札顺天府一文，言“办理抚局事务需用房间，著顺天府即嘉兴寺庙内房间，赶紧预备妥当，以备即日前往可也”④。此后恭亲王等才开始在此办理“抚局”事项⑤。《北京条约》签订后，跟随恭亲王办理“抚局”的蓝蔚雯也曾住此。但据他记载，此时主要办理“抚局”者都在“内城大寺院聚集办事”，“有事即来传唤，无事间二三日亦须到彼照面”⑥。

4．上述《骨董琐记全编》所记“抚局”的组织情况，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与后来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组织竟是完全相同的。如“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八员，轮班入值，一切俱传照军机处办理”，实际见于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奏定章程六条。“司员轮班办事，以五日为一班，满汉各四员到署，每日派一员住宿”及以下段落都见于酌拟新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程10条⑦。这种组织规定完全仿照军机处。在战时仓促之间，办理“抚局”决不可能有如此齐备烜赫的一套人马，至少迄今在档案资料中找不出任何佐证。

对于总理衙门之前，“抚夷局”或“抚局”究竟是否作为一个正式机构存在，此前早就有人提出疑议。周子亚在《我国外交机构沿革考》一文中认为，咸丰年间“办理抚局事宜，虽其性质为与外国谈判，然终非常设之外交机关，各国欲与中国交涉与递送文件，仍感困难；其时惟俄国与我国国交最久，一切往来文书概由军机处、理藩院办理，此项机关组织简陋，自不能视为完善的外交机关”⑧。钱实甫更为肯定地说：“根据有关资料，当时并未设立这样一个正式机构。”⑨美国学者蒙思明（S・M・Meng）在谈到“抚局”时也认为“抚局”不是一个官衙的名称。当官吏受命以温和手段镇压起义或叛乱时，就称之为“办理抚局”，如处理捻军和回民起义时即用过“办理抚局”一词。恭亲王等与英法谈和时，其身份是王大臣。因奉旨办理“抚局”，故有时被称为“办理抚局

①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166页。
② 《四国新档・办理抚局案》，第445页。
③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第180、182、234页。
④ 《四国新档・办理抚局案》，第318页。
⑤ 《顺天府志》卷16，第20页；《翁文恭公日记》，庚申50；《大清会典事例》卷1220页，第1页。
⑥ 《吴煦档案选编》，第5册，第203页。
⑦ 《吴煦档案选编》，第5册，第213、215页。
⑧ 周子亚：《我国外交机构沿革考》，《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5册，第16页。
⑨ 《清代的外交机构》，第149页，三联书店，1959年。

王大臣”。但“抚局”从未被用作官衔的名称。他还提出，从字面上看，“抚局”和“剿局”是相对的，可与“和局”“抚议”相互替换[①]。本文以上的论述，也从办理“抚局”的时间、地点以及组织等方面对邓之诚等人提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骨董琐记全编》所引《总理衙门会典》记载最详，但问题亦最多，且此会典究在何时编纂，现也不详，所以有待进一步研究。其余几部记载“抚局”资料更是晚出，且系世俗相传抄者，难免有以讹传讹之嫌。此外，在总理衙门成立之前，奕䜣曾向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透露成立总理衙门的消息，威氏首表赞同，认为“如能设立专办外国事处（务）地方，则数十年求之不得[②]”。威氏在办理“抚局”期间曾任英方谈判代表并被清政府扣留，对当时中外交涉甚为清楚。他将总理衙门看成是最早的专办外国事务的机关，而丝毫未提到“抚夷局”或“抚局”，这从另一方面也反证了“抚局”的性质。

那么，办理“抚局”与后来成立的总理衙门有没有联系呢？

首先，英法联军撤离北京之后，办理“抚局”即应结束。但一直到咸丰十年十一月，也就是《北京条约》签订的1个月后，办理“抚局”者们仍“日日有事”，“恭邸又不住府中，在内城大寺院聚集办事，迁徙五六次”[③]。这相距奕䜣等人提出设立总理衙门的建议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而这一期间恰恰是总理衙门由酝酿到实现的过程。甚至总理衙门成立之初，仍然有一段时间在原先办理“抚局”的嘉兴寺中办公。因此，办理“抚局”为设立总理衙门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其次，办理“抚局”的主要人物都是“全权钦差大臣”，都是满族皇族和贵族，这已在事实上改变了过去仅由两广总督或两江总督办理对外交涉的情况。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建立总理衙门的骨干。一些办理“抚局”的具体办事人员事后都升官晋爵，不少人成为总理衙门的帮办大臣和其他重要官吏，如崇厚、崇纶、恒祺等，“颇受指臂之效”。

再次，办理“抚局”的当权人物，在与西方侵略者的直接接触中，逐渐由顽固的排外派转化为一心依靠外国的洋务派的代表。特别以皇族奕䜣为首办理北京“抚局”，自然有相当的影响力，其势力越来越大，其地位也越来越巩固。清政府设立专门的外交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和对内推行洋务，就是奕䜣等满族贵族和官僚提出的。这反映了他们在办理“抚局”的过程中对外认识上的重要变化。

所以，“抚局”虽不是一个正式的外交机构，但与总理衙门的设立却是紧密相关的。

---

① 蒙思明：《总理衙门：其组织及功能》，第113–114页，哈佛，1970年。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第2683页。

③ 《吴煦档案选编》，第5册，第216页。

《清史稿·赫德传》补注

——兼评中外辞书传记有关赫德词目的失误

英人赫德（Robert Hart）曾长期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均有较大影响，故《清史稿》专门为之列传。这一传记较完整地记录了赫德在华的仕途经历和官职升转，并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对传主的功过得失做出了评价。其中有些材料和观点，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和利用价值，有些著作甚至将此传记作为研究的基本史料。然而，只要稍加考察即可发现，《清史稿·赫德传》在许多处都存在着严重的讹舛失误。这是由于作者当时未寓目故宫存档，更无法参用西方史料，因而在不少具体问题上都未能进行深入细致研究。作为读者有必要加以鉴别，应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即拟采用各种档案资料，对《清史稿·赫德传》涉及的若干史实加以修订、补充和诠释，以达到求实、存真的目的。同时，还想对20余种中外辞书、传记中有关赫德条目的失实之处加以订正，以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 赫德，字鹭宾，英国倍尔发司人。

赫德，字鹭宾，一字乐彬，道光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1835年2月20日）生于英国北爱尔兰阿尔马郡之波塔当（Portadown）。《清史稿》卷435列传220《赫德传》（以下简称《传》）言赫德为倍尔发司（应为Belfast之译音）人，不确，应言贝尔法斯特西南之阿尔马郡人，1853年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

> 咸丰四年，来中国，充宁波领事署翻译官，调广州，又充香港督署书记官。

《传》不确。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下册）赫德条言“初充宁波领事署翻译官，调香港督署书记官”，亦误。赫德于咸丰四年（1854年5月）抵香港，初在英国商务监督署任翻译学生，8个月后调宁波英国领事署任候补翻译，次年升为副翻译官，并曾代理副领事等职。J·史敬思言赫

德在宁波做了3年的候补翻译，似无根据①。咸丰八年（1858年3月）调往广州英领事署，后兼任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三人委员会之文案。该组织虽曾操纵控制巡抚衙门，然1958年版《大英百科全书》据此言赫德“在宁波工作短期即被调往广州，任两广总督之代理文案”②，似不符合史实。同年10月，赫德被升为翻译官③。

> 九年，改任粤海关副税务司。十一年，总税务司李泰国奉令购战舰，以赫德权代之，赴长江新开各口岸置新关。

蔡冠洛同此，均误。咸丰九年（1859年6月），赫德辞去英领事署职务，进入粤海关任副税务司（《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139页言赫于1859年5月辞广州领事馆职，就中国海关广州副税务司，似误）帮同料理广州、潮州开办新关事宜④。至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一日（1858年4月30日），因总税务司李泰国受伤请假回国，由赫德、费子洛“暂时代办”总税务司之职。赫并赴京，由总理衙门“给札派署”，负有实责，为外商制定纳复进口税之要章⑤。不久，建镇江、宁波海关。5月，建天津海关。7月，建福州海关。10月，赴长江中游汉口、九江两处商议开设不收税之新关。同治元年（1862年），才开始向各海关筹措银两，交由李泰国在英为清政府购买船炮。并复到汉口与湖广督宪官文商办按关征税之章。1862年4月，建厦门海关⑥。

> 同治二年，李泰国去职，赫德实授，徙驻上海。三年，置台湾南北新关。还驻京，加按察使衔。八年，晋布政使衔，赴缘海各地度置镫楼塔表。

《传》不确甚多。其一，同治二年四月（1863年5月），李泰国假满回任，赫德改派为江海关税务司，管理长江各口并宁波事宜⑦。同年十月五日（1863年11月15日）始升授总税务司之职，

① ［美］史景迁：《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1620—1960）》，第95页，伦敦1969年。

② 参见《近代现代世界名人辞典》，第1007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③ 外务部档，第1570号，光绪34年2月24日赫德申呈。

④ 外务部档，第1570号，史敬思：上揭书，第5页，《清史稿·食货志》，第3687页。

⑤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6，第2830页，《清史稿·邦交志》，第4527页。

⑥ 外务部档，第1570号；《清史稿·食货志》，第3687–3688页，《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6卷，第177–182页。

⑦ 外务部档，第1570号。

改饬驻扎上海[①]。许金元言同治七年总税务司李泰国归国，英人请政府委任赫德继之，甚误[②]。其二，台湾各地海关（如淡水、基隆、打狗）于同治二年（1863）先后成立，而非三年设立[③]，应言同治三年（1864）赫德并将台湾南北开设新关事宜办妥，赴京向总理衙门报明一切[④]。其三，同治四年，总理衙门以总税务司驻扎上海，遇事不便，复饬移驻北京[⑤]。同年十一月，赏加按察使衔[⑥]。其四，同治八年十月十七日（1869年11月20日）逾格赏加赫德布政使衔[⑦]。“赴缘海各地度置登楼塔表”应在同治九年（1870）。赫德曾回忆说，同治四年（1865），蒙前总理衙门准以船钞成，交总税务司办理各口内理船厅应备之件。同治七年（1868），又蒙前总理衙门奏明，将七成船钞交总税务司办理江面海面灯楼塔表之用。嗣于九年间，亲赴沿海各处勘定某处应设灯塔等事[⑧]。

光绪二年，佐定《烟台条约》。

光绪二年（1876），中英关于滇案谈判破裂，英国驻华公使骤然离京，用以胁迫。总理衙门派委赫德踵至上海，相与商允在烟台会议办法。赫即奏派李鸿章赴烟商订《烟台条约》，郭嵩焘等出使英国“陪罪”。晚清按国随时派委出使大臣定章，自此肇始。光绪七年（1881），赏加头品顶戴[⑨]。

十年，赴金陵与法使议越南案，会巡船置镫楼台湾洋为法虏，乃遣驻英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申理，乘机与议停战草约，还。

光绪十年五月（1884年4月），因中法越南交涉失败，法使巴德诺出京[⑩]。赫德被派往上海（而非《传》言金陵）面见法使，设法转圜，未果，即行回京（《传》最后“还”应指此事）。是时经理灯楼之海关巡船在台湾海面为法捕拏，乃遣驻英税务司金登干赴法面谒法相，申理此事，即乘机

① 《柯里尔百科全书》，第5卷，第546页，纽约1950年；《人人百科全书》，第6卷，第119页，伦敦1978年；《中文大辞典》，第32册，第106页，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1962年。

② 许金元：《中国关税问题年表》，《中国近代史论丛》，第2辑，第1册，第201页。

③ 《汇编》，第6卷，第177–182页；《清史稿·食货志》，第3688页。

④ 外务部档，第1570号。

⑤ 《平凡社大百科事典》，第8册，第928页，东京1985年，戴逸等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1卷，第417页；史敬思：上揭书，第112页；《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第220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⑥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0，第1页。

⑦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9，第24页。

⑧ 外务部档，第1570号。

⑨ 外务部档，第1570号。

⑩ 《清史稿·邦交志》，第4565页。

开议和局。至次年议妥，在巴黎签订停战草约。后又允派赫、金往返电议，与法相拟定详细条约，经总理衙门认可，由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在津画押完案[①]。

> 未几，其国授为清朝驻使，不就。踰年，赏花翎双龙二等第一宝星。

《传》述二事实为同年（1885）发生。五月十二日（1885年6月24日），赏戴花翎并双龙二等第一宝星，偿电报费一万余金。五月十四日（6月26日），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报告，英国已授赫德为驻华公使兼朝鲜公使。赫德自称："蒙中国政府要留，遂不赴驻京大臣之任。"六月二十四日（8月4日），以中法议和宣布中外[②]。

> 十二年，赴香港、澳门，条议洋药税厘并征，并置关尢龙、拱北。十三年，葡使来华，与订《澳门草约》。

光绪十二年（1886），赫德被派赴香港、澳门，会同邵友濂与英、葡殖民当局商办鸦片税厘拟议条款。为取得葡方合作，仍派金登干赴里斯本与葡政府签订关于澳门地位之草约。光绪十三年，葡国派使来华议定正式条约—《中葡和好通商条约》，随后赫德代表总理衙门与葡国签订《会订洋药如何征收税之善后条款》[③]。九龙、拱北海关设立、税厘开征都在此年，非《传》所言十二年[④]。叶凤美《赫德在中国》言："1883年，他（赫德）指使金登干以'维持已成局面，照顾双方面子，给葡以实利'的手法换取葡……不再坚持要求撤销（关卡）。在这基础上，签订了《中葡里斯本草约》"[⑤]，显误。

> 十五年，藏兵寇哲孟雄，英兵乘势阑入。赫德遣其弟税务司赫政驰往，与驻藏大臣会筹划界诸事。

光绪十五年（1889），赫德请求总理衙门特派其弟赫政会同驻藏大臣商办西藏边务，于此年

---

① 外务部档，第1570号。

② 《翁文恭日记》，乙酉年五月十二日、十四日，六月二十四日；外务部档，第1570号；胡光麃：《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论述此史实时似自相矛盾，参见其书第10页与第333页，传记文学出版社（台湾）1971年。

③ 参见邱克《英人赫德与澳门问题》，《广州研究》，1987年第12期，《清史稿·邦交志》，第4687页。

④ 《汇编》，第6卷，第546–549页。

⑤ 叶凤美：《赫德在中国》，《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第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六月谒见升泰，面商藏印条约[①]。《清史稿·邦交志二》言十六年二月“朝旨派总税务司赫德之弟赫政赴藏协商藏印约事”[②]，不确，且与《传》矛盾。光绪十六年（1890），赫德又电令赫政参与中印商拟划界条款等事[③]，并留赫政在彼久住，至光绪十八年（1892）复随奎焕办理善后三端（通商、交涉、游牧）条款。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1893年12月5日），又在大吉与英国特派政务司保尔、中方代表何长荣合鉴中英《藏印条款》，开亚东为通商处所，并设海关[④]。

十九年，赏三代一品封典。

《传》言年代显误，应为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1889年2月21日）。《光绪朝东华录》曰：“头品顶戴花翎总税务司赫德，久办洋税，精明切实，事事尽心，近来收数逐年加增，确著明效。归政伊迩，允宜特加褒奖以励成劳。赫德著赏给三代一品封典。”[⑤]蔡冠洛亦同，《传》误。

二十五年，与德使筹置胶海新关。

赫德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提出胶澳设关问题，并建议所有常关、民船税课由洋关税务司代征徽、归送道专案报部及海关征收民船进出口百货厘金均作为赔款、军饷之用[⑥]。光绪二十五年（1899），赫德代表总理衙门与德国公使海靖商议在青岛界内设立胶海新关，并签订《会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和《胶州新关试行章程》[⑦]。

明年，各国联军入京，赞襄和议，晋太子少保。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京后，赫德请政府留京大臣商议挽回大局之法，并催请庆亲王回京后即将所拟开办和议大纲呈阅[⑧]。赫德晚年回忆在华数十年经历，“以乙酉（1885年中法战

---

① 外务部档，第1570号。
② 《清史稿·邦交志》，第4535–4540页。
③ 《英国议会文件：中国》，第41卷，第895–899页，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551页，三联书店1982年。
④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566–568页，三联书店，1982年。
⑤ （清）朱朋寿：《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五年乙丑；《汇编》，第7卷，第386页。
⑥ 外务部档，第3942页，榷算司申呈。
⑦ 《汇编》，第2卷，第198–199页，第201–208页；《清史稿·食货志》，第3691页。
⑧ 外务部档，第1570号。

争议和）、庚子（1900年赞襄和议）之事为重大”[①]。《最新世界人名大辞典》言“义和团事起，赫德助各疆吏与各国领事，议立保护东南之约”[②]，似不确。次年（1901年12月），赏加太子少保衔[③]。

二十八年，召入觐，赐“福”字。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六日（1902年2月23日）巳正，赫德觐见皇太后、皇上，次日受恩赏给“福”字一方、绩屏四幅、磁瓶两座、绸缎四卷等。赫德“钦遵祗领，感戴弥深”[④]。自是年起，几乎历年由外务部王大臣带领觐见，具体日期为：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六日、光绪三十年正月六日、光绪三十二年一月十七日、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⑤]。

三十一年，与德使更议胶关章程，改行无税区地法。

光绪三十一年（1905），赫德与德国公使穆然另议胶海关试办章程，将从前青岛口岸租界一概免税之法，改为在租界限内征税；并另行择地一区，作为无税之地。这项税收实际上自光绪三十年已开始试办[⑥]。

寻与日使筹置大连湾新关，征榷一如胶海。

光绪二十九到光绪三十年（1903-1904），赫德多次与强租旅大之俄国当局交涉设关事宜，未果。光绪三十二年（1906），始与日本公使商订大连征税设关办法，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1907年5月30日）仿照《青岛设关征税办法》，订立《会订大连海关试办章程》。两个月后，大连关正式开办[⑦]。

三十三年，东三省度地置关。

---

① 外务部档，第3963号，光绪34年2月19日申呈。

② 《最新世界人名大辞典》，第499页，文友书店（台湾），1980年。

③ （清）朱朋寿：《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90页，《汇编》，第7卷，第386页。

④ 《汇编》，第2卷，第308–309页。

⑤ 外务部档，第3963号。

⑥ 外务部档，第3939号，光绪31年10月27日申呈；外务部档，第3940号；《清史稿·食货志》，第3693页；王铁崖：上揭书，第336页。

⑦ 外务部档，第1570号；外务部档，第394号，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八日税务处文，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七日副总税务司申呈等；《汇编》，第2卷，第585–586页《清史稿·食货志》，第3694页。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三省开放各埠后，将东北分为4大区，各派税务司前往设关，先后设立安东关及大东沟分关，滨江关及满洲里、绥芬河分关，并订立《洋土各货运往东三省新开各埠章程》[①]。

踰年，谢病归，诏许之，加尚书衔。

光绪三十二年（1906）始，赫德即提出辞呈，未允。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1908）又提出申呈，言“近年新开口岸暨自开商埠年见增多，加以邮推广事宜，以及代办各日常税事务，日形烦剧，精神已觉不支。不意去岁忽患内伤之症，尚未医治就痊，近复夜不安眠，异常困惫。据医士云必须请假回籍，静养调理得宜，方能渐就痊可”[②]。不久奏准赏假一年[③]，《近代现代世界名人辞典》曰赫德请准两年官假[④]，误。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8年1月28日），准军机处交片，奉旨：“总税务司赫德在中国总司榷务，宣力有年，卓著成效。国家深资倚重，所有承办各事，悉臻妥协。著加恩赏给尚书衔，以示优异”[⑤]。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1908年3月26日），以赫德请假回国，慈禧赏珐琅瓶、瓷果盘等物[⑥]（《中文大辞典》曰赫德至光绪三十三年请假回国，《最新世界人名大辞典》曰宣统间休职回国[⑦]，均误）。

赫德官中国垂五十年，颇与士大夫往还。尝教其子习制艺文，拟应试，未许。

赫德曾于宣统元年四月十五日（1909年6月2日）致电裴式楷，言“今日为供职中国五十年届满之期，即籍是日电请转达部宪，恭请勋安，以志感激之忱，并表依恋之意[⑧]”。税务处·宣统二年二月十四日文称赫德“办理海关愈五十年，筹画精详，素称得力”[⑨]。另一文件亦曰：“赫德自成咸丰九年到关，游擢今职，统计前后，综理榷务五十余年，心力交殚，贤劳懋著”[⑩]云云。赫德曾延翰苑名宿课其子赫承先习八股试帖，欲援朝鲜人金简例纳监应北闱试，卒不许[⑪]。赫承先后任驻

① 外务部档，第1570号；《清史稿·食货志》，第3694页；《汇编》，第2卷，第590页，602–603页。
② 外务部档，第3963号，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四日税务大臣奏片。
③ 外务部档，第1570号；《汇编》，第2卷，第611页。
④ 《近代现代世界名人辞典》，第1007页。
⑤ 外务部档，第3963号。
⑥ 外务部档第3963号，光绪34年2月24日信。
⑦ 《中文大辞典》，第106页；《最新世界人名大辞典》，第499页；许金光：上揭书，第204页。
⑧ 外务部档，第3963号，裴式楷宣统元年四月十五日信。
⑨ 外务部档，第3966号，税务处宣统二年二月十四日文。
⑩ 外务部档，第3966号，税务处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文。
⑪ 杨德森：《中国海关制度沿革》第31–32页，商务印书馆，1925年。

英副税务司、税务司等职[①]。赫德逝世后不久，辞去海关职务。

> 总署尝拟请受总海防司，道员薛福成以其阴鸷专利，常内西人而外中国，上书鸿章力争之，议始寝。

薛福成以李鸿章有意让赫德掌防之权[②]，提出："中外魁柄潜移于不觉，此履霜坚冰之渐，不可不慎也。"[③]沈葆祯"以中外人员共事不易，且以赫德揽权为虑"[④]。张之洞更明确表示："教练海战实是西人所长。赫德愿觅两人助我教练海防，其说未尝不可酌采，但须权操自我。"[⑤]遂未定议。

> 辛亥后，病卒，赐优恤。

赫德病逝于宣统三年八月三日（1911年9月24日），应言辛亥年病卒于英国勃克斯之大马尔罗[⑥]。8月4日在英举行葬礼，同日中方在宣武门西象房桥安立甘会教堂举办追悼会。清廷颁布上谕，加恩著赏赫德太子太保衔，其子赫承先著赏换双龙二等第三宝星，以示优异[⑦]。

> 赫德久总税务，兼司邮政，颇与闻交涉，号曰客卿，皆能不负其事。

赫德自咸丰九年供职中国海关，到光绪三十四年归国，除同治五年（1866）请假6个月，光绪三年（1877）请假1年外，一直在华工作，所有通商各口设关征税事宜均由其经手创办。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赫德建立海关50处，管理常关19处、厘金7处，海关职员6,600余人（其中洋员1,300人，占20%）、邮政职员7,900人（其中，邮政洋员100余人），全国各级邮递局2,800余处。同年，所收税钞、船钞及常关税3,700余万两。其他如办理船厅，设同文馆，赴各国赛会，亦由其经营规划。遇有交涉，时备咨询。清廷叠晋崇封，历经赏加恩宠，古今无有任何外人可与之比拟[⑧]。

---

① 外务部档，第0751号；第749号，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税务大臣文，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税务处文。

②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9。

③ （清）薛福成：《庸庵全集》文编，卷2。

④ 《总署奏底汇钞》（抄本），第37册，光绪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具奏。

⑤ 《总署奏底汇钞》（抄本），第37册，光绪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具奏。

⑥ 《柯里尔百科全书》，第9卷，第546页；《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册，第733页，大百科出版社，1985年。

⑦ 外务部档，第3963号，安格联宣统三年八月二日信，赫承先公元1911年9月26日（收到日期）电文译稿；税务处档，第2号。

⑧ 《汇编》，第2卷，第614页；外务部档，第3979号。

关于《英商否认海关洋员违章处分的管辖权和（会讯船货入官章程）的制定》的补充

对外商罚款成充公的私货查缉制度是中国近代海关史上有关赫德评价的重要问题之一。已故厦门大学陈诗启教授对此曾做过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他的《英商否认海关洋员违章处分的管辖权和（会讯船货入官章程）的制定》（载《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资料宏富，分析透彻，是迄今有关这一专题最为详尽的论述。这里，笔者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对这一问题做一小小的补充。

一、会讯章程的最早提出

陈先生在论文中指出，早在1862年，额尔金就提出组织一个由中英两国组成的混合法庭以审理关税案件。这一建议受到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的支持，并向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作了介绍，赫德也获悉了这个建议。但这一建议后来并未成功。赫德认为还是使用中外会讯的办法为好。他说："会讯可以让商人公开起诉，详核证据，通过全面审讯，然后进行裁决，这才可以妥善解决关税案件。"这种办法虽然破坏了《天津条约》和《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规定，剥夺了中国违章处分的管辖权，但总理衙门既无法执行处分，就只好屈服于外国的压力，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是赫德最早提出了中外会讯的方法。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对此语篇不详。他只提到李泰国任总税务司期间，曾将英国律师对有关没收、罚款的意见通知英国公使，后者深表赞同，当即命令驻上海领事遵照内开原则行事。美国公使也承认了这些原则。但他强调指出，这些原则"并未含有这样一项建议，即主张筹设调查法庭，以便在该法庭中当众审讯违章案件并宣告有罪或无罪"。于是，当1864年赫德劝请上海中国当局将事关罚款的案件交由领事法庭管辖外，对于一切事关没收的案件，则试行一种会讯制度以作为实验的时候"，各国驻华公使都"表示赞同"（第209–210页）。莱特的这段叙述基本与陈先生的意见相同，亦认为赫德最先提出会讯的方法。

然而根据笔者所见到的档案资料，有关会讯没收入官的建议最初是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和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提出的，而不是赫德。总理衙门于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赫德的信函中（外务部

档，第1819号，第16函，下同）提到，卜鲁斯和蒲安臣在此前不久正式以照会形式向清政府提出，关于洋商违例受罚之事，“拟以领事官会同税务司审讯，开具供词，送请监督阅看。应否入官，听中国裁夺”。在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致赫德函中也说到“本月内因办理各商罚款，英美两国钦差各有照会，并粘附十条（章程）会议前来”（同上，第17函）。现在尚未找到这10条章程的具体内容，但从以上所引数言还是可以窥见其基本意思，即在承认中国对违章处分具有单独裁判权力的前提下，提出由外国领事官同海关税务司共同审讯，并将审讯供词送请海关监督定夺。此时赫德并不在北京，对会讯章程的内容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因此，似不能说赫德最早提出了会讯章程。

二、总理衙门对会讯章程的态度

陈先生在谈到赫德与会讯章程的关系时引用了赫德在1861年说的一句话：“我因能够诱导中国当局在江海关试行会讯的计划而感到满意”以此说明总理衙门在此问题受了赫德的压力和影响。

笔者认为总理衙门早期对会讯办法有明确的态度和办法，与赫德关系似乎不大，并且与1861年赫德拟定《上海海关扣留案件条款》亦是两回事，不应放在一起考察。在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的信函中，总理衙门一方面明确表示“洋商犯约，照例罚充入官，条约业已载明．是罚充之权中国独操．领事官不便过问”，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实际情况（当时清政府已无法执行这一权力）及英、美公使的照会压力，故决定“拟分别办理”，“如有受罚之洋商不愿缴罚款，准其呈明海关会同领事官会讯”。但总理衙门特别提出一个前提，即外国“领事官到任时，必须得有中国愿意接待文凭，方能到任办事；嗣后如有不公，任凭中国照请更换”。这一要求得到了英、美公使的赞同。因此，总理衙门对英、美公使提出的10条章程进行了删改，另拟了有关会讯的7条章程。其主要内容如下：

> 强调一般违约走私案件与贩运违禁货物案件的区别。前者经各关查出，照约议罚。该商即应遵缴罚款，不得抗违。如果双方各执一说，该商不愿遵缴罚款，姑准该商禀请海关会同领事官当堂讯问，取具结实供词，送交中国监督判断。如属后者情形，并到不通商口岸贸易，则无论在何处查出，其船货立刻入官。这种情况不在此次所议之内，亦无庸会同领事官审办，至于审办受罚之事，系中国格外体恤洋商起见，不能援照治外管辖权之例办理。
>
> 参加会讯人员及地点。由海关监督派员会同该口税务司并领事官共同讯问，地点不能在外国领事公署之内，应由监督预定处所。
>
> 会讯办法。按其所犯情节证据秉公讯向，不得仅凭设誓即可完案。以查拿时情节为凭，及关上插手巡役为见证。并强调要先行出具甘结，即需写明并未在各关犯过走私漏税

之案，倘定案后查出曾在别关犯案有据，情愿罚银两等语。甘结由领事官画押，声明代为保交罚银，存于海关监督处备查。

裁夺办法。会讯录取供单后，中国委员及税务司与领事官均须画押，然后送海关监督，听其裁夺。如果监督断以入官，领事官以为不可，则须将案内一切情形及全案见证供词抄录分别呈送总理衙门及各国驻京公使，以便两国官员会商定断。无论裁夺结果如何，洋商均不得禀请赔补。另外，还规定了审讯上诉期间防止货价失时的变通方法。

以上章程就是总理衙门在英、美公使的压力下提出的一套解决方法，似与赫德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三、赫德与会讯章程

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赫德收到总理衙门关于会讯章程的信函及附列7条章程。他虽然没有参与这七条章程的拟定，但他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总理衙门的申呈（同上，第20函）中提出比较详细的意见，这些意见对总理衙门以后改定会讯章程起了较大的作用。

赫德指出，他进入海关五年来，“各关办理入官、罚银各案总觉欠妥”，其根源就在于“甫办之时，谁恐稍失其权，未问细情，一味颟顸办理。迨该商不服，领事不依，详由公使行文来问，反不能不改办”，“罚者或改为不罚也，入官者或改为不入官”。“则要保权而反失权之大概也”。

赫德认为解决的办法有三：第一是领事官独自审断。但“此与关务大碍，于在关办事之人尤大不便，中国之权尽让领事，此大不可也”。第二，税务司会同领事官定断。这一点“亦与关务有碍，中国之权以与领事平分，此亦不可”。第三就是会同讯问。他强调“会同讯问并非全断”，只是由监督派员会同税务司及领事官“公同讯出实协便了，并不完断”。而“或应入官，或应照罚，仍由监督自行定断，则其权仍在中国”，这样领事官参与会讯就只不过是“帮审”，“而不能做主”。洋商“既难狡辩，领事亦难袒护。日后监督据供定断可无翻案之虞。即或该案难定，详到上宪，众供确凿，上宪尤可一览而知，仍可照断，不至宽纵”。总之，赫德称此为“一劳永逸”的方法，“定断之权仍是中国独操，此则似以让权而实永保其权”。他还对总理衙门所拟的7条章程“逐条细阅”，认其加以增删，改成6条章程。总理衙门阅后“极为欣悦”，认为“洵属周备”，并夸奖赫德“实能认真办事”，一切事宜都要等待他到北京后“勘酌办理”（总理衙门致赫德函，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同上，第22函）。

实际上，赫德在此问题上的两面手法是很明显的。他在上引申呈中口口声声坚持入官照罚之权仍在中国，但时隔不久他就在1888年第19号总税务司通札中宣布会讯制度仅仅针对事关没收的案

件，而将有关罚款的案件仍交领事法庭管辖（莱特上引书，第210页）。这就完全违背了总理衙门所拟章程的主旨，分割剥夺了中国海关违章处分的管辖权。此后在增改的《会讯船货入官章程》中虽然包括了罚款在内，但同时又规定其动议开庭会议之权应属于领事，由领事传唤开庭，并在领事馆举行会讯，开庭时税务司本人或委员应与领事同坐在审判官的席位。这又违背了总理衙门所拟章程有关参加会讯人员及地点的规定，完全排斥了中国海关监督。在具体办案过程中，领事官和税务司又以提高办案效率为名，常常先行彼此关照，或当面会商，或文书往来，事实上已经无须经由监督办理，监督的作用只是徒有其名而已。至于清政府特别强调的具结以及审讯上诉期间对被扣货物的处理办法，在赫德经手增删的会讯章程中不是予以取消，就是加以删减，使会讯章程原先仅有的一点儿限制作用完全潜消于无形。

总之，在会讯章程最后形成的过程中，赫德以“似让权而永保其权”为诱饵，使清政府在违章处分之管辖权问题上欲保其权反而牺牲了主权。

有关晚清福州税务司美里登的档案史料

西方列强以不平等条约胁迫清政府接受协定关税之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取得了对中国海关的管理权。从此，各级海关洋员凭借对海关的控制，开始参与清政府的政治、军事和其他事务，使中国近代的各方面发展受到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由于资料的缺乏，史学界对于旧中国海关的各级洋员一直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除了诸如李泰国、赫德、金登干、德璀琳等特殊显赫的人物已受到不少史学家重视之外，迄今尚未见到有关一般外籍税务司的专门论述。笔者在有关方面的协助下，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引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中，发现了有关福州海关法籍税务司美里登早期较为完整的信函资料《税务司美里登信函总案》及其他档案材料。在此，笔者不揣浅陋，对这批档案做一初步梳理和介绍，盼望对中国海关史的研究起到一点儿作用。如有疏忽错误之处，深祈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美里登（Eugine，Baronde Meritens），亦译作美理登或米里登，法国人，1857年来到中国，曾担任法国驻华使馆翻译。1860年法国特使葛罗男爵（Jean Baptiste Louis，Baron Gros）来华与清政府签订中法《北京条约》，他以翻译身份陪同。1861年，美里登进入了以英国为首的，由各资本主义国家人员组成的中国海关，担任福州海关税务司达10年之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所藏《税务司美里登信函总案》，就是清政府官员与美里登于1862—1863年之间的通信汇集。从这些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参与镇压太平天国

美里登来华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着，清朝统治者开始准备联合外国势力对太平天国实行镇压，因而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在与清朝官员的交往中，美里登也已经看出清政府是西方列强可以利用的工具。因此，他很快成为中外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

美里登于元治元年初担任福州海关税务司。不久，即致函福州地方政府，建议地方官员亲临齐界口，“筹划守御攻剿之策”。他认为，各省“致乱之由”，都是由于当地农民暴动，而后太平军才“乘乱而来”。所以，“与其事后扼腕无及，不如预先设法筹防，以期安靖地方”（同治元年二月十六日函）。他表示愿意全力以赴帮助清王朝，扶植并强化它的统治力量：

敝司虽职守税务，唯是管理海关。而睹此河山，亦不欲竟被逆匪扰乱，故尽厥职……欲报效国家，特献万全之策。（同上）

甚至还夸张地表白自己说：

苟利中国，敝司无不力行，只期赤心报国，谅贵大臣以腹心相视知。敝税司虽外国之人，尽心襄赞，原无异于中国人也（同治元年三月十七日函）。

美里登在支持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方面确实出了不少力。首先，他认为“当道者不图远计，足以隐忧，不得不预为设法”。并提出：上下军民人等，莫不以食为天。无食必生内乱。况当逆氛逼尔，邻疆省垣米价高昂，军民糊口孔艰，何暇计及拒敌？（同上）

因此，他建议“当先整顿粮食，以固根本”。并协助福州府官吏组织商贩速从台湾运米来闽，同时催促洋商也抓紧贩运米粮。“如此米价略平，民困可以稍苏矣”（同上）。解决了清朝统治者的一大难题。

其次，美里登向清政府系统提出养兵、用兵和防剿的训练对策。美里登对清王朝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腐败现象十分清楚。因此，他认为，清朝军队即使利用轮船、洋炮，也只能操六七分必胜之势。

“尚有三分赖统兵之官恤兵养士，粮饷无稍亏欠，足其衣食。然后驱之以从戎，用之以利器，则无往不克，全胜之权可操矣。”他向总理衙门提出建议：“外国之兵所以肯用命者，皆由营官素得养兵之道，口粮、衣服、资费按期支给，毫无拖延扣折，所以临时踊跃前驱。中国若不整顿营规，革除旧习，虽有利器，将焉用之？”（同治元年三月十七日函）。他认为各军营应该建立新制，造具名以免虚报之弊，士兵才能“一心专望立功，志在必战矣”。他还别有用心地提出：

倘贵大臣虑中国欲整军政，难得熟谙之人兼理，则于各口洋税关中遴选一二人，试办一二年，必有可观之处。（同上）

这反映了美里登确实存有直接插手清政府军事事务的企图。

再次，在南京被清军围困、太平军在江南的活动接连受挫之时，美里登向总理衙门提出了分化瓦解太平军的阴险计策：

当此贼势稍衰之时，若许以自新之路，凡厥胁限一月之间准其解散回籍，罔究前愆，

请旨宣谕各处，使之闻知，逆匪有冰消瓦解之势矣。羽翼既散，元恶易除。若不分首徒，志在一起扫清，犹恐有困兽伤人，残灰未尽之虑。（同治元年六月十八日函）

最后，在筹借镇压农民起义款项的过程中，美里登也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同治元年底，总税务司赫德为购买新式船炮，以镇压太平天国，在沿海各海关筹措关税，命福州海关拨银十万两，厦门海关拨银五万两，但实际上这两处海关无银可付。美里登即表示：

敝司既受国恩，亦当同心协力，为国设筹，遵谕赴办。冀船炮早到，逆匪速除，方为妥善。（同治二年四月十五日函）

并主动请求前往香港代借银两拨付。到次年年初，美里登“费尽苦心”，终于以极高的借贷利息（年息八厘，当时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借贷一般为年息三厘）为清政府借到了所需的银两。他在致总理衙门的信函中这样写道：

筹借银项，并非易事。只欲国家早致升平，故不禅竭力赞襄，望即阶察悱诚。（同上）

处处表现出他对清政府的一片“真心”。清朝统治者对美里登在“闽省随同剿贼”中“全力赞襄”是非常感激的。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清政府在论功行赏时给予美里登以极高的奖励，赏给头等金功牌一面，大荷包一对、小刀一把、火镰一把、绸缎四卷等（北京大学藏总理衙门清档第87册，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上谕）。

参与海关的活动

美里登所参与管理的中国近代海关是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在监督对外贸易、管理税务方面，他和其他外籍税务司以维护西方国家在华利益为根本要旨，是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忠实推行者。但同时，他们作为清政府的特殊雇员，为了维护海关业务的正常发展，毕竟需要坚持有关中外条约的规定，必须对各国不法商人的走私偷漏和各种违章行为进行处理。否则，海关就无法增加收入和提高威信，他所希冀的其他目的更无从谈起。这种特殊身份，使美里登既为清政府所忌惮，又为清政府所倚重。

同治元年四月，英国商船“白里”号，从非通商口岸金门私贩清政府禁运的食盐到福州，被美里登发现。他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声称有权将船货没收。英国领事则有意偏袒英商，阻

挠海关秉公办理。其理由是除非该船是在非通商口岸交易被当场抓获，否则不能援引条约办理。美里登尖锐地指出“此语大错”，“如此是不能禁人违禁，直欲助人违禁也”。况且，“查天津和约亦无载定金门关可拏违禁洋船，福州关不可拿违禁洋船之例”。（同治元年六月十八日函）他还慷慨陈词地说：海关系“中国地方国课攸关，自应秉公办理，各尽所司”，不能听任英国领事的无理干预，否则“海关将成何海关，不几若领事官之委员乎？”（同上）。

英国领事无词以对，只得承认英商违禁，但又要求海关从轻处理，免予没收。美里登并不松口，他认为此案“若不彻底究办，诚恐各国商船无所示惩，效尤日众”，“任听洋商舞弊？”他主张“执法办理，将百里船货一并入官，惩一儆百，使闻风者不敢再犯，以期杜绝弊端”。（同治元年七月五日函）他还积极向清政府提出：“情犹可循，而约实不可背。”（同治元年八月十三日函）

英国领事见求情不成，就擅派兵船将“白里”号及所装私盐强行护送出洋，逃之夭夭。这一事件引起中英两国政府长时期的外交争议。美里登一方面要求总理衙门向英国驻华公使抗议英国领事官“擅行自专”，并议定章程：“凡商船私到别处沿海地方贸易，亦准各口税务司拿办”，同时，美里登密切注视“白里”船的行踪，在这一商船第二次违约贩运时，将船货一并没收，打击了不法英商的嚣张气焰。

同治二年四月，美里登得知英国“威加里”号商船拟向太平军贩卖鸟枪炮械，便立刻亲往捉拿，共搜出军火六十箱，一千二百件，值银二万两，全部“抄没入官，以备国用”。（同治二年四月十五日函，同年七月二日函）他还雇佣轮船到浙江温州地区查缉走私洋船，并抓获到四艘走私商船。（北京大学藏总理衙门清档，第82册，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函）

这些举动自然得到了清政府的大力赞赏，在清朝官员致美里登的信件中不断可以看到清政府对他的褒扬和肯定，认为他“执法严明”（同治二年七月三日三口大臣致美里登函）、“若各口皆能如此秉公，则税务日有起色”（同上），又说他：“公正无私”“办事公正，破除情面，惩一儆百，杜绝弊端，于各海口税务大有裨益”云云。（同年七月十三日三口大臣致美里登函）

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近代海关在改变清朝传统海关恶劣积习方面确实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美里登等部分外籍税务司对海关的管理比较严格，工作效率也比较高。因此，各口海关税收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在防范和缉查某些不法外商的走私活动中，他们更起到了部分清朝地方官员所难以起到的作用。对此我们毋庸讳言。

干涉地方事务

晚清把持中国海关的外籍税务司多具有强烈的政治背景，美里登自然也不例外。他利用职务之

便，在海关范围之外不断干涉地方事务。这一方面的内容在档案史料中也多有反映。

美里登刚到福建，看到地方官吏没有及时仿效江南地方官吏竭力谋求外国军队帮助镇压太平军的行动，十分不满。他说：

> 自去岁统师援浙，迄今尚在建宁，坐观失地，空耗钱粮，口则能言，而行实未逮……兵勇不遵约束，骚扰民间……无怪号令不行，以致兵民两困。（同治元年三月十七日函）

他向总理衙门提出应该撤换现任的福建封疆大吏，甚至直接提出他认为理想的人选：

> 如欲另选能员，则管理三口通商崇（厚）大人亦堪当此重任，如果蒙恩简命前来统治金师，敝司当从卒戎行，愿效驰驱。（同治元年三月十七日函）

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而美里登与兼管福州海关的闽浙总督及福州将军的矛盾自然也就不断加深，他感到"相处实属碍难"，以致有时跑到上海向李鸿章申诉他的"冤屈"。（同治二年七月二日函）

美里登与地方官吏的矛盾在修建福州附近的公路时表现得很充分。他看到福州海关所在地南台口至外港罗星塔（马尾）之间只有水路出入，交通很不方便，他从开拓外商在福州的商业贸易出发，建议修建一条公路，由地方政府购买民田，地价由福州海关和地方政府分摊，修路费用则由美里登负责向外商捐助。（同治元年六月十八日函）但地方政府以附近农民反对侵占农田庐基为由，迟迟不予办理。美里登十分不满，不断上函给总理衙门。他认为虽然洋商现在可以利用公路运送货物，得以方便，但"去后非其所有"，"此路开成，实系中国之益"。（同治元年七月五日函）以此来说服地方政府听从他的建议。后来沈葆桢发现外籍税务司在福建"硬占民产以开马路"（外务部全宗，第5126号），就是指这一事件。总理衙门对美里登借修路之事干预地方事务也老大不悦，于是严正警告他：第一，有关税务之事，必须报知总税务司转呈办理，"以昭画一"；第二，"关涉地方事件，贵税司不必过问可也"。（同治二年七月九日函）

美里登虽然仅仅是管理福州海关的税务司，但对隔海而望的台湾却极为关注。他很早提议台南、打狗两处鸦片走私严重，若"准予通商，就地输税，务必有起色"，希望为西方商人打开新的通商领域。这一想法得到总税务司赫德的支持和采纳。（同治二年七月二日函）台湾开关后，他又进而觊觎台湾的矿产大宗——煤矿，上书力陈采煤之利，希望租下台湾鸡笼山开采煤矿。这一要求又遭到地方政府和当地士绅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得逞。（《同治筹办夷务始末》卷50，第34页）

美里登此后又多次干预福建船政及地方水务，虽然屡遭失败，但仍四处活动。因此，有人感慨

地说："此人在闽，终是一蠹。"（英桂同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函，《海防档·议设船厂）。

美里登的档案史料所涉及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这里仅仅摘录其中的一小部分（见下表）。美里登插手广州法国领水馆，与英国争夺法国在华势力范围，干预福州船厂水务，在档案史料中都有非常真实的记载。认真研究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对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外籍海关税务司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有关美里登的档案一览表

编号	年代	内容	出处
1	同治元年 二月十六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函 自陈感激微忱，并向省民情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1289
2	同治元年 二月十六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函 请闽省剿办福宁土匪以靖内患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3	同治元年 三月初一	总理衙门致三口通商大臣函 因枢廷碍难复美里登信函的原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4	同治元年 三月初四	三口通商大臣致总理衙门函 遵示答复美里登信函，并抄送原稿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5	同治元年 三月十七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函 陈说闽浙近日用兵情形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6	同治元年 四月初一日	总理衙门致三口通商大臣函 美里登呈文大人信函代为数答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7	同治元年 六月十八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文大人函 台湾土匪滋事并罗星塔等案由。附美致 闽海关书信一件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8	同治元年 七月初三日	总理衙门致三口通商大臣函 抄送复美里登信稿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9	同治元年 七月初五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函 白星船 罗星塔等案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10	同治元年 七月十三日	总理衙门致三口通商大臣函 代复美里登信函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11	同治元年 八月十三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文大人函 历陈英领事办理白星船不善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12	同治元年 十月初六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函 条陈福建事宜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13	同治二年 正月二十四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函 请办星罗塔一案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14	同治二年 二月初二日	总理衙门致美里登函 白星船案调理甚好，罗星塔开路应等 徐中丞级为办理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续表

编号	年代	内容	出处
15	同治二年 四月十五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函 评论闽省练兵通售各事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16	同治二年 四月十五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函 要信一封烦转呈总理衙门文大人当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17	同治二年 四月十五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函 练兵一事请先练百日，罗星塔开路请向 洋商借款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18	同治二年 四月十五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函 续拨购买船炮银十五万两国关库支出， 前往香港代借十万。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19	同治二年 四月十五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函 厦门已付银两万两，赫税司赴船炮复往 香港代借五万两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20	同治二年 七月初二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函 星罗金正福船一案，望速赐咨复等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21	同治二年 七月初九日	总理衙门致美里登函 以后美税务必报明总税司转呈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22	同治二年 八月十二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函 台湾新关收税请准办，金正福船并陈练 兵运米办铜租轮船等情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23	同治二年 八月十二日	美里登致总理衙门函 雇转船在温州缉私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24	同治二年 八月十八日	总理衙门致三口通商大臣函 代复美里登信函由	外务部海关税务档 4289
25	同治七年 正月初八	福州将军英桂致总理衙门的 对关税司要以淡泊遭之，并事事加意提防	钦命总理衙门清档 议政船厂
26	同治六年 七月十四日	福州将军英桂致总理衙门函 美里登谬妄喜功亦必拒之	钦命总理衙门清档 议政船厂
27	同治六年 十月十四日	英桂致总理衙门的 关税司拟北上，各与赫总税司会商，度 其意必别有所图	钦命总理衙门清档 议政船厂
28	同治六年 十一月初八	英桂致总理衙门函 关税司此人在闽，终是一蠹、居心行事 尤宜提防	钦命总理衙门清档 议政船厂
29	同治六年 十一月初八	英桂致陕西总督函 关院司此人在闽，终是一蠹、居心行事尤宜提防。 英桂致船政大臣函 关税司此人在闽，终是一蠹、居心行事 尤宜提防	钦命总理衙门清档 议政船厂

试述晚清档案中有关中国海关的资料

晚清中国海关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个特殊机构，它与政府其他部门，尤其是外交部门，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在研究海关与中国近代外交关系的过程中，曾经走访了不少的档案馆、图书馆和科研机构，对散藏各处的与中国海关有关的档案资料进行过调查和研究。本文对此做一简短的介绍和评述，希望对于研究中国海关史的专家学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一档案馆位于北京故宫之中，收藏了明清两代（1368—1911）的各种档案文件，如两代各朝皇帝颁发的诰、谕、诏、旨，亲笔批写的手书，“朱批”，各级官僚贵族给皇帝上的题奏本章及其夹片夹单，由朝廷或宫廷有关部门编制和保管的各种实录、起居注、玉牒、档册、舆图、史稿等等，总数有900多万件。反映近代中国海关各方面情况的资料主要集中在以下各全宗档案和文种：上谕档、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杂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外务部档、税务处档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是中国海关各级机构与清王朝统治机构之间的往来文书，这部分内容最为丰富，包括谕旨、各衙门、各海关及驻外使节的奏报、电报、咨文、移文、扎饬、通告暨禀、呈、申、译等各种文书；第二是有关海关各项事务的外交文件，如国书、照会、函牍、条约、合同和会谈记录等；第三是海关官员的私人信函和其他属于私人性质的文件，但为数较少。这些文件从广阔的范围和不同的角度，记录了海关行政和业务的各方面史实。

在税收方面，宫中档朱批奏折第四类“财政”列有专门的海关税务项，外交类也有不少类似的原始记录，如编号045为曾国藩等关于预筹与英修约事宜并与英使会议增税问题的文件（1862年，胶片3）等。军机处录副奏折财政类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各海关历年关税报表。总理衙门清档和外务档中的关税方面资料亦较多，如编号4236《议征子口半税案》（1862—1864）、编号0624《外务部、英使等关于英法拟改新定税则及关税抽金等文件》（1869—1904）等。在商务方面，有《英国请在安庆、芜湖、大通三处通商案》（外务部档0644号，1862—1863）、《借船运来案》（外务部档4830号，1860—1863）等。在缉私方面，有《英商偷税案》（外务部档683号，1862—1863）、《严杠奸商济匪案》（同上4361，1861—1864），关于中国海关依照1880年中德《续修条约》和《续修条约善后章程》所建立的关栈制度，外务部档0633号提供了完整、丰富和确切的依据，其中包括海关总税务司与总理衙门、江海关官员为开设关栈问题而互寄的各种密函，由总税务司提出的

《英国关栈择要章程》和《上海关栈详细节略》等文件。在海关官员与清政府的来往信函汇编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外务部档4819号《总税务司赫德信函总案》（1861—1863）和一个法籍海关官员《税务司美里登信函案》（同上4289号，1862—1863），对于研究海关早期的建设情况，以及外籍海关官员与清政府、各国驻华使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有重要的价值。此外，在海关的对外交涉方面，有中英续订商约、互换西藏通商章程过程中的各种文件（外务部档0625，1902—1908），中法商业税务交涉文件（同上1063号，1869—1911），中葡关于澳门设关、修改税则的文件（同上1848号、1850号，1902—1911）等等。

其次要介绍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所藏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这批清档共有324册，分装25函，年代自1860年至1901年，编号为NC47151／2126。北大藏的档案有相当一部分都与中国海关有直接关系。在英字档中，有反映各海关奏销1871—1874年船钞数目的《各关船钞》（5册），有记载粤海关、潮海关等征收罚款清折的《各关罚款》（5册，1864—1865，1868），此外还有《津海关税务》（2册，1890）、《东海关税务》（3册，1869，1875，1877—1878）、《山海关税务》（21册，1880—1882，1889—1890，1893—1900）、《牛庄海关税务》（5册，1870—1874）、《闽海关税务》（7册，1876，1881—1884）、《禁止贩盐案》（10册，1860、1862—1886）、《英商贩运樟脑案》（7册，1889—1890）和《镇江关递送各国文件》（5册，1875—1878）等。在法字档中，有《法人运物进京案》（7册，1873—1874，1875—1876，1890，1897—1898）和《华人拐骗洋员银两案》（3册，1876，1894，1901）等。在俄字档中，有《帕米尔专档》（7册，1889，1891—1893）《新疆税务目录》（1册，1887—1888）、《俄国长江通商案》（1册，1867—1869）、《发缴俄商三联执照》（11册，1895—1901）等。在美字档中，有《美国谅州通商案》（1册，1871）、《美国运送物件案》（15册，1866—1869，1872—1874，1875—1877，1887—1889）、《布国运送物件案》（1册，1870）《京师不准通商案》（1册，1873）以及各国兵商船进出口岸的统计（3册，1891、1894—1895）等。在海防档有《聘请洋员》（14册，1884—1889，1892，1894），重点记载了海关洋员的聘任情况，对于研究外籍职员在中国海关的作用和影响有很大的助益。

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还藏有同治年间（1862—1874）《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稿》1册和《总税务司之经费另款罚款船钞总账》4册，后者年代自1854—1888年，以其自身的完整性相当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海关发展初期的经费和税收状况及增长曲线。

再次，我们介绍几部北京图书馆藏的抄档。计有《总税务司赫德呈文》1册，户部朱丝栏抄本，编号社543・933；《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署经费抄档》1册，编号史550・69037以及1939年夏侯植整理抄录的《总署奏底汇订》，共有40册，编号为史538・885。关于后者的资料来源，据编者序言，是从故宫藏档册中发现的，应系晚清总理衙门档房供事缮写的奏折底件，总数有700余件，

自1866至1884年外交之事居多。《总署奏底汇订》的编者按史实分门别类，每类又按年月排比。首列总署积年办理洋务折单1册，“目为总纲”，其下再分和会门、考工门、榷算门，庶务门。《总署奏底汇订》与中国海关有关的资料不少，如第29～30册《总署经费收支》，第31册《使臣经费支付造报》，第32册《商务税约》，第33册《筹借洋款》，第35册《保护中外船只》，等等。特别是第32册中的中外出进货及贸易银数，以1871年海关统计为参照数，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和商品结构作了详细的排列，可以补充《海关十年报告》中有关早期进出口值的记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书馆也藏有一批抄档，统称为“清代题本”，是40余年前由刘宜诚、王植民等人抄录的共有900余册，3万余件。“清代题本”分为8类：岁入门、岁出门、财务行政门、一般行政门、新政门、外交通商门、行政费用门和杂件门。岁入门的第3部分为海关关税类，百余册，新政门第一部分是总理衙门及京师同文馆经费类，其中包括经费奏销（共56件）和海关收支三成船钞的较为完整的清档抄件（共78件）。另外，外交通商门中的出使经费类（12册），通商交涉类（18册）、中琉贸易类（3册）、禁烟类（6册）和商务类（2册），都是研究晚清时期中国海关的重要资料。

最后我们介绍的是广东省档案馆。这一档案馆所藏各类档案18万柜，其中1861—1949年的档案卷宗现在已全部向公众开放，有关广东各海关的档案占很大比重，件数超过百万份，包括了1859年设立的粤海关以及以后陆续建起的潮海关（1860）、琼海关（1876）、九龙，拱北海关（1887）、三水海关（1897）、梧州海关（1897）、江门海关（1904）和雷州海关（1936）等保存完好的档案资料。在行政文件方面，有总税务司令文索引（1861—1893），编号2127、2128；令文分类索引编号2135；呈文分类索引（1892—1896），编号2129～2134；关令目录（1872—1906），编号2139～2140。人事档案方面有造册资料《新关题名录》（1875—1948）、《海关人事调动公报》（1887—1905），包括各级在职人员交接、考核、晋升、调任公文和员工动态令折报告等。在业务性文件中，有《与各关税务司来往公文登记簿》（1870—1875），编1925；《与海关香港代理函》（1872—1889）编号1036；《致总税务司署各科及各关公函附件》（1882～1884），编号864；《税务司致九龙拱北税务司密件》（1889—1898），编号556；《税务司半官方性信函》（1892—1907），编号557，如此等等。另外，广东省档案馆藏的海关档案中，还保存了大量涉及华南地区贸易统计、华工出洋、通商旅游、考察留学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资料，很值得我们重视。

上述散藏各处的历史档案都是清政府及海关官员在日常工作中所形成的，在当时主要是供某些机构或个人处理事务或工作的参考或依据，因而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中国海关及其官员的活动和有关历史事件的原委经过，是研究中国海关史的一个非常珍贵而又丰富的史料来源。

从人事档案方面来说，中国海关虽然长期沿用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但在名上一直受制于清政府的外交部门，遇事都要秉承办理，因而在官方档案中有详细的海关人事档案资料，包括各地海关

官员的任命、调动、奖惩、考核的文件，见外务部档案第749～753号。当然，清政府对海关用人行政并不能直接干预，“不过受其报告而已”。1901年6月，依西方各国要求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后，对海关行政仍然是“仅有管辖之名，而无监督之实”（外务部档，第3959号）。这在当时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正像北京图书馆藏《总署奏底汇订》第1册“奉为臣衙门积年办理洋务情形折”同治亲政前所指出的：

各海关监督职司收税，而洋商狡狯多端，非中国官吏所能制，并选洋人充税务司，于总税务司外分设各口税务司，同各关道经理洋税，责令分报榷数，藉资稽核。

应该承认，中国海关由于聘用外籍职员，采取西方先进的管理制度，使本身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之海关一直致力于广泛罗掘税源，海关税收以较大幅度增长，效果甚为显著，成为清政府的一项最为稳定和可靠的财政来源（参见下表）。

晚清档案所反映的海关税收增长简表

年代	海关税收数目	资料来源
1862 年以前	4,900,000 两	《清史稿·食货志》
1862 年	6,630,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第 26 号
1871 年	11,400,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第 26 号
1874 年	11,490,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第 26 号
1875 年	11,960,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第 29 号
1876 年	13,150,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第 29 号
1880 年	13,000,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第 11 号
1888 年	15,000,000 两	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第 11 号

为此，清朝政府曾于1878年给中国海关所有外籍税务司（18人）和副税务司（11人）以三至四品衔的奖叙，同时提出：“嗣后如因收税得力，税务司应令请至三品衔，副税务司应令请至四品衔为止，以示限制”，并作为定章。实际上,到1895年即突破了这一“限制”，赏给一外籍税务司以二品衔并三等第一宝星。至于对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奖叙，更是“叠晋崇封”，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参见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第31～36号，外务部档第1570号、税务处档第72号。

在海关建设方面，海关总税务司署在各新开通商口岸建立海关，都要与清政府各级部门反复商议交涉，历年积累的资料相当可观。如外务部档第3951（1907—1909，9件）、第3961（1901—

1908，24件）、第3975（1902—1910，14件）和第0751（1907）号、税务处档第5号比较完整地记载了西藏亚东关及江孜、噶大克分关的筹建情况。外务部档第0628号保存了东北三省建立各海关的各种文件数十件，关于与大连关同时开办的安东、大东沟二海关的资料尤为详细，其中既有当地对外贸易情况的分析数字，又有对建关过程及其存在问题的说明，是十分重要的地方海关建设史料。

在海关税收和缉私方面，晚清档案中保存有数以万计的原始资料，如北京大学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中有关各海关各年奏销船钞、罚款数目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档录副奏折财政关税类及外务部档海关税收类有关各关各年关税资料及其在关税问题上与各国使领的交涉文件，这些材料不仅包括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晚清中国海关的关税征纳状况，还反映了当时进出口货物的种类、数量、价值等详细资料。此外，有关中国海关缉私工作的档案资料也占较大比重。一些比较重要的缉私报告都是单独立卷的，如北大所藏的《禁止贩盐案》（清档第78～70册），记录了1861年海关禁止英商非法贩盐并与英国领事官争辩的经过。外务部档中，有《中英太古行轮交涉案》（第723号）、《英商偷税案》（第683～687号）以及《中葡辰丸船交涉案》（第1819号）。外务部档第0722号《镇江趸船案》保存了海关及其中英两国官员围绕此案进行交涉的一系列资料。广东省档案馆所藏《加哩布格轮船案》（1875—1876）卷宗更加完整，包括会讯记录、代理行来函、税务司与帮办、监察长等来往函件以及存仓货物报告等等，编号为1745～1747。这一档案馆还藏有许多海关官员与地方当局及各海关查缉处的来往信函。所有这些有关海关税收和缉私工作的档案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客观历史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搞清某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并充实我们认识中国海关史上某些关键问题的论据。

在中国海关举办的其他业务方面，晚清档案资料亦可增补其他许多记载之不足。在港务、海务工作方面，外务部档第439号、第3960号、第1092号、第1390号、第735号反映了海关在建造灯塔楼表、筑坝修路等问题上与清政府官员交涉的细节及双方订立的一些章程规定。有关海关为中国参加各种世界博览会而进行筹备工作的档案材料亦很丰富，有人已据此作了很好的研究。以前一些研究著作提出中国第一次参加博览会是在1867年，而根据外务档第4350号《各国赛会章程》以及外务部档第1570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本人的回忆，中国第一次参加的国际博览会是1873年奥地利维也纳博览会。此外，中国海关对隶属于清朝总理衙门的京师同文馆长期给予财政支持。然而史学界对经费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只是根据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8第30页的记载，认为其来源是海关每年上缴清中央政府的三成船钞。实际上，这是不确切的，从1868年起，所有同文馆外国教习的薪金（占同文馆经费的相当部分）并不由船钞项下支出，而是“由总税务司赫德经手”，“在各关留出三四成罚款项下按季支出”。同文馆学生到各驻外使馆实习的费用也不是从船钞中支出的，其来源是出使经费，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洋务档同文馆类第0088号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所藏题本总理衙门及京师同文馆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论及的这一部分晚清档案，也存在着局限性，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海关档案相比，上述资料在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显现出许多缺陷，有的部分尚不能全面、确切地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的全部真相。限于篇幅，这里不拟作进一步的论述。我们提出这部分历史档案是研究中国海关史的重要史料，并不认为其他来源的史料就不重要，因为有关中国海关史的原始资料并不限于历史档案一种，例如海关官员的日记、书信、著作等都是珍贵的原始资料。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搜集各种史料来参详对证，相互补充，在各种不同的记载中比较歧异，决定取舍，从而得出最为接近史实的结论。

总之，如何在晚清档案中对有关中国海关的资料加以整理和利用，应该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共同关注，这是一个还没有完全、摸底的、极其丰富的宝藏。对此，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探索和认识的过程之中。

（本文是1988年11月为香港大学首届中国海关研究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试评汪敬虞先生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

在中国海关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英国人赫德（R.Hart）是一位极其特殊的人物，无论是赞扬抑或是反对他的人，都不能否认他曾起过的重要历史作用。这种强烈的反差固然与阶级、民族立场和价值观念有关，但毕竟说明他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汪敬虞先生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即是近年来国内赫德研究的力作之一。作为对汪先生极为尊敬的晚辈，笔者试图对此书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期望得到批评和指教。

如何看待赫德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汪著一开始就将赫德的历史活动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以及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进程联系起来，认为由赫德贯穿始终的中国近代史，仅仅是一部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一个古老封建帝国向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沉沦史（第5～6页），因而对于赫德的历史作用也做了全面的否定。这不仅是这本专著的主导思想，也是汪先生长期研究的一个思维特点。笔者认为，这样的概括和评价似乎是不够全面的。

在本文论及的历史时期中，中西关系的发展应该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剥削中国人民与中国社会本身近代化不断深入扩展的统一过程。赫德所参与的西方资产阶级逼迫、诱使中国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活动，一方面加强了中国和西方的不平等关系，另一方面则通过将西方近代社会的某些思想和制度移植到中国，使中国人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外国的事物”[①]，接触和了解西方近代社会，扩大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从而打破了中国过去那种建立在封建制度基础之上的天朝礼仪及其片面设想的朝贡外交的模式，也产生了西方资产阶级不愿见到的后果。赫德晚年已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治中国”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时代发展趋势。如果说，中国过去在强权面前的屈从和沉沦是西方能够认可的唯一“理性”选择的话，那么，正在觉醒的中国人民决不能继续甘于屈从和沉沦，而是要尽快摆脱长期遭受的封建束缚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成为真正平等和独立的民族。“用睡眠来作譬喻，它（中国）已睡了很久，现在终于醒过来了，它的每一个成员正在激起中国人的感情：中国是中国人的，外国人滚出去！”[②]

赫德承认，所有这一切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在华活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③]。笔者认为，从长

① ［英］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第3页，伦敦，1901年。

② ［英］赫德：上引书，第51–52页。

③ ［英］赫德：上引书，第59页。

期隔绝的中西文化相互联系交流的宏观角度来观察，不加强中外往来，不了解世界情势，就不可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也就不可能形成推翻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压迫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和思想力量，更谈不上争取独立自由和谋求社会进步。况且，中国与西方联系的日益紧密，本身就标志着整个中国传统秩序的逐步瓦解，而赫德及其他西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所作所为，使近代中国日益深入地卷入世界市场经济的潮流之中，增加了中国对西方的依赖程度，加速了中国传统封建秩序的瓦解过程。

“依赖”是一个很带争议的名词。西方经济学界有关依赖理论本身有许多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关于什么是决定依赖的基本因素的说法是各不相同的。在近代，频繁的内忧外患使中国既无能力也不可能在国际上形成独树一帜的力量，因而总是需要外在的平衡力量，这是显而易见的。清朝统治者支持赫德对中国政治、经济进行改革，其目的或许是希望最大限度减少中国的依赖程度。但历史事实是中国一步步向西方靠拢，受西方钳制，难以建立本身的独立形象。无论如何，这种依顺关系表明清政府在赫德等人的帮助下开始谋求在国际关系中找寻出路。相比过去那种以自欺欺人的闭关政策抗拒在世界上孤立的冷酷现实，不接受国际交往惯例的做法，清政府对西方的依赖关系似乎不应当简单予以否定。因为这种现象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科学分析，他们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打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笔者认为，资本扩张造成的世界经济体系必然要求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国依赖西方，放弃民族权利，做资本的附庸。同时，资本压迫本身也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运动，从而促进中国社会自身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史的进程绝不仅仅是一部沉沦的历史，赫德的历史作用也决不应再用过去的尺度全面予以否定。

第二，如何评价赫德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从赫德初涉中国政坛所提出的《局外旁观论》到其后几十次呈上的改造清政府的改革方案来看，他本人多少具有传播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善意，说赫德没有任何使中国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或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动机，不仅在逻辑上难以成立，也不尊重近代历史的事实。赫德自我表白说：“四十余年食毛践土，极思中国自强。”他曾多次对清帝国的弊病进行过较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他所提出的一些革旧图新的建议，许多都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如他曾提出“凡有外国可效之善法，应学应办”，并将之看作是“跻中国于强盛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开拓进步之路的手段”。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赫德的这些思想是有远见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理解了社会时势发展的规律和要求。

就拿赫德对中国海关的改造来说，汪敬虞先生承认，在赫德进入海关之前，中国封建海关“没有行使征税和管理海关行政的有效能力”（第36页），而“在海关税务司管理之下，外国商人的走私逃税不那么容易了”（第55页）。甚至他也客观地指出，赫德对海关的改造，“或者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新事物的引进，或者是增进对资本主义世界新事物的认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有积极意义的一面”（第81～82页）。但从全书来看，汪先生对此所持的全面否定态度是十分显然的。他反复强调，“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一套都是对中国主权的破坏”（第11页）。

众所周知，国家主权是政治学的概念。实际上，赫德进入海关之前，中国海关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性质，正像陈诗启教授所指出的：“虽属独立，却独立不了；虽属自主，却自主不了。”[①] 可见中国海关所表现出的国家主权已经名存实亡，以此来评判赫德对中国海关的改造显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况且，研究历史并不能仅仅从政治学角度出发，而应该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样才能客观揭示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循序发展的一般过程，才能准确地评价赫德改造中国海关的功过得失。

笔者不拟在这里详细评述赫德与中国海关近代化的关系，但只需指出一点，即随着近代中外交往的进一步扩大，改造旧海关的关税制度及作业方式已是势在必行。赫德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面貌和需要对中国海关进行逐步改造，将西方海关先进的行政管理制度引进中国，这一点是完全应该肯定的。另外，他还运用国际法的某些原则，帮助清政府对各国商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过一些交涉，甚至与外国领事、公使也据理力争，并聘用外国律师参与法律诉讼，迫使西方国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对中国做出让步，限制了外国奸商肆无忌惮的违法行为，缓和了当时的中外矛盾，客观上对发展正常的中外贸易和保障中国的税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汪先生却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史实（即使不是主要方面），而仅仅以抽象的国家固有权利全面否定赫德的客观努力，把赫德领导下的整个海关工作的作用笼统看成是消极的，这难免令人感到遗憾。

汪先生在书中还提到了赫德给中国引进的其他一些近代设施，如海关邮政制度、海务体系以及京师同文馆等，但通通给予极为低调的处理。汪先生认为，这些“都是首先服务于他们（指西方侵略者——引者）的利益，他们的目的，都不是什么向中国引进新的技术，至少首先不是这样，而是为自己攫取利润，至少首先是这样”（第369页）。甚至他将京师同文馆与会审公廨相提并论，认为二者从根本上说“是统一在一个实体之中，它们有共同的目的和方向”，都是“为了适应外国侵略的需要”（第364页）。笔者认为，即使邮政、海务、同文馆的确是为了满足外国侵略者的需

①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问题初探》，第2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

要，但近代中国社会此时不也同样有这个需要吗？而且对中国来说这种需要甚至更为迫切。

这种以主观动机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唯一依据的做法，无疑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一般来说，一定的主观动机能够产生出相应的客观效果，但二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动机所产生的效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想，结果从他的行动中产生出某种别的东西，这种东西诚然包含在他的行动之中，却在他的意图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功过是非，究竟是依据他的主观动机呢，还是他的客观效果呢？笔者认为，应将他的言与行、动机与效果全面权衡，应当着重分析他的客观效果。

例如，赫德亲手办理的海关邮政及海务工作，其中确实有加速外国资产阶级在华侵略的目的和作用，可在另一方面，也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把中国的通信业务和海务工作迅速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中国航运、邮传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客观的公益性质是无法抹杀的。

再如京师同文馆，虽然赫德主观意识上并不一定是“为中国培养新式教育和人才”，但只要认真了解近代中国教育史的人，谁也无法否认同文馆在开创中国近代教育、培养中国各类人才方面所起到的客观历史作用。刘铭传在《台设西学堂招选生徒延聘西师立案折》中曾这样说道：“自京师设立同文馆招选满汉子弟延请西师，天津、上海、福建、广东仿造枪炮船械之地，无不兼设学堂，风气日升，人才蔚起，海防洋务、利赖良多。”这些作用与赫德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认为他是一个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给予全盘否定。我们不否定在一定的条件下恶在伦理上的确定性，也不认为善恶的辩证法是相对主义的，但在评价历史人物的客观作用时必须防止过分注重主观动机伦理化的倾向，把历史的进步当作倒退。

虽然赫德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引进了一些新的社会因素，但灾难深重的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近代化。特殊的历史条件使赫德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先行者，注定了他在中国实行改革的失败命运。赫德曾委屈地说他“前后书数十上，无一准行者”，这种结果也不难想见。可以说，赫德的悲剧是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使这种要求无法实现的客观条件之间冲突的悲剧。笔者认为，像汪著那样全面否定赫德的一切客观努力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汪敬虞先生的这部著作，长达300多页，与赫德毫无关系的背景叙述就占三分之一强，有100多页。这对全面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背景，固然有一定必要性（虽然对本书的范围来说所逾稍微多了一些），但汪先生将所有这些侵略活动都算在赫德头上，认为“他都有份，他插手了一切”（第12页）这未免有点过分了，不仅不合情理，实际上也站不住脚。

汪先生在书中宣称他不是“国粹主义者”，他承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优于中国封建主义的国粹。但他强调：“问题在于正确地区别西方文明本身和西方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西方文明是一回事，西方入侵者手中的文明，又是一回事。”（第363

页）。笔者同意文化和文明存在着社会界限、民族界限以及特定的阶级界限，但笔者反对人为地对西方文化及其西方资产阶级入侵者进行一刀两断的切割，或给予主观的取舍。在中国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东进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外压成为促进内部变革因素增长的契机，而伴随西方入侵者传播而至的西方文明不仅仅是西方入侵者所挟以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手段，同时，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借鉴和中国人民摄取外来文化、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外部因素。正像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所指出的："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是做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①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文明的传播方式是否是强制性的，传播者是何人，对中国社会的促进都是巨大的。区分"西方文明"和"西方入侵者手中的西方文明"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笔者认为，《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反映了汪先生那种先入为主的心理效应。他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抽象的理性作为衡量以往历史的尺度，往往因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入侵而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在汪先生看来，既然西方入侵者是全面反动的，那么由他们传入的西方文明也都成为不合理的东西，都应该贴上侵略的标签进行痛斥，并加以彻底否定，乃至全部扔进垃圾堆。这样就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同时也否定了西方文明。这样做虽然满足了抽象的逻辑要求，也不失其进步的性质，却脱离了历史的具体情形，也妨碍了对西方文明的价值做出科学的结论，不仅很难缩短我们与历史人物真实之间的差距，而且最终将导致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

笔者认为，对赫德之评价，应不断克服过去那种敌我、正反、善恶的人物两极化的思维定式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教条偏见，深入开掘出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既要看到他在时间阶段上的变化，也应分析出他的各个方面，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因为他对中国近代化做出一定贡献而讳言他的罪过，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罪过而否定他的一切积极作用，同样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譬如赫德帮助清政府举借的各种洋债，有的是政治性的借款，有的则是一般的高利贷性质的借款，并非都有政治野心和政治作用，不应笼统地认为接受外来资本一定有害，而应该有所区别。

再如，汪著中多处就赫德参与的各种中外谈判，给予了激烈的批评。须知任何人参与谈判都必然存在着两种心理要素，既要合乎谈判人员的动机，也要合乎谈判对手的需要，只有这二者的统一，才能形成有效的谈判谋略，推动谈判活动的发展。谈判是满足需求的过程，必定要建立在双方有某些需求而又期望得以实现的基础之上，其出发点应是努力寻求最佳途径。在不断争取自己一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页。

利益的同时，也要尽量使对方感到满意，而不导致对其利益的损害。在近代中外力量悬殊的历史条件下，更不能不考虑这一点，要予以具体分析，不能一看到赫德在一些谈判中提出中国让步的意见就大加指责，应该区分开赫德所提出的让步哪些意味着中国自身利益和目标的牺牲，哪些则是“欲取姑予”的策略。这些也是汪著中所欠缺的。

今天人们的观念体系正在从过去近乎单一、封闭、僵化的旧模式中挣脱出来，向着一个开放性的新观念体系推进。对赫德的研究也是这样。人们不应再用旧的尺度去臧否历史人物，也很难同意一成不变地去全面否定或者肯定谁人的历史作用。当然，新旧更替是个扬弃过程。一方面新观念对旧观念的否定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确定界限，另一方面又是对旧观念的合理成分和有价值因素的继承和吸收。这样就可以为新旧观念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体现出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我们之所以重视汪敬虞先生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其意义亦在于此。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第三部分

中西交通史

交往理论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世界是普遍联系着的统一整体。客观世界的各种系统（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实际上都是与周围环境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没有这种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任何物质客体和系统都不可能存在。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同时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来决定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最主要部分。系统论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大系统。处在这一大系统之内的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具体的社会群体分属一个个小系统。各系统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维持和增加系统的有序性，每一个社会以及每一个社会分子都借助于各种媒介，发生着各种交往和作用。交往包括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其中物质交往是首要的，它既包括着人类以生产工具为中介的与自然界的转换过程，也蕴含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交往。物质交往是一切交往的基础。精神交往则是文化、科学、观念、制度、模式等之间的相互影响、启发、互补的过程。此外还有一种交往也是不可忽视的，即信息交往。信息交往原本是通过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进行的。由于时代的发展，它作为体现时代整体性、同步性的交往过程逐渐独立出来，并对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起巨大的导向、反馈和优化的作用。信息本身也只有经过有意义、有目的流通、交换和互动，才能对社会进步和发展产生特定的影响。人类社会的有机系统每时每刻都处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流动之中。人类交往是社会处于动态的条件，动态又是人类交往的必然表现。正如涓涓溪水汇成的江河大川，只有在流动中，在奔腾中才会显示出活力。

交往理论与中外关系史

中外关系史作为研究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发生和发展的学科，其范围显然要涉及物质、精神和信息三方面的交往，并按照交往理论努力揭示人类各种交往发展的联系和规律。可以说，交往理论是中外关系史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始终把人类的历史同生产、交往的历史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和探讨。人类是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并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自身的。他们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与这种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的制约。人类越发展，它所获得的社会属性就越多，形成的关系就越丰富，交往范围就越开阔，文明开放程度也就越高。人类的文明史，可以

说是人类社会相互交往、逐步开放的历史。

在原始社会里，人类仅能在血缘关系的狭隘范围内进行自身的繁衍、劳动的协作和思想的交流。大自然确定了人类的活动范围和生存方式，造成了早期人类文化对地理环境的极大依赖性。这些都突出地表现在地理条件对于特定地区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不同文化交往形式的制约上，形成了一些性质各异、彼此独立的人类文化区域。随着民族内部农业和手工业这两个生产部门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并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不仅出现了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产生了同附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最初的地域局限逐渐消失，以血缘关系维持的狭隘局面被奴隶制所打破，人们可以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协作、交流和通婚，使人类从野蛮时代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封建社会改变了把奴隶永远束缚在奴隶主庄园的状况，使农民有了进一步的自由。人类的交往有了进一步发展。过去农民为了自己必须的衣着而附带从事的织布业，便是由于交往的扩大而获得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其他各种工场手工业的逐步繁荣，也是以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商业交往为其历史基础的。归根结底，各民族都是首先从自身的生存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其他民族发生交往关系；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民族生产力及其物质交换的发展程度。

15世纪以后，美洲和东印度航线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交往，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对于促使欧洲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缩短了商品的流通时间，促进了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动摇了那种自给自足经济基础之上的人的依赖关系，促成了以物为媒介的普遍交往。

考察近、现代各国的社会结构更可以看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战胜自然能力的提高，地理环境对于人类交往的约束力便相对降低，全世界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吸引和各种形式的联系交往也就日益加强。存在于开放系统之中，与外界不断进行的能量与信息的交往，是社会功能变化、社会结构更新的基础和前提，交往的扩大是社会进步的力量，是人类自由度增强的表现。无论来自什么方面的力量，都无法改变交往随人类战胜自然能力的提高而发展的大趋势。因为人本身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只有在交往过程中人类才能不断增强自己的活力，表现自己，判定自己。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伴随着东印度的发现和世界市场的开拓，打破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而代之以各民族在各个领域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没有这些世界性的交往过程，也就没有世界性的进步。同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就在交往中体现出来，在地球由于先进的科技和生产而“缩小”的时候，要想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强盛，实现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就必须打破闭关固陋状态，实行开放，走向世界，参照先进的社会模式进行改革，否则，如果故步自封、闭关锁国，就会丧失吸收外来现代化因素的动力，就会被摒弃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之

外，就会因此而停滞落后。可以说，革新与守旧势力的抗衡，开放与封闭意识的斗争，将充满整个过程。在现代化道路上，必须不断地冲破守旧势力和封建意识的阻挠，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应该也能够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交往与开放

从中外关系史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如果没有人类的交往，社会就无法进步。这种交往关系反映在中外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纷繁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呈现出种种不同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

首先，交往开放形成了社会的凝聚力，增强了社会的活力。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因此每一种发明在每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才能形成绿化人类文明沃土的甘霖雨露，引导世界文化发展和进步，保存以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就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汉代的文化就是由先秦的华夏族和夷狄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更是在汉代汉人和各个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汇、融合而形成的汉文化的基础上，继续与各兄弟民族文化排斥、交融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也吸取了不少人类其他文化圈异质文化的营养。譬如东汉以后传入的印度文化，汉唐时期引进的西域文化，宋元以后吸收的契丹、蒙古、阿拉伯以及西方基督教文化等等。这样形成起来的文化比单一的华夏文化、汉文化在水平上大大提高了，内容也更加丰富了，并且具有更大的凝聚性。这是因为交往的程度和交往工具的发展是社会系统有序化的前提，交往和开放能够使一个社会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达成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使一个社会内部的各子系统之间也达成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有了这种对内、对外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社会系统之间及其内部就会产生一种优化选择的效果，就可以取长补短，不断吸取新鲜血液，艰难地克服惰性，新陈代谢，改变自身的内容和形式，形成一种协同前进的结构，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促进社会的发展。

从整体来看，交往对扩大世界各国或各民族间的贸易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普遍的进步意义。贯穿于整个中外民族、国家之间的各种交往，几乎都与有无相通的贸易联系和经济依赖有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际贸易的发展状况是反映各国交往程度的一个综合性标志。劳动生产力不同的国家通过对外贸易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国际分工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和价值量的增加，即使劳动生产力低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以此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任何可以作为交换的新对象，其本身就是新的价值，所以会增加价值量。因此，随交换形式和内容的不断扩展和增加，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中的价

值量都会增加。

可见，这种交往并不是运筹学中“零和博弈”（一方获利等于另一方受损），而是“非零和博弈”。由于“交往”本身所具有的“移植优势”，可以使输入项避免人类在积累财富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智力、资源和时间上的巨大浪费，而尽“人耕我获”之利，并可以根据本民族特定条件，选择取舍，加工改制，来收“以石攻玉”之效。此外，交往开放还使不同社会滋生出新的交叉点，引入新的“负熵流”，并在一定条件下形成新的有序结构，使整个社会系统体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和不可逆性。

其次，交往开放能够缩短社会发展的进程。按照马克思的观念，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耗散结构论也认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能量和物质交换克服困难，维持稳定，当外界条件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系统就会通过涨落而发生突变，由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空间或功能上有序的耗散结构。在交往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孤立状态被打破，这样不仅可以加快社会的发展，而且可以使社会形态发生在更大系统制约下的“跳跃”。甚至能够使固有社会结构失去平衡，并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性质，对于新形成的社会结构也起着建设性的作用。人类没有必要重走前人走过的弯路，我国当代对外开放的历史也证明了凡是与外界相互作用的开放经济系统，必定会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产生经济发展的加速度。经济发展的加速度与经济开放程度成正比，与经济实体的规模成反比。

交往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揭示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全貌，描绘中国近代历史内在的变化规律，根据中西双方在近代资本主义框架中的地位以及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将中国近代变革运动看作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中比较薄弱的一环，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从而破除了那种片面强调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合理性，无视“西学东渐”，把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的藩篱，为我们重新探讨和评价中西关系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近代中外关系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在平时独立状态下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充分体现的矛盾，在交往和开放的情况下，便一下子暴露出来，从而使人们产生一种“改革”和革命的需要。在当时的情况下，交往与开放是一个艰难而又痛苦的过程，它意味着中国人将与许多中华民族世代崇奉的、曾经引为骄傲的、深深扎根于意识形态的落后文化道别，去顺应陌生的、新奇的、甚或过去嗤之以鼻的文化。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交往和开放（即使是初级形式的），中国封建社会就不可能逐步走向解体，外界新信息就无法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化为改造中国的精神武器，近代社会变革力量的思想素质和领导水平也就不可能达到一个彻底摆脱传统俗套的高度。

最后要指出的是，交往和开放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和平的最大希望，也是当代科技进步和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应该克服阻挡我们前进的封建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观念，促进和推动我国现代化事业迈出更大的步伐。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

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只有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出现人类之间的普遍交往。交往本身作为一种力量也能够促进社会发展，每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因而交往的历史必然就造成了各个国家、民族相对独立的世界交往的同步化。只有这样，狭隘地域性的个人才能被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曾经论述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每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①]这些论述对于增强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以及努力从哲学的宏观角度对中外关系史加以抽象和解析，从而使中外关系史研究更好地为祖国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是极为重要的。

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中外关系史研究者首先应该重视研究中国和外国的具体国情。因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历史上的一切交往都只是一定条件下的个人交往。人类对自然界征服能力的弱小制约着他们之间狭隘的交往关系，而人类狭隘的交往关系反过来也制约着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因而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切不可忽视这种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对人类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的束缚和限制。

在现代物理学上，相互作用通常被理解为物质、能量、信息从一个物质系统向另一个物质系统的传递。这一过程的实现借助于物理场。而相互作用的传播速度不可能是无限的。它受制于物理场的种种条件局限。中外古代交往史的发展也是如此。虽然我们不能以"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为理由根本否定中国与域外地区自远古时期就存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但这种交往确实受到传导工具和时空范围的限制。驿道、河流、人力或畜力驱动的车辆和舟楫使得平面传播的时间相当漫长，使传播的空间相当有限，也使信息反馈、文化交流极度艰难。地理环境的束缚，农耕经济的自给自足，构成了封闭的地域观念、伦理观念和生活态度的世俗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中国古代文化源自巴比伦说"以及"殷人东渡美洲说"，显然都是由主观认识随意构成的。相近、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现象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广泛存在，并不一定证明这些地区、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化传播及习俗影响的关系。古代人类共同经历的生产阶段都可能形成类似的原始信仰、思维以及将自身来源的探索与其本身文化奇异地结合起来。不依据这些文化现象本身的物质统一性和对其每一具体历史事实所作的客观分析和测量，将彼此完全无关的独立存在的事物在人们想象中加以对比，其结论必定禁不起推敲。类似的一些中外关系史研究成果，也往往因为缺乏严格周

① 《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页。

密的推理形式和精确明晰的概念体系，而失之于比附、臆断和猜测，尤其是忽视研究人类文化发展的同步现象和各自文化的相异点和特殊性。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因此，中外关系史研究者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应当从哲学的角度加深对中外社会发展的理解，不仅着眼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同一性、纵向性，同时也应重视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横向性、网络性、多样性、偶然性、机遇性和跳跃性等。中外关系史研究者不应是一些眼界狭隘、热衷于琐屑争论的考据癖，而是应当具有独立人格，富有历史敏感与批评意识和哲学思辨的一代新人，他们应该从平庸的潮流中脱颖而出，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并努力使粗浅的爱国观念转变为精深的爱国思想。

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使世界各国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和交换活动国际化的进程，大大加深了各国间的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哪个民族能最迅速直接地利用世界各国人民智慧的最高创造，哪个国家才能鱼跃于渊、鸢飞狭隘天，快速跃到世界前列。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外关系史研究者应该超越一切狭隘偏见，以高度的现实感承担起神圣的历史使命，清醒地认识历史、现实和未来，这样才能做到史实有终而意义无尽，充分发挥出史学吸引后人的真正魅力。

我国地名与古代造船

地名是伴随着人类活动的历史而产生的。我国的造船业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因而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与造船业有关的地名资料也非常丰富。其中有些地名一直被沿用下来，也有一些地名屡经更改，还有的则因自然环境的变化或其他种种原因，被人们遗忘了。所以，对这些地名做一历史的追溯和考察，是十分有趣的。

早在先秦时期，北起渤海，南至广东沿海及台湾的海上交通就比较发达。尤其是江南的吴、越两国，濒水傍川，“一日不能废舟楫”。在这两个国家的首都附近都有造船的工场，称为“船宫”或“舟室”，以后这些地方即以此为地名（参见《越绝书・札记》）。到汉代，中央政府开始根据地方特点训练各个兵种，江、淮以南各郡训练水军，称为“楼船士”或“楼船”，有的地方也就以楼船得名，如《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徽庐江郡、江西豫章郡都有叫作“楼船宫”的地名。汉武帝为了同南方的昆明国作战，抽调了西北边郡的大量兵士，在长安附近开凿了著名的“昆明池”，周围四十余里，在池中建造楼船，戈船、豫章大船等数百艘，并加紧训练，“以习水战”。这一地名一直沿袭至今，唐代诗人杜甫凭吊这一历史胜迹时，曾情不自禁地赞叹道：“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仿佛看到了汉代造船业的巨大规模和豪迈气势。此外，在长安附近的京兆尹还专门设有“船司空县”，王莽时改名为“船利县”，也与造船有关。当时这里曾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场，船司空即是主持建造修葺工程的官名，以后遂为县名。两汉时南方造船业有很大的发展。福建省长乐县的马头江有太平港，旧名“吴船头”，传说就是西汉诸侯王刘邉造船之处。也有人说，早在春秋战国时，吴国派水军驻守福建，曾经泊舟于此地，因为樯桅林立，所以人们称之为“吴船（码）头”。

三国两晋是造船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当时以占据江南的孙吴的造船业最为发达，沿海主要造船地点有永宁（浙江温州）、横屿（浙江平阳）、建安（福建福州）等郡。但随着造船业的蓬勃发展，一些与造船有关的地名相继出现。如江西南昌城西南的“句鹿洲”就是因为专门制造一种号称“舸艚大艑”的大型木帆船而得名的。浙江平阳县的“横舆船屯”原名横屿，位于今天的鳌江口，因为造船业发达而易名，船屯应该是造船厂的古称。孙吴造船中心的建安郡曾设有典船都尉，以监督罪犯在此造船，以后《闽都记》记载的地名“都尉营”即是渊源于此。当时建安郡所属的“温麻船屯”（位于福州闽江口附近）曾是一个很大的造船场所。这里江面开阔，水流平稳，显然是适合

的造船场所。无独有偶，西晋时永宁县（浙江温州）也有一个相似的地名，叫作“温麻五会”。这是因为当地盛产樟木，“合五板以为大船”，所以以“五会”为名。

明代的造船工场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都达到了历史新水平。就连地处东北平原的吉林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也建起了船场。为了开发和保卫东北边疆，明初曾“发匠卒数千”打造战船。后来此地就以“船厂”为名，成为我国东北最早建立起来的造船中心之一。当时明代水军沿松花江出师，航行至库页岛，都以此为出发点。仅从永乐七年（1409）年至宣德七年（1432）的23年之间，太监亦失哈就先后十次率兵几千人，从“船厂”出发沿松花江而下，一直巡视到黑龙江下游。清初，“船厂”又成为清政府抵抗沙俄侵略的战船制造基地。据《柳边纪略》记载，清人在“船厂”附近挖井，经常可以见到腐坏的船板和生锈的铁钉，许多井内的水都充满了铁臭味，这足以说明造船工业在这里所居的重要地位。

明代造船业最负盛誉的当然还是“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壮举。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次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航舰队到达印度洋。他们驾乘的大航宝船标志着我国乃世界木帆船制造的最高水平。当时宝船的建造基地位于南京三叉河的南面，故名“宝船滩”。这一地名由明初一直沿袭到20世纪30年代（参见《首都志》和《长江水道图》）。

这座规模最大的造船场名叫“龙江船厂”，也称“宝船厂”，具体位置在今南京三叉河的下关附近。这一地区后来一直被人们称作“宝船厂”，已有数百年。位于宝船厂遗址，中心的“上保村”“中保村”“下保村”，也是由“宝（保）船厂一名衍生出来的。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中保村发现了一个有三四层楼高的巨型铁力木舵杆和一段绞关木（用于起锚和挂帆），经考证为郑和下西洋宝船上的部件。令人惊奇的是，就连发现这一舵杆的池塘名“作塘”，也与造船有关。古人对工匠称“作”，如木作、铁作、箍桶作等等。集中造船的地方就被造船工匠称为“作塘”（即船坞的意思）。这一名称后来竟也成了地名。这些都反映出明初造船业发展的巨大规模以及对后来的深远影响。

地名资料不仅为我们探寻古代造船遗址提供了珍贵的线索，也为研究古代造船技术的发展保留了极其重要的证据。据《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在南京下关草鞋峡下游的古靖安河入江口附近，有一“张阵湖”，明代称“稳船湖”，距离龙江船厂（宝船厂）很近，是三宝太监郑和建造宝船的试航之处。“每逢海船造就，在此试航。”为了保证下西洋远洋船舶的适航性和操纵性等良好性能，古代造船工匠必须不计工本地反复试验，方能实际使用。这一地名资料是迄今我们唯一看到的有关古代船舶实验的记载，所以弥足珍贵。

有些地名不但与造船遗址或船型本身有关，还常常以船属具而得名。江苏太仓县城东的“东铁锚登”和“西铁锚卷”，就是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曾在这两条街开了好几家铁锚厂而得名。明代的铁锚已相当庞大，“非二三百人不能举”（《西洋番国志》）。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制作铁锚的

艰辛。这一地方也因此而闻名，至今仍被称为“铁锚弄”。

以上我们仅仅列举了几个比较有名的地方，还有许多许多与船有关的地名至今仍未得到研究。如广东罗定市的“船步街”，广东恩平市的“船角墟”，湖北武昌的“船官埔”，湖南鄢县的“船形墟”，湖南沅陵县的“船溪镇”，湖南醴陵市的“船湾市”，黑龙江龙江县的“船套子”，广西郁林县的“船埠”，四川蓬安县的“舟口场”，如此等等，难以枚举，都有待于地名爱好者去披沙拣金，钩沉阐幽。

（原载《舰船知识》1986年第7期）

《马可·波罗游记》的汉译版本

堪称“世界一大奇书”的《马可·波罗游记》，自从比萨作家鲁思梯谦（Rusticiano）笔录成书以来，辗转传抄，不胫而走，几乎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它的译书。目前各种手抄本和译本总计已达100余种。由于原本的所有卷册都出自手抄，各版本之间往往互不相同，歧异百出，特别是人名、地名讹舛脱漏，道理方向也与现代舆图常不相符，从而使研究《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因此，不仅必须了解中世纪东方各国历史地理以及其他旅行家的游记，还要掌握当时以至于现在亚洲各民族的语言和风土人情等等。除此之外，尚需对各种版本加以适当的批评，细密地品鉴。有人即说：这些事无论一个人学识如何博洽、用力如何勤挚，很难兼而有之。尽管如此，几百年来，研究《马可·波罗游记》者仍然续起不断，其中荦荦大端者有像颇节、剌木学、玉尔、高第、沙海昂、拜内戴拖、穆尔、伯希和、韩百诗等著名史学家。在我国，自从1903年魏易首先将此书介绍给我国人民以来，也出现了不少像向达、张星烺、冯承钧、杨志玖、岑仲勉、邵循正这样的专家学者。本文即试图通过对《马可·波罗游记》诸汉译本之源流、性质及优劣的简略回顾，来总结一下我国学术界对《马可·波罗游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研究《马可·波罗游记》的汉译版本，首先必须对此书的原文版本源流有所了解。通常人们按照文种的不同，将《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分为法文系统和意大利文系统。也有人按照版本的不同将之分为原写本、改订本和合订本。学者们对《马可·波罗游记》最初是用何种文字写成的问题亦有许多争论。16世纪有拉丁文说，19世纪初又有威尼斯土语说，一直到1827年伯尼（Baldelli Boni）在佛罗伦萨刊行了他对《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与考证，史学界关于其最先文字为古法文的说法遂成定论。

1814年（一说1824年），法国地学会刊印了一种老法文版的游记。该写本的法文极为粗劣，但人名、地名则皆无误，游记中的路程指示明了，较之以前所刊的各种版本甚为精确。原书不分卷，只分为232章。这个写本从写作风格上看具有最初笔记的风味，行文完全是闲谈之语，若译文决不致重复无润色，可以由此推断这可能确为马可波罗在热内亚狱中自其口语而笔录的原本，未经后人的修改，简称“地学本”。

此后，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颇节（Pautheir）对这个版本进行了校订，于1865年在巴黎出版。这种版本包括有五个写本，当时分别收藏在巴黎、伯尔尼和牛津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其中至少有两个写本已证实经过马可波罗本人的校订或得到其允许而修订。因此，颇节宣称：“欲得著书人最初叙

述之真相，惟当于此类写本中求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也应指出，颇节的修订草草粗工，而且多他人代为，对于原本只是截略冗章（只有200章，较“地学本”减30余章）及修饰文辞而已，简称“P氏本”或“原写本”。

19世纪末，英国著名学者亨利·玉尔（Henry Yule）在考查大批手抄本后，指出：“P氏本”虽有缺陷和粗率之处，却是一个最正确的版本。1871年，玉尔结合各种考证编订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两大卷），简称“玉尔本”。1889年玉尔逝世后，他的好友高第（Henry Cordier）继续对玉尔的考证进行整理，1902年出版了新的修订本。之后，高第又结合最新的科学探险以及版本的研究成果，对玉尔最后的版本增加了一部分附录，构成了第8卷，使注解比原文多出若干倍，简称“合订本”。

《马可·波罗游记》版本的另一系统称之为意大利文系统。其书在意大利文中称Milione（大概源自马可波罗的另一个名字Emilione）。其中以剌木学（Ramucio）本最为著名，简称“R氏本”，亦称“改订本”。这一版本刊印于1559年，曾收入“航海纪程丛书”第二卷。关于“R氏本”的渊源问题各书均语焉不详，至今尚未明了。这种版本的特异之处比其他版本尤为明显。游记中删除了不少的章节，另有许多史实皆新加入，其中改订、新加入的部分许多似乎不尽真确，但其中有马可波罗晚年所增加的日记与余录，如元世祖时奸臣阿合马一章，他种版本皆无，无疑是马可波罗所增。有人认为，“R氏本”是记录中《马可·波罗游记》最早的印版之一。虽然有些后来窜入之文，但总的看来比较详备，许多人怀疑此版本为马可波罗的最后修订本。现代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大都参阅这两种系统的版本，取长补短，主要以法文系统的版本为底本，取其最初之真面目，而以意大利文系统的版本补充进新的材料。

英文版《马可·波罗游记》比较有名的是1818年出版的马斯登（Marsden）翻译的典型英文版。这个版本即译自意大利文版本，其译文比较华丽，斐然成章，已经失掉了原有的风格，许多专家对此视如敝屣，但这个版本在英语世界却仍流传较广。

现在，我们对《马可·波罗游记》的各种汉译版本逐一作一评介。

1. 中国最早的译本

1913年7月北京正蒙书局刊印了中国第一部《马可·波罗游记》的译本。译者为魏易，浙江杭县人。此书由梁启超题笺，共分两册，题名《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魏易在序中写道：《马可·波罗游记》“实为欧罗巴人对于我国有著作之始，出版以后，风行一时，至今闻名各国，均竞相翻译。数年前曾尝有友询易：此书中国曾有译本否？易答以未详，西友似甚骇异，谓易曰：此书欧美各国重若经典，中国为书中最有关系之国，奈何不急加翻译？易赧然无以答，但日徐当译。”此后，汪康年在北京主办《京报》，约魏易逐日译之，在《京报》连载。不到一年，因触怒权贵，

《京报》停止发行。辛亥革命时，魏易逃避天津，曾在闲暇之中考订了书中的今昔地名。1912年7月，金仍珠约魏易佐办《西报》，才得暇日译数篇，详加注释。到1913年年初，全书杀青出版。

《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曾引起较大的反响，中国人第一次读到了这部“世界奇异之书”的全译本。此后不少专家学者对马可波罗进行深入的研究。时过十年，这个译本（特别是注释）就已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人们发现，其中复沓舛伪之处比比皆是。著名学者柳诒徵批评说：“民国二年，杭县魏易始出马斯登本（指译者选用的版本为马斯登本——引者），自谓择精去冗，为其笺注元语，多浅俚可笑。”他还批评魏易“不读中国典籍，不知中国制度之沿革，地方之名胜，相识写此书，即奋笔翻译、哆哆议论，鲜不贻见橐言马肿背之诮矣”[①]。中西交通史专家冯承钧对魏易的译本亦评价极低：“审其译文，可以说是一种翻译匠的事业，而不是一种考据家的成绩。”[②]

我以为，对于这种初译本，似应全面给予正确的评价。首先应当看到译者的历史贡献，早在民国初年即奋笔将这本世界名著介绍给中国人民，并认为“其所记载，皆属信史”，“可以补正史之脱漏，并可于此得当日社会之消息”，这不能不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而应给予充分的肯定。一概否定的态度在今天是不足取的。当然，魏易选择的版本为“马斯登本”，本身问题就很多，又没有其他版本详加勘校（只在个别地方参考了“地学本”），加之魏易是一位文学翻译家，缺乏历史学家的训练与素养，因此粗漏之处自所不免。仅举二例：魏易认为，“考《元史》虽无马可博啰列传，惟其名尝一见于奸臣阿合马传”一条实为当时许多人之误解；二卷十二章纪元旦佳节，述“上下人叩首及地者凡四次”，魏易注云：“此书各家藏本均言四次叩首，但中国旧制必三跪九叩首，讵元制与明清均不同耶”，此亦为胡乱评论之言。

2. 张星烺的两种译本

1924年8月，北京中国地学馆刊印了张星烺汉译并补注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及第一卷，作为“受书堂丛书”的第一种。由陈垣题笺，柳诒徵作序。张星烺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著名专家，他在留学德国时即开始留心搜集《马可·波罗游记》的各种版本。1903年，他选择亨利·玉尔的英译版本并开始将之翻译成中文。“玉尔本”从内容上看最为广博，其考订之精密，曾一度是标准版本。“是所记载蒙古及各国世系、事迹、制度、风俗、宗教、文字、器用、物产、山川、道里，靡不详搜广征，原原本本，征引吾国史传、地志、碑板、文牍尤夥，益哲种之通儒，其殚心考据往往不下于吾国乾嘉老宿也。”（柳诒徵语）张星烺此时正身患肺病，仍然锲而不舍，全力译注。1923年，先将导言在《地学杂志》上分期发表，其中提要钩玄于马可·波罗的历史著述的源流，可以说

① 柳诒徵：《〈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序》。

② 冯承钧：《〈马可波罗行纪〉序》。

包举靡遗。张星烺在翻译的同时，还多处补其罅漏，增写了“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一章及“元代西北三藩源流略记”。前者就其所知诸书诸条，按照年代先后，条分缕析，编成年表，今天看来，大多已不能成立，因为有关马可波罗的可靠确凿的中文记载至今尚未发现。但张星烺将马可波罗所记元世祖时诸大事，依其年代先后，参正元史，表列出之，成为证实马可波罗来华的重要内证。直到最近还有人提出“马可波罗究竟到过中国没有”的怀疑。我想如果他读过张氏译本及导言，胸中疑窦也许可以涣然冰释。此外，此书尚附有“古代中西交通纪事”“阿兰人致罗马教皇书之考证”“《隋书铁勒传》之考证”“卢白鲁克行纪中之Segin之考证”（卷1第40章）等考证文章十余篇。冯承钧评价此书说：“译文虽然小有舛误，译文补注亦颇多附会牵强，然比较旧译（指魏易译本——引者）可以说是后来居上。”然而，玉尔及高第的合订本共有8卷，此种译本仅出版导言1册，本书第1卷1册，一直尚未续成全帙。

1936年8月，商务印书馆（上海）又出版了张星烺的新译本《马哥孛罗游记》一册，作为“汉译世界名著”的一种。这个版本简称“Z写本”，是意大利拜内戴拖（Benedetio）在1926年前后于米兰市图书馆发现的，据考证是1795年时从一位红衣主教（其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为“Z”）的一本14世纪或15世纪的写本上转抄下来的，其渊源基本上属于意大利文系统。这种版本有约1／3的删节，其余大部分为转录古法文写本的系统，这些段落两种写本几乎完全吻合。另外有不下二百段为法文版本系统所无，其中有2／5为意大利文版本系统的其他版本所阙佚。经过拜内戴拖教授的悉心考订，这种版本不仅纠集了各章中诸本的异文，而且从罕见的古钞本中发现了完全簇新的章节。研究《马可·波罗游记》，不可忽视这个重要的版本。

张星烺的新译本有以下几个特点：①和玉尔合订本相比，此种版本增益较多，如中译本92～93页益柯古斯坦（Icognristan）和都城哈喇卓柯（Carchoco），就是畏吾儿古国和哈喇火者的故墟；中译本333～336页关于摩尼教的记载，是新增的特别重要的资料；387～388页言印度马巴尔省的一种“刻”风俗，也是说明马可波罗记载翔实可靠的又一内证，为其他本所无，据说直到近代此地土人仍然盛行这种风俗。但是，此本脱漏者益为不少。还有同一史事记载不同一，史事记载不同亦数见之，可以与其他版本互相参见。②与旧译本相比，新译本文体为白话文。③旧译本后附有长篇累牍的注释，详列各家考据学说，而新译本仅为原文，只是在各地名后略为注释今地。有些注释参考了几乎是同时出版的法国沙海昂的版本，如Calashan，玉尔以为即阿拉善，取沙海昂的贺兰山说；Nankin，玉尔以为安庆，以沙海昂之南京（即开封）说更为标准。④新译本还有另一番用心，即玉尔合订本陈列各家学说，往往一字的注释有数千字或万余字，专为学者研究历史而作，定价昂贵，超出了一般民众的购买力，也非一般民众必须知晓。因此，经著名出版家王云五的提议，这个新译本作为雅俗共赏的版本，主要面向一般民众，与玉尔合订本并行不悖。

3. 冯承钧译本

1935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了冯承钧译注的《马可波罗行纪》，共分8册。这是我国马可波罗研究的非常重要的译著。向达认为，解放前所有《马可·波罗游记》汉译本中首推此译注本“最为审慎和最为完备”。1954年，中华书局又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原版重新印行。

冯承钧翻译的原本为法国沙海昂（A.J.Hcharignon）所编订，属于古法文版本的系统，但增加了“R氏本”的若干篇章。现存的诸如“地学本”之类的法文本所用的文体，几乎是旧文体，很难畅读。沙海昂于1899年来华，任京汉铁路工程师，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顾问。他利用业余时间，参考了许多重要的版本，特别在中国载籍中所采资料比较丰富，他的功绩主要是将“P氏本”即“颇节本”革新，转为新的法文文体，使读者能畅读；又将各方面的注释采摭甚繁，辑诸注释之长，使研究者检寻便利。这在当时各种版本中是很突出的。冯承钧译著时，更以其对中西交通的渊博知识，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删节部分大约以第五十九章以后较多，仅第一卷就删节有1／6左右。沙海昂编订本原有珠玉沙砾杂陈之嫌，经过冯氏的努力，可以说已经消除。因此，这是一种特别全备和审慎的汉译版本。

沙海昂原书的舛误之处较多，主要由于他对材料昧于鉴别，执笔之始就深受我国某些学者的影响，沿袭旧说，仍以为马可波罗即为元史记载的枢密副使孛罗，还说：“剌失德丁所志此POLO丞相之大元帅的官号，尤足使人联想他是元史枢密副史的对称。”因此，将“蒙古军大元帅”（枢密副使的误译）著录于本书标题之中。特别是他没有见到拜内戴拖的“Z写本”，未能加以参照。伯希和曾在1928年撰文对“沙海昂本”加以批评[①]。此类错误，冯承钧在译注时也多加修改，他提出放弃“马哥孛罗”的旧译，而改为“马可波罗”，一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沿用冯氏修订的译名。

4. 译自科曼洛夫编订本的两种汉译本

1936年，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了李季译的《马可波罗游记》一册。他所依据的是美国作家曼·科曼洛夫（M.Komroff）所编订的版本，简称“K氏本”。英文编订者认为当时英法学者都特别重视注释，借以证实马可波罗记载的可靠性。注解往往比原文多出若干倍，喧宾夺主，异常烦琐，除少数对地名的注释较为有用外，其余大部分已成为本书的附赘悬浮，而“没有一个版本的出现，把这部著作当作一项典型的游历记述”。因此，为使读者尽可能地正确了解到《马可·波罗游记》整个奇伟的叙述，“K氏本”将一切他认为是障碍的注释材料予以删除，以“恢复它的本

① 原载《通报》1927—1928年合刊，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1编，第71-85页。

来面目”。“K氏本”采用的是马斯登1818年自意大利文系统译的典型英文版。怀特（T·Wright）于1854年将马斯登的译本编入“博思丛书”（Bohn’s Library）之中；以后又刊入“人人丛书”（Everyman Library），是现今英文版中比较有名的一种版本。比较“玉尔本”来说，这个英文译文典雅华丽，已经完全成为现代文字，有许多不符古人语气之处，舛误极多。但“玉尔本”源出“P氏本”的古法文，具有最初笔记的风味，用语比较粗野，不少令人亦甚费解。所以科曼洛夫认为，改正英文本的错误比修饰法文本“似乎要简单些”，科曼洛夫所做的也正是这种编订工作。

“K氏本”初版于1926年2月，李季翻译的是1932年3月的第九版。这种译本的章节与“马斯登本”已大不相同，许多过分长的章节各分成几个短章，使之与“玉尔本”相符，可供读者按图索骥，查核玉尔和高第的详尽注释与考证。科曼洛夫几乎将一切注译尽行删除，如对中国三四十个地名仅注出两三个。李季在翻译时补入一些注释，尽管有不少牵强之处，而且更多的都无从考证，付之阙如[①]，这种版本在当时诸多优秀版本俱存的情况也可以算作供一般民众阅读欣赏的普及读物。

1981年12月，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了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林键合译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是解放以来我国第一部汉译本，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截至1982年4月，此书的印数从一万册增加到四万册。关于这部新译本的优劣，已经有人做出评述[②]。这里仅补充几点意见，以供译者参考。

（1）新译者的扉页上写道：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曼纽尔·科曼罗夫英译，此处似乎不确，正如以上所叙，科曼洛夫仅为编订作序（edited with introduction），其所依据的就是马斯登的典型英文版，何以科氏自己又翻译一通？关于此类错误还有一些，如“译后记”（281页）还将张星烺译注的《马哥孛罗游记》误写为冯承钧译注的《马可·波罗纪行》（应为《马可波罗行纪》）。再如第1卷第26章（33页）第4行“必须走八天的路程”。原文（75页）作六天，这样才和下一段“第六天结束时，到达一座城镇，……”相吻合。同页还有一处讲一“广阔无垠的大沙漠，长达七八十千米”，原文（75页）为“四五十哩”，似为译者失检。

（2）由于专业不熟等原因，一些常见人名、地名的翻译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如34页讲到“德里厄斯国（Drrius）王”，似乎是德里厄斯这个国家的国王，但实际上是古波斯王大流士（Darius）。还有一些地名，如巴拉奇（34页）似应译作巴里黑，布鲁伊斯（144页）应为不鲁郁斯，雅歧（哈喇章省会，144页）应为押赤（或鸭赤、鸭池）。

（3）《马可·波罗游记》是一部中世纪游记，但新译本中却出现了“公里”“公斤”等现代公制单位（公制于18世纪末在法国首创）。如189页“用相等于一个威尼斯银币的钱，可以购到三点六公斤生姜”，原文338页为“eigby pounds weightof fresh ginger”，即可以换几十磅鲜姜。41页还

---

① 孟榭：《评李季译〈马可波罗游记〉》，《天津益世报》，1936年11月19日。

② 余士雄：《评新译〈马可波罗游记〉》，《读书》，1982年第10期。

谈到高原上“燃烧点很低”，我们以为和整个中古游记的风格不符。

（4）这部新译本还有许多地方尚待进一步推敲、加工。如第192页有这样一段话：

（在泉州港）船舶装载商品后，运到蛮子省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绌，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

这里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就此笔者提出一种译法，以就求于诸位同志：

那里进口胡椒的数量极大。相比之下，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各地之需的胡椒数量就少得可怜，恐怕尚不到它的百分之一。

以上我们对《马可·波罗游记》的汉译版本做了介绍和比较，希望对这部名著在中国的研究历史提出一个清晰的线索。总结我国过去研究马可波罗的成就问题，可以不断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将前人的终点当作自己的起点，去伪存真，以推动我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不断发展（附《马可·波罗游记》汉译版本一览表，见下表）

《马可·波罗游记》汉译版本一览表

译者	题名	出版社	出版年月	卷册数	版本渊源
魏易	《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	北京 正蒙书局	1913 年	铅印本 2 册	Marsden
张星烺	《马哥孛罗游记导言》 第一卷	北京 中国地学馆	1424 年	铅印本 2 册	Yuie
冯承钧	《马可波罗行纪》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年 2 月	铅印本 8 册	Charignon
李季	《马可波罗游记》	上海 东亚图书馆	1934 年 4 月	铅印本 1 册	Komroff
张星烺	《马哥孛罗游记》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8 月	铅印本 1 册	Benedett
陈开俊、 戴树英、 刘贞琼、 林键	《马可波罗游记》	福建 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	铅印本 1 册	Komroff

（原载《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2期）

闭关锁国时代广州与长崎的比较

闭关锁国，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向东亚扩张时期，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中国和日本等国共同产生的一种畸形的历史现象。广州和长崎作为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唯一管窥世界风云的窗口，集中反映了这一时代社会各阶层和各方面的物质生活与精神风貌。通过对这两个城市的初步比较，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这种历史现象的共同性和特殊性，从而对中、日两国在近代走向不同道路的各方面原因获得新的结论。

在鸦片战争前的200余年中，中国对外交往，几乎一直是在以禁海闭关为其政策支柱的条件下进行的。虽然其间曾几次开放海禁，但根据闭关精神所制定的限制中外往来的种种措施，却贯彻于清前期的200余年的始终。广州地处中国南大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与海外诸国交往贸易的一个重要口岸。到1755年，清王朝下令关闭了广州以外的所有港口，只许西方国家在广州这一港口进行贸易。这一阶段称为“广州贸易”时期，一直维持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

日本从德川幕府1635年宣布锁国令到1853年被迫开关，也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日本幕府曾先后发布五次锁国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锁国体系。日本幕府只允许中国和荷兰的商船到日本经商，并仅限于长崎一处进行。长崎位于日本最西端，港阔水深，又无风浪，16世纪末期以后成为日本西大门的一个繁荣的口岸。日本严格限制长崎一口贸易，如果有外国商船漂流到萨摩、王岛、平户或对马等地时，就立即雇用拖船将之拖入长崎，并要求船主保证“未在日本任何地区停船，本日经行进港”[①]，否则不许贸易。这方面日本比中国要严厉一些。中国在“广州贸易”时期，厦门和宁波有时可以停靠来自西班牙、日本和琉球的商船。

中日两国统治者在广州和长崎所实行的闭关政策可比性很强，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具体的差异。在贸易方面，两国都设立专门机构，置特别官守，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直接代表。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粤海关，对进出口贸易进行征税。海关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正规税收项目包括船钞、货税和附加税等。另外，各级海关官员还使用各种名目和手段对中外商人进行讹诈和勒索。粤海关所立陋规、用费，仅有名称的就有五六十种[②]，这就使海关人员层层中饱，贪污腐化现象十分严重。粤海关虽然被视为肥缺，但历任总督却很少能够善终。

---

① ［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第67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② 《史料旬刊》第5期，第159页。

日本长崎地方负责对外贸易的官员大多都非委任，而是世袭。开港初期，规定对海外贸易不予征税。后来逐渐有以口钱、悬物、房租等税（向日本商人征收）以及常例置银、船别置银、八朔礼物等税目（向外商征收）。与广州不同的是，这些税收的大部分不是上缴给幕府，而是分给长崎的神社佛阁以及当地官员。如“八朔礼物”就是外商馈赠长崎奉行（最高地方长官）以下地方官员的礼物。有人曾指出：“外国和本国商人在长崎进行贸易，似乎都只是为了供长崎的人们享受，这点很难理解。”

广州贸易中对外商的规定很多，如外国商船只能停泊在距广州20千米外的黄埔；必须连环保结，一人犯法，各船大班负连带责任；船只入港，必须卸除船上的军火炮位；外商销货购货完毕即要随船回国，不许逗留广州，间或因事滞留，也要居住澳门；在广州停留贸易期间，外商必须寓居在指定的商馆之内，受行商管事稽查，不得自由行动，外出有定时，而且必须有通事相随，每月只准有三天可以在附近散步；和中国官方商谈公事，必须通过行商，不能径自投递公文①。

长崎地方对外国商人的限制也很严格。有人这样形容：“经营海上贸易的中国人和荷兰人在长崎都置于警察监视之下，实际上可以把他们看作是监禁在那个分配给他们居住的商馆内的犯人。”②对于荷兰商人，幕府规定只能在出岛上居住。出岛是一个仅有一小桥与长崎市街相连的小岛，这样就使荷兰人无法与日本人自由往来。日本对中国商人的限制亦很严厉，每年的贸易总量和船只数量都有严格规定，并将船上全部火药武器（除大炮外）加以封印，由日本官宪保管，到出港归国时才予以交还。中国商人上岸后，也同荷兰人一样，被指令住在长崎十善寺村御乐园内特设的唐人屋中，该地围以高墙，“止有总门，重兵把守，不许外出闲走，得知消息”③。除日方派驻人员外，不许其他人员擅自入内。但娼妓除外。如果中国商人愿意，可将日妓留在围内，有的甚至宛如妻室，怀孕生子，中国商人可以每年来日探望，只是不能携带子女回国。这一点与广州不同。中国方面规定，即使外国妇女也不能到广州的外国商馆居住，只能在澳门居住，理由是“盖恐番妇在行，民夷杂处，恐滋意外；澳门则夷人气类相通，别无嫌忌也”。实质上这是不让外国人长驻广州，同时也考虑到风化问题。以上两例反映了中日两国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不同态度。

广州对外贸易是由清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把持的。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实际接触的只限于几个特许的行商，而不是广大的自由商人。行商不仅承揽贸易，还成为外商一切活动的实际管理人。这方面与长崎基本相同。日本对外贸易实际是由长崎的头面人物“町年寄”（老人之意）负责的。他们对主要进口物品商协定价格，然后一揽子购入，按一定的比例分配给属于行会的商人，这种方

---

① （清）梁廷楠：《粤海关志》卷28；《史料旬刊》第9期，第308页；（清）印光任等：《澳门纪略》卷上，第7页。

②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83页，中华书局，1960年。

③ 《硃批谕旨》雍正六年八月八日李卫奏折。

法称之为“丝割符”[①]。幕府通过这种专卖制度，指令少数御用大商人投标包销外国商船的全部货物，所以也就失去了民间自由贸易的性质。

明清时期，欧洲大陆的天主教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活动非常积极，并将西学传入中国。但到1720年，清政府因“教仪”问题与罗马教廷发生争执，原因是天主教禁止中国信徒敬天、祭祖和尊孔，这势必与中国传统道德“大相悖戾”。因此，康熙皇帝宣布“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除了宫廷中会技艺之人，“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②]。康熙以后的统治者又进一步由禁教发展到实际禁绝一切西学，掐断了中西文化仅有的一点儿薄弱联系。在广州，对天主教和基督教的限制一直较多。英国伦敦布道会首批派往中国的传教士马礼逊等人开始都是隐居在广州的外国商馆，并只能以东印度公司译员的身份从事传教活动，实际进展也一直不大。

在这一方面日本比中国更加严厉。16世纪中叶，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到日本传教，地方官大村纯忠为了确保和葡人进行贸易，最早将其领地长崎及其附近地区献给耶稣会作为领地。从此，天主教在日本发展极快。到德川幕府时教徒增加到70余万人。这使日本统治者感到了威胁，于是发动了大规模的禁教运动，并停止和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天主教国家进行贸易[③]。从1614—1625年间，有近30万天主教信徒因拒绝改变宗教信仰而惨遭杀害，人民和政府形成了严重对立。1637年，岛原天主教徒大起义就是针对幕府的血腥暴行而发起的。

幕府为了阻止人们信仰天主教，强迫人们改奉佛教，并制定了一系列检查宗教信仰的方法。由一些“思想警察”挨户进行宗教信仰的调查。在长崎负责对外贸易的官吏中，有一“书物目利”（目利是善于鉴别者之意）的官吏，负责检查、扣留、销毁、抽抹和斥退有关天主教的禁书。这种职务是世袭制，世代可凭此领得廪米。更为可笑的是，1628—1629年在长崎还实行了一种名为“踏绘”的原始禁教方式，即让人用踝脚踏践上面雕画有圣母玛利亚与基督十字架的铜板或铁板。在长崎府厅前也设耶稣像，“令民践蹂”。以后推广到全日本，“外舶来者必践踏，乃许登岸”[④]。无独有偶，这种基于锁闭型经济之上的蒙昧主义做法，甚至跨越了时间和空间，在广州找到了它的“中国翻版”。1815年，海南籍商人李怀仁因受雇于英国商馆，以“与西洋人往来学习天主教”的罪名在广州被捕，审讯时即试以当堂跨十字架，并践踏十字架之上，必见其毫无难色，才能免罪[⑤]。

中、日封建统治者和一切主张闭关自守的排外主义者一样，其锁国政策主要并不在于对抗外来侵略，而在于禁止本国人民的海外往来，防范国内人民革命。日本为了防止天主教这一宗教异端

---

① ［日］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张俊彦等译），第1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② 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13、14通。

③ 王辑五：《一六〇〇年以前的日本》，第88页。

④ （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卷6；［日］井上清：《日本历史》（天津历史所译），第331页。

⑤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卷4，第23页。

与反幕力量结合起来，自1631年就开始规定，日本船不仅不能开往菲律宾（当时在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等国，就是到中国，除需朱印证明外，还要有奉将军之命发出的文件。以后又进一步禁止奉书船以外的一切日本船出国，并禁止在外国居住5年以上的日本人回国（因为他们可能是天主教教徒）。到1635年，日本幕府终于严禁一切日本船和日本人出国，同时不许日本人从海外回国，并规定违犯此禁令回国者一律处以死刑。

清王朝建立不久，为了不让海外各国与反清力量结合起来，也在禁止中国人出海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从1655—1672年的17年中，清政府颁布私人出海的禁令先后达五次之多。为了严格执行这一禁令，清政府曾三次下令内迁沿海居民，断绝内地和外洋的交通，还禁止私人擅造500石以上的双桅出海大船，更不准民间私卖出海船只与外国，从各方面杜绝人民出海①。

这种在落后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清人叶梦珠曾说，日本“凡奇技淫巧，市俱有禁，惟必需之物方收”，又多用劣质纹银，所以外国“客商扣算资釜及官税外，余利无几矣”②。这种政策还导致了一部分日本人的排外思想和眼光短浅的“岛国本性”。在中国，也同样助长了传统的因循守旧、虚骄自大和闭关自守的思想，一直到今天这种思想仍然阴影未散。虽然闭关锁国政策在表面上限制了西方侵略者的一些活动，但在更大意义上却是消极地束缚了本国人民，而不可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或减轻外来侵略的祸害。我们从下面两例可以清楚地看出闭关锁国政策的实际效果。

日本在锁国初期，虽然在沿海地区兴建了一些防御措施，但其武器的技术水平相当落后。以配备最强的长崎而论，在7个炮台的43门各种旧式炮中，最大口径还不足3寸。而且由于锁国百余年来，朝野都醉心于“太平盛世”，国防观念几乎等于零，武士阶级骄奢淫逸，武备废弛，形同虚设。当1804年，俄国使臣雷札诺夫等人到达长崎时，发现“长崎的防卫力，无异于欧洲最偏僻的渔村”，“只要一个小炮艇配备一些火攻船，短期即可攻陷”③。1808年英国军舰“费顿”号，直闯长崎港内，当面逮捕人质，而日本防卫部队竟眼睁睁无可奈何。

在广州，清政府也多次制定限制外国商人活动的所谓“防夷章程”，这些禁例每每随着外商的不断违例和破例而不断加码。但实际上，外国商人往往“视为故套，慢不遵守”，广州官吏也多“息事宁人”，“置之度外，以致饬行未久，旋即废弛”④。19世纪初，英国军舰也几次闯入广州，并以种种借口两次派兵滞留澳门数月。英国兵船入虎门，闯省河，清军水师林立，却只能“相顾动色而已”⑤，这些都暴露了封建社会末期闭关锁国帷幕之后的腐败真相。

---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0；《皇朝文献通考》卷33。

②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3。

③ 夏应元：《论林子平》，载《日本史论文集》。

④ 《史料旬刊》第期，第307页。

⑤ （清）萧令裕：《记英吉利》，《海国图志》卷53。

但在另一方面，中、日两国深刻的社会危机和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化，也刺激和唤醒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的视线从古代经典转移到现实和西方知识上来。通过对西方知识的了解，他们开始从闭关锁国的夹缝之中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在这方面，长崎和广州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时设在长崎的荷兰商馆是日本人学习西方知识的主要窗口。医师图思贝格（瑞典人）和西博尔德（德国人）等人，长期坚持在荷兰商馆向来自日本各地的优秀青年讲授医学、化学、生物及其他各门科学知识，这就是最初的“兰学”。据福泽谕吉回忆，当时日本名藩的西洋研究者都到长崎来。有的想到出岛的荷兰商馆参观，有的想在长崎学习洋学字母，有的则想到长崎炮术家那里去借阅和抄录他们秘藏的有关西方炮术的书籍，虽然这样做要付相当的报酬①。日本兰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林子平即是在三次游学长崎，与荷兰人接触后，才正式接受兰学，研究荷兰船只与炮术，学习世界地理知识的②。

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大多是经澳门、广州进入内地的；西方科学技术和大量西方图书资料、先进仪器的引进，大都也是经过这一途径，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最重要的两项贡献，《几何原本》的初译和《坤舆万国全图》的编绘，都是在广州附近完成，然后才逐渐流传到全国各地。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的日本人也在相当程度上通过来华耶稣会士翻译编写的汉文自然科学书籍来了解西学，认识西方。中国在嘉庆、道年间出现的一部分研究世界历史、地理的著作，大多也都在广州受到启发或得到材料后编写而成的，如萧令裕《英吉利记》《粤东市舶论》、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纪略》、何大庚《英夷说》、李兆洛《海国纪闻》等等，都是如此。

由广州和长崎输入的这些新的知识，虽然主要还限于自然科学和地理观念，但毕竟使中国和日本的知识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日本，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提倡实践——经世说，重视实证，采取洋学的新动向。通过兰学传入的西方近代先进科学知识，已开始动摇支持着封建统治理论的各种旧学问，同时也激起了兰学者了解西方社会，寻求新的社会思想的热情。加之18世纪20年代以后，幕府对西学传播的控制一度趋于松弛，所以，从1715年新井白石写成《西洋纪闻》到明治维新前夜，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竟达100余人，译书总数约500部③。西学的传布使日本封建阵营中已经形成一个有相当数量的新知识分子集团。他们对日本面临的国际形势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正如一位西方外交官所指出的：“希望多多知道神秘的海外世界的愿望，已经在一部分下级武士中出现，即使在地位较高的人里面，也在暗中增多。”这对日本近代的开国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① ［日］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第21页。

② 夏应元：《论林子平》，载《日本史论文集》。

③ ［日］穗亭主人：《西洋学家译述目录》，引自《日本史论文集》第202页；［日］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邹有恒译），第7页。

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曾在明末清初形成过一次高潮，涌现出一批诸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醉心西学的先进人物，译书的数量也较可观。但到鸦片战争前的广州贸易时期，中国的闭关政策在思想文化方面一直得到严格实施，朝野上下弥漫着“儒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的腐败窒息的气氛，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作为封建社会重要精神支柱的华夷观念。所以，这一时期西学传播从数量到质量上都不能与明末清初相比。与上述日本开国前的情况比较，也应属于相对沉寂的阶段，形成了与日本极不相同的思想基础。

过去一般都认为，中国和日本在封建统治时期社会经济的落后状况基本相同，对于打破闭关锁国的一系列外力事件同样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只是由于开关以后的各自外部遭遇与内部变革都不尽相同，发展的前途才完全不一样。这种说法无疑是不尽全面的。日本学者井上清曾强调指出：“无论什么外部条件（即西方列强的侵略），如果自身没有使外部条件起有效作用的内在条件的话，就没有一点用处。将幕府末期的日本和中国来比较，不但外部世界的条件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并且在民族的经济文化及政治力量的集中发展上，日本也赛过中国，就造成两国地位在不久以后的决定性的差别。”[①]

仅就本文论及的西学传播方面来看，早期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多在天文台供职，虽然在移植西方科学技术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是由于这些人的行动被严格控制，很少与人们交往，所以西学传播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嘉道之际，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已开始感觉到要抵御外侮，就必须首先了解外情：“驭夷者必先得其情，而后有以消桀骜之气，折冲万里之外。”[②]但这部分人虽互有来往，却缺乏一种目的明确的团体或组织，更谈不上用各种方式将西方知识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这一时期在广州兴办教育者首推阮元。他于道光年间倡办的广州学海堂对近代广东教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阮元本人却是反对西学的代表人物，他表面上虽对传教士“勉为敬崇”，实际上根本“不用其学说，其意以为《中华一统志》卷帙五百，至详且尽，安用此浅近之《地球说略》《舆地图说》等为？又以为尧舜之时，已创历法，垂四千年而不变，彼琐琐之说，乌足以异之？”[③]。

而在日本，早期研究西方知识的不少学者都是医生，在长崎以外的各藩也有同行。通过给藩主、官员看病，在望闻问切中了解到世界形势，再通过同行使之传播到全国，如同“滴油入水而布满全池”（杉田玄白语）。他们还在各地设塾授徒，传播西方知识。如绪方洪庵开办“适适斋”，学生多至3,000人；师事兰学家佐久间象山的吉田松阴设“松下村塾”，以新知识教授学生，在幕末，日本培养出一大批向往西方的进步知识分子，从而为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日本下级武士阶层中的许多知识分子。正是由此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充当了明治维新的

① ［日］井上清：《日本现代史》（吕明译），第125，211页，三联书店，1956年。
② （清）颜斯综：《海防余论》，《海国图志》，卷52。
③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6，第463–464页。

领导人物。

再从民族性格这种内在的因素来看，日本民族具有一种可贵的虚心学习外国先进思想和文化，并善于结合本国实际加以改革创新的品德。和中国及其他民族不同，日本民族对外来文化和思想，非但没有异端感、抵触感和其他偏见，相反他们以一切先进文化和思想为师，如饥似渴地加以移植和吸收，并根据本国需要加以改造创新。这是日本人民的优秀素质。虽然幕府曾数次寻机严厉镇压西学运动，但这一素质也并未泯灭而成为一股潜流。即使在锁国最严厉的时期，长崎的日本官吏中还有一种“风说役”，在外国商人进港时，听取他们的日常谈话，如有奇异消息，便记录下来报告奉行所，使幕府借以获知海外情况。从荷兰商船上了解的情报一般编译成《荷兰风闻书》；中国商人向长崎奉行报告的本国情况与旅途经历则被编译成《唐人风说书》，这些资料首先报告到幕府，然后散发到全国各藩。

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并不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于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①]，而是处于经济文化比所有邻国都更为发达的庞大帝国之中。因此，在“四方蛮夷向化中朝”的传统观念制约下社会内部很难产生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的直接动力，只可能出现与自然经济互为表里的文化至上主义，并成为一种固守的思想文化传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表面上看，中国的闭关程度虽然并不比日本严重，但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本身干脆拒绝接触西方和了解西方，广州的行商制度使中国政府不能直接与外国人接触，从而失去了亲自了解外情的最重要机会。所以，当中英鸦片战争在广州爆发时，朝野中不少官吏连英国的具体地理方位都不甚知晓，并担心英人会从陆路经过俄罗斯同时向中国进攻，甚至有人据此提出中国应从陆路进兵直取英国的可笑建议。

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作为清吏进身之阶的八股制度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中国虽未像日本那样大规模镇压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这种制度对广大知识分子却起到了更坏的消磨意志、奴化思想的消极作用。正像康有为所指出的：“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至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可以应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②]因此，这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前缺乏一种为实现社会变革而准备的必要的思想前提，更未能形成新的知识分子集团，以致在鸦片战争后未能迅速形成革新势力，其结果在面临西方侵略时未能迅速克服民族危机。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日本遣唐使虽从中国引进了整套的律令政治制度，但可能因为担心门阀制度的崩溃，日本一直没有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抉择。由于日本在幕府末期就开始建立学校教育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5页。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度，到明治末年，全国国民就学率已超过95%，造成了在日本产生资本主义和近代科学、思想的环境基础。日本领导人吉田茂曾感慨地说："为了实现近代化而如此重视教育事业，这是日本近代化的一大特点。"[①]

今天，人们时常比较中日近代历史为什么开端相同而结果殊异，但不少议论还是离不开变相的"中体西用""西学中源"，甚至"以夏变夷"等陈腐的论调。因此，如何尽快彻底抛开中华民族沉重的历史负担，从根本上效法日本人虚心学习外国一切长处的民族精神，仍是我们所面临的艰巨任务。

（原载《广州研究》1986年第9期）

① ［日］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孔凡等译），第11页。

古代花剌子模

花剌子模（Khorezm或Khrezmian），一译火寻，中亚阿姆河下游的古国，位于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古代曾是中亚地区的一个著名文化中心。公元前第四—三千纪，在阿克恰河沿岸主要分布着克里捷米纳尔文化，其特点是以渔猎为主，使用燧石器和圆底的彩陶器，居址为半地穴式。前第二千纪初，花剌子模的居民已经能够用原始方式灌溉耕地，并开始饲养家畜。青铜时代的塔札巴格亚布文化在花剌子模分布也较广，有人认为是当地居民与俄罗斯草原南部的斯鲁伯——安德罗诺夫文化融合的结果。

在祆教经典《阿维斯塔》和西方古典作家的著述中，很早就出现了对花剌子模的记载。前第一千纪上半叶，花剌子模形成最初的国家组织。前六世纪，遭受到居鲁士二世和大流士一世率领的波斯军队的入侵，成为阿契美尼德帝国的一个行省。前五世纪末或四世纪初，花剌子模摆脱异族统治，建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后来又受到贵霜帝国的控制。公元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复独立，钱币上最早出现了花剌子模铭文。三世纪时，萨珊王朝的势力占据中亚南部及花剌子模。六世纪后，又为塞尔柱突厥人所占。

公元八世纪初，花剌子模的国王叫契甘。其弟霍尔札德领导马兹达派的人民进行反对国王的斗争，成为契甘政权的严重威胁。为此，契甘派密使请求当时任呼罗珊总督的大食战将异密・屈底波帮助他镇压霍尔札德，条件是成功后向阿拉伯纳贡。屈底波感到控制花剌子模对其完成征服中亚的计划甚为有利，便于公元711年率军突然降临于花剌子模的主要城市哈札拉斯普，将霍尔札德俘获交给契甘。契甘重酬之，接着又请求屈底波带他镇压喀姆吉尔德王。屈底波将此任务交给阿不都拉赫曼，后者征服其地，杀其王，俘获四千人，带回谋夫作奴隶。随着阿拉伯人的到处征服，传统的花剌子模文化遭到很大破坏。

12世纪时，花剌子模成为独立的花剌子模沙王朝的领地。其中心最初在乞牙忒，后来迁至玉龙杰赤（乌尔坚齐）。阿忒省恩是第一个独立君主（在位时间1128—1158年），他占领了突厥斯坦和“铁察草场”（即额尔齐斯河至第聂伯河之间的草原地区）的不少领地。到阿剌丁・马合谋（在位时间1200—1220年）时，花剌子模沙王朝的疆域扩展到顶峰。马合谋和他的父亲通过多次战争，征服了整个波斯、伊拉克、呼罗珊、阿富汗斯坦以及河中地区。但马合谋的征服事业却由于蒙古人的入侵而中断了。

1219年，成吉思汗以花剌子模杀害蒙古商队和使臣为理由，亲率大军西征，分兵攻下花剌子模诸城，并进围其新都撒马耳干（撒马尔罕）。这时马合谋已经弃城逃亡，成吉思汗遣哲别、速不合率军追赶，马合谋逃入里海一岛并病死。后来，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分兵攻克呼罗珊诸城，继而与攻克旧都玉龙杰赤的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会师，并击溃花剌子模新王札阑丁的军队于印度河上。札阑丁兵败逃走，花剌子模沙王朝至此结束。

中国古代史料也曾记载了花剌子模的情况。《史记·大宛列传》中宛西小国“驩潜”，或以为即指花剌子模。还有人指出《周书》《北史》中的“温那沙”也是花剌子模国，其理由是据载温那沙“居于大泽”，应指邻近咸海，此非花剌子模莫属。此后，花剌子模在《魏书》中作“忽似密”，《大唐西域记》作“货利习弥伽”，《新唐书·西域传》波斯条作“火辞弥”，康国条作“过利”“火寻”“货利习弥”等，这时花剌子模的首府为急多飓遮城，在唐代曾经数次派使臣来中国朝献；但唐朝的行政管辖似乎没有到达这个地区，唯有岑仲勉先生指出，《新唐书·地理志》所载月氏都督府内有妨女州，以羯城置，其羯城应为Kath之音写，即“货利习弥”。

古代花剌子模是河源泛滥的水泽之乡。农业与水利灌溉事业高度发达。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就对此作过描述。考古发掘出的灌溉网渠遗址多为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七世纪间修筑的。进入铁器时代后，灌溉系统发展极快，其分布东自阿克恰三角洲，西至萨富卡麦什低地。早期贵霜王朝时，灌溉系统达到顶峰。居民皆供奉专门的灌溉保护女神阿娜希特。公元四至六世纪，花剌子模的灌溉系统开始衰落荒芜，至十六世纪蒙古人入侵后被毁。

花剌子模的城市建筑也很有名，保存亦较完整。有人说，花剌子模不经发掘就能看清城市布局和某些基本特点。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此作了长期的辛勤细致的考古发掘，为研究古代中亚城市建设、建筑祖艺术提供了详尽的资料。早期著作中最具权威的是托尔斯托夫于1948年发表的两部书：《古代花剌子模》和《古代花剌子模的文化遗址》。近年考古成果可参见托尔斯托夫和瓦因伯格主编的《科依—科雷尔干—卡拉——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古代花剌子模的文化遗址》（1967年）和沃罗比耶娃著《金基尔泽——公元前第一千纪古代花剌子模的庄园》（1973年）。下面介绍几处重要遗址：前六至四世纪的居兹利—克尔古城墙全长三点五千米，墙内筑有狭长的拱顶小室，平行城墙的房屋建筑延绵六七千米长。詹巴斯—卡拉古城分为两个街区，每区有二百间房屋。位于克孜勒库姆沙漠南缘的科依—科雷尔干—卡拉古堡由两个同心圆的城垣组成，属于前贵霜时期。城内建有宗庙、塔楼、广场、住宅、仓库等。最引人注目的古城是托甫拉克—卡拉（前一世纪—公元六世纪）。该城长500米，宽300米。城西北角有一崇伟宫殿，占全城面积的四分之一。在公元305年迁都阿姆河畔的恰特之前，花剌子模诸王一直以该城为驻跸之地。

古代花剌子模与叙利亚、埃及及黑海北岸诸城市贸易往来频繁；其艺术也受到斯基泰、犍陀螺和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前贵霜时期陶器制作精细，图案有三人头、动物、鹰头、狮身和斯基泰骑士

等。塑成各种形象的赤陶像很能反映花剌子模艺术和宗教的特点。托甫拉克—卡拉宫殿壁龛中诸王及妻妾侍从的塑像极为真实、生动。古城址中的壁画也很精彩。

公元前三世纪时，花剌子模居民用阿拉美字母书写花剌子模语。后来出现了花剌子模文，写在羊皮或木皮上，也刻在钱币上，但至今尚未被完全读通。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些文字对于研究古代花剌子模和整个中亚的政治社会史以及历法、纪年和判断比鲁尼所述古代花剌子模诸王名单的可靠性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托甫拉克—卡拉出土的户主名册，是复原古代中亚社会制度和家系的重要资料。花剌子模的钱币也很有特色。考古学家瓦因伯格于1977年出版了《古代花剌子模的钱币》一书，对公元二世纪末至八世纪末的所有花剌子模钱币进行了研究。书中除探讨钱像、钱币类型、年代学和铸币技术之外，还有一篇根据古钱学资料研究花剌子模政治史和民族史的综述。花剌子模与帕提亚、贵霜、萨珊和嚈哒的相互关系，也都有专门章节论述。花剌子模居民大部分信仰祆教，同时还保留了更古老的宗教习惯。这种状况一直到八世纪以后的伊斯兰化时代才得以改变。

在蒙古人入侵花剌子模后，直到十六世纪之前，花剌子模一直未能再建立独立的王朝。十六世纪初，月即别人（今乌兹别克人）在此建成国家，并迁都基华，通称基华汗国。十九世纪末，被俄国吞并。

主要参考书目：

①［苏］托尔斯托夫：《古代花剌子模》，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

②［苏］蒙盖特：《苏联考古学》，莫斯科，1955年。

③［苏］马松：《中亚文明的历史地位》，《苏联考古学》，1964年第1期。

④［波斯］拉施特：《史集》（余大钧 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⑤［波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版，1980年。

⑥［苏］B.A.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3卷，马小鹤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

⑦［苏］C.E.博斯沃思，M.S.阿西莫夫：《中亚文明史》，第4卷，中译出版社，2017年。

（原文刊载《中国大百科全书》1990年第一版外国历史卷，有更新）

古代奄蔡

奄蔡，古代中亚游牧部族，亦作阖苏，或阿兰。学界通常把西方古典文献著作中谈到的阿奥西（Aorsi）比定为中国文献中的奄蔡。

奄蔡首次见于《史记·列传·大宛列传》：“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馀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西汉时期，该民族在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的锡尔河以北的康居（咸海）西北、里海北部的草原游牧。公元前2世纪左右占有里海北岸至顿河间草原，并南徙高加索。因据有里海沿岸，常假手亚美尼亚人、米底人与高加索、小亚细亚、中亚各族贸易，从中获利，极为富庶。前1世纪，奄蔡丧失独立地位，成为康居的附庸。

据《后汉书·西域传》，奄蔡后改名阿兰聊。一般认为后者应即《魏略·西戎传》的阿兰，亦即古希腊、罗马史籍所见Alani。许多学者把这里的“阿兰聊”比定为西方古典文献记载中的阿奥西和阿兰。

嗣后，因北匈奴西迁，阿兰也逐渐西徙，部分去欧洲，停于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部分则滞留在高加索以北。与此相对应的是斯特拉波的记载。公元3世纪，该族游牧于亚速海和高加索地区。公元370年左右，阿兰人为匈人（Huns）（一说即西徙之部分北匈奴）击败，其王被杀。其中一部分随着巴兰姆伯尔大单于去了欧洲，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地区定居；另一部分则留在高加索以北地区。5世纪初，一部分阿兰人迁至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与当地西哥特人融合。5世纪中叶，大部分阿兰人随阿提拉西征。阿兰人随着汪达尔人经高卢、西班牙迁至北非，汪达尔人在北非建立的汪达尔王国又称汪达尔—阿兰王国。留在高加索者与当地部落融合，形成以阿兰为主体的联盟，史称阿兰尼亚。8—10世纪臣服于曷萨突厥，并接受基督教。10—12世纪出现文字及长篇英雄史诗。1238—1239年，受西征蒙古人沉重打击，残存者迁至中高加索山区和南奥赛提亚。又或以为今奥赛特人即其后裔，或以为即元代史籍所见阿速、阿兰、阿思或阿宿。

奄蔡人操伊朗语，族属接近马萨格泰人与萨尔马特人，身高，发色淡黄。生活方式大致与匈奴人相同；宗教文化则与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极为类似：以树枝占卜，插剑于地，象征战神，顶礼膜拜。奄蔡控制丝绸之路的北道。中国文献记载，丝绸之路的北道穿越东突厥斯坦、大宛和康居，抵达奄蔡。因据有里海沿岸，常与亚美尼亚人、米底人与高加索、小亚细亚、中亚各族贸易，从中获利，极为富庶。

（原文刊载《中国大百科全书》1990年第一版外国历史卷，后经孙毓棠先生和马峰先生补充修改，特此致谢）

斯基泰人

公元前7—公元3世纪占据黑海以北地区、操北伊朗语的居民。又译作斯奇提亚人、塞西安人或西徐亚人。源自希腊语Skythaio，最早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广义的斯基泰人还应包括滞留在中亚、西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地区的一些部落，其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与南俄和伊朗的斯基泰人极为相似。斯基泰人身材高大健壮，蓝眼、隆鼻、多须，在种族上与萨尔马特人、塞种人和马萨格泰人接近，语言、社会生活、文化传统和宗教也大致类似。

学界有关斯基泰人称谓的指代范围存在变化。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认为斯基泰人指黑海以北南俄草原的游牧人群，或泛称从喀尔巴阡山到顿河的欧亚草原的游牧人。希腊人把与希腊人邻近的部分印欧部落称为斯基泰人，并分为农业斯基泰人和游牧斯基泰人。游牧斯基泰人占绝大多数。在希腊化时代，人们把东欧森林地区和亚洲游牧人也作为斯基泰人。波斯人和印度人把所有的斯基泰人都称为塞克人。波斯人把塞克人分为3个部族："饮豪麻汁的塞克人""戴尖顶帽的塞克人"和"海那边的塞克人"，也就是中亚的塞克人和黑海沿岸的塞克人。中亚绿洲农业区的塞克人（张骞给汉武帝的报告中译其音为塞，称为塞人）与斯基泰人在种族和语言上虽属同类，但二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不同。

公元前9世纪以前，斯基泰人主要分布于阿尔泰山以东。公元前8世纪中叶，周宣王征伐猃狁、西戎，后者压迫斯基泰人西走南俄。自然灾害（如干旱）也可能是其西迁的一个原因。斯基泰人到达高加索和黑海北岸后，驱赶那里的西米里安人西逃，大部分定居下来。另一部分继续西迁至多瑙河流域定居。还有一部分跟随西米里安人南下，到达小亚细亚和伊朗高原西北部。另外有些学者认为，斯基泰人系公元前14世纪开始从伏尔加向西迁的斯鲁伯文化居民的后裔。

斯基泰人称霸南俄后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出现军事民主制。公元前7世纪中叶已形成贵族首领阶层，核心是在库班的世袭王族。王族的创始者可追溯到传说中的塔尔吉陶斯。在前8世纪—前7世纪的亚欧大陆民族迁徙时期，斯基泰人从中亚入侵到黑海沿岸，并且深入米底。前7世纪末—前3世纪时，已占据了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从顿河到多瑙河）。王位传至格奴鲁思时（约公元前630），斯基泰人的版图从波斯边境经库班一直伸延到整个南俄草原。公元前625年，斯基泰人侵入叙利亚和位于今巴勒斯坦南部的朱迪亚，后来兵锋达埃及边境。法老萨姆提克一世（公元前664—前610在位）被迫与之签约以阻其继续南侵。这部分斯基泰人后来受米底帝国打击退回南俄。公元

前513年，斯基泰王伊当提尔苏斯举兵反对波斯王大流士一世，在政治上统一整个斯基泰人。希腊边境城邦被迫每年纳贡以免遭掠劫。斯基泰王国在公元前5—前4世纪形成。公元前4世纪中叶，斯基泰人开始衰落。公元前339年，斯基泰王阿提亚斯在对马其顿王腓力二世的战争中战死。公元前2世纪，斯基泰人被萨尔马特人排挤到克里木，建都城于涅亚波里。公元3世纪左右，为哥特人所灭。斯基泰人遂与民族大迁徙中的各民族相融合，此后的“斯基泰”一词用以指居住在黑海以北地区的各族居民。

斯基泰人的国家由四大部族组成，每部族又分为若干区，各区的首领负责断案、征税、向异族属国索贡等。国王和各级首领的继承都是世袭制。氏族部落是斯基泰人的社会基础，战时则是作战单位，各部族每年春天大会于王廷。战时全民皆兵，分成三部分：主力由贵族首领的卫队组成，其次是参过战的部落民组成的部队，其他老弱者组成辅助部队。斯基泰人以多杀敌为荣，有以敌人头骨为饮器的习惯。武器装备有战斧、矛、弓箭等。骑马射箭是他们的特长，故有“马上弓手”之称。

斯基泰人多以游牧为主，饲养马、牛、羊、狗。少部分从事渔猎。进入南俄后，还有一部分定居民。斯基泰人精于制造手工艺术品。整个欧亚草原的斯基泰艺术风格较为一致，即通过锻、铸、镶压、刻等多种手法，用金、银、铜等材料创造出生动的浅浮雕动物造型，其中最常见的有狮、虎、驯鹿、马、麋、食肉鸟以及其他想象的动物，统称为“动物纹”或“野兽纹”。斯基泰艺术的另一特点是往往以带钩、柄、饰牌等装饰在马具、武器、衣着和器皿上，成为财富的标志。同黑海沿岸的希腊城邦、波斯以及中亚各族有贸易往来。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贫富分化明显。公元前2世纪，克里米亚出现斯基泰最初的铸币。斯基泰人的墓葬遍及阿尔泰至南俄草原的广大地区。墓中陪葬物显示当时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国王死后，要杀死50名卫士连同马匹殉葬。贵族的墓制也极宏伟，除要求殉葬外，还埋入金、银、铜器、陶器，一般成员的墓穴则简陋不堪。18世纪60年代以来，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库班河流域一带的斯基泰古墓（巨冢）中陆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收藏在今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中，是反映斯基泰人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的主要实物资料。

斯基泰人初信自然神，但无庙宇之类建筑。迁入南俄后，明显受希腊影响，信仰天神宙斯、土地女神吉尔、日神阿波罗、海神波塞冬。斯基泰人保有明显母权社会痕迹，信奉的神灵中，最高贵的是母神塔别梯—赫斯提亚，主保护火种和牲畜。

斯基泰人始终没有文字，但有大量的斯基泰人名、地名、族名保留在碑铭和古典作家的著作中。

（本文与黄靖先生合作撰写，马峰修改，原文刊载《中国大百科全书》1990年第一版外国历史卷，有更新）

海上丝绸之路与各国船舶

海运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为了探索和开辟海外世界，世界各国人民一直在努力进行以船舶为主要运载工具的接触与交流。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即是其中一条主要的国际贸易通道和科学文化交流的纽带，它用船舶连接了亚、非最重要的文化区域，使各国人民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因此，研究各国船舶和航海业的发展，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某些特点，对于正确认识中国造船在世界船舶史上的地位也有一定的意义。

外国船史的分区问题

研究外国船舶史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即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有某些共同特点的造船传统归列到一起。这种划分往往是历史与结构、渊源并重的，其中有的传统类型已成为历史的遗迹，有的则影响到现在。我们暂且从大处着眼，分四个部分加以叙述，即阿拉伯文化区（包括北非、阿拉伯半岛、波斯湾地区）、印度文化区（印度次大陆、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东南亚文化区（中南半岛、印尼群岛、菲律宾）和东亚文化区（朝鲜、日本等）。当然，这样划分还有不少问题，标准亦不尽统一，这反映了世界船史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不平衡性。

1. 阿拉伯文化区

阿拉伯帝国的疆域东起印度河，西临大西洋，北界咸海，南迄尼罗河，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埃及、两河流域和波斯都囊括在内。从很早的时期开始，阿拉伯就是地中海各国与远东交通的枢纽。阿拉伯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西贸易的变化。

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曼以建造缝合木船闻名于世。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阿曼人往往渡海到印度洋中的海岛，砍伐椰树，等到木材干了，再锯成木板。“他们把椰子果皮的纤维搓成绳索，用来栓板造船。同时，椰树可以做成桅杆，它的叶子能织成帆篷，它的纤维能拧成我们现在所

使用的船缆。"①首批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其原籍都是阿曼人。《天方夜谭》中的大食商人辛伯达也被认为是8世纪乘风破浪驾船来到我国广东的阿曼航海家艾布·欧拜依岱。可以说，辛伯达是这个历史时期的缩影。

古代埃及的造船水平极为高超，年代也很久远。50年代发掘的约4,500年前的齐阿普斯法老帆船残存长31米，宽2.60米，深3.50米，复原后船长达43.40米，宽5.90米，虽然这仅仅是供法老在天之灵伴随太阳游弋长空的象征性冥器，但足以表现出古埃及人民的聪明智慧。大英博物馆还收藏着两只绘有迄今所知最为古老的帆船的陶罐，其中一只陶罐的年代为公元前3100年，另一只则可上溯到公元前3200年②。公元前1478年，埃及女王就派出海上探险队到达红海南部和索马里海岸，这次探险的经过被刻在埃及女王庙宇的墙壁上③。

波斯湾也是航海贸易的摇篮。著名的腓尼基人就是在公元前从波斯湾迁移到地中海沿岸的。波斯湾历来以盛产珍珠和从事海上贸易著名。10世纪初波斯人阿布·赛义德。哈桑曾言及，波斯湾东岸的尸罗夫船工特别擅长制造缝合船，并用一种鱼油掺和其他原料涂在航海的船上，以堵塞船板接口的缝隙并填平板面的裂痕和洞孔。尸罗夫是当时国际航运的大转运站。据元稹《元氏长庆集》载，唐代中国南方习惯称波斯船主为"舶主"，因为这时来胶州和广州的外国船舶大多属波斯人特别是尸罗夫商人所有。宋代泉州的外侨也以波斯尸罗夫商人最多，人们称之为"舶獠"，其富有程度仅次于广州蒲姓的阿拉伯人④。《癸辛杂识》记载：一位巴林巨商，先后在泉州贩运了80艘海船的货物，死后仅珍珠就有130石。

国内学术著作对阿拉伯缝合船的实际性能往往评价过低，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这一地区最早使用铁器，为何直到15世纪才开始采用铁质船钉呢？据《伊本·白图泰游记》解释：因为印度洋的海底礁石很多，用铁钉钉的船碰到岩石就会损坏，而用椰绳缝合的船则具有弹性，不易破裂。另一位名叫伊本·札比尔（1185）的旅行家也说，这种船经受珊瑚礁碰撞的性能，胜过用钉子装配的船⑤。我国古籍提出这种船"不用钉锞，恐铁热火生"⑥，还有人说"海咸烂铁，且妨磁也"⑦。关于缝合船的防水密封性问题，我国古代史料也有记载：刘恂《岭表录异》言："贾人船不用铁钉，只使桄榔须束缚，以橄榄糖泥之。糖干甚坚，入水如漆也。"《一切经音义》也说："用椰子皮为索为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锞。"这些史料与国内学者常常引用的《岛夷志略》《广

① 穆根来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第128页，中华书局，1983年。
② 参加埃及齐阿普斯博物馆编：《齐阿普斯博物馆》，开罗，1983年，R·L·波文：《埃及最早的帆船》，《航海宝鉴》，第46卷，1960年。
③ ［埃及］A·A·阿里姆：《论阿拉伯航海史》（戴开元译），《科学史译丛》，1983年第2期。
④ （宋）岳珂：《桯史》，番禺海獠条。
⑤ ［埃及］A·A·阿里姆：《论阿拉伯航海史》（戴开元译），《科学史译丛》，1983年第2期。
⑥ （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61。
⑦ （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卷8，洋船钉。

东新语》等书的记载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已知，缝合船的影响范围甚广，从地中海、东非、印度一直延伸到东南亚各国及我国广东地区。1981年，航海家廷·塞维林驾驶一艘仿古建造的缝合船（长约26.52米，宽约7.4米，主桅高22.86米）穿过阿拉伯海和印度洋，顺利到达中国，也证明了这种船型的航海性能。

除了线缝船，阿拉伯语中至少还有200多个有关船的词，从小艇（houri）到能载400名乘客和货物的船只，从商船到战舰的各类船舶。阿拉伯商人驾乘着这些船舶从波斯湾港口的尸罗夫、巴士拉、乌布拉以及亚丁和沿海各港口航行到印度、东南亚、中国和非洲，甚至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欧的伏尔加河流域也都发现了阿拉伯人的踪迹。到公元8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阿拉伯的商船已经可以频繁穿梭于印度洋和中国南部海上，停泊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各个主要港口。据《旧唐书·李勉传》载，仅唐代宗大历五年（770）一年，泊入广州港的外国船舶就达4,000多艘，其中不少是大食（阿拉伯）海舶。到了宋代，这些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船舶更是“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极大地推动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2. 印度文化区

印度拥有6,000多千米长的海岸线和200余个大小港口。早在公元前2300年，印度人民就在罗塔尔建了世界上最早的船坞，其遗址为218米×38米。保存下来的砖堤有4.5 m高，可以容纳60~75吨重、20~25米长的船只。另外还建有一条长2.5公里的人工运河，与流入坎贝湾的河流相通，并有能够开关的闸门，可以随时把船只引进水坞进行修理①。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已能远航非洲。印度文化随着海上交通，其传播极广，不仅遍布缅甸、柬埔寨、爪哇、苏门答腊及加里曼丹，甚至远达日本②。印度作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及罗马帝国通商交往的中转站，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③。据《印度珍奇志》第46节记载，第一个航往中国而又安全回归的阿拉伯舵手，最初即在一艘印度船上工作。

印度高度发达的文明为船舶建造奠定了基础。据梵文史料记载，当时孟加拉王的一艘船可承载700余乘客，还有的船可容千余人。目前所知最早的船型资料是公元前2世纪桑奇窣堵坡浮雕上的一艘缝合船和另一艘首部呈带翅半鹰半鹫神像、尾部作鱼尾状、中部建有船楼的大船。早在东晋末年，印度商船就到了广州，有的还到山东半岛，更有甚者，在长江中游的江陵（今湖北江陵）一次就有“天竺五舶”到达④。在中国史料中，印度船也叫“婆罗门舶”。鉴真在第五次东渡日本途

---

① S·R·罗：《印度水下考古的探索》，印度洋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佩思，1984年。

② F·B·埃尔德里奇：《东方海上强国的背景》，第23页，墨尔本，1948年。

③ A·F·赛：《从考古发现看印度—罗马贸易》，印度洋研究国际学术讨论论文。

④ 《高僧传》，卷2。

中，曾被漂到广州，看到珠江中的“婆罗门舶”及其他国家的船只“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①]。

唐代中国史籍中还有一种“师子国舶”，为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所造，在各国船舶中最为引人注目，“梯而上下数文，皆积宝货，至则本道辐辏，都邑为喧阗”。“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②]僧人金刚智从印度来中国时，自师子国登舟，其船队拥有35艘船，经苏门答腊航至中国。[③]

印度的商舶在东西两条航线上航行，东经马六甲海峡，渡南海而来中国；西经阿拉伯海，去波斯湾或红海。马可·波罗在印度目睹后说，各国船舶停泊在印度港口的，以中国船为最多，而在中国福建也有许多印度商船。印度商人带着各色各样品种的珍珠宝石，运到泉州来出售，获得巨大的利润。比马可·波罗稍晚一些的意大利旅行家尼可洛·康蒂也描述印度船舶的尺度比欧洲船大得多，可以运载2,000只大酒桶，五帆，多桅杆，底舱三层列板，可以禁得起海中的风浪，有的船还有水密舱[④]。

古代中国同印度之间一直有着频繁的使节互访与经济文化交流，这种密切的联系已深深渗透到宗教、天文、历算、文学、艺术等领域之中。在这类互访和交流中，作为两国主要交通工具的船舶，所起的作用是不应忽视的。

3. 东南亚文化区

公元6世纪末叶以前，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是扶南国（今柬埔寨），它不仅控制中南半岛中部和马来半岛的广大地区，而且控制着当时东南亚主要的交通路线。

扶南盛产柚木、檀木等造船良材。有关公元1世纪扶南女王的传说即与建造海船有关[⑤]。3世纪时扶南人将铁构件用于造船，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使其国能够“治作大船，穷涨海”，“开地五六千里”[⑥]。这时中国使节康泰、朱应出使扶南，描绘了扶南的海船：“扶南国伐木为船，长者十二寻，广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人有长短桡及篙各一，从头至尾，约有五十人，或四十余人，随船大小，行则用长桡，坐则用短桡。水浅乃用篙，皆当（撑）上，应声如一。”[⑦]这种长九丈多、宽六尺、能载百人的鱼形大船，在当时东南亚地区算是独一无二的。慧

---

① ［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第74页。
② （唐）李肇：《国史补》，卷下。
③ （唐）圆照：《贞元释教录·金刚智传》。
④ R·穆克尔吉：《印度航海史》，第46页，加尔各答，1912年。
⑤ （南齐）萧子显：《南齐书·扶南传》。
⑥ （唐）姚思廉：《梁书·扶南传》。
⑦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舟部。

琳《一切经音义》曾记载一种以前以椰索缝合的“昆仑舶”，有人认为也属扶南船。这种船尺度很大，“垒木枋而为之，板薄恐破”，吃水较深，分前、中、后三个舱位，顺风扬帆时，不用船夫划动便能行驶，速度也很快。当时不少古代南海国家也都以昆仑为号，《旧唐书・王方庆传》说：“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

发达的造船业，促进了海上丝路交通与贸易的发展。其时扶南商船通常自喷呸港出发，沿着中国—南海—印度洋航线航行贸易。从公元434—588年，扶南使华达20余人次，给中国带来了珊瑚、琉璃、玳瑁、牙塔、苏合香等各式珍宝。7世纪时，真腊取代扶南成为中南半岛大国，这时真腊的“巨舟”已发展成使用铁钉连接，用鱼油、石灰捻缝的木板船。真腊商船经常来往于印支半岛与广州、泉州之间[①]。

印度尼西亚诸岛的航海造船可以上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当时的印尼居民驾驶着简陋的海船，成群地自西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迁徙。《岛夷志略》曾记载位于今加里曼丹的蒲奔人的造船方式。爪哇著名的婆罗浮屠（约800）的浮雕保存了典型的印尼船舶资料。这时在苏门答腊兴起的室利佛逝国，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交通线，势力及于克拉地峡，东南亚主要国际贸易港都位于它的势力范围内，中国、阿拉伯和印度的往来商船都汇集于此。

暹罗（泰国）也是东南亚的海运大国，经常派出百余艘船的舰队与外国作战。据《海国见闻录》记载，其国“造巨舰，载万余石，求桅木于深山大树。隋朝派遣使臣到泰国赤土时，其王命令三十艘海舶出海迎接，击鼓奏击，热闹异常……”[②]。

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200多年间，菲律宾马尼拉帆船队装载着中国丝绸等物，驶往拉丁美洲各国，开辟并促进了中国与拉美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拉丁美洲人民满怀深情地把运载中国货物的马尼拉帆船称作“中国之船”。

4. 东亚文化区

公元7世纪下半叶，新罗国统一了朝鲜半岛，并积极开展同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交流。在中国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和密州（今山东诸城）等地区，都有以商人、船工和水手为主的新罗侨民聚居的“新罗坊”“新罗馆”。这些朝鲜航海家驾驶着自己的海船常年在中国北洋航线上从事木炭转贩贸易，直接参与和促进了中国国内的商业活动。公元9世纪初，日本遣唐使回国，还在楚州新罗坊雇佣新罗舟九艘，取道新罗回国。据朱彧《萍州可谈》记载，宋代朝鲜航海家“便于舟楫，多赍辎重”，利用春末夏初的季风，从高丽全罗道的木浦越黄海、东海到达中国明州（今浙江宁波），然后再溯姚江、钱塘江后，入运河北上至汴京（今河南开封）。

---

① （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夏鼐校注本，第169页。

② （唐）魏征等：《隋书・赤土传》。

公元13—14世纪，高丽的造船技术比前代又有发展，主要表现在造船规模大，速度快，战斗力强等几个方面。元朝征伐日本时，要求高丽赶造能涉大海并可载4,000石的大船1,000艘。开始高丽船匠依照中国船图打造，但成本太高，时间也来不及，当时举国忧之。后来东南道督使方庆决定“用本国（高丽）船样督造”，在较短的时间内制造“战舰五百艘”。1281年的第二次东征，高丽王朝又强迫梢工水手15,000～18,000名，制造战舰900艘。这些兵船虽然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却充分表现了朝鲜人民较高的造船技术水平。

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自古海上贸易多于陆上贸易。从《汉书》起的历代中国史书的有关日本（倭人、倭国……）的记载，许多都是得之于驾船航海来华的日本人。因此，有人认为在古代历史上，日本人到中国来的时候，确比中国人到日本去的时候为多。这从侧面反映了日本的造船和航海能力。石井谦治把古代日本造船分成单材刳船、复材刳船和准构造船三个阶段，而以遣唐使船为其最可称盛之事。遣唐使船以使团多分乘四舶之故而称为“四舶”。每舶乘员122～160人，建造前先任命造舶使长官、次官等，然后由周防国（初期）、近江、丹波、播磨（中期）和安艺国（后期）承造。一般船长十五丈，宽丈余，多仿百济式。帆舶无风或逆风时就摇橹行进，黑夜举火相互联系，称为“火信”。负责制造、维修船只的造舶工匠，船匠以及舵师、水手长、水手等人数最多，占遣唐使团人数一半以上。遣唐使团在中日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大量向日本介绍了当时已高度发展的中国封建文化，同时也使两国人民之间得到了相互了解与交流的机会。唐宋以后，每年都有四五十艘日本商船到中国的明州和泉州等地进行贸易，“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为海上丝路的东渐谱写了新的篇章。

各国船史的发展

研究各国船舶的发展，不仅能够清楚地看到各国人民在推动海上丝路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而且还能在分析、比较各国船舶技术传播历史的过程中，对中国船史的特点及其在世界船史上的地位有更加明确的认识。中国船史的特点和地位，是与其他国家船史相比较才存在的。单着眼于中国船史本身，则很难把握其特点。

上面曾经提到，划分不同地区的造船技术传统，有地理、民族、历史联系以及科学技术、思维类型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一点在东亚文化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唐宋以来，中国商舶对高丽的进出特别活跃，商人、船工不断地、大批地渡海到高丽从事贸易，有些人甚至在那里长期居住。据《高丽史》统计，自1012—1192年间，宋商人“因贾舶至者”

共100余次，人数达4,500余名[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富于航海造船传统的福建人。高丽国主经常希望这些中国人能长期侨居，并“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②]。使中国文化包括造船、航海技术得以不断东传。

朝鲜最初的海船船体多为二重结构，全部用木钉钉合，船材也不讲究。朝鲜《世宗实录》卷48谈到朝鲜船舶时说：“率以未干松板造之，又用木钉，故如遇风浪，连合之处，易以违解，且多罅隙、因以漏湿，致令速朽，不耐七八年又改造，故沿边松木殆尽，势将难继。”后来，朝鲜船匠采用中国北洋航线的沙船船型，“桩用铁钉，而板上涂灰，复用槐木，板叠造以试之”，果然实效甚佳，于是朝鲜国王下令予以推广。在兵船方面，朝鲜也学习中国的“甲造兵船之法”，即在船侧另加贴一层“月外板”（一种理直易折的松木板），这样既可以经久，最长达20年，又能够加快速度，“船体大而轻浮，若与他兵船争驰，则其轻快可见”。因此，朝鲜工匠认为，“其甲造之船，果得良匠，依中国体制，精巧制造，则素不能食，牢固不毁，诚为有益”[③]。到了清代，又有不少朝鲜知识分子到中国游学，回国后大力宣扬中国造船工艺的先进，认为应当集国中巧匠“装造船集，务令坚致如华制”；还有人建议如有中国商船在朝鲜沿海诸邑候风留住时，应派朝鲜工匠上船学习中国造船技术，“尽其术而后方许其归”[④]。

唐宋时期不少中国人也到日本建造船舶，将中国先进的造船技术传给日本。如《续日本纪》养老七年（722），“唐人王六仲始造飞舟进之，天皇嘉叹，授从五位下”。中日史籍中类似这样的记载很多，如唐会昌二年（842）在日本佐贺岛（长崎府内）由中国人承造樟木船一艘，咸通三年（862）当觉如亲王来华时，张文侄在唐津城附近的柏地岛建船一艘，同年明州张友（支）信在肥前松浦郡柏岛打造大船，并亲自驾船将日本使者接至明州。日本学者也将当时日本海外交通的兴盛归之于“由于我国商船学习了宋船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⑤]。历史上日本造船技术的许多进步都与中国有关，如原来日本海船多为平底，不能破浪，若遇无风、逆风时，只好倒桅盈橹，而不能转戗。因此，“倭舡过洋，非月余不可”。16、17世纪时，到日本经商的中国福建商人和船工改造了这种日船，“贴造重底，渡之而来，其舡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驶便宜，数日即至也”[⑥]。琉球地区自古以来船缝捻工和涂船的主要原料是螺灰。雍正九年（1731）苏州府镇洋县（今江苏太仓）商船工匠教会当地人拌以石灰，不仅成本降低，而且水密效果很好。由此，琉球派

① ［韩］朴真爽：《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第7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 ［韩］金在瑾：《朝鲜王朝军船研究》，一潮阁出版社，1976年。

③ ［韩］金在瑾：《朝鲜王朝军船研究》，一潮阁出版社，1976年：［韩］金在瑾、黄宗岭：《新安海底文化财发掘调查报告书》，1980年单行本。

④ ［韩］朴正爽：上揭书，第213页。

⑤ ［日］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三千年》（张俊彦等译），第1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

⑥ （明）李言恭、郝杰：《日本考》，第28页。

往中国的“贡船”和派往日本的“楷船”都开始使用这种材料[①]。

公元17世纪时，暹罗的远航船只差不多都是华侨聚资建造。华侨在赴暹罗途中，先沿越南海岸一带砍伐木材，再在抵达曼谷时另外添购一些，因为暹罗盛产造船良材麻栗木，木材充裕。华侨用这些木材，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便能打造一艘帆船，其中所有篷帆、绳索、铁锚和其他工属具均系华侨制作。因而暹罗航运业的发展深受中国的影响。不仅船只的设计和制造模仿中国，就是航海术也完全依照中国的方法，几乎所有远洋船只都由华人水手驾驶。18—19世纪曼谷之所以能成为印支半岛的货物集散中心，完全是由于华侨帆船活动的结果而造成的。19世纪中叶、受英、葡影响的木夹板船逐渐开始代替中国式的帆船。当时暹罗国王拉玛三世唯恐中国式帆船从此缘迹，特意在乌杜社的岩尼瓦寺建造了一座以中国帆船为模型的寺院宝塔，借此作为纪念，至今仍被保留[②]。

加里曼丹的华侨也有许多造船的能工巧匠，据伯塞尔《在东南亚的华人》记载，中国人“从各条河口附近的开辟地慢慢进入内地，砍伐木材并使之沿河漂流到他们建立起来的简陋码头去。他们就利用这些木材建造大而坚固的帆船，装载他们的货物开往中国”。18世纪中叶，一个荷兰人将加里曼丹的华人商业活动报告给荷兰东印度公司，他在文莱的华人造船场看到一艘580吨的帆船，8月开工制造，5月就下水了。又说中国船工造成此船的费用，共4,250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约三十先令一吨，造船费之廉，任何国家都不能比较”[③]。由于中国造船技术的传播，一些汉语船名也为东南亚地区及其他国家人民所采用，如马来语称船为jong，有人认为此为汉语“船”字名；还有人认为本于厦门语的“船”（chun），以后孳乳而成英文的Junk，法文的jonque（或古法文的joncque），葡萄牙文和西班牙文的junco，荷兰文的jonk，德文的dschonke，意大利文的gianco，波斯语jung等等。马来语的划行小船名sampan，也是本汉语“三板”或“舢板”，在西语的推衍亦如junk[④]。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影响范围。

文化的交流总是相互进行的。任何社会都需要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来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任何民族无论多么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都不可避免地要包含着各种外来的文化因素，这是每一种民族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船舶作为一种交通往来的工具，其吸收外来影响，不断完善进步也是很自然的。

中国史籍中有许多记载各国商船的地方。对于进入沿海各港的外国商船，多统称为“市舶”或“互市舶”，具体有“南海舶”、“波斯舶”、“昆仑舶”、“婆罗门舶”、“师子国舶”、“暹罗舶”、“番舶”、“西域舶”、“蛮舶”、“商舶”、“西南夷舶”等。其中“舶”字本身就被

---

① 《球阳》卷12。

② 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③ 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42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④ 田汝康：上揭书。

认为是外来语，苏继庼提出孟语名航海有舱船曰Kapal，泰米尔语、爪哇语、马来语同，“舶”字疑为此海南诸国语之省音[①]。可见各国商舶意向沿海上丝路来到中国，但丰富了中国船舶行业的语汇和知识，而且扩大了中国船工的视野。不少外国商贾、舶主和工匠还在中国沿海定居，并按照本国的传统方式建造海舶，参加海内外的商业贸易活动。唐末波斯人后裔李珣在《海药本草》说到“波斯家以广南山谷所产之柯树为舡舫”。波斯家应指为波斯舶，即采伐适于建造海船的质坚耐水浸的柯树作板材，在广州或附近建场造船。五代国王王审知的侄子王延彬知泉州时，也曾多次利用外国侨民的商船进行贸易运输，“惊涛狂飙，无有坏失，郡人籍之为利，号招宝侍郎”。南宋初年，泉州府属下的晋江县官员受命建造一批战船。这时侨居泉州的外国船主们“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使该县中国百姓免除了一次额外的负担[②]。这些都对中国本身的传统造船技术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在海南岛发现的缝合木船，有人认为其制造技术可能系唐代来广东定居的波斯人、阿拉伯人或印度人传入[③]。

明中期以后，中国木帆船逐渐衰退。因此，学习和仿造西方木帆船成为此时中外船舶技术交流的一个特点。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的《东西洋考》即开始发现西方的造船水平很高：“或谓和兰（荷兰）长技惟舟与铳耳。舟长三十丈，横广五六丈，板厚二尺余，鳞次相衔，树五桅。舶上以铁为纲，外漆打马油，光莹可镒。舟设三层，傍凿小窗，各置铜铳其中。”[④]嘉靖年间部分广东船匠在南京还仿造了葡萄牙船——蜈蚣船。这种船为尖底，面长十丈、阔三尺，旁架橹四十，置铳二十四，每舟撑驾三百，“虽无风可疾走”，非常适应内河和沿海防备巡逻之用[⑤]。

中国船舶的某些材料，也有自外国购进者。据斯波义信研究，宋元海船的巨枋以杉木为主，也用松木。福建、处州是这种特产的供给地，“其不足部分则由日本输入”。他还说，“明州也从广南、福建和日本海船输入船材”[⑥]。由于木材体积庞大，需用日本的一种“巨舰”即大型海舶来运送。清顺治年间张学礼出使琉球，其船上的铁力木舵即购自外国，有人考证应为缅甸出产的麻粟木，清人黄叔做也谈到他所乘坐的船上的桅杆价值昂贵，自其他国家购进，“任重当风，不稍屈曲，长可八丈，通身无节，名打马木”[⑦]。

以上叙述虽因研究不足而显得零碎，但可以看出，其继续探索的前景还是很可观的。因为这种多角度的探索，能够促使我们不据一体、不专一方地思考，可以纠正许多错觉和偏见，更新我们对

---

① （元）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释本，第4页，中华书局，1981年。
②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13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③ 戴开元：《广东缝合木船初探》，《海交史研究》1983年刊。
④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6，第129页。
⑤ 《续文献通考》，卷134，兵考，军器；（清）尤侗：《外国竹枝词》，明代丛书，卷26。
⑥ ［日］斯波义信：《宋元时代的船舶》（庄景辉译），《船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⑦ （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1。

于世界和自身的观念。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研究造船技术的传播要比一般文化传播现象困难得多，因为这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科学技术的集中和体现。其中有的技术传播是很明显的，就好像一副扑克牌洗好后还能挑出红桃、黑桃一样，但相当多数的影响却是呈现出一种更微妙、更密切的混杂，就像把一块糖放在一杯水中出现糖水交融一样，在严重缺乏物证时，我们必须不被空洞的一般说法所迷惑，而要求具体的证据。例如，中国古代造船技术对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方）的影响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密封舱、船尾舵、船用罗经、多桅多帆等是怎样外传的。这些现在似乎并未搞清楚，应该引起广大船史爱好者的深入探索。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以为还是采用“趋同”这一概念来解释上述未解之谜为妥，即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异体同功而非异体同形的结构必然产生彼此相似的作用。正像R·狄克逊所说的：“大多数表面上看来并不相干而又很相类似的特征，也许可以用传播的作用来解释；可是这里还留下大量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各地的独创。”[①]

我的几点看法

以上我们就各国船舶的发展与海上丝路的关系问题作了简略的叙述，并对中外造船技术的交流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最后，还想就与此相关的几个问题谈一点儿极不成熟的看法。

了解别人，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仅反宥于中国船史的研究固然省事，但毕竟有很大的片面性，不易深刻地把握其真正的历史进程。只有将部分放到整体的背景中考察，才可能跃上一个新的层次，较容易抓住本质的东西。在这一方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3册“航海造船部分”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虽然其中一些具体结论还需要中国船史学家做进一步验证和商榷。长期以来，西方船史学界的主要研究重点是欧洲及其邻近地区，对于东亚特别是中国的许多情况所知甚少，不少著作可以说基本谈不出其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一些影响甚广的船史权威的论著，其关于中国船史部分，或异常简略，或与史实出入极大。这些都需要中国船史学家们根据确凿的史料做出自己的反应，并从整个世界历史的基点出发，对中国船史提出新的更符合实际的论断。

从另一方面说，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我们对于国外船史的研究同样是很薄弱的。迄今为止，专门论述世界船舶发展史的专著和论文在国内还很少见到，因而在进行中外船舶发展的比较时，往往容易出现根据个别材料轻易做出判断的倾向。下面，我们具体罗列几点问题以供大家分析讨论。

（1）船坞。不少船史论著认为，北宋时，我国劳动人民在世界上最先发明了船坞，而其他国家则晚了500年左右。实际上，印度的船坞比我国船坞早两三千年[②]。

（2）铁构件。有的著作认为，到唐代，航行于南海沿岸的外国船还使用椰索来捆扎船体，而

①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512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

② S·R·罗：《印度水下考古的探索》，印度洋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佩斯，1984年。

不知铁构件。目前所知，至少扶南国在汉晋之际已懂得用铁构件连接船体①。

（3）多桅多帆。不少专家说，西方中世纪只能造小型的单桅直帆船。其他地区也很少有两桅以上的船舶。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记载，亚历山大东征前后希腊就有二桅、三桅帆船，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亦是如此②。李约瑟根据《一切经音义》关于昆仑舶的记载推论，东印度和南中国海的多桅多帆船在唐以前很长时间就已存在。

（4）轴向尾舵。过去一直认为国外到13—14世纪才出现。李约瑟提出为12世纪。近来有人研究了德国美因茨一家博物馆所藏的公元1世纪石刻上的船形，认为该船不仅有了操纵桨，而且还有轴向尾舵③。另外，日本与朝鲜船上很早就有船尾舵，其形式、特点以及与中国尾舵的关系应该受到重视。

（5）船用罗盘。西方使用罗盘的记载为13世纪初期阿布费达的地理书，1180年已有“水手之友”之说。1281年，拜拉·基勃杰基著《经商宝鉴》，记载了当时从亚历山大港至印度洋的船员把木片浮在水上，木片上放置磁针。又有以铁作鱼形，中空、投海水中，鱼之头尾即为南北，这与中国史籍所记载的指南鱼不谋而合④。因而现在一般认为罗经是由阿拉伯人得自中国，然后再传播到欧洲的。但这里缺乏任何中间环节，应该努力深入探讨。特别有人指出印度的航海罗经比中国更早，并举出梵文和考古实物为证⑤。这一点也需要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注意。

（6）有些船史论著对于有关史料似缺乏详审慎择的考证和分析。如法显自印度归国时讲到“于是载商人大舶，汎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又说到耶婆提停5月，“复随他商人大船”⑥。印度船史著作认为这里所指为印度船，似为臆测；而我国船史论著大都断定为中国商舶，亦恐没有什么根据。再如马可·波罗关于船舶的有名论述是在第3卷“日本群岛、南印度和印度海的海岸与岛屿”的第1章“印度它的居民的礼仪、风俗和特别著名的奇闻轶事航海月的船舶种类”之中，这是指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南亚的情况，还是单指中国？如果单指中国，为何不放到第2卷“忽必烈大汗和他的都城、宫廷、政府以及西南行程中经历的各城市和省的见闻录”之中呢？再举一个迄今引用率最高的记载，即万震《南州异物志》云：“外域人名舡曰舶（舶原误舡），大者长二十余丈，其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货万斛”和“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庐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虽寥寥数语，然而非常扼要，可以考见当时大型海船的长度、深度、运载量、风帆等情况。这里的“外国”和“外徼”是指

---

①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舟部。

② L·加松：《双桅的希腊船》，《国际船舶考古与水下探险杂志》，1980年第9期。

③ A·W·斯利斯威克：《Blussus船上的舵》，《国际船舶考古与水下探险杂志》，1982年第11期。

④ 方豪：《中西交通史》，第2册，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

⑤ R·穆克尔吉：上揭书，第48页。

⑥ （东晋）法显：《法显传》，章巽校注本，第148、1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哪里呢？国内学术界一致认为“然亦可为中国船也”，并由此得出许多其他结论。可是根据这部书所记大多为南海诸国（如材扬、无论、歌营、加陈、师汉、扈利、姑奴、察牢、类人等）来看，很难让人相信这里的“外国”和“外徼”是指我国。但如不是我国，又应是哪个国家呢？希望这一问题能得到深入研究。

以上几点是作者在学习中感到困惑的疑问，敬希船史学界的前辈们惠予赐教。开展世界船史的研究，是本文作者和许多船史爱好者的强烈愿望，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全面考虑这一方面的工作，首先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战略规划，并落实到具体的学术单位和个人，有计划地引进和翻译世界史资料和外国船史学家的研究名著，并加强与国际船史学家、船史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的交流，使船史研究在与国外和国内的横向联系中增加其广阔性、多向性和创造性，开创我国船史研究的崭新局面。

（原载《船史研究》1986年刊）

评《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

对于中国古代船舶，特别是中国与世界各国造船技术，由于文献资料的支离破碎和实物史料的极度缺乏，一直显得有些扑朔迷离。中外学术界长期以来都对这一哑谜给予关注，并不断地尝试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具有某种共同特点的造船传统进行相互比较，从历史、结构、渊源等多种角度进行分析和解释，力求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台湾学者凌纯声教授的《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70年版）就是近几十年海内外学者关于这一问题比较有分量的专著之一。

凌纯声教授早年曾在法国投师著名学者保罗·黎维（PaulRivet，1879—1956）学习体质人类学。黎维教授对语言学和民族学亦很精通。他曾经提出：亚、美两洲中隔太平、印度两洋，此三地自远古以来即有交通往来。所以水上交通工具最初为桴筏，后有边架艇，再进则有双舟，最后即为有名的中国式的帆船（Junk），使新、旧两大陆与太平、印度两洋连成一广大的区域。他甚至还提出：早在公元前6000年，就有澳大利亚人跨越南极洲到达智利南部和巴塔哥尼亚；同时，美拉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也曾到过南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他认为，研究亚、美洲文化的关系，应先探讨亚洲特别是中国古代远洋航行的问题。如能在种族、语言、文化（重点当是造船技术）方面寻本溯源，找到彼此的亲缘关系，则可证明整个太平洋成为亚、美之间“处处可通的大道”，“如此或可使现持反对意见者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理论”（见凌著导言及第78页）。

这部著作共分7篇，均可自成单元，如“中国古代与南美西岸水运工具的比较研究”“台湾的航海帆筏及其起源”“中国古代与印度太平两洋的戈船”“中国古代与太平洋的方舟”“中国古代与海洋洲区（即南洋群岛）的楼船”“中国帆船和舢板的起源”以及“论夷越的民族”。另外附有50余幅图版。每篇之后都有较详细的英文摘要。仅从各篇题目即可以看出，本书论及问题既相当专门，又非常广泛和有系统。举凡古人远洋航行的关键问题，他都多方搜寻中、西史料，认真加以排比，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观点。凌氏有机地将文献史料与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资料结合在一起，或自零篇断简之中寻绎头绪，或旁征博引作精微之考证，这些很值得我们借鉴。

本书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作者一开始就详细介绍了南美太平洋沿岸土著使用的水运工具，如匏筏、笔舟、木筏、皮筏、独木舟、树皮船和缝合船（本书作缝板船，Dalcas）等。他虽未断定这些全部都源自中国，但以为这些都类似中国古代的航行工具，并且可以在中国古代文献和民族

学、民俗学材料中找到佐证（第26页）。在总结水运工具的发展阶段时，凌纯声教授又进一步强调："中国水运工具的发展，据历史或传说的记载：罗欣《物原》曰：'燧人以匏济水，伏羲始乘桴，轩辕作舟。'除匏、桴、舟三者外，其他浮物如苇蒲、兽皮、树皮也都可以造船。缝合船用兽皮和树皮制成，最后用木板制造即南美的Dalcas（即缝板船）。"（第63页）这实际上已将中国古船与南美的水运工具直接联系在一起。此种论断的根据何在呢？我们不妨以缝合船为例做一分析。

第一，本书所提到南美的Dalcas是一种用细绳缝拼三块木板而成的小船。船上无桅、无舵，亦无甲板或舱室。木板缝隙下面衬以纵长的裂藤，其上铺以树皮。以防渗水。凌氏认为中国古代亦有此船，即舢板或三板，并引《稗海纪游》说三板"为三块木板造成的船。"（第58页）这一说法似为望文生义。舢板（三板）是我国沿海或江河中用桨或橹推进的、无桅帆和甲板的小木船，或指脚船、脚划、划子，并不一定是用3块板造成的船，与南美的Dalcas亦无什么联系。凌氏所引郁永河《稗海纪游》已说得很明白："三板，即脚船也。海舶大，不能近岸。凡欲往来，则乘三板。至欲开行，则系上大船载之。"

第二，本书列举了湖南宝庆地区近代尚存的毛板船，认为"其制作材料和方法，尚有些与Dalcas相似"。这一点也不确切。毛板船是一种有隔舱板的单桅船，以松木用铁搭、竹篾制成，显然与上述南美Dalcas完全不同。凌氏只是根据原调查者绘制的草图推测"毛板船缝合痕迹还显露在外，原始的造法想系用藤篾扎成"（第53页），并未找到进一步的旁证，却在后来得出了"中国湖南的毛板船，亦（与南美Dalcas）属于同一类，不过进步到已用铁搭"的结论（第62页）。这似乎是不够严谨的。

第三，凌氏又列举法国学者帕里（F. E. Paris）1841年所发表的越南顺化的缝合船材料（书中注脚误印为1942年），与南美的Dalcas做比较，以为"此船主材原为三块中央板，此或三板（Sampan）的得名"（第54页）。这种推测既不准确，其资料也不尽全面。根据另一法国学者皮埃尔伊夫·芒吉恩（Pi-erre Yves Mangniu）在1984年佩恩印度洋国际学术讨论会所提出的东南亚缝合船的更为详细的资料，越南水域的缝合船有各种类型，缝合加固技术各不相同，来源亦很复杂。凌氏著作中关于南美 Dalcas的材料过于简单笼统，只有一张不甚清晰的图片，因此难以确定两地缝合船是否属于同一技术类群。实际上，不仅仅越南有缝合船，在老挝湄公河支流、菲律宾马尼拉地区、印尼北苏拉威西的万鸦老地区、马来西亚东部彭蒂河流域以及我国广东海南岛等地，甚至波斯湾、阿拉伯半岛、非洲沿岸均发现过不同类型的缝合船。在分布区域如此广泛，船舶类型和缝合技术又有多样性的情况下，利用一两件民族学材料生硬地将之与南美造船传统联系在一起，势必会将不同地区、新与旧、原本传统与历经改进的技术混淆在一起，其结论必定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第四，凌氏最后列举了台湾兰屿雅美族用缝钉接合的拼板船（严格说这已不是缝合船）和日本、琉球等地以独木舟同防波板缝合在一起的船型（这是从独木舟到板船的过渡类型），并断然指出"日

本、琉球、中国台湾和越南的缝合船都与南美智利的Dalcas有关”（第61页），而丝毫未提这种造船技术怎样起源并扩展到世界各地的，各地有无独立发明的可能性？这些分析在全书中不能不算是一个缺憾。

读完凌纯声教授的长篇大著，我有这样几个想法。

首先，关于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中国人横渡大洋到达美洲的争论，海内外一些学者似有一种缺乏冷静思考、以感情代替审慎科学分析的倾向。以香港巨轮社1969年出版之卫聚贤氏《中国人发现美洲——哥伦布以前中国与美洲的交通》为例，其中共分4部分，即：（一）美洲特产的动、植、矿物，中国人所知40余种；（二）美洲地理；（三）中国人知道美洲及往来美洲者一共计140余人（名流者如孔夫子、庄子、李白、杨贵妃等均去过美洲），还有十几位美洲人来过中国；（四）在哥伦布之前其他各国来往美洲和印度、巴基斯坦、日本、朝鲜、伊朗、欧洲、非洲。据说全书有120余万字，现仅出版了“提要”与“目录”。其大胆想象与随意假设，几乎近于不严肃，因之信服者甚少（不解的是，国内某些权威著作竟然也不加分析地引用）。凌氏著作较为晚出，中西文资料丰富多矣，角度也较新颖。但其比较方法仍很难摆脱先假设后求证的窠臼。以作者的指导思想而言，以为求证出中国人具有海上航行的能力（而不区别近海抑或远洋、偶然抑或经常、官方组织抑或个人探险），就可以得出整个太平洋已成为处处可通的大道。试问这种大规模中外交流的巨大推动力到底何在？有没有政治、军事、经济等方的迫切需要？具备不具备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前提？假若对这些问题不予考虑的话，单纯列举船舶类型与工艺的异同，势必成为考古研究中简单的类型学的排比，而失去了历史学比较研究的最根本宗旨。

其次，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研究造船的传播要比一般文化传播现象困难得多，因为这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科学技术的集中和体现。其中有的技术传播固然是明显的。但相当多数的技术影响却呈现出一种更微妙、密切的混杂，就像把一块糖放在水中出现糖水交融一样。在严重缺乏物证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不被空洞的一般说法所迷惑，而要寻找具体的证据。

再次，国内不少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在参考国外研究成果时，主要还是依据中文译文，较少直接征引外文有关资料。从一些外国史家的著述中，也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古籍的理解非常肤浅，许多人甚至根本不谙中文。在这一方面，凌纯声教授的著作很值得重视。他所征引的大量中西文资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为有用的线索。但是，问题的关键绝不在于“外文的研究成果高于中文的研究成果”。真正的症结是参考资料的性质。在上引“中国古代与南美西岸水运工具的比较研究”中，凌氏所引第一手资料（即考古发掘报告）就显得不甚充足。不仅南美方面如此，就连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文物考古资料收集得亦不齐全。有关缝合船的论述更显得有些薄弱。加之对中国古籍的某些理解过于简单，这样虽然用力甚勤，史料较丰，但读来仍让人感到失之空泛，未能击中要害。在缺乏对有关专题的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之前，这种先入为主的比较研究恐怕很难对学术界的认识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原载《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人类最古老的帆船

在埃及首都开罗附近，耸立着一座巍峨庄严的金字塔，这就是埃及第四王朝法老齐阿普斯（胡夫）的陵寝。1954年，一位埃及学者在这座金字塔的南侧，发掘了一条迄今为止最为古老、保存最为完整的帆船，其年代可以上溯到法老齐阿普斯时代（约公元前2650年）。这只船残存长31米，宽2.60米，深3.50米。复原后长达43.40米，宽5.90米。虽然它仅仅是供法老在天之灵伴随太阳游弋长空的象征性冥器，却极其生动地向人们展示了四千五百年前埃及船舶的结构和规模，反映出人类的造船水平，表现了古埃及人民的聪明智慧。

从这艘船的估构和规模来看，其技术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可以推测，在此之前，还应当有一个从雏形发展起来的过渡阶段。珍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埃及陶罐上的船只图形为说明这一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57年11月，美国考古学家博温（R.L.Bowen）在大英博物馆一只埃及陶罐上发现一个年代极为古老的船形（见上图，来自大英博物馆官网）。这只陶罐的高度45厘米，直径40厘米，收藏号为EA36326，注册号1902，0412.26。博温对这只陶罐进行了精细的研究，推断其年代为格尔塞文化中期偏晚（Naqada II），即可以溯到公元前3，200年！

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分析，格尔塞文化始于公元前3500年，埃及已开始进入文明社会的时

代。因此，应该说格尔塞文化中期陶罐所描绘的船形是现存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航船。

实际上，早在1896年，著名英国考古学家F.皮特里就提出这只陶罐上描绘的是一古船。翌年，德・摩尔根也认为陶罐上是有一古老的帆船。但是这一观点遭到大学者C・托尔的极力反对。他在1898年出版的《人类学》中指出，这一陶罐所描绘的只不过是带有两个堡垒的要塞。此后，托尔的追随者纷纷撰文附合，有的说这可能是环绕城镇的栅栏，还有人干脆说画面上反映的就是一个城市。F・皮特里不甘罢休，他在1920年出版的《史前埃及》一书中，认为以前所谓堡垒、栅栏、城市等解释纯属穿凿附会，他仍坚持陶罐画面表现的是一古老帆船。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上埃及南部发现了上百幅岩画，其中就有类似于36326号古陶罐上船形的画面，并且特征更加清晰，船只设施更加形象。至此，过去人们的疑虑终于涣然冰释。这只陶罐上的船只虽然非常简略粗疏，然而这是我们已知最早的帆船图形。专家从其船桅的位置判断，这只古老的帆船大概只能在顺风中航行。

（该文与王建中合写，原载《舰船知识》1987年第12期，有更新）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的西方知识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曾将对世界各国舆地情势的研究归结为“所以志西洋”，而志西洋的目的“所以志英吉利”。这反映了19世纪前后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实际情形。当时所谓的世界观念，首先是指西方知识。在西方世界中，英国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交往也最多。因此，对英国的了解与认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水平。本文拟通过中国人对英国认识的具体描述和分析，力图从一个侧面勾勒出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发展轨迹。追溯这一发展过程，并将其与英国人认识中国的过程相比较，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

民间最早对英国的了解

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开始由运输一般商品转向鸦片走私。到19世纪初叶，中国吸食鸦片之风蔓延天下，甚至“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中，绝无食鸦片烟者甚属寥寥”[①]。鸦片泛滥严重影响了清王朝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使康乾盛世之后的中国社会更加腐败颟顸。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也普遍唤起了对英国鸦片商人的刻骨仇恨。

与此同时，虽然近代意义的贸易结构尚未建立起来，但中英贸易的性质较之以往的中西贸易已开始发生较大的变化。早在乾隆初年，闽广地区已普遍流通洋钱，“统计两省岁入内地近千万”[②]。甚至民间买卖，洋钱也因兑换方便，人们乐于使用，其价值逐渐提高，以至高于白银。当时已有人指出，这一情况“转使外夷潜操交易之柄”[③]。此外，不少英国商品也以其制作精巧，价格便宜而充斥国内市场。尽管清政府严格限制广州一口通商，但厦门、宁波、乍浦、上海等地都有闽广走私船在“转输洋货”。“天下靡靡争言洋货，虽至贫者亦竭蹶而从时尚。”[④]广州还建有专门作坊，仿造英国的时兴纺织品。“民间喜寿庆吊，陈设繁华，室宇器用侈靡，佥曰洋气。”[⑤]

① 《史料旬刊》第9期，第311页；《道光朝外交史料》卷4，第50页。
② 《漳州府志》卷23，第64–65页。
③ 《嘉庆朝外交史料》卷2，第89页。
④ （清）管同：《禁用洋货议》（道光十三年），《因寄轩文初集》卷2。
⑤ （清）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第3页。述及道光初年事。

在江浙一带的语汇里，“凡物之精好贵重者，皆加洋称”[①]。这不仅反映出西方商品（主要是奢侈品）在中国的深入程度，也说明了中国人价值观念所发生的微妙变化。西方商品正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影响着古老的中国风气，并且“日甚一日，罔所底止”，暗中蚕食着旧制度的基础。特别是：“江淮之间，见祸事将起，辄云要闹西洋”，给已处衰弊陵夷之际的清朝统治者增添了不安和忧虑。

英国不仅使其贸易数量在中国逐渐扩大，而且开始通过贸易和金融势力的扩张以及贸易方式的变化，渐渐动摇了中外贸易的支配权。英国商人利用“商欠”等手法使不少中国行商破产、亡家、充军、下狱，或者利用资助使其苟延残喘，以此来达到控制和操纵的目的，在封建中国内部培植了第一批异己力量。这些仰英商鼻息的食夷利者，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全然采取迎合效力的态度，英人遂“得而持之矣”[②]。当时中国已完全缺乏一种寻觅海外商品市场的动力，加之大宗鸦片贸易麻痹了整个国民经济，中国的对外贸易经济也就逐渐从属于英国资本的支配。因此，如果说鸦片战争前英国资产阶级实际上“早已破关而入”，这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18世纪末以来，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封建社会的深刻危机，要求中国知识分子把视线从古代典籍转移到现实斗争上，对于高空远疏，耽于考证训诂，“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③]的乾嘉汉学进行批判。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希望冲破思想禁锢，研究实际问题，兴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进步思潮。他们不仅重视研究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而且扩大到对世界其他国家（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与研究，其眼界比前辈学者更加开阔，研究范围更加扩大，开始从闭关锁国的帷幕缝隙中窥测到了广阔的世界。知识界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一些知识分子借助有关海外形势的知识，把传统的“知彼”思想用于现实，认为要加强海防，抵御外侮，就必须了解外情，重视认识西方。广东南海人颜斯综提出：“驭夷者必先得其情，而后消其桀骜之气，折冲万里之外。”[④]程春海更明确地指出：“惟殊方遐国，人所忽，必当察之”。认识西方和世界情势也不再是为了弘教化、证经传、富襟怀，而是要“备攻战之用”，“万人可据为攻战之导。”[⑤]安徽知识分子叶钟进提出应该重视对英国在我国沿海地区出版的各种外文报刊的研究，“苟当事者留意采阅，亦可觇各国之情势，皆边防所不可忽也”[⑥]。把对西方知识的探求与爱国御侮思想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是当时人们认识西方的重要特点，对于近代进步人士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

① （清）包世臣：《答萧枚生书》（道光八年），《安吴四种》卷35。
② （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8；（清）梁廷楠：《夷氛纪闻》卷1。
③ （清）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道光十七年），《魏源集》上册，163页。
④ （清）颜斯综：《海防余论》，《海国图志》（百卷本）卷52。
⑤ （清）程思泽：《程侍郎遗集》卷7。
⑥ （清）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纪略》（约道光十四年），《海国图志》卷52。

嘉庆、道光以来的这些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开明官吏）大多互有交往，以经世致用相砥砺，悉心于稽察控驭外患之方略。如姚莹在嘉庆年间就对海外形势发生兴趣，尤其看到“英吉利蓄心叵测，制为鸦片烟土，以毒中国，既竭我之财，又病我之人”，于是对“西洋各国情事及诸教源流，尤深致意”[①]。阳湖派领袖之一的李兆洛也对西学有一定研究，他希望广泛参考有关西方的资料，以达到“规揣今势”的目的[②]。以通达时务、学识渊博而著称的广东知识分子梁廷楠自道光初年入海防书局纂修《广东海防汇览》起，便致力于采集各种中外资料，探讨西方各国“岛屿强弱，古今分合之由”[③]，为历任粤督所重。鸦片战争前（1839）林则徐到达广州后，更是“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④]，从中了解英国的情势，给后来人留下了积极的影响。这些都说明了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急于要求了解世界风云，积极探索抵御英国侵略之计的热切愿望，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的初步觉醒，开始了近代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最初阶段，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当时和后来人们的注意。

（2）当时人们对英国的情况，特别是对它在海外殖民扩张的了解，比起以往有关欧洲其他国家的记载更加深入而且充实。主要文献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介绍有关英国的情形。如谢清商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1820）、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1820）英吉利条、萧令裕《英吉利记》（1832）、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纪略》（1834）、汤彝《英吉利兵船记》（1834）、《盾墨》（1831）、梁廷楠《粤海关志》（1838）贡舶部分英吉利条、周凯《厦门志》（1839）番市略、何大庚《英夷说》（嘉道年间）等。

第二，探索抵御英国侵略之计。如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1826）兵政海防部分、萧令裕《粤来市舶论》（1852）、管同《因寄轩文初集》中的《禁用洋货议》（1833）、汤彝《绝英吉利互市论》（1835）、黄爵兹《敬陈六事疏》（1835）、关天培《筹海初集》（1856）、颜斯综《海防余论》《南洋蠡测》（约道光初年）等。

在上述文献中，很早就有英国人“皆工器械，骛利耐远贾，沿海而东南”[⑤]和“刀枪器皿为诸国冠”“究勘天文地理”[⑥]的记载。英国最早实行的“能出一奇物，得专利三十年，他人学作有禁”[⑦]的专利制度，也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兴趣。新航路开辟之后，英国正处在世界贸易航道的要

① （清）姚莹：《康丰酋纪行自叙》及卷10“海岛逸志”条；《中复堂全集附录年1》。

② （清）李兆洛：《海图纪闻序》（道光元年），《养一斋文集》卷2。

③ （清）梁廷楠：《海国四说》序。

④ （清）魏源：《魏源集》上册，第174页。

⑤ （清）俞正燮：《澳门纪略跋》，《癸巳存稿》卷5。

⑥ （清）王大海：《海岛逸志》（嘉庆十一年），英吉利条；（清）陈伦炯：《海国闻见录》（雍正八年）卷上，大西洋记。

⑦ （清）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略》（约道光十四年），《海国图志》卷52。

冲，“居咽喉之地”，荷兰、法国等国“每被其欺凌”[①]。英国海外贸易的范围因而不断扩大，“与邻国分布，相距有万里者，悉航海以通往来”[②]。谢清高在其口述的《海录》一书中，深刻指出了英国资产阶级“急功尚利”的最大特点，他们四处争夺，侵略性很强，“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③]。

当时不少人已看到英国对外发展殖民贸易的方式是“以兵力行商贾”，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以兵船火器横海上”[④]，“故凡海外诸邦莫不为其所困”[⑤]。英国轮船此时也相继闯进中国沿海，“行驶甚速”，数百里之遥“一时许达矣”。英国的枪炮更是“迅利猛烈”，所以英人才能“到处窥伺”，“所向无不披靡”[⑥]。沿海知识分子凭借这种感性知识，已开始朦胧地认识到了英国科学技术的先进和军事力量的强盛。一些官吏也逐渐“震于英吉利之名”，“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侈挥霍而艳其富”[⑦]。即使是最愚固昏庸的官吏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军事装备的先进，不过是以“该夷人除炮火之外，一无长技”[⑧]来表达其意而已。

当然，在鸦片战争前，还有相当一些人对英人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流传着不少荒谬难信的传闻。如“番舶在洋，日与海波上下，一履平地即簸荡无主”；还有人说英人“以布缚两胯，屈伸不便，所曳革履尤蹇于步，夷登陆则技穷”[⑨]等等。但亲历见闻能够驳斥这种传闻的荒谬。最早到过英国的谢清高所见到的英军“号令严肃，无敢退缩”[⑩]。萧令裕曾兼办粤海关署事务，其所遇到的英国人“出游登山，亦殊矫捷，涉浅水则一纵即过，此所且验也”。他还进一步指出，英人船炮虽然尤至精利，但中国人“无难效仿”。然而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在于“讲求用器之人与行军纪律”，这才是“制御之要”。否则，“将士不善用”，再先进的船炮也只能“存乎其人也”。这种新颖而进步的思想，在鸦片战争前的闭关时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英国在亚洲地区的殖民扩张，更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西南洋之印度，及南洋濒海

---

① （清）王大海：《海岛逸志》（嘉庆十一年），和兰条。

② （清）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略》（约道光十四年），《海国图志》卷52。

③ （清）谢清高：《海录》“英吉利、咩哩干诸国”条；（清）颜斯综：《海防余论》。《海国图志》（百卷本）卷53。

④ （清）汤彝：《英吉利兵船记》（道光十四年），《柚村文集》卷4。

⑤ 《史料旬刊》第21期，第766页；《嘉庆朝外交史料》卷3，第6页。

⑥ （清）关天培：《筹海初集》（道光十六年）卷3；（清）萧令裕：《英吉利记》（道光十二年），《海国图志》卷53。

⑦ （清）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9页。

⑧ 《高宗圣训》卷102，［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5–1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39辑。

⑨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8，第6页；《史料旬刊》第9期，第399页；（清）萧令裕：《英吉利记》（道光十二年）；《海国图志》卷53。

⑩ （清）谢清高：《海录》“英吉利、咩哩干诸国”条。

诸市埠与南海中岛屿，向为西洋各国所据者，英夷皆以兵争之而分其利”[①]。英国两院审查委员会讨论印度战争在中国对待旅居广州英商的态度上所带来的影响时，曾感到忧虑。有人干脆就说，这已使中国人“特别不相信”英国人[②]。

1824年，新加坡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闽粤沿海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一批批地被拐骗到这里，引起了著名幕客包世臣的关注。他认为新加坡战略地位重要，“近在肘腋，易为进退”。英国广招“闽粤逃人”，“事深可虑”，很可能对清统治造成威胁。他建议选派胆识俱优的官员秘密前往，查看得实，“或宥客民之前愆，悉徙之内地，仍前封禁；或驱逐英夷，而设重镇如台湾，所可销逆盟，以弭边衅也”[③]。这些建议虽然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他对海外形势的看法还是很犀利的。

第三，19世纪以来，英国侵略者对中国施展的全面进攻日甚一日，罔所底止。日益临近的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引起了沿海地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高度警觉。嘉庆、道光之间的何大庚深切地表明了当时人们日益感到的英国侵略的潜在威胁。他说：“英吉利者，昔以其国在西数万里外，距粤海极远，似非中国切肤之患。今则骎口而南，凡南洋濒海各国……皆为其所胁服而供其赋税。其势日南，其心日侈，岂有厌足之日哉！”[④]陈寿祺还进一步揭露了英国侵略者“桀骜狡黠，常有轻易中国之心”[⑤]。俞正燮也指出，英吉利诸“远隔重洋，辛苦远戎，其用意甚深”，主张“思患预防”，准备反击可能发生的军事侵略[⑥]。颜斯综撰述的《海防余论》更明确地提出，英国久有“垄断中华”之心。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深刻分析了英人来华意图是想“独擅中华之利，而制诸国之咽喉”。他看到英国侵略者已成为中国最强大和最凶狠的敌人：“古今以兵力行商贾，以割据为垄断，未有如英夷之甚者。”[⑦]

当时一些知识分子不仅已经认识到英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严重性和紧迫感，而且开始感到对西方资本主义再去采取“来则抚之，贰则绝之”的古今不易之道已不再灵验。英国的轮船大大缩短了以往看来遥远之极的距离，“彼国虽离数万里之遥，今则无异邻境”。这一事实说明，利用汪洋大海阻隔各国人民交往的时代早已过去。因此，当愚昧的闭关主义者们提出制夷之策首在“封关禁海”时，立即遭到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吏的反对。林则徐首先指出，“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达，鸦片断与不断，转不在于关之封与不封”[⑧]。他们已经看到汪洋大海已决不是什么天然防线：“沿

① （清）萧令裕：《英吉利》（道光十二年），《海国图志》卷53。
② ［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本），第41页。
③ （清）包世臣：《答萧枚生书》与《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安吴四种》卷35。
④ （清）何大庚：《英夷说》，《海国图志》卷15。
⑤ （清）陈寿祺：《上宫保尚书仪真公书》，《左海文集》卷5。
⑥ （清）俞正燮：《澳门纪略跋》，《癸巳存稿》卷5。
⑦ （清）颜斯综：《南洋蠡测》，《小方壶舆地丛钞再补编》第8轶。
⑧ （清）林则徐：《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卷1：第1411页。

海数千万里，处处皆可登岸，虽有十万兵，不能守也。”[①]萧令裕将闭关封港之策比作“因噎废食”，“未胜隐患，可胜言耶”？姚莹更深入地批驳了这种误国之策。他说，英国恃其狡悍，“于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况且早就对中国垂涎三尺，封关只能是“坐致其侵凌”[②]。尽管这些知识分子的人数并不很多，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和对西方的认识水平也不相同，而且他们的思想也都尚未形成较广泛的社会影响，但他们在冲破闭关自守这种封建传统方面所作的努力，从更深刻的意义上代表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这种思想是中国以往任何时期都未曾有过的，具有了明末徐光启等努力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所不曾具有的崭新的时代内容，标志着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新的开端。

认识需要推动力。英国资产阶级是历史上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中国的征服者，他们用剑与火造了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刺激了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世界情势的了解与认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产生新的世界观念的条件也正在酝酿。康、雍、乾以来，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联系日益加强，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新的水平，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复杂，因而知识界的风气也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跳出封建闭关思想的樊篱，力主反对封关禁海，以保护中国商民出洋贸易。这不仅仅反映出国内阶级斗争的剧烈变化，也代表了萌芽中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利益和要求。

官方对英国的了解

当然，在认识水平上，清廷统治集团与沿海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是很大的。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基本认识状况和思想传统也并未得到明显的转变。以英国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为例，这是英国全球性殖民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拉进世界市场，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丧失独立性，这是英国资产阶级觊觎已久的梦想。对此，清代统治阶级的认识却很糊涂。在他们看来，英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行无远识”，即使值得忧虑，也只是针对其人“素贪”而言的。这种思想成为妥协弛禁派的重要理论依据[③]。他们认为，“以中国鸦片抵夷人之鸦片，夷人为利而来，必折本而去，久之自不复贩”。实际上，对中国来说，英国“贵族想降服它，财阀想掠夺它，工业巨头想用低廉商品压倒它”。这一远略有着强大的经济推动力，并在清统治者“英夷北来意在乞恩互市”和“好在彼志图贸易”等自我麻醉和欺骗中逐步得到了实现。

① （清）程含章：《论洋害》（道光十二年前），《皇朝经世文编》卷26，第15–16页。

② 乔还田：《提倡开眼看世界的姚莹》，《光明日报》1984年2月8日。

③ （清）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四。

统治阶级这种思想认识在清代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并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我们却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中国人的妄自尊大、深闭固拒或虚骄夸诞，因为这种现象有着特殊的时代条件和深刻的历史背景。

第一，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来华之时，正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中国方面还有着不可轻侮的力量。因此，商业资本比较发达的葡、西、荷以及最初来华的英国人都只能是卑辞厚币以求通商，或者通过不等价转换交易、垄断贸易以及在中国沿海骚扰抢劫来获取利益。18世纪以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逐渐占主要地位。但对具有坚固封建经济结构的中国而言，英国资本还不能以商品输出为主要职能，只能依靠鸦片走私等手段来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这基本上还属于一种资本掠夺。对于尚未跨出封建社会大门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也不可能将英国资产阶级侵略者与早期西方殖民主义者加以区分，仍只看作是同样的贸易通商关系，这是很自然的。加之英国也的确严重依赖于对外贸易，这就使中国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中国出产的大黄、茶叶、瓷器、丝绸，是英国日常生活决不可缺少之物，而英国出产物品除了中国也“别无销售之处”[①]。中国对英国的贸易完全是“恩加体恤”，“倘一经停止贸易，则其生计立穷”[②]。嘉庆皇帝与孙玉庭的一段对话，集中反映了中国统治阶级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嘉庆问：“英国是否富强？”孙玉庭答：“彼国大于西洋诸国，故强。但强由于富，而富则由于中国。”嘉庆追问其故，孙说：“彼国贸易至广东，以其货物易换茶叶回国时，转卖于附近西洋各小国。故富，因而能强。而西洋诸国之需茶叶，亦犹北边外之需大黄。我若禁茶出洋，则彼穷且病，又安得强？”[③]

正因如此，中国总是以朝贡、通商的眼光来看待英国人，把对外贸易看成是“羁縻”英人极为重要的手段[④]。英人若有不轨，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封舱”（停止对外贸易），而且屡试屡灵，成为英国不能不与中国贸易的证明。这种威胁虽然暂时起到一些作用，但清统治者却把英人的妥协原因简单化了，认为是唯一的手段，这就势必放松了应有的警惕性，使得中国人对英人来华真正意图的理解更加引入歧途。

第二，清朝统治者一直是以对待中亚游牧民族的方法去对待英人。秦、汉以来，中国的主要外患是塞外游牧民族。对此，中国有着成熟的应对办法。在鸦片战争前的100年内，两定伊犁，一定回部，归化外蒙，征定准噶尔等，清廷莫不全胜而归。面对英国资本主义这一陌生的势力，中国人感到茫然，只好到以往的历史经验中去寻求抵御英国侵略的有效途径。正像梅曾亮所说的：“天子独察其胡，行无远识，含养以禽兽土芥，不以生怒喜，亵我兵械，一使其言塞事阻，迁延却退，常

① 《两广总督蒋攸铦监督祥绍疏》（嘉庆十九年），《粤海关志》卷29。

② 《两广总督卢宪奏折》（道光十四年），《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第15–16页；（清）林则徐：《林则徐集·公牍》，第59页；《文献丛编》第9辑，第5页。

③ （清）孙玉庭：《寄圃老人自记年谱》，《延厘堂集》附。

④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144–145页，坎布里奇，1978年。

以无事。”[①]萧令裕将英国侵略者与西北游牧民族作了比较，认为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②]。

西北游牧民族	英国等西方国家
其民巧，织罽、刺文绣	善治钟表，穷极工巧，织罽之属，精妙绝伦
市例以金银为线，文为骑兵，幕为人面	所用洋钱，以银铸，幕为人面，或为王面
画革旁行为书记，书皆横行不直。	书旁斜上，皆拉体纳字，鸟迹蛛丝，由左而达右
其人皆深目多须	深目鲜须，微不同
善贾市，争分。	善贾争利
贵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决	家事取决常于女子，妇主资财，夫无妾媵

因而他提出：“诚如汉之庙略，通关市不绝以主之，则驽马恋豆栈，即穹庐贤于城郭，毡罽美于章绂。古云匈奴安于所习，心不乐议，是以无窥中国者。英夷亦殆有然矣。”这一观点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以夷制夷”的思想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现端倪，追其源流，也是建立于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

如果说，近邻的游牧民族尚有可能对中国构成威胁的话，那么居于西海陬芒的“蕞尔夷邦”英国则因远隔重洋，“与中华争，势难相及”，“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所以“不足以设心”[③]。这也是清廷对英人来华意图认识不清的一个原因。

第三，英国资产阶级也非常注意通过多种途径向中国人民作欺骗宣传，麻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志。1832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号武装间谍船到我国沿海进行侦查，窃取了大量经济、政治和军事情报[④]。他们同时还到处散发《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等小册子，极力隐瞒掩饰英人来华的真正意图，大肆宣扬英国已占领的众多殖民地，企图让中国人相信：“英国之地方现在太多，宁可减少，不可增多也。”“英国朝廷既已有了这多大地方，何得复渴开新地乎？其所尚者特为养护英

① （清）梅曾亮：《送韩珠船序》（道光十六年），《柏枧山房文集》卷3。
② （清）萧令裕：《粤来市舶论》，《小方壶舆地丛钞再补编》第9轶。
③ 《仁宗睿皇帝实录》卷220，第3页；《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1，第218–219页，（清）梅曾亮：《送韩珠船序》（道光十六年），《柏枧山房文集》卷3。
④ 《中国丛报》卷六，第16–25页。

民享平安，纳福乐而已。”[①]这些宣传在当时起到一定作用，影响面也较广，一部分官吏和群众因此放松了警惕。

第四，清廷对于英人来华意图的模糊认识还与对英国政治的知识极为贫乏有很大关系。在所能见到的资料中，我们仅见《皇清四裔考》有近者英王世系的简单记载[②]，其余有关英国政体和国体则一无所知。在清政府讨对英计略时，琦善曾根据审讯英俘记录论述了对英人来华的看法。他说，英国女王现在“且系年轻弱女，尚待择配，则国非其国，意本不在保兹疆土。而其国权奸之属，只知谋取私利，更不暇计其公家”。因此，对中国作战只是“此等权臣逞念”，不会带来改朝换代的危险[③]。这一点曾是当时清朝统治者的最大隐患，一旦他们发现英国人并不像农民起义那样“潜蓄异谋”，又“不致别滋扰”，那就大可放心，“至诚待物”，“区区之施，实所非吝。蠢尔丑类，何足为仇”？马上转向“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④]的投降派一边。

清朝统治者未能认清英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真实意图，因而也就丧失了机智地应对周围世界挑战的能力，直接导致了中英鸦片战争的惨败。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最初几次战役中，每次都有两三万军队参战，加上有全国各地的支援，本来是有可能将仅有几千人的英国侵略军拖垮赶走的，至少可以相持下去，不至于如此惨败。但由于不了解英军的真实用意，清政府时战时和，方针动摇，举棋不定。既没有统一的战略计划，也没有各次战役的具体措施。加之清军的政治素质及战斗力的低下，终于开始了近百年中国人遭受“流血与污秽、贫困与屈辱”的漫长岁月。

中英相互认识的比较

研究当时中国人对于英国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中国一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做一点儿中英相互认识的比较研究可能更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各民族之间的认识和观察总是相互进行的，其深度和广度主要取决于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不同的认识水平和各异的观察方法，也往往表现出历史阶段和文化传统的悬隔。尤其是文化传统的某些因素往往容易长期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如果对鸦片战争前封建社会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做一比较的话，其相互认识的情形正是如此。

（1）信息量的比较。从现今能见的文献来看，涉及中国人对英国认识的主要资料大约近30种。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对英国的描述并不是重点。集中论述英国情况的文献有10余种，都是19世纪

① 《史料旬刊》第13期，第472页。
② 佚名：《皇清四裔考》，《海国图志》卷53。
③ 《史料旬刊》第35期，第282–284页。
④ 《道光朝筹备夷务始末》卷16，第3页；卷49，第1页。

才出现的。这显然与当时中英接触增多，矛盾与冲突逐渐趋于尖锐有关。

英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在15世纪末，卡博特西北航路探险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英国人曾做过几十次打入中国的尝试。虽然屡屡失败，却因此出版了许多有关东方和探险的书籍，为继续认识中国积累了经验①。在17世纪，当中国对这个新出现在东方的欧洲民族还毫无了解的时候，英国已出版了专门论述中国的著作20种。到18世纪，增加到30余种。截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国内共出版专门的中国学方面的游记、通讯录、报告和研究著作达100余种。这和中国认识英国的信息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信息源的比较。信息量的差距与中英相互认识的途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中国认识英国大致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第一，外国人的中文著作。明清之际中国有关欧洲的翔实知识主要来自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但其中英国部分所占比例极小②。英国传教士虽然也曾在中国和马六甲地区刊印过一些中文地理著作③，然而这些书或注重于欺骗宣传，对介绍英国知识价值不大；或主要在海外华人之中流传，对国内知识界影响甚微。

第二，亲自观察。17世纪以后，有些中国天主教徒曾到欧洲大陆和英国参观游历，可惜都未留下认识英国社会的点滴材料。直到1820年，才出版了一部中国人直接观察英国的游记——《海录》④。在《海录》前后还有一部佚名的《皇清四裔考》，有人考定可能是乾隆年间另一亲历英国的广东水手所述⑤。但这些见闻者多没有很高的文化知识，或者其本身有关于英国的连贯叙述，但经过辗转相传，我们所能见到的往往是一些零星简略的东西。

第三，间接调查。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广州，一些从事对外贸易的洋商、通事、引水、孖毡，在商馆服役的工人以及英国人培养的基督教徒和教会学生，都多少具有一点儿有关英国的知识。这些人研究英国，往往要直接或间接询问他们或在粤的英国商人。因为相互传闻，有时难免以讹传讹，产生误解。

第四，利用文献。文献也是前人询问或调查的结果，但这种方法有着较大的局限性。特别是根据别人提供的信息和前人留下的记载综合而成的材料，往往会出现新与旧、真与误等各种材料堆积在一起，甚至以笔误传抄构成新的景观。如《皇清四裔考》谈到那村（Lancashire）和加利皮

① 苏慧廉：《中国与英国》，第62–65页，伦敦，1925年。

② 例如，艾儒略《职方外纪》关于英国的记载仅有250余字，而他的另一著作《西学凡》，利类思等编《西方要纪》、蒋友仁《地球图说》等书则完全没有关于英国的记载。

③ 如马冶平编写的《英吉国人品国事略说》，米怜的《全地万国纪略》，郭士立的《万国地理全集》《大英国统志》和《古今万国纲鉴》等。除马冶平书外，其余似未在国内流传。

④ 陈观胜：《〈海录〉——中国人最早有关西方的记载》，*MonumetaSinica*，1942年，第7卷。

⑤ 杨宪益：《十八世纪关于英国的中国记载》，《译余偶拾》，第141页，三联书店，1983年。

甲村（Hampshire）时说："二村中皆有海港，通大船。"《清文献通考》即误抄成"二村中皆有大海，驾船往来"。《粤海关志》等书又沿袭通考之误。像这样浩引曲称的讹谬之袭在当时并非罕见。

英国方面，早期认识中国主要通过在华耶稣会士和欧洲的各国的使节、航海家等。他们的著作大都很快就有了英文译本，从各个不同角度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情况，对英国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①]。但这些报告也有不少失实之处。此后英国认识中国的信息源逐渐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通过以下四种途径。

第一，来华英商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这些人在广州"常与汉人往来"，"购阅邸钞，探听官事，不惜重资"[②]。如大鸦片商马地臣曾于1823年乘船最早沿中国海岸进行走私和侦查，他在《英国对华贸易的现状和展望》（1834）一书中，极力鼓吹中国一旦被打开将是一个极大的市场。他还在中国创办了第一家英文报纸《澳门杂录》（另名为《长州纪事报》），向英国反映中国各方面动态，另一些英商也"潜募中国山川道里城郭驿站形势，又募得能书者，录述中国各样情形，大小不遗[③]"。

第二，英国出使中国的外交人员。英国政府派出的外交使团每次到中国后，都要出版一批研究中国的游记或其他著作。马戛尔尼（G.M.Macartney）使团中，巴罗（J.Barrow）曾著有《中国游记》（1804）和《关于马戛尔尼伯爵的故事及未刊文稿》；斯当来（G.L.Staunton）则著有《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两卷，1797）。在阿美士德（W.P.Amberst）使团中，多玛斯当东（G.T.Staunton）著有《阿美士德勋爵使华记》（1824），阿禅尔医师（C. Abel）也著有《1816—1817年在中国内地旅行与往返航行纪事》（1817）等。这些著作详细记述了使团来华途中的航海情况，以及在中国所见到的一切，特别是对沿海各港口的水深、标志物、吞吐能力等细节都不厌其详。

第三，传教士。英国基督教传教士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有明显的不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英国资产阶级侵略中国的先锋队。这些传教士曾广泛收集有关中国情报，为叩开中国大门做准备。著名传教士马礼逊（R. Morrison）曾把中国收集的1万余卷汉文书籍带回英国，以供有关方面研究之用，受到了英王的高度嘉奖[④]。传教士郭士立（K.F.Gutzlaff）虽不是英国人，但他却极力为英人卖命。他曾10余次到中国沿海侦查，详细记录了许多有关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提供给英国[⑤]。传教士麦都思（W.H.Wedhurst）也是一个有汉文著述几十种的中国通，他曾在沿海各城市深入调查商业情报，对中国"虚实情形及官民动静无不确知"。

① ［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朱杰勤译本），第16–19页。

②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5，第14页。

③ （清）黄爵兹：《敬陈六事疏》（道光十五年），《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48页。

④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⑤ 《中国丛报》卷1，第16–25页，第45–64页。

第四，英国还很重视欧洲其他国家有关中国的最新动向。例如荷兰特使范罢览（I.E.Van Braam）等人出使中国后所写的《北京之行：1794—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驻中华帝国朝廷使节纪实》（二卷）于1978年出齐，同年英国就出版了同卷数的英文译本。

克服语言障碍是英国认识中国的最主要成绩，也是中英相互认识的最主要差别。有人后来曾这样说过，天下万国“唯英吉利留心中国史记言语”。英国人不仅在广东“从汉人学习中国文字”，还在马六甲建立了英华书院，“经史子集备聚其中，才秀者入院肄业，以闽粤人为导师”[①]。马礼逊来华后还编纂了不少工具书，专供英人学习语言之用[②]。这样，就使有关中国的信息不仅在数量上，更重要在准确性上有了较大的突破。

（3）认识方法的比较。中国域外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从《史记》到以后各朝正史几乎全都立有外国传，并且视为纂修本国史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在世界地理学史上是非常突出的。但明清以来，由于中国科学的停滞和衰落以及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兴起，中国的域外地理学逐渐落后于西方。中国对于英国的认识虽然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上比前代人有所进步，但比起英国对于中国的研究，则依然显得步履艰难，鹅行鸭步，始终处于明显的劣势。

由于中国人缺乏直接观察英国的机会，因而编写有关书籍只好相互抄纂，或者仅把文章组织略加变更，这样往往缺乏新鲜的内容。即使这种简略的罗列式描述，也还存在着许多空缺。当时中国人认识英国的主要目的在于以备战用，用以抵御英国的侵略。对“夷情”的了解也就主要集中于军事情报方面，至于英国其他方面情况如政治制度、宗教文化、行政管理、语言文字等都所知甚少，这样就不能全面比较中英双方的实力，找出自己真正的差距。因而他们也往往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御敌方略。这种情况从明末清初西学初入到鸦片战争后“中体西用”的提出，一直没有发生真正的转变，极大地妨碍了中国人观察世界的视线。

而英国认识中国的最重要方法，是注重实地考察，不惜一切手段获取中国各方面的情报。从内地、沿海到边境地区以至各“藩属国”，英人都作过以搜集各种情报为目的的窥探调查活动，其旅行路线纵横交错，涉及许多省份。举凡政治、军事、商业、经济、山川地理、风俗民情，无不属于搜集之列[③]。英人还十分注意研究应对中国各方面新动向所作的反应。早期《中国丛报》（另译为《澳门月报》或《中国报库》）几乎每一期都有在华商人和传教士对英国在华政策提供对华外交和商业关系的意见和建议[④]。英国国内也出版了一些专门向英国政府提供英国在华政策建议的著作[⑤]。这些对于英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都有一定影响。

---

① （清）萧令裕，《英吉利记》，《海国图志》卷53。

② ［苏］尼基弗洛夫：《英国的中国学》，第6页，莫斯科，1977年。

③ 《中国丛报》卷1，第309，345页；卷2，第56–178页；卷5，第337–351页。

④ 《中国丛报》卷2，第444–472页；卷3，第1–37页的书评。

⑤ 《中国丛报》卷4，第537–550页的书评。

（4）政治因素的比较。中国认识西方一直缺乏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推动力。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本来就是和其余世界联系很薄弱的自给自足的闭关的整体，在此基础上不可能真正产生直接的政治权力来加强这种闭关整体的解体过程。相反，封建的专制政权和腐朽的传统观念一直起着巨大的阻碍作用。“中外限隔，例禁綦严”①，严重限制了中国对外的了解和认识。清政府将外国的科学文化视为离经叛道的邪说，限制外国书籍和文字的流传。康熙末年以及雍正以后完全禁止天主教和基督教，掐断了中西文化仅有的一点儿薄弱联系。

清政府利用行商制度不直接与外国人接触，失去了亲自了解外情的最重要机会。加之作为官吏进身之阶的八股考试仅仅以阐述经义为目的，因而使得清朝大吏普遍缺乏必要的知识基础，偏见和荒唐发展到了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如琦善家藏番银千万元，却认为“外夷番银皆用水银熬点而成，包裹数年不动则生飞蛾蛀蚀，银坏羽化，正是此类。迨至四五年后，不知变为何物”。他们不仅谈不上诱掖或奖劝人们认识外情，就连关系到自身实际利益的重大政治和军事抉择也常常不能利用起码的外国知识，造成了决策系统和信息系统的严重脱节。有人形容当时“能言者不能知，能知者不能言。信于士大夫之耳，则悬隔漫度，妄生形声”②。更重要的是“外知而内不知，下知而上不知”③。这一点英军首领义律（C.Elliot）也看得很清楚。他说：“呈报给中国高级当局的与外国有关的案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判决要根据腐败的下层官吏的报告，而高级主管官员无法察觉错误或在出错后改正错误。”④这样的“圣躬独断，屡颁严旨”，当然只能导致战中惨败。

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殖民扩张动因的强烈而持久的刺激下，对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认识与研究在英国是一种规模渐趋扩大的社会事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英国政府官员在给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的信函中，都要求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将其行动记录寄回英国，作为给英王和政府的情报，其中明确期望要极力搜集有关中国商业政策及政府实际情况的情报⑤。

英国非常重视在华英人所提供的情报及资料。如“阿美士德”号间谍船所窃取的情报对英国制定对华作战计划以及预谋谈判安排都起到了较大的作用⑥。另一谙熟中国内情的鸦片贩子查顿（W.Jardine）对英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英国外相巴麦尊曾说：“我们能够在给中国的海上军事和外交事务以详细的指示，并取得了这些令人满意的成果”，主要归功于“查顿先生所给予我们的相当可观的帮助和情报”⑦。

---

① （清）李善兰：《〈乘槎笔记〉序》。

② （清）梅曾亮：《送韩珠船序》（道光十六年），《柏枧山房文集》卷3。

③ （清）包世臣：《答萧枚生书》（道光八年），《安吴四种》卷35。

④ 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第214页，纽约，1964年。

⑤ 哈尔娄等编：《英国殖民史料选编》（1774–1834年），第48页，牛津，1953年。

⑥ ［美］马士：《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第332页，剑桥，1926年。

⑦ 张馨保：上揭书，第149页。

英国人还很注意培养青年人对中国产生兴趣。马礼逊曾立下遗嘱，将其藏书全部献给英国大学学院，设立汉学教授讲座，专门培养研究中国的人才。对熟悉中国情况的官员、商人和传教士，英国更采用依靠和重用的态度[①]，如中国通斯当东、德庇时、查顿等人都曾在英国驻华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因而在中英交往中往往占有主动地位。英人还以各种方式利用收买行商、买办和汉奸来为英国提供情报。洋商们“每每互相倾轧，倘有泄外夷之短者，该夷公司必知；而中国用人行政，及大吏一举一动，彼夷公司无不周知”[②]。

总之，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地利人事，英国人“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③]。特别严重的是“我之人可为夷用，夷之人我不得而用之；我之虚实，夷人尽知，夷人之虚实；我不得而知之”[④]。从中英相互认识的比较来看，中国终于要在鸦片战争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战败，已是势在必然了。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造成中国落后挨打的教训，是至今仍需记取的。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也是封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这样一个解体过程是在鸦片战争前就开其端倪的，“而到1840年就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⑤]。

鸦片战争以后，一些思想家将中国失败的原因归之于中国“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⑥]，只“震于英吉利之名，实不知其来历[⑦]”，“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⑧]，这些都是针对朝廷中冥顽愚昧，又大权在握的保守派和投降派官僚们而言的。但据此推论“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漆黑一团”[⑨]显然是失之偏颇的。《明史》欧洲四国传大体反映了明代中叶以来到清初这段时间内中国对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的认识水平[⑩]。而与上述资料相比，其重点显然在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交往关系方面，对于这些国家的内部情况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殖民活动不仅语焉不详，而且“亦多为舛”[⑪]。中国对于英国的认识水平，无论从深度上和广度上都超过前者。这标志着中国域外舆地研究的发展和进步。

---

① 郑尧声（译音）：《英、德的中国学》，第9页，檀香山，1967年。

② （清）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纪略》（约道光十四年），《海国图志》卷52。

③ （清）姚莹：《覆光律原书》，《东溟文后集》卷8。

④ 佚名：《英吉利前说》，引见［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之研究》（资料篇），第271页，东京，1961年。

⑤ 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⑥ （清）姚莹：《覆光律原书》，《东溟文后集》，卷8。

⑦ （清）林则徐：《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9页。

⑧ （清）魏源：《海国图志》卷41，关于《职方外纪》的批注。

⑨ 杨国桢：《林则徐对于西方知识的探求》，《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2期。

⑩ 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⑪ （清）夏燮：《中西纪事》卷1。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世界观念的形成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但就其内容和形成方式而言，与鸦片战争之前的认识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此时知识分子提出的经世致用，反对闭关自守，了解夷情以备战用，以夷制夷等主张，差不多都可以反映出19世纪中叶以后各种进步思想的胚胎和萌芽。当时有关认识英国的许多文献，对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和《康輶纪行》等一系列世界地理著作的撰述也起到启迪和借鉴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点滴片段的西方知识逐渐被抽象成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西洋文明观。人类的认识总是不断积累和不断进步发展的。当我们总结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时，请不要忘记那些创榛辟莽、前驱开路的人们。

当然，人类认识的跨度总是有限的。当时知识分子中虽然涌现出一部分努力认识西方世界的先行者，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传统思想和文化模式的基本格调还是没有明显的转变。与同时期英国对中国的研究状况相比较，此时中国对于西方的认识尚处在水平较低的阶段，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中英鸦片战争之后的相当长时期。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虽然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但是要使中国人民同自己的传统偏见和旧有的世界观念彻底断绝联系，还需要长期、曲折和痛苦的过程。不过我们可以坚信，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那些由于不谙外情而造成的种种畸形现象必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李昭祥《龙江船厂志》的史学价值和海外影响

《龙江船厂志》是研究明代造船史、航海史、中外交通史、科技史等诸多历史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但自成书之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获得中外史家的青睐。据统计，海内外有关《龙江船厂志》的研究论文已经有60余篇，其中还有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也把该书作为研究对象[①]。本文试图从新的角度对李昭祥《龙江船厂志》的成书背景和史学价值做一分析，并对中外学术界的研究进行一些梳理，探讨《龙江船厂志》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影响，期望更多的同人继续予以关注，对该书做的进一步研究。

李昭祥其人与《龙江船厂志》的成书背景

（一）李昭祥其人

李昭祥（1512—1572），字元韬，号南湄，华亭（今上海）人。李昭祥幼年聪慧，有岐嶷之质。他在弱冠之年，已成松江府学廪生，声誉在外。25岁考中举人，裒然举首。嘉靖二十六年（1547）考中进士，同一榜考中者有300多人，堪称明朝最为辉煌的一次科考，包括一代名相推行万历改革的张居正；刚直不屈，以死弹劾的杨继盛；抗击倭寇的殷正茂；整肃海防的汪道昆；治理漕运的凌云翼；还有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等。

之后，李昭祥奉命出任浙江省兰溪县知县，深受当地人民爱戴。嘉靖三十年（1551），升任南京工部主事（六品），驻扎龙江都水分司，督理船政，分署龙江关理榷政，兼营漕、战诸舰。嘉靖三十三年（1554），转任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正五品）。但李昭祥的健康状况本来就非常不好，加上生父突然去世，给他打击很大。他在《养病疏》中记叙听到生父病逝的噩耗后“哀痛愈切，号恸之余，不觉闷绝，经日方醒，遂至宿疾尽发，饮食不进”，因而无法继续工作，只能向

① 参见李硕：《设计学视阈下的中国古代船舶形式研究》，武汉理工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张洁：《明代造船技术的社会动力探析——基于明代造船技术文献的考察》，山西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仲跻荣：《读点校本龙江船厂志札记》，《郑和研究》2002年第2期；王亮功：《龙江船厂志点校本出版回顾》，《郑和研究》2002年第2期；王亮功：《龙江船厂志的点校出版——兼论龙江船厂遗址与宝船厂的关系》，《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3期；王世清、李吉华：《龙江船厂志作者其人其事》，《南京史志》2017年第1期。

皇帝请求提前退休回老家养病①。本来应该如日中天的从政生涯戛然而止。这一年，李昭祥才刚刚43岁。

工部为明朝中央六部之一，是掌握官手工业的主要部门。工部下面设四个属部，明洪武初称为总部、屯部、虞部和水部。洪武二十六年，改称为营缮清吏司、虞衡清吏司、都水清吏司和屯田清吏司。各司直接领导或监督管手工业的行政事务。对于一些任务特别繁重的工作则另设分支机构，特派专官莅事，借以加强领导和监督②。李昭祥的工作是专理船政，负责置办和监督建造漕运船、战船，代表政府管理国家控制的官手工业。历任这一职务的官员有很多，但只有李昭祥写出了这部《龙江船厂志》，说明他虽然身为在职官员，并没有人命令他编写此书，严格来说应该是李昭祥的一种自发行为，属于私家纂修；他个人也没有任何造船背景，但因其以工部主事的身份驻扎龙江都水司，该书同时具有一定的官书性质。

（二）《龙江船厂志》的成书背景

李昭祥与明代抗倭名臣胡宗宪同年，出生于正德七年（1512）。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朱厚熜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嘉靖。李昭祥的主要政治生涯都是在嘉靖年间，经历了明朝从鼎盛走向衰败的转折时期。

1. 倭患深重

在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始终是明王朝的莫大祸患。在长城以北，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嘉靖二十九年（1550）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大肆掠夺，史称“庚戌之乱”③。明朝的海禁政策演变从明初实行严厉海禁，到永乐年间海禁松弛，嘉靖年间又开始高度强化，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海上交通。由于边事废弛，倭寇频繁侵扰东南沿海地区，造成极大破坏。“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嘉靖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宁、台，数千人登岸焚劫。”④

李昭祥的家乡上海也是倭患的重灾区之一，他对倭寇的暴行有亲身的感受。在《癸丑夏日纪事十二首》中，李昭祥对嘉靖癸丑三十二年（1553）倭寇大肆劫掠财物，残杀居民，掠夺男妇，明朝军队无能无为，吏治腐败堕落，以及民心丧失殆尽都有非常生动的描述，比如“缘海村村久断烟，竹冈新港亦萧然（其七）”，“海气蒸腾百丈霾，门庭白日走狼豺，忧时怀土混无寐，倾耳洗天

① （明）李昭祥：《养病疏》，《栖云馆集》卷十一，明刻本，原书藏于浙江图书馆（下同），承蒙李昭祥后人李吉华先生提供影印件。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1页。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嘉靖二十九年八月甲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年，第6500 页。

④ 张廷玉等：《明史》，第1961页。

风雨来（其十二）”[①]。倭患不仅屡扑不灭，而且气焰益张，成为当时东南沿海严重的社会问题。“东南火光烛天起，出门望之不一里，急走不及呼妻奴，犹胜与依一齐死（其二）”[②]。“彷徨出门儿女啼，欲舍不舍心含凄，男儿不死有时返，侬去应为佗利妻（其一）”。这些诗句描述了倭寇之患带来的满目疮痍、凄惨萧条景象，反映的现实情况实令人触目伤怀，情郁于中。李昭祥清楚地看到，明军貌似强大，实际上并不是倭寇的对手。“倭人骁勇真绝奇，数骑能驱百万师，莫讶南州桓刺史，轻舟图画独先移（其九）”。“黄埔长城堑海邦，储胥楼堞倚云张，八千子弟真无赖，四十倭夷折苇航（其五）”。很多当地官吏不顾人民死活，只知道横征暴敛，激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乡兵岁岁急供输，总是苍生骨上腴，闾里只今成版荡，来年何处索军需（其六）？”现在读来仍可以感受到作者愤愤与不平之慨。

《龙江船厂志》中对于这一时期的倭患以及海禁政策也有叙述，“岛夷屡发，为寇闽、浙，至焚村落、屠居民，虽添设重臣，奔走二省，而全效未着。岂兵威之未振哉？士不习也。夫海涛之势，与江湖稍异，士非素习其间，一旦欲用之，头旋股栗，不能安其身矣，况欲展其技能乎！然则谓海船之不可废者，未必无深意也。因访其遗制，图以俟考焉”[③]。从中可见，李昭祥对朝廷的海禁政策是不认同的，他强烈呼吁，“今汪洋之盗，乘风鼓浪，倏去倏来，若非因势趋便，未有能收尺寸之功者。窃以为宜合战巡而一之，操练以观其进退之常，巡逻以习其应变之略，奇正并用，缓急从宜，则船不虚设，而临事为有备矣[④]”。

李昭祥在写给抗倭英雄张经总督的《论海寇书》一份建言中，分析了往年海上战事的失策，说及加强城堡建设以及重视海巡船和战船的重要性，阐述了他对海防和抗倭的真知灼见，大胆提出“使勇者驾船拒敌外洋”[⑤]。李昭祥还极力推荐时任宁绍参将的抗倭英雄俞大猷，说他“素习海战，可保成功，若调福清温台水兵使专领之，往来巡哨于浙直地方，随机应变，不使贼得登岸，则先至者援绝胆寒，虽有所掠不得归岛，党与日削，终必成擒”。据《明史》列传记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明世宗朱厚熜下诏调任俞大猷为宁波、台州诸府参将。嘉靖三十二年（1553）起张经被委任为南京户部尚书，后改任兵部。次年五月，明廷以东南倭寇猖獗，命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专办讨倭[⑥]。同年，嘉靖三十三年（1554），俞大猷取代汤克宽苏松副总兵的职位[⑦]。所以李昭祥的这篇建言应该是嘉靖三十三年前后，刚好是写作《龙江船厂志》

① （明）李昭祥：《癸丑夏日纪事十二首》，《栖云馆集》卷十。
② （明）李昭祥：《癸丑夏日纪事十二首》，《栖云馆集》卷十。
③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1–82页。
④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二，第57页。
⑤ （明）李昭祥：《论海寇书》，该文原收入《栖云馆集》，但浙图现存藏本缺失此文，仅见于清崇祯版《松江府志》卷四十九兵燹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79–981页。
⑥ 《明世宗实录》卷四一〇，嘉靖三十三年五月给事中王国祯条，第7151页。
⑦ 《明世宗实录》卷三八七，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壬寅条，第6818页。

期间。从这篇《论海寇书》中可以看出李昭祥忧国忧民、计深虑远的抗敌情怀，在军事上也有一定的雄才大略。

2. 明朝造船事业废弛

李昭祥从政期间距离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刚刚百余年，对明初海军鼎盛时期的辉煌有深刻的印象。那时明朝政府曾经拥有三千五百艘船只，其中郑和舰队不仅航行于中国附近海域，甚至到达到印度洋，最远抵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

但到了嘉靖年代，国家承平日久，岁造战船，未尝御敌，坐以待朽，“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辄望风逃匿，而上又无统率御之。以故贼帆所指，无不残破”[①]。类似的情况在沿海所有的防卫站都有发生。《明史》指出：“浙、闽海防久坠，战船、哨船十存一二，漳、泉巡检司弓兵旧额二千五百余，仅存千人。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②]。”李昭祥清楚地认识到明代造船业衰败已经到了“未之有也”的程度[③]，“迨熙洽既久，四海遏刘，上下相袭，视水军为虚设，而舟楫之务不复一加之意”[④]。

昔日无比辉煌的宝船厂，如今已经是“厂库鞠为茂草”[⑤]。洪武、永乐时，龙江船厂从各省征用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造船。“历年既远，匠户皆失其故业，且消长不齐。嘉靖二十年，存者二百四十五户。又产丁多寡悬绝，视户责役，贫者不堪，流亡日甚。至嘉靖三十年，而户不及二百矣。迩年船政督察近苛，虽宿弊渐除，而匠作不乐其业，率趋他役以求脱。”[⑥]先年打造海船风蓬的车间“今俱废，唯墙垣仅存，拆船旧板收积其中，既无蔓茨，日就腐烂”[⑦]。当年威震南洋的大将军郑和的后代郑灏招等人也落得盗卖菜地的光景[⑧]。这些都让李昭祥极为痛心。加上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一场大火，很多厂房以及档案资料遂成灰烬。李昭祥检阅旧案，虽然已经重录成帙，但是已非原奉，舛谬良多[⑨]，所以他发奋努力，“博考载籍、名物度数、沿革始末，一一书之”[⑩]，遂成此书。

3. 重振船务

嘉靖年间的知识界比较活跃，但大部分知识分子依然“崇艺文，蔑世务”，文人通常游文于六

---

①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二，第57页；张廷玉等：《明史》，第8352页。
② 张廷玉等：《明史》，第5404页。
③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六，第131页。
④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四，第104页。
⑤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三，第93页。
⑥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三，第92页。
⑦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四，第 106页。
⑧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五，第110页。
⑨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一，第21页。
⑩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欧阳衢序。

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淡泊所谓的世务，即谋身治世之事。况且造船属于工商业的“末技”，更不在他们的法眼之中。李昭祥是一个胸怀大志、才识宏远的知识分子。他曾经这样说过：“臣幼尝读史传，见人才之生，或非其时，不得展其所长，辄为概惜。今幸生当圣世，即铅刀尚怀一割之长，驽马尚存千里之志。[①]”他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非但没有轻视造船业，反而强调“刳舟楫之制，圣人观象天船，以前民用；降自吴、楚，遂倚为战争之具。国之安危，恒必系之，胡可忽也”[②]。

李昭祥希望把自己负责的行业状况以及治理良策都可以记录下来，即使细碎琐屑之事也不能遗漏，希望补偏救弊、拾遗补缺，为后人留下具有垂范价值的历史文献[③]。他还提到为何要保留很多的细节资料，目的是“以示存羊之意云”[④]。“存羊”出自《论语·八佾》中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体现了一种探幽析微的哲理哲思，“礼”固然重要，但“羊”也不能忽视。也许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恰恰能决定事件的走向。“譬诸人百骸九窍，一不备则残。船之器不下百数，一不备则废。称工秩材，典司者将于是乎稽之，不容以琐而略也。犹医之于人，察百骸、洞九窍，不容以小而遗也。”[⑤]所以不能让空洞的理论说教遮蔽住双眼。只有借鉴前事，洞幽烛微，未来才能对国家有所裨益，拳拳之心、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龙江船厂志》的主要内容与史料价值

自古以来，造船业一直都是“百需所萃”[⑥]，是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体现了科技发展的最高成就。2002年从浙江杭州萧山发掘出土的独木舟经过碳14和热释光测定，距今约7,000至8,000年，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独木舟，充分证明中国是世界上发明、使用船舶最早的地区之一[⑦]。经过宋元时代的迅速发展，明代的造船航海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南京龙江船厂，是明朝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官办造船企业，郑和下西洋的部分船只应该也是在龙江船厂建造的。李昭祥虽然不是造船技术专家，以前也没有任何造船行业的背景，但他身为工部主事，主持船厂的厂事，可以接触到最原始的工部官方文书和档案资料。他也充分整理和发掘了其他督造官员所写的著作，尤其是直隶吴江人沈棨于嘉靖二十年（1541）以营缮司主事兼理督造身

① （明）李昭祥：《休致疏》，《栖云馆集》卷一一。
②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八，第253页。
③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二，第3–37页。
④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一，第16页。
⑤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二，第33页。
⑥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六，第124页。
⑦ 楼卫：《“世界第一舟”——萧山跨湖桥遗址独木舟及其遗迹》，《浙江文物》2009年第5期。

份撰写的《南船纪》四卷，“至今赖之”[①]。加上他在主持船务过程中亲临现场，探究访求，丈量计算，调查统计，凡事隔久远，一概从略，书中所记很多都是他亲历所见，“尝历览木栅之遗迹，而知创治立法之难也”[②]。

《龙江船厂志》共有八卷，详细记载了该船厂180年来的发展以及规模、能力、工艺、技术以及官办船厂的管理思想、体制、规章等，作为中国船业第一部专志，开创了我国记述造船工业专志的先河，整体性、概要性、史学性、学术性、文献性地展示了明代造船史的成就，给后人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解明代造船技术的视角。该书大致分为造船和船厂管理两大部分，其中卷二《舟楫志》、卷四《建置志》、卷八《文献志》主要记述了造船的技术，船只的类型以及沿革等内容。其他五章主要记述的是船厂的各项管理和制度。

1. 关于造船技术、船只类型与发展沿革

《舟楫志》对造船厂所使用的造船技术进行了记述，通过制额、器数、图式全方位讲解了造船技术。提举司负责修造的船舶，类而为五：曰黄、曰战、曰巡、曰渔、曰湖，即黄船、战座船、巡战船、渔船、湖船等五大类数十个品种，依次记载了北京、南京及其他卫所应配置的船种和数量，图示篇以图证史，以史载图，图史合一，图文并茂，包括了2幅详注船体各部位名称的船体结构图（总图）[③]。还有24幅古船的外观图，配文说明各种船舶的特点、用途、变化以及长宽高尺度。“器数并陈，法象兼著”，忠实地记载了明代战船类型及其结构，为船史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字和形象资料[④]。通过对《龙江船厂志》中所列船型的技术参数的研究可以获取到很多潜在信息，对船舶技术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⑤]。

《建置志》追述洪武初年开始建置船厂、嘉靖年间缩小规模改建新厂的经历，并附有厂址和提举司分司的平面图，详细介绍了龙江造船厂的建设地点，包括提举司、工部分司、篷厂、油麻地和造船厂在内的所有地点，不仅详细记录了龙江造船厂的地理位置和内部机构的设置，对于研究考证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厂遗址，也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⑥]。

《文献志》以观澜索源、振叶寻根的理念，通过以往文献了解我国造船技术的发展历史，摘要性收录了从远古至明嘉靖间古文献中关于船制、造船的记载，目的是“考今揆昔，循景察标，亦足

---

①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三，第89页。

②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四，第107页。

③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二，第38–39页。

④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二，第27页。

⑤ 李硕：《设计学视阈下的中国古代船舶形式研究》，武汉理工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张洁：《明代造船技术的社会动力探析——基于明代造船技术文献的考察》，山西大学2019年硕士论文。

⑥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四，第97–107页；刘义杰：《明代南京造船厂探微》，《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1期；范金民：《明代南京宝船厂遗址考》，《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以达从违之宜、广得失之鉴”①。

2. 关于船厂的管理制度

李昭祥刚刚上任，就发现船厂“弊兹猬兴，而屡经厘剔，政亦罔焉，数矣”②。官员不负责任，工匠得过且过，造船质量完全无法保证。“近来匠作既图苟且，监督者忽而不察。船既不能如式，安得不启小人之揩诈乎？”③此外，官商勾结，制度形同虚设的现象也很严重。“厂寄城外，又官多交承，防范之规，废弛特甚。其仅存者，看守之役而已。然偷安嗜利，人情所同。偷安则巡徼不以时；嗜利则通同之弊日滋。苟非时时申饬，悬重法以惧之，严检阅以察之，欲无侵渔之患也，难矣！”④他深深感叹：“慨规制之弗一，患记载之靡悉，是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也。财殚力疲，利未见而害有甚焉者矣，且国家建官之初意哉！”⑤

其实李昭祥在兰溪执政期间，就表现出过人的胆识和大刀阔斧的管理才能。《兰溪光绪县志》记载他：“平易真率，缜密综核，精于算法，优于吏才。举废墜、剔宂蠹、平赋役、息争讼、戢盗贼、行乡约，具有规条，一一皆见之实事。”⑥

所以，他在《龙江船厂志》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梳理、明确了船厂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希望“纲目相属，先后有伦。上不得以立异，下不得以行私。财不告匮，人不告劳，触之迎刃而解矣”⑦。这是《龙江船厂志》与《南船纪》的最大不同，弥补了明代其他著述的不足，在当时起到了加强管理的作用，对后世研究明代官手工业的管理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于当今的企业管理也有一定的借鉴。

《训典志》记载了明代历代皇帝有关船政的论述和关于船政的法律法规。如“谟训”收录了太祖、宣宗、世宗三朝的敕谕。“典章”录律例以示官常，记载了诸司职掌、职掌条例以及大明律和会典中规定的若干条文。其内容涉及海战船、内河战船的年产量与各卫所的战船配置情况。“成规”收录了明初至嘉靖年间对修造船舶的若干规定，内容广泛，包括船种、产量增减、战船造价、用料数量、修理年限，甚至修船时必须使用若干旧钉、旧材的数额等。“典章”与“成规”两部分的区别在于：有些规定“遵行已久、卷籍可稽，而未经奏请。或虽经奏请而条例所不载”者，“不

①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八，第253页。

②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六，第124页。

③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六，第131页。

④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六，第134页。

⑤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欧阳衢序。

⑥ （清）唐壬森：《光绪兰溪县志》卷三，台湾成文出版社，1973年。

⑦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欧阳衢序；顿贺、刘斌：《从龙江厂看明代船厂的建制与管理系统》，《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敢混入”典章，遂另立“成规”以收纳[①]。由此可看出，李昭祥撰稿时一丝不苟，非常严谨。

《敛财志》力主“通工惠尚，量入为出”[②]，希望便利各地货物交流，使贸易畅通，给工商业者带来好处。同时，国家应该根据收入的多少来决定开支的限度，这样才能邦有恒典，这些都是当政者应该遵守的原则，也是《敛财志》的宗旨所在。该部分详细记载了造船所需各种原材料，如木料、竹货、五金、五彩颜料、麻类、油料、灰炭、皮毛、丝布、漆料等10大类104种；对其中的楠、杉原木和板材均按不同长短粗细规定了价格。至于所需经费，除政府通过不同渠道拨付以外，重点记叙了船厂自筹经费的来源，以隶属本厂的土地召农承佃，收取麻类、油料等实物地租。

《孚革志》的名称出自《易经》革卦，李昭祥强调“弊不革则利不兴，上不严则下不肃”，提出“禅伐之代兴，忠质之异尚，宽猛之互施”，多管齐下，达到治理整顿的效果[③]。他列举了收料、造船、收船、佃田、看守等五个方面的弊端，其中仅在造船过程中就存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擅改规程、工艺粗糙、拖延时日等八大问题。李昭祥主张“慎任使”“杜请托”“平市价”“察扣减”“戒滥恶”“谨法度”“禁需求”“惩勒措”“验器物”“查板片”“惩玩愒”“汰老弱”等若干解决办法，论述客观，切中时弊，从中可看出明代官营企业管理的很多细节问题。

《考衷志》对造船材料和费用进行了介绍，收录了五大类数十种船舶各自的造价、用工标准和所用材料的规格及数量[④]。所记载不仅是龙江厂当时的规定，而且将在此以前的规格变化以及其他记载一并收录，从多方面提供了明代造船的技术数据，这方面的记载比《南船纪》更为丰富详尽。

《龙江船厂志》以龙江船厂为主体，记述了船厂的组建、编制、规模、主要业务以及整个造船业的发展，对造船技术做了深入的研究，对龙江船厂的管理体系也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对我们还原明代造船技术和探讨明代造船技术的发展演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 人本主义思想

虽然与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李昭祥受到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的束缚，但他在《龙江船厂志》中体现出的人本主义思想值得进一步探讨。

早在兰溪担任知县期间，李昭祥就改革当地的税赋，减轻百姓负担，兴修学宫，重视教育，定时在官府接待听取民意，对生有三个女童以上的家庭免征税赋，避免了虐死女婴事件的发生。据记

①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一，第16页；何国卫：《明代造船木料计价和木材材积计算》，《国家航海（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0–30页。

②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五，第108页。

③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第124页。

④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七，第137页。

载，兰溪感念李昭祥的恩德，专门建造一座“生祠”来纪念他[1]。

在《龙江船厂志》里面，他提到大司马王公建议减省进贡快船，嘉靖皇帝慨然行之。他感叹道：“损上益下，恩至渥也”，从而进一步提出减少君上的权利而施惠下民，以顺兆庶之悦。因为“方今司农告诎，有能献计将岁运之器，就京师监局成造，则供御不缺，而民力所省多矣，又安知不足以动宸衷之轸念乎！”[2]

李昭祥在龙江船厂看到底层劳动人民的艰辛苦难生活，深表同情，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他说：“夫工匠执役于官，晨出暮归，岂真有奉公之义哉，为糊口计也。兴工之初，工食未领，先称贷以自给，工完支银计其出息，十已损二矣！而府吏胥徒，蚕食于公门者，又方聚喙而睁目焉，故匠工之所得者，仅十之六七耳。此之不戢，其伤实多。迩因查访既明，痛加禁革，冀得少祛一二。但恐以石压草，石去旋生。能时加之意，或庶乎其可也。”[3]所以他认为，“苟非变通而优恤之，不惟厢民之日贫，而欲求船之如式也，不亦难哉！”[4]可以看出，他那种深沉诚挚的同情心和责任心。

同时，他认为，对待工匠们应该是“恩威兼着，情法并行，使彼畏我而不敢欺，爱我而不忍欺。万一情有冤抑，事有窒碍，亦须为之禀堂，曲为区处，无俾失所。如是则自然乐于趋事，而大有功矣”[5]。说明他既坚持原则和制度，也富于人情味，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事感人。如果看到有不公正的现象，应该挺身而出，为下层人据理力争，这样他们才能感恩戴德，忻然有立业赴功之心。

李昭祥在书中提出了“器虽利而用之存乎人也”，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优秀传统的重要内容，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他进一步分析说，“杨仆之楼船、孙权之艨冲、王浚之连舫，皆足取胜，而陶侃以运船为战，亦克成功。故将得其人，则随宜致用，因变就功，而器械之利不与焉”。在李昭祥看来，方今政府经营战舰，应该是大小毕具，迟速并宜，尤其应该重视人的作用，这样才可以起到“扬武烈，固江防”的作用，“乘是舟者，尚思所以善用之哉”[6]，表现了与众不同的见识和胸怀。

---

① 徐应文《南湄公兰溪去思碑记》，见李卓民编《竹冈李氏族谱》卷八，1921年第六修，原书藏于上海图书馆，承蒙李吉华先生提供电子版；唐壬森：《光绪兰溪县志》卷三，台湾成文出版社，1973年。

②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二，第43页。

③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六，第126页。

④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六，第132页。

⑤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六，第125页。

⑥ （明）李昭祥著，王亮功校注：《龙江船厂志》卷二，第51页。

《龙江船厂志》的版本流传

《龙江船厂志》成书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曾有刻本，但流传不广，虽经汲古阁等多家辗转收藏，也是少有人知。一般说法是20世纪40年代才见到无锡的梁溪余氏所藏《龙江船厂志》孤本。后由郑振铎收入《玄览堂丛书续集》。1947年由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出版，为史学界所重视[①]。

这一说法主要来自历史学家管劲丞。1946年夏间，管劲丞先生在苏州得见梁溪余氏所藏《龙江船厂志》孤本。他认为《龙江船厂志》的最大收获，是书中载有四百料、二百料、百五十料和一百料战座船的详细制度，并说李昭祥著述《龙江船厂志》的时候，“海船制度虽然无考，而图形还信而有征哩！”[②]

民国二十二年（1933）初，当时的教育部下达公文，要求筹备国立中央图书馆，蒋复璁（1898—1990）担任筹备处主任。筹备之初，藏书极为有限，充实馆藏，尤其是善本书的收购，成为最重要的事。蒋复璁《“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序》对此有详细记载：“国立中央图书馆”创立之初，由教育部拨到图书四万余册。后又购到明《龙江船厂志》《太平天国官刊英杰归真》、清沈炳巽撰《续唐诗话》稿本数种，皆海内孤本。时以创立伊始，经费支绌，所得善本，仅此而已。可见当时经费有限，在蒋复璁购买到的善本书中，《龙江船厂志》等被称作“海内孤本”，特别“点名”。民国二十四年（1935）六月，《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议事录》出版，其中收录蒋复璁的《中国古物之范围与分类案修正意见》，也可知蒋复璁购得此书，大概是在1933年4月后，1935年6月之前。[③]

1937年7月上海市博物馆举办过一次上海文献展览会，范围包括上海市以及上海、松江、青浦、奉贤、南汇、嘉定、崇明、金山、太仓和宝山等10县的乡贤著述，其中就包括了明嘉靖癸丑刊本《龙江船厂志》。

上海市博物馆《文物周刊》第一期（1946年10月13日）记述了1937年7月上海市博物馆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的情况，上海乡贤著述包括了明嘉靖癸丑刊本《龙江船厂志》。“上海文献提要选录”详细介绍了作者李昭祥和他所撰写的《龙江船厂志》，论及洪武初年，即于龙江关设厂造船，以备公用，统于工部。永乐迁都燕京，南北相距，水浮数千里，百凡取办于南畿船用更多，而郑和下西洋所用“宝船”“宝石船”，亦多由此建造。盛赞该书为“航运船舶及造船之宝

① 仲跻荣：《读点校本龙江船厂志札记》，《郑和研究》2002年第2期；王亮功：《龙江船厂志点校本出版回顾》，《郑和研究》2002年第2期；王亮功：《龙江船厂志的点校出版——兼论龙江船厂遗址与宝船厂的关系》，《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3期。

② 管劲丞：《郑和下西洋的船》，《郑和研究资料汇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270页。

③ 窦瑞敏：《“海内孤本”续全唐诗话在近代的流传》，《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第4期。

贵史料也”[①]。

由郑振铎先生编的《玄览堂丛书》初集于1941年在上海印制，续集印制于1947年，由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其中就包括《龙江船厂志》。从最近发现的郑先生书单来看，这部书就是郑振铎先生从国立中央图书馆借来的[②]。

综上所述，《龙江船厂志》在20世纪亮相的准确描述应该是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被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1937年7月在上海市博物馆举办的上海文献展览会展出，第一次为学者阅读研究利用是在1946年夏天，首次被媒体和学术刊物曝光是1946年10月13日的上海市博物馆《文物周刊》，正式印刷出版是在1947年。

《龙江船厂志》的海外研究与影响

由于《龙江船厂志》对于郑和下西洋以及中国造船史、航海史、中外关系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自从20世纪重新亮相以来，也受到海外学术界的重视。

最早留意《龙江船厂志》并向西方介绍此书的是当代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和战后汉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他精通中、英、德文，一生潜心研究明清史、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东南亚华人碑刻史籍，著作丰富。早在1946年，傅吾康就在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担任教授，同时在中国文化研究所（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Research Institute）工作。该研究所由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Institute）资助，并且出版西文刊物《汉学研究》（Studia Serica）。傅吾康一直协助编辑部的工作并撰写学术论文。1948年傅吾康在成都出版了《明代史籍会考》（又名《明史要目解题初稿》），首次向西方学术界介绍了《龙江船厂志》。这部书简明扼要，是西方学界了解明史不可缺少的工具书[③]。

该书后来在海外多次重版。2011年德国华裔女汉学家刘奋明（Foon Ming Liew）进一步修订和补充了傅吾康的这本名著，改名为《增订明代史籍汇考》（*Annotated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including Southern Ming and Neighbouring Lands* 1368—1661），变成两卷本，共1,289页，由马来西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主要涉及历史、传记和政治方面。第二卷是外交和军事、地理、经济和技术章节，以及作者和书名的索引、词汇表和书目。《龙江船厂志》（6.5.10）是明代建造海船、

① 宽正：《龙江船厂志：乡贤著述之一》，《文物周刊》1947年，（1–40）；上海文献展览会编：《上海文献展览会概要》，https：//www.douban.com/note/736922132/

② 俞小明：《劫余珍籍“玄览”情：馆藏玄览堂丛书的内容与特色》，《新世纪图书馆》2014年第12期；苏维：《探寻郑振铎与近代中国古籍影印之情——以南京图书馆新见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图书馆书目档案为据》，《新世纪图书馆》2018第4期。

③ Wolfgang Franke, Preliminary Notes on Important Literary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Chengdu, 1948.

沿海和内河船只的重要史料[①]。

20世纪50年代包遵彭先生（Pao Tsun Pheng）的《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是郑和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包遵彭，字龙溪，安徽定远人。曾任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和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并任教东吴大学、辅仁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校。他的《中国海军史》钩沉索引，信而有征，很受研究海防专家重视。包遵彭在《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的第一页这样介绍《龙江船厂志》：“因史文记载过于简略，（郑和宝船）其详确之制度，甚难稽考。吾人均知，郑和出使之宝船，大部造于南京龙江船厂，今幸传世之《龙江船厂志》，系直隶上海人李昭祥著。李氏系工部主事，嘉靖三十年（1551）主持厂事，时距郑和末次出使仅百余年，距海船之革，仅二十余年，应有详确记录，供吾人今日研究考证之资。”他的研究一直为海外郑和研究者所推崇[②]。

1957年中国海军史专家罗荣邦教授（Lo Jung-Pang）在其名作《明代海军的衰落》一文中大量引用了《龙江船厂志》的资料[③]。罗荣邦先后任职于斯沃斯摩尔学院、密歇根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终身教授。当还是研究生时，他就曾经协助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关于中国海军的部分。他还鼓励德国青年学者希林把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作为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

在1971年英国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四卷　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第三分册 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中，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利用了大量中外史料考察了中国古代水上航行用的明轮船、前桅帆、后桅帆、水密隔舱和尾舵等。李约瑟高度评价了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说这部著作“应视为中国技术文献中的瑰宝之一”（one of the treasures of Chinese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该书一开始就简要地记述了明代造船史，以及负责筹办该船厂的官吏的事迹。后面是一些船只图录和说明，但船尺寸似乎均已减小。因为其中仅有一艘四桅船（海船），多数均为两桅船（大黄船，四百料战座船，或四百料巡座船）；此外还有一些单桅内河船及更小的船。该书卷四介绍船厂并绘有平面图，后面是材料规格和尺寸，并附有以银两为单位的造价表，以及各工种所需要的造船工匠和工人数目。末卷，即卷八，汇集了中国典籍中有关船舶和水运方面的文学和历史资料，收集得最为完善。”[④]

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明代名人传》也把李昭祥列入明代著名人物之一。该

① Book Reviews by Roderich Ptak,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ume 43, Issue 02, June 2012, pp 364–367 DOI：10.1017/S0022463412000100, Published online：20 April 2012.

② 包遵彭：《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国内历史博物馆历史文物丛刊》第1辑，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1年版，第1页。

③ Jung-pang Lo, “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 Oriens Extremus, Vol. 5, No. 2（December 1958）, pp. 149–168；［美］罗荣邦：《明初海军的衰落》，《南洋资料译丛》1990年第3期。

④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Ⅳ.3, Cambridge,1971,pp 482,382.

词条的作者任以都教授（E-Tu Zen Sun）为辛亥革命元老，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任鸿隽的长女。幼年生长北平，抗战期间负笈美国，长期任教于宾州州立大学，专治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著作等身，曾将《天工开物》翻译成英文。她说李昭祥主政龙江船厂期间，为明代造船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除此之外的第二重要贡献就是编写《龙江船厂志》，为研究明代造船业提供了整体的视角，其内容涵盖船厂历史、船厂管理律法、历任官员资料、机械设备、建造不同类型船只所需要的原材料，以及行政管理中需要的改革等等。该书描绘有龙江船厂建造的许多船只形状，还有每只船的规格及其简单的历史介绍[①]。

本世纪以来利用《龙江船厂志》开展研究的海外学者还有2005年台湾基隆海舶工作站的曾树铭和台湾成功大学系统及船舶工程学系的陈正宏。他们根据《南船纪》与《龙江船厂志》的资料建造了1/25之遥控肆佰料战座船模型，及1/10的精密展示模型，修订了《南船纪》与《龙江船厂志》中有关四佰料战座船船体各部位描述的错误四处，补充说明不清容易误导者一处；而创复模型因其他考量修改与原记载不同者有两处，并提供计算肆佰料战座船有效容积的图示，并计算出约略的有效容积4,030立方尺与排水量260吨，可作深入探讨“料”的问题之参考[②]。

英国剑桥大学亚洲和中东学研究员程思丽（Sally K. Church）对李昭祥《龙江船厂志》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她一直致力于《龙江船厂志》的英文翻译工作，向更多的海外学者推介这本书。在她看来，《龙江船厂志》是一部规模浩大的专著，要理解该书就必须对古船本身有一个深入的了解。2005年她在“传承文明　走向世界　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郑和宝船的度量单位“料”》是对《龙江船厂志》的深入研究之一[③]。

同年，她和两位造船工程师格约翰（John C.Gebhardt）和李特里（Terry H.Little）共同发表了《450尺宝船的可行性——造船工程学的分析》（Zheng He：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lausibility of 450-ft Treasure Ships）。她认为，如果按照《龙江船厂志》对“料”的记载，我们可推断44丈长、18丈宽的船舶应超过2,000料，约接近20,000料。在《龙江船厂志》中400料船舶为八九丈长，因而这里的数据是被低估的[④]。

① 富路特、房兆楹等：《哥伦比亚大学明代名人传第三集》，时代华文书局，2015年，第1096—1098页。

② 曾树铭、陈政宏：《肆佰料战座船之创复模型及其性能分析》，《中国造船暨轮机工程学刊》2006年第1期。

③ ［英］程思丽：《郑和宝船的度量单位“料”》，《传承文明　走向世界　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2005年，第505—513页；何志标：《从明代古籍所载战船尺度推测中国古船“料”的含义》，《国家航海（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44页。

④ Sally K. Church, John C. Oebhardt and Terry H. Little,“A Naval Architectural Analysis of the Plausibility of 450.ft Treasure Ships”, in Chia Lin Sien and Sally K Church, eds., Zheng He and the Afro-Asian World, Melaka: Perbadanan Muzium Melaka（PERZIM）and International Zheng He Society, 2012, PP. 15–47. ［英］程思丽等：《450尺宝船的可行性——造船工程学的分析》，《国家航海（第十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期，第23—39页。

2011年，程思丽根据《龙江船厂志》“器数”的描述认为中国古代造船的过程似乎是先造外壳而不是先造构架①。当然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说法。何国卫教授从船舶制造工艺角度，认为中国古船的横隔壁是满实了的横框架，其支撑船壳外板保证船舶线型的作用与肋骨相同，因此中国古船并不存在所谓的“船壳法”建造顺序。同时，把对《龙江船厂志》有关记载的误读当作中国古代造船顺序为“壳先法”的依据也是无法立论的②。

2017年日本历史学家松浦章教授论述了明清史籍中记载中国古帆船图的六种重要史料，其中详细介绍了李昭祥所著的《龙江船厂志》，认为是“参考《南船记》后集大成而作”。但他指出，这些史料大部分只是明清时期中国官方使用船舶的相关书籍史料，民间船舶的相关资料却鲜有所知③。

除此之外，还有几篇与《龙江船厂志》研究有关的海外学位论文。

1987年德国学者希林（Hans Lothar Scheuring）在法兰克福出版了博士论文《明代船史资料龙江船厂志研究》。作者希林是一位热爱航海的汉学家，在台湾学习汉语，对中国造船产生了兴趣。作者遵循了李约瑟和罗荣邦的建议，集中精力研究李昭祥和《龙江船厂志》。希林把《龙江船厂志》翻译成德文，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以加强对技术说明的理解，如插图和地图清单、参考书目、个人姓名索引以及地名和关键词。文字中插入汉字，方便在索引中再次出现。论文结尾附上了一篇内容丰富的简明英语摘要，使广大读者能够查阅。希林认为李昭祥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儒家，他关心公共福利，饱含同情心，用一种高效和非官僚的方式支持贫穷的匠人。他对明朝的海防政策有自己的看法，与当时官方的政策格格不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④。

2014年台湾成功大学梅伟强的硕士论文《明代贡舫之研究》根据《龙江船厂志》《大明会典》《南京都察院志》等资料，以贡舫为中心，研究了贡舫船队的发展、运作与影响⑤。2016年台湾清华大学彭文显的硕士论文《欧洲军事武器与东亚的交流——以明代蜈蚣船及叭喇唬船为例》对《龙江船厂志》和《南船纪》中记载的蜈蚣船做了讨论，颇有新意⑥。德国著名汉学家普塔克（Roderich Ptak）以前曾经根据《龙江船厂志》等资料写过一篇关于葡萄牙人与蜈蚣船的经典论述⑦。近年国

---

① ［英］程思丽：《海洋文化的痕迹：龙江船厂志中的“壳先”造船过程的证据》，《国家航海（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期，第1—7页。

② 何国卫：《中国古船建造法考述》，《国家航海（第十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8—66页。

③ ［日］松浦章：《中国帆船研究回顾》，《海交史研究》2017年第1期。

④ Hans Lothar Scheuring, Die Drachenfluβ-Werft von Nanking—Das“Lung-chiang ch'uan-ch'ang chih,” eine Ming-zeitliche Quelle zur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Schiffbaus,Frankfurt: Haag and Herchen, 1987; Book Reviews by Ina Asim in Ming Studies, 2013, Volume 41, pp 85–88.

⑤ 梅伟强：《明代贡舫之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⑥ 彭文显：《欧洲军事武器与东亚的交流——以明代蜈蚣船及叭喇唬船为例》，台湾清华大学2016年硕士论文。

⑦ ［德］普塔克：《蜈蚣船与葡萄牙人》，《文化杂志》2004年第4期。

内关于这一课题也有不同看法的文章，非常值得一读[1]。

综上所述，李昭祥《龙江船厂志》是明代造船业著述的典范之作，自20世纪30年代重新亮相之后，其史料价值已经为中外学术界所肯定，成为研究明代造船史、航海史、中外交通史、科技史的必读之书，在海内外甚至成为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李昭祥也被国外名校出版社列为明代名人之一。同时，《龙江船厂志》又是时代影响和学术发展的产物，体现了李昭祥的家国情怀和人文精神。故此，对此书的分析与研究，既是一个对造船史、科技史学习的过程，亦有助于后人认识明代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艰难历程。从学术角度整体性研究《龙江船厂志》，在发掘丰富的明代造船历史内容、梳理科学技术细节，整理古代企业管理等方面还有更多的研讨空间。

（原载《国家航海》2022年5期）

① 谭玉华：《汪鋐　奏陈愚见以弥边患事　疏蜈蚣船辨》，《海交史研究》2019年1期。

第四部分

考古学与博物馆学

谈殷都地望选择

《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四期登载的郑杰祥同志的《二里头文化商榷》一文，论述很精辟，但我觉得有些地方还值得考虑。例如，他在谈到“汤都西亳说”时说：“二里头处于夏的政治中心区域，汤灭夏后，会不会马上把自己的国都迁到敌对势力的政治中心区域，殊为可疑。因为这种政治社会的客观条件既不允许，商人集团也不会那么幼稚，把自己的国都远离本部的势力范围，建立在敌对势力的政治区域，这在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除非它不想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否则决然不会蛮干到如此地步。”然后他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以仅从这一点考虑，商汤都亳于此实属不大可能。”依我之见，郑杰祥同志的这种推断和结论本身就颇有“殊为可疑”之处。

历史上许多政治集团，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占领区的统治，常常把自己的政权建在敌对势力的中心区域，这在上古史中是不乏其例的。远在上、下埃及第一次统一时，上埃及的统治者美秀斯就发现把首都设在自己过去的势力范围内，已不利于加强对被征服的下埃及的控制。于是，在公元前28世纪，他的继承者就把首都迁到上下埃及之间的白城孟菲斯①。巴比伦城原是古巴比伦王国的首都，但公元前18世纪加喜特人占领了两河流域，正式以巴比伦城为首都建立政权，并且统治长达四五百年之久②。可见这样做并不是什么“蛮干”和“幼稚”。再举一例，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侵，也以巴比伦城作为首都，把帝国的中心由希腊和马其顿移到被征服的东方地区，使大量的希腊人也移居这里，巩固了他的统治③。由此看来，把国都建立在敌对势力的范围内正是巩固和加强占领者统治的一种必要手段。

在我国历史上，此类事情更是屡见不鲜。周武王虽建都镐京，但在其晚年已经考虑在伊洛流域建立一座新的都城，以便更有力地控制商人的势力。后来周公鉴于武庚和管蔡大规模叛乱的教训，认为听从商人继续留在原地区是危险的，于是营建洛邑，使之成为西周统治东部地区的政治、军事

① ［埃及］阿·费克里《埃及古代史》第12页，17–18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② 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39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③ 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241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中心[①]。特别像以后的魏孝文帝迁都洛阳[②]，海陵王迁都燕京[③]，忽必烈定都大都[④]，不都是人人皆知的吗？再拿清朝来说吧，1644年5月满清军队进占明朝首都北京，同年9月清顺治帝就从沈阳迁到北京，定北京为清朝的首都[⑤]。由此推彼，可知郑杰祥同志对“汤灭夏后，会不会马上把自己的国都立在靠近敌对势力区域的地方，甚至就建立迁到敌对势力的政治中心区域”的怀疑是没有什么理论和事实根据的。

古人说：“建邦设都，皆冯（凭）险阻。”[⑥]除此之外，我觉得考察一个政治集团建邦设都的问题时，还应注意到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和财赋所出情况，更重要的还应考虑控制敌对势力是否方便和有力等问题。显然，“仅从一点考虑”是远远不够的。

这就是我对郑杰祥同志的一点意见，正确与否，请作者给予指教。

（原载《河南文博通訊》1980年第2期）

①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第22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595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六册，第289页。
④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3册，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⑤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3册，第24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⑥ （宋）郑樵：《通志略・都邑序》。

古代车辆与东西方文化

在欧亚大陆之间，从大兴安岭到黑海北岸乃至多瑙河下游，错落分布的高山、河流、森林、沙漠和绿洲，把广阔的欧亚草原间隔成大小不同的条条块块，迤逦相属，连绵不断。自古以来，许许多多马背上的游牧部落和民族，诸如匈奴、塞种、月氏、乌孙、柔然、突厥、契丹、鞑靼和蒙古等都在这里繁衍生息，过着追逐水草、居无恒处的游牧生活，发展了独具风格的游牧经济和文化。人们常常把这些游牧民族的文化，甚至整个欧亚草原的物质文化，称之为“骑马文化”或“马上文明”。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马的驯化是在公元前3000年才完成的，而马被用作骑乘则要晚得多。人们在迈锡尼公元前1300年的一只残破模型上可以看出骑乘的战士形象。在克里特发现的考古材料可能稍微更早一点。大约与此同时，巴比伦文献中最早提到骑乘①。中亚地区所知骑马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中国，春秋末年（前5世纪）才有骑马的风气②。所以，从马的驯化到骑乘的使用这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时期内，对欧亚大陆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起着更为重要作用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车辆。车辆的发明是人类征服自然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创举。如果说“骑马文化”或“马上文明”确实对古代欧亚大陆各民族的更迭盛衰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话，那么“车上文明”对于研究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经济生活、军事状况、技术发展以及宗教信仰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科研意义。并且，“车上文明”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比“马上文明”更为宽广，其影响范围不仅是中亚各草原帝国，甚至包括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所有民族③。因此，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的论述却少得可怜。在这里，笔者不揣浅陋，就自己所能看到的考古材料以及历史文献和神话传说，就古代车辆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谈一点极不成熟的看法，有牵强、谬误之处，恳请大家指正。

---

① ［英］C·辛格等：《技术史》，卷1，第728–729页，牛津，1979年。

②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襄公二十六年：“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吕氏春秋·不苟篇》：“衰曰：‘赏其未则骑乘者存’。”

③ 本文只论及欧亚大陆车辆。新大陆文明中没有车子。古埃及很早就有车子，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讨论。

世界视野中的战车

最古老的车辆，其年代可以上溯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文化时期。人类最初搬动较重的物品时，往往用圆木柱垫在重物之下，滚动的概念也就源于这种技术。早期车辆的牵引动物主要是牛和驴，苏美尔曾发现过四匹野山驴拉的四轮车，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①]。过去有人提出两轮车比四轮车古老，这是不尽正确的。在乌尔早王朝神庙出土的奠酒石板上的战车图刻断片，特别是乌尔王陵第797号墓中出土的著名“乌尔军旗嵌镶画”，其中的战车也是四轮的，其年代与苏美尔出土物相去不远[②]。在两河流域一座公元前3000年的王陵中曾发现一柩车的遗存，轮辋周围饰有金属钉子，车后还依稀可见拽引动物的骨骸[③]。最古老的车轮是由圆形木盘做成或三块木块拼成圆盘，连结在随轮转动的轴上，后来才改进为车毂，把中心部分挖空，交叉部分逐渐愈挖愈薄，最终便引导出车辐。目前发现的最早带辐条的车轮，其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前后。马拉战车大约出现在同一时间。最初由于车轮较小，辐条也不多，此后逐渐由4辐、6辐发展到8辐、12辐甚至15辐的车轮。

车辆从两河流域传到欧洲大约是公元前2500年。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当时的车辆，还有专供车辆行驶的用圆木筑成的驿道[④]。克里特后王宫时期（前2000—前1700）的米诺斯王朝也开始牧马驾车，公元前1500年前的泥板文书上已出现了带辐条的车轮。与此同时，希腊也将马车用于狩猎和战争[⑤]。中欧、西欧在凯尔特时代（前1000）开始从笨重的货车过渡为轻型两轮战车，一些较大的墓冢也开始用战车殉葬。欧洲（特别是北欧）遗址中还保留了不少车辙的痕迹，为研究早期车辆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从语言学来看，“车”和“车轮”这两个词很早就出现在雅利安诸语言里。由此推测，原始的雅利安人，也就是较纯的诺迪克种雅利安人，已有了车子。但由于没有表示轮辐、轮辋、轮轴等共同词根，看来当时的雅利安人的轮子不带有辐，而只是用斧头把树干两端之间加工成一定形状[⑥]。中亚和欧洲的考古发现已证实了这种语言学上的推论。

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发现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车辆模型，其顶部呈三角形。在印度中部曾发现战车岩画，这些战车为单辕条二套马车，并载有步兵和弓箭手。阿拉伯半岛也有车辆岩画，其构造与中亚、南亚基本相同[⑦]。

① 《世界上古史纲》（上册），第133页；《技术史》，第205页。
② ［英］杰苏波：《奇妙的考古世界》，第14页，纽约，1968年。
③ 《技术史》，第206页，牛津，1979年。
④ ［英］霍斯特：《考古学导论》，第288页，伦敦，1976年。
⑤ 《世界上古史纲》（下册），第49、53页。
⑥ ［英］韦尔斯：《世界史纲》，第292–29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⑦ ［苏］诺甫戈罗多娃：《蒙古山中的古代车辆岩画》，载《文物考古资料》第2期。

中亚草原曾发现过非常远古的车辆。比较完整的车辆实物出自阿尔泰巴泽雷克二号墓（主持发掘的鲁金科认为其年代应为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这是个畜牧部落首领的合葬墓，其尸体放在一辆四匹马套驾的四轮车上。车轮直径150厘米，数百件零件完全用木榫和皮带连接[①]。

近年来，在蒙古阿尔泰山曾发现22幅车辆岩画，在杭爱山支脉中楚鲁腾河（蒙古北部）两岸的岩石上也发现有8幅车辆图形。另外，还发现一些分割成若干扇形、圆形和人形的车轮，从结构上看，有点像双轮马车[②]。整体说来，蒙古车辆结构相同，与欧亚大陆上已发现的古代车辆区别不大。这种单辕马车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迈锡尼、外高加索和北欧都有发现，同一结构的车辆在阿尔泰巴泽雷克墓和中国商周墓葬中也有发现。但考古学家同时也敏锐地观察到，从移到车轴前方的车厢来看，蒙古车辆与古代中原车厢有显著的区别，而与阿尔泰、图瓦、哈萨克斯坦和帕米尔的车辆有较多的相似之处。

近年在我国内蒙古阴山山脉西端的狼山地区也发现许多处古代车辆的岩画。有人认为其时代与殷代相近。但本人认为阴山车辆岩画的时代恐较晚，不会与商代同时。阴山地区及河北、山西、陕西的北部，是历史上的山戎、俨狁、鬼方、北狄以及匈奴活动的地区，据王国维考证，这些名词是同一种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法[③]。即顾炎武所谓“一时之号而蒙千载之呼也”[④]。但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这个地区的游牧民族还是徒步作战，根本无车[⑤]。最早的考古资料只有玉隆太、迷机沟和西沟畔战国墓葬中发现的车马器零件[⑥]。所以，商代晚期狼山地区就有车辆之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关于我国殷代战车的型制、特点及其与西方战车的关系，我们已在前文论述，这里不再重复。需要补充的是，《韩非子·十过》中曾提到黄帝“驾象车”的传说，远古是否真有“象车”，殊为可疑[⑦]。但《吕氏春秋·简选篇》记载：“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遂有夏”，即在商初就以战车威势征服夏王朝，却是很有可能的。因此，目前发掘的晚商车马器，其出现绝非是偶然的。

战车的社会背景

车辆和车轮的发明是人类技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车轮诞生以前，用两头牛牵引1,360千克重

① ［苏］蒙盖特：《苏联考古学》，第141页。按：有的同行认为西方的车轮直径都不超过100厘米。由此看来，这是不够全面的。

② ［苏］诺甫戈罗多娃：《蒙古山中的古代车辆岩画》，载《文物参考资料》第2期。

③ 马得志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

④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82，胡条。

⑤ 《左传》隐公九年，郑人对北戎，有“彼徒我车”的形容；昭公元年，群狄侵晋，魏舒也有“彼徒我车”之言。

⑥ 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匈奴古发现及研究》，载《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

⑦ 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第14页。

的货物时，必须使出500多千克力的拉力。由于车轮的圆周运动，减少了车体与地面接触的面积，使负载质量所造成的摩擦降至最低的限度，从而大大改变了交通运输的状况。车辆不仅是交通运输史上的最高发明，也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具。

首先，在工业化尚未形成的古代，制车和造船同为最庞大、最复杂的行业，在衡量社会经济活动和刺激各种工艺革新方面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这样说道："车轮是史前木工的最大成就，它是现代机器的前提，而且，一运用到运输上，就把撬车变成了两轮车或四轮车——火车头和汽车的嫡系祖先。"[①]

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一部论述制车技术的专门著作《考工记》曾谈到："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说明当时制车业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综合工艺部门。其中木工绝大多数都是制车的工人，如攻木之工：轮、舆、弓、庐、匠、车、梓。"另外，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设色之工、刮磨之工也都与制车有紧密的联系。由于造车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因此整个手工业技术的不断完善，由分散逐步走向集中，是古代造车工艺提高的主要依据。反过来，制车技术和工艺的进步，对整个手工业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促进其他行业的发展和变革。所以，古代车辆的历史是手工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一面聚光镜。

其次，马克思说过："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的民族一样，必须先得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②]车子的历史也证实了这一点。车的最大功用是"引重致远"，因此应是首先用于负重、狩猎和游牧，之后才逐渐用于战争。许多武器如斧、殳、戈、矛等也都是从生产工具（猎具、渔具、农具）发展而来的，不少器具的用途，始终是兼而有之的。

车的出现，离不开一定的经济结构。一般说来，畜牧和狩猎在每个民族的早期历史都是很重要的。在反映秦人狩猎生活的秦襄公时代的"石鼓文"中，通篇都充满了对车、马、弓、矢的夸耀和赞颂。如《甲鼓》："避车既工，避马既同，避车既好，避马既验"，《丙鼓》："田车孔安，鋚勒马马，四介既简。左骖旛旛，右骖犍骓，避目陵于原"[③]，可以看出狩猎与车辆是不可分离的。

许多游牧民族，如斯基泰人，还将天幕建在车上，迁徙时便于运载全家及财产。这一现象不仅在古典作家的笔下有所反映[④]，在前苏联阿塞拜疆的明超格尔库拉河畔公元前11—公元前9世纪墓葬中出土的带轮子的陶屋模型也提供了形象的材料。斯基泰人的住所是一种能移动的完整房屋，用毛

① ［英］柴尔德：《远古文化史》，第115页，中华书局，1958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47页。

③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第19–22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

④ ［希］希罗多德：《历史》，第478页，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2年。

毡撑起两个或三个房屋，与后来游牧人能拆开的帐篷有所不同。游牧民族需要不断变换牧场，车上的帐幕就成了他们不可缺少的栖身居所[①]。

其次，在古代，奴隶主和封建地主之所以关心生产并促进技术进步，最根本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的私利，即用武力获取政权、土地和奴隶，这就使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畸形化。无论希腊、罗马、两河流域，还是中国，手工业的最高技术成果往往不是农具，而是刀、剑和车马等，车辆也主要是用于战争。

我国先秦时代的车，总的说来分为“大车”（驾牛、车厢大）和“小车”（驾马，车厢小）两大类，以小车为多。大车被看作负载笨重器物的“平地载伍之具”（考工记），而小车（又名轻车、戍车）除贵族出行外，多用于战争。《小雅·采芑》说“方叔莅上，其车三千”，由此可见西周王室小车之盛。甚至对御车，也有讲究。《小雅·车攻》曰：“四黄既驾，两骖不猗；不失其矢，舍矢如破，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徒御不惊，大庖不盛。”小车的制造技术就更为重要了。有种种规定，据《考工记》记载，当时的小车为曲轴，揉轴时应顺应木纹组织，不可过曲，不可伤断木材的筋理；车箱下面的部分要保持水平，轨前面挠曲的部分要仿效注星的连线，并且这两部分还要互相协调，才能便于行车[②]。按照以上要求制造的小车，“终日驰骋，左不楗（蹇）；行数千里，马不契需（耎）；终岁御，衣衽不敝”，甚至“马力既竭，輈犹能一取焉”（《考工记》）。

在古代，掌握大量战车是决定性的战略因素，古希腊罗马的史学家都熟悉由战车和带轮投石机组成的防御工事，战车还是军队冲锋陷阵的“重型坦克”。从我国古籍记载来看，春秋时代历次大战，无论致师、决战还是追击，双方使用的也都是驰骋的战车。不单普通战士要驱车鏖战，就连赫赫有名的楚庄王也亲率战车进行追击[③]。当时动辄动用数以千计的战车[④]，空前巨大的作战规模，正面宽广的严整队形，使得战车在平原作战所向披靡，战车的多少甚至成了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古时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如齐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是以“千乘之国”，“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禁”[⑤]；鲁国也是“公车千乘，米英绿滕，二矛重弓”[⑥]。这都说明了战车在当时战争中所居的绝对统治地位。

---

① ［苏］蒙盖特：《苏联考古学》，第225页，考古所资料室译，1963年；［苏］阿尔茨曾夫斯基：《考古学通论》，第111页，楼宇栋译，科学出版社，1956。

② 《考工记》：“孙而无孤深”，“弧而无折，经而无绝”，“准则久，和则安”，“注则利”。

③ 《左传》宣公十二：“王乘左广以逐赵旃。”

④ 《史记·张仪列传》：“秦带甲百余万，千乘，骑万匹。”

⑤ 《吕氏春秋·简选》。

⑥ 《诗·大雅·鲁颂》。

车辆与神话传说

车辆不仅与古代人们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密切相关，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它还渗透到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古人赞颂、歌咏甚至崇拜的对象，出现了许多与之有关的神话传说。古人寄寓在车辆中的社会感情是含混而多义的，时间的长河已冲淡了其中的感情色彩，但残留下来的千奇百怪的故事和图画，也促使后人回味无穷。

车轮在西方神话中的意义是太阳、神和幸运①。两河流域的车轮仅限于某些特殊仪式和祭典使用。在欧洲，关于把燃烧的轮子滚下山或木圆盘抛上天空，以庆祝冬至和夏至的习俗，其各种解释都把车轮和超自然的力量结合起来。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的象征是太阳车，其中车辕、车轴、车轮、车身都是黄金制成的，周身饰满了闪烁着光辉的橄榄石和金刚石②。在斯拉夫神话中车子和赶车人也是太阳神维达③。

在北方岩画中，太阳与车子总是在一起的。如吉尔吉斯萨马塔什岩画中的太阳徽记，实际上就是车轮④。蒙古车辆岩画中的重要题材也是象征太阳的圆圈，特别是杯形凹坑的小圆穴，显然和车轮一样与象征生命力的太阳有关。这些车辆图形都位于山岩上最难接近的部位，刻在离山脚3米多高的突出状石块上，还有的甚至高达8～9米⑤。

在我国早期神话传说中，太阳神也与车辆有关。屈原在《天问》中问道：日神羲和尚未扬鞭赶车，太阳怎么能大放光明呢（羲和未扬，若华何光）？还有的传说认为太阳神羲和驾的是六条龙拉的车子，每天从东到西飞驰过天空⑥。《淮南子·天文训》中有一段关于太阳神驾马车在天空奔驰的传说："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悬车……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其拟人的成分更多。这里每天腾云驾驶五亿万余里的竟然还是一位女御者！

从以上可以看出，东西方的神话传说虽然时代不同，性质也有差异，但都将车辆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古代车辆使用初期的和太阳神有关的复杂概念结合起来。这说明东西方古代文化虽然彼此分离孤立，不互相从属，实际上都是息息相通的。这种跨越东西文明之上的"超文化现象"（Cross-Culture），又一次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性。

---

① ［德］利普斯：《事物的起源》，第183页，汪宁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 ［德］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上），第35–38页。楚图南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③ ［苏］奥克拉德尼科关等：《德勒格尔—穆连和特斯河谷的岩画》，载《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2期。

④ ［苏］弗鲁姆金：《苏联中亚考古》，第139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编印。

⑤ ［苏］奥克拉德尼科夫等：《德勒格尔—穆连和特斯河谷的岩画》，载《文物考古参考资料》第2期。

⑥ 《淮南子·天文训》："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高诱注："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

在古代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车子还常常与托尔雷神（多纳尔）等相结合①。当时人们往往崇拜雷电的威力，将之说成天地间一切生命的创造者和保护者。费尔巴哈曾指出："在古代日耳曼人那里，至少在北方日耳曼人那里，托尔（Thorr）即雷神，同时也是降福于人的善良的守护神，是农业的保护者，和善的爱人的神。"②

在我国，车与雷也是密切相关的，这大概是因为众多车马轰隆之声与电闪雷骇的声音相像的缘故吧③。《庄子·达生篇》亦可看到"雷车之声"的比喻④。在我国古人笔下，雷车神，和西方一样，是伸张人间正义、对恶人执行刑罚的善良的神，如古代道教说创造车辆"引重致远"的轩辕氏得道升天为雷神，即"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九歌·东君》说"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远游》中也有"左雨师使径径待兮，右雷公以为卫"，以雷师为御，以雷公为卫，以雷为车，都反映车辆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

这种万物有灵的观念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许多原始部落和民族都相信太阳神和雷神，这主要是对雷鸣电闪、日月交辉等自然现象的无知和恐惧。认为在这些自然现象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有意志、有情欲、有人格的神。但把自己创造的车子与超自然的神结合起来，则反映了人们以自己的创造中得到利益或受到损害（如在战争中），因而产生的病态幻想。车轮在古代曾被描绘为仅有神才能使用的乘具。在《日耳曼尼亚志》中记载了公元1世纪易北河下游游牧部落对车的崇拜心情：在大洋的一个岛上，一丛神林中有一辆供献给神的犊车，覆盖着一件长袍，只有一名祭司可以接触这辆车子。当大地之母纳尔土斯（Nerthus）下降到这个隐僻的地方时，也只有这个祭司能够感觉出来，于是牝犊拉着车子上的女神前进，而他"则以兢兢业业的敬畏心情随侍车后"⑤。

把车辆视为崇拜对象，其所表现的价值应是人加于自己、加于自己生命的价值。内蒙古磴口县阿贵沟现存的车辆岩画，都在古代进出山区，翻越阴山的必经道上⑥。这里除了与牧群迁徙、交通路标有直接关系外，无疑还有一种求福保佑自己和亲人一路平安的含义。在波斯王泽克西斯一世亲征希腊的军队中，有一辆由八匹白色圣马拉的神圣战车，战车手徒步跟着牵引白马，任何世人都不能乘坐⑦。李维《罗马史》也提到"乘着白马拉的车子进城，人们认为这即使对一个凡人都是不合适的，更不用说对一个罗马公民了。他们看到独裁官吏自己的车马行列与朱庇特神和索尔神相媲美，从宗教上感到吃惊"。这显然是为祈求神灵保佑战争胜利而设置的。正像费尔巴哈所指出的：

① ［苏］奥克拉德尼科夫等：《德勒格尔—穆连和特斯河谷的岩画》。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31页。
③ （西晋）左思：《蜀都赋》："车马雷骇，轰轰阗阗。"
④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第227页，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
⑤ ［罗马］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75页，马雍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
⑥ 盖山林：《内蒙阴山山脉狼山地区岩画》，《文物》1980年第6期。
⑦ ［希］希罗多德：《历史》，第651页。

“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人来说就是神。”①

车子之所以被神化，被描绘成仅有神才能使用的乘具，还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统治阶级才能享用豪华舒适的车马。在中国，“车驾”竟成为皇帝的代称②。甚至死后也将车马看成是灵魂的庇护者和保卫者。我国古代（特别是商周）用车马随葬的风气延续甚久，有的多达几十辆，御者也被奴隶主作为殉葬品埋进车马坑，豪华的车具和奴隶的斑斑白骨，往往在发掘中触目惊心的同时显露出来。

在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用车随葬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前苏联高加索地区曾发现公元前18世纪的畜牧部落首领的墓葬，死者骨灰就放置在笨重的四轮木车上③。在南俄草原青铜时代期墓中，不仅有双轮陶车的模型，而且还发现一种不同寻常的埋葬习俗：墓穴的四角各放置一个四轮车的轮子，车轮用一块整木做成，没有辐条，显然是专为殉葬而特制的；有的墓中放入三辆拆散的两轮车④。希罗多德也给我们留下了斯基泰王死后殉葬车马的奇怪习俗：斯基泰王死去一年之后，选出50名最可靠的亲信，并将其绞死；同时，杀50匹好马，将其内脏掏出洗净，肚子里装满谷壳再缝合。然后将木桩两个一对钉入地里，在上面放置车轮的半个轮缘，另外半个轮缘放到另一对木桩上。再用大木棍从马的尾部横穿到颈部，然后把木棍架到车轮上，结果是前面的车轮支着马的肩部，后面的车轮支着马的腹部，使马的四条腿在空中悬着。并配置马衔和缰绳。最后把50名被杀侍臣分别安置到50匹马上⑤。这大概是祈求升天国之后，也能驾马出征，威服四方吧。通过对殉葬车马的研究，可以对奴隶社会的一个侧面有深刻的认识。

本文力图避免对制车技术进行烦琐考证，而是努力从人类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对古代车辆的历史地位做一宏观的考察，勾画出早期车辆演变的大致轮廓，并着重阐述古代车辆在东西方文明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古代，战车是壮美的化身、是国威的象征。今天，车辆的多少也是一个国家文明发达程度的标志。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车辆的重要作用更是自不待言的。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438–439、541页。

② 《汉书·商帝纪》：“是日车驾西都长安。”颜师古注：“凡言车驾者，谓天子乘车而行，不敢指斥也。”

③ ［苏］蒙盖特：《苏联考古学》，第96页。

④ ［苏］蒙盖特：《苏联考古学》，第108页。

⑤ ［希］希罗多德：《历史》，第459页。

浅谈海洋考古学

自古以来，海洋就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交通运输资源。人类的历史始终与海洋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随着考古学和海洋科学的不断发展，海洋考古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系统的研究学科，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注视。我国有着广阔的海域和漫长的海岸线，海洋考古学对于我国古代历史，特别是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海洋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及其发展、现状等有关问题做一些简要的介绍，希望对考古学和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有所借鉴和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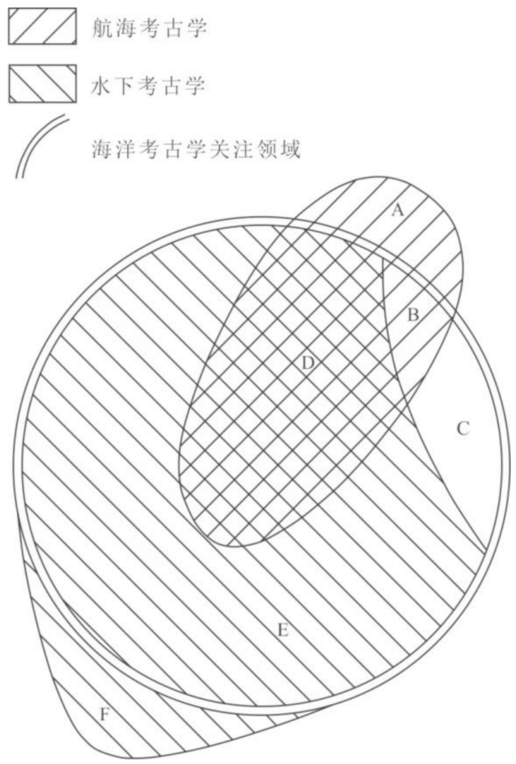
什么是海洋考古学

海洋考古学（Maritime Archaeology）是研究人类在历史上各种海洋活动中所留下的遗迹、遗物的学科，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海洋考古工作者主要通过发掘来发现和整理残存的记录各种人类海洋活动历史事件的材料，并据以研究海洋历史上政治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阐明人类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及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海洋考古学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搜寻者经常能够见到的船舶、货物、构件或仪器，也不是简单地研究器物型制本身，而是着眼于人类制造和使用这些工具的活动以及在海洋这个广阔舞台上一切有关的物质遗存。整个海洋文化史，包括海交史、航海史、海运史、造船史、海港史、海军史、渔业史以及有关的运河史和内河史。海洋考古学的主要任务即是为海洋文化史及各领域的研究提供确实可靠的实物资料，以其本身的形象再现当时的历史。海洋考古学的材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材料，其作用一则可以纠正文献资料的错误，二则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缺漏，三则可以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

当然，海洋考古学不仅仅是实物史科学，它也有着自己研究的独立性和系统性。以下具体谈一下海洋考古学和其他相近似学科的关系以及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课题。海洋考古学与船舶考古学（nautical archaeology，另译航海考古学）及水下考古学（Archaeology underwater）有着密切的重叠交错关系。船舶考古学是对古代各种船舶及其他辅助设施的专门研究，是海洋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但船舶考古学的有些研究可能与海洋毫无关系，如我国西南、华南发现的船棺葬。内河船舶研究似亦不在海洋考古之列。水下考古学的外延则超出了海洋考古学的范围，海洋考古学只是水下考古的

一部分。水下的遗址有的与海洋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海洋考古学却包括不在水中，但与古代航海有关的遗址，如荷兰新填筑低地的“沉船墓地”，这是北欧航海与造船历史的珍贵材料。还有的港口遗址因海岸变迁已不在水中，但也同样反映了古代的航海活动，因此也是海洋考古工作者所密切注意的对象。



海洋考古是一项费用昂贵而且极为艰苦和冒险的工作。据估计，海底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费用较之相应的陆上遗址的考古研发费用高出8～32倍，潜水考古工作者遇到的困难更是不可预测的。首先，水下自然光线昏暗，能见度较差，工作照明设备经常受到环境的影响。水中折射现象也严重妨碍了考古人员的观察。其次，如果不穿带有“中心加热器”的潜水服，水中低温对人体的侵袭会使工作时间受到局限。再次，随着潜水深度的不断加深，深水氮气麻醉会使潜水员动作失调，失去正常工作能力，进而危害潜水员的安全。因此，水下考古工作者必须经过严格的专门训练，必须装备供气、御寒设备，必须遵守水下工作的一整套规则。

水下考古与陆地考古的田野发掘一样，首先需要确定遗址。虽然水下遗址的发现通常是很偶然的，但慎重和全面地探查也必不可少，海洋考古工作者需要参考有关沉船的文献记载和有关海底环境的各种技术资料。水下考古工作由于受视觉、潜水时间和气候等条件的限制，因而比陆地更为紧凑和集中。国外海洋考古已广泛应用了各种现代化仪器，如磁强仪，可以准确地发现含有金属残骸的沉船位置。然而对于各种仪器发现的考古遗存的确切描述、辨别和评价则要依靠熟练的潜水考古

工作者。

海底考古发掘和陆地田野发掘一样，先将遗址分成若干部分，这样才能详细地记录每一件器物的位置。可以用耐压照相机拍下遗址的照片，往往一个遗址的全图由几十张甚至上百张照片拼成。闭路电视系统将水下工作情况报告给水面指挥部，潜水考古工作者则可通过“水下电话间”相互联系或与水面通话，以便随时进行监督和指导。如果木船陷入淤泥之中，就要先用大型弯曲吸力管将过多的淤泥排掉。各种易碎器物用钢丝筐或沙箱运到水面。此外，一些国家还使用潜水艇进行考古调查。

沉船遗址是海洋考古的重要目标。对于沉船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不仅先要对海底环境做全面的观察与描述，还要对遗址的保存和分布情况做认真的分析研究，这样才能确定发掘区域和发掘重点。不少沉船中拥有种类繁多、数量惊人的遗物，也需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除锈或用冷却法弄干。复原各种器物更是一种单调而枯燥的工作，但考古工作者对普通的遗物，不论贵贱，都有极大的兴趣，因为这一切都可能提供准确的断代标准，都可能成为研究历史不可取代的见证。

近年来，随着海底沉船的不断发现，为研究古代船体的造型、结构、工艺、用料等方面都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使古代造船和航海技术史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意义，不仅填补了整个航海史和造船史的一些空白，也打破了许多旧的认识界限，开辟了新的探索领域。海洋考古还有助于研究古代的海上贸易，目前有关地中海古典时代贸易的许多情况已为人们所知。成千上万个塞着软木塞、用火山灰密封的安佛拉罐（即一种双耳尖底罐），带着货主姓名的蜡封印，成为研究希腊和罗马时代葡萄酒和橄榄油的第一手资料。

海洋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不仅是沉船遗址，还有与之相联系的锚地、港口和码头，这些都是研究人类海洋活动的组成部分。法国耶稣会士安德列・普瓦德巴（Antoine Poidebard）在30年代就广泛调查了地中海东岸的古代港口遗址。特别在推罗和西顿，他依据航空摄影和潜水员的报告，绘制了分布在沿岸几十千米的古遗址分布图，为了解早期该地区港湾的布局和结构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但他的报告缺乏准确断代的证据。最近，科学家们提出一种可能的断代方法，有一种Vermutus腹足纲软体动物，只能生存于一定的深度，可以提供历史上海平面变化的证据。根据分析与这种蠕虫共存的器物，并进行碳–14测定，基本就可以确定港湾建造的年代。

通过锚和锚地的调查，也可以研究古代的航海贸易情况。英国女海洋考古学家弗罗斯特小姐（H.Frost）经过多年的收集，已能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锚加以类型学的排列对比，结合其他资料的研究，对不同时期、不同航路及不同民族的相互往来提出新的结论。世界许多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使用石锚，但是有关石锚的断代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目前人们通过在陆地上发现的已可断代的石锚并结合地层和其他器物考订出大致的年代，然后利用这些资料进一步完善海底发现石锚的系列及年代学关系。这种类型学的排比不能离开对水下环境的分析。然而目前潜水者的盲目

打捞，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种研究。

深水考古是近代来海洋考古学的新领域。所谓深水，一般指超过50米的深度。在这个范围进行考古调查或发掘，要求潜水员掌握非常专业和严格的技术，另外还有必要使用潜水艇或遥控装置。据深水考古学家巴斯科姆（W.Bascom）统计，约有20%的沉船遗址都在远离海岸的深水海底。他认为深水中较低的温度可以防止各种化学腐蚀。深水沉积的相对稳定也减少了沿海许多沉船遭到损坏的可能性。此外，许多有害的生物如船蛆等不能在深水中繁殖，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沉船和其他遗物。目前深水考古尚处在实验阶段，巴斯科姆为此设计有船舷扫描探测器以及遥控机械手装置等，后者不仅可以从船底降到海床捞取遗址上的器物，甚至可以将整个船从海底打捞上来。深水考古的发展当然也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其一是开支极大，在地中海底的考古费用大约为沿岸调查的20~50倍。现在只能与海底石油和矿产的勘查开发配合进行。另外，在公海进行考古调查还会牵涉国防和法律争端。因此，深水考古在目前发展缓慢。

海洋考古学的发展

据估计，过去每29小时就有一艘船葬身大海，目前全世界海底至少有100万艘以上的船舶，因此海洋考古学有着极大的发展潜力。

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人类很早就将目光投入这个诱人的奇妙世界，并留下一行行艰难的脚印。公元11世纪，英国圣·阿勒斑斯的僧侣因寻找修缮修道院的石料，在附近罗马时代的古城废墟里发现了许多橡木船构件，上面钉有铁钉，涂抹着船用沥青，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几个世纪以后，1446年，建筑师阿尔伯特（Leon Battista Alberti）开始试图到意大利的内米湖打捞罗马时代的船只。1535年，费兰彻斯科·德马基（F. Demarchi）又继续在这里用极为简陋的设备打捞沉船，这可能是潜水捞船的最早记录。1832年，出版了现代地质学开创者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名著《地质学原理》，这是第一部系统阐述海洋中人类物质遗存的科学著作，他提出海底长期堆积起来的人类历史遗存，比欧洲大陆上任何时代存在的还要多。

海洋考古学的研究开始于陆地发现的船只。1863年，在斯堪的那维亚发现了许多中世纪早期的船只，但海下考古则一直到20世纪初期才开始。苏格兰牧师布兰德尔（Odo Blundell）在佛特奥士斯湖潜到水底，认真观察了湖上住宅及人工岛的建筑情况，并绘制了一张草图。虽然这还不能算是海洋考古，但毕竟是水下考古的有益尝试。

真正的海洋考古学的摇篮是位于欧非之间的地中海。1900年，潜水员在希腊半岛的安提基希拉附近6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艘沉船及许多大理石和青铜造像。希腊政府组织了专门发掘。几年以后，突尼斯也发现了同样的沉船。这些考古发现使本世纪初期的考古学家对水下遗址产生了广泛

的兴趣。考古学家雷那克（Salomon Reinach）即断言："全世界古物最丰富的博物馆仍是难以接近的，我指的是地中海的海底。"

但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地中海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发展不快。值得提及的是意大利内米湖的发现。考古学家排干了湖水，揭露并复原了一艘罗马时代的豪华船只。这项工程不仅创建了一个独特的博物馆，还为研究罗马时代船体结构提供了最新的详细情况。1934年，法国的普瓦德巴最早将航空摄影和水下摄影运用于考古调查与研究。

1944年，潜水员用经过改革的自动压缩空气器（即水肺）在地中海下潜至64 m，为潜水运动和海洋考古开辟了令人振奋的新天地。法国海军库斯特（Jacques-Yves Cousteau）首次系统调查并发掘了马赛大康格岛附近的古船遗址，最早证明了使用自动空气器进行海底考古发掘的可能性。法国海军潜水学校校长菲利普·泰勒（Philippe Taillez）也曾多次组织海底发掘，并意识到在海洋考古学中方法和技巧的重要性。

此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一支水下考古队，如异军突起，活跃在土耳其沿海，在30米深的海底进行正规的考古发掘。1960年，乔治·弗·巴斯教授（G. F. Bass）亲自带领学生以希腊古城哈利加纳特（今博德鲁姆）为基地，在土耳其海底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发掘，不仅为研究东地中海青铜器时代的贸易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在考古方法论上，提出了完整的理论和方法，至今仍为各国海洋考古者所遵循。

海洋考古学已不再限于地中海了。例如，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港发掘了1628年建造的"瓦莎"号军舰（Wasa）。为了复原军舰的装饰物及其他从船上失落的装置，考古学家又在遗址周围进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海底发掘。荷兰也系统地发掘了沿海新填筑低地的公元12—19世纪的船只。1965—1967年，由大英博物馆主持发掘了在1939年夏天英国人萨顿发现的一座巨大的船棺基，引起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注目。考古学家不仅从中发掘到价值25万英镑的金银珠宝，还得到一艘完整的公元6世纪的海船。1970年，在肯特郡也发现了一艘公元9世纪的沉船。英国国立海洋博物馆（格林威治）主持了这次发掘，并对西北欧的古代船舶进行了有计划的系统研究。

近20年来，英国海洋考古学发展速度较快。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60年代英国出版的海洋考古专著有10种，20世纪70年代即增至20余种。1964年，英国船舶考古学会成立，该学会编辑出版的《国际船舶考古与水下探险杂志》，篇幅较大，内容丰富，水平也比较高。一些相应的潜水俱乐部开始增加，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工作者亲自参加潜水活动。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不少海洋考古的新发现是系统调查的结果。在索伦特发现的"玛丽·罗丝"号（Mary Rose）遗址就是突出的成就。1967—1971年开始发掘和打捞。曾经攻读过考古专业的英国王储查尔斯亲自担任基金会主席。他们共发掘采集到沉船残骸中的13,000多件文物，大多是都铎王朝（1485—1603年）的稀世珍品。1982年在英国被称作"航海遗产年"，以"玛丽·罗丝"号打捞出水达到了高峰。

随着人们对从海洋探索历史认识的加深，海洋考古学这一新的学科逐渐成长起来。1973年，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成立了英国第一个海洋考古研究所。同时，海洋考古学发展所提出的一些特别问题也开始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英国政府正式颁布了“沉船遗址保护法”。

除欧洲之外，海洋考古学在北美也有较快的发展。美国许多沿海的州对水下遗址进行了控制，有的州还成立了水下考古组织来监督水下调查与发掘，这些组织的系统研究和发掘具有很高的水平。1973年，美国航海考古研究所成立，其领导人为乔治·弗·巴斯教授。这个科学机构的宗旨是搜集、了解人类过去在海上活动遗迹的有关资料和知识，并通过宣传手段，举办训练班和讲座等形式对此加以传播。在加拿大，国家也鼓励专业和业余考古工作者进行系统的调查与发掘。

关于世界其他地区海洋考古活动的报道较少。以色列考古工作者已开始对地中海和红海的古代沉船进行研究，特别是在沙姆沙伊赫地区做了不少工作。在肯尼亚蒙巴萨附近的海底，国际联合考察队于1977年对一艘17世纪的葡萄牙沉船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日本近年翻译出版了乔治·巴斯的《水下考古学》（冰口志计夫译，学生社）。还翻译了W·威尔克斯的《水中考古学概说》（本庄隆译，学生社）等，日本还比较注意广泛搜罗、征集和发掘有关人类海洋活动历史的传统工具和其他文物，与此有关的博物馆也较多（见下表）。泰国在梭桃邑附近发现许多沉船遗址，有不少人认为东南亚地区今后海洋考古的前景是相当可观的。澳大利亚从1971年起也吸引了不少海洋考古工作者。澳大利亚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法律，以保护水下遗址。国家海洋博物馆有专门机构，主要负责调查和发掘西澳大利亚海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遗址。

日本与海洋考古有关的博物馆一览表

名称	所在地	主要展出品
仁别森林博物馆	秋田市	独木舟
余市水产博物馆	北海道余市郡	船、船具
昭和街历史民俗资料馆	秋田县	渔捞用具
鲸博物馆	宫城县	捕鲸资料
海洋博物馆	乌羽市	渔捞用具
富津海洋资料馆	千叶县富津市	渔捞用具
江户川区乡土资料室	东京都江户区	渔捞用具
知多市民俗资料馆	爱知县知多市	渔捞用具
交通博物馆	千代田区	船舶等
交通科学馆	大阪市港区	陆、海、空交通工具
船舶科学馆	东京都江东区	海运、造船、海事
神户国际港湾博物馆	神户市	神户港史、内外港湾资料

综上所述，海洋考古的发展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时间短，发展快，与考古学其他分支相比，海洋考古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20世纪40年代发明水肺以后，海洋考古学才进入迅速发展的阶段。而真正将这门学科脱离单纯的沉船打捞或猎取珍宝，建立潜水考古的一整套体系，则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但由于整个海洋科学的飞速发展，加之许多国家、企业及个人都提供了大量资助，海洋考古学也进展较快。其二，发展不平衡。海洋考古学起源于地中海，这个地区的考古研究相当充分，但其他地区的工作则相形失色，大多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三，海洋考古工作者的背景比较复杂。由于这是一门边缘性学科，势必吸引不少不同目的、不同职业、不同爱好的科学家从事这种集体性的工作，例如像潜水人员、商业打捞人员和正规的考古工作者。从学科的特殊性质来看，这一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但非考古性质的滥挖古物风气，近年在世界各地有所扩大，引起了不少考古工作者的焦虑。现在，世界各国考古学者要求保护海底文化资财的呼声愈来愈高，有关保护海底文化遗产的国际法律提案已提交世界海洋法会议。可以相信，经过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今后的海洋考古学将会有更多的新发现，为海洋文化史的研究增添新的篇章。

中国的海洋考古

我国的海外交通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解放以来，除发现许多陶制、木制的船只模型和石刻、绘画上的图形之外，在天津静海、河北磁县、山东梁山和平度、江苏武进和扬州等地相继发现不少古船遗址。浙江宁波东门口还发现了宋元海运码头遗址三座、修船工场遗址和一艘外海船。1975年在广州市发掘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也引起了我国古代造船工程史专家们的热烈讨论。特别是1974年在泉州市后渚港海滩两米多深的海泥中发掘的13世纪的海船，文物出土相当丰富。在船舱中发现了从海外运来的大量香料木和药材，还有航行人员日常生活所用的陶瓷器、竹木藤器及宋钱币五百枚。这一重大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极大反响。1979年，召开了全国性的古船学术讨论会，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多学科的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对研究我国海外交通史、造船史、航海史以及泉州湾的地理变迁等，都提供了极好的实物例证，也为我国考古工作从陆地—海湾—海洋做出了积极的尝试。1982年5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又联合试掘了泉州法石的另一条宋代海船。这些发现和泉州、广州、宁波、扬州等古代对外贸易港口的重点研究相映生辉，都为今后开展全面的海洋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亚洲地区的海洋考古学还比较落后，有许多历史空白犹待填补。不少西方的海洋考古学专著，对于亚洲部分所知甚少，可以说基本谈不出其历史发展的轮廓。我国具有悠久的古代文明，这样的重担理所当然地落在我们肩上。在我国浩瀚的古籍当中，虽然有大量的海交史方面的史料，但这些记载由于种种原因往往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研究海外交通史，必须重视

陆地和水中的考古实物资料，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调查、探索，有目的地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这就需要广大考古工作者与海交史研究者的相互协作和配合。现在不少同志建议，在有关部门的倡议领导下，建立全国海洋考古领导机构，确定统一的调查、打捞、发掘和研究计划及其实施方案，并成立海洋考古研究所，与交通运输部及海军现有航道、测量、救捞部门互相配合，共同进行海底遗址的研究和保护工作，重视对现存传统木帆船及其他航海文物的抢救，加强同国外海洋考古学界的联系和交流。从我国考古学和海交史研究的现状来看，逐步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海洋考古学体系已是势在必行。我们在此再次提出以上呼吁和建议，使这门新兴的学科能够为整个历史研究，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海交史研究》1984年第6期）

论殷代战车源自西方说

战车是殷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殷代战车的渊源问题一直是国外传播论派和独立演化论派长期争论的焦点。美国汉学家傅路德（L.Carrington Goodrich）指出，西亚的马拉战车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而六七个世纪以后，马拉战车似乎是很突然地出现在中国，看不出其渊源如何①。英国《剑桥考古百科全书》写道：中国殷代文明“除了马拉战车以外，没有证据说明有来自西方的重要影响”②。言外之意，殷代战车的发明似乎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麦克奈尔（W. N. Mcneil1）在他著名的《世界史》一书中，认为战车最初发明于伊朗或阿塞拜疆地区。并于公元前1700年—前1400年传向各地，遥远的中国也是如此，“西方战车御车夫的到来可能导致了商朝的建立”③。日本林巳奈夫在《中国先秦时代的马车》一文中说得更为明确：“中国殷代出现的有一根车辕的马车，与近东的马车在构造、套马方法、驾驭方法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不能不说，拥有马车的极少数人们费尽艰辛，驾着他们自己的马车从遥远的近东地区来到中国，以这种方式将马车传入中国，并在中国被仿制出来。”④就连前苏联极力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学者克留诃夫（M.B.KpюkoB）也主张“可能殷人还从北方草原部落那里借用了马车，它的早期形式根本不见于龙山新石器时代”⑤。可以看出，殷代战车西来说在国外史学界有相当的影响⑥。

我们赞同这样的解释，在相互隔离的各种文化中，尤其是在最初阶段，有着不少并行的相似发展。中国殷代战车虽然在年代上与西方战车相差很长一段时间，其间或许存在许多传播的机会，但是迄今毫无史料证明。相反，从我国古代的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连续性来看，殷代战车更可能是我国劳动人民自己独立发明创造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战车是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它在更大的意义上说明，中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走了一条共同的道路。

---

① ［美］傅路德：《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最初接触》第5、7页，堪培拉，1962年。

② ［英］谢拉特等编：《剑桥考古百科全书》第169页，剑桥，1980年。

③ ［美］麦克奈尔：《世界史》第49–50页，牛津，1979年。

④ ［日］林巳奈夫：《中国先秦时代的马车》，载《东方学报》第39册，第280页。

⑤ 刘克甫：《东亚古文化的起源》，载《亚洲人民》1964年第6期，第85–86页。

⑥ ［日］加茂仪一：《世界文化史》第1卷，第89–90页，东京，昭和三十年；［日］西村真次：《文化移动论》第五章《为文化陆线移动媒介的马车》，第193页，商务印书馆译本；［苏］瓦西里耶夫：《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前苏联《历史问题》1974年12月。

殷代的战车

为了更好地探讨殷代战车与西方战车的关系，首先让我们对殷代战车的出土情况和形制特点做一些简略考察。目前国内发现年代最早的古车地点是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抗日战争以前进行的殷墟第12、13次发掘，共发现战车30余辆。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在殷墟大司空、孝民屯等地清理了三座较大的车马坑①，特别是1972年发掘清理的一座车马坑，尽管车子的木质结构已全部腐朽，但仍可以根据残存的痕迹剥剔出车子的形状，测量其各部分的尺寸②。从殷墟发掘的战车实物来看，殷代战车结构已经定型，并已有了我国魏晋以前古车结构的基本轮廓。

殷代战车的形制为双轮、双轭、独辀，两匹或四匹马套驾，马以颈部承轭，轭系在衡上衡装在辀前端。在辀与轴的十字交叉部置舆，多作长方形（也有半圆形或簸箕形），面积一般为0.75米×1.3米，武士在其上应是立乘。车箱虽小，而车轮却相当大，轮径约1.22～1.44 m，辐数较少。总的来说，殷代战车车体轻小，轮高马大，所以车速可能比较快。为了加强车辆的坚固性，车上某些关键部位如踵、辖、较、轭等均装配铜构件。此外，还出现了用于装饰的铜睽、铜钖等物。这两类铜车马具，大部分为周代所承袭。

殷代战车不仅有实物出土，甲骨文和金文中也有丰富的材料可以相互佐证。卜辞中“车”的写法很多，从孙海波《甲骨文编》收录的车字来看，都是一衡、双轭、四马套挽的结构，与殷代出土的战车若合符契。容庚《金文编》共收“车”字22个，字形各异，但其形制与出土殷车大体相仿，其他诸如战车甲士的三人编制也大多沿袭殷制。

然而，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战车的创造需要建立在长期社会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由某个人凭空发明出来。就已发现的史料而言，在殷代之前，还应当有一个从雏形发展起来的过渡阶段。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足以直接说明这一情况的考古材料。这种现象应当如何解释呢?

殷代战车与西方战车

东西方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现象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有不谋而合的创造，也有文化传播的影响；有些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必然出现的共同文化特征，而另一些则是作为不同民族接触和交流的结果而形成的传播特征。在此，我们通过分析古代东西方的联系通道上的考古发现以及东西方

① 马得志：《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第25–40页；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孝民屯的两座车马坑》，载《考古》1977年第1期。

② 安阳工作队：《安阳新发现的殷代车马坑》，载《考古》1972年第4期。

战车的具体异同，对殷代战车与西方战车的关系问题谈一点儿自己的看法。

麦克奈尔、赫斯特（James J.Hester）等西方学者在谈到殷代战车的渊源时都曾指出，西方战车传入中国的路线是从近东的两河流域，穿过中亚，经过蒙古或新疆地区，到达黄河中游的殷墟安阳的[①]，但实际上，如果对这一通道附近发现的战车岩画和考古实物作一考察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禁不起推敲的。

目前所知，前苏联与蒙古交界的阿尔泰山区发现早期车辆岩画最多，大约有数十幅。阿尔泰山区还有一些分割成若干扇形的车轮，圆形和人形，从结构上看也有点像双轮马车[②]。前苏联考古学家如杰普洛乌霍夫、格里亚兹洛夫、吉谢列夫和科林等都认为这些战车的年代为青铜时代，最有可能是青铜时代中期，即相当于叶尼塞河及鄂毕河上游的卡拉索克文化时期，其下限大约为公元前8世纪，比中原殷代车马坑的年代要晚[③]。早的文化不能是受比它晚的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从结构上看，阿尔泰山上的战车岩画上不少是两匹、三匹、四匹马套驾的双轮或四轮马车（中原殷代战车无三匹马套驾的四轮车）。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2号墓还出土了一辆四匹马驾辕的战车实物，其年代为公元前5—前4世纪，而且数百件零件完全用木榫和皮带连接，不用金属（殷代战车在关键部位多采用青铜构件）[④]。前苏联卡尔木克草原（Kalmuc）发现的战车泥模型虽在年代上与殷车同时，但其车箱、轭与殷车完全不同[⑤]。如果说这些岩画和考古实物是证明青铜时代东亚中国与西方交往必不可少的环节的话，那么至少在车辆起源问题上，它恰好说明中国殷代战车的渊源不应到西方去寻找。

近年来，在我国内蒙古阴山山脉西端的狼山地区，如磴口县的阿贵沟和托林沟，发现许多处古代车辆岩画。有人认为这种车子的形制结构颇与安阳殷墟车马坑出土的战车相近，并提出这种车子可能就是《汉书·扬雄传》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轒輼，匈奴车也”[⑥]。对此，我们提出几点不同意见。

（1）“轒輼”不是匈奴车的专称，更不是阴山岩画上的这种两轮车形。“轒輼”一词最早出自《孙子·谋攻》，是指一种用于攻战的四轮战车。战国时兵书《六韬》说：“攻城围邑，则有轒輼、临冲。”梁陈间顾野王的《玉篇》也说：“轒輐，兵车也。”所以应劭认为“轒輐”是匈奴车的专称实在有些误解，这种四轮车与阴山岩画上的两轮车也完全不是一种类型。

① ［英］赫斯特：《考古学导论》，第268–270页，伦敦，1976年；麦克奈尔：上揭书，第51页。

② ［苏］奥克拉德尼科夫等：《德勒格尔—穆连和斯河谷的岩画》，载《蒙古考古与民族学》，第159–198页，诺沃西比尔斯克，1978年。

③ ［苏］科仁：《戈壁的双轮马车》，载《苏联考古学》1968年第8期。

④ ［苏］蒙盖特：《苏联考古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料室译本），第141页，北京，1963年。

⑤ ［英］辛格：《技术史》第1卷，第515页，牛津，1979年。

⑥ 盖山林：《举世罕见的珍贵古代民族文物》，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2）阴山岩画的战车与殷墟战车形制是否相似，也是殊为可疑的。特别是岩画上的战车没有殷代战车辕前的横木（衡），不知如何置轭，系驾方式更无法比较，这样何以谈得上“相近”呢？而且即使岩画车形与殷代车形有些相近，也无法推导出“其年代也应相近”的结论。

（3）现在所知这一地区最早的车辆实物是在玉隆太、速机沟的战国时代墓葬中发现的青铜车马具。据日本考古学家秋山进午研究，这种符合北方民族的爱好而制造的马车，“很可能是从中原带过来的”①。因此，从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发现目前也找不出西方战车东传的任何迹象。

从地理环境看，连接中国与西亚、中亚的中间地带，错落地分布着高山、巨川、沙漠和绿洲。这种凸凹不平、迤逦相属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这里不可能以车辆为主要的陆路交通工具。车轮只有在平整坚硬的路面上才能通过滚动摩擦提高能量转化。而连接中国与西亚、中亚的地区显然不具备这一自然条件，在无法投入大批建筑和维修车路的人力物力的古代，途中无数的垂直障碍（沟堑山崖）和空间障碍（石块、沙碛）都为车轮行进造成了无法克服的阻力。因此，在西北和北方草原的中西交通路线上，车辆不可能充当主要的交通工具。很难想象有少数人“驾着他们自己的马车从遥远的近东地区来到中国”，并充当传播制车技术的中介。

“殷代战车西来说”的主要依据是认为殷代战车与近东战车在构造、套马方法、驾驭方式上都完全相同。诚然，世界各地的早期车辆都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必须看到，中国殷代战车与西方战车存在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往往是带有本质性的。

首先，中国与西方战车的系驾方法就显著不同。西方战车采用颈式系驾法，即将马颈用颈带直接缚在车衡上，衡连着独辀，马驾车时，以颈负衡曳轫而前。一直到9世纪，法兰克人发明了利用驮马的方法，才开始使用一种硬性颈圈，套在马的肩胛骨上，这样马就可以全力牵引而不至于产生不舒适的感觉②。而在中国，从西周早期车马坑的发掘来看，就已发明了在马胸与车轴之间联一条与前进方向一致的平行线，即以约马胸的靷（当胸）来拉车。这种胸式系驾法不压迫马的气管和颈动脉，使马力能够得到较充分的发挥。殷代战车虽然可能没有周车这样完备，但从出土资料来看，却毫无疑问是周车的祖型，殷车的基本结构与系驾方式与周车应当是一致的。这与西方的颈式系驾法体系各殊，全然不同③。

其次，殷代战车与西方战车的轮距有较大的差别。西方战车的轮距通常为3.6呎至3.9呎（约103.9厘米），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到公元前5世纪欧洲铁器时代初期文化（Hallstudt）都是这样。直到La Tene文化时，轮距才改为10.85呎（约138.42厘米）④。而中国殷代晚期孝民屯南地和大

① ［日］秋山进午：《内蒙古高原的匈奴墓葬》，载《富山大学人文部纪要》1981年第4册。

② 欧文：《生活科学文库》，各页，阿姆斯特丹，1975年。

③ 孙机：《从胸式系驾法到鞍套式系驾法》，载《考古》1980年第5期，第448页。

④ ［英］赫斯特：《考古学导论》，第267–270页。

司空村发现的车轮轮距都超过了200厘米（分别为215厘米，217厘米，240厘米）。西周时期战车的轮距更大，陕西、北京、山东出土的马车轮距分别为225厘米，244厘米，224厘米，直到春秋以后，轮距才明显变狭①。这反映了东西方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工艺传统。

再次，殷代战车与西方战车车轮的形制和大小也相差很多，现列表如下②。

遗址	年代（公元前）	直径（单位：m）	
		前轮	后轮
基什（伊朗）	2750	0.50	0.50
乌尔（伊拉克）	2500	0.60	0.80
苏萨（伊朗西部）	2500	1.00 0.66	1.00 0.83
特立阿雷特（格鲁吉亚）	2000 1500	1.05 1.15	1.15
耶里斯塔（南俄草原）	1200（？）	0.70	?
梅库拉哥（意大利北部）	1000	0.70	?
安阳“殷墟”（中国）	约 1195—1098	1.33~1.44	
安阳“殷墟”（中国）	约 1195—1098	1.46	
安阳“殷墟”（中国）	约 1195—1098	1.22	

可以看出，中西古代战车的差别是很大的，很难把中国古车说成是西方战车的仿制品。中国殷代战车与西方的战车似应属于共同发展的两个系统，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战国以来有东西方相互影响的确凿证据。

殷代战车的社会背景

大约至公元前1千纪，当西亚、北非、南欧东部古代文明地区连成一片时，遥远的东亚只有黄河、长江流域发展了商文化。正如李约瑟所指出的：“中国的位置是独特的，这使它同古代各种河谷文化隔绝开来。肥沃的新月地带和西边的埃及相距不远，和东边的印度河谷文化也比较近，而黄河流域的文化却在它遥远的东北方，中间隔着喜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的巨大障壁。”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远古，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将殷人的活动限制在亚洲东部的封闭环带。“殷代战车西传”作为一种如此远距离的技术流动，是不可想象的。在缺乏物质基础，没有出现必要的社会需求的情

① 杨泓：《战车与车战》，载《文物》1977年第5期，第90页。

② ［英］辛格：《技术史》，第515页。

况下，人们也不能凭道听途说制造出结构复杂的战车。中国古代有名的工艺技术专著《考工记》总结了殷商以来制车的经验和传统，其中特别指出："一器而聚工焉者，车为多"。这说明制车业需要比较复杂的手工业技术和经验，是科学技术的综合利用和集中体现。我们认为，殷代战车的出现不仅有着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并且还已具备了必要的科学技术条件；既有文献资料的依据，也符合科学技术史发展的规律。

第一，殷代除王之外，邦内外的统治者可分为三类：一是邦境内的"多伯"与"多君"，二是邦边上的"侯甸"与"多甸"，三是邦境上的"邦伯"。这些侯、伯对于王国的义务是：贡纳其农作物，代王征伐多方，入龟于王以供占卜之用，来其牛马等畜，"载王事"。凡此五种，都离不开车辆这种交通运输工具。同时，掌握大量战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商初，成汤就以战车的威势征服了夏朝。据卜辞记载，武丁、帝乙、帝辛时，一次出征就能征集3,000～5,000人，杀伐敌人也多达2,000多人，作战地区到达淮水以南，往返10个月之久。这没有驾乘修备的战车和辎重车辆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田猎在许多民族的早期历史上都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罗振玉的《增订殷墟书契考释》里，有关生活的4种卜辞中，占第一位的便是下田（卜田猎），推想商代初期，此风或许更盛。规模宏大的狩猎活动不仅带有军事演习和娱乐的成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实际情况。狩猎需要围追阻截和运载猎物，在当时不习骑术的情况下，车辆自然成为重要的代步和运载工具。如在武丁卜辞中记载，王狩猎亲率田车，往来追逐，可以看出"车攻"的具体情形：

> 甲午，王往逐兕，小臣甾车，马硪，驭王车，子央亦坠。
>
> 丁卯，王兽潡，祝车马，祝比才车，草马亦（比）。

第三，《尚书·酒诰》称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在周初人的眼中，牵牛驾车进行商业活动始盛于殷商。也许正因如此，后人称经营商业者为"商人"。商代青铜冶铸业高度发达，其所需矿石及其他原料也往往来自远方。这些都必须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表明商代已产生了发明车子的社会经济需要。

第四，发达的畜牧业和成熟的驯养技术，是商代军队得以驱车鏖战的重要保证。殷代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畜牧业也更加昌盛起来。现在被称为家畜的动物，如牛、羊、马、猪、犬等遗骸，在郑州早商遗址中都可见到。一些专门负责驯养的官员也已出现，如"小多马芍臣"即管理这方面事务，后代司马之官或即渊于此名。

第五，在商，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在初步判断为夏文化的各地遗址中尚未发现过车。但车的发明，应以轮转工具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其先决条件。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的纺轮、陶轮，特别是琢玉用的轮形工具，在技术发展史上，都应属于车轮的直接或间接的前驱。此后又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人们对轮转工具性能的认识逐渐深化，装置逐渐改善，效率逐渐提高。因此，战车作为轮转工具较高发展阶段的产物在殷代出现，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至于其他手工业的发展，远在相当于夏王朝时期的二里头文化中，不仅有青铜武器和礼器出土，还发现了各种青铜工具，如刀、钻、锥、凿、锛等。到商代前期，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已完全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手工业作坊有了一定的布局，直接为交换而服务的商品生产也开始发展。《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初曾俘虏了许多以职业为生的商朝手工业者及其奴隶，他们世代从事专门的劳动，如御（舆）、僕、车徒，都是世代以御车为业，具有娴熟的射御之技。这一切都表明，汲取新石器时代制造轮转工具的经验，适应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发展的需要，在发达的畜牧业和成熟的手工业技术基础上，晚商出现成熟的战车是顺理成章的。

第六，正如研究许多其他历史问题一样，目前在殷代战车渊源的探索中，考古发现还不能提供直接的资料，所以应该参考大量文献史料。根据已发现的实物和岩画，世界上最古老的车轮是由圆形木盘拼合而成的，连接在随轮转动的轴上，后来才改进为毂，把中心部分挖空，交叉部分逐渐削薄，最终便引导出车辐。从文献史料来看，我国车轮发展大致也经过这样一个阶段。许慎《说文解字》车部即有“辁”，为用平面圆木制成的、没有辐条的车轮。只是目前考古发掘有限，殷代以前的无辐车轮尚未发现而已。

在我国古籍中，有关造车的文献资料还有很多。《周易・系辞下》有黄帝、尧、舜“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荀子・解蔽》则说：“奚仲作车。”杨倞注曰：“奚仲，夏禹时车正。黄帝时已有车服，故谓之轩辕。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者。”《墨子・非儒篇》《尸子》《新语・审分览》和《世本》（《山海经・海内经》注引）都说“奚仲作车”。《山海经・海内经》还说：“奚仲生吉光，吉光始以木为车”，所记与《墨子》等书有异，但将车的发明追溯到商代之前，并且和奚仲有密切的关系，则各种文献记载都是相同的。这多少有着口头传说作为依据。

殷人的畜牧业和手工业比夏人更为进步。传说中汤的11代祖相土发明了马车，7代祖王亥发明了牛车，“服牛乘马”，以作运载工具。《管子・轻重篇》说商的祖先“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这些历史传说和记载与西方车辆的发展过程也是基本一致的。

因此，我们认为，人类出于同源，在相同的文化状态中，在类似的自然条件下，可以创造出不相轩轾的工具和器具。这种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区都是基本相同的”。

结语

马克思曾经说过："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的民族一样，必须先得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殷代战车的出现也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殷代生产和贸易已达到较高的发展程度，这是战车产生的物质基础；手工业各部门的全面发展，成战车制造的技术前提；发达的畜牧业和成熟的驯养技术，为战车运行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长期以来，有些外国学者坚持一种僵化的文化传播观点，认为世界古文明只能由一个单一的发源地传播开来。这种观点无疑是不正确的。因为"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

由于目前考古材料还很缺乏，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对殷代战车的渊源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更确切的结论还留待新的考古发现。

［该文与王建中合写，原载《中外关系史集刊》1986年刊（总第1期）］

关于匈奴西迁欧洲的质疑

在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匈奴族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在大漠南北活跃了300年之久，其后进入中原地区继续活动了将近200年（公元4—5世纪）。匈奴族强悍善战，纵横捭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影响。

无独有偶，根据西方古代的文献记载，公元374年，欧洲东部的哥特人遭到一种以前从未听说、也从未见过的异族人的袭击，他们不知从地理的何处，如暴风雨般地骤然来临。这就是所谓的“匈人”（Huns或Hunni）。这支游牧队伍左突右冲，所向无敌，挥戈征服了东西哥特，又沉重打击了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席卷欧洲大部，成为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动力之一。

西方所说的“匈人”是否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匈奴”呢？这一问题使西方史学界争辩了200年之久，成为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学者林幹先生认为，至今“除有个别学者别有异议外，一般都赞成公元前5世纪在欧洲展开大规模活动的匈人，原来就是公元1世纪由中国西迁的匈奴。因此，这个问题在西方可以说早已解决了”。另有戚国淦先生认为匈奴与匈人之关系问题在西方并未得到解决，一直到齐思和先生发表《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一文，才“基本解答了两个世纪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

然而，不少历史工作者对匈奴西迁欧洲的说法一直持怀疑态度。人们不禁要问：

（1）匈奴从中国迁徙欧洲的说法是否有可靠的文献记载或考古材料？

（2）有没有确凿证据说明匈奴与匈人为同一种族？

（3）匈奴与匈人是否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4）匈人的文化与匈奴的文化到底有无相同之处？

这里，我们仅就前两个问题谈一点儿极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前辈。

争论是否了结

匈奴西迁欧洲的说法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叶。1756—1758年，法国著名汉学家德金（Joseph de Guignes）在其《匈奴、土耳其、蒙古和其它鞑靼诸国通史》一书中，首先指出西方的匈人即中国史书中所载的匈奴。书的开头写道：“罗马的历史学家对他们（西部的鞑靼人）只是笼统称之为匈

人，一切描写与记载，均属不经的寓言，并不知道这些匈人来自何处。”他根据《魏书·西域传》悦般条匈奴“为汉窦宪所逐，度金微山，西走康居”的记载，联想到欧洲史书所载的匈人，认为就是东方匈奴的后裔。德金的这部巨著，对后代影响极大，直到近代，西方史学家有关匈人与匈奴的著作几乎均出自此书。

例如，英国史学家吉朋（E.Gibbon）在他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十六章中就采用了德金的说法，对于匈奴西迁的过程做了简略的解释。1899年，德国汉学家夏德（F. Hirth）发表了《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匈奴与匈人》一文，摭采许多中文史料对德金的说法加以补充。他认为，解决匈人即匈奴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是《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条“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一段，夏德考证认为，粟特即是欧洲史书中所说的阿兰，而忽倪则是称霸莱茵、黑海地区的匈王阿提拉的少子忽奈克，他还提出《魏书·西域传》所载唐文帝时遣使请赎姑臧囚虏的粟特王亦是忽奈克。夏德之说在众多赞同匈奴西迁欧洲说的学者中较有代表性。有人即说：“前此有多学者怀疑德金专凭臆说，不重证据的遗憾，经过夏德，可以说已补足。”其他许多专著支持于此，亦无新的证据佐证其说。只是重复或对德金、夏德之说稍加补充而已。

另一方面，早在19世纪初期，就有不少学者对德金和吉朋的匈奴迁徙欧洲说产生了怀疑，德国东方学者克拉普罗特（J.Klaproth）的《亚洲史表》、雷慕沙（A.Remusat）的《鞑靼语言研究》以及德国学者李特尔（C.Ritter）的《亚洲地理学》和霍沃斯（H.Howorth）的《关于匈人的几点考证》等都提出了自己的异议。不少人认为，北匈奴经窦宪击败后，早已消亡；并且匈奴的语言与匈人完全不同。英国著名的拜占庭史学家伯利（J.B.Bury）也不同意匈奴西迁欧洲的说法，他评论这种说法“只是凭借幻想，并无事实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梅兴–赫尔芬（Otto Mänchen–Helfen）毕生从事匈奴与匈人的研究，他对匈奴西迁欧洲一直持否定态度。梅兴–赫尔芬教授在他的《匈人的世界——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一书中，征引东西方各种史料以及前苏联考古学的最新成果，披沙拣金，对匈奴非匈人说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他认为，匈奴与匈人绝不是同一个民族集团，匈人属于蒙古人种的一类，而匈奴人则是由一些可能应归于某些西伯利亚人的成员组成地。这一观点在西方史学界较有影响。法国汉学家韩百诗（Louis Hambis）在《匈人和匈奴人》一文中也提出，在前苏联米努辛斯克和阿尔泰地区“留下明显的占领痕迹的并不是匈奴人，而是一些可以被称为‘阿尔泰人’的部族，他们可能就是匈人的祖先”。他们占领了阿尔泰地区以后，“南下进入巴尔喀什湖，一直到达咸海，从而产生了历史上的匈人”。他还分析了历史上匈人与匈奴名称混淆的原因，即北匈奴“前往巴尔喀什湖草原定居，在战胜了乌孙的印欧居民之后，又冲击了自阿尔泰南下并向东欧迁移的匈人，后者也自称或被视作匈奴人，利用了匈奴人的固有名声，完全如同后来沿同一条路线迁移的阿瓦尔人一样”。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匈人”条也坚持匈奴非匈人说，其条目的撰写者汤普生（E·A·Thompson）在其《阿提拉与匈人》

一书中更是力主此说。日本历史学家和田清也曾提出“并不能认为向西逃走的匈奴，就是出现在西洋史上的匈人”。

可见，目前国外史学界对匈奴西迁欧洲的问题还不能说已基本解决了，那种认为这一方面的问题在西方早已解决之观点，实有商榷之必要，齐思和先生生前曾指出：“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两派意见仍相持不下，争论不休。”

过去，中国史学家对于匈奴西迁以后的去向问题长期茫然无知。随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清末洪钧首先在《元史译文证补》卷27中记述了匈奴西迁欧洲的过程，其主要根据是以上所举的西方著作。此后，王先谦、章太炎、梁启超等也都开始注意到匈奴西迁欧洲这一问题，并一致认为欧洲史料上的匈人即是中国史上的匈奴，使中国史学界对此问题有所重视。但是，他们由于资料缺乏，对此问题并未展开发挥，更未能提出新的论据。解放前的有关论文，多援引德金、吉朋、夏德之论证，观点亦无大的分歧。1977年，著名学者齐思和先生发表《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一文，对于他认为是解决匈奴即匈人说的最关键问题，即匈奴西迁过程提出了自己的论述。在这以后，肖之兴先生撰文逐条提出异议，详搜广证，凿凿有据，我们以为已不啻推翻齐说。遗憾的是齐先生不久就归道山，否则二位先生互相辩诘，定会有助于匈奴欧洲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我们认为，中国史学界对于匈奴西迁欧洲问题的研究似未超出西方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范围，也没有超出西方的研究水平（详见下节）。平心而论，那种认为中国史学家“解答”了西方史学界“两个世纪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说法似乎不甚妥当。因此很有必要对于我们可以掌握的某些关键性史料进行重新审慎地探讨，以期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文献究竟如何

现在，我们具体考察一下关于匈奴西迁欧洲的文献证据究竟如何。齐思和先生曾经指出，德金和吉朋虽然提出或同意匈人即匈奴说，“但是，他们都未能考证出匈奴人西迁的具体过程，并且吉朋认为，作出这种考证也是不可能的。因而匈奴即匈人说引起不少人的反对”。“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考证出匈奴西迁的具体过程”。齐先生认为中国史书中有“不容怀疑的详明资料”可供探求北单于西迁的历程。于是，他就将匈奴西迁280多年的过程按照“每个阶段约有数十年之久”，分成了4个阶段，即悦般时期、康居时期、粟特时期和阿兰时期。对此我们提出几点疑问。

首先，德金与吉朋并非未有对匈奴的西迁过程做出考证。德金的《匈奴、土耳其、蒙古和其它鞑靼诸国通史》一书主要的目的即是说明西方的匈人就是中国史书中所载的匈奴，因此他花了不少篇幅解释和考证中国的匈奴如何迁徙到西方的经过。在此书第1卷第4编中，德金指出匈奴人从蒙古高原受中国的攻击而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接着南下抵黑海东北一带。在此匈奴人杀了阿兰（或奄

蔡）国王而有其国，再逐渐扩张侵占了多瑙河流域。到435年，西迫罗马帝国和整个欧洲。吉朋在他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也用了一定的笔墨叙述了匈奴西迁的历史过程，并在德金的基础上又加以进一步的说明。吉朋认为匈奴人是受到中国人和鲜卑人的压力逃至伏尔加河流域的。在这之后，斯基泰人的各方奔迁对于匈奴人再往西迁也有一定影响。匈奴开始是分散西迁的，到公元3世纪才联合起来，于是势力大增，杀阿兰王而有其国。所以，没有理由否认德金和吉朋对于匈奴西迁具体过程的考证。但同时也应指出，西方史学家考证的主要依据是《魏书・西域传》粟特条。

其次，我国学者的论述实际上亦不出这些史料的范围。齐思和先生提出的4个阶段说，除了“阿兰时期”依据的是《魏书・西域传》粟特条之外，其余的3个阶段恐都有些根据不足而难以成立。例如齐先生提出匈奴西迁的第一个阶段是“悦般时期”（约91—160），他说公元91年北单于逃到乌孙西北的悦般，占领该地达70年之久。后来在鲜卑人压迫下离去。可是，东汉时期尚无悦般，悦般是南北朝时期匈奴后裔建立的政权，始见于《魏书》《北史》。悦般的地望约与乌孙先后在同一地区，而不是在其西北。因此，匈奴西迁有“悦般时期”之说似难以令人信服。齐先生提出的第二阶段是位于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康居时期”（约160—260）。而当时的康居并不在中亚阿姆河流域，而是分布在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在大宛的北部和西北，距离齐先生认为的匈奴西迁路线（即阿姆河流域的布哈拉—撒马尔罕一带）远达千里以上。第三阶段“粟特时期”（约260—350）值得商榷之处更多。齐先生认为，粟特即奄蔡，是斯基泰人在中亚草原上的一个部落，位于康居西北，居于咸海地区。实际上，粟特与奄蔡并非一国。《后汉书・西域传》即分粟弋、奄蔡为二，只是《北史・西域传》有误而合为一起。粟特即索格狄亚那，在今泽拉大善河流域一带。而奄蔡又名阿兰，位于黑海与咸海之间，两地相对甚远。齐先生曾批评夏德过分强调对音而对史实注意不够的谬误，但他自己又恰恰犯了与夏德同样的错误，即将粟特错当成奄蔡（阿兰），这也与第四阶段“阿兰时期”相矛盾。所以，这些新提出的证据似乎都不能称之为“不容怀疑的详明资料”。

另外，齐先生文中的一些国外材料也有殊为可疑之处，如他引用伯利《后期罗马帝国史》中匈王阿提拉述说其先祖的一段话：“他可以将他的先世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著名匈奴领袖”，并且认为“这些列举的名字与中国史料中的记载大致相吻合”。然而，当我们从阿提拉统治时代（445—453），向前推1,000年，中国尚处在春秋时代，当时根本就没有匈奴王的名字记载，如何谈得上“吻合”呢？可见，伯利的说法如果不是出于臆造，也恰好说明匈人的祖先可能不是匈奴。

综上所述，关于匈奴西迁欧洲的问题，迄今一直被广泛征引的、东西方史料可以相互对证地集中到一条史料，这就是《魏书・西域传》粟特条的记载，夏德认为这是解决匈人即匈奴问题的关键所在，齐先生之论比较可靠的证据亦即此条。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对《魏书・西域传》卷一百二列传第九十的粟特条做一番新的比较和研究。

> 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亦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所朝献。

今本《魏书·西域传》校勘记曰："诸本目录卷注阙字，卷末有宋人校语（殿本入《考证》）云：魏收书《西域传》亡，此卷全写《北史·西域传》卷九十七，而不录安国以后。"可知《魏书》至唐宋间已有缺佚，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刘恕等人整理残缺的《魏书》时在序录中说："其书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今各疏于逐篇之末。"今本《魏书·西域传》系录自唐李延寿《北史·西域传》。我们知道，李延寿作《北史》只是删削《魏书》，因仍齐、周、隋书，其费功力不如《南史》，南北史中一人两传有之，两处材料混在一起的也较多。许多方面，"一经李延寿删改，疵谬丛生"。后人批评说："延寿唐初人，去六朝甚近，而下笔便误，仅不如我辈之追考于千载以下。"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至于《魏书·西域传》，可以说与其原来的面目有相当的距离，仅举一例，《魏书》本世纪中所载国名，多至百余，而大多不见于《魏书·西域传》即可证也。就现存各条来看，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七西域古地考也提出"《魏书·西域传》不合者多，难以断定"。现列举两点重要罅漏如下。

粟特与奄蔡不是一国，已有许多考证家证明之。以上已举《后汉书·西域传》例，《通典》亦云"粟特与奄蔡分二国"。粟特在泽拉夫善河流域，那里根本无所谓"大泽"，这是《魏书·西域传》在地名上的谬误之处。

即使"粟特"一词有误，应改为奄蔡或阿兰的话，那在时间上亦与其他资料不符。按照齐思和先生的分期，匈人征服阿兰是在公元350—374年之间。而《魏书·西域传》却言"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魏书·高宗纪第五》言太安三年（457）"粟特、于阗国各遣使朝贡"。《北史·魏本纪第二》也记载"太安三年，粟特、于阗等五十余国并遣使朝贡"，当指同一史实。只要比较以上相互矛盾的两个史实，不难看出这里只存在着两种可能：其一，或者此时的阿兰国未被匈人所灭；其二，或者按照夏德之说，这时的阿兰王实为匈奴阿提拉的少子忽奈克。

第一种可能性。根据西方史料的记载，匈人攻阿兰后，一部分阿兰人逃散各地，大部分阿兰人都被匈人接受为"同盟者"，成为匈人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支军队于公元374—375年打败了黑海北岸的东哥特国，又征服了北边的日耳曼部落，夺取匈牙利平原，建立了威震欧洲的"匈人帝国"。通过互相联姻，阿兰人已成为匈人帝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文成初年阿兰国犹尚存之说决难成立。

第二种可能性。公元445—453年，正是匈人帝国的鼎盛时期，阿提拉正率领大军，沿莱茵河攻入西欧，但在公元453年，随着阿提拉的忽然暴卒，匈人军队大部受损，匈人帝国立刻土崩瓦解。

四年之后，当粟特、于阗等国向北魏文成帝拓跋浚朝贡之际，阿提拉的次子率领残部正逃向多瑙河下游，在匈牙利定居下来，另一个儿子也逃到南俄草原以东。这时的匈王正在疲于奔命，哪有余暇去关心东方落难的行商。所以很难让人相信遣使请赎姑臧囚虏的粟特王就是阿提拉的少子忽奈克。

从以上比较可以初步肯定，《魏书·西域传》粟特条如果不是记载有误的话，与西方所载的匈人史实恐非指同一事实。据此，诸家认为研究匈奴西迁欧洲最为关键的中文史料，实质上很可能是不可靠的。

考古提出的佐证

长期以来，对于匈奴西迁欧洲的研究仅仅依据文献资料。近几十年，相继在西方、南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地区以南，特别是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都有了新的考古发现，在许多方面使匈奴史研究有了较大的突破。但尽管有了这些新成果，却还不能说关于匈奴西迁欧洲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前前苏联学者达维多娃指出："从德金时代起，学术界就试图弄清匈奴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所引起的猜测和导出的理论数量之多，胜过其他任何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依然无法对此做出详细的答案。"她还认为这一问题"看来在很长时间也不会解决，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许多新的材料，而这些新材料的积累过程却是缓慢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将有关的考古材料做一类比，试图对匈奴西迁欧洲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我们认为，关于匈奴西迁欧洲的说法，不仅在文献记载中缺乏可靠的材料，在考古方面亦难找出确凿的证据。从我们能够见到的材料来看，匈人与匈奴很可能分属两个不同的种族集团。

有关匈人种族的争论迄今主要有4种说法：

（1）蒙古利亚种；

（2）芬族；

（3）芬族的支系；

（4）斯拉夫族。

这几种说法都是以"匈人＝匈奴"说为前提提出的。现在认为匈人是芬族或斯拉夫族的论点已基本销声匿迹，比较占上风的是蒙古利亚种说。在对匈人形貌有过描述的古代作家的笔下，人是明显的蒙古利亚种。如匈人一般较欧洲人身材短，粗壮雄健。由于长期骑马腿部较短，坐势较高，胸宽膀圆，有粗壮的四肢，粗壮的脖颈。匈人的头颅呈圆形或无定形，双目细小深邃，脸部扁平，鼻骨较低，胡须稀疏，与欧罗巴种的阿兰人有明显的不同。

一些考古发现证明了关于匈人的上述描写并不完全正确。从目前发现的可以证明是匈人墓葬的材料来看，匈人并不是纯蒙古利亚种，而更多地呈混血种。据说匈王阿提拉的最后一个妻子就有一

个日耳曼族的名字爱勒迪科（Ildico），从其他许多迹象也可以看出阿兰—匈人联姻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可能是促成匈人成为混血种的主要原因。匈人时代以后，在此地区发现的绝大部分墓葬也都有混血种的特点。

比较明确的匈人墓葬主要分布在奥地利维也纳、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伯赛诺夫和斯特拉兹、匈牙利的阿多尼、杰尔、莫雄森特亚诺斯以及罗马尼亚的杜尔坎科等地，虽然现在还无法判定这些墓葬的准确年代，但不会早于公元4世纪。因为在匈人到达以前，从维也纳到杜尔坎科并没有蒙古利亚种居民居住。墓葬的分布与墓中器物亦排除了晚于5世纪的可能性。目前发现的墓葬大多规模较小，且数量不多，因此不能说明匈人集团与众多种族的相互关系。但从匈人的埋葬习俗和其随葬器物来看，匈人起源于东方，逐渐向西迁移当不成问题。至少现在可以肯定匈人是从东北方向进入匈牙利平原的。

那么，匈奴族属于什么种族呢？这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由于资料缺乏暂时又不能获得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资料缺乏”包括三个方面：匈奴人在历史上是以“完备状态”出现在民族繁杂的地区的，显然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文献史料中不甚准确记载的出现；语言学资料的奇缺失去了任何可以使我们在语言学领域中得出某种结论的可靠成分；人种学的研究是追溯族属起源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在缺乏人类学资料的情况下，考古资料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准确答案。根据前前苏联搜集的材料统计，从20世纪末至今，从全部已发掘的“匈奴”墓中仅仅得到70余件头颅骨。我国搜集并经测定的匈奴人头颅骨更是少得可怜。因此，这里仅能列举一些材料对匈奴的族属问题做一说明。

1926年，前苏联匈奴史专家伯恩施坦发掘了中亚肯克河畔的匈奴人墓葬。他认为匈奴人很早就迁徙到这里，并从此分散向西移动。伯恩施坦认为墓主（一男一女）为蒙古利亚种，而墓道有两具男子骨架则为欧罗巴种，可能是帕米尔—费尔干纳人种的当地居民中的奴隶。伯氏论点已被证明是不可信的。前苏联人类学家德贝茨重新测量了这四具骨架，发现最能反映种族特征的头骨数据，如鼻颧角、腭上颌角、泪线点高、鼻骨高度和鼻突角指数，都非常接近，表明墓主与墓道的两个男子都是欧罗巴种，而不是蒙古利亚种。如果说这个墓葬的族属确为匈奴的话，那么这些匈奴人的头骨对于解决匈奴种属问题就会具有十分重要的证力。

法国学者韩百诗在谈到匈奴种属的时候说：“对于我们尚未掌握汉籍、中亚和西方希腊—罗马文献的时代，我们可以肯定的仅仅是从欧洲边界到黄河两岸之间的西伯利亚大森林以南生活有大批古欧洲种的居民，其中长头型的人根据地区而占有不同程度的优势。另一批蒙古种的居民集团（短头型的人占某种程度的优势）生活在欧洲大陆北部的森林中。被汉人以各种名称称呼的那些居民（最后到了公元前8世纪左右称之为匈奴）可能属于第一类，由于与逐渐由北方迁徙而来的短头型居民的混合，而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民族集团，一些晚期的资料可以使我们做出后者南迁的原因既可

能是由于气候的恶变，也可能是出于其他为我们所不知的原因的设想。此外还有在蒙古诺颜乌拉发现的非短头型人类头颅。另外，唐代的史学家们都曾明确地提到过“黄头室书”。也就是说，具有金黄色头发的人，他们生活在阿穆尔河上游。最后，他提出“匈奴人与历史上的匈人仅以混合于其中的蒙古种人而保持较疏远的关系”。

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乌拉25号匈奴墓中出土了几幅人像刺绣画，除有个别学者认为是黑海沿岸希腊殖民地织工的作品，其形象当为斯基泰战士外，一般大都以为这是匈奴人像。画中人头发浓密，梳向后方，前额宽广，眼睛深凹巨大，唇下有浓密的胡须，额骨不很突出，面孔严肃，显得很威严。人像都用多种颜色的线绣成，其眼睛绣成黑色，但瞳孔却为蓝色，这与文献中记载突厥族碧眼多须是一致的，也与西方记载中匈人的无须、小眼形成鲜明的对照。

陕西省西安沣西客省庄140号墓，是在我国境内发现的比较明确的匈奴墓葬。这里出土了两件长方形透雕铜饰，中间二人高鼻、长发，两人互搂住对方的腰部和一腿，这也是突厥人的容貌特征，与匈人的平脸扁鼻迥然不同。

陕西省兴平县的霍去病墓前有一尊著名的马踏匈奴像，这个匈奴人亦是脸面宽阔，胡须浓茂，完全不像是蒙古利亚种。而与西密克诺在外贝加尔的特洛伊茨克瓦夫斯克发现的一骑兵青铜像非常相似，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尊铜像，是在匈奴长期占领的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时代亦相符合，从图上明显可以看出是突厥人的形象，与上述匈人的容貌毫无相同之处。

1940年，前苏联学者在叶尼塞的巴于城以南处发现一座中国式宫殿，目前认为可能是投降匈奴的李陵或其他匈奴王的行宫。其中发现的青铜铺首呈兽耳、牛角、人面形，可以看出其容貌特征为典型的欧罗巴种。

近年来，匈奴文化系统的考古工作在我国有了较大的进展，为探讨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匈奴物质文化史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例如，在内蒙古杭旗桃红巴拉、阿鲁柴登、准格尔旗玉隆太、速机沟、西沟畔，凉城县毛庆沟、东胜县补洞沟等地发现了从春秋末至汉代的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墓葬。当地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墓葬的族属为匈奴族。其中有关人种学的材料较少，我们所能看到的发表资料仅有一件：桃红巴拉1号墓（时代定在春秋晚期）成年男性的残颅骨。经鉴定年龄为35岁左右，属圆头形，颅缝较简单，额结节较显著，颧骨大而前突，鼻根凹很浅，犬齿窝弱，鼻前棘低矮，整个面部较扁平，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的特征。现在的问题是，这类墓究竟属何民族，春秋时代匈奴是否到达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考古学界还有争议，尚未形成定论。况且，这个材料在目前亦有“孤证”之嫌，少数人种学材料是不足以说明一个民族的种属的。特别是匈奴作为一个极为复杂的古代民族集团，更不能根据一两个个体的头颅来断定“匈奴是典型的蒙古人种”。还应指出的是，1979年在凉城县毛庆沟发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墓葬，即匈奴墓和汉人墓，相互交错地分布于同一墓地。这一事实更说明一两件人种学材料是不足为据的。

古代匈奴族曾在蒙古、新疆和其他地区广泛活动，相信迟早会发现和积累数量更多、更为确凿的人类学材料，结合考古学、历史民族学、语言学及民俗学等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有希望总结出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科学论断。但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匈人与匈奴分属不同的种族是有一定根据的。

本文试图从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方面证明：匈奴西迁欧洲的说法无论在文献和考古发现上似均无令人信服的证据。匈人与匈奴应当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至于匈人和匈奴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在历史舞台上逐渐消迹的整个过程，则需要重新审慎地整理，发掘东西方各方面的有关史料，重视并依靠国外的考古发现，才能期望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该文与王建中合写，原载《西北民族文丛》1984年第4期）

论手机博物馆及其教育功能的发挥

手机博物馆是移动通信和网络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以公共教育为主要责任的博物馆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手机博物馆的发展态势说明了“无墙博物馆”的预言已经开始实现。本文对手机博物馆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对手机博物馆在提升博物馆教育功能方面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并结合作者的工作实践，对进一步发展手机博物馆的工作提出了建议，希望对未来博物馆公共文化的建设有所帮助，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

手机博物馆的概念及其背景

手机博物馆也称掌上博物馆或移动博物馆，是博物馆利用移动通信技术，以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作为接收终端的新型服务方式。手机博物馆包括狭义和广义两个定义，狭义的手机博物馆指用户利用手机等便携式终端设备，通过无线移动互联网技术把博物馆的文字、图像、音频信息数字化传输给移动终端用户，实现关于博物馆资源信息的获取与相关服务的接受，如语音导览、手机预约、在线浏览、手机论坛等；广义的手机博物馆则指参观者利用移动通信技术和设备实现数字文物资源的在线检索与获取利用，以及利用这种技术和设备获取博物馆导览等服务，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信息内容、 信息展示平台、信息传播者、信息受众之间双向或多向互动地进行信息传播的新媒体。

虽然本文对手机博物馆所进行的研究与探讨是以狭义的手机博物馆作为研究对象，但从长远来讲，广义的手机博物馆定义更能反映手机博物馆的内涵。手机博物馆可能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博物馆类型，而是博物馆利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以及终端设备的性能优势改善与提升自身服务的一种新型服务方式，手机博物馆在未来有望使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和服务范围达到最大化。

手机作为一种移动通信工具已经存在30多年了，但与博物馆联系在一起形成手机博物馆的概念是在2000年以后。手机博物馆已经具有广大的用户市场，而且潜在的用户市场更大。 目前全世界手机用户超过60亿。也就是说，全球人口 85%使用手机。2013年5月16 日，苹果与谷歌不约而同公布了各自的应用程序App的下载量为500亿次（苹果）和480亿次（谷歌），发展速度惊人。手机的广泛普及和手机上网人数的增多，为手机博物馆的出现提供了广泛的用户群。手机已经成为人们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通信工具。随着网络技术及通信技术的发展，无时无刻不上网的时代已经到来，人们传统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电子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而借助于手机的移动阅读开始渗入人们的生活。手机被誉为继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20世纪90年代的因特网媒体革命以来的又一次更深更久远的革命：不断增长的受众、一天至少 12小时的贴身伴随、移动生产和获取信息的能力、随时随地互动。手机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将受众“黏在身上”的媒介。

移动通信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手机博物馆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3G网络实现了手机宽带上网、视频资源在线浏览和下载，提供了更高效的网络环境；IPv6提供了充足的IP地址；同时，具有完整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提供了终端保证。据统计，中国的智能手机普及率为66%，仅次于韩国（67%），已经超越美国（53%）和英国（51%），智能手机成为多数手机用户的选择。从智能手机使用情况来看，短信、网络浏览、社交网络在多数国家都是最热门的活动。以RSS、博客、播客、维基、P2P下载、社区、分享服务等应用为主体的Web2.0的应用及手机可缩放矢量图形、手机视频3GP标准等的产生，使手机博物馆的信息服务形式更加丰富和人性化。

博物馆服务新理念的产生，也为手机博物馆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具体包括：博物馆从收藏向教育转型，对教育功能空前重视，教育成为博物馆经营的最高指导原则。2007年8月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修订的博物馆定义是：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调整了博物馆业务目的的表述顺序，将“教育”调整到第一位（在2001年定义中“教育”列第二位）。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强调博物馆与社会、博物馆与人之间的关系，超出了原有的对博物馆与物之间关系的重视程度。

“泛在博物馆”理论提出博物馆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的建筑空间之中，任何用户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均可获得任何博物馆所拥有的任何信息资源，使文化更加亲民，更加惠民。博物馆应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可存取的，这种理论提倡以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基本特征，用全方位、整体性和开放式的观点洞察世界，博物馆展陈的时间和空间得到极大的延伸，博物馆的参观者也不再局限于周边地区或者本国居民，不再局限于开馆时间内才能参观访问。手机博物馆将是一个面向全球的全时制博物馆，用户无论身在何时何地都可以访问博物馆信息。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各种终端设备访问信息，可以选择使用微博、博客、即时通信、社交网、论坛、短信等各种应用系统进行操作，用户可以自行决定是编写、发布、修改、增删还是评论信息，甚至也可以自行添加信息构筑真正意义上的DIY数字博物馆，从而实现全方位的互动参与。

移动学习（M–Learning）是一种继E–Learning之后的新型的学习方式，学习者在自己需要学习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和无线通信网络，获取所需的学习资源，与他人进行互动交流和学习。新媒体强大的移动性则使得借助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和移动通信网络实

现新型的移动博物馆成为可能。

手机媒体的基本特征是数字化，最大的优势是移动性与便捷性。手机媒体是网络媒体的延伸，不仅具备网络媒体互动性高、传播快、跨地域传播、多媒体传播等优势，而且手机媒体还具备私密性、传播者和媒体受众高度融合等优势。手机博物馆在承袭了原有博物馆信息服务的基础上加以延伸和创新，给博物馆更为广泛的用户群带来更为便捷、实惠的全新体验。

手机博物馆的历史与现状

早在1997年，由英国政府牵头、大英博物馆全力开展的便携式古物计划（Portable Antiquities Scheme）开始鼓励公众使用手机等移动设备参与文物的保护和发现，使考古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几乎全民都可以随时随地，甚至在自家的后院用手机进行“考古”，并将资料上传到网上“博物馆”与爱好者分享，与专家共同探讨[①]。

自2003年以来，日本学者开始在不同的博物馆探索用手机提高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主要对象是那些很少有机会欣赏博物馆艺术藏品的人群，鼓励用户通过手机了解和欣赏博物馆的艺术藏品，既可以阅读别人对博物馆藏品的留言，也能分享自己的看法，达到提高公众艺术鉴赏力的目的[②]。

2004年，IBM与埃及政府合作的“永恒的埃及”项目囊括了遍及埃及各地的大小博物馆的藏品信息，建立了庞大的交互信息库，以手机为接收端，创建了超越普通“语音导游”的数码导游方式，对实地景观进行数字导游。游客可以利用手机远程查阅网站的信息库，还可以自己设计自己喜欢的参观路线，同时下载相关的介绍资料[③]。

2005年，英国的一些博物馆尝试使用手机短信的形式让观众了解博物馆展出的内容和展品的信息。英国学者也开始研究博物馆如何利用手机跟观众进行互动，突破博物馆围墙的束缚[④]。

2006年，英国学者通过手机提高学校师生到博物馆学习的兴趣和效率。在去博物馆参观时，他们把预装专门软件的手机借给学生，用手机查看多媒体演示博物馆的展品、拍照、录音、写笔记，还可以观察别人观看展览的感受。参观完成后，每个参观者的访问纪录自动传输到网站存储。学生们可以查看他们的访问记录和各种多媒体信息，跟其他利用博物馆资源的孩子分享感受，创建演讲

① http://finds.org.uk/

② Klyoka Fushimi, Noriko Kikuchi, and Kiyofumi Mot oyama, Papers: An Artwork Communication System Using Mobile Phones, http：//l 33.6.221.59/~noco/st art.swf

③ http://dg.eternalegypt.org/EternalEgyptW1deAreaW AP/gateway？wa,,action,,key=action,,Bbrary_search &search_type=search_type_library

④ Mike Sharpies and others, Evaluation of MyArtSpa ce： a Mobile Learning Service for School Museum Trips, https://lra.le.ac.uk/handle/2381/8257

稿，充分表达出他们对博物馆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他们在一个为期一年的试验期内，组织了超过3,000个学生到附近的三个博物馆参观，手机的巧妙运用对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大多感觉到非常有趣和更加有时代感①。

2008年，美国一些博物馆如圣荷西艺术博物馆、洛杉矶现代艺术馆、亚洲学会、日裔美国人博物馆、洛杉矶盖蒂中心等博物馆都开始采用手机技术给参观者提供导览服务，参观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想听的解说，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规划自己的参观路线②。

2010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推出了全新的博物馆移动导航系统，通过手机和无线网络为游客带来参观博物馆的奇妙体验。这个经过三年时间研究开发的博物馆导航系统可以免费下载到手机和多种无线终端接收设备上。它不仅能帮助游客明确所处位置，还能对博物馆全部45个展厅、剧院、卫生间和餐厅进行导航，让游客在博物馆内行走自如。导航系统通过手机的演示平台，在游客每次移步换位时，提供图文并茂的馆藏信息和藏品介绍。同时，游客还可以通过该导航系统上网，与远方的朋友分享实时参观体验③。

旧金山科学探索馆的手机导览不仅有英文和西班牙文，甚至还有中文。手机导览的内容深入、翔实、丰富，非常值得国内博物馆学习。网站在各阶段服务内容中加入了很多著名社交平台来实时分享探索馆的展览和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加入了Foursquare这个基于用户地理位置信息的著名手机服务网站，可以鼓励手机用户同他人分享自己当前所在地理位置等信息。Foursquare用户界面主要针对手机而设计，非常方便手机用户使用。

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在2011年8月进行了一项全国性青少年和成人调查，了解他们使用哪些移动设备在博物馆参观，如何上网，如何参与社交网络，以便更好地理解观众对手机博物馆发展的看法并提高博物馆在数字化方面的效率。他们定义的“观众”不仅包括博物馆的参观者，还有广大在线用户对于手机博物馆和社交媒体的数字体验④。同年英美学者也做了很多关于手机端博物馆的研究⑤，如博物馆应用程序的研究，如何用手机统计观众流量的⑥，如何利用手机进行图像识别

---

① Mike Sharpies and others, Evaluation of MyArtSpa ce： a Mobile Learning Service for School Museum Trips, https://lra.le.ac.uk/handle/2381/8257

② http：Z/www.engadget.com/2006/02/23/san-jose-mus eurn-of-art-offers-cellphone-tours/

③ 荣娇娇、杨新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推出导航系统》。http://www.stdaily.com；http://www.amnh.org/plan-you-visit/interactive-floorplan

④ http://www.msichicago.org/fileadm1n/pdf/programs/digital_11fe/Digital,,Life_201_Mobile_Device_Ownership.pdf

⑤ Orit Shaer and others, Art App-reciation: Foster ing Engagement and Reflection in Museums throu gh a Social-MobileApplication>http：//www.museumsandtheweb.com/mw201 l/papers/art_app_reciation_ fostering_engagement_and_ref; Dick van Dijk, Ex ploring Heritage in Participatory Culture： The Museum App http://www.waag.org

⑥ Julian Bickersteth and Christopher Ainsley, Mobi le Phones and Visitor Tracking,http：//www.museums andtheweb.com/mw2.011/papers/mobile_phones_and_ visitor_tracking

等等[①]。

2012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和英国博物馆协会委托第三方研究机构（Fusion）在网上对740个美国博物馆和386个英国博物馆做过一个关于手机博物馆现状的调查分析和预测，其中艺术类博物馆35%，历史类22%，综合类12%，历史遗址类9%，特别类7%，科技类5%，自然史类5%，儿童类3%，其他类3%。博物馆实际访问量5万以下占47%（大部分已经提供了新的手机平台），5万到10万占16%，10万到25万占17%，25万到50万占8%，50万以上占12%。超过一半的美国博物馆为参观者提供各种类型的移动平台，8%的博物馆只有博物馆提供的移动设备，13%既提供传统的博物馆移动设备，也提供类似二维码的功能让参观者用自己的手机扫描，36%的博物馆只提供给参观者新的功能，可以让他们用自己的手机扫描。大部分英国博物馆也是让参观者使用自己的手机来参与互动。总体来说，美国博物馆二维码的使用率占30%，手机语音导览占17%，传统博物馆提供的语音导览器占16%。当然，仍然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博物馆由于资金问题、资源问题和专业知识等原因还没有提供任何手机平台服务，但有三分之一没有任何手机平台的博物馆已经计划近期引进手机平台服务，已经提供手机平台服务的博物馆有一半已经计划新的技术，还有三分之二的博物馆也计划近期扩充手机平台[②]。

国内博物馆开发出独立手机网站和综合平台的博物馆已经有十几家。还有一些博物馆推出了专题展览手机端应用程序，如山东省博物馆（鲁王墓和孔府服饰）、浙江博物馆（惠世天工）、湖南博物馆（白石墨韵）、新疆博物馆（清代新疆文物珍藏展）、广东省博物馆（海上瓷路）、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北方青铜器展）、北京博物馆（世界宗教导览）等。手机网站和应用程序的设计制作单位不仅有国内的IT行业知名企业，也有一些国外的专业公司。

但总的来说，国内手机博物馆的发展还刚刚起步，尚有很大的差距。截至2013年5月初，在苹果应用程序商店中的有关“Museum”的应用程序超过2,000项，有关“博物馆”的应用程序有222项；在IpadApp上的有关“Museum”的应用程序超过1,000项，有关“博物馆”的应用程序接近200项。相比而言，国内博物馆独立的手机端应用程序还非常少，显然与国内各类博物馆的总数量不成比例。一些博物馆手机端的下载和设置未尽人意，速度较慢，有的功能无法使用。大部分语音导览的内容比较单调，缺乏深度的讲解，基本是按照讲解牌照本宣科。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改善。

① Johan Oomen and others, Picture War Monuments: Creating an Open Source Location Based Mobile Platform,http：//www.museumsandtheweb.coni/mw2011/ papers/picture,,war_monurnents_creating_an_ open_source_

② Mobile in Museums Study-2012 A Survey of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US） and Museums Association (UK） Members, https：//aam一us.org/docs/research/mobilemuseums2012-(aam）.pdf

手机博物馆教育功能的体现

手机博物馆的信息服务系统是一个整合的集成系统，通过手机的连接，博物馆服务的对象可以涵盖所有的人；服务的方式由观众和博物馆的面对面的服务扩展到借助于移动终端设备的远程异地实时服务。博物馆馆员不仅是信息的导航员、信息的提供者还是生活百科顾问；这一角色不仅仅是指包括各类知识丰富、有见地的学术权威和专家在内的博物馆内的工作人员，还将延伸至所有的人。通过SNS，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博物馆馆员”，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别人服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与信息的共享。

在具体应用领域，手机博物馆主要依靠3G移动通信技术和便携式终端来实现其教育功能，扩展服务范围、深化服务内容和提高服务效率，向大众传播文化思想精神和文化遗产的灵魂，使博物馆突破了时空距离的限制，扩大了感知距离和能力。我们把这个过程分为展览前，展览中和展览后三个阶段。

1. 展览前的查询规划和预约

通过查询有关博物馆的各种手机端应用软件，观众可以根据用户的地址位置和个人爱好，寻找到身边感兴趣的博物馆。这些博物馆的手机导引既可以按照分类，也可以按照年代，还可以按照地区。通过博物馆附近的交通路线与博物馆内部参观引导的动态化，以GPS为主导和云技术的运用，不仅方便大众的交通搜索，同时具备现场介绍的语音功能，为大众提供更贴心的服务。观众可以清楚地了解身边博物馆的具体位置，可以找到行车路线图，进而可以看到近期有什么展览，有哪些特色藏品，在短短的时间内应该如何安排才不会顾此失彼。

这一方面，国内一些博物馆已经做出了可喜的探索。《寻宝中国》（一生必去探寻的50家博物馆）是一个博物馆群的手机导览，揭开了中国最具特色的博物馆的神秘面纱。类似的语音导览还有中国博物馆联盟（目前为止已经推出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共103家博物馆）、近代上海（共13家博物馆）、西安博物馆（共14家博物馆）和南通掌上博物馆（共14家博物馆）等。

手机博物馆可以提供基于短消息平台的短信咨询服务，基于QQ软件的即时信息咨询和基于E-mail的参考咨询及基于3G手机的类似于可视电话的面对面的视频参考咨询服务等，如通过手机进行实时短消息交流服务、FAQ查询、手机邮件交流服务和手机视频交流服务等。博物馆可以充分利用短消息平台，进行信息的发布、通知和提醒服务。不仅是博物馆动态信息发布，如馆内新闻、业内动态、新书通报、讲座、培训通告等，还有提醒服务，向特定参观者发出展出信息以及预约、取消预约等服务。观众意见与建议等项目也是短信平台的一个重要内容。

手机博物馆可以帮助参观者在还未观赏之前自行上网下载参观资讯，作为参观的行程规划。

针对参观者的需求，以介绍博物馆的特点以及长期与短期展览信息为主。可以在博物馆的宣传海报和广告中加入二维码，让观众自行下载博物馆客户端，或者直接进入博物馆网页进行查询和规划。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手机导航系统为游客定制个性化参观路线，游客在参观前，在家中可以通过该导航系统预先设定自己的参观路线。如果对每个展品节点在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分类及关键词处理，使得各个节点间能够产生不同主题的上下文关联。基于这种关联性，在本平台中的展览可以实现“一个展览多条线索”，虽然实体展品会放置在相对固定的位置上，但是观众却可以按照自己所喜好的不同主题线索，在移动终端的导览下，沿着各不相同的路线参观。也可以设计小群体的参观方案，例如家庭类型、小型团队型、情侣型、旅游团型、残疾人以及个性化参观等等，给予观众体贴可靠的和翔实的博物馆信息介绍，提供更全面的服务。这些功能当然也可以通过博物馆的网站或者通过博物馆提供的手持式导览器实现，但说到便利性、实用性和移动性，手机博物馆会成为越来越多的观众的选择。

博物馆由于每天限定一定的参观人数，希望参观的观众可以通过手机进行预约，避免现场排队浪费时间。还可以协助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实现场馆、展品、展览的管理和关联工作；实时地为管理人员提供客流量信息；为文博管理人员提供多种统计分析报表，为场馆安排、参观线路优化等决策提供支持，提供便捷、高效的信息化管理手段。这一方面，国家博物馆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值得其他博物馆借鉴。

2. 展览中的导览与互动

正在参观实体博物馆的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端利用移动终端软件、WAP、短信等方式，浏览博物馆的海量信息，实时获取用户位置、周边信息、图文资讯、语言自动讲解、好友互动、藏品信息资源服务等。用户只需带具有GPS功能的手机终端免费下载软件、地图信息等资讯；在用户游览的时候提供自助导游，即走即播方式的自助讲解，播报内容随位置移动自动切换。

用户通过手机直接拍摄地图、宣传资料、景点照片、藏品照片、二维码图形等信息发送到服务端，服务端进行图像识别和匹配，找到对应的相关内容供用户下载浏览。

观众对博物馆、展览、文物有任何感受，或是拍照、点评等各种互动结果，进行“一键分享”。博物馆有任何新展览、活动、讲座等，也可以通过这一功能推送到用户手持终端，实现远程注册报名及互动。

手机语音导览是博物馆服务观众的新方式，可以营造动感丰富的参观环境，激发观众的兴趣和学习效益，创造观众主动学习的空间，以达到教育推广的目标。观众通过在自己手机上进行简单操作，即可享受方便、快捷、丰富的导览服务内容。在实体展场参观时，手机导览系统可以提供即时且直接的展品信息，让参观者跳脱教条式的学习模式，结合知识和声效画面，感受到活泼、丰富

的内容刺激，以触发其兴趣与好奇心，深化博物馆参观体验和强调行动学习的理念，提高参观游览的效率，同时也创造欢乐与动感的元素，使展览环境更加丰富多彩，同时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导览品质。传统的博物馆文化教育常以静态的展示为主，缺乏和受众产生交流互动，所起到的教育作用甚微，手机互联网利用其交互优势可以大大提高博物馆的宣传和教育力度。

手机导览的目的在于建立新的参观视觉与听觉体验，以提升资讯和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在内容设计上具有弹性和个性化，并以互动的形式让观赏者参与其中，自行导览和控制整个历程。手机导览具有小巧灵活、便于携带的特点，可以随时、随地、随身为手机用户提供博物馆的各种信息服务，使博物馆的服务更具有移动性、便捷性和实时性，突破了传统博物馆在时间、空间上的局限，便于博物馆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开通的移动博物馆可进行24小时的访问，不受闭馆时间、休假时间等的影响，使得以往的博物馆固定服务变为主动服务。手机的普及性、信息资源内容及信息资源传播方式的广泛性使得手机博物馆的服务更具有广泛性；利于实现对博物馆中各种文物资源数字化加工和潜在文物资源的深层次挖掘与整合，极大地丰富了博物馆的馆藏资源。

目前博物馆观众主要使用的获取展览信息的方法包括二维码、无线射频识别技术、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三种。二维码，是用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矩形方阵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新一代条码技术。具有信息量大、纠错能力强、识读速度快、全方位识读等特点。观众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它对应的地址，获得完整的数据，达到信息传播的目的。随着编码和解码技术升级，二维码可容纳的信息量越来越大，甚至已能将几百幅图片合成一个立体影像。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每个RFID标签包含一个ID号码，能连接到特定作品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储存在博物馆的后端系统中。当观众用手机读取这些标签，手机屏幕就会显示相差数据，包括艺术家生平、作品，出现在该美术馆的经过、其制作技巧和艺术家的相片。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NFC），是一种短距离的高频无线通信技术，允许电子设备之间进行非接触式点对点数据传输（在10厘米内）和交换数据。伦敦博物馆，伦敦道克兰博物馆和韩国博物馆等都已经采用NFC技术进行导览服务，观众只需将手机贴近标签，不仅可以轻松下载展品图片和信息，还可以连接社交网站对该展品进行评论。

移动定位服务根据移动用户所处的地理位置，使邻近博物馆为观众提供与其需求相关的各类信息服务，还可以通过手机访问到馆内一些网络摄像头拍摄的实时影像，比如咖啡厅或者小卖部，可以看到当前去喝咖啡或者吃饭是否需要排队，以确定是否现在前往，还有其他公共空间以及其他馆内空间的实时影像或者图形化的显示。

手机导览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辅助实体展场的缓冲，尤其是当大量人潮同时涌入时，可作为协助导览人员不足或是非导览时间的辅助系统。博物馆可以充分利用手机服务的精准特性，提高为观众

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水平，实现服务内容的深化与拓展。实时反映用户需求，通过个性化推送、定制服务使得手机博物馆更具有人性化和个性化。手机强化和放大了随时随地获取信息，自我表达的传播方式。

手机数字导览与人工讲解相比，能避免由于讲解者个人因素带来的服务质量的不稳定性，为公众提供更加全面客观的服务。手机导览会在自带的语音数据库中查询并自动播放这一展品的中文或外文讲解，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语言、不同层次的参观者随兴趣而自选参观路线和展品的愿望，使博物馆向更广阔的人群敞开知识的大门。通过手机导览服务，国内外的友人足不出户即可感受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扩大了文化交流的途径，有利于促进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

手机博物馆不仅面向广大观众，也可以面向博物馆工作人员，包括基于Web网的移动操作。这是一种全新的博物馆员工作模式，手机相当于博物馆工作人员随身携带的电脑，通过手机能够实时访问博物馆管理系统，方便工作人员随时、随地、随身地处理博物馆的日常工作。它可以实现以下功能：全天候观众答疑，信息咨询服务（包括文字、语音与视频交流），信息即时发布，博物馆工作人员、专家、观众之间的实时交互，24小时导航服务，全天候跟踪检索与即时信息反馈服务，全天候远程系统实时维护等。

基于安装软件的扩展操作，通过在手机上安装相关系统软件，编写相应Java程序，通过手机功能的扩展来实现博物馆的一些日常工作。例如，帮助博物馆工作人员进行库房清点、实时查看参观者的反馈信息、现场发送相应修改意见等操作，以达到方便、快捷、准确地清点库存，减少失误，提高工作的效率，实现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最好的信息资源的目的。

3.展览后的分享和跟踪

手机博物馆可让观众完整记录参观过程或与他人分享，通过同步或非同步交流，传递信息给博物馆，或者提供相关活动信息给亲朋好友，或者结合无线技术在现场做点对点的信息传送，与同伴产生即时的互动。参观者日后观看在参观期间所做的笔记，加深回忆，以延续学习效益。手机个性化信息服务能根据用户个人的兴趣、爱好、需求及对用户以往信息服务记录的分析，进行信息推送服务和信息定制服务（如检索工具定制、数据库定制、电子出版物定制、用户界面定制等）。观众甚至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虚拟博物馆，自己做策展人发起展览邀请朋友在线参观。

手机博物馆还可以提供包括藏品目录、电子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检索的手机版服务，提供“声、色”俱全的数字化文物图片、电子图书或期刊的在线阅读或离线阅读，提供音频、视频点播服务，提供多媒体课堂、视频教程等远程教育与学习，实现随时随地地阅读与M-learning，达到“行万里路而读万卷书”的境界。当参观者在手机微博或者论坛上留下意见或想法时，博物馆可给予回应或提供其他相关的资讯。同时手机博物馆可以建立观众的资料库，未来作为博物馆个性化工作的基础

资料。

其他用户管理服务包括用户注册、博物馆会员证件挂失、资费查询（如博物馆网上商店等）及相关付费服务。为方便大众购买博物馆纪念品，让不同地域的人们都可以购买到所喜爱的藏品纪念品，可以开通手机纪念品商务服务，不仅可以通过手机订购纪念品，还可以通过手机付费等，让各个地区的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能购买自己喜爱的博物馆纪念品，不再因过长的旅途无法携带纪念品的烦恼。

移动博客、微博与论坛都是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社交网络平台。基于Web.2.0的Blog和SNS提供的博客与论坛服务，能对博客站点进行实时访问，能利用手机随走随写、随录、随拍、随发、随读的服务功能，能开展SNS社区网络服务，开辟移动社区，提供实时交互的个性化交流平台，并进行信息共享等。

博物馆对志愿者的发掘、培养、借用、管理，也可以通过手机博物馆这一手段实现。

结论

手机博物馆被称为是永不落幕和随身携带的博物馆，是贴近民众的文化宝库。所有关于博物馆展览与文物的信息，将不再与观众参展过程及参观体验脱节，而是呈现出紧密结合、碎片互动、及时传播的特征。手机博物馆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提升教育功能和不断提升观众在博物馆经营中的位置的过程。在手机博物馆里面，观众不仅是信息的获取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创造者，它使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扩大到极致，其开放性的运作形式，使更多爱好博物馆的人自觉、主动提供信息和参与信息的共享交流，促进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动态化和最大化，实现在广度和深度以及时间上的最大延伸。

（该文与陈刚合写，原载《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2013年“博物馆与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海洋文化数字旅游平台初探

今年是中国海洋旅游年，海洋旅游发展前景非常可观。随着移动通信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旅游消费行为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被动的传统营销转变为主动的网络营销，充分体现了网络时代消费的特性。我们通过网络虚拟实境、景点互动平台及WEB2.0模式，集成海洋旅游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平台，将营运商综合在线管理、运营系统管理、代理商支援系统、出行在线服务、各种应用功能集成在一个数位平台之中，提供全方位的旅游地理查询和技术支援，使用户的交互体验与旅游品质有显著的提升。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践对海洋旅游数位平台的开发与运用进行了探讨，对目前涉及的移动与网络技术做了评估，希望该平台作为海洋文化旅游新的行业模式，为有关海洋文化旅游的决策过程提供实用的价值。

引言

海洋作为全球生命支援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人类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宝贵财富，对人类的生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联合国有关组织估计，进入21世纪，世界人口的75%将居住在距海岸100千米以内的沿海地区。海洋旅游业作为海洋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成为沿海国家竞相发展的重点产业。中国位于地球上最大的大陆和最大的大洋两大板块交会之处，纵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发展海洋文化旅游具有丰富的资源。近20余年来，海洋旅游业在全国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逐步攀升，沿岸已开发有1,500余处旅游娱乐景观资源，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的主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海洋旅游还有一些问题，从信息化角度来看，整体应用范围不大，基础设施差，信息资源零散，静止的信息多，不断更新的信息少。信息化维护能力弱，多数景区网站内容更新滞后，缺乏互动，基本还停留在Web1.0时代的水平，滞后于旅游业的整体发展需要，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距离。很多旅游者无法及时获悉景点的新信息、新动向，难以与景区及时进行交流，很难准确自行规划旅游行程。

随着休假制度的调整，中国旅游业发展已经开始逐步走向散客时代。游客的自主性、个性化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需要通过多种资源和渠道获得各种旅游服务，并得到有效的共享和互通，旅游

市场需求也从传统简单地满足观光游览需要的“到达型”转变为差异化体验需求突出的“个性化旅游型”。因此，为海洋文化旅游设计一个基于文本、语音、视频等多媒体技术的对话模式和互动服务平台确实十分必要。海洋文化数位旅游平台不仅可以满足基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兴旅游业务需求，也可以实现各海洋景区的远端信息发布、管理、沟通和更新，向游客提供实时信息查询，可以极大地提高海洋文化旅游服务的质量。

总体设计与思路

随着互联网Web2.0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近些年以实时监控、实时管理为特征的智慧旅游体系建设渐成共识。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全球网络化和服务信息化的加剧，催生了旅游业的智慧化和数字化。

海洋文化数字旅游平台的总体设计思路是：以移动网络为依托，面向对海洋文化旅游有兴趣的用户（尤其是年轻用户），建立一个可提供多种方式旅游信息，面向游客、服务企业、管理部门及其当地行政管理部门的数字化旅游平台。



系统平台由360° 网上虚拟旅游、行程管理服务、自助导航和救援以及目的地营销系统等主要模块组成。

360° 网上虚拟旅游系统是我们新开发的实景交互展示系统，是目前商业化应用功能全面、效果理想、具有领先技术水平的新一代数位视觉（视频、图像）传媒展示系统，使用者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网络进行接入，为不同接入方式的使用者提供相应的网上旅游内容。

行程管理服务对多家供应商直接预订进行整合，以元搜索服务为主流，允许顾客直接在数位平台依据游客个人偏好和需求、市场热点、旅游产品特征等进行智慧检索和匹配，产生满足用户要求的旅游行程规划。

自助导航及救援的主要功能包括游客通过终端设备精确地定位自己的位置，获得各种旅游服务信息，自助求援求助等，为到达目的地的游客提供无缝对接的体验。例如给使用者徒步游览时提供各种信息，基于地理位置信息整合来自当地旅游资料提供商提供的旅游博客内容，再加上使用者生成内容，形成一个全新的服务组合。

目的地营销系统是指识别使用者的位置和他们希望到达目的地、入住酒店或者参观景区的时间，可以让使用者到达某地后立即决定下一步的活动，通过识别用户的地理位置来提供新的服务。

关键技术与理念

海洋文化数位旅游平台利用最新移动网络平台结合三维虚拟、虚拟实境、GPS等技术以及推荐系统和O2O概念产生各种模式的数位旅游应用，使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设计各种海洋文化旅游的行程、获取详细的旅游信息、电子地图查询、虚拟实境体验、分享旅游经历，使遍游天下的梦想成为现实。

移动应用

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面向旅游者手持终端（如手机、平板计算机）的各种移动应用得到了迅猛发展。相比较于传统的计算机应用，移动应用较好体现了旅游以“人为中心”而不是计算机为中心的理念。平台主要集中于面向旅游者服务的信息推送与搜索、导航、实时路线及目的地推荐；并向普适计算的方向进行扩展，如手机电子门票、基于全球定位系统的车辆监控与导航以及手机与环境之间的交互游戏等。除了面向旅游者服务外，还包含面向旅游研究者、旅游公共管理与服务部门以及旅游企业的旅游行为资料获取与分析，如可通过基于手机资料的散客流分析，对目的地住宿的可容纳量进行估算。

Web服务

Web服务是Web上资料和信息集成的有效机制，是解决Web上各种应用系统高维护与更新代价的最为合理的解决方案。Web服务在旅游中主要用于信息集成、交换以及系统之间的交互操作。Web服务技术对于旅游目的地管理而言非常重要，能够实现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与旅游企业之间以及目的地旅游企业之间的异构资料交换、共享以及集成。Web技术还是Web推荐系统的重要技术之一，能够获取推荐系统所需的动态与实时的万维网资料。

三维虚拟技术

该平台以虚拟成像、增强现实、虚拟模拟为主要手段，通过全面展示旅游景点风貌，提供给用户类似于实地游览的360° 环视、场景切换、虚拟漫步、视角切换功能，使用者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网络进行接入，为不同接入方式的使用者提供相应的网上旅游内容，营造出一种身临其境的视觉冲击和体验感受。

虚拟实境

虚拟实境技术主要用于旅游目的地、景区、景点的市场营销。本文集中于旅游目的地、景区及景点等的虚拟展示，是一种旅游产品的虚拟试用体验，也是游客的现场体验，特别针对历史文化遗产与遗迹，提升游客在博物馆对于文化遗产的体验。虚拟实境技术在旅游中的应用还应包含海洋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如已经消失的历史文化景区的虚拟复原。

GPS 信息处理

系统中使用者的位置通过带有GPS模块的智慧手机设备获得，使用者的GPS信息会实时地发送到服务器端。服务器端通过GPS模块获取使用者的经纬度信息，并对其做相关转换后，通过GIS的相关算法，判断使用者位置和景区边界点的关系，从而确定用户所属的景区。并且，根据使用者的经纬度信息，可以在使用者的手持设备上准确地标示出用户的位置和使用者周边的相关地理信息。个性化目的地推荐系统、基于短信服务的餐馆推荐系统、导航系统、位置服务系统、旅游资源监控预警系统以及文化古迹的信息系统等应用系统都离不开这种系统的支撑。

推荐系统

推荐系统是为解决互联网“信息超载”问题而提出的一种个性化服务，使用者从大量信息中发现其可能感兴趣的或者满足其需求的资源，如信息、服务以及商品等，并自动生成个性化推荐。推荐系统在旅游中的典型应用为旅游行程管理服务，可面向旅游电子商务使用者，也可面向互联网用户；可规划旅行的时间、地点以及活动等全套行程规划，也可推荐旅游目的地、餐厅以及住宿等。

O2O模式理念

O2O（Online to Offline）是一种在线预购、在线支付与线下体验相结合的模式，指通过有线或移动互联网提供商家的销售信息，聚集有效的购买群体，在线支付相应的费用，再凭各种形式的凭据，去线下（现实世界的商品或服务供应商）完成消费。O2O模式的操作过程（营销—交易—消费体验）与旅游的本质特征不谋而合。本平台希望通过和各景点合作，通过各种的购买分成，如新增

类门票，可以注册登录作为使用者信息。还可以通过和各大旅行社合作，通过连接埠，来收取广告费。通过和酒店周边商户合作，采用类似大众点评网的系统，利用团购和定点商户推荐来收取广告费和购买分成。当吸引到一定人群的时候可与电视广告商户联手，制作适合海洋旅游用品的B2C商城。

系统功能与具体实现

海洋文化数字旅游平台是针对海洋文化旅游业综合性的网站商务平台，具体包括展示、沟通和交易三个部分，具体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1）体验三维虚拟旅游

主要功能包括球型实景和360° 实景两种播放模式，实景视频、图像，动、静态混合，360° 全方位互动观看，系统功能表自动导览顺序和循环播放，自主地图导览和功能表选择播放，字幕、语音同步播放。

虚拟景区实现的原理是，借助互动多媒体虚拟模拟技术打造一个数字化的虚拟旅游场景，通过网络、终端等呈现方式现实展现，在互动交互技术设计上实现人与虚拟景区的直接体验和互动。用户通过使用这种终端设备，实现了基于全景图的网上虚拟游，包括全景图浏览、全景图自动生成、虚拟旅游场景生成等。全景图浏览器读入场景脚本，根据需要调入的全景图，按照使用者的视角改变摄像机的方向和焦距，实时地将球面全景图变换成平面投影图，并在荧幕上显示。

在虚拟全景空间中使用者可以用键盘、鼠标等控制漫游方向，穿行于各个视点空间中。在实现移动电子导游功能的同时，还可以随时随地地获得吃、住、行、游、购、娱等全方位的旅游信息和服务。旅游供应商则可以通过这种数位伴游综合体，进行产品、服务的宣传和实时交易。

（2）行程管理服务

其实现的功能包括：基于庞大的旅游目的地信息库，旅游企业和产品信息库，依据使用者特征（包括使用者个人偏好、特征和需求）、市场热点、旅游产品的资料采集和分类结果，采用智慧检索和匹配技术，根据使用者目的地、时间、预算等条件，产生满足用户要求的旅游行程规划。旅游行程规划系统的结构分为数据库层、服务层和展示层。

其中，数据库层包括使用者信息库、景点信息库、线路信息库等关联式数据库。服务层根据使用者数据，并向用户输出所需结果，包括资料登录、资料编辑、空间查询、空间分析和资料输出，并设计了使用者信息服务、行程管理服务。展示层根据使用者不同的接入方式和终端能力，为其提供所需的旅游服务。

另外，通过网络双向交互作用，在实现了游客体验的便捷性和优惠性价值之外，平台还能提供

“个性化”的旅游定制服务，特别是当使用者暂时找不到满意的旅游方案的时候，可以委托服务器监视和跟踪，当符合标准的信息出现时，及时用电子邮件的方式提醒客户。只有个性化定制服务才能真正满足游客的根本需求，引导其消费从周期性向经常性转变。

（3）获取旅游信息

在确定行程之后，游客最关心的就是旅游信息，比如旅游目的地天气状况，当地最好吃的小吃，最有特色的酒吧，最新鲜的玩法，最佳风景的看点。系统可以自动向游客发送位置相关的实时信息和旅游服务信息，包括景点文本、图像和视频的介绍、景点游客拥挤程度、景点注意事项以及安全提醒等，并向游客提供景区信息查询，实时发送给游客。

平台使用垂直搜寻引擎对互联网上的信息进行搜索。垂直搜寻引擎基于网络爬虫技术、中文分词技术和Web信息抽取技术，实现景点的信息收集和结构化处理。为了更好地获取旅游景点信息，在搜索初期增加了信息过滤。修改网络位址的搜索优先级，并根据景点信息的类型特征对各个属性进行回填操作，提高了对景点特定信息抽取的准确率。构建了实时信息数据库，按照信息的相关属性进行数据库存储。从实时信息数据库中提取与目前使用者位置相关的实时信息，通过多种方式向游客发送。如果需要有关当地活动的建议，可以立即使用一键通功能与当地专家进行实时视频对话。

（4）位置服务，自助导游与救援系统

平台通过游客手机或平板计算机上的GPS模块获取信息，提取出使用者的经纬度、速度等，根据使用者位置与中心点的距离判断用户位置和景区边界点的关系，从而确定用户所属的景区。根据使用者的经纬度信息，在旅游信息服务中心的终端上准确地标示出用户的位置，并标出附近的旅游信息。

通过电子地图，游客可以很直观、很方便地查询旅游地的综合信息，定制旅游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的最佳旅游线路，并可以通过GPS系统进行语音实时导航；可以查看旅游目的地周边情况，包括景点、交通节点、酒店、商场等的位置；可以查询相关旅游企业的信息，包括地理位置、电话、联络人以及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等信息等；还可以配合旅游虚拟展示系统将旅游景点及服务设施节点加以虚拟重建，通过虚拟实境展示使游客更形象地了解当地的旅游风光、购物娱乐、餐饮住宿、交通情况等。通过自动定位向旅游者提供当地的旅游产品、交通、气候等文字、图片、影视信息。地图签到也是本平台的特色，可以方便地查看自己和目的地的位置，通过地理位置的定位寻找到自己的好友和感兴趣的朋友。同时不仅可以看到自己朋友所处的地点，也可以看到在此地点的其他游客，更能将自己所处的位置分享给朋友。在旅途中还可以随时发起实时活动邀请身边的人共同参与，相邀成行，共同评论，增加旅途乐趣。

平台也可在网站上设置相应的互动社区，开发移动电子商务交易系统，提供一个功能完善、信息丰富、互动交流、查询快捷、交易方便的移动电子商务综合型地方旅游网络。

同时，自助导游系统把每次更新位置时的GPS资料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实时记录旅游者的当前位置，建立野外旅游者的实时动态数据库，以此作为基础模块设计出旅游管理服务系统，结合路线图和自助导游两者功能实现管理总部和野外旅游成员的成员动态管理、实时通信、照片实时分享等功能。另外，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旅游管理服务系统的系统功能，提供沿途的一些商业服务信息，进而增加B2B或B2C等电子商务信息模块。

救援系统实现是指游客使用各种类型终端设备，通过互联网、电信网或广电网访问系统进行求助呼叫，可以依据游客终端能力，发送文本、图像、语音或视频信息，实时定位游客位置，接收并自动处理游客的求助、救援等信息，提供相应的救援。根据救援的紧急程度和突发事件的严重程度分为一般情况、紧急情况和危急情况，对分类后的求援信息进行存储和分发。

（5）分享旅游经历与社交平台

平台通过游记、拍照、视频、留言、漫画和轨迹追踪等，完整记录游客的旅行足迹，珍藏旅途中的点点滴滴。支持离线模式，无须担心手机流量。给相机照片添加位置信息，将数码相机照片上传到有轨迹追踪的行程中，会通过匹配照片的拍摄时间，自动给照片加上位置标签，再也不会忘记照片的拍摄地点了。

平台还可以自动将旅途足迹整理成精美游记，并能像电影一样在地图上动画重播。还能连接新浪微博等不同的网络载体，比如新闻、论坛、博客、电子杂志、圈群、贴吧等，把精彩内容同步到各种社交媒体上与朋友分享。这些不仅是游客的体验和感受，同时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参考与帮助。

结语

随着数字旅游时代的到来，一个注重游客个性体验的时代也随之而来。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收集信息方式、线路选择、出游时间选择、旅游范围以及旅游方式的选择上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旅游模式，而是更加趋于多样化、自主化和个性化，旅游消费行为更加注重便捷，旅游消费心理也越来越注重旅游过程的体验性。

海洋文化数字旅游平台的主要目标是吸引各类热爱海洋文化的潜在消费者，支持他们的决策以及鼓励他们返回。平台结构不是围绕旅游企业的经营业务或旅游目的地的行政职能，而是围绕网络旅游消费者的需求类型或行为过程，其信息量更大，信息更新速度更快，信息交互性更强，信息服务的定制化功能更突出。目前国内游客能有效地与旅游产品供应商互动的工具还不多，希望海洋文化数位旅游平台及其相关数据库分析为国内海洋旅游业的更新和规划提供一些启发和帮助。

（该文与陈刚合写，是2013年台湾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海洋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

增强现实技术在博物馆的运用

近年来，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作为一项引人注目的新兴技术，模糊了现实与计算机虚拟环境的界线，为博物馆的交互设计和观众体验带来新的契机。增强现实独特的实时交互，以及将环境与信息融合后反馈给观众，都符合传播知识、引发兴趣、激起好奇的教育心理学要求，把教育普及与娱乐休闲有机地结合起来。虚拟与现实的结合增加了展览的参与性和趣味性，为博物馆策展人开阔思路增加了很多亮点。增强现实的成本相对比较低，只要用摄像头取景即可获得信息，让人—机—环境更好地融合为一体。随着增强现实技术跟移动终端发展的结合，相信一个崭新的网络时代已经在向博物馆招手。虚实结合、高度交互性以及三维定位功能，将极大程度地调动观众参与的热情，提高对历史和科学的感知，还原互联网的真实感，让博物馆跟观众的互动联系更加密切。

什么是增强现实技术

所谓增强现实，是利用计算机生成的一种逼真的视、听、力、触和动等感觉的虚拟环境，是把使用者看到的真实画面，通过摄影机等设备，与计算机产生的虚拟画面实时结合，成为有各种补充信息的增强画面。真实的环境和虚拟的物体实时地叠加到了同一个画面或空间，在观众所视的现实环境中叠加了一个虚拟的场景，呈现出效果真实的新环境。

增强现实中的真实物体和虚拟物体与用户环境不仅无缝结合在一起，而且真实物体和虚拟物体之间还要进行互动，同步反映到虚拟的三维空间，实现真正的虚实之间的三维联系，形成新奇有趣的交互体验。

增强现实技术系统包括显示技术、跟踪定位技术、界面和可视化技术以及标定技术，是各种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延伸。跟踪定位技术与标定技术共同完成对位置与方位的检测，并将数据报告给增强现实系统，实现被跟踪对象在真实世界里的坐标与虚拟世界中的坐标统一，达到让虚拟物体与用户环境无缝结合的目标。为了生成准确定位，系统需要进行大量的标定，测量值包括相机参数、视域范围、传感器偏移、对象定位及变形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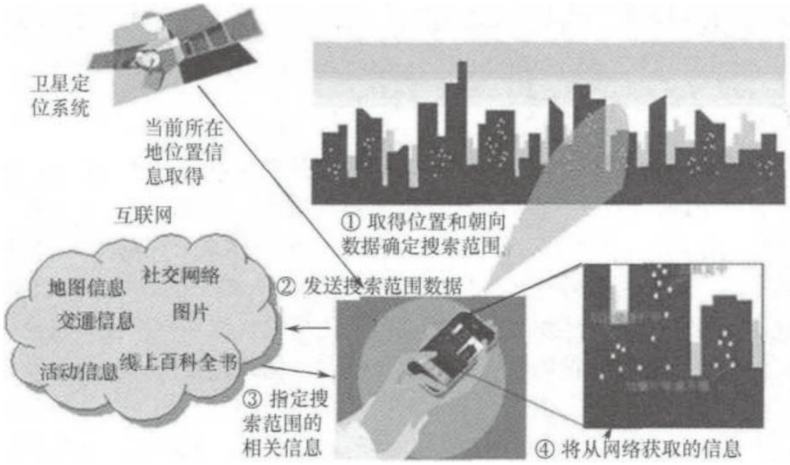


图1 增强现实原理示意图

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VR）是采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技术，生成逼真的视、听、触觉等一体化的虚拟环境，用户借助必要的设备以自然的方式与虚拟世界中的物体进行交互，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亲临真实环境的感受和体验。

根据虚拟现实技术对沉浸程度的高低和交互程度的不同，将虚拟现实系统划分成四种类型：沉浸式虚拟现实系统、桌面式虚拟现实系统、增强式虚拟现实系统、分布式虚拟现实系统。增强现实是虚拟现实的一种类型，或者说是在虚拟现实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计算机应用和人机交互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通过计算机实时计算场景，根据观众的需要把整个空间中所有的信息真实地提供给观众，观众可依自己的路线行走，计算机会产生相应的场景。虚拟现实强调的是虚拟世界给人的沉浸感，强调人能以自然方式与虚拟世界中的对象进行交互操作。增强现实系统致力于将计算机产生的虚拟环境与真实环境融为一体，增强观众对真实环境的理解，并不隔断观察者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联系。增强现实具有较低的硬件要求、更高的注册精度、更具真实感。增强现实系统能够增强观众对融合环境的感知，因而在博物馆这个应用领域里面，增强现实相比虚拟现实技术具有明显的感知优势。

近年，增强现实的搜索量已经超过虚拟现实，人们越来越关注包裹我们的信息空间。通过增强现实技术，使博物馆的观众在获取信息、相互认识和理解方式方面有了新的改变，可能这正是未来智慧博物馆发展的方向。

增强现实与博物馆

美国新媒体联盟出版的《地平线报告（博物馆版）》近年多次提醒博物馆关注增强现实技术，认为它是最有潜力改变博物馆发展的主流应用技术之一。增强现实技术通过对实时视频图像进行信息传输和处理，形成交互式的三维图像画面，给观众带来更真实的全新体验与感受，可以使博物馆越来越走向开放，为观众提供越来越多的个性化服务，帮助参观者用新的视角看待周围的世界。增强现实的关键特点是能够互动和回应用户，创建新的阐释层并覆盖我们以往的感官经验，这种能力为博物馆的教育发展提供了意义深远的潜在空间。增强现实的交互性特点使观众在博物馆的参观和学习充满互动、好奇和兴趣，从而构建新的理解并激活潜在的数据。动态进程、海量数据库及体量特殊、难以操作的物件，都能够以一定的比例和易于理解、操作的形式被引入参观者的个人空间。

展前宣传

洛杉矶自然史博物馆为庆祝建馆一百周年，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做展前宣传造势推广，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他们与Blippar公司合作出了4款不同的百年纪念海报和明信片，在博物馆、主要购物中心、学校和图书馆等处发布。当观众使用这款应用程序来处理图像时，能通过一项3D互动体验功能与霸王龙合影，并在网上分享照片。通过这种令人难忘的方式，积极推动与观众互动。同时，使用这款移动应用的观众还将获得博物馆门票的折扣优惠和一次抽奖机会。奖品包括博物馆纪念品和携家人免费参观博物馆的机会。大奖包括在博物馆过夜的体验，以及与三位朋友一起享受贵宾式的招待。

博物馆传统的信息推送方式包括海报、宣传栏、小册子等，只能出现在实体环境中，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某些信息如策展人诠释、观众评论、音/视频很难提供给观众。增强现实技术的信息推送服务则能将多媒体和富媒体的展览信息主动传递给潜在的观众，使博物馆的服务由被动型转为主动型，可以克服上述缺陷，为观众提供丰富、多样的信息。移动增强现实推送具备传统推送的现场性，同时还能提供一些现场不方便或无法提供的信息，保持信息的丰富、及时和有效，同时，这些移动增强现实推送基本上属于一键操作，简单易学，观众只要打开程序就能获得与环境相关的信息。

定位导引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新建博物馆的馆舍体量越来越大，动辄数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博物馆已经比比皆是。当代博物馆多为大开间的设计，功能布局分散，需要高效率的指引系统。随着电子地图技术和地理位置服务技术的发展，一些大型博物馆都开发了电子地图导航系统。如果

可以结合移动增强现实技术，能够为观众提供实时的路径指向，参观体验更加鲜活、生动。在移动环境中，观众所在位置与对象之间存在着相关性，通过获取观众和对象的位置数据，计算观众与对象的位置关系，可以生成指引信息。在移动增强现实技术中，指引信息被叠加到现场视频中，为观众提供实际指引，好似一名馆员在实体博物馆中为观众指路。指引可以采用文本形式，也可以采用2D/3D形式，在现场直接显示目标的方位。如果观众没有指定目标，可由系统自定义若干个目标，形成多条指引线路。

东京水族馆（The Sunshine Aquarium）和科技公司HAKUHODO Tokyo合作采用增强现实开发了一款应用程序，通过SLAM的定位功能，制作了虚拟导游小企鹅，用以完成对游客路线引导。这家水族馆处于东京闹市，七拐八拐的地形经常把游客绕晕，拿着地图也一头雾水的游客们屡屡抱怨。现在只要打开手机，下载一款名为“PenguinNavi”的应用程序，将手机显示屏对准眼前的真实世界，便看见一群憨态可掬的企鹅出现在了人行道或斑马线上。将冷冰冰的卫星导航，和我们熟悉、亲切的“带路”行为结合在一起，操作简单，又酷又温暖，保证观众不仅不会再迷路，还会一路笑到水族馆！当你走慢了时，企鹅还会停下来等等你，并向你招手催促呢！

甚至在寻找停车位置时，增强现实也能帮忙。当你把车停在博物馆的停车场里面，掏出手机启动一个移动应用，如Car Finder时，软件会记录下你的位置信息。之后，当你想在茫茫车海中寻找它时，这个移动应用会利用摄像头、卫星导航、指南针、陀螺仪等多个传感器把你引导至正确的位置。

展览讲解

博物馆观众通常都会花大量的时间使用手机拍照、给朋友发送短信和照片。因此，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可以把手机变成会讲故事的工具，给静态的展品赋予一种鲜活的生命力，丰富不同层面的知识传递。人们在博物馆不仅可以通过手机看到展厅位置、参观路线，还可以看到周围自己感兴趣的数据，读取到更多的信息，这些都有助于观众从一个新的维度来理解博物馆的馆藏及其周围的世界，并与之互动。

观众进了博物馆，通常都会读一下博物馆的宣传册。首页一般都有馆长的照片和致辞，用手机一扫，观众就可以看到馆长致辞的视频。通过手机的摄像头，可以看到宣传册里面对重点展品的诠释视频，了解到策展人的创作心路，以及著名评论家的点评等，富媒体与交互性的充分融合让观众更容易理解展览的内容。

近年国外许多博物馆都开始使用增强现实技术将静态图片变为动态的视频或者3D动画，如举办“终极恐龙展”（Ultimate Dinosaurs）的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举办“艺术生命展”（Lifb of Art）的盖蒂博物馆、加利福尼亚拉古纳海滩博物馆，利用增强现实系统Movablescreen展示古罗

马遗迹的荷兰考古学博物馆，以及尝试使用The McNay's Reality Check应用程序的玛克内夫人艺术博物馆。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在“和谐无间：诺玛·珍·考尔德伍德的穆斯林艺术品收藏展”（In Harmony：The Norma Jean Calderwood Collection of Islamic Art）中使用 Layar的增强现实图像识别技术，在实践中论证了各种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摄像头的不同功能，以及博物馆的低照明环境对图像识别的影响。

在香港国际艺术博览会上，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人间净土：走进敦煌莫高窟”展览，展示了一般人无法看到的敦煌壁画。当用户通过iPad屏幕，对准原本只展示壁画基本轮廓的墙面时，能够看到色彩更为丰富的、细节更加完整的敦煌壁画。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中国兵马俑”展览（China's Terracotta Warriors）使用了增强现实技术，显示更多针对展览特定部分的教育材料，增强了观众的参观互动体验。使用这款应用程序扫描六张提示牌，将在“现实空间”里显示3D的内容和视频。观众可以在真实的环境下从各种角度看到这些虚拟物品，拍照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增强现实是可将数据轻松附加到现实物体、设施和进程上的便捷途径，促进对关注对象深层含义的理解。目前绝大多数的工具都能通过使用者的实时掌控来增强体验。

例如，策展人可以利用增强现实把展览地点扩展到特定的虚拟领域。艺术家Will Pappenheimer通过增强现实软件Layar，设计了一个填充洛杉矶艺术博物馆间隙的展览。他让五颜六色的数字漏斗和演讲视频充斥博物馆的庭院和走廊，观众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看到这些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景象。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增强现实应用与“超越星球—太空探索的未来”展览组合呈现。观众无论何时只要发现11个遍布展览的增强现实图标中的任意一个，都能用自带设备的摄像头来开启3D动画。

这些被指明的目标物体的信息，或者来源于现有的“兴趣点”数据库，或者来源于策展人的创建。这些目标物体的信息，可以与博物馆的建筑物，以及一些无特征的空间，如广场和花园等各种现实对象联系在一起。通过影像分析和准确地在实际画面重叠相关信息，效果便可以进一步提升。拍下展厅一件文物的照片，并收到有关该藏品的出处和该藏品原主人生平的信息，然后显示该藏品的原貌，或模拟修复后的新貌等，甚至通过“X射线”功能“看”到藏品内层的结构，并和3D模型、视频以及数字说明内容产生交互。

一些博物馆还利用语音识别技术和图像合成技术，把观众与计算机中的讲解员合成到一个场景中，实现讲解员与观众之间的问答，犹如真人导引介绍，非常能够吸引观众。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制造现代世界”展览开发了一个增强现实的应用程序来辅助展览，BBC电视台名人、世界著名汽车电视节目主持人詹姆斯·梅（James May）作为虚拟导览员来讲解展览，展示了增强现实的神奇

魅力，在互动性表现上也有很大提升。虚拟导览员不仅可以在移动终端的屏幕上向参观者致意，还可以逐一介绍著名馆藏、参观路线、文创产品以及各种信息服务。

再现历史原貌

在与历史文化遗迹有关的移动增强现实应用中，“增强旅行”（Augmented Walking Tour）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增强旅行可以让观众在参观历史文化遗迹的同时直接从云数据库中调用相关资料，如照片、历史记录、录音、视频等。博物馆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收藏机构，其价值的发挥有赖于资源的最大化应用，移动增强现实技术为馆藏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以馆藏资源“增强”实体对象。

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通过和旅游局的合作开展了一项名为ARTours的增强旅行活动。在荷兰的著名历史景点，观众能够通过手机实时查看由博物馆提供的历史照片、绘画作品等信息，并提供丰富的背景信息介绍。在古代建筑遗址前，观众可以观看使用仿真技术修复的古建筑的原貌，查看古建筑的相关历史信息。同时，观众留言和标注功能增强了交互性，观众可以互相查看评论和网络外部资源并进行交流，增强了学习效果。融合了虚拟与现实的增强现实手段为观众带来了深刻的感受，有利于知识的记忆和理解。

伦敦博物馆的StreetMuseum移动应用也是一个成功的早期经典案例，观众游走在伦敦街头就能欣赏与之相关的丰富艺术和摄影作品，享受穿越时空的奇妙体验。程序启动后，首先确定你当前所在的位置，然后显示出你周边的相关景点。选择相关景点，就会弹出一个小对话框显示出具体位置以及相关作品的作者和创作时间。单击右方的蓝色箭头就能看到实际作品。在浏览界面还可以查阅作品的相关详细信息或放大查看细节。最有趣的是程序所支持的3D浏览效果。当你站在艺术品相关地点后，启动3D浏览，程序将会自动识别你所在的位置，并根据环境中的建筑物将艺术品与实际场景叠加在一起，在手机上欣赏这一地区曾在历史各个时期所发生过的事件、人物、故事、图片等各种资料。观众可以在3D历史和现实场景之间穿行，房屋、街道、高楼、深巷，都在此时变身为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博物馆。

澳大利亚悉尼动力博物馆利用增强现实技术开发的手机应用Around Sydney也很有趣。观众在悉尼参观旅游时，可以在手机里面看到同一地点和建筑一百年前的叠加影像。即使不在悉尼，也可以通过在手机上输入经纬度来获取准确地址，感受此地址百年前的风貌。他们还准备进一步改进，实现可以在同一地址看到现代艺术家不同摄影作品的叠加影像，甚至引入一些游戏的元素，增强该项目的娱乐性。

由英国约克市议会支持制作的“约克市全息之旅”应用程序（City of York Hologram Tour）为使用智能手机的游客提供娱乐和教育服务。安装此程序后，将手机对准某个特定景点，一个穿戏服的

演员就会出现在屏幕上，并在一分半钟内表演一出有关历史的喜剧，还可以跟这个虚拟人物合影留念。这款应用程序一开始指引游客到约克博物馆，利用馆内免费的无线网络下载完整的应用程序，而无须损耗话费套餐内的数据流量。通过这款应用可以在这座古老的城市内为游客创造一种数字体验，尤其是生于数字时代的年轻一代。目前正在开发声音控制技术，还将在城市中设置标识表明此处有全息图像。例如在约克市巧克力手工作坊景点外，放置一个巧克力大亨的全息图像标识，提醒游客使用此款应用了解景点的信息。

提高参观质量加深与藏品互动

增强现实技术让观众在参观藏品的同时，通过在藏品周围叠加数字图片、在线学习资料以及博物馆相关学术信息，丰富了观众的信息来源，提升了观众的学习体验。增强现实技术让整个参观过程更有交互性，观众通过查看相关元数据、图片、视频和相关深度阅读，建立了一种以探究为基础的学习模式，加深了对藏品的理解。

增强现实不仅可以辨认图形特征，也可辨认物体外形以作为触发增强现实内容的载体。例如，可以使展馆中的花瓶、石膏像等物品也能够形成触发，以调取想要转换的内容。观众利用手机的照相功能还可以测量展品的长度，可以自动对焦检测分辨率及缩放比例；支持公制、英制等单位的转换；随时随地测量身边任何物品的长度、宽度、角度和面积等。每次想要量东西，不用四处找尺，只要拿出手机就搞定了！

解说词如果是不同的文字，也可以通过增强现实技术进行不同文字的翻译。美国Quest Visual公司于2010年年底开发了一款使用增强现实技术的光学字符识别（OCR）翻译软件“Word Lens”。观众只要将摄像头对准要识别的文字（可以是图书、杂志、菜单、路标等），手机屏幕上马上就会浮现翻译之后的语言文字。“Word Lens”包含了识别、翻译、替代的功能，使用非常简便，它利用OCR技术识别文字，再通过字典进行查找翻译，然后使用AR技术将翻译过的文字覆盖在原有文字上，而摄像头对着的场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目前该软件仅支持英文与西班牙文、法文和德文等少数几种语言的互译。可以想见，如果开发一款简化字与繁体字（甚至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互相转换的增强现实移动程序，也将为年轻一代完全不懂繁体字和其他古文字的观众带来极大的便利。如果更进一步，除了翻译功能，还能实时显示博物馆推荐的相关馆藏学术资源，观众不仅能够在手机上浏览与保存这些馆藏资源，还能够将推送结果发送到指定的电子邮箱或者社交网络平台与其他人分享内容，不仅能够帮助观众理解参观内容，还可以高效率地扩展学习资源。

事实上，国外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利用增强现实帮助学习和研究古代文献资料，在保护古籍的同时，让观众充分接触到原始文献，并附加展示丰富的网络资料，提高学习和研究古文献或特种版本的兴趣，同时保护古文献不因频繁使用而受损。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约翰·里兰兹大学图书馆联合

建立了一个“利用增强现实技术促进对特藏的研究和教学”项目，在查阅中世纪的手稿、标志性版本和文献档案原稿时，可以突破原稿保护的限制，在原稿周围显示数字图片、文本、在线学习资料以及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机构收藏的相关资料，读者也可以对数字版进行“翻页”、放大肉眼看不到的细节、聆听中古英语朗读、查找元数据、阅读其他文献、与其他资料对照。这些对我们博物馆今后的发展都是一种有益的借鉴。

提升阅读体验

假设你正在阅读一本在博物馆买的书籍，将手机摄像头对着图书的封面和内页进行扫描，手机屏幕上就会出现视觉和互动元素，书中引人入胜的故事突然在眼前真实发生，如平面模型变成可操控的3D模型，平面地图变成可转动的地球仪，恐龙从书上站起来并缓缓走动，可以操控主人公的赛车，等等。看起来只是一本普通的书，但在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却是3D人物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这将改变传统的阅读方式，结合增强现实场景、三维模型等与现实世界创建的博物馆读物为观众，尤其是孩子们，带来身临其境般的沉浸式体验，赋予了观众一种额外的体验过程。

增强现实技术集合文字、图片、三维动画、声音、视频、互动游戏等多种信息传达，为数字出版和博物馆教育提供了更丰富的载体，增强了书本的可参与性，使知识与信息能够更有效地被观众接受和吸收。读者的身份由阅读者变为表演者，置身于离奇的情节当中，体验各种奇妙的经历，享受更多的感官体验，超越现实，而又处在真实的环境中。

博物馆可以根据各自馆藏和宣传需要自行开发增强现实的图书，应用到博物馆有特色的阅读推广活动中，如观众们可以看到一名虚拟导览员出现在绘本书上，聆听讲解员为他们绘声绘色地讲故事。使用手机识别图书上的标记，就能观看虚拟的三维场景，享受到虚实融合的立体阅读体验。

应用增强现实技术的多媒体图书，突破了原有图书的内容和形式的限制，借助手机等终端设备，不仅具有丰富多样的信息表现形式，还扩展性地为观众提供了实时获取互联网相关数字的资源。随着制作成本的降低和技术的成熟，这项技术应用在博物馆教育领域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

文创产品开发与推广

利用增强现实技术也可以促进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趣味性，可以让任何普通的平面图片动起来，把门票、海报、宣传册，甚至交通卡通过手机识别后转换为跟博物馆推广主题有关的趣味动画的应用，等等。

同样的原理如果应用在文创产品上，也会带来视听触的全面感官体验。通过移动设备的摄像头，对着指定的平面图像（玩具、海报、杂志、包装盒等）轻松一扫，便能触发精彩的视频，还可以跟酷炫的3D动画模型进行互动，玩味无穷。一个简单的图画跳出了平面的限制，变得“活"起

来，成为三维立体的形象，有动作，有声音，还能互动，创造了集视觉、触觉、听觉于一体的多感空间。小朋友一定抢着把有增强现实图案的产品带回家。

增强现实技术可以巧妙地把虚拟物体或者虚拟人物（例如著名博物馆学家）跟拍照留念结合在一起，帮助观众提高在博物馆体验的趣味性，分享后容易引起更多朋友的关注。观众可以轻松通过移动设备的触摸屏对图片内出现的物体进行旋转、调整大小、修正等精细操作，让各种虚拟角色与现实中的文创产品进行互动。观众还可以把增强现实画面保存，通过社交网络和电子邮件与朋友分享，或是制成电子贺卡，或者做成增强现实相册，留作纪念，并且与朋友分享。

Zapper开发的印有迪士尼动画的T恤，打开手机应用程序，就可以看到米奇在衣服上跳动。还有两款网帽，分别印刷有“我是奥巴马”和“我是罗姆尼”字样。手机对准戴帽子的人，就可以看到奥巴马和罗姆尼的虚拟卡通形象，消费者可以用这两个卡通人物来模仿美国总统候选人做演讲并分享给好友。消费者既可以买一件在现实生活中美观实用的文创产品，又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得到乐趣，或者这就是未来增强现实技术和博物馆文创产品结合的发展趋势。

分享和数据统计功能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随时随地都有沟通的欲望，喜欢发表对某事物的看法和意见，跟好朋友一起分享喜怒哀乐，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或者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利用增强现实可以建立基于手机和定位的在线交流，可以在随时随地发表言论，分享信息，建立朋友关系，把自己的感想传播给更多的人群。

通过增强现实技术，还可于手机端收集观众各种操作行为，收集海量的传感数据并进行自动化统计归档。这些数据可以用于互动内容的二次更新，也可以对使用效果与读者体验效果进行科学分析和过滤，建立属于博物馆自己的观众数据库，可用来将现实世界与海量的相关在线信息联系在一起，满足后续阶段策划、立项的数据支撑。

结论

现在人们的生活正越来越数字化，我们周围的信息也正日益与情境相关，并能够被快捷地获取。适应这一趋势，未来的博物馆面临与日益增长的海量信息进行互动，并期待移动科技能够为博物馆的观众带来更加直观与便利的感受。

通过增强现实以及其他正在研发的科技手段，博物馆与数码世界的互动以及与观众的互动将会变得更加完整及灵活，增强观众对科技的感知，尤其是青少年观众，不仅可以增强他们学习的自主性，也会改变他们习惯的学习方式。通过互动的学习界面和生动形象的创新模式，让孩子们身临其

境，具备丰富的知识性和教育性的同时，还能激发孩子的学习积极性，让孩子在有趣的游戏里边玩边学，将被动学习变为集合“视、听、说、触、思”的全感官主动学习，充分调动想象力，达成自主理解，提高学习效果。

增强现实技术透过移动设备的摄像头，观众可以看见虚拟的物体在自己的手中跳动，虚实结合的强烈沉浸感完美实现了虚拟与现实结合，感受到身临其境的奇妙体验。在这样的过程中，参观和学习将变得更有趣，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

增强现实不仅仅是一种商业展示手段，更多的是一种各种资源的聚合链接。增强现实技术的实现需要硬件与软件两方面的持续创新，其结果将会使观众与移动终端的互动形式产生难以置信的改变。借助声音、手势以及其他多种输入方式并结合全新的无缝信息浏览方式，可以满足观众在现实世界中真实地感受虚拟空间中模拟的事物，增强参观游览的趣味性和互动性，为博物馆的观众带来更为强烈的感受和体验。

（原载2015年北京数字博物馆研讨会《博物馆的数字化之路》，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

虚拟触觉让藏品“触手可及”

触觉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本感知之一，是人类与世界直接交互的首要通道。目前，虚拟实境技术虽然已经能够在博物馆中建立惟妙惟肖的三维视觉环境，但是依然不能满足观众日益高涨的互动体验需求。观众对博物馆藏品“可望而不可即”的现状非常不满，很渴望能在看到藏品的同时，还能够触摸到藏品，感知藏品的软硬、纹理、粗糙度和柔韧性等其他非视觉信息，更深层次地理解藏品的内涵。

什么是虚拟触觉技术

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虚拟触觉技术应运而生，它可以让观众触摸博物馆“藏品”，让藏品变得触手可及。

虚拟触觉技术属于计算机、机械、测控、力学、心理学和认知学等多学科交叉领域，能让人们在通过触摸、按压或牵扯等动作操作虚拟物体时，不仅能看到虚拟物体的逼真变形，而且能感受到虚拟物体的逼真触感，感知到虚拟物体的力学物理属性。

在博物馆互动体验中，这种技术的革命性在于把指令式人机互动变成了触觉式人机互动，使得观众可以“真实地”触摸到平时不可能触摸的藏品。在视觉、触觉、人脑记忆和构想的综合作用下，观众能触摸和操控“藏品”，给人们提供前所未有的交互体验。

虚拟触觉技术填补了目前国内外博物馆触觉感知藏品的空白，可以让观众通过触觉认知和感受藏品，对藏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可以极大地增强博物馆展览的互动性、沉浸性、构想性和乐趣性，满足观众触觉感知藏品的需求，增强博物馆的综合竞争力。

面向博物馆互动体验的虚拟触觉技术研发和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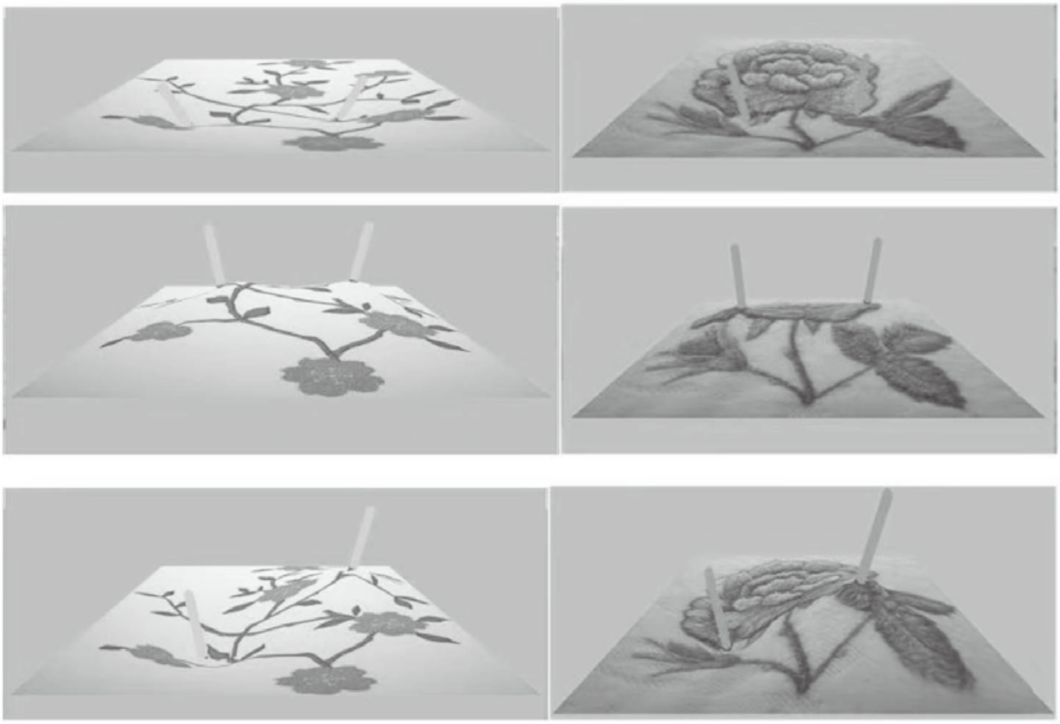


图1 虚拟织物的实时形变和触觉感知

在国家863计划（2013AA013703）、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61332017）、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LY14F020048）资助下，浙江理工大学虚拟实境实验室和上海尚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致力于虚拟触觉技术在国内外博物馆互动体验的研究和推广应用，目前已创新研发出我国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图像触觉感知系统，其核心技术包括基于质子弹簧模型的柔性纹理图像力触觉生成方法，基于质子弹簧模型的柔性纹理图像力触觉生成方法，双交互触点力触觉生成方法，基于五要素的刚性纹理图像力触觉生成方法等。

图像触觉感知系统可以实现图像的形状、纹理和柔性等多模式感知，突破了以往图像只能视觉感知的界限，使得图像不仅能看得见，还能摸得到。此系统能够广泛应用于博物馆的互动体验、文化传承与传播、视力障碍患者（盲人）的学习、教育、影视、军事、游戏娱乐等领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前景广阔。

虚拟织物的触觉感知，如图1所示，展示了图像触觉感知系统的功能。用户可以用两个手指操作和感知虚拟织物，在触摸、按压或牵扯虚拟织物时，既能观察到虚拟织物的逼真变形，又能感受到虚拟织物的手感，体验逼真的虚拟织物触摸过程。同理，应用于博物馆的互动体验，观众可以“隔空”感受古代织物的纹理和质地，甚至可以亲手触摸古代皇帝所穿龙袍的缂丝织绣纹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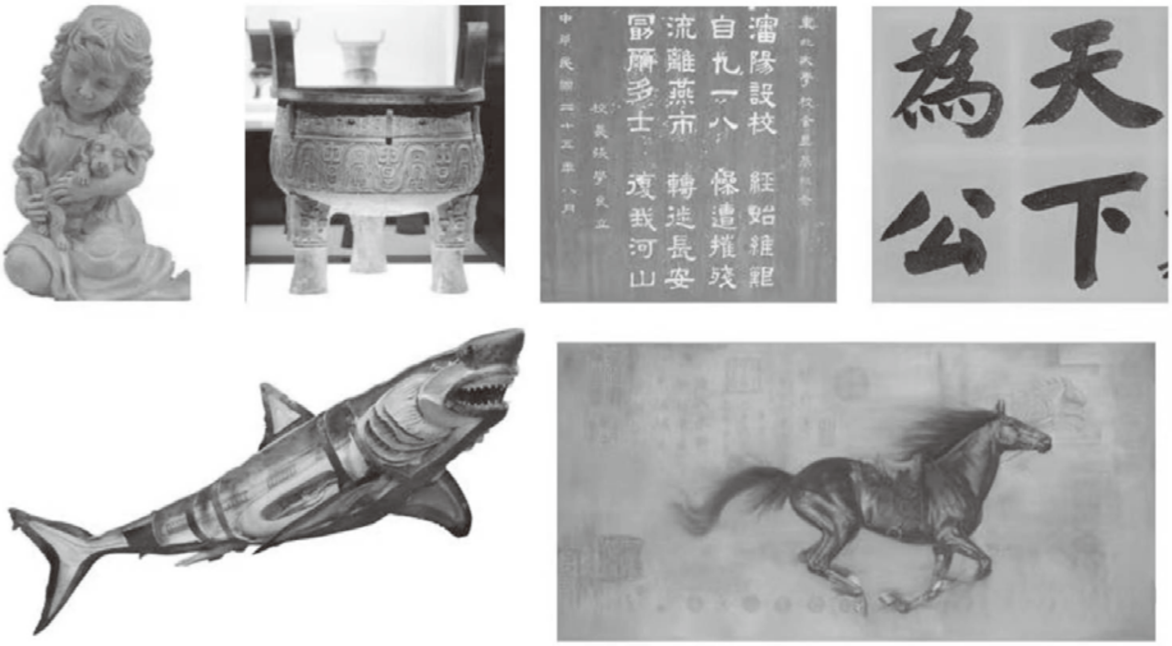


图2　图像触觉感知系统可以触觉感知多种博物馆藏品

当然，图像触觉感知系统也可以感知博物馆各种各样的藏品，如碑刻的雄健粗犷、雕塑的刚劲柔滑、铜鼎的神秘纹饰、油画的气韵笔触、书法和国画的艺术美等，如图2所示。图像触觉感知系统具有良好的实时性、通用性和稳定性。

在2014年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博博会）上，上海尚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展出了图像触觉感知系统，如图3所示，系国内首次将虚拟触觉技术应用于博物馆的互动体验。在2015年科普场馆主题展览高峰论坛上，参会者不仅能视觉感知大连金石滩生命奥秘博物馆的鲨鱼，也能通过图像触觉感知系统触摸到“鲨鱼”，如图3所示，受到参会者的认可和好评。

2014年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图左）2015年科普场馆主题展览高峰论坛（图右）



图3　图像触觉感知系统在博物馆的推广和应用

虚拟触觉技术在博物馆的需求和应用

首先，虚拟触觉可以保护藏品和缓解博物馆与观众之间近乎不可调和的矛盾。

目前，博物馆大都将藏品锁在玻璃展柜里，或展览在护栏后面，或展览在昏暗的灯光下。太多的“请勿触摸”警示性标识和隔离线，让观众无法近距离观看和感受藏品，感受不到藏品应有的知识和文化内涵，损害了观众与藏品的交流，降低了参观的乐趣。然而，触觉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感知和心灵体验，是观众与藏品之间必不可少的认知、交流和互动的途径。观众出于本能或者好奇心，仍然想方设法地去触摸自己喜欢的藏品，时常发生藏品被毁损的现象，让博物馆心疼不已。

虚拟触觉技术可以极大缓解目前这种近乎不可调和的矛盾，有效地保护藏品。对博物馆而言，虚拟触觉既能够拉近观众与藏品之间的距离，又能够保护藏品不受毁损，给观众创造亲手触摸“藏品”的机会和条件，让观众亲身触摸“藏品”，体验和感受藏品内在的文化底蕴，享受与藏品互动的愉悦。

其次，虚拟触觉可以给博物馆与视力障碍观众之间这条近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架起桥梁。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3.14亿视力障碍者，其中4,500万为盲人。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至2010年末，我国有1,263万视力残疾人。2014年我国盲人数量为661万人，是世界上盲人最多的国家，而且几乎每分钟就会出现一例新的盲人。虽然，目前国内外很多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但是一条无形的鸿沟却将视力障碍观众拒之于博物馆之外。这条鸿沟就是绝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是不让触摸的，然而，触觉近乎是盲人感知藏品的唯一选择。

对于盲人而言，虚拟触摸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深刻认知博物馆藏品，拓宽与世界的接触范围，提升审美情趣和愉悦身心，起到增强自信心和心理治疗等作用。因此，虚拟触觉技术也使得为盲人建立实体或虚拟的博物馆成为可能。

第三，虚拟触觉给观众提供一个全新的互动体验，可以提高博物馆展览的互动性、沉浸性和趣味性。

博物馆在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藏品的同时，要重视观众的触觉体验。虚拟触觉能够弥补观众在博物馆参观过程中的触觉缺失，整合观众对真实世界的触觉记忆，充分调动观众的各种感知通道，把触觉、视觉、记忆和构想有效地结合起来，激发出观众对博物馆藏品更为浓厚的兴趣。

虚拟触觉可以呈现出藏品的软硬、柔性、刚性、光滑或粗糙等多种物理属性。观众通过虚拟触觉与藏品互动，使得原本冷冰冰的藏品有了丰满的触觉、想象力和生命力。丰富的触觉感知互动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藏品展示方式、一种全新的藏品互动世界。

第四，虚拟触觉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有助于博物馆藏品的推广和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虚拟触觉是信息科学的最新成果之一，是数字化时代的最新产物之一。把博物馆藏品进行数字

化，通过网络进行跨时空的传播，人们以拟在的方式与远程藏品进行触觉交互，实现了跨时空的心理感受，形成了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体验。进而，虚拟触摸传递藏品的文化内涵，传扬历史文明，促进文化的有效传播。

此外，虚拟触觉在考古、藏品鉴定收藏的教学和训练中，也能发挥出独特的技术优势，使得训练更加真实，操作更加逼真，教学更加高效，同时没有任何风险。

结语

未来博物馆的发展肯定离不开互动体验，大家都会日益重视互动体验营销在吸引观众方面的作用。虚拟触觉是一种增强观众互动体验的有效方法，必将给博物馆带来新的展示方式和竞争优势，必将对博物馆行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该文与杨文珍合写，原载《中国文物报》2015年11月20日）

虚拟嗅觉技术——唤醒历史的记忆

新兴技术的创新可谓日新月异，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给博物馆的发展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目前在博物馆互动体验中，广泛应用的声、光、电、影等技术，已经可以让参观者通过视觉和听觉感知文物和历史。然而，参观者还无法通过嗅觉感知文物的气味。气味是文物藏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仅真实记录了事物的本身，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还可以把观众的思绪带到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激发埋藏在深处的记忆。

虚拟嗅觉技术让观众在看到文物的同时，闻到文物的逼真气味，从而对文物产生更深层次的感受和理解，弥补目前国内外嗅觉感知文物的缺失，增强博物馆展览的感知性、沉浸性、交互性和构想性，满足观众对博物馆文物多种感知交互体验的需求。

什么是虚拟嗅觉技术

虚拟嗅觉技术是指人们与虚拟环境的人机交互过程中，虚拟环境可让人们闻到逼真的气味，使人们沉浸在此环境中，并能与此环境直接进行自然的互动及产生联想。

虚拟嗅觉技术可广泛应用于工业、医学、教育、娱乐、生活和军事等领域，发挥着其他感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军事领域，通过模拟战争的“气味环境”模拟器训练新兵，可以让新兵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味道，使新兵能更快地适应实战环境。在电影领域，气味电影院可以让观众根据影片中的不同画面闻到不同的气味，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全新体验。在游戏领域，可以根据游戏情节模拟游戏环境中的气味。

博物馆互动体验中的虚拟嗅觉技术研发

在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浙江理工大学虚拟现实实验室和上海尚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致力于虚拟嗅觉技术在国内外博物馆互动体验的研究和推广应用，目前已创新研发出我国具有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多款虚拟嗅觉生成装置。

凸轮分度式香味生成装置（国家发明专利号 ZL201210333282.8）。此装置包括转盘凸轮机构、香

味混合输出机构、精油混合稀释机构、香味清洗机构、端盖、外壳和底座等，采用了转盘加内嵌式凸轮机构，可实现多种气体的混合输出，设计了曲柄连杆机构和活塞的配合，既有利于密封，又容易进行香味的输出，香味清洗机构便于气体散发后残留气体的清除。

电磁阀式香味生成装置，包括八个结构相同的香味散发装置、香味混成装置、槽形基座和气泵等，采用超声波雾化的方法，使香水滴更小，使香味喷出的效果更佳，采用了混合气管，可以呈现单一香味或者多种香味的混合，也能够适时清除残余的香味。

步进电机驱动式虚拟嗅觉气味生成装置，已授权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2012103333 00.2），国家发明专利已公告（公告号 CN1039269　41A）。此装置包括定向送气机构、定量排气机构和外壳，可以实现三种气味的生成和传输，为虚拟嗅觉感知的人机交互提供硬件支持。

在由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主办，大连自然博物馆、大连金石滩生命奥秘博物馆承办，科技馆论坛协办的2015年科普场馆主题展览高峰论坛中，上海尚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展示了步进电机驱动式虚拟嗅觉气味生成装置，系国内首次将虚拟嗅觉技术应用于博物馆互动体验，受到参会者的认可和好评。

虚拟嗅觉技术在博物馆的需求和应用

首先，虚拟嗅觉可以传承和传播中华独特的香道文化精髓。中国自古非常注重香道，宫廷中用焚香来显示庄严和礼遇，并写进制度；权贵将奇香作为炫耀的资本，用以互相攀比；文人则将焚香视作优雅生活的标志。然而，目前在博物馆展出的中国古代香料，与观众是完全隔离的，观众只能看到香料的形状，无法闻到香料的气味。

其次，虚拟嗅觉可以唤醒历史的记忆。每一种文物的气味都代表了不同的历史记忆，气味的记忆与人的感受有着强烈的联系，其效果应该与照片、视频及其他记忆一样强烈。近年考古发现了很多跟香薰有关的文物，如各种熏炉及其香料，反映了古代焚香弄琴、宴乐歌舞的风雅生活。如果配上虚拟的香气，可以让观众跨越时空，既可以悠然于书斋琴房，又可缥缈于庙宇神坛，体验那种“博山虽冷香犹存”的文化内涵，让人参之不尽、悟之深刻。例如西安首次发现金代墓葬随葬品中的古代盛酒器具梅瓶中的清澈液体，专家推测里面装的是当时的酒水。八百年前的酒水是什么味道?遗憾的是没有人知道。如果可以利用从液体中萃取的香料，采用古代酿酒业所使用的相同工艺，复原出相应的酒香，让观众闻到沁人心脾的酒香，把这些考古发现完整地展现出来，让观众看到真实的历史原貌，激发观众的想象力，揭示埋藏文物深处的人文内涵。

再次，嗅觉可以提高博物馆的宣传力度，让观众感到好奇和惊喜，更加吸引观众的兴趣。如果博物馆有一个沉香展，广告屏不仅显示出精美的沉香藏品图片，观众在屏幕的不同位置还能闻到淡淡

的幽香，从气味强度的真实变化，感受嗅觉所蕴含的精神气象，似有若无，氤氲流荡，体会超越有形世界的美感。虚拟嗅觉的宣传可以引起观众对博物馆展览的注意力，让更多的潜在观众产生极大的参观冲动。

最后，虚拟嗅觉可以提升博物馆的竞争力。目前我国各类博物馆的数量越来越多，有的城市就有上百家大小不同的博物馆，彼此竞争也很激烈。如果采用虚拟嗅觉这种新兴技术，可以让观众感受到冷冰冰的文物藏品自身所蕴藏的生命馨香，体会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及其昭示的内在品格，同时也让博物馆的展览脱颖而出，提高在业界的竞争能力。

虚拟嗅觉技术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属于计算机、机械、测控、心理学和认知学等多学科交叉领域，具有很强的技术综合性。虚拟嗅觉应该实现气味从无到有、从有到变、从变又到无的完整循环体系，且具有便携性、交互性、实时性和集成性等特点。

虚拟嗅觉在博物馆的应用要考虑参观者的心理和生理因素，注意嗅觉与其他感知的融合，使得参观者能够更全面、更自然地感知文物，获得更强烈的存在感和真实感。

（该文与杨文珍合写，原载《中国文物报》2015年9月8日）

虚拟现实技术在水下考古的应用前景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主要是在给定的环境条件下构建相应的数字模型以及场景，利用数据接收、转换模型编辑器、生成器，接收各种常见的三维描述数据、计算机文件，并将其转换为数字模型驱动引擎（三维引擎）可以使用的数据，建立数据接收、转换编辑器、数字模型驱动引擎和综合浏览平台。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虚拟现实技术在水下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前景。

虚拟现实与水下考古的三维记录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在水下考古现场进行以点面相结合的数据采集，使用全站仪等设备实现水下探方平面图及遗迹平剖面图的一体测绘，逐点进行测量，获取三维坐标，再将数据传输到电脑上，编辑成图，获取逐点或逐面采集的空间坐标及其属性。然后通过航拍和数码摄像来获取两方面的数据信息。之后可以对考古材料进行整理，构建地层、地形、图形库、材质库；其次是抽取遗迹、出土物的形态数据，生成对象的数字模型，并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组合三维模型群和其他数据集合（文字、音视频数据等），按照贴近实际的效果完成表面渲染，确定灯光、范围、方位、运动模式等场景数据；最后在浏览器中，利用三维引擎展示所复原构建的遗址场景。

虚拟现实与水下考古的三维重现

虚拟现实所建立的虚拟环境是由基于真实数据建立的数字模型组合而成的，可以按照考古发掘项目设计的标准和要求建立逼真的三维场景，对发掘对象和过程进行真实的再现。用户在三维场景中任意漫游，人机交互，这样很多不易察觉的问题和缺陷能够轻易地被发现，减少由于事先规划不周全而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损失与遗憾，大大提高了水下考古发掘的评估质量。

动态环境建模技术的目的是获取实际环境的三维数据，并根据应用的需要，利用获取的三维数据建立相应的虚拟环境模型。三维数据的获取可以采用CAD技术（有规则的环境），而更多的环境则需要采用非接触式的视觉建模技术，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有效地提高数据获取的效率。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可以重建一些水下历史文化遗址。不仅可以根据残缺部件进行遗址遗物的“修复”仿

真，还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结合空间信息数据对古代水下遗址进行虚拟恢复，再现了古代的城市布局景象。同时也可对水下古迹进行虚拟现实仿真，为文物部门提供宝贵的数字化资料。

虚拟现实与水下考古的三维传播

虚拟现实在水下考古遗址的三维复原方面，可以帮助学术研究的深入以及历史遗存的数字保护和水下考古的推广。媒体单纯的文字叙述已经不能吸引人的眼球，现场录像也不能还原历史演变过程。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水下考古三维复原能带给公众一个完整、可视、有兴趣的视觉冲击力，比如水下考古发掘的进程、遗址或沉船的历史堆积过程。这样可以增加考古发掘的可看性和娱乐性，便于公众接受。它不仅将丰富考古成果与科学技术形式相互渗透，同时也将艺术手段运用其中，增强了娱乐性和形象性，使公众更容易接受。这不仅是一个最新成果的研究展示平台，也是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虚拟现实所特有的视听触觉会超越了语言、文字和视频图像的局限，将成为各国水下考古学界用来传达信息的最佳工具。

虚拟现实与仿真技术在水下考古安全作业方面的作用

由于水下环境的恶劣、复杂和不可预知性，如果直接进行水下考古实验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资源和代价，或需要冒较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利用系统仿真、建模的方法，建立能充分代表水下考古系统的仿真模型，通过计算机仿真手段对该系统模型进行充分的仿真运行和仿真试验，模仿实际系统的运行情况，对仿真过程进行观察，就好像是人们处于真实的水下考古发掘的虚拟环境中一样。同时，能够节省资金、减少人力投入和缩短研制周期，是传统水下考古试验阶段之前的一种科学、经济、有效的仿真验证手段。因此，建立虚拟仿真系统对于水下数字考古的开发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虚拟现实与水下机器人

利用机器人进行水下考古探测近年已经有很多案例，如2013年福建古田翠屏湖的水下古城遗址考古探查，2014年安徽黄山太平湖三处明清遗址的探查。虚拟现实技术作为可视化工具在机器人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在机器人学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为遥操作界面，可以应用于半自主式操作；作为机器视觉中自动目标识别和三维场景表示的直观表达；建立具有真实感的多传感器融合系统仿真平台。主要仿真的传感器是超声传感器，模拟在水下不同深度和温度

情况下的超声行为。在这个工作中系统地总结和研究了传感器可视化仿真的方法。虚拟现实技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得益于许多机器人技术，例如传感器技术。反过来虚拟现实技术又为机器人领域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技术手段。

虚拟现实与水下考古的教学

虚拟现实技术在水下考古教学中的应用是通过虚拟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可以模拟显现抽象的或在现实中存在的、但在课堂教学环境下用别的方法很难做到或者要花费很大的代价才能显现的各种事物，供学生学习和探索。这样既可以缩短实验的时间，又可以获得直观、真实的效果，还能对水下考古的操作过程进行仿真实训，避免真实实验操作带来的各种危险。比如在教授水下各种自然现象的形成和发展的内容时，由于大多数的自然现象都有时间性，或者是转瞬即逝，或者是非常漫长，学生很难实际观察到，用电影或录像的手段也显然不行。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使学生在一堂课的时间里非常逼真地观察到自然界在几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将海洋、湖泊、山川、河流等相关地形地貌信息建成模型库，再通过虚拟现实系统的人机对话工具，使得受教育者通过一次次足不出户的虚拟经历就能亲身领略祖国山川河流的壮美，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得到巨大的美的感受和启迪，从而将枯燥的书本知识以更有效率的个人亲身体验的方式转化为受教育者所掌握的知识。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各种水下地形地貌的模型库建设好之后，可以被反复使用，理论上永不损坏；再加之网络技术的使用及迅速普及，也为多用户同时使用某个模型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为水下考古教学方式的改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手段。

虚拟现实技术作为水下考古研究重要的技术层次支撑，是未来水下考古和遗产保护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如何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实现水下考古技术的数字化，建立水下数字考古技术的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建立一个科学、精密和综合的水下考古现场虚拟展示技术研究平台，将是未来水下考古重要的研究领域。

（原载《中国文物报》2015年7月24日版文博技术产品专刊）

展品点交工作的数字化尝试

依托于展品，精心策划与布置的展览给观众带去知识与视觉的享受。展品是展览的核心。如今馆际展览日益兴盛，频繁的展品流动增加了展品安全的风险。厘清安全责任成为展品流动诸环节中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直以来，通过文字和照片详细记录展品的状况，以之作为判断展品是否出现新变化的依据。问题在于，文字记录无法精确。清晰的图片是目前最好的记录方式。实际工作中，绝大部分博物馆采用纸版表格配合照片的方式。

但是，目前采用的方式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文字记录与图片无法整合。纸版表格一般均为A4篇幅，所容纳的图片数量有限。同时，纸版表格均为提前编制，所用只能是之前的旧图片。

（2）纸版表格信息无法电子化，不利于信息的积累。关于展品状况的信息，包括每一次点交信息都是值得记录的内容。但是，传统的纸版表格不利于信息的及时记录，因此大量的信息在事后被忽略。

为解决上述问题，利用当前高度发达的移动互联网技术与智能终端设备，针对博物馆展品点交工作的需求，我们联合开发国内首个专业的文物点交软件，努力为文物点交工作带来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一个人与一台智能终端设备即可完成以往需要很多人参与的工作，而且有关展品状况的信息都以电子数据的方式上传到数据库中。今后，不论是整合有关展品的增量信息，还是对展品数据进行二次开发利用都将变得十分便捷。

这款“文物点交系统”的特点如下。



“文物点交系统”界面

（1）高度设备整合与智能化。目前的智能终端设备集成了高像素摄像头、大容量存储、多触点大屏幕、多制式网络技术等众多设备，结合专门定制的功能软件可以提供比传统记录方式更便捷、更全面的方式。我们的软件可以将文字记录、拍摄照片均由一人一个设备完成，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大容量存储与网络技术允许更多的照片与文字整合在一起组成更为完整的记录。点交系统可以大大减少重复劳动，它可以使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单独处理工作串联起来，同时也能处理流程上多环节的任务；可以方便进行点交各个环节的输入、审核、批复、签字，同时也可以进行不同环节的查询；不仅解决了传统点交的效率低下和纸张浪费状况，而且也解决了因无法使用烦琐的现代办公自动化系统而闲置的信息化投资。

（2）实时信息数据库。我们为这套软件设计了后台数据库，所有的信息都将上传于此。因此，所有的数据都以电子数据的方式被存储、利用和输出。而且，这个数据库还可以与展品原有的数据信息库进行对接，安全地将增量信息与存量信息进行融合。

（3）可扩展性。优秀的硬件与软件平台提供了巨大的开发潜力，具备以更低的成本开发更多适合工作需求的功能。目前，我们的软件可以实现实时信息输入与上传、图片拍摄与编辑、数据库信息读取等功能。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将会有更多功能陆续开发上线。

（4）安全性。为了保证信息的安全性，我们的服务器选用中央党校服务器群。而且，展品信息属于馆方所有，软件与数据库的使用权限仅限于使用者。除非有授权，否则任何机构无法使用。点交软件可以与让各个环节紧密结合，动态电子认证保证了每个点交人员签名内容的不可更改性和

来源的真实性。用户可以利用动态认证实现可靠的身份确认功能，比传统键盘密码更安全、更有效。用动态认证来替代传统密码口令验证，极大地增加了系统中信息的安全性，而且使用更加方便，更加容易。

（5）易学易用性。可将在纸版点交表格上的批注、签署信息引入办公自动化网络系统当中。通过对点交文件传阅、审批流程的定义，各用户便可在网络中对文件进行亲笔圈阅、批注和签名，从而使不同用户可对所传阅讨论的文件发表各自的意见、相互交流并进行最终的确认及签署。用户对文件进行的亲笔圈注、签名信息均可被保存，并可进行打印输出。用户只要会写字，不需要学习烦琐的键盘输入方法，就和日常在点交纸质文件上审查、签署文档一样，就能方便地使用含有动态签名技术的办公自动化系统，从而大大减少了培训工作量。

数字化的展品点交系统可以将博物馆工作人员从烦琐和低端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把关注力集中在核心事务当中，整体提高点交工作的效率和对信息的可控性，降低了办公成本，提高了执行力，使点交工作的管理趋于完善。通过对点交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可以快速提升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

（1）整合资源。通过网络技术将有关博物馆对外展览的各项资源，如借调单位、外展单位、点交经验和文化资源等集成在一个平台上进行管理使用，实现各种资源的互相促进和增值，形成一套正规、科学、开放的点交规范，保证点交工作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加快信息流通。点交人员在现场的工作可以在几秒钟内同时传达到相关人员，无任何中间环节。所有工作人员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畅通无阻地直接反馈到最高领导层，便于及时发现问题、改进过程和发现人才。参与工作的人员能够在网上轻松、直接、公平地发言、交流，建立融洽的团队关系和博物馆文化。

（3）规范点交工作流程。建立起一个紧密、协调、可靠、简单的点交工作管理机制，让工作充满活力，促进可持续的健康发展，使工作人员责任明确，权限分明，具体事务落实到人，查有所依，杜绝推脱、扯皮现象，彻底消除信息传递中的阻塞、延误、失真，保证正确、及时地反应。

（4）提高办事效率。有效协调多部门之间的协同工作问题，实现高效协作，领导层能够方便地随时查看点交人员的具体工作及其进度情况，跟踪监督，提高执行效率和力度。

（5）节能降耗。全球因为办公而消耗掉的纸张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在纸张背后的能源消耗，更是每一个博物馆人追寻可持续发展所必须关注的问题。电子点交不单是减少了纸张在物质能源上的消耗，在其背后还节省了很多琐细的工作以及各个工作人员为此付出的宝贵时间。

我们认为，展品点交工作的数字化将是今后工作发展的方向。解决了信息的存储、读取和安全问题后，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将为此项工作提供巨大的便利与想象空间。

在此，我们愿意对展品点交工作的下一步发展做一番展望。

首先，展品点交工作将实现无纸化。智能终端设备的强大硬件结合高度定制的专业软件将取代

目前的纸版表格。便捷的操作、高度整合的功能、智能操作系统、强大的数据库等优势将进一步满足展品工作的实际需求。

其次，更多的设备为展品状况提供多方位信息。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传感器将被整合进智能终端设备。在目前摄像头的基础上，将会出现更多满足展品安全需求的设备及功能，如3D扫描、表面温湿度测量、高精度微观探测等。这些设备将提供更多的关于展品的状况信息，从而为保证展品安全提供更为全面、专业、细致的数据。

再次，以“展品”为节点的信息将实现无缝衔接。互联网技术将彻底改变目前存在的工作前准备、现场操作记录、事后整理利用的工作模式，打通处于隔离状态的各种信息源与数据库。今后，工作人员在现场实时调取展品信息，实时采集、确认与上传展品状态，与被授权人员实时分享所有数据，数据库不断增加关于展品的增量数据，按照需求对数据进行分析与输出等将成为现实。落实“展品安全”要求，实时确认展品状况的工作将成为日常工作的内容之一。

最后，丰富的展品状况信息将改变包装运输行业。展品包装与运输工作以展品状况为基础，以保证展品安全为核心。随着越来越丰富的展品状况信息的积累与利用，将为展品包装与运输机构提供更为准确、专业和及时的数据，从而可以依据其状况制定适宜的包装与运输方案。这将改变目前的展品包装运输行业，体现出高价值、高成本、高技术含量的行业特点。

我们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相信并期望更多的人关注展品点交工作的发展。以这项工作为支点，我们相信可以为这个行业带来更多的便利。

（该文与张钊合写，原载《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26日；又收入《博物馆的数字化之路》，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

未来博物馆如何拥抱新科技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智能化时代，以云计算、物联网、移动通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社会资源、信息资源、物理资源的人机物三元深度融合给人类历史带来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科技革命，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近年来，作为传承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创造性表达的风向标，博物馆以增强观众体验为导向，实现了经营模式与移动应用、社交网络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以博物馆业务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手段整合线上线下活动的新型博物馆生长模式。面对未来不断涌现的各种新科技，博物馆从业者必须有前瞻性地思考，积极应对挑战，主动学习和应用各种新技术，用科技和创造推动各项工作，才能把握博物馆发展的历史机遇。

关注与博物馆有关的新科技

回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每个时代都有着推动其发展的驱动因素。在农耕时代，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着人类从石器时代发展到青铜器和铁器时代。工业时代的动力技术让人类从蒸汽机时代发展到内燃机和电力驱动时代。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借助着计算机、集成电路、光纤通信、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兴起，信息技术正在成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向着智能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方向快速迈进。博物馆行业也不例外，日益成熟的创新科技通过信息资料的共享和互动交流，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更好的个性化服务，同时使博物馆各相关业务活动的开展更加高效、快捷、便利。这一切不仅给博物馆信息传播提供了更多新的载体，拓展了博物馆的形态，也改变了博物馆的管理水平和展示手段，同时带来了很多思想观念的转变。

新科技对博物馆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数字化已经成为博物馆行业的新工具和新方法，并为博物馆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观众可以看到更广阔的空间，可以穿越历史与未来。数字化所提供的共享平台使博物馆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实现资源整合，提供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合作机会。博物馆展览已经从传统的陈列模式迈向交互式和沉浸式的数字化方向。通过触摸界面或运动检测系统等与观众互动，让娱乐体验更精彩，达到趣味性与科技性的完美结合。

与移动应用和增强现实的融合带来更具交互性、沉浸式和个性化的用户体验，通过模拟各种声光色电信号来还原真实或者虚拟的世界，超越时空制造出逼真的具有代入感的场景，摆脱了以往的严肃沉闷氛围，增强了文物观赏的全面性、互动性和吸引力，通过精彩纷呈的展示方式进行展品内涵的解读和文化信息的传播，呈现出更为立体真实的效果，丰富了呈现的手段，增强了创意方式。

同时，在互联网的平台上，观众和游客可以放松身心，互相交流，形成社区，形成圈子，形成各种关联，将单一被动的参观过程变成在体验参观中学习、思考、互动、分享和共进的新型传播学习模式。

收藏是博物馆的基本功能。在藏品管理方面，各种物联网技术可以从文物入库开始，对登录、保管、流动、点交、展出等各项流程进行智能化监管，利用实时定位与识别、出入库感知清点、智能化日常巡查等手段，降低藏品在管理风险点上的主要安全问题。

无损检测技术可以针对文物的保存状况及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全面量化分析，使文物在损坏发生之前提前掌握其各项特征，持续采集传输相关信息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评估，并以三维建模形式立体呈现可视化结果，展现数据的不同变化和关系，形成一套集藏品面貌、内部结构、周围环境因素于一体的馆藏文物诊断、分析、处理和评价体系，为文物保护措施的制定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通过对观众的构成、需求、心理、动机等各类数据的搜集和分析，从丰富馆藏内容、改进展陈方式、提高参观体验、优化服务质量等目标需求出发，以物联网为基础的多种信息技术（如智能感知、识别技术和普适计算）为博物馆的信息传播提供了更多的载体，提升了对观众的服务水平，优化了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播的能力，拓展了文化知识的传播渠道。引入游戏模式已经成为博物馆创新学习模式的重要方面，在轻松娱乐的气氛中让年轻一代感知博物馆丰富的展品，获得更多的情感、沟通和共鸣方面的体验。

其他各种前沿的教育方式如机器人、3D打印以及基于Web的三维建模被广泛引入博物馆教育活动之中。创客空间作为解决实践难题、开展创意工作的有效方法，方便更多爱好者参与博物馆创意活动。社交分享技术方便观众随时随地用手机或电脑分享精美展品和参观体验，结识兴趣相同者。精细化定位讲解服务、观众信息收集和处理技术可以与参观者随时随地保持长久的联系。

国外有的博物馆超过一半的参观者来自网络，这些情况正在重新定义博物馆的观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谁才是博物馆真正的观众？”以及“应该如何定义博物馆的参观空间？”另外，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站是否有可能影响实体性的博物馆体验，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世界上90%的数据都产生于最近这两年，导致了计算机硬件、软件和网络信息交流技术成倍地增长。国外很多博物馆已经开始通过数据分析去推动博物馆的营销增长和参观者行为的追踪。

相对于以往博物馆简单通过活动出席人数和参与度调查，对参观者的行为进行分析，这些方

法的效果显然有极大的不同，可以深入了解到人们的活动经历和参观体验。博物馆业可以参考零售行业的一些成功经验，采取更多的数字策略，应用新的数据分析技术，从人们进入博物馆那一刻开始，让精细化的数字信息识别和收集系统记录参观者的行为特点和游览兴趣，使博物馆更加精准地了解观众的兴趣和需求，提高博物馆各项服务的效率。

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科技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博物馆的管理运营和安全保卫等工作都因数字网络科技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预约订票系统、馆内OA办公系统、身份证自动识别门禁系统等不断需要创新科技的支持和更新。通过科技与服务的结合，可以建立集文物保存环境监测、文物本体监测、文物及资产管理、人员行为管理、观众导览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应用系统，实现全方位立体式的智能化管理。

基于博物馆数据采集、具有模型分析功能的可视化数字中心可用于博物馆数据管理、可视化操作。文物保存环境监测大数据分析评估及预警平台可用于博物馆大小环境的监测管理，查看博物馆整体环境温湿度分布情况。不可移动文物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针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信息资源管理，可用于文物管理部门对不可移动文物的监管和跨部门管理，在数据感知和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形成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系统化工作方式，为文博事业的发展创造更新的价值。

提高博物馆人的数字素养

随着互联网、移动设备以及其他技术在博物馆行业的普遍应用，对文化素养的理解已经从传统的读写能力扩展到对数字化工具的掌握。

目前有关部门还没有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对于数字素养的概念也没有形成共识。美国图书馆学会将数字素养定义为“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去发现、理解、评估、创造、沟通数字信息的能力，一项需要认知技能和专业技术技能的综合能力”。

欧洲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ISC）对数字素养的描述有些宽泛抽象，“使个体能够在数字社会里生活、学习和工作的那些能力”，也可以理解为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批判性思维和反思能力的发展。

对博物馆行业来说，数字素养应该是指博物馆从业者的信息判断、收集、批判、处理、生成及传递的能力，尤其是运用数字工具实现各种教育目的的能力以及批判性评估网络资源的能力等。博物馆人作为信息的吸收者和传递者，其数字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博物馆教育的效果，数字化素养日渐成为博物馆从业人员的职业新要求，提高新技术应用能力成为提高博物馆宣传水平和观众体验的基础。

博物馆管理者要树立数字素养的理念，博物馆作为一个“可以自学的学校”，应该更加重视信

息获取的过程而非简单传递信息。传统博物馆满足于知识灌输，满足于把知识讲深讲透，讲解水平容易停留在静态发展的水平空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博物馆与观众在教育中角色发生了转变。如果缺乏信息科学的基本知识，不能使用现代的科技手段，肯定无法提高展览水平，也很难有效地传播知识或者与观众交流互动。

博物馆管理者应具有现代化的理念，掌握现代化的手段，熟练运用信息工具对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收集、组织、运用；通过网络与博物馆内部工作人员以及观众进行交流，在潜移默化的教育环境中培养员工的信息意识。只有把科学的工作方法、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先进的信息理念贯彻到博物馆各项工作之中，才能真正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果。

最后，博物馆应该创造各种良好的数字环境，拓宽数字素养的应用时空，提供更加丰富的数字培训计划，使各种数字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适应现代博物馆发展的要求，最终实现博物馆教育过程的全面信息化。

克服对新科技的恐惧

虽然数字化信息化已经成为博物馆进入全新阶段的标志，但一部分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工业化时代，对于新科技持怀疑和抗拒的态度。这种思维模式在当前的浮躁社会环境中还是很普遍的。

即使在科技很发达的欧美国家，也有相当的人对难以置信的科技变化与更新感到不自在，有少数人甚至“极端抗拒”。据说46%的英国人，50%的德国人，55%的法国人和55%的美国人对新科技持恐惧排斥的态度（即害怕并拒绝新科技进入日常生活领域）。“科技恐惧症”未来或将成为主要的心理问题。这种恐惧症也不仅仅针对中老年人，其趋势越来越年轻化。年轻人即使都是在富技术的环境中长大的，因为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更新换代不停加速，如果不抓紧学习，也会被抛在后面。

所以在网络社会和数字化生存的时代，不管是晚辈，还是长辈，即使在接受和适应新事物的能力上有所差别，都面临着不进则退的挑战。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博物馆从业者应该始终把学习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才能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

警惕对新科技的过分迷信

另外也有一些人一旦出现思维的转换，又开始对科技过分迷信和依赖。博物馆既要关注新科技对挖掘文化遗产和文化反思的积极作用，也要有冷静的思考来审视与看待新科技对于博物馆的作用。

如有些技术可能本身就不适合在博物馆应用；有些技术虽然不错，但在特定场合有可能对观众认知功能产生干扰；“在线生活”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应忽视，如果应用不当，确实有可能冲击观众现场的感情共鸣和深度体验。一些互动性展览可以改变观众的参与方式，但如果安排得不合理，某些方面就可能被忽视。可以采用新的模拟技术，结合观众认知解读分析，再通过时空的重新分配，真正达到提高观众参观体验的效果，提升互动交流的品质。

其次，要重视新科技的综合使用，未来科技最主要的亮点是深度融合，要重视各种不同技术的互补，以最自然的方式实现展品与观众的互动。

最后应该注意探求观众受到新技术影响后的行为变化，注意考虑观众的行为模式和操作习惯。一切技术手段的应用都是为了提升观众的艺术品鉴能力和文化认知水平，培养和激发人们探求知识的兴趣，鼓励观众从陈列的旁观者变成展览的参与者。

结语

博物馆与新科技的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博物馆从业者应该不断提高数字素养，努力学习各种前沿科技，不断强化对技术手段的敏感度，提高信息获取的综合能力，发现和利用丰富多彩的学习资源，才能在思想、意识、敏锐性方面有所进步，从而达到一个新的思想境界。未来的竞争说到底就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其中信息的搜集、整理和使用至关重要，不可忽视。

在互联网时代，高科技对挖掘博物馆创新价值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博物馆从业者必须有一个包容和开放的胸怀，站在新科技的最前沿，才能引领博物馆的最新发展方向，在文化传承与传播以及各国历史文明交融等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新科技和博物馆都是包罗万象、举一千从的行业，每一个有志之士都应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和发光点。新科技渗透性强，对博物馆的各个层面产生冲击，带来了注重体验的崭新概念，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成为实现现代展览设计理念的最佳载体。博物馆提供了一个独特和广阔的市场，吸引和成就着新科技领域众多的从业者。从长远和多角度观察，新科技和博物馆这两个领域可以相辅相成、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原载《中国文物报》2016 年 11 月 15 日）

大中华地区海事博物馆网站的比较

网站是博物馆在网络时代的舞台中展现自身实力和寻求发展的重要途径。博物馆通过简单优美、特点鲜明的网页，不仅可以表达自己的藏品信息和服务，还可以及时全面地接受观众的信息查询和反馈。我们从2014年3月开始，对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航海造船类博物馆和纪念馆的网站进行了跟踪比较研究，从网站定位、网页设计、网站结构、网站安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综合的考察和对比，提出了未来博物馆网站拓展和改进的具体建议，希望对各博物馆有所帮助和借鉴。

在数字化信息时代，互联网作为最先进的媒体以低代价却很方便的方式把博物馆的藏品或服务信息发向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全世界所有人都能通过网站，了解博物馆。互联网在中国正以几何级数速度发展。因此，任何一家博物馆，都不应置身于互联网之外，否则就会脱离博物馆发展最基本的资源和环境。

博物馆建立网站，将信息咨询站开设到网上，提供信息服务，并可与外部建立实时的、专题的或个别的信息交流管道，让观众可以全面和客观地了解博物馆及其藏品和服务。观众也能够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留言板向博物馆发表意见，让博物馆能够迅速得到观众信息并及时给予答复。

网站还可以帮助博物馆提高效率，减少中间环节，规范管理，降低管理成本。利用互联网低廉的通信成本，统一开放的技术平台，简单实用的前端界面（浏览器），博物馆可以把内部的管理应用放到网上，实现真正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借助互联网，博物馆内部，博物馆和分支机构，博物馆和观众，博物馆和供应商，博物馆和政府部门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为博物馆带来了实在的效益。

我们从2014年3月开始，对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航海造船类博物馆和纪念馆的网站进行了关注和跟踪研究，从网站定位、网页设计、网站结构、网站安全以及如何提高网站互动性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综合的考察和对比。

考虑到这些博物馆和纪念馆的网站在网站技术方面的专业性不是很强，本文将对这些网站分析的角度分为网站定位、网页设计、网站结构、网站安全等方面，然后在其下分列了与之紧密相关的19个问题。

截至当前，在大中华地区的36个涉海、造船类博物馆和纪念馆中，有19个已经建立独立网站，3个挂靠在大学或者上级单位的网站之中，有14个还没有建立网站（招商局历史博物馆、郑成功文

物纪念馆、郑成功文物馆、葫芦岛市博物馆、蓬莱古船博物馆、南京郑和纪念馆、昆明郑和纪念馆、江南造船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上海博物馆）或者网站无法打开（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博物馆、上海交大董浩云博物馆、上海交大船舶数字博物馆）。无论是从展示形象、提供服务、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网站建成后所获得的社会效益、节省的沟通成本与网站建设的投入成本相比要大得多。比如在介绍一个博物馆的新展览项目时，在宣传册上最多放上数张照片和简短的文字介绍，但在网站上却可以详细介绍展览的背景、藏品亮点、点交细节等，效果显然比宣传册好很多。网站也可以每天更新（甚至随时更新），反映博物馆的最新情况。如果一个博物馆网站都没有或者做得很差，给观众的印象是：这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至少是一个跟不上形势的博物馆。如果博物馆网站做得好，给观众的感觉是：这个博物馆观念领先，管理科学化智慧化，观众的信任度也高很多，可以提高博物馆的知名度和品牌。

网站定位的问题

随着网络的普及，博物馆观众的需求呈现出多维度、个性化、专业化等特点，要求博物馆网站不断向纵向深化和横向拓展的综合发展。在受众范围、功能设计、内容组织、使用者习惯等方面都需要作出科学、明确的界定和分析，这种做法不仅能够直接满足观众的需求，而且能够全面、合理、有效反映和展示博物馆的信息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因此，网站的板块划分、内容全部应围绕这个目的来设置，在进行板块划分时，不应单纯讲“我们在做什么”，而应是“我们能为公众提供哪些服务”以及在提供服务时公众是否能便利地享受到这些服务。

博物馆网站应该具有简短、形式多样、更新迅速这三大特点，以符合当前年轻一代对参观博物馆的需求。但笔者对随机指定时间段内最新信息的发布条数进行了统计，22个相关的网站中，只有10个博物馆有信息发布栏，总量从10～495条。信息发布条数较多的，主要的信息来源也并非原创。

外语版也是一个短缺。只有9个博物馆有英文版，大部分网站只有中文版。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提出，将开启全新的对外开放格局，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开拓国际空间，也为航海造船类博物馆带来了历史性机遇。博物馆应该重视国际化宣传工作，利用多种手段，全方位宣传博物馆，加强与其他国家博物馆的合作与交流，提升博物馆的品牌价值和世界影响力。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公众注意力逐步向手机、平板、可穿戴设备等移动终端迁移，博物馆在线服务的载体与输出通道需要随之转变，以满足公众的需求。因此，网站手机版是一个未来

趋势，可惜绝大部分博物馆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有极个别配备了手机版网页。今后的网站实施技术应该注重智慧化、自我调整的多平台统一性，最为突出的将是博物馆网站与移动端的融合，微博、微信及App将成为未来博物馆发展的一种标配，并与网站形成信息互通、服务互补。

从内容的原创、丰富性和逻辑性方面来看，有8个网站做得不错，9个网站做得较好，4个做得一般，只有1个做得较差。网站内容不仅需要具有较高的原创性，同时内容的质量也要较高，能够和网站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与此同时，能够让使用者因为这些内容活动得到更多的帮助。因此，博物馆网站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做好内容的深耕细作，彻底摆脱网站简单的展示模式，而是要和使用者产生良好的互动，让用户能够参与进来，共同打造高质量的内容，这样才能够提升博物馆网站的人气以及内容质量。

作为一个初次登录博物馆网站的访客，经常会碰到在网站上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访客可能会将网站地图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对网站内容的多级分类一目了然。在22个相关的网站中，仅长荣海事博物馆和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设置了网站地图；中国海事博物馆在互动论坛板块有单独的网站地图，但其他部分却没有。福州船政文化博物馆有网站地图功能表，但内容是空的。另外，在网站首页设置本站内容搜寻引擎，将极大地节约用户时间、方便用户获得有效信息，特别是既往信息。在22个相关网站中，还有5个尚未设置此功能，有的虽然有设置但位置不明显，或者搜索有问题。

在服务方面，只有6个博物馆网站有免费下载的功能，有的网站虽然有这个功能，但无法使用。只有3个网站有周边景区的板块。参观指南方面，竟然有6个网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很多网站这个板块的内容也非常简单，完全没有站在旅游者和访问者的角度考虑。电子商务方面，包括网上预约订票、网上购物等服务，竟然有12家网站没有这项服务。

微信公众号以及其他社会化平台已经培养了用户喜欢互动的习惯，之所以网站的影响力开始下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够重视互动。特别是对于博物馆网站来说更是如此，大多数提供的互动模式就是留言板，或者在线的服务QQ或者其他平台，可是当使用者点击在线服务时，往往没有人回应。这样用户的互动期望就会被剥夺。对此，博物馆网站必须要引入互动机制，比如相关的内容下面提供相应的评论。与此同时，还要有相关人员针对评论进行互动，从而提升对用户的吸引力。

安全性方面的问题

我们通过安全性检测工具对网站进行了安全检测，在本文论及的22个网站中，暂不存在安全问题的仅有1个；很多网站由于还未认领，无法进行漏洞检测，安全得分未知；还有的网站已经数年

没有进行安全检测。由此可见，在网站的安全维护方面，还需要大力加强。

大多数网站设计，只考虑正常用户稳定使用。但在黑客对漏洞敏锐地发觉和充分利用的动力下，网站存在的这些漏洞就被挖掘出来，且成为黑客直接或间接获取利益的机会。很多网站管理员对网站的价值认识仅仅是一台服务器或者是网站的建设成本，为了这个服务器而增加超出其成本的安全防护措施认为得不偿失。而实际网站遭受攻击之后，带来的间接损失往往不能用一个服务器或者是网站建设成本来衡量，很多信息资产在遭受攻击之后造成无形价值的流失。不幸的是，很多网站的负责人员，只有在网站遭受攻击后，造成的损失远超过网站本身造价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

网站结构方面的问题

网站结构设计是网站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内容设计完成之后，网站的目标及内容主题等有关问题已经确定。结构设计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将内容划分为清晰合理的层次体系，比如栏目的划分及其关系、网页的层次及其关系、连接的路径设置、功能在网页上的分配等等。这些前台结构设计的实现需要强大的后台支撑，后台也应有良好的结构设计以保证前台结构设计的实现。显然网站的结构设计是体现内容设计与创意设计的关键环节。理清网页内容及栏目结构的脉络，使连接结构、导航线路层次清晰；内容与结构要突出主题。

从国内与相关的网站的板块划分和板块内容的分析来看，可将网站提供的信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宣传型信息”。一般包括：单位概况、机构设置、专家介绍、工作成果、交流合作等。这类信息一般占网站全部内容的70%。第二类是“服务型信息”。一般包括：展览信息、政策法规、论坛、文物精品等。在22个网站中只有11家有不同形式的在线互动板块。这些服务型信息一般仅占网站内容的30%。而国外博物馆网站的板块划分中，服务型信息一般占到80%以上，其余的20%为宣传性或专业信息。

网站设计方面的问题

交互设计和用户体验，是指使用者使用产品的体验。由于使用者的体验是使用者使用产品的所有心理感受，感受是复杂交叉的，所以用户体验设计注定就是门交叉学科。博物馆网站作为一个系统化产品，必然涉及使用者使用产品过程中的方方面面。

以用户体验为出发点和立足点，通过构建合理的网站信息结构、内容组织方案、网站架构设计和便捷的协助工具，有效的向观众展示信息，提高博物馆网站使用者体验水平。利用先进技术，结合博物馆自身特点，提供竞争优势明显、创新实用的服务，例如场景类比服务等。

页面回应速度是网站分析的关键指标，是访问者接触网站的最先感受。在本文论及相关的22个网站中，有14个的页面回应速度快，访问流畅。另外，6个页面打开速度一般，有3个比较慢，有3个挂靠在大学的博物馆网站处于无法打开的状态，极大地降低或打消了访问者的访问意愿。

从连结质量上看，有个别博物馆网站的首页连结数4～8个。

从网站内容展现的形式上来看，相关的网站一般实现的图文混排中，存在着文字内容过多的现象。表格、视频、3D虚拟技术运用得较少，观感显得较为沉闷。22个网站中，只有6个有视频、虚拟展厅或者藏品360° 等手段，这些恰恰都是最吸引访问者的工具。

当前的网络频宽建设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在博物馆网站上发布一些视频内容也已经成了可能，观众在打开这样的视频内容时，也不会觉得多卡多慢，通过视频来介绍博物馆的各项活动显然要比文字更加直观，也能够更好地吸引观众。如果在视频档相关的属性中设置与网站有关的关键字，就能够很好地利用视频抢占长尾关键字的流量，进而提升网站的曝光度。

在我们论及的网站里面，善于利用缓冲动画等元素，还不多。网络技术不断发展进步，也使得网页内容更加丰富，可以穿插一些音乐和动画等元素，能给浏览者带来听觉和视觉上的双重享受，传递更多的信息和互动。

从界面设计来看，美观性比较好的有中国港口馆、船舶数字博物馆、广州博物馆、鸦片战争博物馆、香港海事博物馆和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等。但总的界面配色设计方面，配色过于简单，甚至连标题列都只有一个素色框，在配色方案的统一性、协调性、颜色搭配舒适度、字体类型选择和大小方面还有较多改善空间。

结语

海事博物馆在互联网时代应该加快转变博物馆职能，即从单纯的管理和研究型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型转变。应该懂得并善于利用互联网，树立博物馆的形象，宣传博物馆的精神。在网站搭建的技术方面，从公众享受服务的便利性出发，注重用户体验、以方便公众便捷获得咨询和参与文化遗产相关工作。具体来说，需要做到网页回应速度快、板块划分清晰合理、网页配色方案明快、网站路径清晰、信息发布及时、信息形式多样、信息用语通俗、建立全站内容搜寻引擎、开辟常见问题回答专栏、不断修复网站安全性漏洞这几个基本方面的工作，为公众架设好这座享受文化遗产社会公益的桥梁，从而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永续利用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文为2016年台湾高雄海洋科技大学海洋文化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图像触觉感知如何帮助博物馆的视障观众

目前绝大数博物馆的藏品是不允许触摸的，把视力障碍的观众拒之在博物馆门外。如何拉近视障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距离，触觉图像是一种有效方法。本文通过基于图像的3D打印技术，可以直接打印出藏品的盲用图像触摸板，供视障观众认知藏品。本文还提出了一种基于区域特征的图像触觉感知模型和改进的JSEG算法，在电脑中显示出藏品的数字图像，恢复出藏品的触觉，再通过人机交互的触觉反馈设备，让视障观众触觉感知藏品。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算法能较正确地划分出图像区域，提高了图像触觉感知的正确率。

引言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截至2012年6月，全世界有2.85亿视力残疾人（最佳矫正视力小于0.3），其中3,900万为完全看不到（最佳矫正视力小于0.05），2.46亿为低视力者（最佳矫正视力为0.05 ~ 0.3）。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至2010年年末，我国有1,263万视力残障人士。2014年我国视障人士数量为661万人，是世界上视障人士最多的国家，而且每年约有45万人失明。文字识别技术把文字信息转化为声音，可以较好地解决视障人士通过听觉获取文字信息的问题。然而，如何让视障人士获取数字图像所传达的信息？触觉几乎是目前视障人士的唯一选择。

虽然，目前国内外很多博物馆是免费开放的，但是一条无形的鸿沟却将视力障碍观众拒之在博物馆门外，这条鸿沟就是绝大数博物馆的藏品是不允许触摸的[①]。据了解，世界上也有极少数专门为视障观众设计的博物馆，陈列了一些文物、贵重物品或艺术品的复制模型。视障观众可以用他们的手指触觉感受这些复制藏品的轮廓，并在心中勾勒出属于自己的作品[②]。此外，有些博物馆有时也会专门为视障观众定做复制藏品的展览，但是这些复制藏品的制作周期长、种类很有限，数量更是少而又少，而且成本非常高，难以让广大视障人士群体受益[③]。

① Cock M, Saeed K. Help the Blind Access your Collections. Museums Journal, 2015， 5(11）:5–15.

② Raša U, Matej P, Urška E. Development of Tactile Floor Plan for the Blind and the Visually Impaired by 3D Printing Technique. Journal of Graphic Engineering and Design 2016, 7 (1）:19–26.

③ 赵云彦.包头市博物馆盲人导览系统设计研究.长江丛刊，2016， 26:142–143.

为此，我们设想能否以盲用图像触摸板的形式，呈现出藏品，通过图像触摸板中藏品轮廓、不同区域的不同触感，让视障观众获取图像所传达的信息，辨识图像中的藏品，用指尖感受藏品的无穷魅力。这个设想的核心是如何快速且低价地制造或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藏品盲用图像触摸板。本文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这个设想，第一种途径是通过基于图像的3D打印技术，直接打印出藏品盲用图像触摸板，供视障观众触觉认知藏品；第二种途径是在电脑中显示出藏品的数字图像，并生成数字化的藏品盲用图像触摸板，再通过人机交互的触觉反馈设备，让视障观众感知藏品。

盲用图像触摸板的快速制造

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图像的3D打印技术，可以把藏品的数字图像，直接通过3D打印机制造出藏品盲用图像触摸板。这一技术的核心内容是基于区域的触觉纹理信息恢复和物体表面轮廓形状的表达方法。首先，获取藏品的数字图像，通过像素点的高度值求解算法，恢复出藏品表面每个像素点的高度值，表达藏品表面的粗糙度；然后，用三角网格构建出藏品表面的三维形状，再分区域（区域组）和分层次地表达图像中藏品表面的三维轮廓形状；最后，通过3D打印机制造出盲用图像触摸板。

图1是中国古代妇女的发髻文物，为木质材料，形状独具特色。我们通过手机照相，运用此技术，可以快速复制出它的形状，让视障观众体会古代妇女的发饰，想象她们的日常生活，丰富视障观众的精神世界。图2是孙中山先生的墨宝，属于书法作品。传统观念一般均认为书法、水墨画等文化作品，只能通过视觉感受它们的魅力，与视障观众几无任何关系。运用此技术，我们可以直接制造出文化作品的盲用图像触摸板，让视障观众和正常人一样，欣赏文化作品，提高视障观众的文化素养。类似的，中国特色的服饰图案、中国甲骨文等，见图3，都能通过此技术，直接让视障观众触觉辨识。



图1　中国古代发髻（本质）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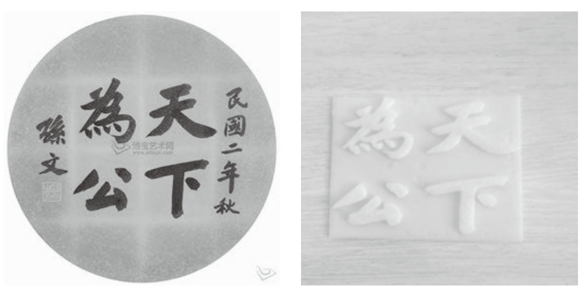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书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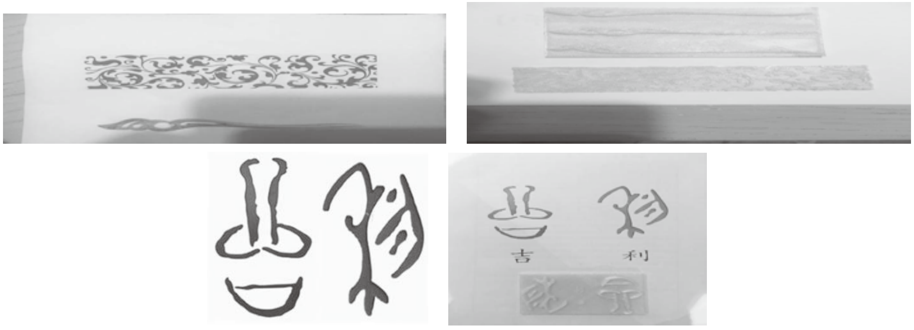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传统服饰图案和中国甲骨文

这一技术主要有两大特点：（1）速度快且成本低；目前，获取藏品的数字图像很容易，3D打印机的价格和打印成本也越来越低廉。所以，这一技术能快速地制造出藏品盲用图像触摸板，让视障观众使用。（2）突破传统观念，让传统认为只能靠视觉欣赏的藏品变成可以让触觉辨识的藏品。

数字图像的合理区域划分

用多种材料分区域制作而成的盲用图像触摸板，可以表达出物体不同区域的多种触感，包括高低不平的凹凸感（粗糙度）、柔顺感（摩擦和黏性）和柔软感（刚度和柔度）等，有利于视障观众辨识图像。同样地，对于数字图像而言，合理的区域划分是逼真触觉生成的关键。

图像的区域划分就是在图像中提取出各具特性的区域，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也提出了很多经典的图像区域划分算法[①]。如基于边缘检测的区域划分、基于区域生长的区域划分、基于小波变换的区域划分、基于统计学理论的区域划分和基于纹理的区域划分等。但并不是所有的图像划分方法都适用于触觉感知的生成，在通过触觉传达数字图像信息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图像中合理的区域划分而且作为触觉设备交互的对象应该时间复杂度尽可能低，保证触觉感知的实时性和真实性。考虑这两方面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基于改进的JSEG算法用于恢复基于合理区域的数字图像的触觉生成。该算法针对由于JSEG算法所产生过度划分而导致的触觉不真实以及其算法复杂度高而导致的触觉实时性不强现象提出改进，更加逼真地模拟现实中手摸到物体不同部分所接收

① Deng Y, Manjunath S. Unsupervised Segmentation of Color-texture Regions in Images and Video. IEEE Transaction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2001, 23(8）:800-810.Deng Y, Kermey C, Moore S, et al. Peer Group Filtering and Perceptual Color Image Quantization. IEE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Circuits and System, 1999, (4）:21–24.Wesolkowski S, Fieguth P. Color Image Segmentation using a Region Growing Method. In the 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or Association, Edmonton, Canada,2001.汤迪逊，陈健，胡荣. GLA聚类算法在视频对象提取中的应用.数据采集与处理，2002，17(2）:175–178.

到得不同反馈信息。

本文对图像进行区域划分是为了服务于触觉对区域的感知，可以分区域地表达出图像中物体表面的形状，每个不同的区域体现出不同的手感，需要区域间尽可能地合并，算法复杂度尽量低。而JSEG划分算法会存在区域划分过度现象，并且需要在多尺度的模板窗下，基于颜色立方图的迭代计算，空间划分过程烦琐，算法复杂度高。因此，我们对此进行了改进。在经过颜色量化后，我们采用增量式的种子区域生长方式在类图的基础上形成初始划分区域，取消用局部值的迭代计算选定种子的过程。用融合边缘轮廓信息的区域合并替代基于颜色直方图的合并过程，并提出终止合并规则，如图4所示。

改进后的空间划分方法对颜色和空间上的边缘信息进行了综合考虑，主要可分为两部分。首先，对经过颜色量化后的图像采用一种增量式的区域增长方式完成图像区域的初始划分。然后，综合考虑区域颜色、边缘以及邻接关系，对区域距离进行定义，将相似区域进行分级合并，制定一个停止区域合并的规则，直至满足条件完成区域划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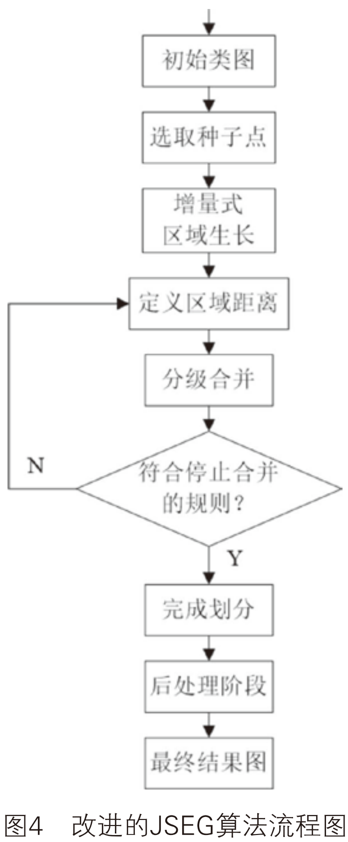


图4　改进的JSEG算法流程图

图像的初始划分

在JSEG算法颜色量化得到类图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增量式区域生长的算法完成图像的初始分

割。首先对种子区域像素的选区进行定义，需满足以下条件。

量化后的颜色相同；

空间上形成四连通区域，且面积达到整幅图像面积的一定比例（按照划分精度的不同，将比例设为0.001%、0.01%、0.1%）。

对图像中不在种子区域的像素，将其分配到与它最为相似的邻接区域，并且如果它满足独立条件：

与其他新生长进种子区域的像素空间上构成四邻域连通；

彼此间的平均距离小于与种子区域之间的平均距离；

满足种子区域面积要求。

则可以形成一个新种子区域，更有利一些细节区域的发现，并且相对于JSEG算法中基于J图的不同模板窗下的种子选择，算法复杂度相对较低。至此，得到图像初始划分结果。

区域合并

（1）定义区域距离，分级合并区域

区域距离的度量是对初始划分的图像进行区域合并的重要前提，并影响最终区域划分的质量。本文把颜色、空间上的邻接关系以及边界当作区域间合并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融合颜色、邻接关系以及边缘距离，对区域间的距离做出定义。设图像内区域i与区域j中分别有$|r_i|$、$|r_j|$个像素，$\overrightarrow{u_i}$、$\overrightarrow{u_j}$分别表示区域i、j的颜色均值，颜色距离$D_{ij}{}^{c}$可表示为：

$$D_{ij}{}^{c} = \frac{|r_i|\cdot|r_j|}{|r_i|+|r_j|}\|\overrightarrow{u_i}-\overrightarrow{u_j}\| \qquad (1)$$

参照Canny算子的边缘距离公式定义为：

$$D_{ij}{}^{e} = \frac{1}{|E_{ij}|}\sum_{(k,l\in E_{ij})}\|\overrightarrow{x_k}-\overrightarrow{x_l}\| \qquad (2)$$

其中$|E_{ij}|$区域i、j边缘上的像素点的数目，$\overrightarrow{x_k}$、$\overrightarrow{x_l}$分别为边缘两侧像素点k与像素点l的颜色值。另外，如果区域i与区域j相邻，那么我们设Δ_{ij}为1，否则为$+\infty$。最后计算出区域距离：

$$D_{ij}{}^{r} = (D_{ij}{}^{c})^{p}\cdot(D_{ij}{}^{e})^{q}\cdot\Delta_{ij} \qquad (3)$$

在区域合并过程中，本文采取分级的合并策略，从距离最小的区域开始，以递增的方式进行合并，并对合并后的新区域距离作出相应的调整。

（2）区域合并的终止规则

何时终止区域间的合并作为区域合并的关键步骤，直接决定着区域划分结果的好坏。在上节介绍中可知，JSEG算法所采用的是阈值法的终止策略，基于颜色直方图的重复距离计算，对阈值的选取也要根据不同的图像进行相应的调整。本文利用了颜色量化过程中的颜色离散度概念，基于区域合并过程中颜色信息的损失量及合并后剩余的区域数相对于初始区域总数目之间的比例关系，提出了一种新的终止区域合并的准则。当合并区域内颜色不统一程度与终止合并时保留的区域比例达到最佳折中，即 $J_l + k_l$ 取得最小值时，可以理解为合并的区域尽量多时颜色不统一程度最低，停止合并。

在这里，我们将类内离散度的概念扩展到区域，用 $J_w{}^r$ 表示图像内一个区域的颜离散度，整幅图像的颜色离散度用 J_t 表示，定义对 K_l 个区域合并后的颜色离散度相对于 J_t 的比例关系为颜色不统一程度，可计算为：

$$J_l = \frac{\sum_{r=0}^{K_l} J_w{}^r}{J_t} \qquad (4)$$

那么，剩余的区域数目比例 k_l 就定义为：

$$k_l = \frac{K - K_l}{K} \qquad (5)$$

为了对后面图像触觉感知提供方便，最后我们利用类内离散度概念，计算出划分后的区域内的颜色离散度，并按照离散度递增顺序对区域依次编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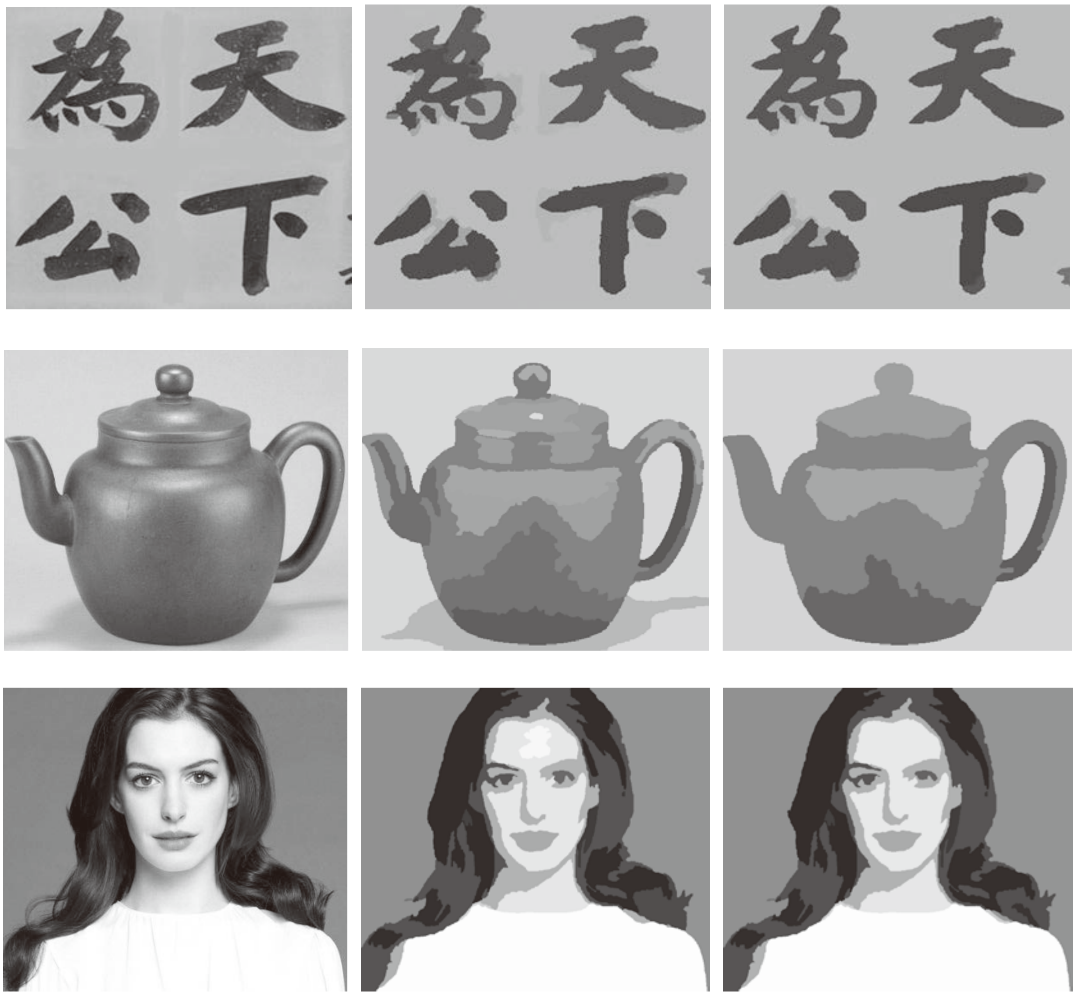
（3）后处理阶段

后处理阶段就是对合并完成后的图像进行图像增强，去除噪点，平滑边界，提高图像质量。本文借助半径为3个像素的圆形区域作为掩模对划分后的图像进行膨胀、腐蚀，得到最终结果图像。

实验分析

（1）区域划分实验

为了对改进后的算法进行有效分析，我们对三幅400×400大小的图像（见图5）基于VS2010平台进行了测试，从图像的划分效果和算法时间复杂度两方面与JSEG算法进行对比。



（a） 原图　　（b）JSEG划分结果图　　（c）改进的JSEG划分结果图

表1　JSEG算法与改进的JSEG算法对图5的划分时间对比（单位：s）

图片	JSEG 算法	改进的 JSEG 算法	相对时间降低
1	16.37	14.56	11%
2	9.88	9.32	5%
3	18.05	16.22	10%
平均值	14.76	13.37	9%

通过上面三组图片的划分结果对比，可以看出，新算法较好地划分出了图片主要区域，保证了划分质量，相对于JSEG算法的划分结果过度划分现象得到较好的改进。如图5中第一组图像，JSEG算法的划分结果便出现了过度划分现象，水印明显；第二组图中由于图中物体表面亮度不均的问题，所以在划分中出现物体颜色区域划分明显，容易看出JSEG划分的区域较多，把一些细节部分比如物体的影子、物体本身划分为较多层次；在第三组人物图像的区域划分中，依然有过分划分的现象出现，比如人物的额头部分，相比较本文算法的划分结果应更加符合人的主观视觉，既可以把主

要区域划分出来，又避免了触觉交互时由于区域复杂造成的模拟真实度下降的问题，由表1可以清晰地看出新算法的平均运行时间明显缩短。

触觉感知实验

对划分后的图像区域进行触觉感知，需要对这些不同的区域进行三维形状恢复，本文利用三角面片的形式对其形状恢复后，借助力觉交互设备PHANTOM Omni进行触觉感知实验。

我们用六幅刚性纹理图像（如图6）来进行触觉系统效果的验证实验。我们随机选取10人，其中包括6男4女，年龄在22到51岁之间，均无运动障碍疾病史，并且之前都没有进行图像虚拟触觉的经验，我们将他们分别编号为受试者1，受试者2，受试者3，……受试者10。在简单地学习了PHANTOM Omni的操作后展开实验。在实验过程中图像的外观隐藏，并随机安排图像，受试者借助PHANTOM Omni通过感知图像表面物体的纹理、三维形状以及力触觉的反馈，在六幅图像中选出自己与之交互的那幅图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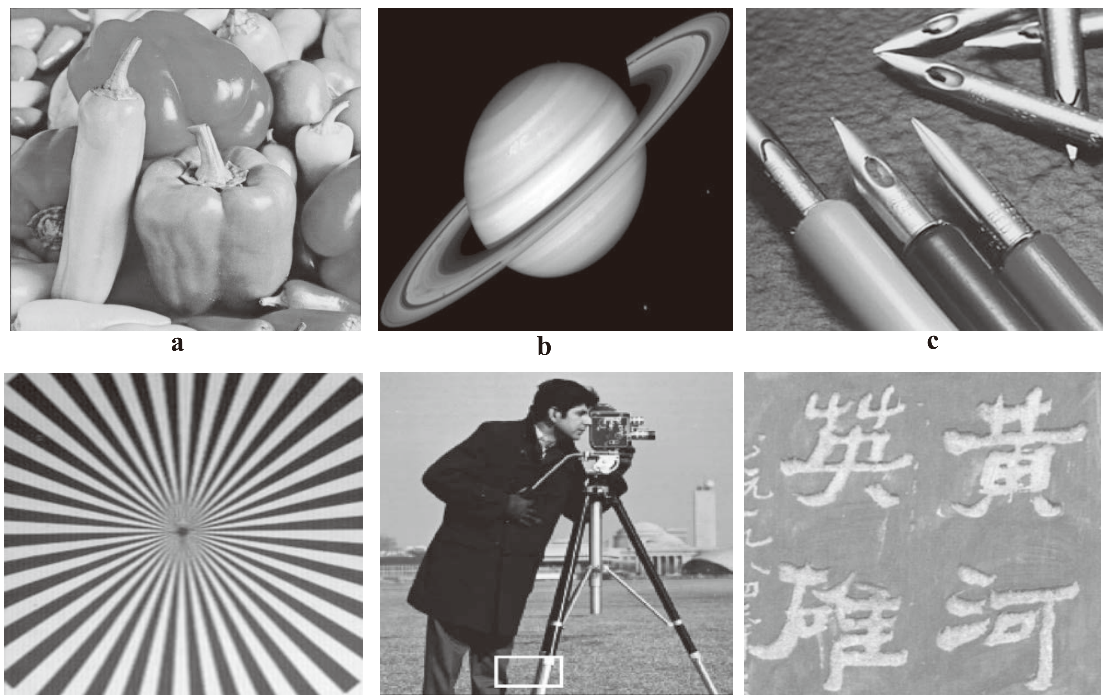


图6　力触觉感知实验图像

实验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可以看到10名受试者对图像识别的正确率明显较高，实验结果基本理想，错误的判断也在预料之中，且受试者在实验结束后表示每块区域的力触觉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触觉模拟效果也比较满意。

表2 图像力触觉感知识别结果（√表示识别正确，×表示识别错误）

受试者	（a）	(b)	(c)	(d)	(e)	(f)	正确率（%）
1	√	√	√	√	√	√	100
2	√	√	√	√	√	√	100
3	√	√	√	√	√	√	100
4	√	√	√	√	√	√	100
5	×	√	√	√	×	√	66.67
6	√	√	√	√	√	√	100
7	√	√	√	√	√	√	100
8	√	√	√	√	√	√	100
9	√	√	√	√	√	√	100
10	√	√	√	√	√	√	100
正确率	90	100	100	100	90	100	

计结果如表2所示，我们可以看到10名受试者对图像识别的正确率明显较高，实验结果基本理想，错误的判断也在预料之中，且受试者在实验结束后表示每块区域的力触觉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触觉模拟效果也比较满意。

结论

触觉图像是拉近视障观众与博物馆之间距离的一种有效方法。本文先提出了一种基于图像的3D打印技术，可以直接打印出藏品的盲用图像触摸板，供视障观众认知藏品。考虑到物体的区域和触觉纹理对视障观众辨识图像的重要性，我们开展基于区域触觉纹理特征的视障观众感知图像研究，建立了具有区域特征和触觉纹理特征的新型视障观众图像触觉感知系统。

此系统能够把博物馆数字化藏品通过网络进行跨时空的传播，让视障观众以虚拟的方式与不能实际触摸的珍贵藏品进行触觉交互，感知藏品的软硬、纹理、粗糙度和柔韧性等其他非视觉信息，实现了跨时空的心理感受，形成了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体验。进而，可以通过虚拟触摸向视障观众传递藏品的文化内涵，传扬历史文明，促进文化的有效传播，更深层次地理解文物的内涵。

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视障观众通过触觉获取数字图像信息，提高视障观众对数字图像的辨识度，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在博物馆互动体验中，这种技术的革命性在于把指令式人机交互变成了触觉式人机交互，使得观众可以“真实地”触摸到平时不可能触摸的藏品。在视觉、触觉、人脑记忆和构想的综合作用下，观众能触摸和操控“藏品”，给人们提供前所未有的交互体验。

视障观众是特殊的弱势群体，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更多关爱。我们应该遵循视障观众手指触摸

认知图像的规律，利用虚拟触觉设备帮助提高视障观众对数字图像的辨识度，通过触摸展品来感知自己心目中的历史文明。如果加上适当的盲文说明和语音导览，可以让视障观众也能跟正常观众一样，享受更完整的参观体验，可以用心感受艺术和历史，丰富视障观众朋友的精神世界！同时，虚拟触摸设备也可以让更多的视力正常的观众关注到“无光明人群”的需要，参观者都可以闭上眼睛，利用虚拟触摸设备感受和体验，重新用心发现文物和艺术品的魅力。对艺术爱好者来说，这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致谢：本文得到浙江省科技厅公益项目（2016C3317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61332017），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3E050025）的资助。感谢邸伟、张昊、项俊杰、周强、罗先权、敖发祥、朱长健、严明、董露杰、汪文妃、李昕等人参与实验。感谢论文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该文与杨文珍、罗佳丽、吴新丽、姜兆娜、吴跃成等人合写，原载2017年数字博物馆研讨会《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博物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年）

基思·穆克尔瑞及其《海洋考古学》的学术价值

海洋考古学的先驱之一基思·穆克尔瑞（Keith Muckelroy ）所著《海洋考古学》自197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一直是各国海洋考古学研究和教学的必读书之一，至今仍然被广泛认为是海洋考古学里程碑式的奠基性著作①。尽管40多年来出现了许多关于海洋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但基思·穆克尔瑞这部深思熟虑的著作及其对海洋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研究依然是经典之作②，被称为“备受欢迎的补充”③，至今还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即使这部《海洋考古学》属于40年前的研究成果，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还没有一本其他著作能直接取代它的位置，这证明了基思·穆克尔瑞的成就。有学者甚至说这部书应该得到跟西方考古学大师大卫·克拉克教授（David Clark）代表作《分析考古学》一样的评价④。

本文通过对基思·穆克尔瑞及其学术活动的介绍，希望对《海洋考古学》的学术价值以及影响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英年早逝

基思·穆克尔瑞生于1951年9月6日，1970年考进剑桥大学考古系。剑桥大学考古系有一个灵活

① Matthew Harpster： Keith Muckelroy： Methods, Ideas and Maritime Archaeology, J Mari Arch （2009） 4：67–82；Jonathan Adams： Comments on Keith Muckelroy： Methods, Ideas and Maritime Archaeology,Published online： 19 May 2009,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LLC 2009； Joyce Steinmetz：Mid-AtlanticC Deepwater Shipwreck Study： Side-Wheel Paddle Steamer Admiral Dupont, 1847–1865 https：//www.academia.edu/5292541； Matthew Harpster：Muckelroy, Keith （Extreme Environments）.Encyclopedia of Global Archaeology,2014； Paula Martin：Muckelroy, Keith （Underwater and Maritime Archaeology）,Encyclopedia of Global Archaeology,2014.

② J. Du Plat Taylor：Review of Keith Muckelroy （ed.）： Archaeology underwateR. An atlas of the World’s submerged sites. London & New York： McGraw-Hill, 1980. in Journal： Antiquity / Volume 55 / Issue 213 / March 1981, 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02 January 2015, pp. 66–67.

③ George F. Bass：review of Keith Muckelroy： Maritime archaeolog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in Antiquity / Volume 54 / Issue 210 / March 1980,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02 January 2015, pp. 67–68； Matthew Harpster：Keith Muckelroy： Methods, Ideas and Maritime Archaeology, J Mari Arch （2009） 4：67–82.

④ Jonathan Adams： Comments on Keith Muckelroy： Methods, Ideas and Maritime Archaeology,Published online：19 May 2009,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LLC 2009.

的研究传统，就是鼓励学生从第一年开始专攻某一项科目，也可以选择一个广泛的开始，第二学年再专注一门或者两门科目。显然，基思很早就对水下考古产生兴趣，第二年开始参加水下勘探小组（CUUEG），在潜水官杰夫·都伯里（Jeff Dubery）的指导下学习潜水。这个小组是1957年成立的，吸引了来自建筑、工程和自然科学的参与者，不完全是一个考古学团体，基思是该组织这些年唯一一位考古专业的学生，很快他就成为该组织的助理潜水员。

1973年，他带领一个由来自不同学科的潜水员组成的探险队，对利比亚阿波罗尼亚（Apollonia）的水下港口结构进行调查、测绘和研究。同年，在水下勘探小组的推荐下，他加入了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组织的位于设得兰岛的发掘工作，主要发掘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肯内默兰号”沉船（Kennemerland），并在1974年共同撰写了关于该遗址的第二季发掘报告①。对这艘从荷兰运货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武装商船的发掘是海洋考古学最早的实践之一。对基思·穆克尔瑞来说，这个分散的遗址成为他研究沉船形成过程的主要焦点。他很快成为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实践者和理论家之一②。

在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教授和大卫·克拉克教授的指导下，基思·穆克尔瑞于1974年夏天毕业获得本科学位，来到位于苏格兰东海岸的圣安德鲁斯大学海洋考古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一职。这个研究所是1973年才成立的，基思在所长科林·马丁（Colin Martin）的带领下，共同从事发掘和研究沉没于爱尔兰和苏格兰沿海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船只“特立尼达·巴伦西亚”号和“大格里丰”号以及马尔海峡的“达特茅斯”号快速舰遗址，长达六年之久。在这个时期，正像基思在其前言中所提到的，他已经开始构思这部《海洋考古学》的结构和内容了。其中最令人激奋的和富有创造力的真知灼见都是在与大海的直接联系中产生的。海洋使他的思想日臻成熟，并独具特色③。

在1975年至1978年期间，基思在《国际航海考古学杂志》《世界考古学》《不列颠尼亚》和英国航海协会季刊《水手之镜》等顶尖学术杂志上连续发表了7篇学术论文，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1977年，基思离开圣安德鲁斯，回到剑桥攻读研究生，他的兴趣集中于对欧洲青铜时代晚期沉船遗址的研究。对于英格兰南部沿海两处青铜时代沉船遗址的探索，充实了他的理论研究，并为他发展水下遗址调查和各种资料分析技术的方法奠定了基础。他以后陆续发表的著述，展示了史前遗

---

① Price,R.& Muckelroy,K.（1974）.The second season of work on the Kennemerland site,1973；an interim report. I.J.N.A.,3,257–68.

② Muckelroy,K.（1976）.The Integration of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Concerning an Historic Wreck Site： the Kennemerland. World Archaeology 7（3）：280–290.

③ ［英］科林·马丁（Colin Martin）：《致中国读者》，［英］基思·穆克尔瑞著，戴开元、邱克译：《海洋考古学》，第1–2页，海洋出版社，1992 年。

址是如何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使考古学记录熠闪光彩的①。

同年，基思接到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考古研究中心邀请担任考古潜水员一职，他的学术成就在英国学术界已经广为人知，无疑可以使他对海洋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起到持久和重要的作用。他热爱这一事业，并已经为之做出了如此卓越的成绩。10月，开始准备博士论文《论海洋考古学与晚期青铜时代跨渠道联系的几个问题》，并在12月完成了他第一部学术著作《海洋考古学》的初稿。

1978年，他继续在“肯内默兰号”进行第五季的发掘工作，并担任水下探险小组（CUUEG）的考古主管。这一年，他的《海洋考古学》出版，被誉为“由一位备受尊敬的英国海洋考古学家撰写的重要著作”，代表着“水下考古学时代的到来”。

1979年和1980年同样忙碌，他带领水下探险小组前往希腊的普利特拉，并对德文郡兰登湾附近的第二个青铜时代遗址进行进一步调查②，并准备另外两部书稿的草稿。

1980年，基思·穆克尔瑞刚刚过完29岁的生日，正是风华正茂之时，却不幸在苏格兰第六大湖泰湖（Loch）的一次潜水事故中去世，年轻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学术界失去了一位才识过人的青年学者，实在是令人扼腕长叹！他的最后两部学术著作《水下考古学：世界水下遗址地图集》和《发现历史沉船》，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出版③。

学有师承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专业在英国乃至全球都是声名卓著的，已有百年历史，一直被誉为考古学家的摇篮。这里不仅汇聚了全球最顶尖的导师和最先进的仪器设备，也孕育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理念。基思在剑桥大学有幸得到了两位著名考古学大师的教诲，让他的学术观念与以往考古学家所采用的传统主义或历史学方法迥然有异。基思《海洋考古学》一书也揭示了他如何师承往哲先贤的精髓，在史前考古学的基础上，坚持了20世纪70年代逐渐成熟的新考古学基本原则④。

有趣的是基思的两位老师的姓都是一样的，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和大卫·克拉

① Muckelroy,K.（1977）.Historic Wreck Sites in Britain and Their Envir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6（1）：47–57；A Possible Seventeenth-Century Dutch Backstaff, The Mariner’s Mirror Vol. 63, London, pp 213–214.

② Muckelroy, K.（1980）. Two bronze age cargoes in British waters. Antiquity Vol 54 number 211 pp100–109.

③ Muckelroy, K.（1980）.Archeology Under Water： An Atlas of the World’s Submerged Sites. McGraw-Hill, New York；Muckelroy, K.（1981）.Discovering a Historic Wreck： A Handbook Offering Some Advice on What to Do When You Find an Archaeological Site Under Water （Handbooks in Maritime Archaeology）.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④ Matthew Harpster： Keith Muckelroy： Methods, Ideas and Maritime Archaeology, J Mari Arch （2009）4：67–82.

克（David Clark）。

格雷厄姆·克拉克教授（1907—1995）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史前学家之一，专门研究中石器时代的欧洲史和古经济学。克拉克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包含了景观、经济和社会主题，而不仅仅是贴有标签的器物。他更关心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如何或为什么。这与其他考古学家过分关注器物类型相反。

从1972年起，克拉克开始大量参与使用新开发的科学技术来分析考古材料。受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考古模式的影响，克拉克利用民间传说和民族志来更好地了解史前的生存方式。尽管如此，他并没有不加批判地使用这样的类比，他相信当较旧和较新的社区之间存在持续的历史联系，并且他们都生活在非常相似的环境条件下时，它们才最有用。

克拉克帮助将史前考古学确立为“完全专业的学科”，具有明确概述的目标和方法及基础。他是生态学、功能主义考古学方法的先驱，也是第一位撰写全球人类史前史的考古学家。

基思·穆克尔瑞非常推崇克拉克教授的代表作《考古学与社会》，尤其是关于遗址保护的一章，启发了基思《海洋考古学》的很多想法[①]。克拉克关于环境因素对遗址保存情况的影响分析、文化重建的思路深刻影响了基思。正如克拉克写的干热或湿冷的气候一样，基思写的是海流、海浪和风向。克拉克讨论不同类型的土壤，基思用同样的方法讨论了海床的坡度、地形以及不同的沉积物。基思将克拉克的气候和地质过程转化为水下分解和海床运动。克拉克关于社会行为的第三部分，同样启发基思讨论在水中的打捞活动。最终，基思破译沉船遗址形成的过程与克拉克描述人工制品生存或消失的章节异曲同工[②]。

另外一位大卫·克拉克（1937—1976）是格雷厄姆·克拉克教授的学生，以过程考古学（另译为“新考古学”）而闻名。1964年他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导师就是格雷厄姆·克拉克教授。

大卫·克拉克教授早期研究分析考古学，重视系统论、量化和科学推理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并将生态学、地理学和比较人类学牢牢地纳入考古学的范围。他强调一个合格的考古学家必须具备这些学术知识。他的代表作《分析考古学》对基思的影响最大[③]。

大卫·克拉克试图建立一系列解释考古学数据的科学分析方法，并试图证明这些方法如何成为考古学的基础。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供其他考古学家遵循的指南，在这种情况下，基思就是这些考古学家之一。他对基思的统计学和系统理论的应用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并为他提供了可以进行分析和测试想法的框架。基思统计分析的大部分应用都采用了《分析考古学》中的观点。

《海洋考古学》对于古代社会的认识方式，也参考了《分析考古学》所探讨的社会子系统的体

① Clark, G.（1939）. Archaeology and society.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② Matthew Harpster： Keith Muckelroy： Methods, Ideas and Maritime Archaeology, J Mari Arch （2009） 4：67–82.

③ Clark, D.（1968）. Analytical archaeology. London：Methuen and Co., Ltd.

系。在探索海洋考古学这一新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时，基思通过不同层次的研究来充分估计出各个沉船遗址的意义，勾勒出这一分支学科的整个范围。这种分析层次与《分析考古学》中提出的分析层次非常相近，但克拉克教授采用周密的分析方法是为了从器物和器物组合方面获取大量的知识，基思则花了很多精力论及遗址及其形成过程。

克拉克教授知识渊博，且乐于提携后进，对学生给予极大的包容和鼓励，深受基思和其他学生的热爱。基思的这本《海洋考古学》就是1974年受克拉克教授的委托，成为其《考古学新研究》出版系列的一部分，于1977年12月完成的。可惜克拉克教授在1976年突然死于败血症，基思·穆克尔瑞在前言中把《海洋考古学》作为献给老师的礼物。他深情地说："令人悲痛的是，这本曾得到他大力支持的著作，现在却只能作为一件菲薄的奉献品来报答他的恩情了。"[①]

除了这两位考古学大师之外，基思的导师还包括"世界水下考古之父"乔治·巴斯（George Bass）教授。1960年，他率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队员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沉船进行的水下调查和发掘，是世界上最早并且最规范的水下考古实践。他建立的标准、理论及工作程序，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考古工作者努力遵循的楷模[②]。他主编的《基于水下考古学的航海史》也是基思推崇的经典之作，在他的书中多次引用。巴斯教授认真阅读了基思的《海洋考古学》，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他将基思视为海洋考古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当然，他更喜欢基思的另一部专著《水下考古学》，因为他认为《海洋考古学》的研究过于学术化。

科林·马丁（Colin Martin）是基思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工作期间的导师，他指导了基思对西班牙舰队船只的突破性研究，为基思提供该书许多观点得以产生的知识背景，还通读了全书初稿并和他讨论过其中的不少章节。他跟巴斯教授一样，已经花了十年的时间来完善水下调查和发掘的技术，并证明了这些成果与在陆地上获得的成果一样行之有效和富有价值。作为一个年轻的后来者，基思的角色是在这些基础上承嬗离合，将海洋考古学发展成一门成熟的学科。正如许多人所评论的那样，基思的研究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自信的第一步。

薪火相传

基思·穆克尔瑞的英年早逝虽然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让后人痛心惋惜，但他的名字并没有渐渐消弭，无人铭记。恰恰相反，40多年来，基思·穆克尔瑞形骸虽无但精神不灭，他的理论通过其《海洋考古学》承前草创，启后规模，影响了几代学者不断在海洋考古学这条艰难的路程上砥志研思，深稽博考。

---

① ［英］基思·穆克尔瑞著，戴开元、邱克译：《海洋考古学》，第12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

② ［英］基思·穆克尔瑞著，戴开元、邱克译：《海洋考古学》，第17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

曾经写过《考古学与船舶社会史》的美国布朗大学考古学教授古尔德（Richard Allan Gould）回忆说，他1977年在剑桥出版社见到基思之前，对海洋考古完全没有概念，由于跟基思多次兴奋的交谈才对海洋考古产生兴趣。“正是基思，而不是别人，将这种观念移植到我的大脑中，即水下考古学拥有学术上的合理性，而绝不只是神秘详细的航海故事和航海技术。”“他的《海洋考古学》为我沿此方向开辟了途径。20年后，对于熟悉基思工作的人来说，其卓具才智的影响在我的书中将清晰可见。对于在这一航行之始他所给予的激发与鼓励，我深为感激。”[①]

20世纪80年代，美国有越来越多的海洋考古学家受到了基思・穆克尔瑞的影响。在这些研究人员中，有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乔治・费舍尔（Fischer）及其学生。1983年，费舍尔领导了对1748年英国军舰“富伟号”（HMS Fowey）的系统性发掘，就像基思・穆克尔瑞在“肯内默兰号”所做的一样，使用网格系统和分层取样策略来确定文物模式。菲舍尔的学生在研究沉船遗址的过程中，也继续应用过程考古学理论，以寻求比较沉船文物组合中的定量模式[②]。

1998年出版的《海洋考古学：实质性和理论性贡献的读本》一书面向有志于从事海洋考古的学生以及关心海洋考古的公众，对该学科的发展和现状提供了及时的观察和评论。该书特意转载了基思《海洋考古学》一书中的三个章节，作为对他的致敬[③]。

1999年，中国著名海洋考古学家、厦门大学吴春明老师在他早期研究海洋考古学的论文中也多次引用了基思这部书的观点和资料[④]。

进入千禧年后，基思・穆克尔瑞的遗址分布模式继续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海洋考古学家。科林・马丁以基思・穆克尔瑞的技术为基础，对整个北欧的遗址进行了研究[⑤]。托马林（Tomalin）等人在2000年有意识地遵循这一方法，在英国怀特岛附近的泼默恩（Pomone）遗址取得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马丁・吉布斯（Martin Gibbs）2006年的一篇论文扩展了基思・穆克尔瑞的模型，以考虑灾难发生时的人类行为以及人与沉船之间的长期关系。该模型使用对参与灾难的人类的研究，将人类活动描述为围绕失事时间的不同阶段[⑥]。

① ［美］理查德・A.古尔德著.考古学与船舶社会史，第71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

② Chuck Meide：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Evolving Use of Theory by Maritime Archaeologists（2013）https：//www.academia.edu/4376520

③ David J. Stewart：Northeast Historical Archaeology Volume 27 1998 Book Review：Maritime Archaeology：A Reader of Substantive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edited by Lawrence E. Babits and Hans Van Tilburg 1998, The Plenum Series in Underwater Archaeology, Plenum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④ 吴春明.试说海洋考古与社会经济史学的整合[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1）：1–7.

⑤ Joe Flatman and Mark Staniforth：Historical maritime archaeology,Article - October 2006 DOI：10.1017/CCO9781139167321.010 - Source：OAI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2894250

⑥ Martin Gibbs：Cultural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in Maritime Archaeology：Disaster Response, Salvage and Muckelroy 30 Years on,First published：06 January 2006 https：//doi.org/10.1111/j.1095–9270.2006.00088.xCitations：21

2016年，马修·基思（Matthew E. Keith）在其主编的《沉船遗址的形成过程》（*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of submerged shipwrecks*，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导言中概述了海洋考古学中遗址形成理论的发展，介绍了基思·穆克尔瑞的基础性工作，并采用了他开发的流程图方案，用于解释环境和遗址的形成过程①。2017年南安普顿大学的莎拉·霍兰德（Sarah Holland）在她的博士论文《沉船简史：重新调查和持续管理英吉利海峡沉船遗址的综合方法》中基于《海洋考古学》的理论，对适合重新调查的分散性遗址提出新的解决方案②。

一直到2020年，在巴西塞尔吉佩联邦大学鲁阿娜·巴蒂思塔·古拉尔特（Luana Batista-Goulart）研究沉船遗址形成过程的论文中依然重视"第一个研究沉船遗址考古学形成过程的考古学家基思·穆克尔瑞及其名著《海洋考古学》一书"③。

此外，基思的同事和朋友们通过建立"基思·穆克尔瑞纪念奖"（The Keith Muckelroy Memorial Award），评选出英国海事、航海或水下考古学方面的最佳作品，让基思的开创性思想和学术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承和发展④。

作为勉励后学的精神遗产，"基思·穆克尔瑞纪念奖"旨在奖励涉及海洋、航海或水下考古学的优秀出版物，作者的国籍、书籍出版地点以及项目地点均不受限制，但要求提交作品必须用英文写作。从2004年起，"基思·穆克尔瑞纪念奖"已经成为英国考古奖的一部分，由基思·穆克尔瑞信托基金（Keith Muckelroy Trust）、IFA海事小组、航海考古学会和地方政府考古官员协会海事委员会赞助。

该奖项的评委有他的老师和同事科林·马丁博士（圣安德鲁斯大学）、保拉·马丁博士（Dr Paula Martin，《国际航海考古学杂志》编辑）、戴夫·帕勒姆（Dave Parham，伯恩茅斯大学）、马克·雷德克纳普博士（Dr Mark Redknap，威尔士国家博物馆）和艾莉森·谢里丹博士（Dr Alison Sheridan，苏格兰国家博物馆）等。

"基思·穆克尔瑞纪念奖"没有奖金，只有一个证书和奖杯，但还是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参与。海洋考古学者们也以获得这项奖项为荣。如澳洲的吉米·格林（Jeremy Green）是航海考古学委员会成员、西澳大利亚大学史前史中心荣誉研究员、考古学研究所研究员、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研究

① Robert Witcher：MATTHEW E. KEITH （ed.）.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of submerged shipwrecks. 2016.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SEAN A. KINGSLEY. Fishing and shipwreck heritage： marine archaeology's greatest threat？ 2016.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Reviews New Book Chronicle by Antiquity Publications Ltd, 2016.

② Sarah Holland：Shipwreck bibgraphies：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for the re-investigation and ongoing management of shipwreck sites of the English Channel.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18046921

③ Luana Batista-Goulart：A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shipwreck sites formation processes， https：//hal.archives-ouvertes.fr/hal-02463968 Submitted on 4 Feb，2020.

④ https：//www.nauticalarchaeologysociety.org/keith-muckelroy-award

员和航海考古学研究所研究助理，科廷科技大学和詹姆斯·库克大学的兼职副教授，也是《国际航海考古学杂志》的顾问编辑。在自我介绍中他把获得“基思·穆克尔瑞纪念奖”作为自己的殊荣①。顺便说一下，这位格林先生对中国海洋考古学也有相当的贡献，后面还要提及。

由于疫情缘故，我们迄今还没有看到2020年“基思·穆克尔瑞纪念奖”的评奖活动的报道。纵览历年“基思·穆克尔瑞纪念奖”的评比资料，被提名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其主题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例如，2013年“基思·穆克尔瑞纪念奖”得主为巴里·坎利夫（Barry Cunliffe）的《不列颠的开端》（*Britain Begins*，牛津大学出版社）。该书以海洋视角贯穿整个论证过程，给评委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正是吸引基思·穆克尔瑞的那种视角和理念，它融合了海洋考古学的所有方面，对英国各民族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看法，构成了对英国历史的一个非常易于理解的介绍。

2015年的“基思·穆克尔瑞纪念奖”得主为斯图亚特·尼德汉姆（Stuart Needham）等人撰写的《大海的召唤》（*Claimed by the Sea*），其清晰无缝地叙述，体现了基思·穆克尔瑞的思想，即将这些遗址视为水下考古学和陆地考古学之间的桥梁，跨越了当时存在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的观念鸿沟。如果没有基思·穆克尔瑞的开创性努力，这些最初未受保护的遗址就得不到科学的发掘，也不会以这种规范的方式整理出这份出版物。从发现和发掘遗址的方法到地貌学分析以及遗址形成过程的建模，创造了对古老历史的新理解，评委们一致认为这部书是对海洋考古学的重大贡献。

在对提交的作品进行排名时，评委们遵循的标准是，获奖作品应该是 “最能反映基思·穆克尔瑞的兴趣和愿望”。换句话说，基思·穆克尔瑞自己会选择哪一个。如果基思·穆克尔瑞在天之灵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学术价值

（1）首先是基思·穆克尔瑞对海洋考古学的明确定义。基思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水下遗址的分析调查和解释，这也是他的博士论文和许多出版物的主题。在他的时代，海洋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还很年轻，但已不再是一个新鲜事物。英国特别是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前辈们正在吸收新的哲学思想和分析方法，并尝试应用在海洋考古学的研究中。因此，基思·穆克尔瑞浸润在剑桥大学这个“考古学理论温室”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很早开始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海洋考古学的理论范畴，从而前瞻性地对海洋考古学的本质属性做深入的思考。

---

① Australian Archaeology Number 66, June 2008, pp.94.

基思《海洋考古学》探讨了海洋考古学的各种特征，把学科定义为“对人类及其海洋活动物质遗存的科学研究①”。他明确指出，研究的首要对象是人，而不是研究者直接接触的船只、货物、设备或仪器。考古学与其说是研究遗物本身，不如说是通过遗物来了解制造或使用它们的人。其次，他强调海洋考古学关心的不仅仅是船舶，而是与最广泛意义上的海洋活动有关的一切物质。海洋考古学涉及海洋文化的各个方面，不仅有技术问题，还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及其他许多方面的问题，从而使这一年轻并且缺乏系统理论基础的考古学分支具有明确的内涵②。查克梅德（Chuck Meide）评价说，自基思以来，没有一位考古学家的观点对海洋考古学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有了这个框架，该学科明显走向了对人类、陆地和海洋之间关系更加全面的理解③。

基思・穆克尔瑞让海洋考古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概念很快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其独具特色的方法论以及对历史现象的评判方式，形成了解释海洋文化遗产问题的现代科学观点④。海洋文化遗产被定义为与航行和人类发展所有方面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和⑤。正是由于基思・穆克尔瑞的影响，“海洋考古学”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其他曾经常用的术语，如航海考古学、水下考古学、船舶考古学等⑥。

（2）其次，基思・穆克尔瑞开发了沉船形成过程模型，对水下遗址形成过程有了更系统的了解，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存的考古记录，并澄清影响沉船遗址的全部考古学背景。40年来，这一方法已被广泛用于考古沉船遗址的发掘、记录和解释。可以说，这是基思《海洋考古学》最主要的贡献之一⑦。

基思认为，在海洋考古学中，任何正确的结论都取决于对沉船过程的认识。因此，对沉船过程的研究必然在海洋考古学中占有中心地位。通过了解遗址的形成过程，考古学家可以更准确地了解文物的分布和沉船的腐烂，从而更完整和准确地重建船上的生活。但以往许多沉船遗址的考古报告往往对沉船的过程及其以后的情况轻率地做出不合实际的臆测，从而降低了其价值和权威性⑧。

---

① ［英］基思・穆克尔瑞著，戴开元、邱克译：《海洋考古学》，第3页，海洋出版社，1992 年。

② 吴春明，张威.海洋考古学：西方兴起与学术东渐[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43-49.吕章申主编.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成果[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5.27.

③ Chuck Meide：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Evolving Use of Theory by Maritime Archaeologists（2013）https：//www.academia.edu/4376520

④ David Berg Tuddenham：Maritime Cultural Landscapes, Maritimity and Quasi Objects,Published online： 8 May 2010

⑤ Nikolaev Ivan：Maritime Cultural Heritage： The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n the Example of Great Britain（2020）DOI： 10.36343/SB.2020.21.1.002

⑥ Chuck Meide：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Evolving Use of Theory by Maritime Archaeologists（2013）https：//www.academia.edu/4376520

⑦ David Gibbins：Analytical approaches in maritime archaeology： a Mediterranean perspective Journal： Antiquity / Volume 64 / Issue 243 / June 1990，Published online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02 January 2015, pp. 376–389

⑧ ［英］基思・穆克尔瑞著，戴开元、邱克译：《海洋考古学》，第162页，海洋出版社，1992 年。

在1973年至1978年的发掘工作中，基思·穆克尔瑞直接受到已经用于陆地遗址的类似模型的影响，开发了研究分布模式的统计方法。1976年，基思在《世界考古学》发表题为《沉船遗址的历史与考古数据整合研究——以“肯内默兰号”为例》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沉船遗址形成过程的理论构想。

1978年，基思·穆克尔瑞在《海洋考古学》中扩展了该理论，用很大篇幅详细讨论了沉船遗址和地貌的形成过程。在他提出的11个影响遗址形成的因素中，有4个是地貌因素，包括他发现的决定考古遗迹生存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水下地形、最粗沉积物的性质和最细沉积物的性质①。接着，他用流程图表示沉船遗址形成过程的理论，并使用统计模型来澄清大量的数据，以辨别沉船过程中的模式。这些想法以前从未被提出过②。

他的这些概念与新考古学呼吁更加科学的分析方法不谋而合，并首次将其引入水下沉船研究当中。基思的沉船遗址形成理论成为解释沉船遗址的经典模型，直至今天，对水下遗址（尤其是沉船遗址）堆积物的讨论研究，都要从基思的《海洋考古学》谈起。所以，有学者称基思·穆克尔瑞在海洋考古学界“引起了一场革命”③。

（3）基思·穆克尔瑞提出船舶是前工业社会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特征，船员也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具有特定的海洋文化，并受到当时经济和社会框架以及周围海洋环境和与船舶本身关系的影响。基思·穆克尔瑞提出了一个解释框架，用于在其历史背景下更好地理解沉船，这个框架系统的三个方面是：①船舶作为一种机器，旨在利用动力源作为运输工具；②船舶作为军事或经济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提供其基本存在理由；③船舶作为一个封闭的社区，有自己的等级制度、习俗和惯例。在回顾历史上人们对船舶及其作用的理解时，可以看到他对“系统”的明确表述，即船舶的技术机构与总体的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及社会理想交织在一起。许多海洋考古学家在寻求了解船舶作为更大文化系统一部分的时候，这一模型已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④。

（4）基思·穆克尔瑞善于衡量学科变化的趋势，并且具有挖掘新考古学时代精神的能力。剑

---

① Matthew E. Keith （ed.）.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of submerged shipwrecks. 2016.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7–43；［英］基思·穆克尔瑞著，戴开元、邱克译：《海洋考古学》，第169页，海洋出版社，1992 年。

② M. Secci & others：A LIVING SHIPWRECK： An integrated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site formation processes in archaeological shipwreck sites in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 volume 35, Feb 2021 ； Chuck Meide：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Archaeology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Evolving Use of Theory by Maritime Archaeologists（2013）.https：//www.academia.edu/4376520.

③ Yftinus van Popta： Lost Islands, Drowned Settlements and Forgotten Shipwrecks： interaction between aspects of the maritime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former Zuiderzee（AD 1100–1400）, 2015 https：//www.academia.edu/35876871.

④ Johan Rönnby & others ：Interpreting shipwrecks. Maritime archaeological possibilities, January 2013：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9428001；［英］基思·穆克尔瑞著，戴开元、邱克译：《海洋考古学》，第231页，海洋出版社，1992 年。

桥的学术环境对他方法论的形成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但基思・穆克尔瑞并不是简单地模仿或者套用。在分析沉船遗址的环境时，他利用海岸形态学的方法，保持了克拉克教授应用生物科学方法的习惯，以及整合各个不同社会科学的做法。他将海洋考古学定义为一种科学实践，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追求核心问题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进步。他在书中对计算机潜力的讨论，反映了这个时代考古学的技术性越来越强，在许多方面，没有计算机就不可能完成。当然，他的研究也包括了系统理论和基于归纳推理的一般规则，所有这些都是新考古学的标志[①]。

基思・穆克尔瑞在他的第二篇文章《调查分散的沉船遗址的系统方法》（1975年发表在《国际航海考古学杂志》上）中已经包含了他在克拉克等教授的指导下应用统计方法的尝试。具体而言，基思展示了矩阵分析和数字分类法如何被用作解释分散沉船遗址的手段，以及这些遗址如何因此值得进行多学科的考古学研究。

矩阵分析是一个统计过程，确定一组样本的相似、相关或差异程度。这些样本可以是任何特定的东西，但集合中的每个样本必须由一组共同的离散特征来量化，根据这些样本来推断古代社会的情况需要应用概率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由此得到的结论和知识才能具有统计性质，才能避免主观臆测。基思把分散的沉船地点定义为缺乏连贯的船体结构，需要确定整个考古现场不同文物类别之间的相关性和关联性，并对这些文物样本进行比较以确定其相似度。在他的分析中，文物类别的集群似乎与它们在船上的作用相匹配：最大的集群是货物，而外围的集群是设备、供给或船员个人物品。他证明了有可能定量地、而不仅仅是凭直觉来确定分散沉船遗址上哪些文物类别是货物的一部分，哪些是个人物品。基思的统计方法本质上是可复制和可检验的，可以被反复应用于许多沉船遗址，每一次的结果都将是同样有效和可比较的。因此，这项研究是基思・穆克尔瑞更大目标的第一步，即整理来自大量遗址的数据，并通过分析这些数据，确定准确描述水下遗址的一般规律。

《海洋考古学》在中国

1978年我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跟随著名考古学家刘敦愿教授和蔡凤书副教授等老师系统学习了跟考古学有关的各项课程。山大的考古专业是1972年开始创办的，我们应该是第三届学生，初创时期教学和生活条件比较简陋，刚刚进校时20人住一个宿舍。但老师们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教学认真，循循善诱，学术氛围十分浓厚。我们同班同学年龄相差很大，平均年龄28岁（只有我和三位同学是应届毕业生），大多都是工作多年才得到高考的机会，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他们刻苦努力，拼搏进取，希望把被“特殊时期”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同时，强烈地求知

① ［英］基思・穆克尔瑞著，戴开元、邱克译：《海洋考古学》，第196页，海洋出版社，1992 年。

欲让大家不满足于国内现有的教材，总是想知道国外的研究现状。这样我受到了感染和激励，利用业余时间阅读过一些国外的考古学论文和专著，曾经翻译过英国考古学家罗纳德·杰苏坡（Ronald Jessup）撰写的《奇妙的考古世界》（*The Wonderful World of Archeology*）一书，作为我的毕业论文。

1982年本科毕业后，我考取了山东大学历史系中西交通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维华教授，开始对中国造船史和航海史产生兴趣。研究这些课题当然离不开考古资料，尤其是水下考古，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力。

1983年5月，我赴江西九江参加了中国航海学会（及其下属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组织的“纪念郑和学术讨论会”，认识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造船史研究生戴开元和他的导师、造船史专家周世德先生。戴开元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后来在长江轮船上工作多年，研究造船史可谓得心应手。因此，我经常向他求教各种造船史的问题。

同年，戴开元跟我分享了基思·穆克尔瑞的《海洋考古学》，我们阅读后都认为这部书应该对中国的未来海洋考古学有所助益，就利用各自的业余时间（当时我俩都要应付研究生的课程）开始分工合作，前后花了一年的时间把这部《海洋考古学》翻译出来。海洋出版社虽然同意和支持我们翻译此书，但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对海洋考古学还没有太多的认识，征订结果非常不理想，所以出版之事一拖再拖，一直到1992年才予以付梓①。该书出版的时候，我们两人也不知道，因为戴开元已经去美国留学深造，我在读完博士之后选择了下海经商。

就在我和戴开元一起翻译《海洋考古学》的过程中，1983年，周世德先生发表《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与海洋考古》②；1983至1984年间，我也撰写了《海洋考古学与海交史研究》和《浅谈海洋考古学》两篇论文③。其中《海洋考古学与海交史研究》只是一个铅印本，作为山东大学历史系中西交通史教研室的教材分发给兄弟院校和科研机构；另外一篇《浅谈海洋考古学》发表在《海交史研究》1984年总第6期。我主要根据基思《海洋考古学》一书，也利用了其他的一些外文资料，简要介绍了欧美和日本海洋考古学的发展情况，并对海洋考古学的定义、方法、研究范围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④。戴开元1984年在《科学史译丛》第2期上摘译过基思·穆克尔瑞的部分内容，题名为《海洋考古学的发展史》。

这四篇文章是1987年之前中国学术界对海洋考古的基本认知，大部分知识都来自基思·穆克尔瑞的《海洋考古学》，比中国考古学泰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先生在百科

---

① 汪笑砾：《<海洋考古学>即将出版》，《水下考古通讯》第三期，1989 年 8 月，第 23–24 页；［英］基思·穆克尔瑞著，戴开元、邱克译：《海洋考古学》，海洋出版社，1992 年。

② 周世德：《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与海洋考古》，《海交史研究动态》总第 15 期，1983 年。

③ 邱克：《海洋考古学与海交史研究》（铅印本），山东大学历史系中西交通史教研室，1983 年 1 月.

④ 邱克：《浅谈海洋考古学》，《海交史研究》1984 年总第 6 期。

全书“考古学”总条中的相关认识还要早，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实际上，1983年刘敦愿先生曾写信介绍我去拜访过夏鼐先生，并把《海洋考古学与海交史研究》这份铅印本送给夏鼐先生。所以在《夏鼐日记》里面有两次提及我的名字，他也曾经给我回信[①]，给予我莫大的鼓舞。

在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的亲自主持下，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成立水下考古研究室（现已合并到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同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中澳合作海洋考古研究项目”，这是我国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该项目的澳方教授主要是澳大利亚博物馆海洋考古部主任吉米·格林，他是水下考古学之父巴斯的学生，也是“基思·穆克尔瑞奖”的获得者。因此从技术与学术源头上说，中国的海洋考古是世界海洋考古的组成部分。现任青岛市博物馆馆长的邱玉胜就是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的学员，他回忆说基思的《海洋考古学》中文版是他们重要的参考资料。另外一位第一届的元老、现任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和研究馆员的孙键先生告诉笔者，当年他自己到海洋出版社，把所有的《海洋考古学》存书都买回去做了参考书。他说：“中国的考古学整个都是从国外引进来的，田野考古就是老一辈从国外学成带回来的，一开始就和国际接着轨。水下考古学也是一样，开始时我们真是一无所知。正因如此，就可以直接面向世界，主动向国外学。”[②]广州考古工作者陈博宇说，回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思的《海洋考古学》正是在我国水下考古诞生之初、国内尚未出版任何一种综合性水下考古专著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若从中国水下考古学术史的角度看，译介工作意义非凡，其对学科发展思路的影响无疑举足轻重[③]。

结语

基思·穆克尔瑞完成《海洋考古学》时，刚刚26岁，从大学毕业仅仅3年，学习潜水只有6年的时间。作为一位海洋考古学的白衣骑士，他提出了富有开创性的想法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并在海洋考古学和过程考古学之间建立了一个有机的关联。《海洋考古学》对海洋考古学领域的影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非常显著的[④]。这部著作虽然只是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一位英国年轻海洋考古学者的观点，但作者试图使书中提出的体系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适用于一切尽责而科学的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基思·穆克尔瑞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起点，

① 《夏鼐日记》卷九第217、230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丁见祥：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序章——以《夏鼐日记》为线索（中国考古网2020年6月19日）http：//www.kgzg.cn/a/1554.html

② 《水下考古探寻中国海洋文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www.scio.gov.cn 2010-06-27

③ 陈博宇：回望起点——纪念基思·穆克尔瑞逝世四十周年，考古大家谈，2020年12月28日 https：//mp.weixin.qq.com/s/GQGKcpF3vhTcLlxxiIVFOA

④ Matthew Harpster：Keith Muckelroy： Methods, Ideas and Maritime Archaeology, J Mari Arch（2009）4：67–82.

我们可以从这个起点上继续进步①。

圣安德鲁斯大学海洋考古研究所所长科林・马丁如此评价基思的工作：基思总是将海洋考古学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学科，认为这一学科不可能局限于某些特殊领域、时期或地理分布，只有将部分和整体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才能认识到其真正的价值。从这种观点出发，对某一特殊遗址所进行的探讨，就比孤立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例如，基思自己在“肯内默兰号”沉船上所做的深入研究，就是对探讨沉船的特殊时代和整体关系的重要贡献。但其更为广泛的价值则在于将一个残破遗址上的沉船形成过程看成是一个有规律可循的过程，这一看法适用于世界各地所有时期的残存沉船遗址②。

中国既是大陆文明国家，也是海洋文明国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民族之一。考古学证明，中国有着悠久的海洋文化和航海活动，是享誉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创国。随着中国海洋考古及航海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华航海精神也向世界展现出灿烂辉煌的内涵。海洋考古对中华海洋文明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海洋考古学也是一项充满理想与激情的研究，拥有极为广泛的主题，从搜索古代文明到绘制消失的贸易航线，都具有无穷魅力并充满挑战。希望更多的年轻学子通过对基思・穆克尔瑞及其《海洋考古学》的认识，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海洋考古学的建设之中，不断创新理论与方法，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海洋考古学的教学和科研平台。

最后，要感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各位老师，在山大期间的考古学和历史学训练对于我后来的人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的考古情节始终没有泯灭，一直以欣喜和自豪的心情关注着母校考古专业一步步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特别要感谢方辉院长为《海洋考古学》再版所做的努力，没有他的关心和鼓励，这部30年前出版的译著不可能再次跟读者见面；海洋出版社原副总编刘义杰先生为此书的再版也多次斡旋，做了精心安排；责任编辑张欣女士为书稿编排校对付出了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

①　[英]基思・穆克尔瑞著，戴开元、邱克译：《海洋考古学》，第10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

②　[英]基思・穆克尔瑞著，戴开元、邱克译：《海洋考古学》，第1–2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

定向音箱给博物馆观众带来新奇的视听感受

传统博物馆的陈列语言以实物、照片、文字说明、雕塑、模型等为主，有时会显得呆板，也不利于参观者了解展品的文化内涵。现代博物馆为了适应大众的欣赏口味，运用了很多声光电等科技手段，使展品更多地“活”起来，展示给参观者一个活灵活现的生活场景，使参观者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真正能够达到获取知识、陶冶情操的目的。

什么是定向音箱

博物馆陈列的展品数目众多，而且地方空间有限，如果使用一般的扬声器发出的声音是面向四面八方传播，各个声音之间必然会相互干扰，让参观者有种像逛菜市场一样的感觉，让博物馆花费很大心血去营造的氛围大打折扣。如果有的导游讲解水平参差不齐，游客听得一知半解，错过即无法补充；环境嘈杂，也让游客观展心情受到影响。

不少博物馆为此专门为观众提供了耳机，但长时间佩戴容易引起耳朵或头部的不适。不仅管理起来很麻烦，交叉使用耳机也不卫生，而且经常需要维护。

定向音箱利用最新声学、电子学、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将音频信号调制到超声波信号上，通过超声波特有的非线性作用的自解调，产生具有高指向性可听声的新一代扬声器，实现了声波在空气中传播的空间分布控制和声源位置控制。

定向音箱发出的声音更像是由声波组成的聚光灯，像手电筒一样聚焦，让声音传播到想要的区域。该产品具有超指向性、无线推送、无噪声污染、密实结构等功能，可广泛应用于展览展厅、博物馆、规划馆等众多领域，突破了传统音箱无法实现声音定向传递的技术，让参观者对未来的智能生活充满了憧憬。

定向音箱的主要特点

1. 超强指向性，把声音调制到超声频段，利用超声的指向性特点，实现指向传播，不同展品区域播放，音源可控，把声音控制在局部范围内传播。独立的声音针对独立区域和目标人群，分别讲解，互不干扰，实现公众场合声音的环保效果，不受外界任何干扰，也不对外界环境干扰，既维护

了场所的安静环境，也让参观者单独享受了讲解服务。

2. 采用红外线感应，人来开始播放，人走自动停机。声聚焦喇叭可配置红外感应功能，红外感应器控制自带的功放，可接任何发声设备。当有人走近声聚焦喇叭下方时，声聚焦喇叭自动播放声音出来，当人离开后，自动停止播放声音。声聚焦喇叭配置CD播放机，红外感应器控制CD播放机。当有人走进声聚焦喇叭下方时，播放机自动开机开始播放碟片，当人离开后播放机自动停机。

3. 杜绝噪声污染，零反射箱体技术，音质极为清晰，实现顶级音质，让参观者在不使用耳机的情况下，得到高质量的声音享受，充分体验参观的乐趣。

4. 适用于天花板、墙壁等环境的单点安装。抛物线圆顶可以实现最大化声音聚焦。使得游客更好地沉浸在作品中。

5. 颜色和涵盖区域可定制，在一个展区可以创造不同的声音效果。同一场景多种音源呈现立体多位的音效及讲解音，提升受众观展体验，颠覆传统音频体验，得以大幅感受“指到哪里，声音传到哪里”，打造听觉上全新体验。

6. 目前的音箱已经可以做到小巧轻便，安装便利，维修维护简单。除了出色的指向性功能之外，还可以利用Wi–Fi技术制造出无损无线音桥，随时随地不受距离限制，尽享无损音质音乐，直接将手机上的音乐推送到定向音箱上。

7. 定向音箱可以无间断播放音乐达到24个小时，同时又能有效解决噪声污染功能，增强受众的观展互动性。

8. 还可以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营造一个沉浸式的参观环境。

定向音箱在国内外博物馆的应用案例

在波士顿科学博物馆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构思的展览中，定向音箱所产生的极其狭窄的音束被用于与全息视频提供三个完全不同的节目内容之中，当三个观众同时站在屏幕前面，根据他们所站的角度不同，就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并看到不同的画面，如一个观众正在欣赏格什温的歌剧《波吉与贝丝》中“夏季的时光”，而他旁边的观众则在听爵士四重奏。结合这种技术有效地创建一台显示屏在同一时间向三个观众提供三个完全不同的内容。站在一个位置，可以看到和听到一个小号在演奏，如果跨一步的话，小号手结束了，独唱演员出来了。观众如果再移动一步的话，所有的人消失了，只有一个小提琴手在演奏。

帕金斯学校是著名作家海伦·凯勒受过教育的学校，他们在校区的中心建了一个博物馆。因为博物馆非常靠近教室，学生们对声音干扰的灵敏度非常高，他们想要确保展览中的音箱声音控制在一个恰好的范围内。因此，博物馆安装了一套定向音箱系统，给参观展览的观众提供了高质量的声

音享受，但除此之外的地方非常安静，完全不被干扰。

每两年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现代艺术展（Biennale di Venezia），有70多个国家参与，在第53届展览中应用了定向音箱并获得大奖。

俄罗斯达尔文博物馆在一个全新的互动展览中巧妙利用定向音箱技术把观众带回到35亿年前地球的历史过程当中。通过进化之路的参观者感受到数十亿年前的音频环境，尤其是每个进化阶段的不同音响，还有127米长的迷宫中的美妙声音，侏罗纪世纪森林中几十种不同的音频流，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向传来，彼此没有干扰，给每位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德国慕尼黑宝马博物馆由几个不同的建筑组成，升级后的博物馆核心展区是称为“碗”的大厅，毗邻宝马塔楼，展出的是1973年到2004年的现代艺术作品，其中有一个由18个投影仪组成的360度投影，非常引人注目。众多参观者可以同时在这里的十米长的触摸屏上浏览有关该公司的历史信息。博物馆设计者充分认识到声学的重要性，把音频作为展品的一部分，竭力想办法搜集各种音频源，安置在适合的展品附近，创建一个彼此无干扰的音频环境，给每个观众提供令人兴奋的个人体验，创建一个真正独一无二的展出环境！

结语

对博物馆来说，声音是一种展示利器，做得好可以吸引观众，享受真正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声音。安静的环境可以产生沉浸感，让观众更好地体验展品和展览环境。还可以引导人流，提高参观体验，增加观众的驻留时间。但音箱设备太多太杂也会适得其反，所以必须善于利用声学原理，掌握好尺度，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博物馆参观环境的品质。

第五部分

点滴回忆

四十年后重返魂牵梦绕的焦坪

我的童年是在陕西铜川的焦坪度过的。

在那段困难时期的时候，我出生的西安城区非常困难，食物严重匮乏，有钱也买不到吃的。我有一张跟妈妈的合影，妈妈简直就是皮包骨头。无奈父母只能把我送到我外公外婆住的焦坪小镇上。

焦坪位于三秦腹地的陕北高原与关中盆地过渡带，兼有南北自然条件的综合特征。北枕连绵起伏的子午岭，南依广袤富饶的渭河平原；南距西安100千米，北距人文初祖黄帝陵80千米、革命圣地延安240千米。

焦坪以盛产煤而出名，焦坪煤矿是铜川矿务局最大的矿区之一。1958年以前，井田内仅有一些私营小煤窑生产。1958—1961年，逐渐形成了焦坪煤矿，我在那里的时候应该是焦坪煤矿开始兴旺发展的时期。我记得多数人都讲河南话，原来那段时期河南、安徽很多灾民来到焦坪，以至于当地的“官话”之一就是河南话。

我记忆中的焦坪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山上长满了各种树木，有油松、山杨、刺槐、侧柏、桐树、苹果、核桃、柿子、梨、桃等；野生植物资源也非常丰富，有党参、黄芪、柴胡、黄芩、连翘、丹参等；还有很多种野生动物，其中被列为国家规定的二类保护动物有金钱豹、麝和水獭，其他主要野生动物有中华鼢鼠、花鼠、岩松鼠、艾虎、水獭、草兔、野猪、狍等；禽类有石鸡、环颈雉、喜鹊、鸢、楼燕、啄木鸟、杜鹃、麻雀等。

我的外公当时已经从煤矿上退休，就住在小镇旁边。当时主要的建筑都是很简陋的土坯房，上覆木梁、木檩、荆笆、瓦片，在墙体内外涂刷白灰，在前后院栽植蔬菜瓜果，冬暖夏凉，是矿区的特色景观。外公还养了一头奶羊，我小的时候每天都能喝到羊奶，吃到新鲜蔬菜，在三年困难时期应该是非常奢侈的事情。

我还有些亲戚也在焦坪煤矿上工作。二姨夫是矿上的电工。还有一个麻子表舅，是外婆她们家唯一的男人，也在煤矿上工作。他们都很关心我，经常来看我，逗我开心。所以，我的童年还是很快乐的。记得在读西安外国语学校时，我曾把记忆中的二姨夫写成一篇作文，语文老师看了，非常欣赏，说是一篇非常生动的短篇小说。

我还记得小时候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工人文化宫，每个星期都放映电影，好像不要门票，所以

我每次都去，有的电影连续放映很多次，我都不会放过。回到家里，就给外公外婆模仿电影中的对白，惹得大家笑不拢口。还有一次，我在文化宫的水泥凳子上面狂奔，不小心头撞在水泥凳子上，血流不止，去医院缝了很多针，一直到现在还能隐约看到伤口。这可能是焦坪给我留下的最深烙印吧。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一直不能忘记的，就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歌词就是在焦坪煤矿的简陋工棚里诞生的。词作者姚筱舟就是陕西铜川焦坪煤矿的一名技术员（在焦坪煤矿工作了28年）。我们开始只知道雷锋在日记中摘抄了这首诗。雷锋牺牲后，报纸把这首诗当成了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这首小诗被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朱践耳见到后，谱了曲，由才旦卓玛首唱，一时红遍大江南北。一直到1997年，姚筱舟、朱践耳、才旦卓玛这三位《唱支山歌给党听》的合作者在跨越34个春秋之后，终于头一次在“上海之春”第17届音乐会开幕式上相见。

40年过去了，一直没有机会再回焦坪。

这次清明给我父亲扫墓之际，听说亲爱的二姨年前去世并土葬在焦坪，我们驱车陪老母和小妹去焦坪给她扫墓，顺便也很想再看看一直在我梦中萦回的焦坪小镇。

但说实话，这次回去看到的景象却让我很心痛。

焦坪煤矿近年因为资源枯竭，已经宣布破产。

虽然附近又发现了玉林煤矿，据说比焦坪煤矿的储量还要丰富。但从工人居住的条件来看，仍然非常简陋，跟我小时候见的没有多少改变。

房屋简陋，道路狭窄泥泞，环境脏乱，到处都是生活垃圾。镇上居民穿着也十分破烂，满脸茫然。

我见到了麻子舅舅，当年帅气的小伙子已经是年过花甲，饱尝艰辛。他已经退休，每月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倒也还过得去。他的两个孩子都是矿工。希望他们的煤矿能够注意安全防护措施，不要重蹈陕西很多煤矿的覆辙。

二姨夫也已经86岁高龄，却偷偷离开孩子们在西安给他买的高档公寓，执意只身回到这个小镇上，他说他一生都在这里度过，也要在这里走完人生的最后历程。

我们虽然十分不理解，不断感叹唏嘘，却也只能尊重老人自己的选择，衷心祝福他在这里能随他所愿，同时得到适当的照料！

西安外国语学校的回忆

五月古城，温柔春风，等着你归来。
日夜盼望，像个小孩，有谁能明白。
无论本地，还是海外，每个人都在期待。
是否体会，是情在呐喊，还是心在感慨。
梦醒来时，想起外校，心头总是澎湃。
过去一切，如旧电影，一幕一幕对白。
老师恩情，点点滴滴，还在心里徘徊。
同学之间，充满多少，纯洁的友爱。

这是2008年我写的一首诗歌，当时正值西安外国语学校俄三班毕业30周年。

从1973年到1978年，我在这个西安外国语学校度过了五年半的宝贵时光。半个世纪之前，我们还是一群懵懂无知的孩子，可以说是豆蔻年华，少小无猜。而今已两鬓斑白，步入花甲之年。蹉跎岁月没有让我们忘记这一段特殊的经历，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更加怀念和珍惜在外国语学校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西安外国语学校创建于1963年。当时，为适应国际交往日益增多的形势需要，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决定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创办10所外国语学校，以培养高级的外语人才。最初的校名是西安外国语学院附设外国语中学部，校址设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内。同年12月6日，更名为“西安外国语学校”。1964年春，搬迁至北关振华北路原邮电学校旧址，并增加了小学部。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入学住宿学外语，配有专职生活老师。据刘树琪老师的回忆，当时讲课以听说为主，没有教材，主要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

1972年年初，西安外国语学校经历了数载曲折动荡，又开始招生，并改名为“西安市外国语学校”。第一届有五个班，三个班学习英语，两个班学习俄语。我们是第二届，1973年入学，一共三个班，两个班学习英语（中国驻澳大利亚前大使成竞业就在二班），一个班学习俄语。我们毕业之前没有再招中学生，开始改为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招生，西安外国语学校回到了初建时设想的发展轨道。

我小学就读于西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后改为书院门小学），学习成绩一直拔尖，还担任学校红小兵（后改为少先队）大队长。毕业之前，学校推荐我去西安外语学校参加考试。我记得口试有两个老师，男老师考英语，女老师考俄语。那时我完全没有任何外语基础，完全是鹦鹉学舌，照葫芦画瓢，老师说一句，我跟着模仿一句。记得女老师考完之后，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俄语的，我说完全没有接触过。她说你的模仿能力太强了，语感非常好。我当时就有预感，如果被录取之后，可能会分到俄语班。但一直到小学毕业，也没有听到任何录取的消息。我小学毕业后，就按照原来的计划，就近上了旁边位于今天长安书院的西安市第五中学。但入学没有几天，突然收到了来自西安外国语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从此告别还不熟悉的同班同学，来到西安北郊的外国语学校。

西安外语学校不是很大，不到400个学生。学生中有不少是部队高干或者省市领导的孩子，有一些学生是用小汽车送到学校的。当然也有来自一般干部或者工人家庭的孩子，就像我一样。不过学校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规定所有学生必须住校，周末才能回家，周日晚上必须返校。离开学校要征得班主任的同意。

在学校吃住，必然要交学杂费和伙食费。那时学费大概是3元，代办费1元2角，医药费1元，书费2元，伙食费每个月6元。1976年伙食费涨价到7.50元，1977年伙食费涨价到11元。学费、代办费、书费也涨了0.5元。现在看起来这些费用非常低，但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的状况如何呢？据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所以，我们的父母至少都有稳定的收入，又能够上得起这样的住宿学校，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群人。

20世纪70年代，食物仍然十分匮乏，油水很少，很多东西有钱也未必买得到。我们刚好在长身体的时候，总是感到吃不饱。每天上午第四节课的时候，我的肚子就开始咕咕叫。一些同学背后总是在骂食堂管理员胡喜发老师，说他肯定贪污了我们的伙食费。其实现在想想，一个人每月只有6元的伙食费，要保证大家基本吃饱（虽然玉米面发糕和高粱米做的钢丝面那么难以下咽），并且每天基本不重样，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有同学甚至说胡喜发老师是一个很好的管理学家。

当时的校长是任希禹，花白头发，慈眉善目，和蔼可亲。副校长叫王意强，可以用英文和俄文演讲，颇有文采，后来调任新城区中教科科长，2008年送过我一本他翻译的普希金诗集。

第一位班主任是段瑞玲老师，是教音乐的。真巧，我小学第一个班主任也是音乐老师，也姓段。由于小学期间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所以一进外语学校，段瑞玲老师就指定我做班长。学校规定中午必须午睡，班主任就成了生活老师，监督大家上床睡觉。睡不着只能躺在床上看书，上厕所也要请假。段老师经常说同学们是直肠子，刚吃完饭就要上厕所。

第二个任主任是教政治的韩凤琴老师，大概做了一年半。她说话带着浓重的陕西口音，感觉比

较刻板。但另外一位班主任邵辉老师虽然也是教政治的，但给大家的印象迥然不同。她说话带着南方口音，慢条斯理，善于把枯燥的政治概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富有逻辑性，深得大家的信服。三年级的时候，俄语老师李洪喜做了一段时间的班主任。李老师用俄语做自我介绍时风趣横生，一下子拉近了跟大家的距离。

数学老师丁育英和张洪经也做过我们的班主任。外语学校的定位是培养专门的外语人才，初中三年有数理化课程，高中两年只教一点点数学，物理和化学完全就不学了。因为后来报考外语专业也不考数学，所以大家更加不重视数学。我跟大家一样偏文科，数学成绩一般，最重要是数字概念很不清晰。高中之后我的数学才有比较大的进步，高考中的数学成绩名列全校第一。

我们班一共48人，上俄语课时分成两个小班。因为外语课需要互动，人太多无法实现。我们小班的老师有刘树琪、杜如檀、胡自强等老师。她们的业务水平都很高，又尽心尽责，循循善诱，很有耐心，从来不发脾气。我之所以特别喜欢俄语，成绩也一直很好，是跟这几位老师的厚爱和鼓励分不开的。

当时的俄语教材都是根据政治形势自己编辑的，除了基础词汇之外，多为政治和时事类的内容，甚至经常把《人民日报》社论的俄文版拿来作为课文。教材中有关俄罗斯和前苏联的文学名著不多，只学过很少几首普希金和高尔基的诗歌。影音教材更加有限，除了中央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频道之外，只能反复播放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

高尔基的《海燕》让我十分着迷，晚上做梦都在朗诵这个经典的文学作品。刘树琪老师和杜如檀老师花了很多时间给我辅导，后来诗朗诵《海燕》成为我的保留节目，在很多场合表演。

语文、历史和地理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课程。其中语文老师曹本权对我的影响最大。曹老师知识渊博，融贯古今，其书法洒脱流畅但不露锋芒。在他的影响下，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杨更荣和杨世彝老师都有名门大家的气质，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历史老师单保忠和地理老师李忠齐的课程让我产生浓厚的兴趣，在选择未来考古专业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

最后说到体育，我至今还怀念着已故的李洪伦老师。每天早上跑步，都可以看到他在清理操场，小心把树叶和小石子扫到旁边。我的身体协调性差，也很胆小，体育是我的弱项。很多项目都不能达标，更谈不上参加运动会拿奖。此外我小脑平衡差，即使坐公交车也会晕车，坐长途大巴时更是呕吐不停。在李洪伦老师的鼓励下，我发挥自己爆发力差但韧性好的特点，重点练习中长跑项目，持之以恒，刻苦练习，终于在校运会上获得了1,500米项目的第二名。另外，为了锻炼身体平衡性，我天天到操场荡秋千，克服了紧张心理和恐惧情绪，增强了心理承受力和自我控制能力，最终治好了晕车的毛病。

在外语学校期间，每年都要花一个月的时间离开学校，把教室搬到工厂、农村或者部队。这当然是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但也让我们在读书期间接触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也经历了同龄人很难

经历的快乐。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到西安市未央区北部马旗寨大队学农，住在农民家的土炕上。当地主要盛产小麦和玉米等，我们每天跟农民一起起来做农活，收工回来可以吃到最甜的烤玉米。如果身体不舒服，房东就会给病号做荷包鸡蛋汤面，香味四溢。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学都想轮流病一次，以便得到这种特殊的犒劳。我们班有个“赤脚医生”胡莉莉，小学就开始学针灸，曾经给村里一个老大爷扎针治病，15天一个疗程，竟然痊愈。有的同学胃痛肚子痛，她也敢用针灸治疗，甚为传奇。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四年级一次校运会上，我在1,500米竞赛中扭伤了大腿。丁益军四处找校医，蒋治平拿来了伤湿止痛膏，王藏平送来了简易暖水袋（实际就是军用水壶），汪大明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晁戍军小心帮我按摩，张翔打来了热水。王文忠不停地换着毛巾，给我热敷，脸上的汗珠不住地往下掉，却全然不顾。晚上班主任邵辉老师看我伤势较重，决定用三轮车将我送到医院。大概九点多的时候，邵辉老师和她的丈夫（后来任上海东华大学党委书记）坚持送我去医院。袁海春骑着三轮车，一路很小心。但邵老师再三叮嘱骑稳一点儿，不住地问我冷不冷，哪里不舒服。我望着满天的繁星，伤口仿佛也不疼了，丝毫没有因为没有取得名次而沮丧。相反却感到得到了历届校运会上没有得到的东西，那就是浓厚的师生和同学情谊！

由于我的腿部受伤，没有能够跟同学们一起去大荔部队农场参加学军活动，颇感遗憾，否则会有更加有趣的回忆。

这一年我们班的毕艳红同学不幸患上肠癌，由于已经是癌症晚期，很快就去世了。很多同学听说后都流下伤心的眼泪。毕艳红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朴实端庄，性格文静，至今很多同学仍在怀念“艳红的青春”，愿她在天上依旧还是那么年轻美丽！

外语学校最后一年的时候，很多同学响应国家号召，怀抱着憧憬，准备毕业后去边远地区，建设祖国的边疆，希望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我和汪大明等人征得父母的同意，组织了赴内蒙古的小分队。其他同学也组织了黑龙江小分队和新疆小分队。

正当我们积极筹备上山下乡的时候，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在他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拍板决定恢复高考。那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名参加考试。我们实际上还没有毕业，只有李向东和姜鸿提前考取了上海外语学院（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我和大部分同班同学都是次年1978年考取大学的。否则，我们或者至今还在内蒙古耕地务农。恢复高考，让我们的人生通过公平竞争得以改变。改革开放的和煦春风吹拂了我们这一代人，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展现出不同的才华。

毕业30年之后，我们同学又一次回到了母校团聚，倍感亲切。母校发生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原来的教学楼已经不复存在，不仅盖起了现代化的电化教学大楼，还兴建了图书馆和教职工住宿楼。原来外国语学校最多算是中专，后来升格为大专，改名“陕西省外国语师范专科学校”。1982—1995年期间，学校共为国家培养3,000多名外语师资人才。2006年4月又变更为“西安外国语

大学附属西安外国语学校”，学校由此迈上新的征程，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杜如檀老师1985年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如今，你一定会像千千万万有志好学的青年一样，使自己的智慧在刻苦学习中聚积，将自己的才华在潜心钻研中闪烁，让自己的理想之花在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盛开。”

今天，我们同班同学都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分布在世界五大洲各个国家。但外校师生和同学情谊的丝带一直联系着大家。如果说亲人是父母带给我们的朋友，老师和同学犹如是命运带给我们的亲人。亲人的温暖和师生的情谊犹如瑰宝，在每个人心中占有一块圣洁的领地！

最后，再次感谢西安外国语学校和每一位教诲、关心过我们的师长和教职员工，特别是那些已经故去的老师们，愿他们的灵魂感受平安。也真诚祝福健在的每一位师长，希望老师们安度晚年，健康长寿！

深切怀念张维华教授

著名历史学家、中西交通史专家、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维华先生于1987年6月6日不幸病逝，终年85岁。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突然和震惊。我曾经作为及门弟子受教于张维华先生，他一直是我最尊敬和爱戴的楷模。他既是学贯中西、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教授，又是诲人不倦、和蔼可亲的慈祥长者。他以多病之躯为他所致力的事业献出了全部精力。他的逝世，是我国历史科学尤其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一大损失。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是失去了一位一直关心、爱护和不断鞭策我进步成长的恩师！自从我毕业离开山东大学以后，云山阻隔，只有两次机会回母校看望张维华先生。在最后一次的拜见中，因当时他哮喘病较重，不能长时间谈话，我在他的家中仅逗留了很短的时间就匆匆告辞。没想到那次的分别竟成了永诀。每念及此，我都悲痛殊深，好生惆怅！

张维华先生，字西山，1902年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市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境贫寒，上不起官办或者国立学校，只能在外国教会办的学校免费读书。他自小勤奋努力，此后考入济南齐鲁大学历史系。在大学期间，张维华先生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史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一位美国老师奚尔恩（Heeren，John J.1875—1941）对后来治史产生深刻影响。奚尔恩毕业于德国维滕贝格大学，获博士学位。1911年来华，在山东潍县广文学堂供职，后任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张先生在齐鲁大学跟随奚尔恩学习历史，先后四年。如他选修过奚尔恩“远东史”，采用的是美国人写的课本。书中详论南洋群岛的历史，尤其欧人在南洋发展的情形以及怎样使南洋群岛先后沦为殖民地。他回忆奚尔恩说：“在大学学习期间，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影响我一生。”张先生逐渐认识到研究历史决不能只限于古代文献文字的校订和诠释，而应该探颐索引，钩深致远，着重分析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

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在齐鲁大学的资助下，他进入北京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深造，从师于史学巨匠陈垣和顾颉刚先生以及洪业先生。陈垣是辅仁大学校长，兼任燕大国学研究所所长。张先生选修他们的课，颇得益于他们治学的方法，促使他下决心走上了研究史学的漫漫长路。张维华先生特别推崇和尊敬陈垣和顾颉刚这两位老师。他说过，陈垣先生治史用力极深，其搜集史料之广博及订正辨伪之精深，是同时代人所望尘莫及的。而顾颉刚先生是近现代由经学向史学的结构性转化中的关键人物，他的特点则是才力过人，以极为锐利的眼光和卓越的辨别力去发现和解决问题，在史学界开创了一代新风。二位前辈的方法虽然不同，其实是殊途同归，均是在历史史实上，力求它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去伪存真，揭露中国古史的真实面目。

在燕京大学，张维华先生即开始研究明末清初中西交通史。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葡萄牙第一次来华使臣考》，刊于《史学年报》1933年第一期，曾受到法国汉学权威伯希和教授的重视。伯希和曾在《通报》专门撰文加以评价，并进一步同他进行探讨。张先生在《大公报·图书副刊》（1934年第52、53期）发表《对于伯希和评〈葡萄牙第一次来华使臣事迹考〉要说的几句话》，在史坛初次崭露头角。

此后，在洪业先生的指导下，张维华先生积数年之力，精心结撰出硕士毕业论文《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由哈佛燕京学社于1934年正式出版。这部著作对错误百出的《明史》欧洲四国传采用溯源、辑补、比勘三种方法进行了详细研究，将《明史》中四国传所据史料的来源详加排列，对其失误错讹之处，参照其他记载一一厘出。考据详赅，征引宏富，汇聚海内外成果，发挥一己心得，力求从迷雾中把明后期中国与西欧各国关系的真相揭露出来。注释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瞩目。洪业先生在1935年所撰《考利马窦的世界地图》中说："两年前张维华君著《明史佛郎机吕宋和荷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即将尤侗、万斯同、王鸿绪三家为文与明史传勘校，又复远征博引，细加注证，这也是可喜的贡献。"后方豪所著《中西交通史》和日本人和田清所著《中国史》等书，都曾引证此书，成了中西交通研究者案头必备之著作，堪称中西交通史研究的一座丰碑。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为名将之再版。

1933年秋，张维华先生回到齐鲁大学任教。他在这一阶段撰写了不少有关我国长城历史的论文，如《齐长城考》《楚方城》《魏长城》《赵长城》《秦昭王时之长城》《燕长城》《秦统一后之长城》《汉边塞》等文。张先生在学术上受乾嘉学派的影响，强调实证主义，实地考察了很多地方。这种调查既开阔了眼界，可以发现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重大课题，也可以印证书本上的记载正确与否。他深深感到，古人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确是作学问的真谛。这与当时的主流学风也非常亲近。解放后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长城建置考》（上册），就是张维华先生早年率先研究长城历史的勤奋之作。

抗日战争期间，张维华先生在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后来到昆明，在此时已迁到昆明的北平研究院工作。北平研究院的考古历史组在昆明郊区黑龙潭的一座古庙里，条件非常艰苦，但国难当头，正直的知识分子心中都充满民族正气，大家不仅无所求，而且奋力工作着。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倾全力于清前期中俄关系的研究。研究这个题目，觅寻材料困难，况且正值战祸之中。张先生主要利用了《东华录》等书，同时也参阅了法国学者加恩著名的《早期中俄关系史》，写作了有关中俄政治、军事交往的《读史札记》（《责善半月刊》1940年第5、6期）、《清初平定喀准两部时之中俄关系》（《学思》1942年第1、2期）和《康熙初年用兵黑龙江之前一幕》（《学思》1942年第12期）等论文。他还编著过一部《早期中俄关系史》书稿（未刊），并同另一教授合译过一部反映18

世纪俄国商队在北京进行皮货贸易的珍贵资料（后来由孙西老师帮助整理成《清前期中俄关系》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张维华先生回忆此事时说，从此自己得到一个经验，学习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只要努力去做，顺利的环境干，不顺利的环境也要干，总能有些收获。

1939年，张维华先生同顾颉刚先生等人一起离开昆明，回到当时已迁往四川成都的齐鲁大学工作。在这里，张先生除了开设秦汉史、中俄关系史等课程外，还以饱满的民族感情和深刻的理性思考写出了《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和西学东渐史》，先叙明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与中国之关系，说明近世中欧交通发展之情形；此述基督教之东来及其所传入之西学，说明西洋文化在中国所发生之影响，以见当时吸收外来文化之重要史实。初稿最初交给国立编译馆，后由贵州文通书局1948年出版，现在已由齐鲁书社再版。这部书在详细考证的基础上，对明末清初中西各方面的交往情况做了准确的描述和精到的总结。与他的成名作《明史佛朗机吕宋和兰意大里亚四传注释》相比较，这部著作将许多看起来杂乱无章的史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阐明了其因果关系和规律性。近代世界历史发展已经证明，那种企图避免各民族间文化波轮撞击、互融的想法显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勇敢地向一切值得自己学习的文化学习，并逐步摒弃、更新种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使先进文化和本民族原有文化的合理成分融合成为一种更为创新的文化，才能在当今世界的广泛联系中形成独树一帜的力量。张维华先生的史观，恰恰反映了这一“现实”，或者说反映出这种“愿望”。他在谈到编撰《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和西学东渐史》的宗旨时说，新航路开辟之后，中西交通的新局面到清初已入繁盛。而《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受到西方列强控制，几乎全袭西欧之唾余。抚今追昔，则以明清之际中西交通为其转移的关键。这一番议论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1943年经世学社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开成立大会，决定编印丛书，其中《中西交通史》一书由张维华先生负责。1944年张先生离开成都齐鲁大学，任教于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讲授“中西交通史”，用压在国立编译馆那份稿子，用石印的方法印了五六十部，发给学生做参考。

在成都期间，张维华先生对汉代中西交通史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写出了《汉张掖郡与骊靬县得名之来源》（《齐大国学季刊》1940年第1期）、《汉武帝伐大宛与方士思想》（《学思》1942年第4期）、《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第2卷）等论文，特别是《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一文，表现出精深的史学功底，至今为研究者所称道。解放后，他撰著《论汉武帝》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并由齐鲁书社将他有关秦汉史的论述编辑成《汉史论集》。

张维华先生有关明清史的论文也较多，如《明江东卫、都卫、都司建置年代考略》（《禹贡》1931年第4期）、《明代辽东所建置考略》（《禹贡》1931年第7期）、《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文史哲》1964年第10期）、《跋丁耀亢的出劫纪略和问天亭放言》（《山东大学学报》史学版，1962年第3期）、《顾炎武在山东的学术活动及其与李焕章辩论山东古地理问题的一桩学

术公案》（《山东大学学报》史学版，1962年第4期）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一书，言简意赅，线索明晰，每次通读，总有一种“大者含元气，细者入无间”的感觉。直到今天，仍是研究明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的必读之书。赵令扬先生是著名的明史专家，长期担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在1975年由香港史学研究会为他出版的《明史论集》前言中，他举大陆几十年来在明史研究领域“用力尤勤”、成就较大的学者，只举出朱希祖和张维华等四人。由此可见，张先生在解放初的学术地位。

1951年张维华先生所在的齐鲁大学文学院并入山东大学。他跟韩连琪、莫东寅、徐绪典等教授赴青岛的山东大学工作，他后来成为山东大学“八大教授”之一。张先生从这时起开始接触唯物史观。据他最早的学生之一安作璋教授回忆，当时张先生开设了马恩史学名著选读课，实际上他自己也没有学过，只能采取互教互学的方法。当时在新华书店能够买到的如《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资本主义生产前各形态》《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后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等书，都放在国学研究资料室，他跟学生一起阅读讨论，共同从中寻找例证。在他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学术范式由考据向理论转变的轨迹。有人说，两种范式甚至在张维华先生身上产生出新的研究方法。张先生强调在“求实”这一点上，“乾嘉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他的史学研究工作从此走上一个新的阶段。

张先生曾经说过：“我出身农家，上学迟，少机敏，然自幼养成勤苦的习惯，生活上向无所求，即使政治上蒙诟，亦能泰然处之，唯用心于学术之上。”他多次强调说：“人类文化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从分裂走向和睦团结、和平共处的一个必要途径。”50多年来，张维华先生孜孜不倦地从事历史科学特别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不断将最新的思想成果贡献给学术界。他一贯光明正大，胸怀磊落，从不趋附众议，投人所好，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一切事情，治学严谨，学风朴实，淡泊明志，一直保持书生学者本色。

张先生时刻关心国内外形势，不能忘情于祖国的治乱兴衰和经济文化建设。但他是教会学校出身，又长期任教于教会大学，解放后诚恐旁人怀疑，常常欲言又止，社会、政治问题更绝口不谈，连西服也不敢穿。他本来淡于名利，后来就愈益希望自己默默无闻，只想平平安安度日。改革开放之后他撰写了不少极有学术价值的论述，他以前的部分手稿也逐渐得以整理出版。1981年以来，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几次住院抢救。但他仍然兢兢业业，不遗余力地培养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关心学校尤其是中西交通史研究室的工作，并担任了名誉主任一职，赢得了后辈的尊敬和热爱。他常常告诫我们，在学习上必须有恒心，保持持久不懈，奋发努力，不投机取巧，老老实实，才能学有所成，才能完成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记得一位俄国学者曾经说过：“学者们花费了惊人的劳动去著述，只有一种劳动较之更繁

重，那就是阅读他们的‘学术著作’。”这在历史学界似乎是一种通病。但张维华先生的学术著作不是这样。他的文字总是充满真实情感，毫不做作。既意蕴深长，又简明流畅。他特别善于把积淀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历史因素加以揭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因此非常富有哲理的启迪意义，使人感到他的文章确有一种通透洒脱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他一直强调不能只在史料上下功夫，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借以探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个目标大得很，困难得很，是应当更加注意的。他十分不喜欢那种片面追求华丽辞藻的做法，而是反复强调史学论文应当使用具有准确科学含义的概念，容不得半点儿虚假的装饰。只有在自己感触最深的范围内，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功力，才能厚积而薄发，举重若轻，三言两语，切中要害。我从张维华先生的著述，也深深体会到，没有一种不可以简单明了地说出来的思想。最重要的是要努力使自己的思想与读者沟通，只有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张维华先生是中西交通史研究方面的一位大家。凡是认真读过他著述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说他是大家，并不意味着他的学术观点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也不是说他在50年学术生涯中所得出的结论都全部正确。实际上，任何时代的任何学者都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张维华先生在动乱的历史环境和艰难的客观条件下，潜心钻研，辛勤耕耘，在开拓中西文通史研究领域方面做出了极其有益的贡献，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西交通史的认识，纠正修订了不少错误和偏见。更为重要的是，他较早地将中西交通史研究置于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从而抉发哲学的精微和进步或蹇滞的必然，给后来的研究者打下了极为广阔的基础。这一点足以使得他永垂不朽。已故安作璋教授撰写的挽联对张先生一生的成就概括得十分精辟：“百万言鸿篇巨制，上溯秦汉，下逮明清，学贯中西，一代士林共仰泰斗；六十载春风化雨，前绍孔孟，后宗马列，门盈桃李，五世传人痛悼良师。”

最后，还应提及师母李琼芳夫人。几十年来，她以惊人的毅力陪同张维华先生经受了各种磨难。在张先生晚年病重期间，她更是以挚爱的感情倾注了全部心血。她的无私精神深深感动着我们。张先生在最后一部专著《清前期中俄关系》的前言中深情地说：“她虽不治史学，但我在数十年间能潜心史学却与她的照料分不开。尤其在我政治上遭遇坎坷后，她与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未曾有一句怨言。如今我常年辗转病榻，她寸步不离，细心护理，为系里同仁所称道。她早已退休，且亦高龄，但何曾稍息一时。我能存活至今，工作至今，全赖她矣！我的每一部书，无不包含她的劳动，但从没有她的名字，今彰显此端，微表我心中有她。”

我知道，这篇短文远远不能充分反映出张维华先生多方面的成就和功绩，只能寄寓千里之外一位学生发自内心的哀思和缅怀，遥祝先生英灵得以安息！

（原载《海交史研究副刊》1988年第6期，有改动）

怀念山大留学生朋友韩克图

2021年8月10日（星期二）凌晨，我收到了英国友人韩克图（Christopher Jeston Homfray）妻子珍妮特（Janet）的邮件，韩克图在与抑郁症和严重焦虑症抗争了几个月之后，于8月5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63岁。

听到这个噩耗，我真是感到十分震惊。我知道英国的自杀率非常高，其中男性是女性自杀人数的3倍。而韩克图所在的苏格兰是自杀率最高的地区，每10万人中有13.9人自杀。令人不解的是，韩克图一直积极参与的一个慈善机构撒马利坦，就是民间以劝导民众制止自杀为宗旨的，这个组织一直呼吁社会正视这一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

我是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百废待兴，学校的各种设施都十分简陋，所有校舍建筑都是灰色调的，有点压抑。刚开始我们是20人住在一个大教室里面，后来才搬到8人的宿舍。早上到大操场跑步，很多人都穿着家乡带来的黑棉袄，显得十分朴素。1979年在山大举办过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学术讨论会，对很多同学的思想观念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大概是1980年前后，山东大学迎来了第一批留学生，一共18人，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招来的，开始住在老校专家楼。除了韩克图之外，还有来自英国的贺安雷（Andrew Higgins），纽约时报驻东欧大牌记者，驻华沙，曾经两次集体获得普利策奖，大名鼎鼎。最近又在报道波兰边境难民事件。中文系同学还记得这位英国留学生常常坐第一排，也善于挑战讲师。来自瑞典的傅瑞东（Lars Freden，后任瑞典驻华大使）做过记者、电台英语主持人等，经常一个人往农户家跑，是留学生科特别关注。傅瑞东做了大使后，每逢瑞典国庆节举办招待会，时常招待在北京的山大同学。傅也回过山大，算是座上客。以上几位都是中文系的。

历史系的留学生有三位，一位来自德国的帅哥任欧力（Ulrich Stackmann，听说也去世了），他主动要求跟中国学生一个宿舍，室友有刘志毅和刘伯勤等；来自澳洲的周桉桉，由杨桦陪读；还有一位是瑞典的斯文特（Svant Kilamgder），由胡绍军陪读，曾担任瑞典驻华大使馆公使衔政务参赞、驻朝鲜首席外交代表、驻罗马尼亚大使，前几年还在驻非洲大使（在尼日利亚）任上，估计现在应该退休了。

这些留学生都是在本国修完中文才来的，听说读写都有一定基础。韩克图就是英国剑桥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中文非常好，与我们用中文沟通交流都没有任何问题。我也趁机跟他学习英文，经常

背诵课文和诗歌跟他听，请他帮助纠正哪些不够标准。韩克图十分热情，有耐心，还把英国诗歌录下来，让我跟着模仿。我在山东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英文课的外教是一位从美国来的日本女教师玛雅（她的丈夫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语言学家，当时在山大外语系任教），她说我的口语在所有研究生中是最好的。还有一些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在跟我聊天时，总说我的英文有英国口音，这些肯定是受了韩克图的影响。

在山大期间，我和韩克图一起去过济南附近的千佛山和灵岩寺游玩。记得去灵岩寺的时候，附近农民没有见过外国人，大概有100多人围观。韩克图想给他们拍照，他们就一哄而散。回头一看他不拍照了，他们又跑过来围观，让我们十分尴尬。此外，我还陪韩克图在我的家乡西安游玩了所有著名的景点，他非常开心。记得西安第一次举办外国电影周，我们一起看了好几部美国电影，有《猜猜谁来吃晚餐》描写白人与黑人深层次的矛盾和隔阂，《雨中曲》是非常经典的好莱坞歌舞片，《黑骏马》描写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沟通，他给我详细讲解了这些电影的背景和内容，让我眼界大开。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彼此相互了解，建立了深厚和长期的友谊。

我在网上看到山大中文系网红教授马瑞芳老师的两篇文章，里面有一些关于韩克图的记载，十分有趣，生动反映了当时留学生在华学习生活的一些细节：

（上课了）两个英国学生到得最早。中等个儿的韩克图长了一双浅绿色眼睛，熠熠闪光，眼神既温柔又善良，蓬松的卷发带着火焰般的光芒。他住在中国学生宿舍，我前一天晚上找他了解学习进度和要求。他说，我们最不乐意听冗长的作家生平介绍，最想听听艺术分析。我说："把你的笔记拿给我看看。"他马上脸红了，讷讷地说："我记得不好。"怎么也不肯拿出来。进课堂时，他一手提暖壶，一手拎两个茶杯。"你怎么带两个杯子？"和韩克图一起进门的高个子英国青年贺安雷问。韩克图谦恭地笑笑："有老师的一只。"

还有一段记载也很有意思：1980年我第一次在给外国留学生讲《红楼梦》，说到第五回就用诗词框定人物命运。英国留学生说：小说不能这样写，我们英国小说从来不会开头就把人物命运告诉读者，那读者还会往下看吗？后来我想起留学生的话总乐，欧洲小说家不会这样写，中国小说家兰陵笑笑生开始这样写，而曹雪芹写到极致，要不全世界就出一本《红楼梦》？"那么，曹雪芹为什么要采取这种预示人物命运的方法呢？"贺安雷问。还没等我回答，另一位英国青年韩克图忙说："那是怕中国的红学家失业吧！他们从这里做出了多少文章啊！"英国学生为自己的趣话十分得意。

韩克图在山大对考古也非常有兴趣，经常跟我谈论中国考古的一些话题。等到山大留学结束之后，其他留学生都回国找工作，他却申请了北京大学考古系进修，只身一人去了北大学习考古，跟北大的1980级考古系一起学习。恰好我的一位好朋友唐启山就在这个班，毕业后去了国家文物局的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后来定居日本。我跟他说起韩克图的突然离世，他也感到十分遗憾。

北大之后，韩克图到了香港，在香港特区政府工作，大概做到1990年。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先留在山大历史系工作。后又考上广州暨南大学的中外关系史博士研究生。他听说我到广州学习和生活，马上就邮寄了一套教外国人学粤语的教材和录音带。我也很努力，有空就听录音，厚着脸皮跟当地人对话，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方言，后来在工作中很有用处，因为那时来大陆做生意的海外华人华侨多数都不会讲普通话，用粤语交流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韩克图放假的时候也来过广州几次。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了肇庆的鼎湖山，大家有说有笑，十分愉快。我在暨南大学读博期间，看到很多港澳学生都在溜旱冰，觉得十分有趣，也想学习。韩克图听说后，从香港买了一双国外生产的连体溜冰鞋送给我，估计也很贵，国内买不到，让我在暨大期间一直沉迷于这项运动。

韩克图的家人我都见过，包括他的姐姐Caroline（原来在澳洲），姐夫David（后来病逝），弟弟Michael（居住在威尔士），还有他的父亲John Homfray。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韩克图专门给我电话，讲述他心中的痛苦，我也很难过，用各种方法对他进行安慰。

1988年我博士毕业后，决定下海经商，进入了广东省轻工进出口集团公司。不久听说香港大学要举办一个中国海关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并不认识任何组织方的人员，只是试着寄了一篇文章，没有想到立即接到香港大学的回信，同意我参加会议，并支付所有费用。这在广东省外贸行业也是一桩新鲜事，一个新来的外贸业务员竟然接到香港大学的邀请。但公司领导还是很开明的，帮助我通过了政府的各种审批程序。正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香港的繁荣文明程度之高，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韩克图听说我到了香港非常高兴。会议结束后，他邀请我住在他的宿舍里面，带我游览了香港的很多地方。

此外，韩克图为我安排了一次特别珍贵的飞行体验，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私人飞机飞行游览，让我非常震惊。我们先到了位于启德机场的香港飞行会（现在改名为香港飞行总会）。韩克图的一位朋友，也是在香港特区政府工作的一位英国人，带我们进行登记签名，大概意思是如果飞行中出现任何问题，都是要自己负全部责任等等。我们登上一架小型飞机，只能坐四个人（包括飞行员）。这位英国人自己驾驶，我和韩克图坐后座，另外一位在路透社工作的英国人米佳坐前排。我以前坐车都会晕车，有时还会呕吐。我很担心自己反应过度，让大家扫兴。不过在飞行过程中我的反应并不是很严重。只是在爬坡和下降时有些失重的感觉。第一次飞行的感受非常舒畅，在大约一千米的高空鸟瞰大屿山和其他的岛屿，感到自己与蓝天大海已经融为一体。尤其震撼的是回到维多利亚海湾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华灯初照，港岛和九龙的所有摩天大厦亮起璀璨的灯光，仿佛是在迎接我们的到来，那种感觉一直到今天还深深印在脑海里面。不知道这次飞行要多少钱，谁付的账，估计价格不菲，心中一直对韩克图非常感谢。

韩克图1992年与香港人Julia结婚，女儿Alix生于1994年，儿子Nikki生于1995年。我的大儿子

Jerry生于1993年，跟他的孩子差不多大，两家一直有来往。他们来广州，就住在我家，在祈福新村附近划船、爬山，孩子们一起玩耍，我们谈天说地，十分惬意。我们去香港时，韩克图每次都热情招待，陪我们游览。

20世纪90年代初，韩克图有段时间回到他的故乡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他就出生在格拉斯哥的Lenzie）。1991年我带团去英国公干，还专门到格拉斯哥看望韩克图，在他家住了一晚。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韩克图举家搬回到格拉斯哥。1999年我到美国发展，跟韩克图有几年没有联系。2005年回到上海，又重新恢复互动，知道他跟Julia缘分已尽，但他从来没有说过前妻的一句坏话。好在他的两个孩子发展都不错，Alix喜欢艺术，Nikki喜欢曲棍球和管理科学。我们每次通信都会讨论如何让孩子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规划自己的人生。

2014年年初，韩克图说他与Janet已经相处两年，准备8月份举办婚礼。Janet是英格兰人，她跟韩克图一样有在亚洲生活的经历，不同的是她在老挝生活了12年，她的儿子Fionn在万象出生并长大。我为老朋友再次找到真爱感到理解和高兴，马上就决定全家一起去英国参加他们的婚礼，还幸运地成为韩克图婚约的见证人并在婚姻证书上签名。8月10日下午，先去一个19世纪50年代建造的别墅参加他的婚礼。韩克图的妈妈已经90多岁了，还自己开车前来参加儿子的婚礼，她对韩克图在这个年龄还能有这样的爱情感到十分满意。他的姐姐和弟弟也都来了。整个婚礼很简朴，但洋溢着温馨浪漫和甜蜜的气氛。他的很多朋友从不同国家地区，如美国、德国、法国、泰国、中国和香港等地专程飞来。后来，我们又到离克莱德河只有一箭之遥的一家餐厅吃饭，我的两个儿子跟韩克图的两个孩子坐在一起，回忆起少年时在一起玩耍的快乐。我跟原来在路透社工作的米佳聊起我们20多年前在香港一起飞行的往事，无不叹息时光飞逝，一晃已经开始进入暮年。

当时正值爱丁堡戏剧节和英联邦运动会，到处人山人海，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很多艺人浓妆艳抹，做出各种造型跟游人一起拍照，留给我们非常美好的回忆。

这一年，韩克图还参加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Big Scottish Run的半程马拉松比赛，为帮助希望和儿童之家筹集善款，最终筹集了一万英镑。他以1小时42分57秒的成绩在他的年龄和性别组排在第40位，殊为不易。

他富有爱心，一直在为各种慈善事业默默地付出，但又非常低调，很少跟别人提及，给朋友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他参加过很多个慈善组织，并在其中工作很多年，如参加格拉斯哥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的志愿者工作；在英国红十字会帮助过许多在格拉斯哥定居的难民家庭，每周一次，时间将近十年；参加格拉斯哥市的一项公益项目，每周帮助学校中需要辅导的孩子；他还参加过国际大赦等非政府组织的活动。

从2000年起，他开始与撒玛利坦慈善机构的20年合作，他认为倾听和与人坦诚交谈是人际关系

的核心。他在工作之余，一共付出了惊人的5,432小时，通过电话或者面对面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撒玛利坦格拉斯哥分会主席丹尼斯·班农（Denise Bannon）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将韩克图描述为一个富有爱心的人，“他对一切都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刻感受”。

2019年年初，我告诉韩克图，我和朋友们策划了一个德国歌剧之旅的计划，他听了很兴奋，说他也很喜欢歌剧，尤其是瓦格纳的歌剧。然后他也携Janet一起去德国旅游，在柏林与我们会合，一起在德国国家歌剧院观看瓦格纳最完美的乐剧杰作《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我们这次到德国一共看了八场歌剧和一场柏林爱乐的交响乐，韩克图只选择了这一场，说明他有自己的想法。这部歌剧确实是代表了瓦格纳巅峰时期的风格。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还遇到专程从中国飞到柏林观看这部歌剧的著名青年男中低音歌唱家沈洋，聊起沈洋明年也要出演特里斯坦的随行武士梅洛特。没有想到这次会面竟是永诀！

我收到韩克图的最后一封邮件是今年元月29日，我跟他讲述了中国的疫情状况，也很担心英国和欧洲的疫情发展。他只说了他们家人的情况还好，但英国面对病毒确实经历着非常糟糕的现实，还说另外抽时间再详细跟我谈。5月份我把我的演唱视频跟他分享，也没有任何回复。接着就是8月份传来他去世的噩耗。在没有心理准备的前提下，突然失去亲人和朋友是每个人最痛苦和难以接受的经历，真有一种“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的感觉。

我非常怀念韩克图，也很自豪有这样一位正直、真诚和善良的朋友。他善解人意，愿意倾听别人的故事，乐于助人。跟朋友非常坦诚，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写道：“我渴望对我周围的人诚实、自我意识、温暖和鼓励——也希望能分享自己的微笑。另一方面，我对我的工作很认真，对我所拥有的任何能力都给予最充分的利用。”

他的生活很简朴，长期吃素，很享受生活中简单的事物，酷爱户外运动，尤其是爬山。每天整理花园和遛狗，乐在其中。在伦敦房产价格高居不下的时候，他卖掉伦敦的公寓，在格拉斯哥置换了一个新的单元，说明他也善于理财。他平时很节俭，但对朋友毫不吝啬。我印象最深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那段时间，我曾经想过再去英国申请博士后，但当时根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我跟他提起过这个问题，当时他也没有回应，估计是有一定困难。但过了几年之后，他突然给我写信，说他已经有帮我担保的能力，非常愿意给我提供留学的经济担保。我心里万分感激，但此时已经下海经商，没有了继续深造的动力。如果当时沿着这个道路到英伦去学习，现在可能又是不同的人生。

韩克图是一个好父亲，在跟我的通信中屡屡表达出对孩子的关心和热爱。每次儿子在曲棍球比赛中赢得好的成绩，他都非常开心。女儿选择艺术史，可能源自韩克图一生的兴趣所在，他非常理解和支持，也对女儿的优异成绩感到十分自豪。他对Janet的儿子Fionn视同己出，跟两个孩子一样在意和疼爱，Fionn显然很懂事，内心也爱这位继父。

韩克图有着英国人特有的滑稽和幽默，经常给我讲苏格兰的笑话，然后自己先露出灿烂的笑容。在我不理解的时候，他会耐心帮我解释其中的笑点。他知识很渊博，在学习语言方面有过人的才能。有一次我们跟一群法国人聊天时，他竟然可以用法语流利地交流，让我非常惊讶。当然，他的普通话和粤语都很流利，用中文写信也很通畅，不过他经常自嘲，说他的汉语水平不断下降，是因为孩子们总是嘲笑他。

他爱好广泛，不仅热爱文学、历史和考古，特别是小说和诗歌，在通信中经常引用苏格兰诗人的诗句，在婚礼上用浓重的苏格兰方言为来宾朗诵诗歌。他也热爱音乐，不光是古典音乐（我们经常讨论交响乐和歌剧），还喜欢流行音乐（包括爵士和摇滚），甚至中国的宗教音乐也感兴趣。除此之外，他热爱博物馆和美术馆，这一方面我们俩与Janet一样有很多共同的语言。我有新的论文发表，一定会第一时间与他分享。

2021年8月25日，下午2点，在格拉斯哥科姆里的斯特劳恩林地公墓，伴随着苏格兰风笛奏出的凄凉和悲壮的乐曲，亲友们为韩克图举办了简短的告别仪式。中国古人不也是这样吗？“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韩克图将长眠在郁郁葱葱的绿地之下，这里周围的环境美丽静谧，相信热爱自然的他在此地一定会享受安宁。

虽然韩克图可能不再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作为他的挚友，我们与他的联系永远不会消失。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从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韩克图始终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并通过我们而存在。

愿韩克图的灵魂安息！

（原载《文汇网》2021年12月17日）

暨南园的回忆

我曾于1985年到1988年在广州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读博。20世纪80年代在暨南园的生活，确是一段非常幸运并值得回忆的宝贵时光。暨南大学的精神被归纳为十六字：“忠信笃敬、知行合一、自强不息、和而不同”，我理解前八字“忠信笃敬、知行合一”是对每个暨南人的个人品格和秉性的要求，忠诚笃实、脚踏实地、勤奋好学，把知识落在实处；后八字“自强不息、和而不同”是对整个大学风气的要求，积极向上，学术自由，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说，暨南精神一直鼓励着我，也塑造了我精神气质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让我受益终身。

报考暨大

在国内，任何学习过中外关系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暨南大学的朱杰勤教授 (1913–1990)。从30年代起，朱杰勤教授就开始撰写和翻译有关亚洲史和中外关系史的著述。解放后，他以大部分精力致力于中外关系史的教学和研究，对这一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79年，在中国历史学会规划会议中，他最早倡导成立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会。 1981年，他创立了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后改称华侨华人研究所），是国内第一个成立的同类研究机构，在很长时期内也是这个领域的最知名学术机构。

第一次见到朱杰勤先生是在1983年夏天，我和山东大学同门师兄于化民利用假期沿着丝绸之路到甘肃和新疆考察。到了乌鲁木齐，时刚刚遇到中亚文化研究学会召开第一次学术会议。我俩不仅聆听了学者们的学术报告，还跟着代表去了天池和吐鲁番参观。朱先生作为学会的负责人与马雍秘书长以及新疆考古所穆顺英所长等坐在主席台上。在参观吐鲁番的路上，我跟朱杰勤老师请教过中外关系史的一些问题。没有想到他非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珍藏着一张在吐鲁番跟朱先生的黑白合影。



1983年与朱杰勤老师合影

当时，国内研究生制度刚刚恢复，全国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屈指可数，朱杰勤教授是全国唯一的中外关系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即使以中西交通史研究见长的山东大学历史系，也没有这个专业的博士点。我非常希望以后有机会报考朱先生的博士生，但也不知道把握有多大。于是，1984年底我利用实习的机会，来到安徽、江苏、上海、湖南和广东考察。

在长沙，我拜访了岳麓书社的总编辑钟书河先生，他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对我开阔眼界有很大的帮助，跟他的谈话也让我收获良多。湖南的冬天阴冷潮湿，还下着小雨。即使在室内也感到透骨的寒冷，手脚冰凉，令人不适。晚上从长沙乘火车去广州，第二天早上醒来，忽如一夜春风来，感觉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不仅与北方各省冬季冰封大地朔风凛冽大相径庭，即使与江南冬季的阴冷潮湿也有着明显的差别。岭南温暖如春，树木葱茏，花香漫溢，气候宜人，实在让我意外惊喜。特别第一次来到广州这座千年岭南名郡，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南国都会给我的印象非常美好，更加坚定了我报考朱老师博士生的决心。

广州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章深（暨大毕业）和中大著名教授袁伟时的公子袁征（当时正在暨大跟宋史专家陈乐素先生读研）陪我在广州游玩了很多名胜古迹。中大历史系的蔡鸿生教授早年也是朱杰勤老师的学生，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对我热情恳切，抬爱有加。记得冬至之夜，他专门邀请我到他家吃晚饭，说广东人的习惯冬大于年，不能让我一个人过冬，着实令我这个来自遥远北方的青年游子非常感动。蔡鸿生先生曾这样评价朱先生：“古籍洋书，并列案头，手不释卷，每当涉及中西互证，便能左右逢源。”他说如果可以跟随朱先生学习，是我的福分。

我记得从北京路乘公交车到了岗顶，在美丽的暨南园拜访了朱杰勤教授。朱先生见到我很高兴，说看过我写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慢条斯理，有条不紊，

充满了智慧，听之靡靡，令人忘倦。他对我的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去做报考的准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暨南大学。



1985年与朱杰勤先生在山东长岛

恩师教诲

暨南大学当时隶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主要面对港澳和海外华侨的学生，充当着传播中华文化、沟通中西的桥梁，声教讫于四海，宏教泽而系侨情。暨大历史系创办于1928年，是当时国立暨南大学设立较早的学系之一。近百年来，除了朱杰勤先生之外，历史学系先后有周予同、周谷城、陈高傭、沈炼之、谭其骧、陈乐素、金应熙等诸多史学大师任教，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朱先生门下的七位博士生

良师之外，还需益友。朱杰勤先生第一批中外关系史专业的博士生有丘进和郑海麟。我与纪宗安、高伟浓、袁丁、朱凡成为朱先生门下第二批博士生。除了历史系中外关系史专业，医学院眼科的李辰教授也带了一位博士生郭阿娟医生，比我晚一届。全校一共八位博士研究生。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又都性情平和，和蔼可亲，给予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让我这个新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朱先生家上课的情景

朱先生给博士生上课都在家里。在他称为“旷远楼”的客厅里面，学生们坐成一圈，听老师娓娓道来。他从不照本宣科，总是通过讲述他早年的教学和研究经历，对所讲专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传授他的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发蒙解缚，开阔视听。他总说史学家不仅应该通古今之变，还要沟通中外，成一家之言。不仅要懂得中国史，还要懂得世界史和中外关系史。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说明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每次讲完，大家一起讨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后他再做讲评，并布置作业，让大家回去读书写作。

朱杰勤先生祖籍广东顺德，祖父是美洲华侨，晚年回国。父亲曾在马来西亚开过一间百货商店，读书不多，粗通文理，赋性慷慨，有不少知识界朋友，包括维新派康有为之人。小时有一位科举屡试不第的伯父教导，家学渊源，国学根底雄厚，在处理历史文献时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同时，朱先生在少年时期曾入英文学校学习，很早就熟练地掌握了英文，在研究中可以突破中文史料的局限。抗战初期，先生曾在云南昆明空军学校做翻译，40年代，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吸收为会员。为了介绍外国史学者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论著，朱杰勤翻译了《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利奇温著）和《大秦国全录》（夏德著）两书， 这使他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往往能洞幽察微，发人所未发。

1933年，朱先生被中山大学研究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在章太炎的大弟子、著名南明史专家朱希祖的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史。从此，朱先生开始了史学研究和教学的生涯。他三十岁以前主要研究中国史，三十岁以后就侧重世界史了，最后以中外关系史为归宿。清代广东顺德出了几位研究西北史地及中外关系史的著名学者，如李文田、梁廷楠、何藻翔等，都有著作传世。朱先生对于这几位同乡老前辈钦佩已久，对他后来开始中外关系时也颇有影响。

中外关系史是一门难度较大的学科，不少早期研究者们多沿袭传统的研究方法，往往侧重于中外史地的考证。朱杰勤教授自年轻时就认为中外关系史不仅需要对历史事实的必要考证，更重要的则是着眼于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的研究，并注意与一些较大的历史问题相联系，形成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较为完整的体系，这样才能深入揭示各种历史现象的内里底蕴，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1988年，《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朱杰勤先生，我们几位研究生也被邀请前去跟老人家合影，后来刊登在《羊城晚报》的头版。广州画家李国辉先生根据报纸刊登的与朱先生合影的相片， 创作了一幅油画《博士・导师》，据说还在画展中展出。



一九九〇年五月一日朱杰勤教授因突发心肌梗塞住进暨南大学华侨医院，经抢救医治无效，不幸于九日下午逝世，享年七十七岁。他的藏书由其家人全部捐赠给暨南大学图书馆，总计4000余册，数量众多，门类齐全，自成体系。很多专著暨南大学图书馆都没有收藏，少数专业论著国内仅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图书馆有收藏。



1991年给朱杰勤先生扫墓

校园风气

我在山东大学读了本科和硕士。山东大学位于齐鲁大地、孔孟之乡，民风质朴醇厚，教学严谨，学风浓厚，但同时也有些思想保守，安常守固。与此相比，暨南大学主要面对国际生和港澳生，有不同的文化碰撞，是一所比较包容并且鼓励学生发扬个性的学校。大学毕竟不是培训机构，应该是铸就完整人格的修养所，所以来到暨大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当时的暨南园生机盎然，充满活力，五花八门的学生社团为年轻学子提供了多姿多彩的活动，校园文化与山东大学相比丰富而绚丽。我在山东大学一直在学生会和研究生会负责文艺部的工作，曾组织过舞会和文艺演出，遇到不少阻力，一些老师和同学都不理解，有的老师问我为何要组织舞会，去操场跑步也可以锻炼身体啊，让我哭笑不得。但在暨大，每周末在蒙古包的舞会是雷打不动的，是非常正常的社交活动。在浪漫的音乐中，大家舞姿妙曼，衣袂飘飘，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暨大学生的演讲辩论也很有特色，大家自由讨论不同的观点，唇枪舌剑，如针锋相投，无纤毫参差。我旁听过几次辩论，感触很深，有些辩论的题目到现在都有意义，如西方文化的冲击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利弊，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中国足球队成绩不好到底是球员不好还是教练不好等等。辩论的过程对思维非常有帮助，可以增强理性思维能力，提高沟通效率和技巧，对任何问题都去思考相反结论成立的可能。在这种开放包容、不同意见正面交锋的竞争氛围中，学生们逐渐克服自卑和懦弱，建立自信，找到展示自我的舞台，提升自己的领导力和创新力，为以后进入社会奠定良好的素质基础。我深深感觉到，自由的氛围是现代大学精神的基础。没有自由精神的大学，是没有灵魂的，不可能承担起培养人才的重任。

暨大的单车协会也很有名气，是暨南园里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学生社团之一。我还没来暨大之前，就听说过他们的单车队到北京宣传尊师重道的理念，为设立教师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后来听说另外一支单车队，沿东南沿海一线“挥师北上”，经过一个多月的餐风露宿，33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最后到达北京。在沿途宣传交通安全知识、征集签名，直至将制定“交通安全法”、设立“交通安全活动日”的倡议书递交到国务院与公安部。这一行充分展示了暨南学子的家国情怀。

在研究生宿舍楼下还有一个旱冰场，吸引了很多学生参加。滑冰技术比较好的大部分是港澳同学。看着他们优美的身姿，一会儿像海燕轻盈地飞舞在大海上空，一会儿又像展翅的雄鹰在碧空中乘风翱翔，让我看得眼花缭乱，羡慕不已。后来英国朋友韩克图从香港带来一双连体的滚轴旱冰鞋，我也开始跟这些年轻的学生一起学习花样滑冰。滑冰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运动，既要勇敢，也需要智慧。刚开始只能颤颤巍巍地扶着栏杆学步，离开扶手就不停地摔跤，只能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虽然第二天双腿还是隐隐作痛，但因为有一种不服输的心理和不怕困难的精神，最后还是坚持下来，掌握了平衡的要领，可以自由地穿梭，做出一些颇有难度的动作。



在山东大学期间，虽然我在学业方面一直比较优秀，得到系领导和老师的认可。不仅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共青团员，研究生毕业也能够留校任教。但某些政工干部一直对我有些偏见，觉得我有自由主义倾向，甚至头发长一些，裤腿宽一点，他们都看不惯。至于组织同学跳舞，在读书期间谈恋爱，都被他们指指点点。但考进暨南大学之后，情况立即得到了改变。记得第一次见到历史系党总支书记魏乙生老师的时候，他问我为何不是党员，我都蒙了，在以前那种环境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但魏书记说，你这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就是我们党需要的，他马上表示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另外一位介绍人是我的师姐纪宗安）。1986年底在历史系党总支办公室开会，参加者有魏书记、丘进、袁丁、郑海麟、杨蜀渝等，由庄友明主持，大家一致同意我入党。后来的转正是在文学院研究生支部进行的，除了博士研究生的同学朱凡、袁丁之外，还有些硕士研究生同学，如何龙、郑敏、钟小洛、李希跃、倪鹤琴等人。很多人平时交流不多，连名字都叫不上，但大家都踊跃发言，充满了热情和真挚的气氛。没有人空谈政治口号，都是从修养、气质和为人处世方面对我进行点评，而且是极口相斯，赞誉有加，让我深受感动，至今难忘。



1988年研究生党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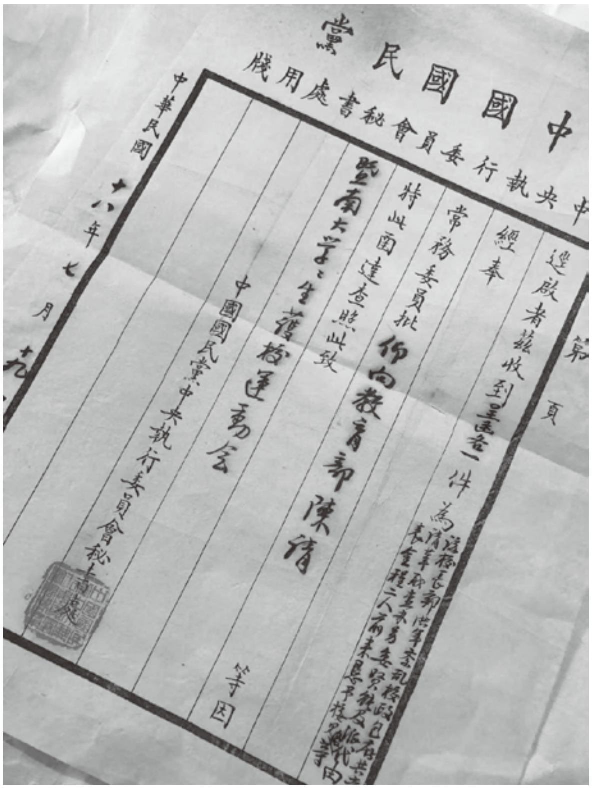
优良传统

说起暨南大学的优良学风，其实应该从暨大的校史说起。从1906年创办起，暨南大学三落三起，五度播迁，始终屹立于时代潮头，主要就是靠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培植学术自由的优良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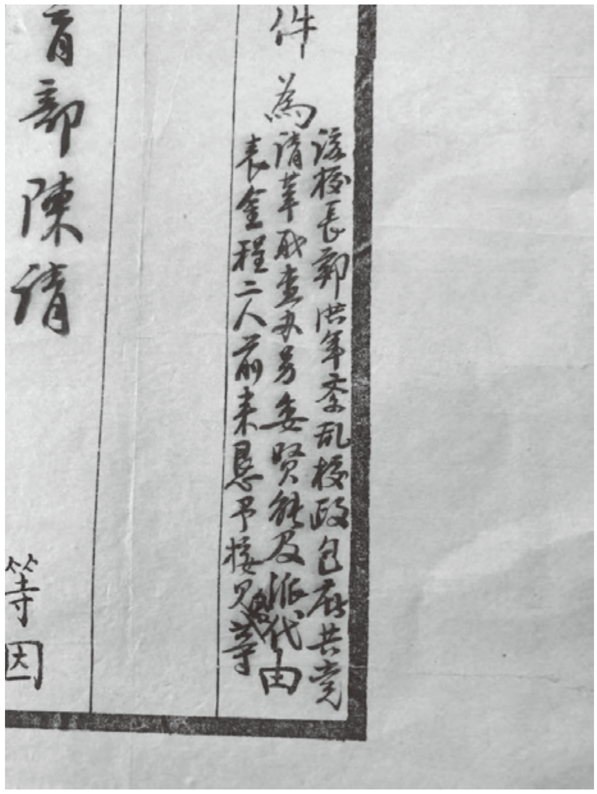


“暨南六先贤”之一的郑洪年于1927年二次出山，继任暨南校长，将商科改为商学院，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农学院、文哲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艺术院五门，将暨南学校扩充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对暨南大学的发展、定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学术思想上，郑洪年一方面“独尊三民”，但同时“兼容百家”，认为“各种主义，亦可提出研究”，允许各种学派、不同团体的观点，各抒己见，自由阐发，让学生独立思考，判断抉择。在如此民主宽松的学术思想指导下，暨南大学经常邀请著名学者、作家和名流来校演讲，如鲁迅、蔡元培、马叙伦、胡适、李达、郑振铎等都曾应邀到校讲演。



中國國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用箋
第　頁
逕啟者茲收到呈函各一件為
經奉
常務委員批仰向教育部陳情
特此函達查照此致
暨南大學學生體校運動会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九
等因



件為
育部陳情
等因

（该照片由友人李吉华先生提供）



1935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松先生受聘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他也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对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干预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学生在课外从事和组织各种社团活动。在何炳松的领导下，社会各界对暨大也越来越看好。《东方杂志》撰文评论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时指出，“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武昌的武汉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都像春花怒放，成绩斐然”。由于他的宽容和保护，爱国学生运动逐步壮大，暨大也因此被称为“东南民主堡垒”。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兼任校长，王越被任命为第一副校长，受命组建暨大，为暨南大学的重建立下了汗马功劳。1977年，已经70岁高龄的王老被重新任命为暨南大学副校长。在他实际主政暨大时期，对培植学校的学术自由也非常投入。当时朱杰勤先生给学生讲授中西交通史，系总支书记随堂听课，觉得有些地方政治不正确，便召集学生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朱教授知道了，十分不快，找到王越诉苦。王越认为系总支书记的方式欠妥，教学问题最好先和任教者坦诚讨论加深了解。再则，有些历史问题应容许有不同的解答，这在当时那种历史环境中也是殊为不易和难能可贵的。

暨大历史上所以能凝聚和培养出众多人才，成为大师之园、英才之园，与暨大一贯以来的教育理念和学术环境有密切关系，加上郑洪年、何炳松、王越等掌门人的人格风范和学识思想在支撑和

熏陶，一代又一代暨南人在这些教授、大师们的循循善诱和潜移默化之中茁壮成长，暨大精神也在他们营造的氛围中形成。

开放包容

我非常喜欢暨大多元、开放、包容的氛围，也在其中收获良多。尤其是在暨大跟随朱杰勤老师学习的课程也是开放包容，中西兼备。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非常注重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样就能够思想解放，融会贯通，视野开阔。即使后来没有走上专业的研究道路，但对各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理解会更加深刻，从暨大获得的学术基本训练给我很大的帮助。



暨大研究生郊游

80年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思想解放的重要时段，暨大也有各种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学术讲座，其内容都比较新锐，在知识积累和思想成熟的层面上，给了我极大的帮助，能接触到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学术观点，从中获得很多原来比较单一式的教学所获得不了的知识。我本科学习考古，硕士期间改为中西交通史，比较注重实证和考据。来到暨大之后，在朱杰勤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从一个宏观的思维、中西方结合的角度去探讨问题，多学科的交融碰撞，毕竟在边缘处往往能发现新大陆。这样多维度的学习与让我们的内心世界更丰富、更细腻、更立体，让焦灼不安的灵魂有宁静的港湾可以停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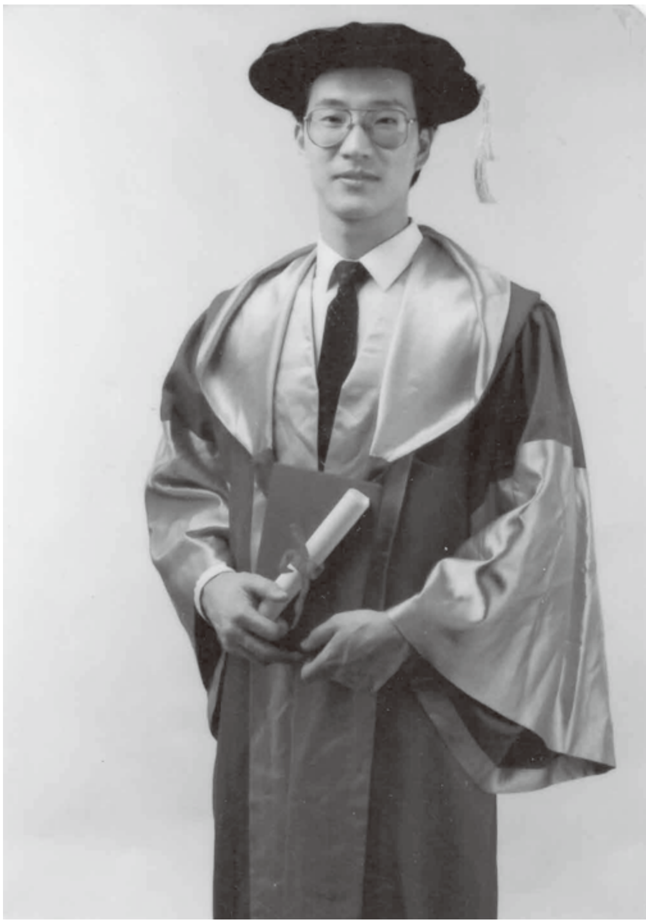
一个人思路开阔了，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

情。比如我的毕业论文《英人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选题最早是朱杰勤先生提出的。朱先生希望通过深入分析赫德的为人及其行事，记录赫德对中国主权的种种侵害，帮助人们加深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但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很多中国近代的中外文化冲突，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侵略与反侵略，应该从更高的维度来看待和评价中国如何与外部世界的融合。中国在反对侵略的同时，也面临如何近代化以及如何与近代世界合拍的问题，而不能继续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感谢朱杰勤老师的胸怀和雅量，也感谢暨南大学有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可以海涵地负，休休有容，允许学生跟老师有不同的见解，允许学生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如果换一个时间或者场景，这是完全不可能想象的。



博士论文答辩现场

记得博士论文的答辩由中大的汤明燧教授主持，参加者有余炎广教授、卢苇教授和黄启臣教授等。汤明燧教授十分赞同我的研究思路和阐述分析。他说：“作者对赫德的评价，在把握其本质的同时，注意到他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现象。作者本着探索精神，尽量避免简单化和片面性，根据事实摆出负面与正面，既注意剖析其主观动机，也注意事物客观发生的社会效应，采取了较全面的分析方法。”论文答辩非常顺利就结束了。



后来我根据这篇博士论文出版了《局内旁观者–赫德》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989年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发表了《试评汪敬虞先生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同年又在《近代史研究》第6期发表了《赫德与中国早期近代化1862–1874》（译文）。这些都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三十多年来，几乎所有关于英人赫德与中国海关史的研究综述都会提及我在暨大期间所作的研究和思考。如戴一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3期），佳宏伟《近20年来近代中国海关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第6期），张瑞霞《晚清海关史研究综述》（《高校社科动态》2010年第 3期）等。

赵雨田在《三十年来国内关于中国近代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研究成果综述》一文中说，“国内研究注重从史学的角度，对赫德在华半个多世纪的活动给予整体评价。在这方面学界曾有不少著作，其中以卢汉超、陈霞飞、汪敬虞、邱克等学者为先。他们以赫德的往来信函、日记等史料为基础，深入研究、系统分析赫德其人其事，成为引领赫德研究的先锋人物”（《经济史》2014年第4期）。焦雨楠《试析赫德对义和团之认知》评价我的《局内旁观者–赫德》是“20世纪90年代赫德研究的新起点”（《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勇在其《赫德与晚清中英外交》一书中把我的《局内旁观者–赫德》称作是“学术界研究赫德与中国近代

外交制度的唯一一部专著”。认为“作者是学术界对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的关系作出比较全面、比较客观评价的第一人，使关于赫德与中国近代外交的理论总结与研究开始起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

在暨大读博期间，1986年中葡举行首轮关于澳门问题的会谈，引起了我的注意。1987年我发表两篇论文《英人赫德与澳门问题》和《英人赫德与中葡澳门交涉史料》，引用了原始档案等材料，勾勒出赫德与澳门问题的主线，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苏小兰2010年在其硕士论文《赫德与中葡澳门交涉》称这两篇论文为“论述赫德与澳门问题较早的研究成果，对于研究赫德与澳门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加深了学术界对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在澳门主权过程的认识。（另见姚翠翠《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赫德研究综述》，《许昌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杨秀云在其博士论文《赫德与晚清中外约章研究》提出，世纪年代以来，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编辑出版，学界对赫德有了更广泛深入的了解，加上学术环境的宽松，一批学人对赫德的研究和评价趋向一分为二，“颇具代表性的有邱克、陈诗启、文松、张志勇、曹必宏、王宏斌等等”。

除此之外，在暨南大学读博期间我还曾在各类学术杂志发表论文和译文二十多篇，如《马可波罗游记的汉译版本》，（《海交史研究》1986年第2期）、《闭关锁国时代广州与日本长崎的比较》（《广州研究》1986年第9期）、《古代花剌子模》（《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古代各国船舶–兼论中国船史与世界船史的关系》（《船史研究》1986年第2期）、《读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论文集》（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8期）、《我国地名与古代造船》（《舰船知识》1986年第7期）、《殷代战车溯源初探》（《中外关系史集刊》1986年刊第1期））、《评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英人赫德与中葡澳门交涉史料》（《岭南文史》1987　年第2期）、《英人赫德与澳门问题》（《广州研究》1987年第12期）、《人类最古老的帆船》（《舰船知识》1987年第12期）、《闭关时代中国人的西方知识_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深切怀念张维华教授》（《海交史研究副刊》1988年第6期）、《读曾鍏波郑和下西洋考略》（《郑和研究》1988年第6期）等。我在暨大期间发表的翻译文章有《有关中国古代来世观念的新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2期）、《英国伦敦布道会档案简述》（《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4期）、《郑和下西洋与郑和船队》（《船史研究》1986年刊总第2期）、《中国海事史研究现状》（《海交史研究副刊》1987年第3期）、《评米尔斯马欢瀛涯胜览译注》（《郑和研究》1987年第5期）、《中国史学家对十五世纪初郑和远征的评价》（《郑和研究》1988年第6期）等。



1988年暨南大学所有研究生毕业留影（作者在后排左六）

抚今追昔，我从内心感恩暨南大学对我的培育、熏陶和塑造。暨大的校园有多大，学生有多少，在国内或者世界的排名如何，这些外在的东西对我并不那么重要。我看重的是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暨大给我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和自由的发展空间，在灵魂的生命里有了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表达以及超越历史的对话与交流，给我未来的发展也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改变。祝愿母校不断发展壮大，培养更多有智慧的爱国精英，成为乐观、自信、坚韧，无畏无惧、勇于接受挑战的一代新人，为民族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白求恩故居访问记

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1890年3月4日—1939年11月12日）是我们从小崇拜的人物。不仅从小学开始就能背诵《纪念白求恩》，上中学后看了根据周而复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白求恩大夫》，更让我对这个把自己生命贡献给中国人民的加拿大人充满了景仰之心。不由让人从内心呼唤白求恩那种真正无私的人道主义精神。

我虽然在北美生活工作了六年之久，以前却一直没有机会去多伦多访问。一直到2008年复活节的时候，才第一次从芝加哥飞往多伦多。一是拜访客户，二是看望久别的大学同学，三是期望去参观一下白求恩故居。没有料到，白求恩纪念馆在冬季和春季是不开放的。这让我郁闷了很久。

2009年夏天，我送孩子去麻省鳕鱼角的夏令营，促成了我第二次访问多伦多，并且终于来到了心驰神往的白求恩故居。

白求恩故居位于安大略省格赫文雷斯特镇，在多伦多市北100多千米处，小镇的建筑和习俗依然保持着20世纪的风貌。格尔湖和马斯科卡湖沿岸的农舍古风犹存，即使没有白求恩的缘故，这里也是加拿大一处有名的旅游胜地。当然我来这里的目的却只是希望拜谒这位英雄的故居。



白求恩故居由一前一后两座白色小楼组成。他出生的房子是维多利亚时代矮小典雅的小屋，具有北美农村的古老风韵。小楼旁种有苍翠的松柏，周围被低矮的栅栏半围着。

另外一个房子是白求恩纪念馆，于1974年建成，陈列着白求恩一生有关的实物和照片。

原来以为来这里的只有中国人，到了这里才发现也有不少加拿大人参观。有个加拿大老太太还带着三个孙子孙女。工作人员告诉我，每天都有不少人从美国加拿大来到这里，暑假的时候还要在外面排队。

在纪念馆有关于白求恩生平的纪录片，解说词分汉语、英语、西班牙语等版本，游客可以随便选择。这部电影是加拿大拍摄的，从中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情况，对白求恩的了解更加全面和深入。

以前从来不知道白求恩还擅长绘画，纪念馆中可以看到他的很多美术作品，表现出他对艺术品的鉴赏力非比寻常。据说白求恩的大部分收入都用于购买当地艺术家的作品上，以此保证这批潦倒艺术家的生计。他还长期无偿教过很多小朋友画画，在蒙特利尔办过儿童美术班。

在1970年中之前，白求恩在加拿大默默无闻。直到两国恢复关系后，加拿大才发现白求恩在中国享有这么崇高的地位。他们赶紧搜寻一切有关白求恩的事迹，采访白求恩的亲人和朋友，加紧宣传。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CNBC曾作过一个调查表明，目前白求恩在加拿大的知名人物的排名中处于26位。

白求恩的父亲是一个传教士，他的很多思想和行为都带有基督的博爱精神。虽然后来也参加了共产党，但他不是一个狂热的激进主义者，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爱人如己，始终都带着一种对人类，尤其对弱势民族的那种怜悯的爱。

他曾中断了他在多伦多大学的生物学学业，在安大略北部伐木场为移民工人开班讲课。

在完成了他的医学学位课程后，白求恩开始在英国和美国行医，后来到了蒙特利尔从事胸外科手术。1933年，他到卡第埃维尔的萨克勒柯尔医院担任胸外科主任。

白求恩在医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为医学刊物撰写过很多文章，介绍新的外科手术并概述他研究所得的改进办法。他设计了好多种新仪器，并不断进行试验，精益求精。其中有一种剪刀叫作“白求恩肋剪”，据说一直到现在还在医院使用。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这是多么高尚和稳定的职业，他完全可以在医学界不断发展，成为所谓的社会精英。

但白求恩完全跟一般的中产阶级的思想相背离，表面上他是一个复杂和变化无常的人，理想主义味道很浓，但他内心深处却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他认为医学不但要注意医疗症状，同时还必须重视疾病的社会根源：“让我们把利润、私人经济利益从医务界里取消，把贪得无厌的个人从我们的职业中清除。让我们把靠自己同胞的痛苦发财当作可耻的事情。”这多么像《罗马书》上说的“爱人不可虚假，应当温柔地彼此相爱”。

1935年他为失业者设立了一所免费诊所，还提出过关于社会医疗保险体制的很多设想。

1936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白求恩志愿赴西班牙服务。抵达马德里不久，白求恩就设想了一个流动输血队的方案，这样可以将城市里捐献的血收集起来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他的流动血库被誉为西班牙内战时军事医学上最伟大的创举。

1937年5月，白求恩回到加拿大，立即开始做横贯全国的演讲旅行，为在西班牙的工作筹款。

然而同年夏季，日本军队侵略中国。白求恩认为，爱是周济有需要的人，“我要到中国去，因为那里的需要最迫切”。他用实际行动给大家做榜样，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

1938年，白求恩告别加拿大，辗转到了延安。当时中国抗战前线的那种简单、纯粹而质朴的氛围，使白求恩突然感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所在——“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是啊，人若没有了爱，就一无是处！

在极短的时间内，白求恩的名字传遍了中国抗日前线。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他说：“我的确非常疲惫，但长期以来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愉快……因为人们需要我。”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死于中国河北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死前他的遗照像一个69岁的老人。他生前最著名的一幅做手术时的照片好像都驼背了，让人感到他已经年过花甲。

这让我想起《圣经》上说的：“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尖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爱是永不止息的！

厚谊常存魂梦里

——深切怀念席龙飞教授

今年元月17日，接到中国造船学会秘书长蔡薇老师的短信，得知93岁高龄的著名造船史专家席龙飞教授由于新冠肺炎，肺部感染严重，已经被送进武汉中南医院呼吸科急救中心。海内外研究中国造船史、航海史、中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的同仁纷纷祈祷，献上真诚的祝福，希望奇迹出现。但席龙飞教授最终还是在元月21日下午永远离开了我们！噩耗传来，大家非常悲痛。我虽然不是席教授的亲传弟子，也不是造船界的同行，但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中西交通史的晚辈，仍然得到过席教授的亲切关爱和无私帮助，更加领略过他睿智的思想、博大的襟怀和温煦的人格。

席龙飞教授出生于吉林省梅河口市，满族人，1953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造船工程系，先后执教于大连海事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席老师在造船史方面是国内最具开创性和代表性的学者，长期参与出土古船的测绘与研究，被誉为“中国舟船文化的活化石”。他从1975年起开始撰写造船史的研究论文，几十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船舶史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二十余本，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席老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思维敏锐，看待问题总有独到的见识，他的著作和文章都值得我们细品精读。

四十年前的1983年，我第一次见到席龙飞老师。那时我刚刚23岁，在山东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有幸参加中国航海史研究会在九江庐山举办的郑和下西洋学术讨论会。在这个空前的郑和研究盛会上，有幸结识了许多在中国造船史、航海史、中西交通史和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知名专家。其中就有来自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现在更名为武汉理工大学）的席龙飞老师和何国卫老师。席老师坦荡儒雅，宽厚仁慈，思维敏捷，性格豪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会议期间，他几次抽空跟我深入交流，不仅给予嘉许和鼓励，还提出不少的宝贵建议，让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的我受宠若惊，深受感动。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学术观点，会后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例如1985年7月3日《光明日报》《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究竟有多大》，7月5日香港《大公报》《郑和宝船有多大 江西会议有争论》，7月24日《文汇报》《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究竟有多大》，1986年1月31日日本《朝日新闻》《详述郑和之航海》等等。

之后我跟席老师一直保持联络，不仅在海交史学会和船史学会多次见面，我写的论文还多次幸运地与席老师“同框”，发表在同一学术杂志或者同一本论文集中。如我写的论文《郑和宝船尺寸记载的可靠性》（原载《文史哲》1984年第3期）与席老师与何老师合作的大作《试论郑和宝船》同时被收入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编《郑和航海学术论文集》（交通出版社，1985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海洋出版社，2005年）。《上海大学文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郑和研究专刊发表了席龙飞老师的《郑和宝船研究的进展》和我写的《论郑和航海图的地名研究》。《舰船知识》同年也出版一期郑和专刊，席老师写了《伟哉郑和宝船》，我写了《国外对郑和宝船的研究》。

1988年之后，我离开了学术界，跟席龙飞老师的联系就少了。但席老师一直没有忘记我这个晚辈，他在很多学术著作和研究综述中总是不忘提及和褒奖我在80年代所做的那一点点工作和努力。如在1999年《中国造船技术的世界贡献》（《武汉造船》第5期）、2004年《郑和宝船的尺度及船型特点》（《船舶设计技术交流》第4期）、2005年《关于郑和宝船的论辩》（收入国家博物馆编：《云帆万里照重洋——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大型郑和宝船存在及其出现的年代探析》（《海交史研究》第1期）、2011年《郑和宝船研究的进展》（中国航海博物馆《中国航海文化之地位与使命》，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与蔡薇老师合写《一九四九年以来船史研究著述纵览》（《国家航海》第1期）等。可以说，席龙飞老师之于我，一直有提携和知遇之恩。

我2005年回到国内定居，又跟席龙飞老师重新取得了联系。大约十年前，席老师到上海参加中国航海博物馆的会议，我在临港新城跟他一起吃饭。那时他已经是八十高龄，但目光炯炯、精神矍铄、底气十足，还可以喝一大瓶啤酒。说起有关船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和论战，更是滔滔不绝，兴趣盎然，好像第一次见面一样，还是那样真诚，那样谦和，那样坦然，至今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此后，每当他的新作出版发表，总是会发给我，或者用快递寄给我，还谦虚地说请我多提意见。2021年11月央视十套播出《李约瑟与中国古代科技》，有席龙飞接受采访的部分，他也特地让我注意观看，这些都给了我不少的启发。

席老师虽然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毕生未改初心，但也不是一位食古不化的老学究，反而心存美好，“兴在趣方逸，欢余情未终”，对生活充满热爱。他经常给我发一些他拍摄的花卉和风景照片，还有他培育的有七片叶子的龟背竹和其他姿态各异，生机盎然的植物盆景，让我强烈感受到席老师的卓异与优雅。

席老师做事一丝不苟，不管是做顾问还是参加研讨，每次参加活动都认真准备资料，凡是涉及学术研究的内容，都要自己亲自手写。为了使立论有根有据，字斟句酌，拈精撮要，有时为了修订

稿子不得不通宵达旦。他说，“只要是做与船史相关的事，再累也会觉得很开心”。

席老师经常说，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席老师十分尊重他的老师--中国造船界的泰斗杨槱院士。杨槱院士1962年在我国发表第一篇船史论文，席老师研究造船史是紧随老师的，“杨先生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但在郑和宝船和广州造船遗址等学术问题上，席老师与老师持不同看法。他通过查阅历史典籍，结合考古最新发现，从而得出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获得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和认可。

席龙飞老师虽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也从不刚愎自用和故步自封。他在《南京静海寺残碑与郑和宝船》（《国家航海》2013年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一文中，曾质疑过静海寺残碑是否为郑和所立。但后来他再读顾起元《客座赘语》，发现在“宝船厂”条中有“和等归建二寺，一曰静海，一曰宁海。”静海寺既为郑和所建，静海寺碑当然也是为郑和所立。据此，他认为原来的质疑是错误的，应当纠正。从此可以看出他从善如流的雅量和胸怀。但是，他坚持“两千料海船不是郑和宝船”的基本观点仍然不会改变。

在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以及造船史和航海史等领域，不少学科带头人本身虽然很有底蕴和名气，但没有培养出老中青不同层次研究人员合理组成的学术梯队，学科建设普遍存在着青黄不接的现象。席龙飞老师几十年间孜孜不倦编写教材，呕心沥血教导学生，桃李满天下。他带头在武汉理工大学组建了船舶史的研究团队，由他和他的助手以及学生们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学术团队。他说，近年有很多报道，往往是把别人的业绩加在我的头上。其实这是我们造船史研究中心整个团队共同完成的。他与一些中青年的工作者，一起写文章，都会把自己名字放在末位，让他们作第一作者，把机会和责任留给年轻人，提高他们的知名度，也让他们多见世面。“我觉得现在的后辈们一定会比我们强，长江后浪推前浪，对此我很有信心“。席老师高风峻节，令人仰慕。

我每次给席老师发信息或者邮件，他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予回复。我提出的问题和请求，他总是想办法帮忙解决，每次都是加以鼓励，并提出很多宝贵意见。这次仅举两个例子。

2021年7月我把新写的一篇论文《李昭祥龙江船厂志的史学价值和海外影响》寄给席老师，请他指正。席老师非常高兴，他说：

> 邱克好友：喜读您的大作，首先应当向您表示祝贺，祝贺这一篇极具重要研究成果的著作问世。大作对撰著者李昭祥的生平研究极其详尽。对《龙江船厂志》的写作背景及其成就也具有深刻的阐述。对《龙江船厂志》的史料价值，论述深刻得当。对《龙江船厂志》在海外影响的研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我对这一篇大作的成就十分钦佩。

但肯定的同时，他也提出一些不同的见解。我在文中说“南京龙江船厂，是明朝建立最早、规

模最大的官办造船企业，郑和下西洋之很多船只应该是在龙江船厂建造的”。对此席老师说他很难赞同。

第一，龙江船厂很小，所建造的船舶有400料战座船。这样的小船是不能远航的。史料记载郑和船队中最小的船舶是1500料和2000料的战座船。龙江船厂是不能建造1500料和2000料战座船的。

第二，龙江船厂所建造的船舶要通过秦淮河才能到达长江。秦淮河如此之小，怎么能通航2000料海船？江苏古籍出版社《龙江船厂志》（1999年本）第98页的《厂图》有“秦淮北通江”5字。

第三，请参阅南京大学出版社《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第39页，当年洪长倬文章中的 “南京明造船厂示意图” ，龙江船厂在秦淮河畔，宝船厂则在长江之畔。相距悬远。当年杨槱教授就是坚持：“龙江船厂所建造的船舶” 最大不会超过10丈。

最后席老师建议说：

邱克好友，删去“郑和下西洋之很多船只应该是在龙江船厂建造的”句，既不影响大作的宏伟，又不留不确定的字句。何乐而不为？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的疏忽。早在2004年9月席老师应邀出席“南京龙江宝船厂遗址考古发掘评审会”时，他就提出南京有个龙江船厂，位于秦淮河与城壕之间，建于洪武初，厂区很小。南京还有个宝船厂，位于长江之滨，建于永乐初，厂区很大。不能将龙江船厂与宝船厂混为一谈。2006年6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宝船厂遗址－南京明宝船厂六作塘考古报告》，也扬弃了“龙江宝船厂”的说法。

这段学术经历实在是令人难忘，让我充分领略了席老师帮助和奖励后学的大家风采。

去年6月份，我告诉席老师，我和戴开元在80年代曾经翻译过《海洋考古学》，1992年由海洋出版社出版，今年计划再版。原书中有一张山东梁山发现的古船照片非常不清楚，我看到席老师的《中国造船通史》中有一张梁山古船的总布置图，想征得他的同意，放入他的原图。当天，席老师就在电脑上找到原图，晚上九点半就把原图发给了我。原打算等该书再版后送席老师指教，不想老师却遽归道山，乘鹤仙去，使我失去一次向席老师请教的机会，感觉无比遗憾。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这个学校的光荣，一个学科有一个好的带头人是这个学科的荣幸，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席老师

就是这样的一位好老师，好带头人。每当我跟同行谈起他的时候，大家无不认可席老师是最好的老师，最优秀的学者。席老师的逝世，让中国造船史学界失去了一位著述等身、声华盖代的大师，我也失去了一位诲人不倦的恩师和莫逆于心的益友。席龙飞老师虽然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博大胸怀，以及对后辈学者的竭力扶持，永远让人感怀。

厚谊常存魂梦里，深恩永志我心中。

邱克

历史考古文博论文集

本书收集了我国中外关系史专业博士邱克在历史、考古和文博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作者潜心研究中西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对几千年来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颇具新意，视野开阔，分析深刻，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给人以全新的启迪，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本书对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航海史、造船史、海洋考古、博物馆学等学科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适合大专院校师生及文史爱好者阅读。

邱克●著

ISBN 978-7-89544-623-6
9 787895 446236 >
仅配光盘使用

线装書局

邱克 历史考古文博论文集

邱克●著

邱克

历史考古文博论文集



线装書局

作者简介



邱克，1960 年出生于陕西西安。1972–1978 年西安外国语学校。1978–1982 年山东大学考古专业。1985–1988 年山东大学中西交通史硕士研究生毕业。1985–1988 年在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外关系史博士研究生。1988 年后下海经商，主要从事对外贸易。

1985 年参加编写《郑和下西洋》（导师张维华主编，交通出版社，1985 年）

1990 年出版专著《局内旁观者 – 赫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1992 年出版译著《海洋考古学》（与戴开元合译，海洋出版社，1992 年出版，2022 年再版）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介绍国外海洋考古学的译著。

1994 年出版论文集《中国交通史论》，人民交通出版社。

曾被聘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上海大学博物馆兼职研究员，上海海事大学郑和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上海大学博物馆《博物馆与新科技》副主编，《郑和研究》和《海关研究》特约撰稿人等。

近年主要研究博物馆文创产品以及科技在考古文博方面的应用等领域。主要领导的项目包括（1）开发山东省博物馆鲁王墓虚拟展厅；（2）开发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资源信息库及检索系统；（3）开发中国国家文物局对外交流中心出国文物展览点交软件，系全国首创点交自动化软件；（4）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网站以及支付平台的设计与建设；（5）参与上海大学博物馆数字博物馆，网站建设，微课程，博物馆宣传片摄制等；（6）与山东大学考古系共同开发模拟考古教学软件；（7）开发和运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网站等。

所获奖项：

1988 年 7 月参与《古今对照郑和航海图》项目获得军队级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015 年文创产品“桃花双授风灯”荣获首届上海市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二等奖；

2017 年在第 13 届全国人机交互学术会议人机交互与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大赛上获得优秀创新项目奖；

2018 年“面向博物馆和视障群体的虚拟触觉和嗅觉技术”荣获浙江省技术发明奖三等奖